

20世纪
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

下册

A Chronicle of Historiography in 20th Century China

王学典　主编



国家社科基金
GUOJIA SHEKE JIJIN HOUQI ZIZHU XIANGMU
后期资助项目

http://www.cp.com.cn

ISBN 978-7-100-10691-7



定价：256.00元（全二册）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

下册

A Chronicle of Historiography in 20th Century China

山东大学985工程二期
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团队项目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
（1900～1949）
下册

王学典 主编
陈峰 姜萌 编撰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王学典主编;陈峰,姜萌编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ISBN 978-7-100-10691-7

Ⅰ.①2… Ⅱ.①王… ②陈… ③姜… Ⅲ.①史学史-中国-20世纪 Ⅳ.①K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0695号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

王学典 主编

陈峰 姜萌 编撰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691-7

2014年11月第1版 开本710×1000 1/16

201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63¼

定价:256.00元



1900 年 / 1
1901 年 / 7
1902 年 / 19
1903 年 / 43
1904 年 / 66
1905 年 / 82
1906 年 / 99
1907 年 / 110
1908 年 / 120
1909 年 / 130
1910 年 / 139
1911 年 / 149
1912 年 / 157
1913 年 / 167
1914 年 / 177
1915 年 / 186
1916 年 / 197
1917 年 / 207
1918 年 / 219
1919 年 / 227
1920 年 / 242
1921 年 / 257
1922 年 / 268
1923 年 / 289
1924 年 / 317
1925 年 / 334
1926 年 / 353
1927 年 / 372
1928 年 / 391
1929 年 / 423
1930 年 / 456
1931 年 / 489
1932 年 / 521
1933 年 / 551
1934 年 / 590
1935 年 / 634
1936 年 / 682
1937 年 / 731
1938 年 / 762
1939 年 / 777
1940 年 / 797
1941 年 / 820
1942 年 / 849
1943 年 / 863
1944 年 / 883
1945 年 / 903
1946 年 / 917
1947 年 / 934
1948 年 / 954
1949 年 / 974
后记 / 993

1931 年

※《读书杂志》创刊。
※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出版。
※ 陈垣《〈元典章〉校补》、《敦煌劫余录》出版。
※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出版。
※ 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史》出版。
※ 刘复编《敦煌掇琐》上集出版。

1 月

1 日　谢兴尧开始在《北平晨报》撰写专栏“洪杨卮谈”。

此专栏止于 1932 年 4 月，所写皆为太平天国史事，如《忠王李秀成之死及其供词质疑》等，谢兴尧亦以此为学界所知。

《二十世纪》月刊创刊。

此为叶青主办的综合性理论刊物，以思想批判为特色。最主要的工作是宣扬科学理论、批判胡适。

15 日　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由中国经济研究会出版。

任曙认为中国社会已经进入资本主义。他以对外贸易的发展证明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

任曙持“外烁论”，他说：“不管你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商业资本主义如何的估价，总不能不承认近八十年来中国才有急剧的变动，而这一变动的原动力便是帝国主义经济的入侵，由此才有新的都市以及外与世界市场内与穷乡僻野相联系的新式商业、新式农业、新式工业，以及金融经济。”在他看来，“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取得支配地位，以及在全部中国经济生活中起了决定意义，不是由于中国整个资本主义内在的发展，而是因为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入商品的关系”。列强的入侵，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使封建的生产关系彻底解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

任曙说："撇开帝国主义，中国的经济性质实无从谈起"；"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占最重要的地位，我们研究中国经济时、应当把它放在第一位，不能有丝毫的忽视"；"中国资本主义问题是要从帝国主义问题去求解决的"，"当我们研究中国资本主义时，绝对不应当把整个资本主义中给它划分一个界限，认为这是国货的资本主义，那是洋货的资本主义"。

此书在1930年12月写成，1932年出修订版。

是月　雷海宗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2卷第1期发表《殷周年代考》。

雷氏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吸取其他科学的研究成果，如"温带人类生理"的知识来推断殷周的年代，最后认为《竹书纪年》所记"周元"和盘庚迁殷的年代"当为可信之历史记载"，即"周元"为公元前1027年、盘庚迁殷为前1300年，并认为即使有误差，"前后相差亦必无十年之多"，而"商元"只能定位公元前1600年左右。

朱士嘉、顾颉刚在《社会问题季刊》第1卷第4期发表《研究地方志的计划》。

作者指出："我们现在寻找材料，要转向社会方面去了；因为那里有露骨的风土人情，切实的国计民生。这条路，除了我们自己开辟之外，若要在旧材料里找，那只有叩地方志之门了。"

范文澜《正史考略》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

此书叙说中国史学的流变，分析著史得失，书前绪言引许慎、江永、吴大澂、王国维等人关于"史"字的解说，考论史书的由来，广泛评述《春秋》、《史记》以下的史书及其作者。

冯承钧编撰《史地丛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辑译自伯希和、沙畹、冯承钧等人发表在《巴黎亚洲学报》、《荷兰通报》和《河内远东学校校刊》上的西域历史地理论文集。1933年1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冯承钧编译的《史地丛刊续编》。

2月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冯著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上起先秦孔子，下迄清代经学，是第一部用新的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通史。此书把中国古代哲学的演进历程划分为子学、经学两大时代，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经学时代。冯友兰还运用唯物史观的学理，揭示哲学发展的深层动因，

从社会经济变动来解析思想变动。正如冯氏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的："唯物史观的一般原则，对于我也发生了一点影响。就是这一点影响，使我在当时讲的中国哲学史，同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有显著的不同。"此前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材料真伪与文字考证上用力颇勤，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更强调思想的挖掘与义理的阐发。冯友兰将此概括为"汉学"与"宋学"两种方法的不同。

陈寅恪和金岳霖为本书作《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岳霖的《审查报告》说："写中国哲学史就有根本态度的问题，这根本的态度至少有两个：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金岳霖指出，"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主张写出来的"，这种哲学主张即实用主义。"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胡著和冯著虽然都是"在中国的哲学史"，"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遍的哲学问题"来确认中国哲学的存在。但金岳霖肯定冯著所注重的"不仅是实质而且是形式"，因而它避免了按某种西方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

1934 年由商务印书馆一并出版上下册。1953 年，冯著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英译本，译者为美国卜德（Derk Bodde）教授。该书至今仍是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

陈垣《〈元典章〉校补》由北京大学国学门出版。

该书正文 10 卷，另有《札记》6 卷、《阙文》3 卷、《表格》1 卷。《元典章》是一部元代法令的汇编，因其文字芜杂，清代《四库全书》仅入存目，流传极少，清季沈家本将此书重新刊刻（实为董康刊，沈家本跋），始广行世。沈氏刊本虽写刻精良，但底本较差，错误百出，而且此本流传又广，对读者的贻误不浅。因此，陈垣选取沈刻本为底本，根据故宫藏元刻本及四种旧抄本精心校勘，校出沈刻本讹误、衍脱、颠倒、妄改及行款，元代用字、用句、名物等错误。陈氏此书是校勘整理元代历史文献的一项重要成果，成为研究元史的案头必备书，学人大受其惠。

谢国桢《清开国史料考》6 卷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

此书辑录从明建州卫设置至清兵入关前的历史资料 230 余种，共四类：清初之档册、明人对于清代之记载、清代官纂和近代追述之书、朝鲜日本等国之相关记载。凡当时所能见到的书籍及其有关篇章几乎全部网罗，对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本也比较其优劣，是清史研究中第一部系统考证资料来源的著作，具有研究指南的性质。此书后来多次再版。

江恒源编《中国关税史料》由人文编辑所出版。

该书共18编，收录民国建立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关于关税记载和论述，涉及海关行政、关税与外债、关税自主、税则修订，并附有研究关税的论著目录。该书由于其内容的丰富，成为研究民国初期关税等问题的基础性文献。

《〈说苑〉引得》、《〈读史年表〉附引得》由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认为《说苑》一书"保存古代史料甚多"，"特就《四部丛刊》为本编引得，并举卢文弨《〈说苑〉校勘记》中之异文所在，俾便检对。又就其他十二种版本与《四部丛刊》本对照，制就各版《说苑》页数推算表，以免根据一本所作之引得，不能适用于他们之弊"。《读史年表》"共二十四张，始汉迄清，代为一表，详注公历年数与各帝王之年号，庙号，名讳，陵号，以及代讳诸字。并附有标年度尺一，中印甲子纪元，用以量各表两旁之尺格，则年数可不劳指算。表附有引得，其排列一依庋撷方法，颇易寻检。篇首有洪煨莲教授序文，详言年表起于汉代及汉前纪年不易考订之故"。

这两部工具书是洪业负责的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的第一批成果。从1931年至1950年，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共编辑出版了引得64种，主要集中在经、史和子部，编纂方法或索引一书，或多种书籍合并，或索引人名，或索引语句。这些引得系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亦是民国整理国故的最大成果之一，对当时及后世学术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

全书分古代诗史、中代诗史、近代诗史三卷，为自先秦至宋元的诗歌研究。在1955年为《中国诗史》新版所作序言中说："这书初稿是在1925—1930年间写成的。那时我们一方面受了五四运动右翼'整理国故'的影响，一方面也一知半解地浏览了一些1927年以后翻译出版的左翼文艺理论书籍。"

黄文弼《高昌》（第一分本）由西北科学考查团出版。

同年5月出版《高昌》（专集），皆系黄文弼对所发现高昌遗址的考古报告和对相关文物的研究成果。

王志瑞编《宋元经济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分从手工业、矿产、交通运输、商业、都市、货币及钞法、农业

及地理、租税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宋元两代的经济情况。

叶青在《二十世纪》月刊第 1 卷第 2 期发表《怎样做“文化运动”？——评胡适博士底理论》。

刘麟生《中国沿革地理浅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日）内藤虎次郎等著、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3 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庄心在著、陶希圣校《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由上海卿云书局出版。

3 月

21 日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进行第 4 次发掘。

此次发掘由李济主持，参加者有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吴金鼎、王湘、石璋如、刘燿（尹达）等。此次发掘至 5 月 12 日止，共发现有字甲骨 781 版，梁思永在后岗发现字骨版一片，这是首次在小屯以外地区发现甲骨文字。

30 日　西陲学术考查团成立。

西陲学术考查团由国家拨付经费，国府指定各学术机关参加，以蔡元培、李石曾、陈布雷、翁文灏、傅斯年、徐炳昶等为理事，蔡元培为理事长。考查团分为地理、地质、生物、人类、考古五个组，预定 1932 年 4 月出发，时间预定为四年。

是月　陈垣《敦煌劫余录》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

据陈垣记述：“十八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嘱编北平图书馆敦煌写经目录，予乃重理旧稿，删其复出，补其漏载，正其误考。”另据刘乃和记述：“当时有的朋友曾劝他在序中不要直接提名（即伯希和、斯坦因等），因为他们来中国，在学术界集会上彼此还常常见面，而且‘劫余’二字太刺激。是否改一名称。他说：‘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敦煌劫余录》是一部目录学著作。书凡 14 卷，著录写经 8679 号，兼采中国传统目录与近代西方目录索引的编制方法进行编排，稽核同异，分门别类。首曰“总目”，著录书名、译撰者、卷数、轴数、页次等；次曰“检目”，将原轴编号即排架号按千字文顺序排列，以便查索；再次为各轴介绍，略仿赵明诚《金石录》前十卷体式，每轴著其原号、起止、纸

数、行数及内容。……每轴经卷著录之后，又有“附记”，为各轴简要考证与说明。陈寅恪在为该书撰写的序中指出，本书“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有“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的功绩。

是书一经问世，便受到学术界的盛赞。胡适极为推崇：“敦煌石室所藏写本，凡数万卷，十三余年来分散各地，……巴黎的目录最先出，但很简略，伦敦的目录开始很早，到最近才有完成的消息。北平的目录，胡鸣盛先生主编，近年才编完，虽然没有印行。另有陈垣先生的《敦煌劫余录》流行于世，其考订之详，检查之便利，已远在巴黎、伦敦诸目之上。”

罗家伦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1号发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

作者认为“最近人事的历史，影响于人类或人类的某一部分——民族——也最大。要知人类或民族过去的来历和演进，现在的地位和环境，以及他将来的生存和发展，都非研究近代的历史不可”，故“做近代的人必须研究近代史，做中国近代的人更须研究中国近代史”。罗氏指出，虽然研究中国近代史是实际的需要也是知识的需要，“但是现在看重这种研究的很少——当然带营业性的中国近代史出版品也很多，学术界却不能认为研究”。

罗氏特别强调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指出“我所谓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主要的部分就是整理中国近代史料的方法”，第一步是“放开眼光，扩大范围，随时随地和猎狗似得去寻材料”，然后再在史料的整理翻译考订上下苦工，编成中国近代史料的丛书，最后“有这各部分的史料丛书几百种以后，才可以动手写科学的中国近代史”。

有研究者认为，罗家伦此文“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

齐思和在《朝华》第2卷第4期发表《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

作者对当时史学发展现状进行综述。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中心的史学流派迅速壮大，取得了不菲的业绩。这使得以“古史研究”为中心的史学在人文学术各部门中异军突起。齐思和从“地下史料之发现”和“出版之史学书籍”两方面，总结、赞扬了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新史学”取得之成绩。

吕思勉《理学纲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是吕思勉 1926 年在沪江大学的讲义，梳理了理学的源流、派别及其对社会风俗的影响，并专门论述了理学名家的思想。

潘光旦在《人文》第 2 卷第 2、3 期发表《人文史观与“人治”、“法治”的调和论》。

作者提出“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归宿”的人文史观。

4 月

1 日 《读书杂志》创刊于上海。

编辑者为王礼锡、陆晶清，自第 3 卷第 5 期起改由胡秋原编辑，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王礼锡在日本期间已经酝酿出版《读书杂志》。1930 年 12 月初，他与留学生胡秋原、朱云影、贺扬灵、王亚南、汪洪法、梅龚彬等商讨，决定将“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寻求中国社会的前途”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并强调要“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

创刊号《读书杂志发刊的一个告白》指出：“我们的内容包括三点：第一是讨论读书的门径，第二是发表读书的心得，第三是沟通海内外各方面读书者的个人与集体的联络。”并宣称：“我们不主观标榜一个固定的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一般地忠实介绍；革命文艺作家的作品和趣味作家的作品一样登载。我们这里的文字不统一于一个主张之下。我们尽管有思想的斗争，但编者并不偏袒斗争的那一方面以定取舍。因为我们不是宣传主张的刊物，而是介绍主张的刊物。我们这里不树立一个目标，而是为读者提供出已走过、正在走着或者想走去的许多途径。”

它是一种政治与文化理论综合性月刊。主要撰稿者有王礼锡、陆晶清、胡秋原、陶希圣、朱其华、王亚南、郭大力、周谷城、彭芳草、贺扬灵、汪洪法、彭信威、朱云影、朱伯康、朱新繁、杨玉清、周绍溱等。它内容广泛，辟有经济讲座、书籍的介绍与批评、物观文学史丛稿、新心理讲座、社会讲座、科学讲座、论文、文艺论战、文学讲座、艺术讲座、文艺时评、译文、世界文坛消息、国际讲座、国外生活、读者之页，以及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等栏目。

1933 年 9 月 1 日出版第 3 卷第 7 期后停刊。

陈训慈在《史学杂志》第 2 卷第 5、6 期合刊发表《清代浙东之史学》。

文章内容包括“浙东史学之渊源”、“清代浙东史学之统系”、“黄梨

洲之史学”、“万季野与明史”、“万氏考礼之学”、“全谢山文献之学”、“章实斋之论史与方志学”、“邵二云之史学”、“定海黄氏父子对古史之贡献”、“浙东史学之特色”等。本文被认为是清代史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论著之一，有研究者指出，自此文之后，“浙东史学”被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被学术界接受。

同期还刊载了柳诒徵《江苏钱币志初稿》，汤用彤《摄山之三论宗史略考》，缪凤林《汉胡混合之北统》、《西汉诸帝与外戚之祸》，陈汝衡《评话研究》等文。

16日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后岗遗址进行第1次发掘。

梁思永主持，吴金鼎，刘燿参加。因“地方上忽然发生了军事行动”，此次发掘至5月12日匆忙结束。此次发掘基本解决了龙山文化和小屯文化的年代关系。

是月　陈寅恪、傅斯年、徐中舒等编审《明清史料》甲编10册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傅斯年在发刊例言中云：此所刊布，皆整理中随时检出，以为值得流通世间者。最完美之办法为俟整理完事，再将一切认为可以刊印之篇，详加别择，以类相从，附以考定而刊行之。如此可为一个整个之制作。然似此事业，完工不可期之于十年之内。国内学人近年已甚注意档案一类之直接史料，不早刊布，无以答同祈求者之望。且校订考证之业，参加者多，成功益美。若先将“生材料”按月刊布之，则据以工作者不限吾等，凭作参考者不分地域。于是不待整理完功，先分期刊行之。非敢草率将事，正以求其友声云尔。

1935、1936年分别编印乙、丙两编各10册，1948年编定丁编10册，1951年由中国科学院出版，后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根据运往台湾的明清档案，又将《明清史料》出至癸编（1953年戊编、1957年己编、1960年庚编、1962年辛编、1967年壬编、1975年癸编）。总计10编100册，1000多万字。1985年中华书局又影印该书。

此书刊布了从明隆庆元年（1567）至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近二百年间形成的10300余件官方档案史料，其中包括明天启、崇祯、清顺治、康熙等朝的敕、诏书、诰命、谕、题本、奏稿、塘报、揭帖、图、单，以及内阁各项档案、外交文书等。其内容多是关于明末辽东战争、农民战争，清初社会各阶层的抗清斗争以及有关郑成功的史料，其中前两种资料尤能补其他史书之缺漏。此书为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原

始资料。

徐中舒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 本第 3 分发表《殷周文化之蠡测》。

此文对《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提出的殷周似属两种民族的观点继续深化论证，并认为周迁岐后，“以新兴的民族而承受殷人的文化，兴革制作，遂得为极度的发展”，殷周在文字、生活习俗、器物货币等“全趋于一致”，但姓氏、历法、亲族等有不同，乃是由于民族习惯不同所致。最后作者认为“中国文化在殷周之际，很少的受到西方（周）文化的影响。周人的勃兴，恰好做了中国文化的大护法与传播者。后来所谓先秦的灿烂文化，在殷文化来源未明以前，我们是可以肯定的说这都孕育于殷商一代”。

同期还刊载了赵邦彦《九子母考》，高本汉著、王静如译《论考证中国古书真伪之方法》，王静如《论阻卜与鞑靼》，陈寅恪《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等文。

周予同《群经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由“导论”和“本论”组成。“导论”探讨了“经的定义”、“经的领域”、“经的次第”、“六经与孔子”、“经学的派别”等问题；“本论”分章探讨了《易经》、《尚书》、《诗经》、《三礼》、《春秋》、《论语》、《孝经》、《尔雅》、《孟子》著“经”名称的来源、作者、篇目，以及经学的派别等问题。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是反对统治者利用经学迷惑青年，故有普及的性质，语言内容力求“浅显又深入，生动又准确”，是了解经学史较好的入门书。商务印书馆 1933 年将其收入“百科小全书”、1947 年收入“新中学文库”再版。

此月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万有文库”出版的还有明陈邦瞻著、臧懋循补辑《元史纪事本末》、孙诒让《墨子间诂》、江藩《宋学渊源记》、陈柱《老子与庄子》等书。

裴文中主持发掘周口店遗址的“鸽子洞”洞穴。

首次发现大批人工打制的石英制品，同时还发现了人类用火的痕迹。贾兰坡从此次发掘开始加入对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

孙曜编著《春秋时代之世族》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系中华书局“史学丛书”之一，内容有春秋时世族的起源、形质与精神、教育，各国世族之概略，世族制度及世族衰落的原因等，书后附“春秋各国世族表”。1936 年中华书局再版此书。

束世澂《中英外交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从分别梳理了中英之间的战争、英国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英国对华土地的侵略、英国对华的经济侵略等内容，并综合性地分析了中英的外交情况。

罗邕、沈祖基合编《太平天国诗文钞》修订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内有张元济据俞大维在德国普鲁士图书馆摄录的照片校补编入的《天条书》等8种印书。

商务印书馆出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40册。

山西公立图书馆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等合作，发掘山西万泉荆村仰韶文化遗址。

（英）殷格兰姆著、唐道海译《奴隶制度史》由新生命书局出版。

（英）古池（今译古奇，G. P. Gooch）著、黄公觉译《民族主义史》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

丰子恺《西洋美术史》由开明书店出版。

沈漫若《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中国》由中华印书局出版。

罗根泽《管子探源》由中华书局出版。

钟挺秀、李卓编译《近代政治思想史略》由中华书局出版。

孙楷第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5卷第2号发表《三言二拍源流考》。

孙文青在《女师大学术季刊》第2卷第1期发表《九章算术源流考》。

5月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20周年纪念特刊》发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

此文呼吁“学术独立”。陈氏开篇即以强烈的语气指出：“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陈氏接着从自然科学谈起，一直谈到人文学科的发展现状，一一痛下针砭。对史学文学思想艺

术史的研究状况，多有批评，特别不满于全国大学在国文方面，“皆不求通解及剖析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虽有贤者，势不能不以创造文学为旨归。殊不知外国大学之治其国文者，趋向固有异于是也”。

他还表达了面对西方汉学突飞猛进的危机感。陈寅恪说：“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2 册由大东书局据著者手迹影印出版。

本书系作者近年来研究甲骨卜辞的论集，通过一批已识或未识的甲骨文字的考释，以阐述殷代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该书分两卷：第一卷收论文十六篇，即《释祖妣》、《释臣宰》、《释寇》、《释攻》、《释作》、《择封》、《释挚》、《释版》、《释耤》、《释朋》、《释五十》、《释龢言》、《释南》、《释岁》等；第二卷收论文一篇，即《释支干》，另有《附录》、《后记》。其中《释祖妣》、《释臣宰》、《释岁》、《释支干》四篇收入《沫若文集》十四卷《甲骨文字研究》。

作者序云：“余之研究甲骨文字，志在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本非拘拘于文字史地之学。然识字乃一切探讨之第一步，故于此不能不有所注意。且文字乃社会文化之一要征，于社会之生产状况与组织关系略有所得，欲进而追求其文化之大凡，尤舍此而莫由。”

《燕京学报》评曰：罗振玉、王国维于商代文字“未尝不有所阐发”，但因“经典所束缚，虽知卜辞中有多父多母之事实，而必曲为之说，以免离经叛道之嫌。郭君治社会学，知家族进化之历史、血族群婚、亚血族群婚、乃婚姻之演进一定之邮程，故直言无隐。此种新解识，于甲骨文字上实有相当之贡献”。

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由大东书局石印手稿本。

作者研究金文最早的论集。此书上卷所录为殷末周初之古文，下卷前六篇为春秋时代之文献。评论者认为此书长处在于“独出心裁，不拾前人牙慧”，但也存在“张皇其辞”等问题。

1954 年作者曾略作删改，增加附录，由人民出版社排印出版。1961 年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刊甲种第七号，由科学出版社重印。

钱基博编《国学文选类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在“序”中用“新汉学”来称呼整理国故派，指出“新汉学”在当时谈国学者心目中的地位及其所以盛行的原因。

钱基博指出，在“新汉学”横扫学界之际，独有“丹徒柳诒徵，不

询众好，以为古人古书，不可轻疑；又得美国留学生胡先骕、梅光迪、吴宓辈以自辅，刊《学衡杂志》，盛言人文教育，以排难胡适过重知识论之弊。一时之反北大派者归望焉”。但钱氏也承认，自《学衡》创刊以迄于今，以“议论失据”及“东大内畔”之故，目前以“新汉学”一派处于上风。钱基博又用“古典主义”与“人文主义”来判别“北大派”与“东大派”。钱基博力言“学衡派”的“人文主义”优于“北大派”的“古典主义”；提出“‘古典主义’者，国学之歧途；而‘人文主义’，则国学之正轨；未可以一时之盛衰得失为衡也!”但一般人仍认为“新汉学”才是“国学之正统”。钱基博最后感叹道：“‘古典主义’者，特国学歧出之途，……论者乃以国学之正统目之，傎矣!”

钱穆《国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全书分从“孔子与六经”、“先秦诸子”、“嬴秦之焚书坑儒”、“两汉经生经今古文之争”、“晚汉之新思想”、“魏晋清谈”、“南北朝隋唐志经学注疏及佛典翻译”、“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最近期之学术思想”十个方面来梳理国学。

臧励龢主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上起远古，下迄现代，“凡吾国地名有为检查所需要者，均参考群书，调查甄录，于古则详其因革，于今则著其形要，上下纵横，古今悉备”。全书近四万条，二百多万字，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地名词典。

《金陵学报》创刊。

该学报由金陵大学负责编辑刊印，半年刊，哈佛燕京学社提供经费支持，文理综合性刊物，撰稿人主要为金陵大学师生。至1937年抗战爆发，出版至第7卷第1期。抗战期间，在李小缘、钱能训等人的努力下，《金陵学报》又出版至第11卷。

吴景超在《金陵学报》创刊号发表《两汉多妻的家庭》。

作者认为研究这类问题，“从科学的眼光看去，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当然不如用个案法的完善。但用个案法以研究这个问题，困难很多，在这些困难没有打破以前，历史法颇有一试的价值”。文章梳理了汉代多妻的情况，认为多妻制存在的主要原因是有钱有势的人想“御声色”，多妻制也是导致诸多家庭问题的根源。这一时期吴景超对汉代社会史多有研究，成果有《两汉的人口移动与文化》（《社会学刊》第2卷第4期、第3卷第2期）、《两汉的寡妇再嫁之俗》（《清华周刊》第37卷第536—537号）等。

创刊号还刊载了万国鼎《两汉之均产运动》、《汉以前人口及土地利

用之一斑》，陈登元《秦桧评》，吕凤子《中国画与佛教之关系》，张守义《中国古代书契制度》，黄云眉《〈周礼〉五史辨》，（日）田中萃一郎著、王钟麟译《西人研究中国学术之沿革》，刘国钧《两汉时代道教概说》，张龙炎《殷史蠡测》等文。

冯承钧《景教碑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汇集诸家《景教碑》之考证著述，证以当时西方汉学家之研究成果，考其谬误，被其阙遗，而成是书。

中国大学《国学丛刊》创刊。

吴承仕任编辑。因与北平师范大学《国学丛刊》同名，故从第2期起，改名为《国学丛编》。

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清代文字狱档》第1辑由北平国立研究院出版。

至1934年共出版9辑，系雍正、乾隆两朝65起文字狱原始档案的汇编，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又因注明出处、相关档案缺失情况等，较便利用。

（日）木宫泰彦著、陈捷译《中日交通史》上下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6月

6日　陈垣在《师大史学丛刊》创刊号发表《日本文学博士那珂通世传序》。

作者历数那珂通世之学术成就，批评中国学界不注意东洋史学科之综合研究："从来学者多仅守一隅，罕闻有东洋史学科之综合研究。乃那珂氏独创设之，其说明此科之要领有曰：'东洋历史应以支那为中心，而并述东洋诸国之治乱兴亡，以及支那种、突厥种、女真种、蒙古种之盛衰消长。'谅哉言乎！自是之后，日人对吾国历史研究之进步，一日千里，然吾人对于日本历史，尚多漠然视之，奇也！又清代以来，专攻元史者辈出，然能以汉文翻译蒙古史籍者，殆不数见。今那珂氏乃以日文译蒙古文籍，成绩卓著，因蒙古文属阿勒泰语系，与日本文法相同，一语一语直译，无须增减，即可成文，此秘自那珂氏发之，故日人研究蒙古文者渐多。吾人若不急起直追，将来势必借日文以考蒙古文献，宁非学界之耻？"

《师大史学丛刊》为北平师范大学史学会主办，创刊号还刊载了陆懋德《西方史学变迁述略》，（日）三宅米吉著、黄子献译《日本文学博士

那珂通世传》，柴德赓《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上），张鸿翔《南北朝史日蚀表》，王云渠《西汉徙民于诸陵考》，李树峻译《历史研究法》，Paul Cressey 著、雷震译《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发展上之影响》等文。

黄公觉在《师大史学丛刊》创刊号发表《新史学概要》。

该文从新史学的起源、历史概念、性质、与社会科学关系，一直到“我对于治史学者的希望”，完全本之鲁滨逊学说。所列书目除兰普雷希特外，其他也都属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如《新史学》、*The New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tudies*、*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History and Social Intelligence*。其中专拟“新史学与社会科学之关系”一节，提到：“旧史学是闭门造车的东西。新史学则是与各种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结婚的产物。若是历史和社会科学一离婚，它就马上变成旧史学了。”

30日　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由新生命书局出版。

严灵峰将其在《动力》上的两篇代表作《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和《再论中国经济问题》，又加了一篇《我们的反批评》及《序言》，编成此书。

本书以马克思的经济观点来分析中国经济。严灵峰认为，在方法论上，“必要懂得辩证的科学方法之应用于实际的研究上，以及对于抽象的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的深刻了解”。

是月　郭鼎堂（郭沫若）在《燕京学报》第9期发表《〈汤盘〉、〈孔鼎〉之扬搉》、《臣辰盉铭考释》。

《〈汤盘〉、〈孔鼎〉之扬搉》一文对汤盘、九鼎的铭文提出新的解释，认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原文当是“兄日辛、祖日辛、又日辛”，并推测或是兄、祖、父三名并列一器，后因有损渍，《大学》作者遂误读成一句道德训诫之语。此文刊登以后，立即引起学界关注。程千帆后来还将郭氏对“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新看法引为“以金石文字校正古书一个较著名的例子”。余英时指出，其实这是一个永远不能证实，也无从否证的猜测，但是郭氏“由想象力而生的巧思也由此可见其一斑”。

《臣辰盉铭考释》是对新出土的臣辰盉之铭文进行考释。有研究者认为，郭沫若以此两文“名动天下”，遂以鼎堂为号，与王国维、罗振玉并称三堂。

同期还刊载了吴其昌《矢彝考释》，许地山《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李长傅《菲律宾史上李马奔之真人考补遗》，顾颉刚、洪煨

莲《崔东壁先生故里访问记》等文。

《安阳发掘报告》第 3 期出版。

此期刊载了董作宾发现“贞人”的《大龟四版考释》及《卜辞中所见之殷历》、李济《俯生葬》、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秉志《河南安阳之龟壳》等文。

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第一次将古史传说与田野考古成果相结合，提出了仰韶文化可能即是夏文化的推想，从此揭开了夏文化研究的序幕；董作宾《大龟四版考释》提出了“贞人说”，对甲骨文断代有重要的意义。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出版《〈白虎通〉引得》。

编者在此引得序文中指出此书为东汉末三国初作品，而非班固所著。

班书阁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 5 卷第 3 号发表《书院藏书考》。

曾纪蔚《清代之监察制度论》由兴宁书店出版。

王士达在社会调查所《社会科学杂志》第 2 卷第 2 期发表《最近十年的中国人口估计》。

7 月

10 日　鼎堂（郭沫若）在《东方杂志》第 13 号发表《毛公鼎之年代》。

是月　丁文江在英文《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 15 卷第 2 期发表《评葛兰言教授〈中国上古文明论〉》。

1929 年，法国学者葛兰言的《中国上古文明论》出版。他批评“一般旧派的史学家或中国学家，不是仅以考证为能事，就是虽有解释而仍是以主观的心理的意见为主，故貌似科学而实极不正确，极不彻底，故远不如杜氏所倡的社会学分析法为高明”。因此，他倡行将社会学分析法引入中国研究领域，撰写了《中国古代节令与歌谣》、《中国人之宗教》、《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中国古代之婚姻范畴》等著作，开创了西方汉学的社会学派。

丁文江对葛兰言进行了尖锐批评。后来傅斯年称赞道：“凡外国人抹杀了中国的事实而加菲薄，他总奋起抵抗，……论学如他评葛兰内的文，

都是很有精彩的。"

直到1939年，杨堃才在英文《燕京社会学界》（*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撰文介绍葛氏的学历、师承和方法，并对丁文江的批评有所回应。40年代，杨堃又在北京的《社会科学季刊》连载《葛兰言研究导论》。杨堃指出，葛兰言《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的绪论中所提出的方法，是"他向整个中国学界一种革命的宣言"。（《杨堃社会学民俗学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1943年，王静如在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演讲《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华北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8期，1943年8月），也重点介绍了葛兰言的学术方法。但是这些正面介绍评价的诸文所产生的影响有限。

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史》由上海春耕书局出版。

作者的写作目的是总结中国革命特别是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所谓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华岗说："现在正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同时又是新的更深刻的革命浪潮将要兴起的时候，我们更须仔细研究过去的大革命各种重要流变的过程，学习过去大革命的经验，求得许多活的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以帮助推动我们当前的实际斗争任务，以保证我们将来的胜利。"

尽管该书被后人认为存在"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话当作是不容置辩的绝对真理，而没有采取分析的态度；对于当时犯有'左'倾错误的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也没有采取分析的态度"等不足，但是该书在出版后仍然受到瞿秋白的严厉批评，认为"没有坚决的无产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阶级立场"，存在"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过于重视民族资本主义的作用等，因而是"非布尔塞维克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史》"。

从学术史视角来看，此书是一部体系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史研究作品。他完全改变了以往只叙述事件过程的做法，而注意分析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社会基础和经验教训等各方面。此书资料丰富翔实，运用了大量文件、报刊及外文资料。此书学术影响较大。廖盖隆在该书1982年再版前言中指出，"仍然是详细论述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唯一著作"；蒋大椿认为此书"初步地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较之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在内容叙述和理论深度上，都将中国革命史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该书后被译为日文和俄文出版。

童振藻在《岭南学报》第2卷第2期发表《钱江九姓渔户考》。

作者“征考旧籍，咨诹近事”，对钱塘江流域长期存在的“九姓渔户”之来历、姓氏、人口、船舶、生计、习俗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同期还刊载了容肇祖《明冯梦龙的生平及其著述》（第 2 卷第 3 期发表《明冯梦龙生平及著作续考》）、《陈亮的生平》，黄仲琴《重修〈粤东金石略〉议》等文。

崔述著、努力学社标点《孟子事实录》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

邢鹏举《中国近世史》由世界书局出版。

8 月

1 日　镜园在《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发表《评两本论中国经济的著作》。

刘镜园批评任曙《中国经济研究》否认帝国主义妨碍中国工业发展，否认中国问题的中心是民族解放与土地革命，因此得出一些安那其（无政府主义）的结论。他又指责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有两个错误：不注意指出中国现有的封建剥削形式；不甚注意帝国主义妨碍中国生产力之发展。此外，也不认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方面相当地发展中国工业，但也保存中国的落后关系。

王礼锡、陆晶清编《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第 1 辑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此后至 1933 年 3 月，《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共出版 4 辑，收录了 1931 年至 1933 年来伯康、陶希圣、王礼锡、胡秋原、王宜昌、李季、陈邦国、杜畏之等人讨论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文章。中国社会史论战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亚细亚？中国历史上是否曾经历过奴隶制社会阶段？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特征？等等。

王礼锡在本辑《序幕》中，一是分析社会史论战兴起的原因，指出各阶级学者为“确定或辩护他自己的阶级的前途”，回答中国经济性质及问题；二是与科玄论战比较，点明此次论战的特点：论战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辩证法为武器”；三是提供了一个研究指南，归纳研究中以几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参考；四是提供了一个论著目录，列举 37 种书籍，收集数十篇散见于各期刊中的论文。王礼锡还提出分工合作的计划。

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一文对郭沫若提出批评。他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流行甚广”，但“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够呆板的把西洋史译成中文，而只嵌上一些尧、舜、汤等人物名称，就可以塞责的。反之，他的发展是受着特殊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所限制，与其他各国不尽

相同”。陈邦国称郭沫若为“是矗立在龟甲兽骨丘积上的名人”，他“误认封建社会是直接由奴隶制度推移来的，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铸下了大错”。

朱新繁《关于中国社会封建性的讨论》主要是批评陶希圣的封建制度崩坏论，对其指出的封建制度分解的五个征象一一进行批驳，他提出，中国封建制度的破坏，始于19世纪下半期，即西方列强入侵以后，但至今封建残余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依然占主导作用。

孙倬章《中国经济的分析》试图折衷调和“新思潮派”和任曙、严灵峰的主张，认为在中国社会的现阶段，经济上资本主义占优势，而政治上的支配者为封建势力，“经济基础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了，上层建筑只保存着无关重要的封建残余”。他以为中国社会的这种特殊状态可用下层基础已变而上层建筑未变来解释。

傅振伦在《史学年报》第1卷第3期发表《清史稿之评论》。

第4期连载。作者曾参与国民政府组织的审查《清史稿》工作，此文既是在此工作基础上完成，“按正史体例，首述其得失，而通分论其内容之利弊焉”。

同期还刊载了洪业《崔东壁书版本表》、韩叔信《虞初小说回目考释》、范文澜《与顾颉刚论五行说的起源》、徐文珊《儒家和五行的关系》、齐思和《与顾颉刚师论易系辞传观象制器故事书》、吴晗《山海经中的古代故事及其系统》、赵澄《〈史记〉版本考》、黄文弼《楼兰之位置及其与汉代之关系》、冯家昇《太阳契丹考释》、毛汶《女真文字之起源》、白也《指画略传》、关瑞梧《夷务始末外鸦片战后中英议和史料数件》等论文。

11日　教育部训令各地搜集边疆史地材料。

称奉政府主席令编纂边疆历史地图，请各地协助搜集材料。令文中指出“我国边疆各省历史文献，素感缺乏，非博采周咨，难臻完备”，所以希望各地就近详细调查各该省历代人口统计、民族种别及分布，语言系统、官制军制沿革，文化教育发达状况，历代名人事迹及作品，风俗习惯特征，宗教派别及由来，僧侣教徒统计，寺庙教堂名称，建筑年月及所在地，物产种类分布及产额，货币种类及流通方法，山地田园开辟经过，地丁钱粮税收多寡，气候高低及雨量统计，交通机关及交通所用器具等项，制为图表，并加说明送部，以备应用。

17日　张季同（张岱年）在《大公报》发表《评〈先秦经籍考〉》。

此文指出北平师大毕业生渡日参观，“日某教授语一行云，再俟十年，贵国人研究古籍亦必须来此留学矣”，作者认为“其对于吾国国学界可谓藐视取消之极矣。但实际情形足以语此言”。张季同认为“综观二十多年来，足以抗衡日本学者，或且驾而上之者，惟有王国维郭沫若之于甲骨（郭于质实方面稍不及王，于创见方面过之），陈寅恪陈垣之于中亚语言历史，胡适冯友兰之于哲学史（冯著尤为精湛，允称宏构），傅增湘之于目录，杨树达奚侗之于注释（奚之庄子注解、老子集解，卷帙不多而内容之佳，罕甚俦匹），数人而已。此外则顾颉刚之疑古精神，唐钺之谨严方法亦皆足称”。

张季同还指出，清代学人分为两派，一派能疑古而欠坚实，一派极其坚实精密而乏疑古精神，而民国国学界也正是沿袭了这两个路向“而罕有兼备二者之长者”。张季同在文末指出，如果“后出之辈”若能学习“清代朴学之谨严方法而益之以怀疑精神”，并能吸取“西洋之科学方法与辩证法”，“不矜奇务怪，不求速得结论”，认真求学，切实下功夫，“则或能雪此最小亦最甚之国耻乎”。

杨树达在第二天日记中载，“读《大公报·文学副刊》，有张季同评日本人《先秦经籍考》一文，谓日本多学人，今中国学人，只有冯友兰之哲学，陈垣之史学，杨某之训诂学，足以抗衡日本云”。

20日　绥远通志馆正式成立。

通志馆聘请郭象伋为馆长，阎肃为副馆长，荣祥为主任编纂，李泰棻为总纂，白映星、王森然等为纂修，另外还聘请了蒙汉学者数十名到各地察访收集材料，以为修志之基。由于工作量巨大，至1936年6月，十万经费用尽，但修志工作只进行一半，通志馆改组，李泰棻、王森然等离职，改由荣祥等负责编纂，至1936年志稿主体确立。同年绥远行政长官傅作义聘请傅增湘为总纂为之审定润色。傅增湘转聘吴廷燮、夏仁虎、谢国桢、史念祖、张国淦等人参与重修，“七七事变”后，重修中辍。1938年傅增湘应日人要求，又请张星烺、孙楷第等人相助裁定该稿，于1939年3月完成。该稿分6志、36门、70子目、共116卷，约200万字，清稿誊就后送日本印刷，但毁于美军轰炸。此志虽屡经战乱，但主体尚在，2005年残稿以《绥远通志稿》为名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绥远在1929年才建省，1949年后又裁撤，故该志是绥远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通志，其记录的各种材料对于研究此地区的史地具有不言而喻的价值。

25日　陶希圣《中国社会现象拾零》由新生命书局出版。

是月　杨东莼《本国文化史大纲》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此书是我国一部较早的唯物的文化史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五社会形态论”进行文化史分期。作者打破传统的断代为史的做法，“而以一个个的事实做单元”，将中国文化史分成“经济生活之部”、“社会政治生活之部”、“智慧生活之部”三大块，再作从古至今的系统分析。“凡属农业、商业、工业、交通、财政、土地制度以及赋税制度等，都归经济生活之部。凡属政制、刑制、教育、宗教、选举、家族、婚姻、丧葬等，都归社会政治生活之部。凡属哲学、文学、艺术等，都归智慧生活之部。”这种叙述方式成为后来中国通史著作的雏形。该书曾作为当时大专以上教科书，因而每章之末都附有“问题提要”。

罗元鲲《史学概要》由武昌亚新地学社刊行。

本书系作者据其在湖南省立第一高级中学授课讲稿改编而成，1930年杀青。全书共32章，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有关史学的几个基本问题，二是史料的分类、搜集与整理，三是观察、编纂、记述“史迹”的方法，四是论中西史学的“演进”。

1935年上海开明书店再版时，除更名为《史学研究》和不再分为上下编外，各章节题目、内容均与初刊本同。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出版《〈历代同姓名录〉引得》。

《历代同姓名录》一书为清代刘长华用三十余年精力编纂而成，“汇史籍所有之同姓名者于一册”，详尽有用，但“其排列方法以朝代为本，以皇室居先，迂拙错杂，检寻深感困难”，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乃采用洪业“新发明之庋撷法排列，拼音引得及笔画引得，以便对照”。

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1分发表《李唐氏族之推测》。

陈氏认为李唐为后魏拓跋氏弘农太守李初古拔之后裔，但李唐自称西凉王李孙李重耳后裔。刘盼遂依据陈寅恪之说，发表《李唐为蕃姓考》（《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第2卷第1期）。其后陈寅恪又撰《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日本学者金井之忠发表《李唐源流出于夷狄考》。1935年，陈寅恪复为《三论李唐氏族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2分），改变原有看法，谓李唐先世本为汉姓，驳斥金井之说。

针对陈寅恪提出的李唐可能是非汉族的观点，朱希祖撰《驳李唐为胡姓说》（《东方杂志》第33卷第15号，1936年8月1日）一文予以驳斥，提出：一、李唐先世李虎赐姓大野氏，实则赐姓与鲜卑拓跋部九十九姓不同，不可混淆；二、李昞娶独孤氏，李渊娶窦氏，李世民娶长孙氏，三世

皆娶鲜卑胡种，其子孙自不免与胡人有相似处，然面貌言语风俗与母族相近，并不能武断其为外国人；三、李重耳不是李初古拔。

朱氏对这一问题的辩难，流露出民族主义情绪和“夷夏之防”观念，有其现实诉求。朱氏指出，说李唐出于胡姓，“与指明成祖为元顺帝子，同其谬误。若依此等说，则自唐以来，惟最弱之宋，尚未有疑为外族者，其余若唐若明，皆与元清同为外族入居中夏，中夏之人，久已无建国能力，何堪承袭疆土，循其结果，暗示国人量力退婴，明招强敌加力进取”。

后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4分发表《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坚持李唐祖先出于李初古拔及赵郡冒陇西说。朱氏遂在1937年5月《东方杂志》第34卷第9号发表《再驳李唐氏族出于李初古拔及赵郡说》，继续讨论李唐的姓氏及种族问题。

陶希圣《西汉经济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许之衡《中国音乐小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 月

10 日　贺昌群在《东方杂志》第17号发表《敦煌佛教艺术之系统》。

文章对六朝佛教艺术产生的原因、敦煌与云冈石窟的关系、敦煌开凿年代等问题进行论述，为此后的敦煌艺术研究开拓了新路。

18 日　“九一八”事变爆发。

张东荪在《大公报》发表《我亦谈谈辩证的唯物论》，挑起唯物辩证法论战。

张东荪此后在《再生》等杂志发表《辩证法的各种问题》、《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以及《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等文章，宣传自己新哲学的观点，反对唯物论特别是辩证法。

首先向张东荪等人发难的是叶青等人，他们利用《二十世纪》、《研究与批判》作阵地，展开论战。叶青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以捍卫新唯物论和辩证法自任。他反驳张东荪的主要论作有《张东荪哲学批判》、《与再生记者谈谈哲学》、《科学玄学的论战与唯物唯心的论战》等。1933年初，秀侠在《现代文化》第1卷第2期发表《张东荪的哲学——对所提出辩证法的各种问题的驳复》一文，逐一反驳张东荪对唯物辩证法的非议。

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邓拓、艾思奇、陈伯达等实际上在两线同时作

战，既与张东荪等辩论，又批判叶青。艾思奇先后发表《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关于内因论与外因论》等文参加争鸣，批驳叶青的观点。针对张东荪的《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一文，邓云特（邓拓）以《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批驳他对辩证法的否定，指出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事物运动变化的"唯一的科学方法"（《新中华》第1卷第23期，1933年）。陈伯达在《腐败哲学的没落》中，认为张东荪等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攻击唯物辩证法者企图"预立一个万古不变的正反合程式去套用任何事物"，完全是故意曲解真理的无聊之诬赖（《读书生活》第4卷第1、2期合刊，1936年）。

1934年10月，张东荪编《唯物辩证法论战》由北平民友书局出版。

这场哲学领域的唯物辩证法论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流行，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影响。

是月　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第1册由南京钟山书局出版。

本书共3册，第2册1933年2月出版，第3册于1935年8月出版，然仅及第二篇隋唐五代章止，共80余万言，第4册为第二篇宋元时代章，原拟于1937年秋改定付印，后因抗战而中辍。

本册共分四编：一、导论，略述史学通义及史上之民族年代与地理；二、历代史略，以说明各时代之重要潮流为主旨；三、政治制度；四、学术文化与宗教。作者提出该书"有所征引，多因仍旧文，鲜加润饰，略如读史要录之例"，凡所叙述，皆先通其大，标立节目，次就编者一已涉猎之正史、"通鉴"、"通考"，与百家传记之书旁及中、东时彦论著，扼要汇录。

缪凤林反对历史主要叙述与民族、民权、民生相关的内容，以服膺"党义"。他认为，只能说三民主义植根于中国历史；但是，绝不能根据三民主义去剪裁中国历史："言党义者，当奉历史为中心，不当削通史以就党义"，"高中与大学普通科之国史，以说明古今各方面之重要潮流，示国家民族社会文化政治演进构成之真相为主"。

柳诒徵序称该书"是编条理明晰，本末赅备，先儒精粹及近人钩索辩难之文，大略在是"。田义生则批评此书：1. 全书一半引录历史原料或他人意见。2. 正文非常简略。3. 仅将他人意见生吞活咽。4. 无自己意见。5. 流为史科读本。

后改题为《中国通史要略》，抗战期间多次印刷，仅在文字上有些许变动。该书后来被国民政府列为部颁教材。

北京大学史学系编写并公布新的课程指导书，废除社会科学方面

的内容。

其中提出了大学史学教育的两个重要要求。

一是“严整的训练”：所谓严整的训练者，指脚踏实地不取转手的训练而言。在反面有三个条件：一、不取乎泛滥漫汗的知识；二、不取乎不能充实的知识；三、不取乎不相干的知识。把这话应用在史学的研求上，乃应是借教员的指导取得一种应付史料的严整方法，不应是借教员的贩卖聚集一些不相干的杂货……史学中的典著，接近史料的工具，整理史料的方法，就是你们的三宝。

二是“充分的工具”：史学的工具，第一类是目录学。……第二类是各种语言。史学的研究每每与语学的研究分不开；同一研究，文字方面是语学，事迹方面是史学。

至于史学的步次，第一步是亲切的研习史籍，第二步是精勤的聚比史料，第三步是严整的辨析史实。取得史实者，乃是史学中的学人，不曾者是不相干的人。

按照 1931—1932 年度的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史学系课程分为甲、乙两类：“史学之一般科目为甲类，近于专题研究者为乙类。”甲类科目包括中国上古史、汉魏史、宋史、满洲开国史、明清史料择题研究、欧洲中古史、西洋近代史、战后国际现势、中国社会政治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史料目录学、金石学、考古学等；乙类科目包括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代外交史、中国古代文籍文辞史、清代史学书录、尚书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地理、西藏史、南洋史地、近代中欧文化接触研究、法国大革命史、日本近世史、东洋史、科学发达史、中国雕版史、东洋建筑史、西洋建筑史等。与朱希祖时期的课程相比较，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不再开设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哲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等“史学应有之基本常识”科目。

课程指导书落款为“暂代史学系主任蒋梦麟”，但从其旨趣推断，应是傅斯年代笔。

章钰编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印行。

作者从 1916 年起对此书进行校勘，先后用包括七种宋刊在内的百衲本、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宋本、北京图书馆所藏北宋残本以及几种前人的校记，至 1928 年完成时，从近 300 卷的书中校出“脱、误、衍、倒”共七千余处、一万余字，七种五千余字与史实有重大关系。章钰的工作得到后人的充分肯定，1956 年“标点《资治通鉴》委员会”决定“把章钰的校记摘要附注在正文之下”，章钰的成就“已足以附于《通鉴》而不朽了”。

顾颉刚开始编辑《尚书研究讲义》。

顾氏将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尚书学》一课的讲义及学生相关论文等编为《尚书研究讲义》，并由景山书社陆续出版。据《史学年报》第1集第5册所载此书广告，该“讲义”计划每年出3册，至1933年8月已出版3册。刘起釪在《顾颉刚先生与〈尚书〉研究》一文中指出，顾氏在燕京所编《尚书研究讲义》分甲、乙、丙、丁、戊五种，每种分册收集资料，作专题研究。此书被认为代表了当时《尚书》研究的最高水平。

方壮猷在《辅仁学志》第2卷第2期发表《室韦考》。

作者认为“女真蒙古二族似同出唐之室韦民族”，“蒙古民族之源出唐之蒙兀室韦或蒙瓦室韦”，而“女真之源出唐之如者室韦或俞折室韦，此又就声音上及住地上皆有可考者也”。有研究者指出，宋代洪皓在《松漠纪闻》中的错误记载，导致白鸟库吉错误地认为“蒙兀部落即后世之蒙古”，方氏此文更仅凭声音相近等原因，得出了比白鸟氏更为错误的结论。

同期还刊载了余嘉锡《北周毁佛主谋者卫元嵩》，（日）滨田耕作著、张我运译《自考古学上观察东亚文明之黎明》，周叔迦《北平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小记》，滕固《关于院体画和文人画之史的考察》等文。

郑鹤声《司马迁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以王国维《太史公纪年考略》为基础，从纷繁的书籍中搜集司马迁的史料，并编成编年。该谱使此前不为人详知的司马迁生平得以呈现，推进了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商务印书馆编印《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

韦修编、朱仲翰校《中国史话》4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傅振伦《刘知几之史学》由景山书社出版。

10月

邓初民《社会进化史纲》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此书在“绪论”中探讨了“社会进化史”的意义和编制系统，并运用唯物史观将整个人类历史分为六个阶段，即先史时代、原始共产社会、奴隶制的古代社会、农奴制的中世封建社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邓初民认为每一个社会阶段的内容体现在经济、政治、精神三个方面，故在叙述各阶段时都是从这三方面展开的。

该书出版后颇受欢迎，1932年9月再版，至1949年8月，已出版了4版。但是当时也有不少人批评该书，如李建芳在《图书评论》1934年第

10 期发文，批评该书“把社会分作三方面（经济、政治、精神）叙述，形式上虽是整齐划一，事实上却是牵强至极”，且“取材以欧洲的史实为限，而未提及本国的显例，尤足证其缺乏创作能力，只能对于外人的著作公然抄袭”。

1940 年 11 月，邓初民《社会史简明教程》由重庆生活书店出版，内容和此书无大区别。

蔡尚思《中国学术大纲》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

该书分“首部”、“中部”、“后部”三部分：“首部”论“国学之定义”、“至底限度之国学书籍及其研究次序”；“中部”论“中国文字学”、“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下部”论“四学大家之总比及其分比”、“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字文史哲四学之比观”。

蔡元培曾评介说：“蔡君尚思精研国学，所著《中国学术大纲》一篇，内容丰富，且多新见解。”

蒋廷黻在《清华学报》第 6 卷第 3 期发表《琦善与鸦片战争》。

作者一反民族主义的立场，对鸦片战争及此前被认为是卖国贼的琦善提出了新的看法。蒋氏认为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目的“全在禁烟”，英国的目的“全在通商”，所以战争爆发前“二国均未预抱一个必战之心”，英国则“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故鸦片战争“非两国所预谋”，实乃是“因禁烟而起冲突，继则因冲突而起报复，终乃流为战争”。对于琦善，蒋氏认为他在鸦片战争中“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查外强中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而林则徐则“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

该文发表不仅反响颇大，赞成者与反对者均有，且影响深远。据余英时《费正清与中国》一文指出，费正清研究鸦片战争后条约体制在中国各通商口岸之建立的观点，即是受到蒋氏此文影响。1949 年后，蒋氏此文被作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历史观点”的代表屡被提及。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编印“日本研究小丛书”。

该丛书共有二十多种，主要有《为什么研究日本》、《日本的民族性》、《日本的地理》、《日本的历史》、《日本侵略我国史略》等书。

上海华通书局开始编印“日本研究丛书”。

该丛书收录的史学书籍主要有徐孔僧译《日本社会史》（1931 年 10 月），（日）重野安绎著《日本维新史》（1931 年 10 月），查士骥编译《六十年来日本经济发达史》（1931 年 10 月），（日）崎正治等著、古同资

译《日本维新三十年史》（1931 年 11 月）等。

马元材在《河南政治》月刊第 1 卷第 2 期发表《春秋战国时代之经济生活状态》。

第 3 期连载。

杨筠如《荀子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日本侵略中国年表》。

11 月

7 日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进行第 5 次发掘。

董作宾主持，参加者有梁思永、郭宝钧、王湘、石璋如、刘燿等。此次发掘至 12 月 19 日止，共发现有字甲骨 381 片，并发现了殷代建筑遗址和殷人居住之园洞穴及储藏物品之地窖。此一发现纠正了此前殷墟为洪水所淹没的假定。

10 日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对安阳后岗遗址进行第 2 次科学发掘。

梁思永主持，刘燿、张善参加。这次发掘至 12 月 4 日结束，揭示了小屯、龙山、仰韶文化的层位关系，即上层为小屯文化，中层为龙山文化，下层为仰韶文化。这一发现为认识中原史前文化的相对年代提供了关键依据。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第一次解决了新石器时代各文化间的相对年代问题。后冈的三迭层被誉为“打开中国史前年代序列的钥匙”。

20 日　清华历史系讲师吴其昌绝食请愿，要求抗日。

吴其昌以绝食促使蒋介石、张学良抗日的行为震动全国，促使全国民众抗日救亡情绪进一步高涨。吴其昌因此被清华解聘，1932 年开始转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是月　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 3 册由朴社出版。

上编讨论《周易》，下编考辨《诗经》。中心思想是破坏《周易》的圣经地位，恢复其书卜筮的原貌；破坏《诗经》的圣经地位，恢复其乐歌的原貌。

在自序中，顾颉刚认为：“我们的功力不但远逊于清代学者，亦且远逊于宋代学者。不过我们所处的时代太好，它给予我们以自由批评的勇气，也许我们比宋代学者作进一步的探索，——解除了道统的束缚；也许我们比清代学者作进一步的探索，——解除了学派的束缚。它又给予我们

许多崭新的材料，使我们不仅看到书本，还有许多书本以外的东西，可以作种种比较的研究，可以开出想不到的新天地。”

顾颉则还指出，《古史辨》只是一部汇集一时代人们的见解的材料书。他说：“就表面看，我诚然是专研究古书，诚然是只打倒伪史而不建设真史。但是，我岂不知古书之外的古史的种类正多着，范围正大着；又岂不知建设真史的事比打倒伪史为重要。我何尝不想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唯物史观等等，走在建设的路上。……我不但自己只能束身在一个小范围里做深入的工作，而且希望许多人也都能束身在一个小范围里做深入的工作。有了许多的专门研究，再有几个人出来承受其结论而会通之，自然可以补偏救弊，把后来的人引上一条大道。”

李季指出，从《古史辨》第一册到第二册出版的几年间，青年人对顾颉刚等，已经由热烈推崇迅速转变为极度的失望。李季说：“一般青年学子本来万分热烈地希望他们弄出一个头绪，建设一个信史来。……不意继《古史辨》第一册而出现于各种报章杂志上面的东西，仍旧是一些没有头绪的片段文字。迨《古史辨》第二册而于一九三〇年九月出版，人们已大失所望，而继此刊布的《古史辨》第三册两厚本，更少人过问，因为语其内容，每况愈下，越弄越枝节了。”到《古史辨》第三册出版后，顾颉刚等因未能符合青年人的想望，于是“整理国故派建设信史的权威，因事实上的表现和顾先生自己的宣言，完全没落”。这表明，古史辨派的影响力已呈下降之势。

蒋廷黻编辑《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4 年 11 月出版中卷。资料辑要收录 1822 年（清道光二年）至 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中外交涉的重要文献共 799 篇。“我编这书的动机不在说明外国如何欺压中国，不平等条约如何应该废除。我的动机全在要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不仅“使青年学生得从此入门以深究中外关系史，并且一般国人也因此而得明过去外交得失的真相”。这成为他后来撰写《中国近代史》的基础。

《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是中国第一部不依靠外国蓝皮书等单方面文件而编成的外交史资料。这部史料式的外交史，只是平铺直叙地排比材料，呈现历史真相。蒋廷黻在每一章节前面都有一段引论，以此对史实做深入剖析。

学术界对这部外交史资料褒贬不一。洪煨莲认为此书，其按语准确、清楚而且引人入胜，他对中西在地名、人名及日历上的差异作了对比考订，使读者用起来特别方便，因此该书为以后类似著作树立了一个榜样。

夏鼐则持批评立场，他认为蒋氏以新不新为取材标准是不妥的，因为对于一部史料辑要而言，最重要的是一个“要”字，至于新不新则不必计较，因为即使没有新材料，而用了新眼光来编辑，旧材料也会发生一种新的意义。又编者对于中日战争以前的史料，专采自中国方面也不妥，而应中外兼收。

黄云眉在《金陵学报》第1卷第2期发表《〈明史〉编纂考略》。

作者“将《明史》文字体例事迹材料，一一加以勘核，成《〈明史〉考证》一书，以确定《明史》价值”，此文“先揭其编纂始末于此”。作者认为康熙十八年至康熙末年为《明史》纂修中期，在“史料”、“史才”、“体例之订定及编纂之方法”三个方面虽取得进展，但缺憾也很严重。文章还探讨了“总裁之攘窃”、“时主之钳制”等所谓《明史》特点。

同期还刊载了万国鼎《北朝隋唐之均田制度》，陈登原《秦始皇评》，吴景超《一个内乱的分析：楚汉之争》，范存忠《约翰生、高尔斯密与中国文化》，陈恭禄《四国〈天津条约〉之经过》，（日）武内义雄著、王古鲁译校《六国表订误及其商榷》，刘国钧《后汉译经录》等文。

程树德《中国法制史》由上海华通书局出版。

第一篇“总论”探讨了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些问题，第二篇“律令”，梳理了从上古至清代的律令，第三篇“刑制”，梳理了从上古到元代的刑制，第四篇为“关于中国法制之研究”，探讨了“成年制度”、“婚姻制度”等问题。

12月

1日　辅仁大学举行始业典礼，代理校长沈兼士在开学训词中简要回顾中国文史研究。

沈氏认为：“中国的学术界倘要使世界注意，须要先有两种贡献：第一关于东洋史的研究，近年来本校校长陈援庵先生，及本校历史系主任张星烺先生皆各有极成功的著述，开吾国研究的风气。东邻的日人，及远处西洋的欧洲人，于此种学问，且早有独到的研究；我国本乡本土的事情，到远不如外人知道的详细，这岂不是羞辱！且东洋史的研究，自然不能不以中国为中心，现在叫外人来代庖，立脚点就与中国人不同，其持论恐不免时有偏见，这一层是尤不可不注意的。”

是月　刘朝阳在《燕京学报》第10期发表《殷历质疑》。

作者对董作宾在《卜辞中所见之殷历》中提出的殷历的平年十二月闰年十三月且月份已有大小的区别之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殷朝曾通用过两种

不同的历法，一种是前期通用的每月都是三十日，一种是后期通用的已有大小月之分。1932 年 12 月刘朝阳在《燕京学报》第 13 期又发表《再论殷历》，将学界对于殷历的看法分为三派：第一派认为殷历一平年为十二个月，闰年为十三月，每月的日数都固定为三十日，记日的干支和各月的日次亦有一种固定的关系，以束世澂《殷商制度考》（《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 2 卷第 4 期）为代表；第二派就是董作宾为代表的一派；第三派就是刘朝阳自己为一派。作者在此文中重新提出了“殷朝的历法始终没有大小月的区别”，但是在“干支和各月的日次的关系”上和第一派不同的观点。

同期还刊载了朱希祖《整理升平署档案记》、李俨《珠算制度考》、冯承钧《大藏经存佚考》等文。

钱穆在《燕京学报》第 10 期发表《周初地理考》。

此文分别从“姜氏”、“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几个方面对周初地理进行考辨。钱穆在文中提出了“周人起于晋，而旧误以为在秦”；“古史地名皆由民族迁徙”造成的两个观点。

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主办《史学》创刊。

发刊词云：“自西学东渐，国中史学者除数千年国史外，且须进而探求西洋民族兴衰之迹。欲以一人之力而兼明东西全史；……故本刊对东西各国史学，只负介绍之责。”

第 1 期刊载《评日本研究丛书》、《产业革命影响说略》、《考古学的新方法》、《欧洲各国对中国学术之研究》以及《克罗奇的史学论》等五篇文章，还有“史学界消息”一栏，内中有“国内史学界消息”、“东京卅一次大会”、“西洋史学界消息”等三部分。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表现了对西方史学乃至西方学术的关注。

本刊为不定期刊，1933 年停刊。

（德）马克思著、郭沫若译《政治经济学批判》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1930 年郭沫若译讫，并作《译者序言》，译稿交王礼锡，《译者序言》被遗失。1947 年 2 月 20 日郭氏重作一篇，当年 3 月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据郭沫若自述：“这书曾经遭过禁止，坊间后来把封面改换发行，译者是作为李季。”

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此书系作者《我的生平》一书部分章节的单行本，重点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的实验主义方法。对于胡著中的某些论述，如：

春秋战国的时代性及其产业发展的情形，中国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和思潮，诸子哲学勃兴的原因，老子、杨朱、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别墨、法家及前三世纪的哲学思潮，古代哲学中绝的原因等问题，均提出了不同意见。《读书杂志》刊登的广告称："本书以唯物史观作批评的工具。"

陈国强《物观中国文化史》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作者尝试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文化史。他强调文化"就是人类依其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而创造、而展开之精神生产的成果之总和"。因而"在叙述各时代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意说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技术的发展阶段，使读者明了这两者间的适应关系"。

容庚辑《秦汉金文录》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该书收录秦器86件，汉晋器749件，为当时秦汉金文之总汇。

汤象龙在社会调查所《社会科学杂志》第2卷第4期发表《道光朝的捐监统计》。

该文主要内容有"捐监制度的起源"、"清代捐监制度略述"、"道光朝捐监之统计"、"道光朝捐监之分配"等。此文系作者利用清宫档案资料研究近代经济史的第二篇成果。作者在分析了二千件清宫档案的基础上，对相关现象进行了认真统计，绘制了《道光元年至三十年各省每年所收捐监银数总表》等，并对清中期财政困难时期以卖官鬻爵为措施来弥补政府收入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文发表后，先被南开经济研究所翻译为英文发表，后由日本杂志翻译为日文发表，影响及于国外的中国史研究。

孟森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5卷第6号发表《建文逊国事考》。

李麦麦在《读书杂志》第1卷第11、12期合刊发表《中国封建制度之崩溃与专制君主制之完成》。

汤中《宋会要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是年

刘复编《敦煌掇琐》上集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出版。

全书按写本性质分类排比，自行编号，编为上中下三集，"上集是文

学史的材料，中集是社会史的材料，下集是语言文字的材料”。上集包括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绎、艺术等；中集收入有关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教育、宗教、历书、迷信、杂事等方面的材料；下集收有《刊谬补缺切韵》、《字书》、《字宝碎金》、《俗务要名林》等。凡所辑录，都保持写本原貌，俗字也照样描出。

《敦煌掇琐》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敦煌文献收集的集大成者，“标志着我国敦煌文献辑佚整理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书前蔡元培序云：“读是编所录一部分的白话文与白话文五言诗，我们才见到当时通俗文词的真相。就中如孟姜女、五更转等小唱，尤可以看出现今通行的小唱，来源独古。”又说：“就中如家宅图，可以见居室的布置；舞谱，可以见舞蹈的形式；各种借券，可以见借贷实物与罚去利息的习惯。”并肯定该书辑佚钩沉，网罗甚富，确为辑录敦煌遗书的重要专书。

1925年10月28日，《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1卷第3期刊发了《敦煌掇琐叙目》一文。该书中辑出版在1932年，下辑在1934年。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室重行补版刊刻1部6册，并附有校勘记1卷。

陶希圣受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教授。

陶希圣晚年在《夏虫语冰录》中回忆说：“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六年(1931—1937)，我在北京大学讲课及演说，又往天津、济南、太原、南京、武昌讲课及演说，全是以社会史观为研究古代历史及考察现代问题之论点与方法。在正统历史学者心目中，我是旁门左道。正统历史学可以说是考据学，亦即由清代考据与美国实证主义之结晶。我所持社会史观可以说是社会观点、历史观点与唯物观点之合体。两者格格不入。”他又说：“我虽持唯物观点，仍与唯物史观不同。我自称为社会史观，而反对公式主义及教条主义。我主编《食货半月刊》，讲究方法论，同时注重资料，必须从资料中再产生之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食货半月刊》出版两年半，自成一种学风。”

他在《潮流与点滴》中回忆说，当他从上海到北京后，立即察觉到北平教授与学生之间存在一条鸿沟。因为来自各地而又饱览各种新出杂志、小册子的学生，其脑中多已播下唯物史观的种籽，大多“有一种兴趣，要辩论一个问题，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是甚么社会’？”

秋，孟森开始在北京大学担任史学系教授。

孟森先后教授“满洲开国史”、“明清史料择题研究”、“明清史”和

“清史研究”。孟森为授课分别编辑了《明史讲义》、《满洲开国史》和《清史讲义》（1947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

秋，钱穆开始任教于北大。

钱穆在北京大学先后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等课，并兼职于清华大学历史系。

朱谦之从日本回国暂居杭州，开始研究历史学派经济学。

8月，应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之聘，主讲历史哲学、西洋史学史、史学概论、社会学史等课程。课余应民智书局之约主编历史哲学丛书。10月，丛书之一《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完成，书中主要为译文，有朱谦之《黑格尔百年祭》和《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等文。

齐思和毕业于燕京大学文科，获史学学士学位和金钥匙奖。

同年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作为燕大历史系首位送往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研究生，进入历史系研究部。主修美国史，选修英国史、世界中世纪史、政治思想史、史学方法、国际关系史及西洋现代史等课程。

1933年7月获得历史科文学硕士学位，1935年获得历史科哲学博士学位。1935年5月，齐思和从哈佛大学研究部毕业后即返国，先受聘为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同时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兼课，讲授的课程除史学概论外，还有商周史、西洋现代史、美国史。

陈训慈《中国近世史》由美丰祥印书馆印行。

该书系作者的讲义，“起自明季之中西通商，迄道光中叶”，共有十章。作者在《编余附记》中指出，“惟粗举凡要，略寻统系，聊为进研初桄，未足语通史之义例。惟取舍之间，稍有通则，因果得失，偶陈管见”。

1932 年

※《大公报》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
※ 郭沫若编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出版。
※《清华周刊》“文史专号”出版。
※ 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
※ 谢国桢编纂《晚明史籍考》出版。
※《东北史纲》第1卷出版。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创刊。
※ 钱宝琮《中国算学史》上卷出版。

1 月

4 日　素痴(张荫麟) 在《大公报》发表《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作者以人类学理论评价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认为郭著的一个突出贡献就在于“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那就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去爬梳古史的材料”。张又列举了这条研究古史的路径的三种优点，并提出此一路径“是值得后来史家的遵循的”。从这一评价中，张荫麟的立场也显露出来。在当时的上古史研究中，盛行的是“疑古辨伪”的方法，是史料考订的方法，而张氏却将郭沫若的跨学科方法提示出来，表明他对这一路径的认同。

但同时张荫麟对郭沫若的方法运用又提出尖锐批评：“穆尔纲的《古代社会》，那已经成了人类学史上的古董，其中的结论多半已被近今人类学者所摈弃，……穆尔纲和他同时许多人类学先驱者的根本错误在以为社会的演化，有一定之程序与方式，为各个社会所必经。”郭先生“竟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的，十九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社会进化论，并担任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穿凿牵强的地方”。

10 日　郭沫若编著《两周金文辞大系》由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

据著者手迹影印出版。

1931年9月9日全书录成，并作《序》和《解题》，说明作者频年以来“潜心于殷代卜辞与周京彝铭之译读”，更把重点集中到东西二周，从传世的数千铜器中选择了有重要史料价值的金文辞，加以系统整理，“其目的在求周代彝铭之历史系统与地方分类”。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宗周文凡一百三十又七器，仿尚书体例，以列王为次”，“下编列国文凡一百一十又四器，仿国风体例，以国别为次”。作者还感谢给本书以惠助者容庚、石田干之助、田中庆太郎等人。

1934年11月，本书增订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者《引言》云：“《大系》成书已历三年，旧时见解有未当意处，新出之器复时有所获，爰更详加增订，改版问世，而别成此《图录》以便观览。”该书分为《图编》与《录编》，一专辑形象，一专辑铭文。1935年3月5日由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据著者手迹影印出版。1935年8月，《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由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据著者手迹影印出版。本书对于金文辞的说解比《西周金文辞大系》详审，原书从此作废。

《大系》对两周重要的青铜器进行了编年、考订，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第3号发表刘节《〈两周金文辞大系〉商兑》，对《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有所指正”，郭沫若读后特录出四处表示接受；“惟刘文似成诸仓卒，多未深考”，故作《答〈两周金文辞大系商兑〉》，“亦略布所见”“以答‘商兑’之雅意”。并说：“我辈考古，在降心以求真，非好胜以立异，窃愿与诸君子共勉之。”

11日 《大公报》隆重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

“九一八”事变爆发几天后，《大公报》社长吴鼎昌同张季鸾、胡政之召开会议，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讨论今后的编辑方针。张季鸾宣布两项决策，其中之一是“明耻”，即尽快开辟一个专栏，记载自1871年签定《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中日关系史料，介绍“九一八”之祸的由来。栏目定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指定王芸生专任其事。

王芸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道：“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沈阳的炮声响了。《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因念国家之可危可耻，提议在报上辟一个专栏，每日刊载一段中日关系史料，以为警醒国人之助，并推我担任主编。我当时只是一员编辑，对历史并无研究。但亦义不容辞，率尔操觚，实甚浅陋。由于符合读者的感情和需要，谬邀传诵，陆续得到历史学者和当代外交家的热心帮助，或予指教，或供史料，逐步得到先辈学者的重视，博得一些虚声，实非编者之功。”

该专栏每日登载一段记者王芸生撰述中日关系的史料，连载长达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王芸生在首篇前“前言”中说：“吾人试考六十年来之中日外交关系，当可了然于强弱进退之所由来。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爰自同治十年中日订约，以迄最近之日本侵华经过，搜辑政书，分纪始末，使一般国民，咸知国耻断非突发，自反乃能自强，明耻教战，或非无裨。”“迨甲午一战，中国遂大暴露，赔款割地，自是日本渐为强国，中国则日衰。庚子后，日人在华之势力，亦日益伸张。迄今又三十余年，日本着着进步，窥伺之计无穷，而中国则积弱之势，每况愈下，迄今东北三省复又不战而失守，谁实为之，孰令致之，览兹篇者，庶知耻而怀奋焉。”

《大公报》连载《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中国国内的一些大学引起强烈反响。北平的燕大、清华和上海的复旦等，分别邀请王芸生演讲日本问题。

15 日　黄花考古学院编辑《考古学杂志》在广州创刊。

谢英伯在《黄花考古学院的组织和使命》一文中，认为“客观的实证的新方法”帮助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开辟了一新纪元”，使“远古文化史逐渐成为一新信史”，这种新方法正是从考古学得来，在考古学方面，史语所安特生等的实地发掘也“颇足为我国上古文化史开一新纪元”。

胡肇椿在《考古学研究热潮中现在考古学者应取之态度与方法》一文中指出考古学者“肩负着综合调和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者之间，而去研究人类已往的一切物质的遗物，令我们对已往的文化有一个更明了的认识的使命”，并在文中探讨了考古学的态度、道德、方法等问题。

另外此集还刊载曾传轺《南越朝台残瓦考》、蔡守《广东古代木刻文字录存》等。

29 日　日军摧毁商务印书馆。

日军为摧毁中国人的抗日宣传，将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列为重点打击对象。29 日（“一・二八”事变第 2 日），日军炸毁商务印书馆总厂、编译所等，2 月 1 日又焚毁商务印书馆所设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损失财产数千万元，五十余万册图书，包括三万多册善本书，二万五千多册地方志悉数化为灰烬。该年 8 月 1 日，商务印书馆才恢复正常营业。

是月　嵇文甫《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由北平开拓社出版。

此书系作者1930年在清华、燕京两校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的部分讲义，书末附《仁德观念之社会史的观察》和《老庄思想与小农社会》两文。嵇道之在《嵇文甫传略》中认为该书是“我国第一本用马列主义观点来讲中国思想史的书”。

余嘉锡在《辅仁学志》第3卷第1期发表《晋辟雍碑考证》。

作者认为洛阳出土的晋辟雍碑“所叙之事，有可以补正史传者，有可以考证经义者，今辄上征经史，旁参群籍，为之疏通证明之”，并“兼考辟雍之兴废”。牟润孙指出，此文“论述西晋太学所立各家经学博士，考汉晋的辟雍与太学不在一地，都能贯穴群书，独创新说，足与乾嘉经学名家的著作并驾齐驱”。

同期还刊载了王重民《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中亚史地译丛》等文。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印《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

该引得“分两巨册，上册为《书名引得》，下册为《人名引得》。不仅采辑无漏，且凡一书而有二称，二人而同一名，伪书之假托，数人之合著，笺注之另有其人，附刊之别为一书，往往分作专条，排成易检，手此二册，则总目二百卷，加以《未收书目》五卷，绝无难检之病矣。引得据大东书局影印本，卷首有卷页内容表及推算公式，凡有其他版本者亦可用此引得”。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同年出版的引得还有《仪礼引得附郑注及贾疏引书引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者引得》、《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

蒋维乔编著《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认为清代以来的哲学可分为“复演古来学术之时期”、“吸收外来思想之时期”，并对近三百年间哲学的主要学派及其代表性人物进行了梳理。李长之批评该书“与其说是一本哲学史，不如说是一本中国三百年来几个学者的治学概要与处世态度记”。

故宫博物院编纂的《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道光朝）陆续出版。

该书所收资料始于1796年，迄于1831年，主要为军机处存档中有关对外关系的谕旨、奏议、照会、书札等。各件按年月日排列，不分类。它是研究清代外交史的重要资料。

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由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

翦伯赞在天津创办《丰台》旬刊，参与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

（英）J. T. Merz 著、伍光健译《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 月

29 日　章太炎在北平师范大学演讲《清代学术之系统》。

章氏认为“清代学术，方面甚广，然大概由天才而得者少，由学力而成者多”，小学、经学、史学、算学、地理学等，均甚有成绩，理学由于“半赖学力、半赖天才的，清代于此亦不甚高明”。章氏分别简要梳理了地学、算学、史学、小学、经学的系统，并分从汉宋角度重点梳理了清代经学。章氏将清代汉学分为苏州学派、扬州学派、常州学派、四明学派几个重要学派。

此文经柴德赓记录，钱玄同审定，后刊于《师大月刊》第 10 期。

是月　刘汝霖编《汉晋学术编年》第 1 册由北平著者书店出版。

1933 年 4 月出版第 2 册。作者在北平师大研究所任职时计划编撰《中国学术编年》6 集（汉至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本书为第 1 集。整个计划也只完成前两部分，1936 年 1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后，未见再有续刊。

作者试图从纷繁的典籍中搜寻资料，试图将官私学术活动、成果及学人成就活动等进行考证排比，为学术史书写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

3 月

1 日　《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第 2 辑出版。

编者王礼锡说：“这中国社会史的问题所以能引起全社会的兴趣，就因为它不仅是一个要了解的问题，而且是解决行动问题的前提。”

王宜昌发表《中国社会史论史》，对中国社会史研究尤其是社会史论战进行了初步总结。他将 1925—1927 前后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927 年以前是神学的中国社会史论，1927 年以后“回想”时期属于玄学阶段。从“研究”期到“论战”期属于科学阶段。

李季的长文《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认为，论战的主要问题是：一是如何认识中国有史以来的封建制度或封建势力，二是如何认

识当前中国社会性质。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深切了解马克思主义，（二）深切了解西洋的经济发展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三）深切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李季提出一套与众不同的历史分期方案，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与奴隶制并行的、前封建的一种社会形态。

朱其华的《动力派的中国社会观的批判》，对严灵峰运用统计资料表示怀疑。

胡秋原在《略覆孙倬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中提出，“奴隶社会只是封建社会末期，商业资本发展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社会形态（在海岸国家则达其发展之极致），不是一个社会必经的过程”。

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总结古史研究的各派别，关于胡适和顾颉刚，他说：“汉学帮助了他们，汉学也限制了他们，他们的优越点适成了他们的终结点，他们止于校勘家了。”他称陶希圣等新生命派为社会学家，认为他们“把握了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学与经济学的方法，涉猎了西方的社会史，转以这些知识来考察古代中国的社会”，而且他们是“第一批用社会学的眼光来研究古史的人”。杜畏之断言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没有划然的奴隶社会一阶段，更无东方社会一阶段。在氏族的丘墟上产生了封建社会。”

张横《评陶希圣的历史方法论》说：“陶希圣是现在国内有相当威信的历史学者”，并痛斥陶氏的“封建制度崩坏论”。对于陶氏的春秋战国以来士大夫阶级统治的判断也不以为然，士大夫阶级并非是超阶级并代表各阶级的利益。他最后指出，“陶的历史著作有一个最让人感觉到的地方，便是它的矛盾性”，即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叙述与结论的矛盾等。

是月　马元材在《河南政治》第 2 卷第 3 期发表《秦汉时代奴隶制度概观》。

该文副标题为“秦汉经济史稿之第七章”。《河南政治》月刊此后分别刊登了该史稿的各章：第六章《秦汉时代的人口及土地分配状况》（第 2 卷第 6 期）、第八章《秦汉时代的租税制度》（第 2 卷第 7 期）、第三章《秦汉时代的农业》（第 2 卷第 10 期）、第一章《秦汉时代之手工业》（第 2 卷第 11 期）、第二章《秦汉时代的商业》（第 2 卷第 12 期）、第四章《秦汉时代之货币制度》（第 3 卷第 1 期）。未见刊登第五章，此后此七篇论文又分别刊登在《食货》半月刊杂志上。

同期还刊载了“影秋”《诗书时代的农业演进》一文。

汤用彤在《国学季刊》第 3 卷第 1 号发表《竺道生与涅槃学》。

汤用彤认为晋宋之际，“佛学上有三大事，一曰般若，鸠摩罗什之所弘阐；一曰毗昙，僧伽提婆为其大师；一曰涅槃，则以昙无谶所译为基本经典。竺道生之学问盖集三者之大成”，故收集材料，撰写此文，“首述涅槃初至时之事实，次略考生公之学说”，以“便后日之参考”。此文是汤用彤佛学史研究的重要论文，1932 年有抽印本，后收入《汤用彤集》。

同期还刊载了朱希祖《郑延平王受明封爵考》、刘复《释“一”》及傅振伦《燕下都发掘报告》等文。

马衡在《国学季刊》第 3 卷第 1 号发表《记汉“居延笔”》。

该文是马衡研究在居延发现的一个毛笔的成果，后署“西北科学考查团短篇论文之一”。居延汉简被送到北平图书馆后，马衡、刘半农指导傅振伦、傅明德等人进行登记、编号、整理。马衡自己也动手研究，此篇文章是马氏第一篇研究居延汉简的文章，此后又撰写发表《汉永光二年文书考释》、《汉兵物簿记略》、《居延简释文》等。

同期刊载的黄文弼《高昌疆域郡城考》一文，也是“西北科学考查团短篇论文之一”。

施复亮《中国现代经济史》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4 月

1 日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进行第 6 次发掘。

此次发掘由李济主持，参加者有董作宾、吴金鼎、王湘、刘屿霞、周英学、石璋如等。此次发掘至 5 月 31 日止，重点是对殷墟遗址的探寻，发现了屡经改造的殷代王宫建筑、墓葬等。

16 日　郭宝钧主持浚县辛村西周时期卫国贵族墓地发掘。

5 月 26 日结束，参加者有刘燿等。1932 年 10 月 21 日至 12 月 6 日、1933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24 日又分别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发掘。

是月　《大公报》将已经连载了三个多月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文章结集出版。

此后该书又连续出版了第 2—7 卷（时间范围原为 1871—1931 年，第 7 卷只写到 1919 年），最终形成七册巨著，仍定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该书是一部集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于一体的专著。它不仅涉及中日两国关系，而且以六十年来远东国际关系为经，以中日两国关系为纬，以原始记载和档案资料为依据，勾勒出中日关系的来龙去脉。许多学者和外交

家、前清遗老为王芸生提供了不少资料。例如曾任驻日公使的李盛铎将其保存的中国驻俄使馆档案中关于中俄东三省交涉的珍贵史料，都交与王芸生收录书中。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汇编成书后迅即流传到日本，引起日本政界、军界、学术界的注意。有日本人指出，中国一份具有悠久历史的全国性大报，如此大规模地宣传中国屈辱的外交史，是在唤起中国民众对日的不满情绪。日本学术界迅即组织专家翻译此书。1933年3月，波多野乾一和长野熏合以《日支外交六十年史》为题翻译该书（只译出第一至四卷）。内田康哉在为此日译本撰写的序言中指出，该书“得资料于中国之秘库，旁征博引，略近所期之完璧。盖辛亥革命后二十年，以往藏于清舍、不出库外之档案，亦陆续公开之际，不迟滞地利用之，足见本书之价值”；末广重雄在为此日译本撰写的序言中认为日本“实以对支外交最为紧密重要，虽无须赘言，但许多外交专著中，惟专论日支外交者极少，而如本书详审精密者，殆可谓皆无。如此论著，首先于他国出版，乃不堪惭愧且当惊异之大事。本书深采资料于前清朝廷秘库，军机处、外交部、执政者密柜，且广泛涉猎编纂内外文献，实乃理当推崇之伟业”。

1957年王芸生开始修订此书，并于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再版。1980年3月，新版八卷本的第一卷由三联书店出版。2005年，该书又再版。1987年7月，日本龙溪书局也再版此书。

王彬在“社联”《研究》月刊创刊号发表《社会科学任务》。

作者提出：“应用唯一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史的唯物论，来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过程这件事，在认识中国现实社会上，实有万分必要。在中国，这也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项任务。”“中国社会科学家必须运用新兴的社会科学理论所给予的武器——唯一正确的方法论，把他们所已建立的一般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现实的社会——不问过去或现在上去，给予它的种种的现实问题以应有的解答，同时在实践上去证实这些解答的真理性。”“必须这样，我们才能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使社会科学在中国完成它应该完成的任务。”

孟森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第2号发表《清史传目通检》。

第3号连载。

5月

7日 《清华周刊》“文史专号”出版。

《清华周刊》将第 37 卷第 9、10 期合并为“文史专号”，封面署“清华历史学会、清华周刊社合编”，实际主要是由《清华周刊》“学术栏”主任吴晗组织编辑。

该号刊载冯友兰《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蒋廷黻《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之史料的价值》，陆侃如《论卦爻辞的年代》，商承祚《殷商无四时说》，吴其昌《殷代人祭考》，吴景超《西汉寡妇再嫁之俗》，李峻之《周代西方民族之东殖》，千家驹《东印度公司之解散与鸦片战争》，华芷荪《对华门户开放主义之起源》，胡适《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顾颉刚、张福庆《九族问题》，余嘉锡《水浒传宋江平方腊考》，西谛（郑振铎）《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辰伯《〈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演变〉补记》、《两浙藏书家史略》，钱穆《秦三十六郡考》，王以中（王庸）《明代海防图籍录》，祁延霈《帕米尔史地考》，陈寅恪《敦煌维摩诘经问疾品演义书后》等文。

该专号多篇论文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如商承祚批驳董作宾等的《殷商无四时说》，以及吴其昌的《殷代人祭考》、蒋廷黻的《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之史料的价值》、钱穆的《秦三十六郡考》、顾颉刚和张福庆的《九族问题》、吴景超的《西汉寡妇再嫁之俗》等。

“凡”在《国立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第 1 卷第 9 号发表《书评：〈清华周刊文史专号〉》，评论北平文史学界的风尚说：“近今学术上考据之风大盛，即研究文学艺术者，亦惟以训诂历史相尚，而于文艺本身之价值反不甚注意。各大学国文系课程，往往文字训诂为重；其关于文学史之课程，内容亦多考证文人之生卒，诗文之目录，及其文法章句名物故事之类，而于文学批评与美术之品鉴忽焉。”且谓学界的这种风气，皆研究者受“时代之影响”所致。

25 日　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第 1 册由新生命书局出版。

该书共 4 册，至 1935 年 1 月出齐。陶希圣在完成了社会史的一系列研究之后，开始思想史探讨。此为其在北京大学授课的讲义。这套讲义声称以“物观的”方法为方法论。第 1 册绪言称：“思想不能决定存在，反之，存在乃决定思想。社会之经济构造变迁，政治制度及政治思想相随变迁。”他提到，“中国社会的变化有可寻的法则，与欧洲社会是一样的。但是欧洲社会与中国并不是同一的，也并不是始终相类，到处相类的。……中国社会发达过程很难捺进欧洲社会发达过程的铜模之内”。陶希圣还在第 4 册“小序”中提出：“我以为历史是社会科学家的任务。”

作者将中国历史划为三个时期，即神权时期、贵族统治时期、王权时期。商代为神权时代，西周至春秋为贵族统治时代，战国至清为王权时

代；在王权时代中，战国是由贵族统治至王权统治的过渡期，秦至唐末为王权建立期，宋至清为王权成熟期。

此书广告说："国内的唯物辩证法叙述古代政治思想史发展概况及各派主张之详细内容者，本书实首屈一指。"

1933 年，刘节在《图书评论》第 1 卷第 12 期撰文《陶希圣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批评他运用方法的不当。以此"整理史料则可，若用之以排比事实，求一贯之因果，则尚不足。盖历史进化，决非事实之积聚，乃各种事象之交辐发展。求其一鳞一爪，皆属片面理由。何况概括与统计二法，尚不能脱离形式逻辑中求同求异之理，且系考证家所常用之方法。至于抽象法，则所寓之危险更大，一有不慎，必至抹杀证据而后已"。"陶君之所以采用此三法者，因其胸中预存唯物史观之理论。"

1942 年，重庆南方印书馆再版该书。《民国丛书》第 5 编收录该书。

是月　（苏）马札亚尔著，陈代清、彭桂秋译《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作者说："本书之结构的方法，即从整个中国农村经济之特征为出发，以至于土地关系，阶级分化，市场及帝国主义影响等分析。"他以亚细亚生产方法来观察东方和中国社会，内容从水利、黄土层、垦殖区等地理条件开始，到土地分配形势与性质，农业和手工业，最后到帝国主义和农村阶级。马札亚尔以为，"现代中国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法进入资本主义的过渡期"。中国及东方社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这就是说，中国及东方国家，自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就进入了一个既不同于奴隶制社会也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完全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时代。它延续了几千年，直至帝国主义的侵入将它打破。

1928 年，苏联"中国问题科学研究院"就马札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写了长篇《编辑者序言》。他们称赞此书"可算是中国现代土地关系之马克思主义分析之第一个有力的尝试"。但更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以土地国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但是商业资本的发展早已使这种生产方式解体。因此，他们断言，帝国主义入侵以前，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马札亚尔说亚细亚社会的特点是人工灌溉、官僚制度、土地国有，但中国问题科学研究院只同意地租采取赋税形式，是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特质。马札亚尔以为中国的租佃关系，是永佃制，而中国问题科学研究院说永佃制不是支配的形态，这一现象只是农奴制的特质，并不是亚细亚社会的特有形式。

1928 年马札亚尔在苏联出版《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后，在苏联、日本和中国引起了广泛注意，从而展开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激烈争论。

王钟麟在《金陵学报》第 2 卷第 1 期发表《最近日本各帝大研究中国学术之概况》。

作者指出，此文是《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中第一章的有关学校的部分内容。《最近日本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一书计划系统梳理介绍研究中国学术的日本学校、与中国学术有关系之学术机关及图书馆、因政治经济因素成立的各种协会、利用庚子赔款设立的文化事业、日本学界关于中国考古学的研究等。此文主要介绍了东京帝大、京都帝大等日本国立大学研究中国学术的学人、学术机构等。作者希图对日本研究中国学术情况的详细介绍，能供给国人参考的资料。

同期还刊载了雷海宗《孔子以前之哲学》、陈登原《蜀汉后主刘禅评》、黄云眉《李卓吾事实辨证》、万国鼎《金元之田制》、孙文青《张衡著述年表》等文。

孙其敏《中国学术思想史》由世界书局出版。

6 月

2 日　胡适被聘为普鲁士国家学院哲学史学部通讯会员。

当时中国报纸称："德国普鲁士国家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齐名。该学院会员，能为世界著名之权威学者。柏林大学教授佛郎克近在该学院提议，通过选举胡适博士为会员，实为东亚第一人。"一时甚为轰动，教育部长朱家骅代表中国学术界致电申谢。

胡适复函也说："这是在世界学术界的最大的荣誉之一种。我这个浅学的人很少贡献，这回接受贵会这样奖掖，真使我十分感激又十分惶恐。"并以羊公鹤的典故，表示将努力在学术上多做贡献。

5 日　廖平在从井研赴成都途中病逝，享年 81 岁。

廖平著作众多，凡一百数十种，以在 1900 年后由存古书局等刊刻的经史著作为主体，如《谷梁春秋经传大义》、《王制集说》、《周礼郑注商榷》、《公羊补正》、《群经大义》、《群经总义讲义》、《周礼今证》、《左氏古经学》、《汉志源历表》、《文学源流考》等。廖平病逝后，其学生将大部分论著编入《六译馆丛书》。

14 日　国立编译馆正式成立。

该年 5 月 6 日，教育部已任命原编审处处长辛树帜为编译馆馆长，着手筹办。6 月 12 日，教育部正式公布裁撤编审处，设立国立编译馆决议。1938 年 2 月，国立编译馆迁往重庆。该馆的职责主要是编译、审查图书及审定学术名辞，以教科书和学术书籍为主，如编译《近代欧洲政治社会

史》（汉斯著、曹绍濂译）、《广东十三行考》（梁嘉彬著）、《中华民族拓殖南洋考》等，编纂《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郑鹤声编）、《黄河志》（胡焕庸、郑鹤声等主编），将《史记》、《资治通鉴》、《中国戏剧史》翻译为英文等。1942年教育部规定全国小学及中学公民、国文、历史、地理四科必须使用编译馆所编之书。

30日　洪业在《史学年报》第1卷第4期发表《驳景教碑出土于盩厔说》。

洪业在对法国人夏鸣雷《西安府圣教碑》一文中认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于盩厔的观点进行批驳，认为应出土于长安大秦寺旧址。

同期还刊载了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冯家昇《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唐兰《获白兕考》、奉宽《元虎贲军百户印考释》、郑德坤《〈山海经〉及其神话》、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统计表》、沈维钧《〈商书〉今译之一——汤誓》等论文。

谭其骧在《史学年报》第1卷第4期发表《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

此文是作者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作者认为中国内地移民史具有三大价值，一是“于民族史为不可缺之主文”，二是“于经济史为不可缺之旁证”，三是“于人种学于优生学为不可缺之论据”；研究移民史主要应该依据氏族志表、族谱序等文字等。因“研究湖南较之研究他省为易”，故先从湖南始。

是月　钱穆在《燕京学报》第11期发表《周官著作时代考》。

钱氏认为何休“《周官》乃六国阴谋之书”的观点较认为《周官》系刘歆伪造或“周公制作”的观点要“遥为近情”，乃从“祀典”、“刑法”、“田制”、“军制”等方面“考其著作时代，藉明真相”。钱氏认为《周礼》成书当在战国晚期，汉代以前，既不可能是周公致太平之书，也不可能是刘歆伪造。

由于钱氏该文论证基础坚实，发表后进一步动摇了当时学界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肯认，对钱玄同、顾颉刚等人皆有影响。余英时指出，自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周官著作时代考》两文刊布后，学界“大体倾向于接受《周礼》成于战国晚期的论断”，并且逐渐放弃对《周礼》作者是周公还是刘歆问题的追问，这种转变“是现代历史考证学在观念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即对于考证方法的内在限制已有高度的自觉”。

该文后与《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博士家法考》、《孔子与春秋》三文合编为《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一书，1958年由新亚研究所印行。

同期还刊载了闻宥《上代象形文字中目文之研究》、刘节《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跋三原于氏藏》、马彦祥《秦腔考》等文。

郑德坤在《燕京学报》第 11 期发表《层化的河水流域地名及其解释》。

此文对中国古书及现实中“河水流域地名”存在重名的现象进行梳理解释，认为这是“民族迁移”所酿成的，是以“故土名名新土”的结果。

钱玄同在《国学季刊》第 3 卷第 2 号发表《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

此文是为方国瑜标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所作的序。钱玄同引用崔适“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高度赞赏康有为此书，并认为“这是一部治国故的人们必读的一部要籍”。钱玄同逐一分析了康书中“精当的和错误的部分”，认为最重大的发明是“秦焚六经未尝亡却”、“河间献王及鲁共王无得古文经之事”。钱玄同不但认可康有为和崔适对于古文经为伪经的论证结论，还进一步指出，“今文经对于古文经而言，固然是真经。但今文经实为周秦间儒生集合而成之书，西汉时尚有加入之篇”，其间既有真史真书，亦有伪史伪书，需“一一分析，疏证明白，方能作古代种种史料之用”。钱玄同认为“今文古文之不同，最重要的是篇卷之多少，次则文字之差异，至于经说，虽有种种异义，其实是不值得注意的”，并进一步指出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破除“师说”、“家法”的陋见，“多与过去的一切笺、注、解、疏，不管它是今文说或古文说，汉儒说或宋儒说或清儒说，正注或杂说，都可以资我们的参考及采取”。

同期还刊载了方壮猷《鞑靼起源考》、刘文兴《刘端临先生年谱》等文。

张德昌在《清华学报》第 7 卷第 2 期发表《明代广州之海舶贸易》。

作者认为“清朝对于通商，在精神上和明代是一贯的”，所以“要明了清代鸦片战争前广东通商制度以及在这种制度上所寄托的精神，不能不追溯到明代的通商制度”。文章将明代广州中外贸易，分为明初到嘉靖年间的“贡舶贸易时期”和嘉靖以后到明末的“商舶时期”，并对明代管理中外海上贸易的相关机关制度予以梳理。

同期还刊载了萧公权《拉斯基政治思想之背景》、陈寅恪《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冯友兰《朱熹哲学》、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浦薛凤《美法革命之政治思想》等文。

罗根泽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 6 卷第 3 号发表《墨子引经

考》。

7月

是月　陈垣在《辅仁学志》第3卷第2期发表《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

此文分上下两编，上编述考苏努诸子的世系略历、获罪原因、治罪详情等，下编述考简亲王德沛之世系略历、奉天主教之由来、德沛之相关学说等。此文旨在考辨雍乾间清宗室奉天主教之情况，并指正诸书记载之错误及其根源。

此文被认为是运用档案补充文献不足并纠正文献错误的范例，发表后受到学界重视，被视为陈垣的重要论著之一。但也有研究者指出，该文未能利用西方传教士方面的档案资料等。该文发表后曾有人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商榷文章，陈氏又撰写《从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说到石老娘胡同当街庙》。

同期还刊载了伦明《建文逊国考疑》、张鸿翔《明外族赐姓考》、冯承钧《楼兰鄯善问题》等文。

卫聚贤编《新中国史》在太原刊行。

此书探讨了社会组织进化的阶段、生活、工具进化的阶段、中国的民族等问题。

郑行巽编著《中国商业史》由世界书局出版。

陈易编著《历史动力论》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

张雷鸣《太平天国革命史》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8月

1日　《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第3辑出版。

王礼锡的《中国社会形态发展中之“谜的时代”》把秦以后两千来年的历史称作中国社会形态发展中之“谜的时代”。他用“专制主义”解开这个历史之“谜”。他说：“专制主义政权的建立，是地主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结合。”

王伯平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发轫》中说：“奴隶的发生，在氏族社会末期就有的现象，……不过奴隶在社会上成为一个严重现象乃是封建社会中才有可能。奴隶制度不能列作一个社会进化的独立阶段。”

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云："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二、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希望短篇论文减少，多来几部大书，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一个强固的根基。"

胡秋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主张：亚细亚生产方法不过是"亚洲之先资本制"。它"既不是与封建主义不同的特殊的生产方法，也不是什么前封建的、与奴隶制并存的生产方法"。"中国东周的封建主义，因商品经济之分解，发生变质而为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有专制主义时期的存在"。中国"自秦至清末，就在这一阶段"。

陈邦国发表《"关于社会发展分期"并评李季》。由于李季在《对于中国社会论战的贡献与批判》中批评陈邦国的历史分期主张，陈撰文回击认为李的批评几乎全是无中生有、无的放矢。

梁园东的《中国社会各阶段的讨论》认为，自春秋战国封建制度崩溃以后，"既不能看作完全的封建社会，也不能看作完全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他确认"中国秦汉后是一个'半封建社会'，或称'农村商业社会'"。

是月　谢国桢编纂《晚明史籍考》由北平图书馆出版。

该书 20 卷，附通检。作者搜集明万历以后至崇祯，清初至康熙平定三藩时期有关明末以及南明弘光、唐王、桂王时期各种稗乘野史 1140 余种，未见书目 620 余种。书名虽为晚明史籍，实际上大部是清朝统治时期的历史载籍。由于清初对涉及南明及与清朝史籍大部分予以封禁，谢国桢以五年时间遍寻全国各大图书馆和藏书楼将当时所能查到的有关史籍予以著录，仿照朱彝尊《经义考》方法，标举书名，确定作者，罗列版本，开载庋藏，说明内容，叙述其史料价值。凡关于明末清初的史料，此书中皆有明确线索。

孟森的序言说："《晚明史籍考》，用《经义考》之例，多载序文凡例，以启发人阅读之趣，海内学人，留念此事者甚多，谢君先为指津，使人执此以考其书，有事半功倍之乐，何其幸也。"此书出版后赢得学界一致认可，朱希祖认为它使人"一扩耳目，增益知识"。柳亚子则誉为"研究南明史料一个钥匙"。此书为研究明清史提供了莫大便利，是一本价值很高的资料工具书。1963 年作者又将其修订改名为《增订晚明史籍考》。

郭沫若《金文丛考》由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据作者手迹影印

出版。

该书收《两周金文辞大系》之外的零散的金文研究著述11篇，与《大系》为姊妹篇。作者自述：当时怀抱着“挑战的意识”，即“向搞旧学问的人挑战，特别是想向标榜‘整理国故’的胡适之流挑战”。郭氏此书中提出一系列金文研究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如生称谥号等。

沈曾植著、张尔田校补《蒙古源流笺证》8卷刊行。

沈、张二人从正史、方志、佛典等搜集资料，对《蒙古源流》一书的人名、地名、史迹等进行考辨、疏证、注释，系研究中国北方历史、地理等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沈氏另有《元秘史补注》1945年由北京古学院出版。

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刊印。

该书系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及顾实《重考〈古今伪书考〉》二书的补正，形式是依照姚书顺序，前人论辩列于前，黄氏意见附于后。

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齐鲁书社1980年再版该书。

朱谦之应中山大学之聘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

12月开始自费筹办《现代史学》杂志，开展“现代史学运动”。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第4号刊载谢国桢编《清开国史料考书名著者通检》。

李温民《日本侵略中国史纲》由北平国民外交研究会出版。

9月

1日　罗家伦在《图书评论》第1卷第1期发表《读标准的书籍写负责的文字》。

罗家伦承认鲁滨逊的贡献在于西洋中古史，“在中国最出名的便要算鲁滨孙”，然对他用差不多的材料不断编辑出版的历史课本，认为“值不得我们什么崇拜”。

柳诒徵创办《国风》。

编辑由南京的国风社负责，柳诒徵被推为社长，编辑委员张其昀、缪凤林、倪尚达三人。由张其昀主持的南京钟山书局出版发行。本刊仍以发掘传统文化，培植民族精神为标榜。发刊词云：“本史迹以导政术，基地守以策民瘼……以隆人格而升国格为主。”

是月　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国学基本丛书”。

该丛书内容包括目录学、读书指南、哲学、政法、礼制、字书、文法、数学、农学、工学、医学、书画金石、音乐、诗文、词曲、小说、文学批评、历史、传记、地理、游记共二十一个门类，分为两集，初集一百种，二集三百种，共四百种。所收书籍是参考了十三种“国学入门书目”之后选定的，供中等文化程度以上学生参考或阅读的国学基本书籍。编者在初集说明中指出，该丛书是“中等以上学生必须参考或阅读之国学基本书”，而初集一百部是以“最低限度为准”来选择的，其字数约五千万。

该丛书所收史学类书籍有司马迁《史记》、班固《白虎通义》、陈寿《三国志》、常璩《华阳国志》、郦道元《水经注》、王溥《五代会要》、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冯琦《宋史纪事本末》、顾炎武《日知录》、黄宗羲《宋元学案》、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章学诚《文史通义》、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孙诒让《墨子间诂》等。

黄文山《西洋知识发展史纲要》由上海华通书局印行。

此书原系讲义稿，黄文山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劳动大学、中央大学讲授过此课。此书共有七章：知识发展史的背景，希腊文化及其传入罗马帝国，后罗马帝国构成的中古的知识遗产，中古大学之兴起与中古化的亚里士多德之流行，经院治学之没落，现代科学精神的诞生，现代知识生活的主要新元素。黄氏认为所谓“西洋知识发展史”应该是将思想史、科学史、技术史合一炉而冶之，“这种根据西洋近来所谓‘新史学’的精神和方法来建设的‘史学综合’，总可以说是西方学术界对于史学最鲜明而又最有价值的贡献”。全书虽只是一个纲要，但内容丰富，包罗万象。黄文山参考借鉴最多的是鲁滨逊学派的论作，如鲁滨逊、巴恩斯、海斯、桑戴克和肖特韦尔等人的著述。

杨家洛编著《四库大辞典》由南京中国图书大辞典编辑馆出版。

此书收录一万余条图书提要和七千余条作者传记，是四库研究的早期重要成果之一。

黄现璠、刘庸《中国通史纲要》第 1 册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

第 2 册 1934 年 4 月出版，第 3 册 7 月出版。

董作宾编著《甲骨文论著目录》由北京大学作为讲义刊印。

此文于 1933 年 4 月在《读书月刊》第 2 卷第 7 期发表。

杨幼炯《近世革命史纲》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书分从民族革命、民权革命、社会革命和中国革命四个角度叙述了从17世纪到20世纪20年代的世界革命史。

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纲》由开明书店出版。

此书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妇女文学通史，言简意赅地梳理了从周代到清代的中国妇女文学的发展。

吴承禧在社会调查所《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3期发表《百年来银价变动之回顾》。

10月

3日　陈恭禄在《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48期撰文评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

陈氏认为萧一山该书在取材上多为转手材料，即所谓“次料”而非“原料”，并列举《清代通史》下卷“事实错误十例”。

萧一山起而辩难，先后撰《答陈恭禄君评拙著〈清代通史〉》（《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52期，1932年11月3日）、《为“清代通史”卷下第一二册批评事再致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者吴宓君》（《大公报》1934年7月7、14、21、28日，《图书副刊》第34—37期，并见《国风》1934年第4卷第11、12期），陈恭禄又撰《为〈清代通史〉下卷答萧一山君》（《大公报》1933年2月7日，《文学副刊》第269期）。

吴宓为萧一山答文加按语说：“清代通史似为有价值而可赞许之书，像（一）肖君书综括一代之政治经济学术典制等，材料丰赡，而（二）肖君国学具有根柢，文字流利畅达，在今皆极不易得者。”“若论其书之缺点，似在革命之意味过重。”“至清室私事，如（一）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二）顺治出家等，则张尔田君《清史后妃传稿》等书辨之已详。章炳麟跋王闿运圆明园词有曰：‘余见清季人士，喜述宫廷狎亵之情’，‘其言绝秽，心甚恶之，夫衽席幽昧，谁所明睹。’所言极是。”

双方唇枪舌战，轰动一时。

16日　北平史学会成立。

当日，顾颉刚等在中山公园水榭召开北平史学会成立大会。该会由各大学史学系教授及学生发起，当天到会者百余人，极一时之盛。

10月26日下午，该会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由谭其骧主席，会议议决执行委员会组织法，文书股由谢兴尧（北大）、谭其骧（燕京）、丁迪豪（北师大）担任，事务股由柴德赓（北师大）、陈均、张德昌（清华）、戴邦伟担任，出版股由吴晗（清华）、朱士嘉（燕京）、邓嗣禹（燕

京）、李树新担任。决定出版会刊，拟聘陈寅恪、陈受颐、陈垣、顾颉刚、邓之诚、陶希圣、陆懋德、洪业、胡适等 18 人担任编辑委员会委员，由执委会派邓嗣禹、吴晗二人为代表，出席编委会，计划 1933 年元旦出版会刊创刊号。从职员构成看，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的成员在其中占有较大比例。其纲领性的《北平史学会缘起》，事先曾经顾颉刚修改。

北平史学会的主体是各校学生而非教师，但并未能真正将北平的史学系学生聚合起来，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学术活动。会刊也未如期出版。

19 日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进行第 7 次发掘。

此次发掘由李济主持，参加者有董作宾、石璋如、李光宇、马元材等。此次发掘至 12 月 15 日止，发现了殷人宗庙宫室所在，得出土物品百余箱，并发现有毛笔墨书的“祀”字。

是月　商务印书馆组织大学丛书委员会，着手编印“大学丛书”。

蔡元培、胡适、顾颉刚、冯友兰、傅斯年、马寅初、何炳松、马君武、傅运森、姜立夫等 56 人被聘为丛书委员会委员。至抗战军兴，大学丛书已按计划出版了三分之二，共二百余种。

入选“大学丛书”且在 1937 年 9 月已出版的史学类作品有何炳松《新史通义》、董之学译《新史学与社会科学》、章嵚《中华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梁思成等译《世界史纲》、何炳松编《中古欧洲史》、王绳祖《欧洲近代史》、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萧一山《清代通史》、陈恭禄《中国近代史》、钱端升译《英国史》、伍光健译《法国大革命史》、魏野畴译《美国史》、冯雄译《世界文化史》、朱基俊译《近代意大利史》、葛绥成译《最新世界殖民史》、陈捷译《中日交通史》。

入选名单但未能出版的有何炳松译《新史学》、李思纯译《史学原论》、姚名达《中国史学史》、何炳松译《西方史学史》、张君劢编著《历史哲学》、杨筠如编著《中国中古史》、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何炳松编《近世欧洲史》、周新译《俄国史》、胡荣铨译《新印度》、罗家伦编著《意大利史》、姚名达编著《南洋史》、李季谷编著《日本通史》、杨筠如编著《中国文化史》、胡肇椿编著《考古学教程》、刘朝阳编著《年历学》、罗香林编著《中国民族史》等。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领域的史学类著作也入选，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潘天寿《中国绘画史》等。

《东北史纲》第 1 卷由中央研究院出版。

《东北史纲》第 1 卷为古代之东北，由傅斯年执笔；第 2 卷为隋至元

末之东北，由方壮猷执笔；第3卷为明清之东北，由徐中舒执笔。此外，萧一山、蒋廷黻还撰写了清代部分，除第1卷外，其余各卷因故未出版。

本书目的在于以历史事实证明东三省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卷首引言写道："就历史论，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发祥地。辽东一带，永为中国郡县；白山黑水，久为中国之藩封。永乐奠基东北，直括今俄领东海滨阿穆尔省。满州本大明之臣仆，原在职贡之域，亦即属国之人。就此二三千年之历史看，东北之为中国，与江苏、福建之为中国又无二致也。"

劳榦评论说："《东北史纲》一书，除去对于古代民族的演变有一个正确的整理之外，并且对于东北一地对中国有深切的关系，尤其有一个精详的阐发。"陈槃也说："这部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知识，来证明东北原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史学方法和史识，是最现代的、科学的。"

这是一部具有政治意义的学术著作，曾由李济英译送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

（苏）沙发洛夫著、李俚人译《中国社会发展史》由新生命书局出版。

《中国社会发展史》估定周以前是原始社会时代，周以后是封建社会，秦汉时代插入一个"封建奴隶私有制"，始终没有奴隶社会的位置。沙发洛夫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从周朝开始。周代的军事封建组织，是由于征服者强迫农业种族或氏族为农奴，由于强大的种族或氏族，和弱小种族或氏族内社会分化的结果，而成立的。后来周朝"原始组织的封建制"，经过了自春秋开始的诸侯混战的"封建的无政府时期"的"危机"，由于"官僚的提拔"，而完成了秦的统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向自然经济回归，明代封建制度复兴，后来由于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封建制度终于崩解了。

陈啸江评曰："全史一类的著作有俄国人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发展史》一书，该书原本是专门研究阶级斗争史，有关社会经济史的许多方面都没有论述，但有关中国历史分期的一些主张在社会史论战中却有较大影响。例如王宜昌、陶希圣等人的对于魏晋时期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都受到该书的影响。"

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新《小学课程标准》。

该标准要求历史课本要以"研求中国民族之演进，特别说明其历史上之光荣，……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且培养其自信自觉发扬光大之精神"。自是之后，"历史的科目几完全为'民族复兴'四字所笼罩"。

11 月又颁布《中学课程标准》。

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3 本第 3 分发表《南岳大师立誓愿文跋》。

作者认为天台宗创造者慧思所作《誓愿文》，“取本人一生事迹，依年岁编列。其书不独研求中古思想史者应视为重要资料，实亦古人自著年谱最早者之一。故与吾国史学之发展殊有关系”。该文旨在先判定《誓愿文》之真伪，并对“其所表现思想之特征略加解释”。作者认为该文并非伪作，此文中“求长生丹药一事”显示，“天台宗内由本体之同质，外受环境之习熏，其思想之推演变迁遂不期而与道家神仙之学说附会”，“天台原始之思想虽不以神仙为极诣，但视为学佛必经之历程”。有研究者认为，此文显示陈氏治学渐由语言比较转向思想比较。

同期还刊载了徐中舒《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孟森《清史稿中建州卫考辨》、《清始祖布库里雍顺之考订》等文。

梁思永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 本第 1 分发表《昂昂溪史前遗址》。

该文是 1930 年 9 月梁思永在辽宁昂昂溪遗址主持考古发掘的发掘报告，内容包括“东三省及附近各地的石器时代遗存”、“挖掘”、“墓葬”、“墓葬里的人骨架”、“文化遗存”、“石器”、“骨器”、“角器”、“陶器”等。

同期还刊载了庞新民《广西瑶山调查杂记》、姜哲夫等《拜王》（广东北江瑶山瑶人风俗之一）等文。

郭湛波著，胡适、嵇文甫校《先秦辩学史》由北平中华印书局出版。

郭湛波认为胡适的《先秦名学史》“有两个根本缺点”，一是“没有把‘辩学’的系统弄清”，二是“所叙述的出了‘辩学’的范围以外”，所以他要撰写此书。之所以用“辩学”这一概念，是他认为在逻辑的汉语译称中，“‘名学’太宽泛，‘形名学’太生涩，所以就用‘辩学’二字”。郭湛波认为哲学思想有印度、西洋和中国三支，哲学方法（逻辑学）也有印度“因明”、西洋“逻辑”、中国“辩学”三支。先秦时期中国的逻辑学方法是“辩学”，先秦荀子以后“辩学”亡绝，汉至明末则为“因明”，明末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则是“逻辑”。他还认为中国“辩学”不起于孔子、老子，而起于邓析，至惠施而盛，至公孙龙而集其大成，构成系统学说。

吴其昌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第5号发表《金文疑年录》。

第6号连载。

11月

1日　北平师范大学主办《师大月刊》创刊。

该刊由黎锦熙、钱玄同、马哲民等人组成的师大月刊编辑委员会负责编辑出版工作，计划每学期出版四册，每册分别为“文学院专号”、“理学院专号”等。

创刊号刊载了黎锦熙《研究所略史》、周书舲《书院制度之研究》、王亚权《义和团事件的政治背景同中国民族运动的关系》等史学论文。

是月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创刊。

此刊由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陶孟和、汤象龙主编。第5卷起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49年出至第8卷第1期停刊，共出8卷16期。

其发刊词说：“在我们认识经济在人类生活上的支配力并且现代生活占据个人、民族、国际的重要地位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历史的大部分应该为经济史的领域。”它是一个专攻社会经济史的刊物。最初，它自许“以讨论中国近代各种经济问题及现象，并介绍各种重要经济史料书籍为目的”，且称“此种刊物的发行要为中国学术界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创举”。但后来该刊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展，在时间上已突破近代之限，领域也不再止于经济史，而是涉及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史。它所研究的内容涵盖了赋税制度、盐务、货币、国际贸易、铁路、兵制、度牒等。

该刊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1942年，萧一山说：此刊论文，根据实际材料，多有足取，将来成就，当可观也。台湾学者刘翠溶则指出，它是第一份以经济为名的学术刊物，创刊时间比美国经济史学会出版的 Journal of History（1941年5月）还要早，这份刊物实为导致今日研究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之嚆矢。不过时人陈啸江也指出此刊的不足，“该杂志的作者多不注意历史理论的修养和运用”，偏于政府财政而很少注意社会经济，其实际影响不大。

此期刊载了罗玉东《厘金制度之起源及其理论》、周益湘《道光以后中琉贸易的统计》、陈文进《清代之总理衙门及其经费》、张德昌《胡夏米货船来华经过及其影响》等文。

万国鼎在《金陵学报》第2卷第2期发表《明代屯田考》。

此文考辨梳理了明代屯田之建立、屯田之制度、屯政之管理、屯田之功效、“开中之制”、屯政之废弛等问题。

同期还刊载了陈登原《韩愈评》、孙文青《九章算术篇目考》（上）、刘国钧《三国佛典录》、万国鼎《农史随笔》等文。

谢无量《中国古田制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共六章，内容主要有“土地制度之起源及其成立”、“什一取民制度之研究”、“周礼中之土地制度”、“土地制度与军赋制度之关系”等。

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该书共十二讲，分别讲述中国学术思想的萌芽、解放、分野与混合、道教、佛教、理学、清代学术、新文化运动等。作为较早较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学术专著，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因系从讲义改变而成，也存在着过于简略、举例多而论断少等不足之处。

岳麓书社 1986 年、2011 年，东方出版社 1996 年再版该书。上海书店 1990 年将其收入“民国丛书”。

陈登元《中国土地制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共十九章，从“皇古之土地与人生”叙述到“土地改制之黎明时期”，梳理中国历代土地制度的发展演变。作者撰作此书意在为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提供历史启示。

《文化月报》在上海创刊，第 2 期改名为《世界文化》。

严灵峰《追击与反攻》由神州国光社刊行，作为中国社会史论战丛著第三种。

罗根泽《孟子评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王德周《近代政治思想史大纲》由北平西北书局出版。

吴金鼎在山东藤县发掘凤凰台龙山文化遗址。

12 月

钱穆在《燕京学报》第 12 期发表《古三苗疆域考》。

作者在文中指出古三苗疆域“夹黄河为居，西起蒲潼，东达荥、郑，不出今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广运数百里间”。钱穆自认其说可“为治古史考古代民族地理者作商榷”。后饶宗颐撰写《魏策吴起论三苗之居辨误》一文对钱氏论点进行质疑。

同期还刊载了钱宝琮《太一考》、何观洲《牂柯江考》、侯堮《觉罗

诗人永忠年谱》等文。

洪业在《燕京学报》第12期发表《所谓修文殿御览者》。

该文对敦煌“唐人抄本类书残卷”“汇校一番”，并考订罗振玉所谓此书为“修文殿御览残卷”“格格而不合”，主张“与其称残卷为‘修文御览’也者，不如号之为‘华林遍略’”。

贺昌群在《燕京学报》第12期发表《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

该文“略述近三十年来东西探检（险）家在我国西北考古的经过，及各国学者在这方面努力的深浅”，是总结研究西北考古较早的论著之一。

蒋廷黻在《清华学报》第8卷第1期发表《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此文至刊出上半部分“从顺治到咸丰”，内容有“俄国的远东发展”、“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尼布楚交涉”、“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俄国友谊之代价”及四个“附录”。文章指出《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在世界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念，即土地割让的记录”。

同期还刊载了冯承钧《玉玄策事辑》、冯友兰《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二派之不同》、浦薛凤《英国功利主义派别之政治思想》等文。

杨树达在《清华学报》第8卷第1期发表《汉代丧葬制度考》。

文章分别探讨了汉代丧葬中的“沐浴饭舍”、“衣衾”、“棺椁”、“发丧受吊”、“送葬”、“从葬之物”、“葬期”、“坟墓”、“归葬”、“合葬”、“附葬”、“改葬”、“赙赠”、“护丧”、“丧期”、“上冢”等情况。该文是民国时期研究中国丧葬文化的代表作之一，后扩充为《汉代婚丧礼俗考》一书。

王信忠在《清华学报》第8卷第1期发表《福州船厂之沿革》。

文章内容包括“福州船厂之时代背景”、“筹备之经过”、“初办时期——外人协办时期”（含“船政经费收支对照表”）、“自办时期——衰退时期”（含“船政经费收支对照表”）、“整顿革新时期”等。作者认为福州船厂开办三十多年目的全未达到，所耗的财力和精力与其所取得的成绩不成正比，造船技术虽有进步却步伐太小落后于西方。究其原委，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事业往往系之于一二人，这一二人走了，他们的事业也就完了”。该文是首次运用第一手资料对福州船厂进行系统研究，对洋务运动等领域的研究有不小影响。

谢国桢在《清华学报》第8卷第1期发表《明季奴变考》。

作者分别从“明代奴仆制度之所以发生”、“豪奴放纵的情形及奴变的主因”、“奴变的状况”、来回答“为什么明代会发生奴仆的情势”、“明代卖身投靠，和豪奴放纵之风，与社会经济上发生什么关系”、“奴变和卖身契的事，是不是民族阶级的运动”三个问题，最后得出奴变是“一种阶级运动”的结论。

文后附孟森《读明季奴变考》一文，对谢国桢认为明季奴变是阶级斗争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洪业《引得说》由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出版。

此书分“何为引得”、“中国字庋撷法”、“引得编纂法”三篇，其中，第一篇概说索引理论，第二篇论述索引排检方法，第三篇论述索引编制方法。为作者创办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及编辑《汉学引得丛刊》实践经验的总结，被学界誉为我国近代索引研究的开山之作。

刘复在《国学季刊》第 3 卷第 4 号发表《西汉时代的日晷》。

作者不仅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所见到的日晷进行了测量研究，而且认为日晷在秦汉时期已经出现，“是当时通用的东西”，并进行了社会史的探讨。1934 年北京大学出版有抽印本。

同期还刊载了孟森《建州卫地址变迁考》（系《名媛清系通纪》上编内之一篇）。

齐鲁大学主办《齐大季刊》创刊。

创刊号刊载明义士《商代文化》、吴广治《近代政治思想三大潮流》等文章。

（德）黑格尔著、王灵皋译《历史哲学纲要》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193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王造时、谢诒徵译《历史哲学》，作为万有文库第 2 集。

（日）箭内亙助著，陈捷、陈清泉译《蒙古史研究》、《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3 年 3 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箭氏《元朝怯薛及斡尔朵考》一书。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由北平朴社出版。

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谢国桢《黄梨洲学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陈安仁编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是年

商务印书馆推出“汉译世界名著”丛书。

此丛书是商务印书馆最有影响的大型学术丛书之一，由1920年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孟和等主编的“世界丛书”发展而来。该丛书从1932年至1950年陆续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名著”250种（分为两集，初集100种，二集150种），涉及文学、史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教育学、自然科学、地理等学科。1982年，该丛书改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辑印行。

民国时期“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收录的史学类著作主要有：（德）穆拉来尔著、叶启芳译《婚姻进化史》（1935年8月），（法）赛洛博著、陈建民译《中古及近代文化史》（1935年12月），（德）柯饶著、吴觉光译《经济通史》（1936年1月），（英）莫瓦特著、王造时译《现代欧洲外交史》（1935年10月）、《近代欧洲外交史》（1936年2月），（日）藤田丰八著、何健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1936年7月），（美）卡特著、刘麟生译《中国印刷术源流史》（1938年10月），（日）山根新次著、张资平译《中国地史》（1940年2月），（意）沙耳非米尼著、周谦冲译《史学家与科学家》（1945年4月）等。

1982年，商务印书馆将此丛书改名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分辑印行，并不断扩充。

王静如《西夏研究》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号之八”出版。

至1933年，共出3辑。《西夏研究》第2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单刊甲种之11；《西夏研究》第3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单刊甲种之13。

《西夏研究》三辑除主要考释四部西夏文佛经外，还辨识了四千多个西夏文字，并对佛经雕版作了系统考察，为西夏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档案资料。

此书一直是从事西夏研究的中外学者必备的参考书。苏联西夏学家克恰诺夫说：“王静如教授所发表的论文，他的专辑《西夏研究》，是所有希望认识西夏文学和语言的人真正可资利用的教材。”1936年法国院士会根据《西夏研究》授予作者“儒莲”奖，成为中国学者个人获得此奖的第一人。

费正清首次来华。

据费正清《对华回忆录》记载，“1932 年上半年，我作为学术事业的开创者到达了中国，在我心灵深处有一种模糊的想法：在适当的时候，我可能设法让该项研究回到哈佛大学”。1932 年 5 月 10 日，费正清首次接触胡适、陶孟和等中国学界名流。稍后，费正清又拜访了蒋廷黻，并师从蒋廷黻学习研究中国历史。为帮助费正清在华期间撰写博士论文《中国海关的起源》，蒋廷黻又安排费正清在清华大学兼课。1935 年 11 月，费正清离华，并于 1936 年 1 月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费正清的博士论文修改后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为题出版（1953）。1939 年起，费正清开始在哈佛大学开设东亚文明课程。

（清）张德坚主撰《贼情汇纂》由南京国学图书馆石印出版。

咸丰初张德坚在湖北探访太平天国的情况，撰成《贼情集要》一书；咸丰四年（1854）设立湘军采编所，由其主持，并以总纂官编辑《贼情汇纂》。张德坚等进一步搜集资料，主要是从军前缴获的太平天国文籍，以及从太平天国地区逃亡出来的地主分子的报告，于次年 7 月编成全书。该书除照录或摘录了 12 种印书外，还辑录了作为清方战利品的诏旨、本章、谕示、禀报等太平天国早期文书若干件。

其内容分别就太平天国领导人和重要将领的姓名简历，以及太平天国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制度和措施等，列为九个总目，详细记述，并且对太平天国的文告、印信、旗帜、服饰等项绘图说明。此书的编纂目的是为清军提供情报，所以记载比较详尽确实。只是此书所记止于咸丰六年（1856），未能包括太平天国后期的材料。

此书有旧刻本，而传抄本尤多，且因在 1854—1856 年间陆续增订修改，所以各本的歧异颇多。中国史学会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钞本为底本，重加整理，收入《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第 3 册。

伯希和建议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将“于里安奖金”（儒莲奖）授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该年底，伯希和为调查近年中国文史学的发展，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通应用书籍，经香港、上海到达北平。在北平期间，他考察中国古迹及美术，并参观各著名学术机关。

伯希和因史语所各种出版品之报告书，尤其是李济等人所编著安阳段墟发掘报告另伯氏对中国史学研究印象深刻，乃建议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将本年度“于里安奖金”授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1932 年 3 月，伯希和专函中研院院长蔡元培说：“考古与文学研究院

每年准备一千五百佛郎之奖金，赠于在过去一年中关于中国语言、历史等学最完美之著作。此项奖金名为余里安奖金。予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各种出版品之报告书，尤因李先生所著安阳发掘古物之报告，特提议赠于该所，此予所欣喜而欲告知先生者。然此仅为予等对于中国博学者极微薄的钦佩之表示，同时予等欲在中国极感困难时借此向中国博学者表示同情。”蔡元培复函表示各项研究将积极进行，“本所同人当益益勉力，以副期望。敝国以水灾及兵事之影响，经济困难，敝院亦感竭蹶；然一切研究工作，均仍积极进行，安阳发掘，亦仍继续工作”。同年底，傅斯年向蔡元培汇报史语所工作时说：“此时对外国已颇可自豪焉。”蔡氏则复函勉励：“‘中国学’之中心点已由巴黎而移至北平，想伯希和此时亦已不能不默认矣。”

侯外庐开始《资本论》的第三次翻译。

侯氏因日本侵占东北内迁北平，并受聘为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时在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兼课，主讲授经济学等课。

这次翻译是与王思华合作，1932 年 9 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在北平出版。据侯外庐自述：“对资本论的翻译和研究，奠定了我的理论基础，我从中得益非浅，所以做起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探讨工作来颇感得心应手。……正是通过那段苦斗，赢得了理论上的武装，才构成我在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真正支柱。”“我之所以一向欣赏乾嘉学派的治学严谨，一向推崇王国维近代研究方法，而未至于陷入一味考据的传统，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在于资本论方法论对我的熏陶。”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 本第 4 分发表《明成祖生母记疑》。

1932 年，傅斯年从《枣林杂俎》、《陶庵梦忆》、《明诗综》、《蒙古源流》等文献中所载材料，推测明成祖生母为元顺帝所遗高丽妃子——碽妃。朱希祖阅傅斯年的文章后，乃撰写发表《明成祖生母记疑辩》（《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 2 卷第 1 期，1933 年 10 月 5 日出版）一文，对其观点提出疑义，明成祖生母问题论辩由此展开。

1936 年，吴晗在《清华学报》发表《明成祖生母考》（第 10 卷第 3 期，1936 年 3 月出版），李晋华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第 6 本第 1 分，1936 年 3 月出版），均支持傅斯年的看法，驳朱希祖之说。稍后朱希祖又作《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东方杂志》第 33 卷第 12 号，1936 年 6 月 16 日出版），运用了更多史料，特别是新发现的碑文，并对吴晗、傅斯年、李晋华所使用的史料的可靠性进

行了辨析。他将汉文与蒙古文、高丽文相比较，指出明成祖生母是碽妃的说法不成立，并考明明成祖生母为洪吉喇氏、甕妃、碽妃三说的先后顺序，认为三说同出一源，只是在文字音译过程中出现了差异。

由于当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逐渐加深，此问题的讨论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涵。朱氏在《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一文的引言中写道："今学者不信洪吉喇氏及甕妃为明成祖生母，而仍信碽妃为明成祖生母，则究其源，仍为元顺帝之子而已。此与李唐为胡姓之说，同为诬辱之尤，混淆种族，颠倒史实，杀国民自强之心，助眈眈者以张目，此不可不重为辩驳者也。"

1949 年之后，傅斯年的这一研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1956 年，胡绳在《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的一文中说："谁是明成祖的生母，这问题有什么意义，这是傅斯年自己也说不出来的"，这场争论延续了五年之久，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民族存亡的一个极端严重的时期"，但傅斯年等人"竟以这样的'科学工作'来为反动统治者'点缀'升平"。

同期还刊载了朱希祖《吴三桂周王纪元释疑》、陈寅恪《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考释序》、罗常培《中原音韵声类考》、庞新民《广东北江猺山杂记》等文。

王弢夫、王亮父子编辑《清季外交史料》刊行。

此书收录光绪元年（1875）至宣统三年（1911）中外关系的重要史料 269 卷，内容包括光绪朝外交史料、宣统朝外交史料、西巡大事记、清季外交史料索引、清季外交年鉴、地图等六部分。该书上限与《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衔接，为研究清末中外关系的重要参考书。1931 年 9 月蔡元培为之序，认为"其必能供给理事家以外交上贵重资料，而补国内学界之阙撼"。

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88 卷。

该书资料汇编分线装 44 册，所辑档案文件全部选自清军机处档册或月折包，编者对所收各件加拟标题、编号，并按收文时间先后依次编排。前 74 卷收录谕旨、奏折、电报、函札、照会、条约等 5592 件（另有附件 803 件），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光绪元年十二月（1876 年 1 月）至三十四年十二月期间的中日关系及有关交涉事宜。卷 75 至卷 88，为有关日俄战争的"东事收电档"和"东事发电档"，共收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 年 2 月）至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期间的有关电报 1892 件。

钱宝琮《中国算学史》上卷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单刊"出版。

全书分二十章，将上自殷周、下迄明季的算学发展系统进行梳理，而

且对每一新方法及每一专门学者，均做出独特的论断。1937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李俨从远古到清末的《中国算学史》，弥补了钱书中的一些空白和不足。

张忠绂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3号发表《甲午战争与远东国际关系之变化》。

1933 年

※ 陈垣发表《元典章校补释例》。
※ 董作宾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
※《现代史学》创刊。
※ 蔡雪村《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出版。
※ 梁方仲发表《明代鱼鳞图册考》。
※ 李平心《中国近代史》出版。
※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出版。
※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出版。
※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出版。
※ 余嘉锡发表《四库提要辨证》。
※ 陶希圣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社会史。

1 月

1 日　张国淦在《国闻周报》第 10 卷第 1 期发表《中国方志考》。

第 2—21、23—25 期连载。作者试图将包括“蒙古、卫藏”在内的中国省、府、厅、州、县志，“作有系统之编纂”，乃将自己见到或书目等资料上所载的方志之存佚、作者、版本、序跋、篇目等情况予以考辨或列举。该文被认为是迄至民国时期“我国方志上规模最大的考录性方志提要之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国闻周报》所刊《中国方志考》实际只是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内容。1935 年，《禹贡》半月刊第 4 卷第 3—5、7、9 期，第 5 卷第 1 期又以《中国地方志考》为题刊载了江苏省的部分府县志的内容。1962 年，经修订后全书改名《中国古方志考》，由中华书局出版。

孙文青在《师大月刊》第 2 期发表《张衡著述年表》。

作者认为关于张衡之著述，“各家著录，多略而未备”，乃“略为排

次”，以资参考。该年表主要由“历代著录考”和“著述年表”两部分组成。该文是较早以著述为主的年谱类论著，在体例上有创新之处。

同期还刊载了罗根泽《七言诗之起源及其成熟》，宫廷璋《刘知几史通之文学概论》，程金造《司马迁崇尚道家说》，刘铭恕《王安石字说源流考》，（瑞典）高本汉著、陆侃如、冯阮君译《中国古书的真伪》，王兰荫《朱笥河先生年谱》，（日）加藤繁著、王桐龄译《唐代庄园考》、《唐宋柜坊考》，陆懋德《李译历史研究法序》等文。

10日　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办《现代史学》创刊。

本刊由朱谦之、常乃悳等创办，由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编辑发行。创刊号刊载的《本刊宣言》申明：“历史应该阐明从过去而现在而未来而不断的生命之流，历史应该根据知识线上的进化现象，使我们明白自己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我们不要建设有生命的历史罢了，既然要建设历史创造文化，便不得不毅然决然舍弃了过去历史的残骸，而从事现代性的历史之把握”。编者们还指出，“现代性的历史之把握”是该刊的“第一使命”，“现代治史方法之应用”是该刊的“第二使命”，“注重现代史与社会史等研究”是该刊的“第三使命”。编者在《现代史学》创刊号《编后余墨》又明确指出，因为“经济史是研究社会史的基础，要清算中国社会史，非先立好中国经济史的根基不可，所以这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了”。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3年1月20日刊文，指出“史学研究会主编之《现代史学》月刊，自创刊号出版后，即引起学术界重大之注目”。该刊对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提倡、对社会经济史的集中研究等在学术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些论文后来都发展为专门著作，如朱谦之《文化哲学》、《现代史学概论》，陈安仁《中国文化演进史观》，陈啸江《两汉社会经济研究》、《三国经济史》，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王兴瑞《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史》，岑家梧《史前史概论》，董家遵《中国婚姻史论丛》，关燕祥《中国奴隶制度史》等。

该刊原定为月刊，后因稿件、经费等因素，并未能按期出版。抗战期间，该刊被收归学校，作为中大学术刊物，由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和史学系合办。1942年迁至重庆出版，1944年出版至第5卷第3期后停刊。

创刊号刊载了吴康《现代史学之意义》，朱谦之《什么是历史方法》、《文化哲学》，陈廷璠《现代文化概观》，陈啸江《西汉社会史研究发端》，黄松《秦始皇代表什么阶级》，傅衣凌《秦汉之豪族》，董家遵《唐代婚姻研究》等文。

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欧美同学会为伯希和举行宴会。

1932 年底，伯希和到达北平。伯氏此行目的是调查近年中国文史学的发展，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书籍。在北平期间，他考察古迹并参观各学术机关。历史语言研究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国立北京图书馆、营造学社、《北平晨报》馆以及当地的学者名流，陆续举行欢迎宴会或邀其讲演。

当日，“除该所研究员特约研究员皆到外，并请北平研究院李圣章、李润章，故宫博物院李玄伯，北大陈受颐、罗庸，清华冯友兰、蒋廷黻、黎东方，燕京许地山，辅仁余嘉锡，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徐森玉、刘节、谢国桢、孙楷第，营造学社梁思成，西北科学考查团袁复礼、黄仲梁诸氏作陪”。傅斯年致词对伯希和表示敬意云：“伯先生在学术上之伟大，以他在东方学中各方面的贡献，以他在汉学上的功绩，以他在中央欧洲文史的发见与考证，他不仅是以中国学著名的，而他正是巴黎学派中国学之领袖。”伯氏的答词谈到沙畹的地位与贡献。

21 日，辅仁大学宴请伯希和。据 1933 年 1 月 22 日《北平晨报》报道，陪宾有法公使、傅增湘、胡适、刘复及本校重要教职员。

同年 4 月，伯希和离京返国。《陈垣来往书信集》载，伯希和离京前曾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者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为首屈一指。”

班书阁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女师学院期刊》创刊号发表《五代史记纂误释例》。

11 日　行政院会议决议成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以张继、戴传贤、马衡等 11 人为委员。

16 日　地理学家张相文去世，享年 68 岁。

25 日　《历史科学》杂志创刊。

北平史学会文书股干事丁迪豪以国立师范大学研究院历史科学研究会的名义主编。

《创刊之辞》表达了对史学现状的不满。他们认为，当时史学界存在三种不良倾向：一是将古书记载当历史，只知寻章摘句埋头考证，其实距历史真相甚远；二是从玄想和自由意志出发空谈历史；三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有关历史发展阶段的名词，把活历史填入死公式。该刊疾呼：“以上这些我们是没有半点满意，我们虽也站在历史的唯物主义方面，

但我们要由历史发展的本身作深入的探究，从而以为历史之判断；我们虽也留心史料的时代价值，但我们要以新的科学来阐明历史，充实历史；而我们更要努力于历史之传授——历史教育之研究，以作历史大众化之准备。”其思想立场明显倾向唯物史观。

为“使本刊能逐渐成为新史学知识底总汇”，该刊决定“一面介绍新史学之理论与研究作品，一面在鼓励吾人以新方法作成有价值之新著”。具体做法是：在一年里打定科学的历史理论的基础，计划出版下列专号：(1）科学的历史理论，(2）历史与各种科学的关系，(3）世界史学界鸟瞰，(4）现代中国各派历史方法论批判，(5）满蒙史研究，(6）西北历史研究。同时开展各大学历史系和各地历史名胜等调查。还设想从第2卷起开展亚细亚生产方法、专制主义、郑和下南洋与商业资本及殖民，以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专题的探究，拟刊行《中国农业发达史》、《近代中国工业发达史》、《中国商业资本主义之史的研究》、《中国历代发明史要》、《历史教育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丛》等六种丛书。

《历史科学》自称“本刊为惟一主倡新史学的有价值之刊物”。它在一些青年学生中引起反响。

北平史学会成员丁迪豪另行组织国立师范大学研究所历史科学研究会。据1933年3月底出版的《历史科学》第1卷第2期，该会又改名为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除丁迪豪外，还有郭昭文、萧桑等。其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的治学倾向，与北平史学会其他成员截然异趣。也许这正是丁迪豪等从中分离出来另建组织的原因所在。

罗香林在《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创刊号发表《读顾颉刚先生〈古史辨〉》。

第2期连载。此文原拟讨论十四个子题，实际两期刊出了前三个子题。多年后，罗氏将此文的第二节稍作删略，以《由〈古史辨〉讲至史事的本身与写的古史》为题纳入其《历史之认识》论集的增订版（香港亚洲出版有限公司，1955年）中。

罗香林把历史区分为“主观的历史”和“客观的历史”，即“写的历史”与“史事的本身”。他指出，“写的历史”不可能达到“客观的历史”。首先，撰史者可能“有许多都是因为要谋达某种史学以外的目的而写的”；其次，作者可能确实是亲临其事，也是决心要记录事实，但个人无法同时从各个角度对事件进行观察，还是无法穷尽事实的全部；再次，即便记录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事件进行记录，但记录传述的技术却不能保证足够高超，使得后来者不致误会。罗香林还指出，即便当时人们普遍

持乐观态度的考古学也无法达到史事的本身。首先，遗迹不能等同于古代事物本身；其次，遗迹是残缺不全的，“要想用此残缺凌乱的遗物，去拟测古代某种事物或某种生活的任何方面或一切外缘，那是办不到的”；最后，“就是办得到，也只是对于古代某种事情或某种生活能得到一种主观的认识而已，到底还是与‘古代事情’本身的整理，没有关系”。

同期还刊载了朱希祖《乾隆内府铜版地图序》、朱谦之《唐代歌谣》、钟道铭《中国古代地理学之发展》、罗香林《民族与民族的研究》等文。

是月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印《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

本书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1种。

论文集上册收录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朱希祖《后金国汗姓氏考》、马衡《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李四光《战国后中国内战的统计和治乱的周期》、赵万里《两宋诸史监本存佚考》、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赵邦彦《汉画所见游戏考》等史学论文。

《本书撰文人共上蔡元培先生书》一文中，论文撰写者以共同名义指出：“先生创设中央研究院，以求中国之进于近代文化，而发扬中国供献于文明之潜力；其中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以整理中国及四裔之文史材料。同人等幸逢此际会，得于先生表率之下，奋起治学；温故以求纂顾黄之旧统，知新以求树文史之新宗”；“先生以师儒之涵养，接受西土之学思，则同人亦志在持旧学之造诣，质之国外，化以大同。惟先生知旧邦之命，必曰维新，则同人亦愿于顾黄长流之后，益以近世自然科学之助力，晚出材料之凭借，以为新学。且先生政教之暇，常著论以喻世矣，其所负荷之批评精神，与夫安稳之新论，正是文史学之将来风气。假以时日，使此研究所能为中国建立若干文史科学，则后之探河源者，必以为北辰韩愈，祭酒荀卿，昭然无他属也”；“本书撰文诸人，不仅中国共学之士，亦有异国同好之人，既奋志于汉学，理同情于中土。值此时日，形骸之所寄有殊，精神之所系不二”，并敬祝“中国文史学之前途无限进步”。

陈垣在《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发表《元典章校补释例》。

陈垣从校勘《元典章》时发现的一万二千多条错误中选出十分之一，加以分类和说明，撰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全书凡六卷，前五卷归纳古籍致误的通例，卷六将以往校勘方法系统总结为“校勘四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

《释例》是陈垣对传统校勘学进行理论总结和现代改造的重大贡献。胡适在为本书所作序言中说："陈援庵先生校《元典章》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我们承认他这件工作土法校书的最大成功，也就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它是"中国校勘学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陈寅恪认为此书"发凡起例，乃是著作，不仅校勘而已"。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指出《释例》总结的校勘四法"既是总结前贤心血结晶的承先之书，也是旁通西方近代文献鉴定学的启后之作"。

该文1934年辑为《励耘书屋丛刻》第3编，中华书局1959年重印，改名为《校勘学释例》。

董作宾在《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

此文系统提出了依据十项标准把全部甲骨文资料划分为五个时期的分期断代理论。其十项标准为：一、世系，二、称谓，三、贞人，四、坑位，五、方国，六、人物，七、事类，八、文法，九、字形，十、书体。他所划分的五个时期是：第一期，武丁及其以前（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世二王）；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董作宾创立的这一分期断代理论与方法，为后来的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建立了一个大体可以遵循的科学体系，至今仍不能废。此文成为殷墟甲骨分期的开山之作。郭沫若在日本接到《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后，"惊佩其卓识"，认为"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董氏之贡献诚非浅鲜"。

哈佛燕京学社开始编印"《燕京学报》专号"。

从1933年至1950年，"《燕京学报》专号"共出版22部学术专著，依照序号顺序（有序号在前出版在后者）分别是郑德坤、沈维钧《中国明器》（1933年1月），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3年10月），李晋华《明史纂修考》（1933年12月），黎光明《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1933年12月），冯家昇《辽史源流考与辽史初校》（1933年12月），陈懋桓《明代倭寇考略》（1934年12月），张维华《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注释》（1934年6月），顾颉刚、杨向奎合著《三皇考》（1936年1月），钱南扬《宋元南戏百一录》（1934年12月），顾廷龙《吴愙斋先生年谱》（1935年3月），钟凤年《国策勘研》（1936年

2 月)，邓嗣禹、毕乃德合编《中国参考书目解题》(1936 年 6 月)，陆侃如、冯沅君《南戏拾遗》(1936 年 12 月)，郭绍虞辑校《宋诗话辑佚》(1937 年 8 月)，张诚孙《中英滇缅疆界问题》(1937 年 12 月)，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1938 年 4 月)，容庚《商周彝器通考》(1941 年 3 月)，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1939 年 8 月)，侯仁之《续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1941 年 12 月)，陆志韦《古音说略》(1947 年 10 月)、《诗韵谱》(1948 年 9 月)，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1950 年 6 月)。

该“专号”所收录的专著，除了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顾颉刚、杨向奎的《三皇考》，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等书为人熟知外，其他也大多是流传后世的学术名著，如郑德坤、沈维钧《中国明器》是现代研究中国明器的最早著作，对史前、三代、秦汉、六朝、唐代及唐以后的明器之种类、特征等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陈懋桓《明代倭寇考略》考据倭寇的来源、发展过程、剿平诸事颇精审详尽；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对清代纳捐制度的沿革、组织及其影响进行了拓荒性梳理分析。

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史地小丛书”。

该丛书共有 100 余种，不仅收录中国学者撰写的论著，也收录不少外国学者关于中国史地研究的论著。中国学者自著的论著主要有卢绍稷《史学概要》(1933 年 11 月)，冯承钧《元代白话碑》(1933 年 12 月)，陶希圣《西汉经济史》(1934 年 2 月)，王志瑞《宋元经济史》(1934 年 2 月)，孔德《外族音乐流传中国史》(1934 年 4 月)，张亮采《中国风俗史》(1934 年 10 月)，谢兴尧《天平天国史事论丛》(1935 年 11 月)，陶希圣、沈巨尘《秦汉政治制度》(1936 年 12 月)，陶希圣、武仙卿《南北朝经济史》(1937 年 2 月)，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1938 年 6 月)，冯承钧《诸藩志校注》(1940 年 2 月)，鞠清远《唐代财政史》(1940 年 9 月) 等。

翻译的外国论著有 (日) 箭内亘著、陈捷、陈清泉译《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1933 年 7 月)、《元朝制度考》(1934 年 4 月)、《元代经略东北考》(1934 年 10 月)，(法) 施亨利著、黎东方译《历史之科学与哲学》(1933 年 9 月)，(俄) 范伦斯基著、鲁学瀛译《俄国革命史》(1934 年 1 月)，(日) 桑原骘藏著、冯攸译《中国阿拉伯海上交通史》(1934 年 9 月)，(日) 梅原末治著、胡厚宣译《中国青铜器时代考》(1936 年 5 月)，(法) 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交广印度两道考》(1933 年 2 月) 等。

上海女子书店开始编印“女子文库”。

该文库收录的史学类书籍有（日）石涣知行著、特伟译《女性社会史》（1933年3月），姚舜生《中国历史妇女演义》（1935年1月）、《中国妇女大事年表》（1935年4月），吕云章《世界妇女运动史》（1935年1月），林仁王编译《婚姻进化史》（1935年4月）等。

北平图书馆委员会成立“《宋会要辑稿》编印委员会”。

北平图书馆聘请傅沅叔、陈垣、章式之、余季豫、徐森玉、赵斐云、叶左文等组成编印委员会，陈垣被推为委员长，主持筹备编印工作。经数年筹备，《宋会要辑稿》编印委员会委托上海大东书局印刷所代为影印《宋会要辑稿》原稿，哈佛燕京学社资助2500美元。至1936年10月，《宋会要辑稿》影印完毕。

苏州国学会成立。

该会推李根源为主任干事，“以讨论儒术为主，时有所见，录为会刊”。章太炎列名该会，并为之撰写《国学会会刊宣言》。该年6月1日，国学会会刊《国学商兑》第1号出版，陈衍任总编辑。

郑振铎在《东方杂志》第1号发表《汤祷篇——古史新辨之一》。

作者宣称“《古史辨》的时代是应该告一个结束了！为了使今人明了古代社会的真实的情形，似有找一条路走的必要”。这就是，依据文学史料，利用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知识，从以往被考据学者视为荒诞不稽的传说中，重建古人的精神世界。

蔡雪村《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本书共九章，近三十万字。序言云：“本书的责任，是要说明历代农民‘叛乱’问题，也就是要把那些被士大夫所鄙视、被皇帝御用的历史家所隐蔽了的农民为‘饭碗问题’而反抗统治阶级的事变，使其恢复委屈淹没了数百年或数千年前之本来面目。”作者强调：“由秦始皇时代以至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前后，农民不断的暴动，成了推动中国历史向前演进的一个主要因素。”“农民虽不能完成划时代之伟大使命，然其生存斗争之为数千年循环发展之主要动力，已属无可置疑。”

本书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早期代表作之一。本书专章论述了秦末农民大起义、西汉赤眉铜马起义、东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大起义、唐代黄巢起义、元末农民暴动、明末农民起义以及清代的太平天国运动。蔡书首先进行理论阐述，然后再列举排比材料。对历次农民战争的分析，重在讨论社会背景，而薄于具体过程的叙述。而社会背景部分，概念化的、雷同的叙述多，典型材料少。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运用大量中外资料，数易其稿，不仅梳理了 1931 年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历程，而且为后人研究中国工业发展保存了不少史料。

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纂出版《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

此引得将班固《汉书艺文志》，姚振宗《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文廷式《晋书艺文志》，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及《禁书总目》等二十种艺文志所载书名、人名等以书名、作者姓名为条目，按“中国字庋藏法”排列。该书广告称“欲研究目录学，或欲知某一书见于何种艺文志，某一人约有若干种著作，以及某一书约亡于何时，皆不可不备此书”。

该年出版的引得还有《佛藏子书引得》、《世说新语引得附刊刘注引书引得》等。

黄云眉编著《邵二云先生年谱》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

任觉五《唯生论与民生史观》由南京拔提书店出版。

李晋华《三百年前倭祸考》由国民外交委员会出版。

该文较为详细地探讨了明朝初期倭寇形成的情况，及明中后期倭寇的入侵路线、入侵伎俩及沿海的海防情况。

2 月

6 日　因外患日亟，华北垂危，故宫博物院所藏古物及善本图书开始南迁。

首次南运的古籍有四库全书、文献档案、明清殿本等，古物有商周铜器等。

28 日　罗香林在《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 1 卷第 2 期发表《古代越族考》上篇。

第 3 期连载。

是月　朱谦之《历史学派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蔡元培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人类进化，分为神学、玄学与科学的三级，近代学者，“无不以由玄学而嬗于科学为目的，是我们所能公认的。科学的异于玄学，就是舍演绎法而用归纳法。但同是用归纳法的科

学，因对象的不同，而得区为两类：一是自然科学，一是历史科学，前者在剔除歧异之影响而求得反复不变的因果；后者在观察类似之事实，而表出特别不同的关系。各有领域，不能相易”。

商务印书馆的“社会科学丛书”收录的重要著作还有（日）出井盛之著、雷通群译《经济学说史》（1930年12月），（法）季特著、吴克刚译《英国合作运动史》（1931年2月）、《俄国合作运动史》（1931年10月），（美）滂恩著、雷滨南译《法学史》（1931年11月），（英）马雷特著、吕叔湘译《人类学》（1933年3月），（美）杨琴巴尔著、高觉敷译《社会心理学史》（1933年7月）等。

（法）格拉勒著、李璜译述《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附沙畹“法国汉学小史”和“法国汉学重要书目”。该书的绪论，“不仅是葛兰言方法论中一个很好的说明书，而且是他向整个的中国学界一种革命的宣言”。而首当其冲的对象，便是伯希和、高本汉等人所代表的正统语文学派。“这一派从沙畹以至于伯希和与马伯乐，可谓登峰造极。其特长与弱点，已均暴露无遗。……社会学派的最大贡献即在乎方法。亦正是这样的方法，乃最能济语文学之穷而补其短。”

葛氏主张突破语文考据学的局限，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史。但此种倡议在中国本土长时间反应平平。

蒙文通《经学抉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分从旧史、焚书、传记、今学、古学、南学北学、内学、鲁学齐学、晋学楚学、文字、蜀学等十一个角度来探讨中国学术内部分支的异同。

茅盾《子夜》单行本开明书店出版。

始作于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5日脱稿。茅盾以长篇小说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他说：“我写这部小说就是想用形象的表现来回答托派和资产阶级学者：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压迫下，是更加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

（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交广印度两道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蒋天枢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1号发表《全谢山先生著述考》。

第2号连载。

朱谦之在《现代史学》第1卷第2期发表《史的论理主义与史的

心理主义》。

3 月

1 日　孙文青在《师大月刊》第 3 期发表《九章算术篇目考》。

7 日　张荫麟在美国斯丹福大学致信张其昀，探讨《中国通史》编纂办法。

张氏在信中说，“通史艰巨之业，绝非少数人之力所克负荷。研制营构，固须自用匠心，至若网罗散佚，分析史料，及各方面之综合，则非资众手不可。颇拟约集同志，先成一国史长编”，“此长编不必有一贯之统系，各册自成段落，为一事，一人，一制度，一时代或文化一方面之专史可，为丛杂之论集亦可。篇幅多寡亦可不拘，要以于国史知识有新贡献者为准。各册随得随刊，不必按伦类或时次编排”。张氏并指出，“此意非弟创发，英国 Began Pual 书店所刊有名之《文化史丛书》性质即略如上所云云”。

1929 年夏，张荫麟由清华毕业，旋赴美国留学，在斯丹福大学先学习西洋哲学，后改习社会学，并立志以史学为终身志业。

13 日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瑞金正式成立。

校长为任弼时，副校长董必武、杨尚昆，成仿吾、冯雪峰是专任教员。该校所开的课程主要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中共党史、苏维埃运动史、工人运动史、史地等。该校在 1955 年 8 月 1 日改称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共中央党校。

15 日　章太炎在省立无锡师范学校讲演《历史之重要》。

章氏在讲演中提出：“夫人不读经书，则不知自处之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经与史关系至深，章实斋云‘六经皆史’，此言是也。”“今日有为学之弊，不可盲从者二端，不可不论。夫讲西洋科学，尚有一定之规范，决不能故为荒谬之说，其足以乱中国者，乃在讲哲学讲史学，而恣为新奇之议论。”“夫今之讲史学者，喜考古文，有二十四史而不看，专在细致之处吹毛求疵，此大不可也。”“夫讲学而入于魔道，不如不讲。昔之讲阴阳五行，今乃有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皆魔道也。必须扫除此种魔道，而后可与言学。”

25 日　罗香林在《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 1 卷第 3 期发表《拟编中国通史计划书》。

罗香林认为，过去的史书多是适合专家研究，而“要想找出一种可供一般人阅读的中国通史，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此应把过去繁简适当的通史著作“做个相当的理董”，并将新发现新确定的史料补充进来，用“客观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来编纂一部具备“通识”的、“符合时代需要的中国通史”。这部通史“要将中国的历史，依照它开展的途程和趋势，给它一个确当的叙述”，使人可以“用最相当的精力以获取在这个时代关于中国全史必须获取而且可能获取的普遍的认识与了解”。

罗香林设想中的这部通史重点关注“国族”、“国土”、“国事”、“社会”、“民生”、“文教”。全书分为十二编，第一编“前论”探讨通史理论、中国的民族、地理、语言、文字等问题，第二编“史前史及古初史”叙述西周以前的社会文化教育等情形，第三编“上古史第一期”叙述春秋战国史事，第四编“上古史第二期”为秦汉史事，第五编“中古史第一期”论述三国两晋南北朝，第六编“中古史第二期”探寻隋唐的治乱兴衰与社会文化教育等，第七编“近古史第一期”叙述五代十国两宋的历史，第八编“近古史第二期”为元明史事，第九编“近世史第一期”叙述明末至清道光间的治乱、民族问题、社会文化教育等，第十编“近世史第二期”自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第十一编“现世史上”述民国成立至1924年国民党改组史事，第十二编“现世史下”叙1924年至1933年之史事及将来之预测。

在“现世史”以前各编，罗香林都将最后一章设计为揭露此前史家对此段历史之“喻解及臆说”，以帮助读者校正对历史的认识。

同期还刊载了朱希祖《新修广东通志略例》等文。

是月 《古史辨》第4册由朴社出版。

本册为诸子丛考，由罗根泽主编。上编考辨儒、墨两家，下编考辨道、法两家。收有胡适、罗根泽、钱穆、游国恩、梁启超、冯友兰、余嘉锡等人的文章。其中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梁启超《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被认为是诸子学开风气的文字。

顾颉刚《序》陈述了疑古辨伪的计划，阐明了他力图打破旧的古史系统的宗旨：“我们的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而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王制是政治的偶像……道统是伦理的偶像……经学是学术的偶像……这四种偶像都建立在不自然的一元论上。”“我们要使古人只成为古人而不成为现代的领导者；要使古史只成为古史而不成为现代的伦理教条；要使古书只成为古书而不成为现代的煌煌法典。”

顾颉刚还表明自己拥护唯物史观。“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我们

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虽不谈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的进行。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

1933 年 2 月，钱穆应邀作序。当时钱穆从罗根泽那里了解到外界对考据之风批评渐盛，每以“琐碎”而“无关大体”相讥，乃借此次撰序之机为考据学辩护，提出：“非碎无以立通，碎非考据之终事，不足为考据病。”钱穆表面替考据辩护，其实“着眼于中国民族文化之前途，颇有慨于现今大思想家的缺乏”。有评论称：“这在北平的学术界里充满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之中尤其是对症发药的文字”，“盖钱意调和汉宋，其志甚伟。”

(苏) 杜博洛夫斯基著、吴清友译《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之本质问题》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此书原版问世于 1929 年。莫斯科国际农业问题研究所所长杜博洛夫斯基激烈反对马札亚尔的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他认为，“在亚洲的不同时代及不同区域中，曾经过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社会结构要素”。他从封建剥削关系中来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他看来，“对农民以封建的及一部分农奴式的剥削，构成亚细亚社会基础”，“就这点，决定亚细亚社会中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他认为，以马札亚尔为代表的“亚细亚派”所讲的作为“亚细亚生产方法”特征的土地国有及灌溉制度，“只是某一种生产方法所附有的特殊表征”，至于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统一，则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国际性的生产方法”。

胡秋原受其影响，对于亚细亚的特殊性持否定态度。“……亚细亚生产方法，也是欧罗巴生产方法。亚洲生产方法国际化了。”

(苏) 波卡洛夫等著《唯物史观世界史》第 1 册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原名《阶级斗争史教科书》，由王礼锡、王亚南、胡秋原等根据日译本翻译。该书叙述从原始社会之崩溃到阶级社会之发生，包括前阶级社会与阶级之发生、古代亚细亚社会、古代社会等 3 编。汉译共 5 册，至 1936 年又出版了第 2 册和第 4 册。第 2 册的主题是“从封建制度之发生至成熟”(1936 年 5 月)，第 4 册的主题是“从资本主义发生至成熟”(1936 年 2 月)。

此书在 20 世纪 30 年代颇流行，是唯物史观世界史的代表作，为众多作者所征引。

蒙文通《古史甄微》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持一种古史多元的观点，认为中国上古民族可分为江汉、海岱、

河洛三系，分称三系为“炎族”、“黄族”、“泰族”，三族文化各有不同，“泰族者中国文明之泉源，炎、黄二族继起而增华之”。并指出上古“中国之中心，前后有三，以次自东北而西南”。

此书体现出一种批判性眼光，自称“非毁尧舜，讥短汤武，狂悖之论哉”。它颠覆了古代圣王祖孙一系相传的架构，以不同族系之间勾心斗角的故事取代了三代圣君贤相的旧说，将三代视为“权力”角逐而非“道德”兴盛的时代，以为三代之兴皆得“夷狄”之助。在史料上，作者尊信非正统史料，认为“儒家言外若别有信史可稽”，因而大量征引前人认为荒诞不经的材料尤其是纬书。书中论证“我华族自东而西”的发展之迹，又是对晚清以来流行的中国民族西来说的反驳。

古史辨派将蒙氏引为同调。但蒙氏与古史辨派在史料观上又存在歧异，他批评此派疑古过甚的弊病，认为古史传说也有史料价值，不可一笔抹杀；而所谓“伪书”虽伪，其所据材料却不必尽伪，仍可回收利用。

南京日本评论社开始出版刘百闵主编的“日本研究会小丛书”。

该丛书收录的史学类书籍有百闵《日本共产党之发展》（1933 年 4 月），家壎《日本财政史要》（1933 年 6 月），邵德厚《抵制日货之考察》（1933 年 11 月），南柔《日本制宪史》（1933 年 12 月）、《日本现代人物小传》（1934 年 4 月），陈丹崖《日本美术演进小史》（1934 年 7 月）、《日本维新后的教育思想发展史》（1935 年 1 月），郑师许《日本考古学之过去与现在》（1934 年 8 月），吴绳海《日本近世文化与中国》（1934 年 12 月），张克林《日本社会教育之史的发展》（1935 年 3 月），蔡可成《日美远东对立之史的考察》（1935 年 3 月）等。

胡汉民在《三民主义月刊》第 1 卷第 3 期发表《三民主义的历史观》。

文中云：“唯物史观中经济结构的基础，所谓生产力，生产方法，只是为求生而觅食的一种工具，其上层的建筑，如制度的文化等等，只是为求生而自卫的必要的设施。文化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转变，都随着求‘生’的方式而转变，把握住社会进化的原动力的，不是‘物’，而是人类求生的意欲。……人类的意欲，是没有尽止的……一切努力所发生的种种现象，种种变迁，都只是求生存一念的演变。”胡汉民将求生存的意欲视作历史进化的根本动力。“唯物史观者之所谓‘物’，只是求生的努力与欲望的推展之外物，是结果，不是原因，是枝叶，不是根本。”

自胡汉民后，视民生史观为心物合一论，基本上成为国民党理论界的共识。

李剑农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 3 卷第 3 号发表《先秦货币演进考》。

萨孟武《西洋政治思想史》第 1 册由新生命书局出版

第 2 册同年 5 月出版。

4 月

1 日 《读书杂志》第 3 卷第 3、4 期合刊“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第 4 辑出版。

胡秋原的《中国社会 = 文化发展草书》一文，把奴隶制看作只是封建社会末期的一种“变形发展”，从而否认了奴隶制社会的存在。他说：“不是奴隶社会先于封建社会，而是封建社会先于奴隶社会。”并认为，郭沫若的“全部著作都受了甲骨金石的束缚而不能自由开展”。

王宜昌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中提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步骤：利用西欧社会分析所得的指导原理，这在初步的归纳法上是必要的，从搜集事实以到假设都是必要的。而后从普遍中求特殊，以相对的辩证法观点中求中国的现实的差异，又是进一步的工作。而最后统一西欧社会和中国社会，从新验证和发展已成定律，这是最后的工作。王宜昌希望社会史研究者多学习经济学理论，以消除思想混乱。

陶希圣在《汉儒的僵尸出祟》中，针对不加批判的应用古书的情况，他建议“把骂人的工夫移到中国史料上面去”。陶希圣批评论战者“证据不足之处，以谩骂补足”。陶希圣讥刺李季成文之速，五六天或三两天写就数万字，大抄马恩全集也是一大特点。李季为攻击顾颉刚、钱玄同的疑古论，与汉儒同流，误信他们的正统史观。

刘苏华的《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对社会性质论战中的要角严灵峰的方法根本质疑，他认为严氏以形式逻辑嘲弄马克思主义，曲解辩证法。接着他分析了严氏提出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是否有占主导的经济成分、目前的阶段结构等几个具体问题。他认为，严灵峰关于中国社会目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论断，“根本推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他还将严灵峰称作“骂人斗争家”。

余沈的《经验主义的，观念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济论》提出，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有三种根本趋向：经验主义的、观念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重事实和经验，观念主义以观念支配事实，马克思主义将叙述事实与探求原因结合起来。余沈说：在最近二年来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关于中国现代经济分析，“多半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

进行，或至少是企图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唯物史观在中国已具有最大的权威”。

3日　胡适撰《四十二章经考》，引发与陈垣的讨论。

胡适认为汉代译经即有“佛”、“沙门”等名词。他将文稿送陈垣征询意见。陈垣致函胡适，运用汉代君臣诏令奏议称“浮屠”、“浮图”，而不言“佛”、“沙门”的材料，反驳胡适的观点，认为现存《四十二章经》非汉译亦非曩昔所引之汉译佚经。

陈垣与胡适关于《四十二章经》的论战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次高水平的较量。这场论战前后十余日，双方往来书信达八封，胡适过分相信内典，依据现存《四十二章经》将佛道名称追溯至汉。陈垣利用外典史籍发难。他说：“信供不如信证，故每在教史以外求证，……佛家记载如可信，吾何以不信，奈其可信者甚少何，故尝谓研求教义，自当寻之内典，研求教史，不能不证之外典也。”记载佛教史事，教籍不如史籍缜密。

许冠三评论说：援庵“考《四十二章经》身世，能以缜密傲视胡适之”。陈智超论这场辩论，说：“他与胡适关于《四十二章经》的辩论，更是宗教史研究中的一段佳话。……今天回顾这一场辩论，犹如欣赏一场精彩的高水平的友谊比赛。双方实力伯仲，旗鼓相当。经过辩论，在一些问题上取得共识；未能一致的地方，也因此充实了自己的论据，使自己的观点更严密。前辈学者在学术上坦率的态度，令人向往。”

21日　教育部呈请行政院，将四库全书中尚未付印及已绝版之珍本约八九百种先行付印。

稍后教育部训令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迅速刊印四库全书中尚未印行或已绝版的珍本。6月17日，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影印四库全书未刊珍本合同”。两个月后，由教育部聘请的专家编订《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目录》（计231种、2000册），决定至1935年分四期出齐。

是月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北平迁往上海。

上海黎明书局开始编印“社会科学名著译丛”。

该译丛收录（俄）佩兰著、杨心秋译《十九、二十世纪经济学说史》（1933年7月），（美）海斯著、耿淡如等译《近世世界史》（1933年9月），（美）雷岱尔著、郑学稼译《社会主义思想史》（1933年10月），（英）Robert Flint著、郭斌佳译《历史哲学概论》（1934年2月），（德）李朴克拉西等著、孙寒冰等译《价值学说史》（1933年5月），（美）海斯著、蒋镇译《现代欧洲史》（1935年4月）等。

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

该书从历史哲学的概念入手，认为历史哲学“是和自然科学一样，要在事实的浑沌当中寻出一种社会现象的根本法则来”，所以史学的“本身却是关于社会的一个具体的叙事学，换言之，即一种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哲学，实际就是‘社会学’”。

该书梳理了“历史哲学的历史”，分析了“神学的历史哲学”、“形而上学的历史哲学”、“社会的科学的历史哲学”、“新理想主义的历史哲学”、“新理想的生命的历史哲学”。作者认为，“从哲学方面说，现代哲学的新倾向，可从两个方面观察，一方为由神学、形而上学而递嬗于实证的科学的哲学；一方即为黑格尔主义复兴。以前言之，应先研究孔德的历史哲学；以后言之，不可不先研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及辩证法”。并认为“从历史方面说，历史学的演进，是从故事式的历史进到教训式的历史，又从教训式的历史进到晚近发展式的历史，这就是所谓历史观，或历史哲学”。在学术研究中，“史家论史，愈广博，愈深刻，换言之，愈真实，就愈不可不先研究历史哲学”，而“研究任何派社会学，都不可不先研究历史哲学”，研究其他社会科学，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历史哲学，所以历史哲学“在学问体系中，为一种综合性的学问。尤其在我们中国有作整个系统地介绍的必要”。朱谦之还指出，“本书的编辑意在广包并容，不拘一格，内容务切急需，而以总理所唱三民主义的历史观，为其旨归”。

（苏）柯岑著、岑纪译《中国古代社会》由黎明书局出版。

本书讨论了夏、商、周三代土地制度，其中对井田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尤为重要。作者还对胡适、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关于井田制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的观点进行了评论。

马札亚尔在本书序文中提出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定义：（一）人工灌溉是耕作的主要条件；（二）阶级社会的发生与人工灌溉有密切的关系；（三）没有土地的私有；（四）东洋专制主义是国家形态。通过讨论，他放弃了“亚细亚的”是帝国主义所遇见的制度，但仍坚持在社会史上存在亚细亚社会。他批评沙发洛夫“不说明亚细亚生产方法在东洋各国是如何解体、封建制度是如何发生”。在他眼中，亚细亚生产方法先于封建制。

5月

10日　郭沫若《卜辞通纂》由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据著者手稿影印出版。

其序云：“本书之目的，在选辑传世卜辞之菁粹者，依余所怀抱之系

统而排比之，并一一加以考释，以便观览。”正编收甲骨八百片，分为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等八项，并加以考释、小结。别录收未经著录过的甲骨一百二十九片。考释多为诸家所未识者，从此解决了殷先王中各家争论不休的问题。作者通过卜辞对周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风俗等各方面进行了研究。书后附考释、索引。

20日 《现代史学》推出“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

该专号收录了朱谦之《经济史研究序说》、陈啸江《西汉社会“纯经济过程”之解剖》、黄松《均田制度下的北朝农村经济》、董家遵《唐末经济恐慌与农民》、朱希祖《交子之起源》、戴裔煊《纸币印刷考》、梁瓯第《清末外资本侵入后的农村经济》、傅衣凌《论中国的生产方式与农民》、王兴瑞《关于中国古代用铁的研究》等文。

陈啸江在《编后》中指出：“年来中国社会史的研究，随着国际间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热潮，冲进了国内学术界的中心，突然使这沉寂又沉寂的古国，竟又透出一些新生气来”，且由于东北的丢失，“社会史研究的严重性，更随时势的进展而有实践的意味了”。陈氏认为，社会史的范围太广，它的基础是经济史。该专号的最大意义，“便是认清中国社会史的核心”。陈氏还对当时的历史学界提出批评，认为史学研究“始终跳不出考古学、考据学家的圈子，把历史看为‘破罐子’，大做特做其补‘边’，修‘底’，添‘把’，增‘嘴’一类的工作而无已时——亦不会有已时——好似一说历史，便可完全与现实脱离关系者然，宁不痛心之极”。陈啸江将其大力提倡的社会史经济研究，称之为“新史学运动”，且断言“它便是将来中国史学史新旧分期的界线”。

王兴瑞在《现代史学》第1卷第3、4期合刊“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发表《关于中国古代用铁的研究》。

该文先讨论中国古代用铁知识的来源问题，推论用铁知识是从中亚传到苗族再传播到其他民族，南方早于北方。开始用铁时代在西周末叶，最初是装饰品，不知用作生产工具，此时“铁对于文化并没有什么影响”。铁之用作耕器，约始于春秋初期，武器用铁在春秋下半期。作者还在文末批评朱希祖的观点，认为朱氏所谓工业之早发达为南方先行铁兵的原因，是倒因为果的说法。

稍后，《中国经济》、《食货》半月刊等经济史、经济类刊物上陆续推出关于铁器研究的文章，如《食货》半月刊第2卷第7期（1935年9月）所载莫非斯的《中国用铁时代问题的研究》，《中国经济》第2卷第10期（1934年10月）所载王宜昌的《中国用铁时代之讨论》等。

20 日　新生代研究室正式开始山顶洞遗址发掘工作。

因 1929 年发掘“北京猿人”的发现而受到鼓舞的裴文中等人从 1930 年春季开始对龙骨山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工作，并发现了山顶洞。1933 年 5 月 13 日，杨钟健、裴文中、卞美年、德日进等人决定集中力量发掘山顶洞。此次发掘工作至 12 月 19 日因天气寒冷中断，1934 年 4 月 24 日至 6 月 17 日，将此前未完成的发掘工作完成。

此次发掘获得了很多整齐的动物化石、石器、装饰品，更重要的是，此次发掘发现了完整的头骨、头骨残片、上颚骨、下颚骨及躯干骨等，被认为是七个男女不同的身体，后被称为“山顶洞人”。

是月　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由著者书店出版单行本。

文章检讨近人在考辨老子时存在的方法论问题。胡适将与其辩论的学者的方法论分作两组：第一组是从“思想系统”或“思想线索”上推导老子成书当在战国之末。梁启超、钱穆、顾颉刚持这一观点。胡适指出：“这种方法可以说是我自己‘始作俑’的，所以我自己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我现在很诚恳的对我的朋友们说：这个方法是很有危险性的，是不能免除主观的成见的，是一把两面锋的剑可以两边割的。你的成见偏向东，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向东；你的成见偏向西，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向西。如果没有严格的自觉的批评，这个方法的使用决不会有证据的价值。”第二组则用文字、术语、文体等来证明《老子》是战国晚期的作品。冯友兰、梁启超、顾颉刚运用过此法。胡适指出：这个方法，自然有有用之处。“孔子时代的采桑女不应该会做七言绝句，关羽不应该会吟七言律诗，这自然是无可疑的。”“但这个方法也是很危险的，因为（1）我们不容易确定某种文体或术语起于何时；（2）一种文体往往经过很长时期的历史，而我们也许只知道这历史的某一部分；（3）文体的评判往往不免夹有主观的成见，容易错误。”

罗玉东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 1 卷第 2 期发表《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

文章以“岁入岁出”为依据，将光绪一朝财政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光绪元年至二十年（1875—1894），第二个时期为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1895—1900），第三个时期为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四年（1901—1908），并分别探讨这三个时期政府对财政的补救整顿措施。此文是较早研究晚清财政史的论著之一。

同期还刊载了刘隽《道光朝两淮废引改票始末》、陈文进《清季出使

各国使领经费》两篇论文和汤象龙评《张季子九录》、刘隽评《东三省盐法志》等书评。

(美)海斯著、姚莘农译《近代世界史》由世界书局出版。

《近代世界史》搜集广博，而无散漫支离之弊，“洵通史中之佳作”，出版后颇受欢迎。(耿淡如、沙牧卑译《近世世界史·译序》)这本书虽系统井然、编制妥善、文字佳妙、中心突出，但中译本存在不少问题，没有充分译出这部书的特色。(伯明《关于姚莘农译的〈近代世界史〉》，《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4期，1934年2月17日；李惟果《海士、蒙合著〈近代史〉之两种译本》，《图书评论》第2卷第4期，1933年12月1日。)

万国鼎《中国田制史》由南京书局出版。

作者鉴于当时中国尚缺少研究中国田制发展历史的著作，而土地问题影响国计民生至巨，且当时中国“亟待解决者中国土地问题”，乃撰写此书。此书内容主要有“上古田制之推测及土地私有制之成立”、“两汉之均产运动”、“北朝隋唐之均田制度”、“均田制度破坏后之唐宋元”等。1934年12月南京正中书局再版该书。

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将上古至太平天国的中国宗教思想之发生、发展、流传、变迁等进行论述，对了解中国宗教思想发展的概况有不小帮助。

容庚、瞿润缗合著《殷契卜辞》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6月

5日　陶希圣在新生命书局推出“中国社会史丛书”。

陶希圣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筹建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时，就计划出版该丛书。该丛书主要收集三方面的著作：(一)通论中国社会全部或一时代的变化过程的。(二)对中国一时代或一问题作特殊研究的。(三)史料的收集。

在《中国社会史丛书刊行缘起》中，陶希圣指出：“史学不能制造历史，反之，历史的研究产生史学。”认为：“也许中国社会的发达与欧洲有同样的过程。也许两者截然不似。但是，要断定中国社会的发达过程，当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及现存的各种材料下手。如果把史料抛开，即使把欧洲人的史学争一个流水落花，于中国史毫没用处。”因此，“发下一个小小的

誓愿”，要把当时“学者不独把欧洲的史学当做中国史的自身，并且把中国古代学者的史学当做古代史的自身”的“悲惨笑话”，“转换为真实的功夫”，即：第一，“宁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找出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来，在沙上建立堂皇的楼阁”；第二，“多做中国社会史的工夫，少立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空论”；第三，“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

该丛书后来收录的主要著作有：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1933 年 6 月）、《中国中古时期的田赋制度》（1934 年 10 月），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1934 年 10 月），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1934 年 11 月），曾謇《中国古代社会》（1935 年 4 月），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史研究》（1936 年 3 月）。

刘道远《两宋田赋制度》在新生命书局出版。

该书主要内容有“宋以前田赋变迁概说”、“土地制度”、“官田租课”、“民田赋税”、“土地整理与均税”、“丁口之赋”、“差役”、“租税制度对户口及垦田的关系”、“征收制度”等。

1978 年台湾食货出版社再版此书。

7 日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对吉林宁安县上京龙泉府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发掘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至 15 日结束。1939 年在东京出版《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址的发掘调查》，作为《东方考古学丛刊》之一。

20 日　李麦麦《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批判》由新生命书局出版。

全书分五篇：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封建制度之崩溃与专制君主制之完成，再论春秋战国的阶级斗争，先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哲学思潮，诗经时代的女性生活。此书研究从殷商至先秦社会性质、政治制度、哲学思潮，阐述这一时期的经济基础、阶级斗争及其对社会政治制度形成的作用；分析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变革、阶级斗争对其思想形成的影响；作者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提出中国封建制度起始于殷代，全盛于西周，崩溃于春秋战国时期，而秦至清为专制君主制时期；认为《诗经》一书是典型封建社会的产物，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女性生活；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叶青《胡适批判》、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三书进行批评。

1934 年 3 月 10 日，叶青在《二十世纪》发表书评；1935 年 9 月 10 日，王伯伦在《文化建设》第 1 卷第 12 期有《评〈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批

判〉》一文。

24 日　陈垣写信规劝治思想史的后辈蔡尚思。

陈垣在信中说："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阔，不成一专门学问。……欲成一专门学者，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

7 月 1 日，致函蔡尚思，再论治学问题。认为士各有志，不能强同；强调自己反对的是"空泛弘阔"之理论，未尝主张"无博之精"。

后来蔡尚思回忆："陈师的治学方法，基本上是属于清代朴学的一个体系的，但在研究的范围和中心上，二者已经有所不同，他不再以经学小学为中心，曾说：'清代经生，囿于小学，疏于史事'，他颇相反，这是学问中心的不同。他比清代朴学家更加集中精力，专做'窄而深'的史学工作，不再上自天文，下至地理，近自书本，远至器物调查，什么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文艺等无所不包。他曾亲对我说：'象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的所谓名著，很象报章杂志，盛行一时，不会传之永久。'……在我的老师中，要推陈师最强调专题的精研了。凡专门史，如文学史、史学史、哲学史等等的研究，他尚且觉得范围太广，更不要说思想史、文化史了；至于中国通史、世界通史，那就更大而无当了。他自己是从来也不想做这一类的研究的。"

是月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

陈翰笙为理事会主席，主要成员有吴觉农、孙晓村、薛暮桥、王寅生、钱俊瑞、孙冶方、冯和法、张锡昌、秦柳方、陈洪进、姜君辰、骆耕漠、徐雪寒、石西民、狄超白、千家驹、张稼夫等，共 500 余人，最盛时会员达 1000 多人。它在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领导下，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农村经济之方法、中国农业经营的形态和性质、中国的土地分配和租佃制度等十个方面。

1934 年，该会以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月刊为阵地，与王宜昌、张志澄等为代表的"中国经济派"展开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吕振羽编就《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

该书作为中国大学教材，由北京聚魁堂讲义书局铅印，在校内发行。在讲义中，吕振羽指出，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因而，"一个忠实而负责的历史家总不应该单拿上层的政治形态的东西去说明下层的经济的性质"，"而欲说明其历史运动的法则时，只有从生

产力以及由生产诸力而构成生产诸关系上考察”。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经过了几个阶段：殷以前是原始社会，殷代是奴隶制社会，西周至鸦片战争是封建制社会。讲义较详尽的阐述了殷到鸦片战争各阶段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政治形态。这是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雏形。

吕振羽还提出，中国“到清代的前半期封建经济已临没落，而开始跌入社会自身的突变的过渡期”，“历史的新因素已在形成的过程中”。他已注意到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孕育着新的资本主义因素这一问题，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张寿镛编辑《四明丛书》第 1 集出版。

张寿镛为保存四明（今浙江宁波）地区文献典籍，弘扬民族精神，特别编纂刊印此套丛书。张寿镛从民国初年即有志于收集刊印故乡典籍，从 1931 年初正式着手，至 1932 年 12 月方才完成第 1 集，此后陆续编印至第 7 集（第 2 集 1934 年 9 月出版、第 3 集 1935 年 5 月出版、第 4 集 1936 年 4 月出版、第 5 集 1937 年 9 月出版、第 6 集 1939 年 12 月出版、第 7 集 1940 年 9 月出版），第 8 集尚未刻成，张氏于 1945 年 7 月 15 日去世，由其子于 1950 年刻成，第 9、10 两集仅见目录。

该丛书是我国收书最多、规模最大的地方丛书之一，共计收书 178 种、1177 卷，其中不少浙东史学家的著作，如高似孙《史略》、万斯同《石经考》、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等。该丛书不仅校刊精良、著录详实具有版本价值，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序跋具有学术史价值，而且表章忠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激发民族气节，故在学术界影响颇大，1949 年后多次重新出版。

冯家昇在《燕京学报》第 13 期发表《契丹名号考释》。

冯氏在导师洪业等人指导下，原本计划撰写《契丹名号源流考》，不仅考释“契丹”名号之来源，且考其衍变及影响，但后因资料收集等问题，乃改为现名，集中于对“契丹”名号的起源、为何以“辽”为国号、“契丹”的字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被有关研究者视为“契丹史开创之作”，或民国时期民族史研究的代表性论著。

同期还刊载了刘朝阳《再论殷历》，吴世昌《诗三百篇“言”字新解》，徐中舒、郑德坤、冯家昇《月氏为虞后及“氏”和“氐”的问题》等文。

陶元珍在《燕京学报》第 13 期发表《三国吴兵考》。

作者认为，“魏蜀之兵，上符两汉，可无具论；若乃东吴之兵，性质

制度，最为特异，故不可以无纪”，但一直缺少梳理研究，故撰写此文对东吴的“兵数”、“兵种”、“聚集”、“统督”、“授袭”、“屯戍”、“奉邑”等问题等进行梳理、考证。该文被认为是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的代表性论著之一。

张荫麟在《燕京学报》第13期发表《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本事考》。

作者认为龚自珍此诗乃暗涉岳钟琪事，为龚自珍对清朝“腹诽恶诅”之流露。后张氏得知陈寅恪认为其考证结果不准确后（陈寅恪认为是指杨芳事），又撰写《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刊《燕京学报》第15期），认为“此诗乃借岳钟琪事以讽杨芳而献于杨者”。

北平文殿阁书庄开始编印“国学文库”。

该文库主要收录宋元明清时代的史料书籍，有《松漠纪闻》、《辽文萃》、《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皇明四夷考》、《皇明经济文录》、《满洲实录》、《粤海关志》、《庚子交涉隅录》等。

陈寅恪在《清华学报》第8卷第2期发表《读连昌宫词质疑》。

作者“据地理以推年月，依年月以论人事”对《连昌宫词》进行研究，不仅探讨“作诗之时、地”，且“大旨在发挥此诗与当日政治关系，并略及文字疏谬之处”。文后附“故宫博物院所藏连昌宫词图”。该文是陈寅恪以唐诗证唐史的最初尝试。

同期还刊载了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吴景超《近代都市化的背景》、姚薇元《〈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北人姓名考证》等文。

何格恩在《岭南学报》第2卷第4期发表《明代倭寇侵扰沿海各地年表》。

该表将从洪武元年至天启五年倭寇侵扰沿海之事按年排列，明代纪年之下，附列日本纪年，主要内容有“倭寇侵扰之地方及其情形”、“朝廷之设施与任免，及地方官吏之剿抚与防御”、“中日两国之邦交与来往，证明倭寇与日本政府之关系”。作者并指出，因丰臣秀吉侵朝“志在吞明，意义重大，与侵扰沿海之倭寇不同”，另文述之。

由于20世纪30年代日寇对中国侵略不断加剧，国内学术界兴起一股以“日本倭寇”为对象的研究热，该文即是出现较早的重要论著之一。

同期还刊载了冼玉清《元赵松雪之书画》、黄仲琴《明永历三十年官印》、李镜池《古代的物占》、何格恩《叶适在中国哲学史上之位置》

等文。

《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出版。

内有《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殷代冶铜术之研究》等。

史襄哉、夏云奇编《纪元通谱》由中华书局出版。

7月

4日　班书阁在《女师学院期刊》第1卷第2期发表《书院掌教考》。

此后班书阁又发表一系列关于书院研究的论文，如《书院兴废考》(《女师学院期刊》第2卷第1期)、《书院生徒考》(《女师学院期刊》第3卷第1期）等。

是月　《学衡》第79期出版后停刊。

此期刊载了陈寅恪《与刘文典教授论国文试题书》、杨宽《墨学分期研究》、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等文。

蔡芹香《中国学制史》由世界书局出版。

此书是我国第一部学制专史，脉络清晰地梳理了从上古至民国的学制变迁。

(美) 弗领著、薛澄清译《历史方法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探讨了历史学的性质、历史研究的步骤、研究题目的选择、史料的处理、史实的建造、书写方法等问题。同年10月立达出版社出版另一译本。

容庚编《颂斋吉金图录》出版。

谢国桢编《清初史料四种》由北平图书馆刊印。

罗福成在《满洲学报》第2期发表《辽宣懿皇后哀册释文》。

8月

31日　柯劭忞在北平去世，享年86岁。

是月　常乃悳《生物史观与社会》由大陆书局印行。

生物史观，又称“生物社会史观”。其理论来源是西方的“社会有机体论”或称“社会达尔文主义”。常乃悳加以发挥，综合生物学、社会学

和历史学的方法，创立生物史观。他把人类社会看作是生物进化过程的一部分，认为生物进化原则也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生物和社会进化的根本趋势是组织化，即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由简单组织到复杂组织。组织化程度越高，发展阶段越高，越能适应环境，在竞争中有能力击败敌人。组织化是人类唯一应遵循的原则。因此，个人应当服从整体。在当时世界上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只有建立强大的国族才能战胜外来侵略。生物史观的核心是国族主义，而且始终以唯物史观为对立面。

常乃悳的此种论述还见于其《社会科学通论》、《生物史观研究》、《历史哲学论丛》等作品。

章嵚《中华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书中“编辑概略”称草成于1914年。此书共5册，达1500余页。共分四编：甲编为上古，乙编为中古，丙编为近古，丁编为近代及现代。该书自黄帝之盛治起，以下述各时期之世变、大政、法制等。作者初衷不专为学校参考而作，也供文章、政法、军事、实业诸专家及一般公民阅读。宋钟岳“校读后记”云：“盖叙历代史事，采通史之体制，且先生融会东邻本邦史论之精粹，去取别具眼光，故特称曰‘新’，是诚国内一有系统、有条理之史册也。”

陈沅远在《史学年报》第1卷第5期发表《唐代驿制考》。

此文梳理考辨了唐代“驿之组织”、“驿之管理”、“驿使”、“驿之经费”、“驿程纪要”、“驿馆名录”，并绘制了《唐代驿路图》。有研究者认为，此文认为在民国时期的研究唐代驿制的论文中，“不论在论述详备，还是资料丰富上，都堪称第一”。

同期还刊载了洪业《高似孙〈史略笺正〉序之一》，顾颉刚《州与岳的演变》，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叙论》，葛启扬《刘向之生卒年及其撰著考略》，冯承钧《考古随笔》，张维华《葡萄牙第一次来华使臣事迹考》，魏建猷《清雍正朝试行井田制的考察》，傅振伦《章实斋之史学》，（日）和田清著、翁独健译《明治以后日本学者研究满蒙史的成绩》，黎光明《皇明驭倭录勘误》，梁愈《读山中见闻录书后》等论文。

梁方仲在《地政月刊》第1卷第8期发表《明代鱼鳞图册考》。

此文不仅利用了《明史·食货志》、《明太祖实录》等材料，而且利用一些地方志，探讨了明代鱼鳞图册的内容、鱼鳞图册与黄册之关系、鱼鳞图册名称之由来、鱼鳞图册之来源、明代鱼鳞图册攒造之经过等问题。

此文是梁方仲刊发的第一篇论文，也是最早研究鱼鳞图册问题的论著，刊出后迅速引起了中国与日本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至今仍是明代经

济史研究领域的基础性论著之一。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出版“圆明园”专号。

万国鼎编《中西对照历代纪年图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梁心《国耻史要》由上海日新舆地学社出版。

9月

9日　黄侃《日知录校记》由国立中央大学刊印。

26日　顾颉刚作《民众读物编刊社章程》。

长城抗战后，华北危急，顾颉刚为宣传抗击日本，决定征集、出版鼓励抗击日本的大鼓书词，并以“三户亡秦”之义将发行机构命名为“三户书社”。数月后，为鼓舞抗战士气，顾颉刚决定将“三户书社”的范围扩大为普及知识的机构。本月14日，顾颉刚致信教育部长王世杰，为三户书社请款。为此，顾氏决定将三户书社改名为“民众读物编刊社”，并作《民众读物编刊社章程》。

顾颉刚指出编刊社的目标有四：一、“唤起民族意识”，二、“鼓励抵抗的精神”，三、“激发向上的意志”，四、“灌输现代的常识”。该年10月，三户书社正式改名“通俗读物编刊社”。在10月15日上教育部呈文中，顾氏说明该社“目标除提倡民族精神外，尤注意于国民道德之培养及现代常识之灌输，盖救国大业固非但恃血气之勇若义和团者所可胜任”。

后来“通俗读物编刊社”致力于编纂通俗故事丛书和人物传记。郑侃嬨所撰文章，如《勾践报吴》、《子产治郑》、《张季直》等，陆续刊于《大公报·史地周刊》，颇得一般读者好评。顾颉刚又请其代作《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自己修改后由《中学生》刊出。顾氏还计划先由个别人物写起，将来再整理加工，改写为中国通史演义。

29日　简朝亮在广州去世，享年81岁。

简朝亮为岭南名儒朱次琦门人，数十年精研儒家经典，著有《尚书集注述疏》、《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孝经集注述疏》等书。

30日　蒋介石在《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

蒋氏指出“人类全部历史即是人类为生存而活动的记录”，“惟有以民生哲学为基础的民生史观，或以民生史观为出发点的民生哲学……才能说明人生的全部与历史的真实意义”。

王兰荫在《师大月刊》第6期发表《纪晓岚先生年谱》。

此文以纪晓岚作品集为基础，同时参考《东华续录》、《清宫史续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及时人相关文集编纂而成。有研究者指出，此谱于纪氏事迹“多方补苴，原原本本，颇称丰备”。

同期还刊载了罗根泽《乐府的故事与作者》、黎锦熙《两宋理学两派五家选目并叙例》、陈子怡《宋人理学由回教蜕化而出》、牛继昌《朱熹著述分类考略》、陈述《蒋心余先生年谱》、杨宗震《史记地名考》、刘汝霖《两汉粮价涨落考》、王桐龄《宋代房钱考》、王正己《宋江考》等文。

是月　李鼎声（李平心）《中国近代史》由光明书局出版。

全书分十八章，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迄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察哈尔的近百年历史，是我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撰写的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的滥觞。

《中国近代史》在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中国近代史分期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探索，批驳了长期流行的一些观点。作者提出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论断，并确定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书中开卷即称：“本书重视史事发生之社会、国际背景与经济基础，每一重大事变之因果与过程必多方阐明，务使读者由此获得明确之历史概念。”他强调：“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因此，在史料的取舍裁剪上，注重“富于历史意义之事实，如农民之战斗、民众之反帝运动、劳工之政治斗争、帝国主义之对立与阴谋等”。

李平心主张，研究中国近代史，要从世界历史的整体中进行考察。他说：“我们研究中国史的主要任务，乃是要考察中国社会在全人类历史上的一般发展过程中特有的发展路线，同时要解释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变，如民族的分合斗争，社会形态的递嬗变化，等等——发生的原因与其成果，说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相影响。”他又指出：“中国近代史又是中国社会受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影响，震荡得最激烈，变化得最迅速的时代”，所以，从世界历史的整体中来考察中国近代史，“求得中国近代史的知识，也就成为异常必要”。

至1939年3月，已发行第10版，颇受读者欢迎。

（美）海斯著，余楠秋、谢德风、吴道存编译《近代欧洲史》上卷由黎明书局出版。

此书是“社会科学名著译丛”之一，被誉为“近世欧洲史之唯一名著”（《近代欧洲史》版权页）。据黄慎之译本广告介绍，海斯这本书是“历史界的一本空前的著作”，不但在欧洲是“风行一时的大学历史课本”，即在我国各大学亦“久已采作教本”，译刊此书“特应国内各大学之需用”。五四时期各大学采用国外历史课本最广者，殆无过于海斯的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它在美国也是极为风行的课本。

下卷由蒋镇翻译，题名《现代欧洲史》，1935 年出版。30 年代此书完整的中译本还有两种：黄慎之译《近世欧洲政治社会史》，上海民智书局 1933 年出版；曹绍廉译《近代欧洲政治社会史》，国立编译馆 1935 年出版上卷，1940 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

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小学生文库”。

该“文库”收录的史学书籍有《中国文化小史》（姚名达、朱鸿禧著，1933 年 10 月）、《秦始皇帝》（何炳松著，1933 年 10 月）、《国耻小史》（黄孝先著，1933 年 12 月）、《中国革命史略》（庄适、吕金录编，1934 年 2 月）、《世界大战小史》（吕金录编，1934 年 2 月）、《德国小史》（冯和法编，1934 年 2 月）、《英国小史》（冯和法编，1934 年 2 月）、《希腊小史》（高君韦译，1933 年 10 月）、《日本小史》（滕柱译，1933 年 10 月）、《法国小史》（马绍良译，1933 年 10 月）、《埃及小史》（高仲洽译，1933 年 12 月）、《罗马小史》（高仲洽译，1933 年 12 月）等，此外还有几十部中外名人传记。

《读书杂志》出版第 3 卷第 7 期后停刊。

《读书杂志》观点激进左倾，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于是遭到查封。《读书杂志》停刊使中国社会史论战失去了主要阵地，论战高潮结束了。不过社会史研究并未就此收场，而是转移到《历史科学》、《食货》、《中国经济》、《文史》、《文化批判》等刊物上继续进行，转入新的阶段，在关注理论问题的同时，趋于注重材料的搜集整理和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纂出版《日本期刊三十八种中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

该书广告称“日本为近今研究东方学之重镇。我国年来提倡国学之风，甚嚣尘上，于日人之研究，当不无借鉴之处”，此引得将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三十八种日本期刊中“关于东方学之论文篇目，编为引得，以为检查之助”。

陈顾远《中国法制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第一编为“总论”，首先探讨了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然后探讨了“中国法制之变的问题”、“中国法制之质的问题”、“中国法制之量的问题”；第二编为“政治制度”，探讨了“中国法制中之组织法”、“中国法制中之选试法”；第三编为“狱讼制度”，探讨了“诉审”、“刑名”、“科刑”、“肆赦”；第四编为“经济制度”，探讨了“田赋税制中之经济立法”、“商制币制中之经济统制”。

该书是中国法制史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论著之一，多次再版，至今仍有学术价值。

丁迪豪在《历史科学》第1卷第5期发表《中国奴隶社会的批评》。

文章批评郭沫若的认识是“异端邪说”，“奴隶制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上，不能成为一独立的阶段”。

谭正璧《国学概论讲话》由光明书局出版。

10月

10日　吕思勉在《光华大学半月刊》第2卷第1期发表《三皇五帝考》。

20日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进行第8次发掘。

此次发掘由郭宝钧主持，参加者有石璋如、刘燿、李景聃、马元材等。此次发掘至12月25日止，除了发现有字甲骨257版外，还发现殉葬的人头骨28颗，被认定为杀人殉葬的确证。

24日　山东古迹研究会在山东滕县安上村遗址进行发掘。

参加者有董作宾、王湘、祈延霈及山东大学教授刘咸。此次发掘至11月30日结束，发现龙山文化遗址及众多的遗物。

25日　吕思勉在《光华大学半月刊》第2卷第2期发表《夏都考》。

是月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由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贺昌群认为该书“捃摭疏通之勤，而惜其少独发之功”，书中不少内容已“他人先我而道之”，但“增益前人之处也颇多”。当时有论者评价该书不仅“将中国史料及耳目所能接及者为之抉择排比成书，末附图四十余幅，足供研究交通史者之参考”。

1957 年 4 月，三联书店出版了以该文为题名的论文集。该版收录作者关于中西文化交流史和目录学的代表性论文 23 篇，按内容可以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四篇，主要讨论唐代中外文化关系史和国内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第二部分十篇，属于敦煌学的范围；第三部分三篇，主要讨论摄山佛教石刻和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洋美术；第四部分六篇，属于目录学范围。此书叙述唐代长安与西域间文物之交互影响，对长安胡化、西亚宗教在长安的传播等问题考证“至为深博”。邓广铭 1957 年发表书评，认为此书显示向达存在对唐代中西交通史史实基本知识不足等问题。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自言在整理《汉书》时，颇留心有关风俗的材料，任教清华大学后，因有学生询问有关汉代风俗问题，乃撰成此书。全书共分两章。第一章为两汉婚姻，叙述议婚、婚仪、婚年、重婚、约婚、改嫁、妾媵七个方面的制度和习俗。第二章为两汉丧葬，述及从死亡到上坟的丧仪全过程。作为一部汉代社会史专著，该书对汉代民俗史进行了深入的梳理考辨，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

向达编著《中外交通小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以 Henry Yule 所著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一书为蓝本，梳理了中国与希腊罗马、中亚、阿拉伯地区、印度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1934 年 3 月，中华书局又出版向达著《中西交通史》。此书主要从政治文化交流的角度，概述两千年来中国与欧洲各国的交往，全书包括了古代中西交通概况，景教、天主教等东来，元代的西征，马可波罗的东来，十八世纪的中国与欧洲，鸦片战争与中国的开放等内容。

范文澜《群经概论》由北平朴社出版。

此书分“经名数及正义”、“周易”、“尚书”、“诗”、“周礼”、“乐”、“仪礼”、“礼记”、“春秋及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章，全面论述中国古代经书知识。作者试图在辨析古代史料的基础上摆脱今古文学派的门户之见，吸收双方各自合理的成分，做出较允当的评析。此书可作为学习经学的入门作品。

(美) 班兹著、董之学译《新史学与社会科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用“新史学”的观点，论述史学与地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理智等学科的关系。阐明新史学是一种综合式的史学，历史学要求将人类过去的全部历史列入研究范围，并力求用各种学科知识综合地解释历史。

全书约30万言，征引广博，译文流畅，不但为“研究史学者所应读，即对于研究社会科学者亦极有参考价值”。但这本书以主要篇幅综述近年来各种社会科学的发展，对彼此间关系阐述太少，征引过繁，以致全书几乎成了一本书目与人名表。

叶青《胡适批判》上册由辛垦书店出版。

1934年8月下册出版。本书是对胡适在哲学、科学、思想、政治、文学、历史与国故等六个方面的评论。叶青指出，当代中国有三个普遍受人们欢迎的知识分子应值得共产党人给予批判性的重视：梁启超、陈独秀、胡适。三人之中，胡适是最危险的，因为梁已死去，陈尽管还活着，但他的影响已衰落了。只有胡适的影响还在不断扩大，至少有一千万年轻人读过胡适的著作，而且迷恋着他的思想。

刘静白《何炳松历史学批判》由辛垦书店出版。

本书附言说：“若果要执行中国历史学底批判，应该是选梁启超，其次也应该选顾颉刚。”但因为梁启超不单是历史家，目前批判他比较缺乏现实意义，顾颉刚理论性论述不多，“何炳松在理论底成就和历史底考据上，也许还不及梁、顾，可是因为他之学舌，那就比他们都可尊敬了，这也是我在此地对他批判的一个小小的理由”。

全书分“绪论”、“历史科学论”、“历史方法论”、“历史系统论”、“史学发展论”五章，对何炳松《通史新义》、《历史研究法》、《增补章实斋年谱序》、《历史上之演化问题及其研究法》等论著进行了批判。该书的目的是通过批判何炳松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作者认为，何炳松“虽当了新史学派的媳妇，还可以和瑟诺波结婚生子”，“何炳松的历史研究只是史料研究，而历史方法又只是心理方法”，“何炳松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本书批判的用语相当尖锐，不免流于情绪化，有失学术批评的平和持重。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由世界书局出版。

作者自谓：“近来论先秦学术者，多侧重哲学方面，此书独注重社会政治方面，此点可取。”

田农编著《西洋史表解》刊行。

雷海宗在对此书的评论中认为，“历史表解是中国历史学界一种迫切的需要”，而田农这本书“在中国虽不是最早的一本，却可称为最早作品之一”，且“小字精印320页，在目下的中国可算一本巨著”。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推出“四库全书”专号。

该专号刊载了赵录绰《清高宗之禁毁书籍》、黄云眉《从学者作用上估计四库全书之价值》、袁同礼《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辑本之缺点》等文。

鸟居龙藏《满蒙古迹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陈中凡《两宋思想述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叶玉森《殷墟书契前编集释》由大东书局石印出版。

朱其华《中国近代社会史解剖》由上海新新出版社出版。

11 月

5 日　陈啸江在《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 2 卷第 2 期发表《西汉的通货单位和物价》。

9 日　北京周口店遗址发掘出完整的男性头骨。

此次发掘共发现 3 个完整的晚期智人头骨化石、少数石器、装饰品等。

17 日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正式开始。

25 日　吕思勉《光华大学半月刊》第 2 卷第 4 期发表《昆仑考》。

是月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由兴宁希山书藏出版。

该书在此前客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证了“客家为汉族里头的一个支系”，并对客家的源流、分布、语言、特性等作了全面的阐述，被当今学界视为客家学奠基之作，他也因此被公认为客家学研究大师。

谢幼伟在《民国日报》发表书评称：“往昔研究客家问题的著作，大半是答辩式的，以证明客人是比较纯粹的汉族为止；岂能以客观态度，超然眼孔，用科学方法，将客家问题作一种严密研究，将客民系由中原迁移的原因，经过，及路线，及其分布的区域，活动的情形，作有系统的叙述，同时并研究其语言，风俗，习惯，品行，文教等等，当以罗君一书为蒿矢。”此书出版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一些学人展开了对客家问题的研究讨论。

新生命书局出版作为“新生命大众文库”。

该文库分为“大都市”、“小历史”、“小辞典”、“世界文学故事”、“民族英雄事略”、“当代名人传记”等主题。“小历史”系列收录了徐懋

庸编著《印度革命史》、《法国革命史》，陈醉云编著《太平天国史》，胡一源编著《最近国难史》等；“民族英雄事略”收录了陈子展编著《马援》、《郑和》、《林则徐》，易君左编著《文天祥》、《史可法》，曹聚仁编著《李秀成》等。

汤象龙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2卷第1期发表《咸丰朝的货币》。

作者指出，咸丰一朝的货币在清代货币史中最为复杂紊乱，并因此引发了金融的混乱，作者乃依据清代档案等材料，对此问题进行梳理。文章内容包括咸丰之前的清代货币、咸丰时期货币破坏的原因、咸丰时期的货币制度等。

同期还刊载了刘隽《清代云南的盐务》、《咸丰以后两淮之票法》两篇论文。

商承祚在《金陵学报》第3卷第2期发表《古代彝器伪字研究》。

此文“以假字为主，真字为宾，互相印证”对如何辨认伪字，并通过辨认伪字来辨认伪器进行探讨。作者在《考古》1936年第2期又发表《古代彝器伪字研究补编》。此二文被研究者视为很有创见的文字，为铜器辨伪的重要著作。

同期还刊载了万国鼎《明代庄田考略》、谢国桢《明清史料研究》、孙文青《张衡年谱》、刘国钧《西晋佛典录》、陈登原《曹操评》、叶启勋《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史部正史类》（第4卷第2期连载）等文。

12月

10日　郭沫若《古代铭刻汇考四种》由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据著者手稿影印出版。

线装三册，收考释论文四种：《殷契余论》、《金文续考》、《石鼓文研究》、《汉代刻石二种》。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将其中金文部分与《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等合编为新的《金文丛考》。

是月　吴其昌在《燕京学报》第14期发表《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

作者系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王国维的学生，撰《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意在继先师之业。他说：“上虞罗叔言先生著《殷虚书契》前、后编考释，先师王先生著《戬寿堂殷虚文字考释》，而先师之创获新知，尤为卓绝百世。其最著者，如于《山海经》、《竹书纪年》、《世本》、《楚

辞》、《吕览》、《殷本纪》、《三代世表》、《古今人表》，纫缀通贯，而已佚先公王亥之史实，得起骸骨而重新。于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复增益之，而作《王亥》一篇。先师复感内藤之意，且创获益丰。于是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越一月，又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此二文成，而洹鄗一代先公先王之史实文献，钩沉汲断，彰著明白，无遗憾矣。然自先师此二文成后，迄今又十有五年，地不爱宝，卜辞所出愈多，即先师所及见之前后编等书中，为先师所遗佚未发者，亦复不少，经典群籍之史料，可以与卜辞旁证互发者亦未尽，而未闻有继先师之志而赓其业者，此庸非弟子辈之责欤?”可见《三续考》的撰作目的是在补王国维研究的阙遗。

同期还刊载了唐兰《古乐器小记》、瞿润緡《大龟四版考释商榷》、洪业《尚书释文敦煌残卷与郭忠恕之关系》等文。

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开始编印“青年丛书”。

上海青年协会书局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主办，故该丛书收录了不少有关基督教的论著，如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936 年 9 月），《墨翟与耶稣》（1940 年 6 月），卞文著、郑启中译《基督教史略》（1937 年 1 月），樊都生著、应远涛译《现代潮流中的上帝观》（1937 年 8 月），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1940 年 3 月），韦杰端著、赵景松译《宗教与近代思想》（1940 年 6 月），党美瑞《初期的教会》（1948 年 4 月），詹辅明著、李荣芳译《旧约人物志》（1949 年 3 月）等。除此之外，该丛书还收录了一些励志类名人传记，如《甘地自传》（1933 年 12 月）、《海伦凯勒自传》（1934 年 3 月）、《尼赫鲁自传》（1939 年 9 月）、《余日章传》（1948 年 6 月）、《中国历代名人传略》（1949 年 2 月）等。该丛书收录的学术性史学论著不多，仅有沈嗣庄编著《社会主义新史》（1934 年 12 月）等。

余嘉锡在《辅仁学志》第 4 卷第 1 号发表《四库提要辨证》。

此处所发表之《四库提要辨证》实际只是《孟子正义》一书提要之辨证。《四库提要辨证》是一部目录学名著，全书共 24 卷，文 490 篇，其中序录 1 篇，经部 2 卷 61 篇，史部 7 卷 108 篇，子部 10 卷 217 篇，集部 5 卷 103 篇。据余氏自述，其在 17 岁（1900 年）得到《四库提要》这部书后，“日夜读之不厌”，有所疑就将考证写于书端，于 1931 年决定写成专书，后因抗战爆发，恐书稿散佚，乃取史、子两部 200 多篇付印，直到 1954 年 10 月，才最终确定 24 卷 490 篇之定稿，1958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80 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重排本。

该书对《四库提要》中近500种书的各种复杂问题，如作者之归属、成书之始末、内容之分合、流传之完残、传本之真伪等，都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尽管该书完整版出版较晚，但余氏仍在1948年主要凭此书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该书被刘家和认为“是现代著名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的学术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

同期还刊载了陈乐素《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孙楷第《唱诺考》、王重民《仓颉篇辑本述评》、刘文兴《宝应刘楚桢先生年谱》等文。

李晋华《明史纂修考》由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顾颉刚为之序。全书包括四朝诏谕、朝野学者之建议、纂修中之三时期、历任纂修各官姓氏、纂修各官所拟史稿考、《明史》因袭成文之例证、《明史》诸本卷数比较表、钦定《明史》与三修《明史》人名地名改译表等十个部分，对《明史》的编纂经过作了梳理考辨，对《明史》修撰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剖析。

此书与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金陵学报》第1卷第2期，1931年）一文的发表，标志着系统研究《明史》的开始。

黎光明《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由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此书上编叙述嘉靖时调遣客军御倭之原因、客军之情况、乡兵编练情况等，下编分述“狼兵”、“土兵”、“北方兵”、“南方兵”、“僧兵”等。

冯家昇《〈辽史〉源流考与〈辽史〉初校》由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该书第一部分是《〈辽史〉源流考》，上编主要梳理《辽史》修纂经过及未完成的原因等；下编论今本辽史之取材，并对辽史进行校刊补正，“是正伪误，几二千条”。该书第二部分为《〈辽史〉初校》，作者将能搜集到的23种《辽史》互校，“择其异文，辨其正误”，有校有考。

《燕京学报》刊登的“学界消息”认为此书“一代不朽之作”，并指出“近日研究辽、金、元三史及东北史地之风其炽，手此一编当获益非浅鲜也”。

1959年，作者将《辽史源流考》、《辽史初校》、《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三书合为《辽史证误三种》，由中华书局出版。

陈鼎忠、曾运乾《通史叙例》由南京钟山书局出版。

据张舜徽《湘贤亲炙录》云，陈氏“与曾星笠先生同乡里而友善，

一九一四年，二人同任事湖南官书局，有志编述《通史》，先成《叙例》三卷。遭时多故，《通史》终未属草。后十七年，柳诒徵取《通史叙例》交南京史学会排印行世。虽署名陈、曾二人合著，而实出于先生一人之手为多也”。

柳诒徵为之序，盛赞此书：“已足以传百世俟来者”，“闲识渊怀刘子所不逮”。张舜徽撰有《读通史叙例笔记》，并云：“其义例之精，规模之大，夹漈（即郑樵）以后，殆未有窥及此者。”金毓黻谓：“诚足革新史体，此合近代以事为纲之法。”

卫聚贤编撰《中国考古小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不仅收有阮元、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著作，亦有自著之论。

《励学》半年刊创刊。

国立山东大学励学社编，指导教师有丁山等。本期刊载王学易《两汉经济状况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弓英德《东汉风俗及其因果》等。

赵剑华在《新中国》第1卷第1期发表《反唯心的民生史观》。

作者说：“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党徒固以马克思之经济史观——通称唯物史观——为法宝，而中国国民党党员，也拿出孙先生的民生史观为武器了。”并称关于民生史观的派别已达12种。

陈觉《日本侵略东北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何子恒《现代欧洲各国侵略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国学会编审委员会国学论衡编纂部编《国学论衡》由苏州国学会出版。

缪钺《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由上海青年出版社出版。

（法）薛纽伯著、王慧琴译《现代文明史》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王镇中在社会调查所《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第4期发表《大战前日本棉纺织业在华贸易之发展》。

苏学林《辽金元文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是年

春夏之际，陶希圣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社会史，着手筹建中国经济史研究室。

后来一些卓有成绩的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学者，如鞠清远、杨联陞、全汉升、何兹全等，许多是在陶希圣的引导下，沿循社会经济史的路数成名的。

陶希圣开始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着手筹建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组织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

叶昌炽著、王季烈等编《缘督庐日记钞》由上海蝉隐庐刊印。

该书是叶昌炽的日记，由于叶昌炽在临终前嘱托勿以全稿示人，所以其弟子王季烈等在将原稿删节后刊印。苏精在《近代藏书三十家》中指出“由于这部日记抄的内容有大量读书题记、知人论世、所见所闻的近代史料价值，与先出的《翁文恭日记》、《湘绮楼日记》、《越缦堂日记》三者各有所长，为人等量齐观，还有人认为《缘督庐日记》足于《曾文正公日记》并传”。由于《日记钞》所载内容不足原书一半，2002 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将全书影印出版，宣传称该书自同治庚午九年闰十月十三日起，至民国六年九月十五日止，前后四十八年，内容丰富，其数十年间学术兴衰、政治得失、风俗变迁无不包括，兼具史料学术价值和书法珍赏价值。

谭其骧编辑《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由北平图书馆印行。

袁同礼在序中说：“近今学风丕变，文史道分，凡著述之可资探讨者，不以其辞之不雅驯而轻之，于是学者渐以读方志相倡。”“本馆自清季成立之初，即由内阁大库拨交方志千数百部，又由国子监移藏方志百余部。至民国五年教育部征集全国方志，凡征得二部以上者拨交本馆一部，计得三百余部。至民国八九年间由坊间购入者，又约百部。民六至民十八陆续由各地人士捐赠者亦百余部。国府成立，教育部又以前所征得仅有一部者移拨本馆，凡二百余部。此前京师图书馆之旧藏也。北海图书馆自民国十五年开办，陆续购入，先后约得五百部，多为京师图书馆所未备，十八年九月，两馆合并，迄于今，兹陆续购入者凡千数百部，总计都凡五千二百余部。”这些方志悉数收入谭其骧所编目录中。

1933—1936 年，又新收得方志 862 部，编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二编》，由北平图书馆 1936 年印行。

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3 本第 4 分发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作者认为东晋孙恩之乱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旧史记载已详，但是“天师道与政治社会有关者，如汉末黄巾米贼之起原，西晋赵王伦之废立，东晋孙恩之作乱，北魏太武之崇道，刘宋二凶之弑逆，以及东西晋南北朝人士所以奉道之故等，悉用滨海地域一贯之观念以为解释者，则尚未之见”，

故撰写此文，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季羡林以此文为例，说明陈寅恪治学即受到德国考据学影响，又有所改进的特色。余英时也认为此文是陈寅恪在中国中世史领域最有分量的单篇论文之一，做到了点线面的结合。

同期还刊载了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王静如《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刘复《莽权价值之重新考订》、孟森《重印朝鲜世宗实录地理志序》等文。

柳诒徵主编《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开始出版。

此总目至1935年全部印毕，1937年又出版补编。该书目共30册、计分经、史、子、集、志、图、丛7部85类832属，是中国图书馆第一部全部馆藏图书总目。

金梁编选《满洲秘档》出版。

此书是金梁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从沈阳故宫藏满洲老档中挑选出具有研究价值的档案材料编选而成。同年金梁还出版了《清宫史略》。

春，吕振羽经李达引荐，为中国大学聘任，讲授“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计划经济”和“社会学概论”等课程。

刘静白在《二十世纪》第2卷第2期发表《世界史导言》。

陈恭禄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卷第1号发表《甲午战后庚子乱前中国变法运动之研究》。

陆和九《中国金石学》由北平中国大学印行。

1934 年

※ 顾颉刚、谭其骧主编《禹贡》半月刊创刊。
※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上册出版。
※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出版。
※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出版。
※ 孟森《明元清系通纪》刊行。
※ 陶希圣主编《食货》半月刊创刊。
※ 胡适发表《说儒》。

1 月

1 日　朱偰在《东方杂志》第 1 号发表《井田制度有无问题之经济上的观察》。

文章开篇即提出，“井田制度之有无，本为经济史上之重要问题，非兼具经济的与历史的眼光，本客观的态度，有充分的论据，不能解答。”又批评疑古学者“贸贸然用不充分之根据，非专家之眼光”，“结果古史愈辨愈纷，愈考去真相愈远”。朱偰从经济史立场出发观察问题。鉴于以井田制度为共产制度的普遍误解，他先考析了土地私有权的发生过程，证明井田制与土地私有制可以并存。接着朱偰从欧洲经济史上寻求证据，利用西方人类学上的发现，指出北欧各国的“田地公有”、德国的“乡村共同团体”、“俄国的乡村团体、南斯拉夫的家庭集产团体”，皆与井田制类似，最终证明井田制是一项历史事实。

是月　中华书局开始推出“中华百科丛书”。

该丛书收录了左舜生《辛亥革命史》（1934 年 1 月），向达《中西交通史》（1934 年 3 月），王光祈《中国音乐史》（1934 年 9 月），刘炳藜《社会主义史纲》（1934 年 9 月），任启珊《中国外交史纲要》（1934 年 12 月），胡哲敷《史学概论》（1935 年 2 月），周伯棣等《世界产业革命史》（1935 年 4 月），左舜生《近代中日关系史纲要》（1935 年 5 月），娄壮行

《俄国史》（1935 年 6 月），郑昶《中国美术史》（1935 年 7 月），余子渊《英国史》（1935 年 10 月），冯品兰《法兰西史》（1936 年 2 月），姚绍华《美国史》（1936 年 6 月），吴海绳《意大利史》（1935 年 9 月）、《罗马史》（1937 年 3 月）等史学书籍。

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周予同认为"教育之史的研究是教育研究之重要的工作"，而"有些从事教育理论或实际的人的见地不免有些狭窄，不能从社会的或历史的认识入手"，认为"教育史的编制是不容稍缓的"，所以编撰了此书。该书分为"正篇"和"辅篇"，"正篇"共九章，分别讨论了清末以来的"教育宗旨"、"教育行政"、"学校系统"、"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辅篇"为"中国现代教育史年表"。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被商务印书馆收入"大学丛书"出版。

作者认为"文化人类学即是专门研究文化的人类学，这种科学还有其他名称，如社会人类学、民族学都是"，并认为这一学科"只着重在'原始的'文化，即文化的起源而已"。该书共分七篇，内容分别是"人类学总论"、"文化人类学略史"、"原始物质文化"、"原始社会组织"、"原始宗教"、"原始艺术"、"原始语言文字"。作者在序中指出，"本书材料是由各书取来编译的"。

该书是文化人类学领域开创性的论著，此后多次再版。

林惠祥《神话论》作为"百科小全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运用人类学的知识，探讨了"神话的性质及解释"、"神话的种类"、自然神话、各民族神话等，并对一些神话的实例进行了分析。

张星烺《欧化东渐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全书共三章："欧化东传之媒介"、"有形欧化即欧洲物质文明之输入"、"无形之欧化即欧洲思想文明之输入"。附录有"三百年前菲律宾群岛与中国"、"马哥孛罗"。此书梳理了明清至近代欧洲物质文明（军器、学术、财政、交通、文教）和思想文明（宗教、伦理、政治、艺术、学术等）的东传途径和媒介等。

作者认为，欧化东渐的媒介有三：欧洲商贾、游客、专使、军队之东来，宗教家，中国留学生。欧洲文化的输入侵蚀和改变着中国的旧有文明，旧文化日趋式微。中西有形文化即物质文化之间的差距极其明显，而无形文化即思想文明则因民族性的不同而难判高下，故不能盲目仿效。

本书对我国欧化东渐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全书简明扼要，条理清晰，第一次对近代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进行了系统阐述，奠定了中外关

系史研究的基础。本书产生了深刻影响，受到广泛欢迎。但有书评批评此书论中西文化优劣“仍不免于主观的直觉”。

张元济开始辑印《四部丛刊续编》。

共收书81种（实际为75种），1438卷。

邓嗣禹编《〈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由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出版。

该年引得编纂处编印的引得主要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水经注引得》、《唐诗纪事著者引得》、《宋诗纪事著者引得》、《元诗纪事著者引得》等。

吴晗在《清华学报》第9卷第1期发表《胡应麟年谱》。

该文是为明晚期著名学者胡应麟（著有《四部正讹》，古书辨伪名作）所作的年谱，以学行为主，兼及文学创作、古书辨伪、古籍收藏等方面的贡献等，所载事迹一一注明出处，评价平允恰当，颇有学术价值。该文1934年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中国史学丛书”出版单行本。

同期还刊载了杨绍震《庚子年中俄在东三省之冲突及其结束》、刘盼遂《六朝唐代反语考》、罗根泽《中国发现“人”的历史》等文。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引发中西文化新论战。

本书共有“文化的根本观念”、“折衷办法的派别”、“复古办法的观察”、“全盘西化的理由”、“近代文化的主力”、“南北文化的真谛”等7章。该书是“全盘西化”的代表作，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将中国文化本位与全盘西化的论战推向高潮。1934年，吕学海将相关论著收集为《全盘西化言论集》，由岭南大学青年会出版。1935年岭南大学又出版了冯恩荣编辑的《全盘西化言论续集》，1936年岭南大学又出版了《全盘西化言论三集》。

左舜生《辛亥革命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书系作者在复旦大学讲授中国现代史讲义的一部分，共有“辛亥革命的原因”、“辛亥以前革命运动的经过”、“武昌首义与各省响应”、“清廷的应付与汉阳南京之战”、“临时政府的成立”、“明清议和与清帝退位”、“袁世凯就职问题的纠纷”、“约法公布临时政府北迁”八章。

作者希望此书能“供给中等以上学生研究本国史参考之用”，故每章之后附有参考书和问题。

傅勤家《道教史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 月

4 日　顾颉刚与谭其骧开始筹建禹贡学会。

在“强邻肆虐，侵略不已”的情况下，顾颉刚谭其骧等人思谋“以沿革地理之研究，裨补民族复兴之工作，俾尽书生报国之志”，故发起成立该会。该会“集合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学生及平津研究史地学者专研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演进史”。

顾颉刚等人计划禹贡学会的工作主要有整理中国地理沿革史，绘制地理沿革图，编纂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整理历代地理志，辑录地理书籍中各种文化史料作专题的研究。顾氏“希望聚集若干肯作苦工的人，穷年累月去钻研，用平凡的力量，合作的精神，来造成伟大的事业”，同时指出“在这个团体中的个人是平等的，我们的团体和其他的团体也是平等的”，“绝对不需要‘是丹非素’的成见，更无所谓‘独树一帜’的虚声”。

9 日　章太炎在《制言》第 51 期发表《与邓之诚论史书》。

作者对当时疑古和唯古器物是尚的史学风气作了抨击，“今人之病，以经为基督圣书，以史为《虞初》小说。名实既谬，攻击遂多，甚者谓考史必求物证以为持论之根。不悟唐、宋碑刻，今时存者正多，独于爵里世系小小之事，颇为得实。至其谋之臧否，行之枉直，不及史官审正远矣。若三代彝器，作伪者众；更有乍得奇物，不知年月名号者，其器既非可信，而欲持是以考史之端，盖见其愚诬也”。他认为研究历史不应轻视文献史料的价值，古器物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历史的原貌。

19 日　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

是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7 月 1 日，复于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介石任总会会长，并聘请何应钦、陈果夫、张群等 33 人为指导员。这一运动是以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演说和主持制定的《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须知》等文件作为理论和方针的。其内容是以“礼义廉耻”为基准，以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新生活运动既是一场以反共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运动，同时也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

21 日　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合组陕西考古会在西安城内开始发掘。

发掘结束以后，何士骥利用发掘所得“太极、大明、兴庆三宫图石刻，与历来记载唐宫城制度之书籍，加以比较推考”，撰成《石刻唐太极宫暨府寺坊市残图大明宫残图与兴庆宫之研究》，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作为《考古专报》第 1 卷第 1 号于 1935 年 1 月出版。

是月　吕思勉《本国史》上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全名《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是继《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1924）之后，作者在20世纪30年代初为高级中学学生所写的另一种历史教科书。针对前书有“嫌其太深”的批评，吕氏自行检点：“在内容一方面，关系尚少；在文字一方面，关系转觉其较多。”所以，《本国史》编纂“改用白话，叙述亦力求其具体，少作概括之辞。无论教师或学生，使用起来，该都较前书为便利”。

《本国史》特别重视历史与地理的关系。作者认为：“治历史的人，必先明白地文地理；次则历代的政治区划，亦宜知其大概；然后任举一地名，大略知其在何处，即能知其有何等关系。”

同年8月，下册出版。到1935年5月，上册已经发行到第16版，下册发行到第9版。

葛绥成《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共七部分，记述自清代以来中国与苏、英间的未定界，中国与英属地及诸小国部落的境界，中国与法、葡、日属地的境界等，并收录有关条约、文件和图片。由于该书资料丰富、论证精确，是中国边界研究的基本书籍。

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梳理了从上古到清代的粮食种植、人民饮食、政府的粮食仓储制度、农作物耕作及政府的农业制度、政府救荒工作、粮食运输等方面的情况。

陈鼎忠《六艺后论》由钟山书局出版。

容庚编《武英殿彝器图录》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陈垣《元秘史译音用字考》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3月

1日　顾颉刚、谭其骧主编《禹贡》半月刊创刊。

《禹贡》半月刊为历史地理学专业刊物，由顾颉刚、谭其骧创办。《发刊词》谈到历史与地理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盼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倘使不把地理沿革史痛下一番功

夫”，研究历史的人“真是开口便错”；“一般学历史的人，往往不知《禹贡》九州、汉十三部为何物，唐十道、宋十五路又是什么。这真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极端的耻辱！在这种现象之下，我们还配讲什么文化史、宗教史；又配讲什么经济史、社会史；更配讲什么唯心史观、唯物史观！”

顾、谭等人认为研究地理沿革就是要“使我们的史学逐渐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一方面要恢复清代学者治《禹贡》、《汉志》、《水经》等书的刻苦耐劳而谨严的精神，一方面要利用今日更进步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以求博得更广大的效果。”

1937 年七七事变后，《禹贡》半月刊被迫停刊，1946 年 3 月复刊，在《国民新报》上辟专栏《禹贡周刊》（王光玮、张政烺、侯仁之主编），出至 10 期后停刊。

创刊号刊载了李素英《禹贡的地位》，许道龄《论禹贡田赋不平均之故》，王树民《周书周官职方篇校记》、《职方定本附章句刍说》，袁忠姒《职方冀州境界问题》、《汉书地理志中掌物产之官》，高去寻《山海经的新评价》等文。

顾颉刚在《编后》中说，“非有一班人对于古人传下的原料作深切的钻研，就无法抽出一点常识作治史学或地学的基础”，并指出《禹贡》半月刊是以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三校同学的课艺作基础”，研究范围从上古之民国皆可。

有研究者指出，《禹贡》半月刊一方面因为关注边疆史地研究而在创刊后立即引起社会关注，其进行的大量史地研究也为史学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其所展开的各类调查为此后史学研究提供了材料；有研究者认为，《禹贡》半月刊显示了“朴学考据的新出路”；有研究者认为，顾颉刚及其主办的《禹贡》，“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推进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开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之先河。

5 日　董家遵在《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 3 卷第 1 期发表《从汉到宋寡妇再嫁习俗考》。

9 日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进行第 9 次发掘。

此次发掘由董作宾主持，参加者有石璋如、刘耀、尹煌章等。此次发掘至 4 月 1 日止，得有字甲骨 441 片。因侯家庄发现甲骨，董作宾决定赴侯家庄发掘，4 月 2 日至 5 月 31 日，考古组在侯家庄得有字甲骨 15 片，内有“大龟七版”。

15 日　蒋维乔在《光华大学半月刊》第 2 卷第 6 期发表《道教思想的由来及其哲学》。

第 7—9 期连载。

16 日　朱士嘉在《禹贡》第 1 卷第 2 期发表《方志之名称与种类》。

文章首先简单分析“方志”名称，然后列举方志的 8 个种类（志、图经、记、图志、书、录、乘、传），并认为“方志各依历代地理沿革之不同而异其种类”，方志的主要形式有通志、都会志、路志、府志等 22 类。

同期还刊载了顾颉刚《古史中地域的扩张》，谭其骧《辽史地理志补正》，冯家昇《洪水传说之推测》，蒙文通讲、王树民记《古代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杨毓鑫《禹贡等五书所记薮泽表》，胡德煌《前汉户口统计表》等文。

31 日　刘汝霖在《师大月刊》第 10 期发表《南北朝人寿之研究》。

作者统计南北朝时期“人民善终的寿数，表明其倾向”。结果显示，南北朝初年，南北基本一致，在 51 岁至 60 岁是死亡最多的年岁，南北朝末年，“人寿有向上增加的趋势”，在 60 至 70 岁区间死亡的人占多数。

同期刊载了章太炎讲、柴德赓笔记《清代学术之系统》，李旭《汉末三国时代中国民族之演变》，王桐龄《中国史上之婚姻制度》，孙楷第《小说专名考释》，宫廷璋《刘知几史通之修辞学》，沈镰之《评黎东方译〈历史之科学与哲学〉》等文。

是月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上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17 年邓之诚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任职国史编纂处时即着手此书的写作，后在北大史学系讲授中国通史，更戮力撰写，名为《中国通史讲义》。其中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辽金夏元四部分，1934 年出版时更名为《中华二千年史》。

《中华二千年史》以排列史料的方式介绍中国两千年的历史。该书体裁可以说是融纪事本末体、编年体、纪传体、章节体等于一炉，而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干。该书取材，取法《资治通鉴》，材料采自“正史”。“首重正史，次及政书，次始及于杂史，再次始及于其他”。

此书内容上有以下特点：一是重视经济。各卷几乎都以介绍经济状况为首，包括赋税、货币、实业、人民生活状况、物产、工艺等等。二是重视历史地理。邓之诚认为地理和官制是修史谈史的基础。该书于每朝之前首述地理疆域，并列疆域表。三是重视典章制度。对官制、兵制、刑法、学校、选举等制度，按中央和地方分别叙述，且均附表说明。四是注重记

载域外交通和少数民族史。对汉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及这些民族的风土人情、物产和人民生活做了较详细的介绍。五是注重文化学术史。对经学、史学、文学等均有论述。六是重视记载社会风俗习尚。论及婚嫁、丧葬、服饰、饮食、家族及奴婢。这部分内容其他各书多所忽略。

《中华二千年史》是中国通史著作中篇幅最大的一部，颇得学者赞誉。但也有为人诟病之处，即全录原书，不做任何改易。未利用考古材料也是一个不足。他肯定碑文墓志等金石材料在记述历史人物官阶、地理、姓名、世系、年月等方面的价值，认为“足以补证史阙”，但同时认为碑文墓志等金石材料中所记历史人物作为，则大有可商榷之处，书中对金石材料取用较少。

全书共分 5 卷。秦汉—明清卷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5 年补纂明清部分，1954—1958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明清中、下为新版）。

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由现代书局出版。

伍氏将从 1842 年起的九十年分为三期：1842—1895 年是“中国旧文化的衰落期”；1895—1915 年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时期”；1916—1933 年，“学术思想界正式竖起新文化的大旗，极力提倡西洋文化，实在可以算是新文化运动的全盛时期”。

伍启元把五四后十余年中国学术思想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一）直觉主义阶段，代表人物是张君劢等；（二）实验主义的阶段，代表人物是胡适等；（三）唯物的辩证论的阶段，代表人物是陈独秀、郭沫若等；（四）东方文化的阶段，代表人物是梁漱溟等。

其中，胡适鼓吹的“实验主义”和陈独秀提倡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同为近世重要的“科学方法”。“科学”在中国这两大分支皆是“历史的方法”：“实验主义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研究事理；辩证法唯物论是用唯物史观的见解来研究事理”；而其贡献也具体落实在史学：“实验主义的引进，在中国学术思想上已开花结果（此后还要继续地开花结果的）；整理古史，整理国故，就是它最明显的果实。”辩证法的唯物论在中国学术上的“贡献也是在史学方面”，即以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代表的社会史。“《古史辨》的贡献是在破坏伪古史，《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目的在建设真古史。”

该书是较早对新文化运动的系统研究，出版初期颇有影响。两年后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就几乎全本伍书。

中央研究院动议将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为历史语言社会研究所。

以傅斯年为所长，在未经国民政府核备前，两所名称依旧，由傅斯年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两所合并一事遭到傅斯年的坚决反对。在致蔡元培、杨杏佛的信中，傅氏认为，两所工作性质不同，史语与经济社会并非一路，尤其与经济无法打成一气。合并事最终作罢。

（法）伯希和等著、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及其续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6 年 7 月、1940 年 7 月分别出版三编、四编。

张金鉴《美国政治思想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 月

1 日　王德甫在《禹贡》第 1 卷第 3 期发表《后汉户口统计表》。

顾颉刚在《校后》中指出："这两期中，都有户口统计表，我觉得这是很有希望的一件工作，我们应该准备把二十四史里的人口记载都这样的整理一下。但尤其重要的是在这数字上指出其社会现象和寻求这些现象的原因。"

同期还刊载了谭其骧《清史稿地理志校正（直隶）》、王以中《山海经图与职贡图》、徐家楣《民国二十二年以来所刻修方志简目》、孙媛贞《禹贡职方史记货殖列传所记物产比较表》、张公量《略论上述三书所记各地特产》、袁忠姒《自禹贡至两汉对于异民族之观念》等文。

华芷荪在《中国经济》第 2 卷第 4 期发表《隋唐经济史研究》。

第 6 期连载。该文探讨了隋唐时期的户口、财政、税赋制度、币制、交通、国外贸易等问题。该文被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认为是隋唐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论文之一。

15 日　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创办《文史》双月刊。

由吴承仕任主编，齐燕铭、孙席珍任编辑。《文史》用较多的篇幅发表国学系学生的著述。吕振羽、吴文祺、孙楷第、陈伯达、侯外庐、黄松龄、李达等，常在《文史》上发表论文。每期分别有七至十篇史学和文学论文，在编排方面史重于文。

在《文史》创刊号上，吴承仕声明："在史学方面，是希望把握着正确的史观，调整可靠的史实，发现它各阶段的下层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并与世界史作比较研究，而求其通性。从此点出发，不论研究对象的大小，以及结论的不一致，皆是我们愿意兼收并蓄的。在文学方面，理论必求正确，自不待言；文艺作品当然因天才、技术、志趣、环境等而表现

各有不同。但是在消极的‘不逆流’、‘不反动’、‘不为某方面之代言人’、‘不为某阶级之说教者’几个条件下，至少，我们努力保持着她的统一性。”

《文史》的一大特点是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古代文化。当时钱玄同读了第1期后就对吴承仕说：“我送你一幅三字联：‘普罗学，唯物观。’加上你的《文史》就是‘普罗文学，唯物史观。’可见《文史》是个赤色刊物。”

吴承仕在创刊号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者对于丧服应认识的几个根本观念》，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立场：“最少应该从搜集、统计、比较事实入手，在此浩如烟海真伪杂糅的事实中，应该由各有心得的多数学者分工合作入手，迟之又久，庶几可以编成一部稍有可观的中国社会史纲”。创刊号还发表吕振羽《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作者认为殷代已经进入奴隶社会。

本刊共出4期即停刊。《文史》第4期本应10月出版，却接到当局勒令停刊的命令。后经多方交涉，于12月还是推出第4期，即最后一期。编辑部把积稿放置于最后一期，使它成为特大号。吴承仕与其学生齐燕铭、管彤（张致祥）等又开始筹备新的刊物。

16日　张维华在《禹贡》第1卷第4期发表《明辽东“卫”、“都卫”、“都司”建置年代考略》。

作者认为明初“平定海内，于边疆要害建置卫所，而于卫所之上统以都司”，但是“边地都司之设，非为初立之制，而其先尚有卫与都卫之制”，并认为“辽东建卫之制，自盖州得利嬴城始，而其时则在洪武三年与四年交会之间，都卫之建，以四年七月为近是。至都司之建，则始自八年十月可断言”。

同期还刊载了顾颉刚《说丘》、冯家昇《辽金史地理志互校》、张公量《说禹贡州数用九之故》、许道龄《从夏禹治水说之不可信谈到禹贡之著作时代及其目的》、李子魁《汉书地理志中所记故国及都邑》等文。

26日　宝鸡斗鸡台遗址开始发掘。

此次发掘是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主持，徐炳昶、何士骥、苏秉琦、白万玉等为主要发掘人员。此次发掘的主要目标是宝鸡斗鸡台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及周代、战国、西汉墓葬等（第一期至6月28日结束，第二期从11月23日至次年5月7日结束）。

是月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由世界书局出版。

《中国民族史》分章叙述中国境内十二个民族源流，“贯穿全史，观

其会通”，“比合史事，发见前人所未知之事实”。

作者执笔于国家民族危难之秋，洋溢爱国主义之情。吕思勉自谓：“此书考古处有可取，近代材料不完备，论汉族一篇，后来见解已改变。”

许地山《道教史》上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的副标题是“道的缘起与发展”，由“绪说”和七章组成，较完整地叙述了道家思想、神仙方术、中国古代的神仙信仰等。原计划还有下册，叙述“道教发展中教相与教理”，未能完成。

易君左《中国社会史》由世界书局出版。

作者认为：“中国的民族思想支配了中国整个的社会，中国的社会……是以民族为本位来团成的。中国的民族每一次的扩大，即中国的社会每一次的开展；反之，中国社会的收缩，是由于中国民族的疏散。所以，我们可以断定一句：一部中国社会史，就是一部中国民族发展史。”这样，“民族史观”上升到历史哲学的层次。

陈垣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8卷第2号发表《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

作者利用大量官书、档案、文集、笔记等史料，订补教会史籍的阙误，论证教士的品学、端行、奉教热诚等。

蒋天枢《师门往事杂录》载1934年4月6日陈寅恪致信评价说：“近来日本人佛教史有极佳之著述，然多不能取材于教外之典籍，故有时尚可供吾国人补正余地。今公此作以此标题，畅发其蕴，诚所谓金针度与人者。就此点言，大作不仅明清教史，实一般研究学问之标准作品也。”

李济在《东方杂志》第7号发表《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未来》。

其中提出如下主张：（一）古物国有，任何私人不得私藏；（二）设立国家博物院，奖励科学发掘，并有系统地整理地下史料；（三）设立考古学系，训练考古人才。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开始编印“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

该丛书主要有陈衍《通鉴纪事本末书后》、《史汉文学研究法》（1934年4月）、《石遗室论文》（1936年6月），唐文治《礼记大义》（1934年4月）、《十三经提纲》（1934年5月），冯振《老子通证》（1935年4月），钱基博《名家五种校读记》（1935年5月），叶长青《文史通义注》（1935年8月）等。

容肇祖在《岭南学报》第3卷第2期发表《孔尚任年谱》。

此谱据孔尚任的诗文编制而成，主要记述孔氏的创作活动。据作者跋

文可知，作者认为此编年首次考出孔氏的生卒年。

同期还刊载了谢扶雅《田骈和邹衍——战国时齐道家底两派》、叶玉森《殷墟书契前后编集释序》、郑师许《读殷商无四时说》、黄仲琴《唐三平大师碑》、冼玉清《元管仲姬之书画》、莫伯骥《五十万卷楼题跋》等文。

金云铭在《福建文化》总16号发表《朱子著述考》。

原属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民族学组归入史语所列为第四组，后改称人类学组，主任为吴定良。

孔德《外族音乐流传中国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李攸《宋朝事实》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钱穆《孟子要略》（又名《孟子研究》）由大华书局出版。

胡行之《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刘横起著、刘炎校《中国五千年革命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5 月

16 日　聂崇岐在《禹贡》第1卷第6期发表《宋史地理志考异》。

第1卷第8、9、11、12期，第2卷第1、2、4—7、9、12期，第3卷第2、3、5期连载。据聂氏自记，此文系在顾颉刚的要求下，于版本对勘的基础上，“校其同异”，“钞撮考索”，撰写而成。

该文被对宋代地理的梳理被认为极有贡献，先后被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和《宋史丛考》予以再版。

同期还刊载了孙海波《由甲骨卜辞推测殷周之关系》，傅述尧《古代蜀国史略述》，余瑛《宋代儒者地理分布的统计》，黄席群《晋初郡县户数表》，劳榦《由九丘推论古代东西二民族》、《禹治水故事之出发点及其他》，唐兰《辨冀州之“冀”》等文。

20 日　清华大学“史学研究会”成立。

主要成员有来自清华大学和北平社会调查所（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吴晗、汤象龙、夏鼐、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后来又有张荫麟、杨绍震、吴铎等加盟。研究会以汤象龙为主席，吴晗为编辑，谷霁光为文书。成立后，每月集会一

次，每年召开年会，直至“七七事变”时研究会活动中止。1938年4月，西南联大成立后，吴晗、张荫麟、罗尔纲、孙毓棠等先后抵达昆明，“史学研究会”才于1939年恢复活动。

“史学研究会”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易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和南京《中央日报·史学》周刊为学术阵地，刊发了大量史学研究成果，显示了史学新生代的力量。

朱谦之在《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合刊发表《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

作者“将中国史学的发展，当作一种人类文化的进化现象看”，即将“中国史学的演进，当做一个发展一个极有规律极有条理的阶段进程，而且这个阶段进程，是和西洋史学的发展相一致的”。朱谦之认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和西洋史学的发展一样，可以分为“故事的历史”、“教训的历史”、“发展的历史”三个阶段。

近代以来，以方法论的转变为中心，中国史学先后经历了考证考古派到唯物史观派和现代史学三个阶段。考证派以王国维、罗振玉、梁启超、胡适、顾颉刚、李济、傅斯年等为代表，成绩固然不少，但“他们不谈思想，不顾将来，其心理特性完全表见着对于眼前社会剧变之无关心，而只把眼光放在过去的圈套里面”，不承认历史进化法则的存在，“对史料依于贪得务多的心理”，误以历史辅助学科为史学之全部，遭到了唯物史观派的批判。唯物史观派“其自身的缺点，也决不在考证考古派之下”，主要是“理论多而事实少，他们很少对于中国历史有很深的素养的；当他们拿着马克思的公式，来解决中国社会上之复杂问题，而且要‘见之行事’，这自然是太危险了”。因此，朱谦之认为应当综合“历史上记述主义与推理主义”，发起一场“现代史学运动”。

同期还刊载了全汉升《中国古代的行会制度及其起源》、王兴瑞《中国社会史细分派的批判》、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研究》、戴裔煊《蛮族与图腾关系之史的检讨》、岑家梧《南宋之都市生活》等文。

是月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2卷第2期推出“明清档案专号”。

编者在“导言”中指出，研究历史有两大困难，一是“范围太广”，一是“资料缺乏”，专题研究帮助克服了范围太广的问题，档案材料则可对解决材料缺乏的困难有帮助。在史料极端贫乏的中国，档案的价值实在无与伦比，特别是在近代财政经济方面。为此《集刊》特辟“明清档案

专号”，分别由徐中舒、赵泉澄、吴晗、单士元对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藏明清档案，尤其是有关经济方面的档案进行分析，企图帮助其他研究者了解、查检利用这些档案。

金陵大学筹设国学研究班。

20世纪30年代初，华东基督教会希望金陵大学能加强中国文史方面高级人才的培养，同时金大文科毕业生数十人也联名提出此类请求。在校长陈裕光的支持和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协助下，文学院院长刘国钧遂在该年春筹设国学研究班，至该年5月底6月初基本筹建就绪。招收国内名大学文史哲专业毕业且有志于研究国学的学生入学，由胡小石、胡翔冬、黄侃、吴梅、刘国钧、刘继宣等学者担任教师，课程有经学、史学、音韵学、训诂学等，注重培养学生考证、辨伪的国学基本功。胡小石开设的“中国书学史”被认为是大学开设书法史的首创。该班前后举办两期，培养了沈祖棻、殷孟伦、曾昭燏等30余位文史学者。

金毓黻编《渤海国志长编》20卷由辽海书社刊行。

该书以鸟山喜一《渤海史考》和唐晏之《渤海国志》为蓝本，广泛征引138种中国、朝鲜、日本书籍，对发展史、风俗礼制、祭祀信仰、社会民风等皆有梳理考证。

谭其骧认为该书“材料之齐备”、“考证之详慎”、“内容之扩大”为此书之三大优点，并认为此书“诚为近代史学界中罕观之伟著”，“其有裨东北民族史者，诚非鲜浅”。

吴晗在《图书评论》第2卷第5期发表《李继煌译述的高桑氏〈中国文化史〉》。

作者认为，文化史的主要任务是在告诉我们以每一时代每一地域的特殊文化的详切情形，它不但要告诉以这一时代文化的特征和内涵，并且要告诉我们它的来踪去路，空间，时间，和民族的关联，尤其是经济的背景和构成社会的因素及其条件；而“文化史家的任务，是在探求历史演化的法则，精密地指出新旧嬗递的痕迹”；在史籍浩繁、材料不成系统的情况下，首先要鉴定整理史料，然后进行局部的片段的研究，“以为后来人写文化史或通史者敷路”。

《文化批判》月刊创刊。

叶青主编，北平文化批判社编辑发行。第3卷第1期改为季刊。

编者指出：“中国社会所走的历史道路”、“现阶段社会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的前途”这一脉相承的三大重要问题，《读书杂志》发行的四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及其他出版物、著作均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

复，因此，“现在本刊不避艰辛，自愿担负起这部未完成的工作”。

沈志远《新经济学大纲》由北平经济学社出版。

此书是中国人自著的系统完整地介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最早专著之一，被一些大学采用为教材，对20世纪30—40年代的青年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多次增订再版，并于1952年被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

《岭南学报》第3卷第3期出版陈序经《南北文化观》专号。

陈氏此文分三编，第一编探讨“历史上的南北文化观”、梁启超的南北文化观、最近来的南北文化观、南北文化的意义；第二编探讨西化始于南方的原因、南方对于西化的贡献，说明南方之所以成为新文化或西化策源地的原因；第三编分别论述容闳、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的“中国西化观”。文章对古代汉族文化的向南方扩展、近代西方文化由南方向北方推进，及容、严、梁、孙四位近代重要人物的西化思想等问题皆有探讨。

于省吾编《双剑誃吉金图录》出版。

本书所收录的器物以商周、秦汉为限，并附考释。所收各器有为各书所著录者，则于考释中注明其卷页，方便读者查看。

山东大学主办《文史丛刊》创刊。

第1期刊载胡适《记北宋本的六祖坛经》、丁山《辨殷商》、彭仲铎《汉书佚注叙例》等文。

谢国桢《孙夏峰李二曲学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下册1947年出版。

罗元鲲《中国近百年史》上下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日）本田成之著、江侠庵译《经学史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林惠祥《民俗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6月

1日　蒋廷黻在《清华周刊》第41卷“向导”专号（总588、589期合刊）发表《历史学系概况》。

蒋廷黻指出“西洋的史家现在都到了 Post-Baconian 和 Post-Darwinian 的时期”，而“中国史家除了少数伟人具了培根治学的精神以外，不但是 Pre-Darwinian 而且还是 Pre-Baconian”，具体来说就是“在史学方法的分析

方面——如考据校勘等等——我们的史家确有能与西洋史家比拟的人；但在史学方法的综合方面，我们的史学简直是幼稚极了”。已往我们的史家“以治某书为始，也以治某书为终。结果我们有某书的注疏考证，而没有一个时代或一个方面的历史；我们有某书的专家，而没有某一时代或一个方面的专家。实在治书仅是工具学。我们虽于工具务求其精，然而史家最后的目的是求了解文化的演变”。

蒋廷黻认为清华史学系应该努力的方向，是“使我国的史学有进一步的演化”，所以在课程设置上，不仅要“兼重西史和社会科学”，而且“设立的课程概以一时代或一方面为其研究对象”。

谭其骧在《禹贡》第1卷第7期发表《论两汉西晋户口》。

作者自称“阐说此三百年间个地方户口盛衰递嬗之大势”，希望能为“治经济史文化史者之借鉴”，作者认为以现代省区而言，西汉时山东人口最多，其次为河南，东汉时河南人口最多，山东其次，西晋时河南人口最多，河北升至第二。

同期还刊载了蒙文通《论古水道与交通》（第2卷第3期连载）、张维华《明代辽东卫所建置考略》、陈观胜《论利玛窦之万国全图》、张公量《古会稽考》等文。

3日　陈寅恪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作序。

作者认为王氏之书“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并概括王氏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为三目：“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陈氏所云三目中，以第一目为最突出。对于清末以来发现的殷墟甲骨、西北简牍、敦煌遗书、内阁大库档案等，王国维非常重视，称之为“我中国新出之史料”。认为它们的价值“足敌孔壁、汲冢之所出”，并及时充分地利用这种新史料进行史学研究，取得了不少令世人瞩目的成果。

16日　钱穆在《禹贡》第1卷第8期发表《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

作者认为“治古史，考详地理实是一绝大要端”，“而考论古史地名尤关重要的一点，即万勿轻易把秦以后的地望来推说秦以前的地名，而应该就秦以前的旧籍，从其内证上，来建立更自然的解释，来重新审定更合当时实际的地理形势”，所以如有一部《古史地名索引》，“则可省却许多麻烦，增添许多方便，又定可刺激我们许多新鲜的推想”，此书对学术界的贡献，不在阮元《经籍纂诂》一类书籍之下。作者呼吁哈佛燕京学社等

学术研究机关来从事这项工作。

同期还刊载了谷霁光《北魏六镇的名称和地域》、陈观胜《乾隆时学者对利玛窦诸人之地理学所持的态度》、史念海《两汉郡国县邑增损表》、贺次君《山海经图与职贡图的讨论》等文。

是月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

作者在序言中写道："本书算是拙著《中国社会史纲》的第一分册"，"我之来参加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动机，完全由于感觉这一问题的重要，已迫切的需要解决"。本书是在李达的指导下为参加当时的社会史论战而写，所以对论战中出现的主要观点展开了分析和批驳，重点批判了托派、"新生命派"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点。

在"绪论"中，吕振羽认为，中国原始社会一片混沌，"问题是在于历史材料的不充分，和既有材料之难于正确运用"，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待于国内大规模的地下发掘和中国近亲各民族之研究，而且有待于我们对亚细亚作大规模的发掘，以及作语言学、土俗学、人种学等各方面的研究"。"幸而恩格斯、卢森堡、考古学者、古生物学者、人种学者、民俗学者、语言学者们各方面的努力，根据事实研究的结果，指示出史前期人类活动的一幅轮廓画"。

本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进行了分析，特别是用民族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对古代传说进行研究，对中国历史分期做了新的划分。作者把中国史划分为几个连续的发展阶段：一、传说中之"尧舜禹"的时代，为中国女性中心的氏族社会时代；二、传说中之"启"的时代，为中国史由女系本位转入男系本位的时代；三、殷代为中国史的奴隶制社会的时代；四、周代为中国史的初期封建社会时代；五、由秦代到鸦片战争前这一阶段，为变种的封建社会时代；六、由鸦片战争到现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该书最主要的贡献是为殷代以前的历史整理出一个完整的系统。

作者纠正了疑古派的做法，使传说材料与地下遗物相配合。认为史前社会研究，"只有用作发掘的锄头才不说假话"，应以考古材料为主材料，神话传说研究为副材料。他对当时仰韶文化发掘物作了认真的研究。翦伯赞评价道："吕振羽的这一大胆尝试，不管其正确性达到何种程度，但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突破了'阶级社会'的局限，从殷代再提前到先阶级的原始时代，因而把'历史怀疑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所设定的封锁线，也彻底地毁坏了。在这一点，吕振羽对于中国先阶级社会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由山西国际学社出版。

此书是作者治史的处女作。1934 年当时学术界正激烈争论着老子思想问题，侯氏将 1931 年在哈尔滨法政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时的讲义中的一章名为《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试图用《资本论》的历史分析方法来解释《老子》中的某些晦涩难懂的论述。侯外庐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写，作为单行本出版。

侯外庐首先研究确定了老子其人其书的社会时代，研究老子的经济思想、自然哲学、社会思想及国家学说。他本人曾说，该书“虽然只是一个小册子，却既包括社会史，也包括思想史。我的第一本史学著作的格局和研究方法，虽无甚明朗意识，却相当典型地表现我早年的追求，即要在史学领域中挑起一副由社会史和思想史各占一头的担子”。

谭其骧在《燕京学报》第 15 期发表《新莽职方考》、《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

《新莽职方考》一文对王莽时代郡县划分的理论、郡县官制、王莽改汉郡县名通例等问题进行研究，将县以上的行政区划名称逐一考订排列，填补了两汉之际政区地理研究的空白。也有研究者指出该文也存在忽视王莽施行九州制度等问题。

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中，作者指出晋永嘉丧乱后北方汉人大规模南迁“是吾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之一大关键，盖南方长江流域之日渐开发，北方黄河流域之日就衰落，比较纯粹之华夏血统之南徙，胥由于此也”，但由于“正史纪传罕有载及之者”，故人们知而不详，此文乃根据当时的“侨州郡县之记载”、“纪传中之材料”等，勾勒此一时期北方汉人南迁的数量、时间、地点等。

此两文不仅被谭氏自认为其代表性论著，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其成名作。周一良认为谭氏这些文章反映了传统“沿革地理之学”向现代历史地理之学的转变，“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也反映谭其骧这位不世出的学人的发展”。

同期还刊载了叶国庆《古闽地考》、姚薇元《唐蕃会盟碑跋》、朱希祖《金开国前三世与高丽和战年表》、郑德坤《水经注版本考》、刘盼遂《李唐为蕃姓三考》、魏建猷《日本鸟居龙藏氏调查热河省境契丹文化的经过》、张荫麟《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等文。

吴晗在《燕京学报》第 15 期发表《胡惟庸党案考》。

此文对明初疑案进行探讨。作者不但详细追考了胡案的组构过程，辨明了诸多史实上的谬误，还对胡案的发生进行了经济的、阶级的分析。吴晗认为，明初国库空虚，朱元璋屡兴大狱，目的只是筹措财款，因此在一

系列党狱中，许多地主富商被网罗进去。这是经济方面的原因。从阶级关系上看，朱元璋出身寒贱，与士大夫集团的关系不能协调，便借胡案打击士大夫集团。朱元璋出身寒微，既恐知识分子嘲笑，又怕其不为所用，因而对士大夫集团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政策。在胡、蓝二狱中所杀的几万人大部分属于知识分子，其他同时诸文士，凡和明太祖稍有瓜葛的也都不得善终。

齐震在《文史》第1卷第2期发表《中国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商榷》。

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史的讨论，目前的需要，是从“历史资料的实践”下手。理论也依赖于史料，历史资料的搜求，更足以阐明理论；反之，材料的空虚，乃能造成理论的贫血症。甚至认为：只运用历史法则的公式而不实际的讨论社会史，反不如考据家罗列事状不去理解什么来得可靠。齐震提出：“由传说的演变看作家的改写中也正映着一套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中反映的种种形态仍旧联系到其基础的结构——经济结构——上去。”

同期还刊载了吴承仕《语言文字之演进过程与社会意识形态》等文。

张鸿翔在《辅仁学志》第4卷第2期发表《明外族赐姓续考》。

作者在《辅仁学志》第3卷第2期发表有《明外族赐姓考》，此文系对前文的扩充。该文共考出有明一代赐姓之外族有398人。作者认为，共有鞑靼、女真等九部族有人被赐姓，其中以鞑靼79人为最多；明成祖时赐姓96人，为赐姓最多之时期；所赐姓中，王姓最多，次为李张二姓等。

同期还刊载了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康居校释》、《〈汉书·西域传〉奄蔡校释》，冯承钧《元代几个南家台》等文。

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由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此书考论倭寇的来源、发展过程、剿平诸事颇精审，尤其侧重分析倭寇的性质及其产生原因。该书还收录了一些珍贵图表。

张维华《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注释》由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此书是张维华的硕士论文，其以中文史料为经、西文载籍为纬，考证精详、条理分明，“西人东来之迹，由是以明”。

《岭南学报》出版《广东专号》上。

此专号刊载了容肇祖《学海堂考》，黄仲琴《陈衍〈虞象传〉》、《广州部曲将印》，黄菩生《清代广东贸易及其在中国经济史上之意义》，莫

伯骥《题记广东崇正书院明嘉靖刻本两汉书》等文。

容肇祖《学海堂考》一文包括“学海堂创建人考”、“学海堂建置考”、“学海堂规制考”、“学海堂学长考”、“学海堂专课肄业生考”、“《学海堂集》选取人名考”、“学海堂所刻书考”七个部分组成。作者认为阮元创建学海堂，于广东学风转移影响至巨，故搜集著作、志书，并访问老辈学者，撰成此文。

傅运森《外族侵略中国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7月

10日　冯家昇在《禹贡》第1卷第10期发表《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

文章首叙在边疆危机情况下研究边疆史地之重要性，次叙中国东北边疆史地研究之急迫，然后阐述研究计划，分为“搜集并整理材料的计划”、实地调查计划、知识储备等。作者希望用十年之力，作成一部《东北史地》。

同期还刊载了唐兰《四国解》、贺次君《山海经之版本及关于山海经之著述》、王重民《清代学者关于禹贡之论文目录》、傅振伦《方志之性质》、周振鹤《青海前言》等文。

朱延丰在《女师学院期刊》第2卷第2期出版《突厥职官名号考》。

15日　边政政教制度研究会编印《清代边政通考》。

是月　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本书包括：关于中国社会史上争论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所必具的先决条件、马克思对于经济发展分期的指示和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内容、中国经济时期的划分及其说明。书后附：对于胡秋原君所代表的杜布洛夫斯基和波卡洛夫等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迎战。

李季持“前资本主义社会”论。他认为人类已经历过五种生产方法的时代，即：原始共产主义的、亚细亚的或奴隶制的、封建的、前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所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就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破坏以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兴起时的社会”。它包含有过去各个生产方法时代的“残余”，“也有商业和都市的发达”。“自秦汉以至清鸦片战争前，历时二千零八十六年，虽朝代更易在二十以上，然这种生产方法始终没有变化”。以往生产方法的“残余”加商业资本的发展，构成了

前资本主义社会。他还列举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七个要点。

北京大学潜社创办不定期史学刊物《史学论丛》。

主要刊载潜社成员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并发表中外关系史、民族史、史学理论以及刊载书法史、围棋史等方面的研究论文。栏目有中国古代史、民族史、文化史、小学考、史学理论。

第1卷由12篇论文组成，顾颉刚《五藏山经试探》、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王树民《畿服说成变考》、孙以弟《中国围棋史》、杨向奎《“帝”字说》等。1935年11月出版第2卷，收录蒙文通《职官沿革考》等论文、贺次君《〈说儒〉质疑》等书评。

钱穆在《清华学报》第9卷第3期发表《楚辞地名考》。

文章包括“略论楚辞疆域源流”、“屈原年历”、“屈原放居汉北考”、“楚辞洞庭在江北说”、“楚辞湘澧沅诸水均在江北说”、“宋玉赋巫山高唐在南阳说”、“再论湘澧沅诸水”、“屈原卒在怀王入秦以前说”等内容。

钱文发表后引起争议，如游国恩就撰写了五万字长文《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一文（收入游氏1937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读骚论微初集》一书），1937年方授楚在《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3期发表《洞庭仍在江南屈原非死江北辨》一文，对钱说提出质疑。钱穆也在《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3期刊发《再论〈楚辞〉地名答方君》予以回应，对澧、沅等地名从新考释，认为其实际地址不在洞庭一代，而在汉北。此说又引起饶宗颐的质疑，饶氏1939年撰写《楚辞地理考》（商务印书馆1946年12月出版），予以辩论。此外，谭其骧等人也围绕钱文的观点阐发了自己的看法。

同期还刊载了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之问题》、杨堃《家族演化之理论》、刘盼遂《中国金石之厄运》等文。

萧公权在《清华学报》第9卷第3期发表《中国政治思想中之政原论》。

文章将“先秦以来十数家之说，按拥护政治及折衷调和二派中各家对于立君手续意见之异同”分为“天命”、“人归”、“圣立”三类，并对这三类思想依次论说。作者认为三派的“立君手续”尽管不同，但“大体皆以民本君治为其宗旨”。该文是萧公权中国政治史研究的早期代表作，已经显现出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认识轮廓。

蒋维乔、杨大膺编《中国哲学史纲要》上册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书不同于其他按时间划分中国哲学的方法，而将中国哲学划为自然主义、人为主义、享乐主义、苦行主义、神秘主义、理性主义六派，并总

结他们的中心思想和发展变化轨迹。尽管蒋维乔对佛学颇有研究，但编者认为佛教是外来思想，故文中未予讨论。

该书中册在同年 10 月出版，下册 1935 年 1 月出版。

陈立夫《唯生论》由正中书局出版。

此书鼓吹所谓“民生史观”。把“民生”当作“民族生存之原理”，“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求生存的一切动作行为的记录，是唯生而不是唯物”。

8 月

1 日　刘节在《禹贡》第 1 卷第 11 期发表《周南召南考》。

作者认为《逸周书》和郑玄关于周公召公采邑赐封时间的记载不可靠，引用《诗经》等材料，认为周代发祥于今陕西关中道境内，周南召南在今陕西、豫南、川东、鄂北之地，成周时“南国”面积并不大，后逐渐兼并扩充。

同期还刊载了邓嗣禹《唐代矿物产地表》、王庸《中国地学论文索引序》等文。

4 日　吴承仕在《文史》第 1 卷第 3 期发表《竹帛上的周代的封建制与井田制》。

作者表示，“用一元论的历史哲学，从事于中国社会发展史中之某一部分工作，从实践来证明理论，这当然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陈伯达在《文史》第 1 卷第 3 期发表《研究中国社会史方法论的几个先决问题》。

陈伯达指出：数年来，风靡整个中国学术界的中国社会史争论，似乎大多数人都还以“唯物史观”或“辩证唯物论”相标榜；敢于公开否认唯物史观的，似乎比较不多，因为如果有谁公开地来做这样否定的，他的文章就不会引起人一读的兴趣。

作者反对公式化地运用唯物史观，主张切实研究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16 日　杨效曾在《禹贡》第 1 卷第 12 期发表《地理与历史的中心关系》。

作者认为梁启超、顾颉刚等人对地理与历史关系的看法是呆板的，认为“我们要正确的理解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必须先探求人类社会的生产方法：即在某种生产方法之下，地理环境对人类的作用是如何；亦即在某时代，人类社会能征服自然环境的程度是如何”。作者还提出，“我希望禹贡

学会的朋友们不要以考证为终极的目标，我们的目的应当以整理史实为理解历史进化的初步手段，而由历史进化的过程中来把握未来社会的去向，那么，我们的研究才不是学院式的，而是指示方向的探讨了”。

对于作者的呼吁，顾颉刚在《编后》中予以回应，“学问应有全体的关系，有综合的目标，但个人的工作却不妨只为一部分的”，希望微观研究和宏观综合各有人从事，以客观的态度，共同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

同期还刊载了俞大纲《北魏六镇考》、许道龄《〈客家研究导论〉提要》、杨向奎《丰润小志》、史念海《关于〈两汉郡国县邑增损表〉》等文。

30日　黄现璠在《师大月刊》第13号发表《唐代之贱民阶级》。

是月　陈立夫《新生活与民生史观》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

陈立夫认为“人类生命有进化，然后生活才有新旧的分别，假使没有进化，人类生活就无所谓新旧了，所以新生活的根本要点，就是人类生命，要具备生、存、进、化四个步骤”，“新生活就是求生命的进化，人类因生的追求而不断进化的全部历史，指示出我们进化的动向，新生活就是顺着这个动向而前进”。在“新生活运动”和“民生史观”的关系上，陈立夫认为“民生史观是新生活的哲理基础”，“新生活是民生史观在现实阶段中的实施办法”，二者具有不可分性。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

本刊是中山文化教育馆创办的综合性刊物。孙科撰写的该刊《发刊词》称，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宗旨在阐明中山先生的意义和树立中国新的文化基础，现在出版这个季刊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给有志于这种工作的人们一个公共发表意见的园地”。

至1937年秋，该刊出至第4卷第3期后停刊。

黄凌霜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发表《民生史观论究》。

作者坚持心物一元论，认为“我们在世界整部的文化史社会史随处都可以找出充分的凭据证明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铁则。人类求生存，并非单是为着物质，也不单是为着精神，而是为着心和物合一的生命或生活”。

同期还刊载了蔡元培《吾国文化运动的过去与将来》、唐擘黄《论我国学术界最近的风气》等文。

李季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发表《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

作者认为研究中国社会史有两个先决问题，一是了解西洋卓绝的考古学的学说，二是了解西洋卓绝的经济史的学说。又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结束于东周，秦至鸦片战争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代，鸦片战争后为资本主义时代。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所写不限于明末，但明末党社为其重要部分，主要考察明末清初的党争、文人集会结社与忧国忧民的活动。作者在自序中明言“写这篇文字”，乃“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唤起民族之精神”。并附有论文《明季奴变考》和《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

是书曾得到鲁迅的好评：“谢国桢先生作《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钩宏文籍，用力甚勤。”

叶绍钧（叶圣陶）编《十三经索引》由开明书店出版。

此书编纂期间，叶圣陶动员家人一齐帮助摘抄分类，历时一年多告罄。本书将十三经各书以句为单位，按部首笔画为序编列，每字句下注明出处，检查十分方便。此书系与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最配套之工具。另外不知句首之字而仅知其中一字时，可查哈佛燕京学社所编“十三经”专书引得。

陶希圣《婚姻与家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从西周之前讲起，论到西周、春秋的宗法制，战国至五代的大家族制，最后讲到近二十年家族制度的渐次分解。该书把生产关系的演变与家族、婚姻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分析。

何炳松《外国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在写到中古史时，专设两章讲印度和南洋、朝鲜和日本，因作者认为：“中古时代的世界实在是亚洲文化的极盛时代，和欧洲的混乱情形刚刚成了一个反比例”，故特予表彰。该书上册至 1947 年 6 月出版 53 版，下册至 1948 年 10 月出版 44 版，可见在当时之流行。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 1 册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

此后商务印书馆在 1943、1944、1945 年陆续出版其他分册。

罗尔纲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 8 卷第 4 号发表《贼情汇纂订误》。

崔万秋《通鉴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赵世昌《中国上古史之研究》由北平新史研究社出版。

9月

1日 “全国考古学社”成立。

该会由徐中舒、董作宾、顾廷龙、邵子风、商承祚、王辰、周一良、容肇祖、张荫麟、郑师许、孙海波等人倡议成立，原名“金石学会”，正式成立时更名为“全国考古学社”。大会推举容庚、徐中舒、刘节、唐兰、魏建功5人为首届执行委员，负责编辑考古学社社刊，1934年9月开始出版。1936年4月，又增设社长，由叶恭绰任之。社员开始仅35人，一年之内即增至八九十人，到抗战前夕，已发展到141人。

自成立至抗战前的三年间，共出版《社刊》6期，篇幅由最初的56页扩充至400多页，发行量也由500册增至1000册。同时，学社还筹资刊行了学术含量很高的《考古专集》17种和《考古丛书》甲编2种、乙编8种，有力地推进了国内金石考古学和古文字、古史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影响。

《学社简章》称该社“以我国古器物学之研究、纂辑，及其重要材料之流通为主旨”。其成员中虽包括梁思永、董作宾、徐炳昶、何士骥等从事现代田野考古的人员，但大多仍属一般古文字、古器物及古史研究者。学社的刘节在《考古学社之使命》一文中指出，传统金石学“既无严格的范围，又无一定的方法。从前学者们所得到的古器物，大半出于盗掘，连最重要的出土地点一项也弄不清楚，遑论其他”。而现代考古学则“都是依照科学律令，作有系统的发掘，成绩已斐然可观”。因而要求社员认清这一趋势，自觉加强两者的分工合作，共同推动研究的深入。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中国考古学界正由传统金石学逐步向现代考古学过渡的特征。

《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出版。

编者云：“谁都知道，目前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不但幼稚，而且研究的方法与结果各不相同。所以到处充满了互相排斥的意见。过去中国社会史论战之毫无结果，即其明证。……幸而这里所集的文章，关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证者居多，而泛论社会史公式者极少，这虽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态并无何等具体的决定，但我们认为史料的整理和考证，乃是决定历史形态之先决条件，在这方面多花些工夫，总比草率地决定历史形态较有意义。”

此期刊载了傅筑夫《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意义及方法》、石决明《中国经济史研究上的几个重要问题》、王宜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等文。

10月1日，《中国经济》第10期专号下出版，刊载了王毓铨《关于“中国农村经济论”》、马乘风《与李麦麦论春秋时代之阶级斗争》、石决

明《外国学者关于中国经济史之研究与主要文献》、陶希圣《读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册以后》等文。

两期专号共刊载29篇经济史论文，逾40万字。

《大公报·史地周刊》创刊。

本刊由洪业、张荫麟、容庚发起，顾颉刚、容肇祖、张印堂等亦参加编辑工作。该周刊创刊后迅速成为史地研究的新阵地。《燕京学报》编者认为此周刊“内容新颖，颇足打破以前史学界循循相因，一见令人头痛之干枯沉闷空气”。

谭其骧在《禹贡》第2卷第1期发表《元福建行省建置沿革考》。

作者指出，元代福建行省置罢分合频繁，各处记载各异，导致“读史者苦于莫可适从”，乃撰写此篇。文章考辨了福建行省始建的年月治所、历次废置年月等问题。后作者又在《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6期发表《元陕西四川行省沿革考》。

同期还刊载了冯承钧《伯希和撰〈郑和下西洋考〉序》、石兆原《曲录内戏剧作家地域统计表》等文。

15日　《文化批判》第1卷第4、5期合刊出版“历史研究特辑”。

刘海鸥撰《写在历史研究特辑的前面》云：“历史是以说明人类实践的活动及实践活动的发展过程为任务的、现实的、实证的科学。当历史材料体系化时，必然答出抽象化普遍化结论之总计；这抽象化普遍化的说明，成为历史过程的合法则性，这合法则性，正表现于具体的历史活动中，而成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科学的历史，不是复古派滞钝的铅刀所能奏效，崇洋派大刀阔斧的乱砍，也不能有所成就，要把中国的历史推进科学的殿堂，这部艰巨的工作，还待开始，要从中国历史材料中抽出正确的合法则性……我们要在科学的武器的运用下，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的决心，从事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在历史材料体系化中，找出其合法则性，以建立正确的革命理论。”

此特辑刊载了王宜昌《宗教与中国封建社会》、铁丸《隋唐矿业之史的考察》、章元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刘兴唐《中国奴隶社会论》、王宜昌《再为奴隶社会辩护》等文。

16日　王以中（王庸）在《禹贡》第2卷第2期发表《地志与地图》。

作者认为：“中国舆图，自周秦以迄西晋为演进时期，及裴秀而造其

极。东晋以降，此学渐衰，乃趋重于文学记注与绘图艺术之精美。故自晋迄隋，遂多图说并重之图经（或称图记、图志）。唐代舆图复盛，图经转衰。沿及北宋，图经中兴，至南宋而鼎盛，元明以来，方志之繁富，即肇基于此；而舆图之学，几类地理学上之支流余裔，不仅鲜人注意，亦且无甚进步。”

马培棠《巴蜀归秦考》、姚师濂《山东通志人物类地域分布表》、赵惠人《宋史地理志户口表》、李晋华《明代辽东归附及卫所都司建置沿革》等文。

28 日　素痴（张荫麟）在《大公报·史地周刊》第 2 期发表《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

此文系张荫麟对编修中国通史的组织工作的思考。他设想编写通史应由一个以友谊和共同兴趣为基础的小团体来承担，内中包涵国史各方面的专家，和一两位有历史兴趣的散文作家，而其中有一些史家比较喜欢作广阔的、鸟瞰的反省和文章技术上的试验。大家推定一人为总纂。首先讨论出应包括的项目，拟成一个大纲。大纲不妨先行发表，征求团体以外的史家的意见。然后由总纂决定最后的去取。第二步因这个小团体的分子各就所专的范围，从大纲中认定自己担任的项目，去广集资料，纂成长编。在分纂的过程中，大家要时常交换意见。长编全部告成后，也可以刊出。总纂根据长编和对它的批评，开始作初稿。由初稿到定稿，自然要经过大家的讨论和总纂的裁定。

关于编纂《国史长编丛书》，并不要求长编有统一的体例，知人论事，不拘一格，随得随刊，只要求是有新意的专史研究著作。长编在促进专史研究的同时，也即为通史的编纂提供了基础。张荫麟提出的是众人合作修史的一种比较理想化的办法。可惜这一规划未能付诸实施，由他一人独自承担的《中国史纲》也未成完璧。张其昀说，“此非徒为少数人谋，后来任何有志通史者，均可用为凭借”，“这是我们共同的理想”。时当抗战时期，长编未能如愿。张荫麟不幸英年早近，张其昀后到台湾，利用其影响，终有机会编纂《中国丛书》，十年间成书三百余种，自谓“可算了了当年志愿”。

是月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陈寅恪作审查报告。

陈寅恪为作《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说：“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陈文还阐述了儒家思想与法典

的关系、儒学与佛教和道教的关系等等，谓："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本书至 1946 年出至 7 版。1936 年 11 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补》。

孟森《明元清系通纪》前编 4 卷及正编 5 卷由北京大学印行。

1932 年，北平图书馆自日本获得朝鲜《李朝实录》，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孟森遂不分寒暑，日往北平图书馆逐卷披览，对比考证，至 1934 年冬撰就此编。

此书原名《清朝前纪》，为在南京中央大学讲稿，到任教北大后改名《满洲开国史》，1933 年最后定名为《明元清系通纪》。全书计划编辑 40 册，250 万言，1934 年陆续由北京大学出版，至 1937 年孟森去世前印出 16 册，前编 4 卷，正编 15 卷，99 万余言，从洪武四年起至嘉靖三年（1371—1524）。其时，明朝后 120 年有关满清的部分，亦大体成篇，惟明末数年尚待勘定，惜逢卢沟桥事变，孟森即于翌年 1 月忧逝，遗稿留弟子商鸿逵处。商氏至 60 年代初将是书补苴完稿。"文化大革命"中，孟森原稿及商氏补足本尽毁。

该书序言说："《明元清系通纪》之作，留意者二十余年，近搜集材以自谓略备，着手编次，……后有执文笔操笔削之权者，就此取材，纵不敢言无遗漏，抑于清室之神秘，业尽发之，可以供来者渔猎之资，而与举世认识此一朝之真相矣。""今以明之纪元，叙清代之世系，成一编年之文，一览了然，既为明史所削而不存，又为清代所讳而不著，则此一编正为明清历史补其共同之缺也。"本来最为扑朔迷离的清朝先世史迹，因此一跃而为历代先世史中最详实者，"前史无论何朝，其开国以前祖先之事实，未有如清之先世，彰彰可考，既详且久者也"。

此书以明历朝实录及朝鲜实录书为主，辅以刊版行世之书，其记事居十之八，考订居十之一强，而论述不及十之一。该书取材立论均经鉴别斟酌，"盖慎之又慎"，故于明清史研索，颇具参考价值，奠定了孟氏在清史研究领域的地位。

上海开明书店推出"开明中学生丛书"。

该丛书收录的史学书籍有周予同《孔子》、周振甫《班超》、丁晓先

《鸦片战争》、张同光《戊戌政变》、宋云彬《王阳明》、王耘庄《晚明流寇》，以上 1934 年 9 月出版。1935 年 11 月出版王耘庄《东汉党锢》、《玄奘》、《东林与复社》等。

周予同《孔子》由开明书店出版。

周予同在“引言”中提出：“孔子是大家都知道的圣人，然而孔子的真相，到现在还在学者间研究而没有完全解决”，原因是“真的孔子死了”，汉代以后的孔子是为了政治的便利捧出的假孔子。他明确表示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描画出一个真的孔子的轮廓”。

齐思和在《史学年报》第 2 卷第 1 期发表《黄帝之制器故事》。

作者认为，自《韩非》提出“以圣王能发明器物，而后始为人民举为天子”的观点出现后，“各家所喜托之古代‘圣王’，遂皆不能不有所发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之制器故事，“纷纷作矣”，以至于“攘他人之发明，归之于新圣”，《管子》、《世本》等中述黄帝、尧舜等各有发明，即利用此法。文章一一梳理典籍关于黄帝制器故事的记载，并考辨黄帝的有关发明。文章对《易传·系辞下》之圣人观象制器说真伪的质疑引起了胡适等人的不同意见。

同期还刊载了洪业《崔东壁莜田賸笔之残稿》、奉宽《居庸关元刻咒颂音补附考》、谢兴尧《太平天国历法考》（附《太平新历与阴历阳历对照表》）、冯家昇《〈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朱延丰《古师子国释名》、周一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赵丰田《康长素先生年谱》、劳贞一《释士与民爵》、顾颉刚《读尔雅释地以下四篇》、张维华《明辽东边墙建置沿革考》等论文。

赵丰田在《史学年报》第 2 卷第 1 期发表《康长素先生年谱稿》。

此文原系作者在燕京大学的毕业论文，“用《南海先生自编年谱》为底本，其外或增或减则依自己意见决定之”，对于原谱所记诰封等事皆不录，用讳字亦改正，所引书注明出处，纪年以旧历为主，附以西历等。赵丰田毕业后开始编辑《梁启超年谱长编》，故此次刊行前又将新得资料补入。作者编辑此谱时，距离康氏去世时间甚短，且得到亲友故交支持，所记亲历亲见亲闻之史料不少，故有较高史料价值。

邓嗣禹在《史学年报》第 2 卷第 1 期发表《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

此文对“科举考试”进行界定，并提出了“科举之制，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的观点，此一观点与当时主流的科举制度始隋说不同。文后附俞大纲和张尔田的商榷信函。此文后被收入《中国考试制度史》中。

王光祁《中国音乐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书按专题分类论述我国从远古到清代的音乐发展轨迹的著作，对律调、乐器、乐队等都有系统的论述，是流传最广的一部“音乐史”著作，被誉为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具有“纪念碑性的作品”。

何兹全在《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发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

此文是作者在大学三年级所作，探讨了佛教输入与寺院兴起、寺院的发展及其兴盛、寺院的组织、寺院对国家和社会的服务、寺院与政权的冲突、寺院的衰落等问题。该文被认为是研究寺院经济的开创性之作，作者自认为是五四之后从社会史、经济史角度探讨寺院史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受到陶希圣、汤用彤等人的赞赏。

作者在此文中还提出了“中古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时间是“从三国到唐中叶即从三世纪到九世纪”的观点。

商务印书馆开始印行万有文库第二集。

此集收有国学基本丛书二集（300种）、汉译世界名著二集、十通、佩文韵府等。

（日）桑原骘藏著、杨炼译《张骞西征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考证了张骞在西域经过的路线、古地名和此后流传到中国的器物、植物、文化等。

周传儒《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由开明书店出版。

嵇文甫《左派王学》由开明书店出版。

陈庆麒编《中国大事年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吕思勉《史通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常乃惪编《西洋文化简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10月

1日　武仙卿在《中国经济》第2卷第10期发表《秦汉农民生活与农民暴动》。

3日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进行第10次发掘。

此次发掘由梁思永主持，参加者有石璋如、刘燿、胡厚宣等。此次发掘至12月30日结束，系第一次发掘侯家庄西北冈殷代墓地，亦是殷墟发

掘史上第一次在发掘地设立工作站。发现大规模的墓葬4座，小墓63座。

10日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上海创办《中国农村》月刊。

由薛暮桥主编。从1934年到1943年，共出版8卷，发表各类文章千余篇。其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迁至南昌，从第4卷开始出版《中国农村战时特刊》，又迁往长沙、汉口，1938年10月后迁往桂林，1943年6月被国民党图书馆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封。

其宗旨是：“彻底地明了农村生产关系和这些生产关系在殖民地化过程中的种种变化。简单地说，就是要寻找那些压迫中国农民的主要因子。”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及其《中国农村》在中共领导下，根据“六大”精神，与“托派”进行论战，主张外国的经济势力已经侵入，“半封建的农村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从而为当时的土地革命提供理论依据。

围绕此刊形成的一个学术群体被称为“中国农村派”，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与“中国经济派”相对立。

《文化建设》月刊创刊，创刊号为陈立夫领衔的“中国文化检讨”专号。

此专号虽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局限也有所批评和涉及，但主要还是致力于“认识中国光荣的历史”，以证明“中国文化是极有价值的文化”。所以，其所刊发的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价值的开掘、弘扬，要多于对其糟粕的批判与清算。

钱穆在《禹贡》第2卷第4期发表《西周戎祸考》。

第12期连载。作者认为“古书所谓蛮夷戎狄，并不全在边荒。此意不明，则治古史地理，每多窒碍”，乃撰写此文，以戎为例证明之。文后附《西周对外大事略表》。

同期还刊载了愚公谷《贾耽与摩尼教》、姚师濂《华阳国志晋书地理志互勘》、吴玉华《明代倭寇史籍志目》（第6期连载）等文。

吕翼仁在《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1期发表《二十四史户口考》。

第2—8期、第4卷第1—5期连载。此文试图利用正史的关于人口的记载资料，研究推测从秦汉至宋代的户口之变化，对此后人口史研究有开拓之功。

30日　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由新生命书局出版。

该书主要内容有“官工业的组织”、“私工业的组织”、“私工业成品销售方式及流动资本之考察”、“工业种类与生产地域”、“工业的行

会”等。

作者指出：“社会史论战的结果，除去呈现出一些外国理论的差别，和对于中国社会史的轮廓的个别见解意外，使人对于实际的、个别时代的、个别问题的实际情况，仍然不能明白”；“要明了中国社会史的全体，必须先明了各时代，各个问题的真相。由某时代的各个问题的综合研究，方能描画某时代的真面目。由相连的几个时代的特殊问题的比较研究，方能明了某一特殊问题的进化的实况。明了各个特殊问题演化的真相以后，方能估定两个，或几个相连的时代的真价值”。

该书被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认为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和财政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王辑五在《师大月刊》第 14 期发表《日本建国年代考》。

文章批驳了日本学者“延长年代说的谬误点”，考辨了日本建国年代。作者认为“从来的日本建国年代，乃确是建筑在神话中之延长线上的，此延长年代之所由生，乃是根据其荒谬不可靠的古文献的”。根据相关材料，“日本的建国年代，绝非从来一般日本学者所主张的西纪前六百六十年之辛酉中，实在是始于西纪三世纪末叶的”。

同期还刊载了（日）桑原骘藏著、王桐龄译《晋室之南渡与南方之开发》，熊梦飞《记刘瑾水牢并考释》，高步瀛《哀江南赋笺》，陈述《金史氏族表序例》等文。

是月　湖北省通志馆正式成立，王葆心被聘为总纂。

虽然湖北通志馆出版了李廉方编《辛亥革命首义记》（1947）、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1947）等书籍，但是因种种原因通志并未修成。湖北通志馆修志时期的最大学术成果是王葆心撰《方志学发微》和甘鹏云撰《方志商》二书。

王葆心在很早就开始广泛搜集全国志书一千余种以为编纂湖北通志准备，在博览群志的基础上，王葆心考史地变迁、审体例得失、寻沿革脉络、辨谬纠误，撰为《方志学发微》一书。该书约 50 万字，分取材、纂校、导源、派别、反变、赓续、义例七篇，是其一生研究方志学的结晶，也是中国方志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

甘鹏云《方志商》一书由 1932 年撰《修志问答》、1934 年撰《湖北通志义例商榷书》、1937 年撰《河北通志义例书》及 1938 年与外甥讨论修志的一封信组成。仓修良在《方志学通论》中指出该书“虽不是系统的方志理论著作，但对修志问题中的一些重要之点，多有看法和主张”。该书在修志的宗旨、体例的拟定、如何取材、内容撰写等问题上做了较为

详细的论述，对方志纂修有较强的指导作用，所以影响较大。

吴承仕在《中大周刊》第56期发表《本系的检讨与展望——对国一年级学年开始的讲话》。

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吴承仕提出了改造国学系的口号。他认为“我们现在研究国学，当然不能抱残守缺，尽在故纸堆里讨生活”。后来又明确提出“应该废除经院化的词章考据校勘学”的主张。当时的文化教育界涌动着一股复古暗流，有人倡导青年学生埋头于古书堆中，走“读书救国”的道路。中国大学的国学系，也有不少学生沉醉于金石、校勘之学。吴承仕力图扭转这种风气。

蒋廷黻在《清华学报》第9卷第4期发表《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作者认为李鸿章关于近代中国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观点表示赞同，并借此文重点探讨“这个大变局的由来及其演化、中国对此变局的应付及其屡次修改”这两个问题。

该文与《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一起构建了蒋氏对于近代中国的整体认识。蒋氏认为17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兴起，欧美势力一路自陆地来，由北向南，一路自海洋来，由南向北，对亚洲、中国进行剪刀式的侵略，但是中国人迟迟没有认清西方国家对中国早已形成的这种剪刀式进攻的态势，因此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方式，结果“治标没有治好，治本也不足济事”。作者最后提出在列强剪刀式侵略夹攻下“又来一个从东面临头砍杀的日本”，中国人是否可以在“民族意识”的作用下应对这个大变局的疑问。

同期还刊载了雷海宗《皇帝制度之成立》、陈之迈《英国宪法上的两大变迁》、吴景超《从佃户到自耕农》等文。

孙海波《甲骨文编》5册由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此书依《说文解字》分卷，所收甲骨文单字按原样摹录，正编14卷收已认识的和可以按偏旁隶定的字。见于《说文》的字按《说文》字序编排，字条上方加篆文。不见于《说文》的字附在同部首字之后，字条上方加隶定写法。合文另编为一卷，不可识的字编为附录。书末附检字。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改订本。

陶希圣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演讲《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方法》。

陶氏指出，社会史研究应从社会分析和社会调查入手。“从社会问题

入手也是一个常见的方法。问题的类别很多，如贫困问题、人口问题、犯罪问题、妇女问题、劳动问题等每个问题都可搜集许多的材料去做研究的解释。”陶希圣对统计方法的应用也做了反思。“单靠统计的数字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明白数字与数字中间的关系和连锁，才能求得社会现象间的真相”。该演讲稿刊发于该年 11 月 14 日的《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

裴文中《旧石器时代之艺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是介绍数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欧洲地区包括绘画、雕刻、塑像等形式的古人类艺术的通俗性著作。作者还探讨了现代艺术的起源等问题。

（法）瑟诺博司著、陈健民译《古代文化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5 年 3 月，陈健民译瑟氏《中古及近代文化史》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朱文鑫《历法通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南京，建立语音实验室。

11 月

1 日　顾颉刚在《禹贡》第 2 卷第 5 期发表《从地理上证今本尧典为汉人作》。

作者认为《尧典》尽管在孟子时期已有，但是今人所见之尧典，并非孟子时作，而是西汉武帝时所作，并从泾阳、朔方等地名及相关制度等方面入手予以考辨。该文发表后，引起孟森、劳榦、叶国庆等人的商榷（文刊《禹贡》半月刊第 2 卷第 9 期）。

同期还刊载了王光玮《禹贡土壤的探讨》、马培棠《梁惠王与禹贡》、饶宗颐《广东潮州旧志考》等文。

14 日　陶希圣在《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发布《食货半月刊宣言》。

陶氏介绍发刊缘起、旨趣与办法：“近年来，中国史研究有一个新的部门，叫作中国社会史。这门学问的研究，第一步是中国史的社会学的解释；第二步是中国社会史内容的充实。如今走到第二步的时候，我们觉得社会经济史料的收集，是主要的工作。有许多问题必须经济史料搜集得很多，才能解答。还有许多问题，在社会经济史料还没有收集得很多以前，我们还知都不知道，哪能说到解决！说到收集经济史料，工作既大且繁。

我们现在想对这一繁大工作做一件起手的事。我们出版一个半月刊，叫作《食货》半月刊，《食货》半月刊的办法是这样的：一、凡是中国社会经济史料，足够提出一个问题或足够解答一个问题，整理成文不论字数，都可以在这里发表。二、多举事实，少发空论，不谩骂，更绝对不做政论。三、凡是愿意或正在做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或特定问题的研究，都可任意做食货学会的会员。四、食货学会的会员对中国经济史料的收集及研究如能分工进行，使工作不致重复，那是最希望的事情。如此，会员应当随时分配工作交换成绩。”

17日　商务印书馆正式启动《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工作。

时华北危急，文渊阁全部藏书南迁，教育部乃有选印文渊阁四库珍本之提议，令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负责相关事宜。行政院批准蒋复璁与商务印书馆制定之影印四库未刻本草合同，规定未刊珍本限1500部，两年全书出齐。后经蔡元培、袁同礼等人努力，教育部于该年8月14日函聘陈垣、傅增湘、张元济等17人组成“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珍本委员会”。该委员会遂编订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目录，选书231种。商务印书馆于该年11月17日正式根据此目，开始摄影，并预约发售。初集至1935年出齐。

是月　卫聚贤《历史统计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1年国立暨南大学历史系和社会学系首先开设“史社统计学”课程，聘卫聚贤主讲。《历史统计学》是卫聚贤在持志学院讲授“历史研究法”时编写的讲义，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与卫氏另一专著《中国统计学史》一起合订出版，总名为《历史统计学》。

《自序》言其宗旨云：“我所授的这历史统计学，不注重高深的方法统计，而注重一般使用的应用统计，而应用统计除将学理解释外，注重在练习，即是欲各位同学会作统计表及统计图，使用于欲所统计的事实上去。”

书前还有当时中国统计学社负责人盛俊和学者胡朴安的序言各一篇。盛序指出，利用统计法治史有利于“矫正向来以文学治史，以人生哲学治史的流弊”。而该书“对于史料之如何收集如何观察，图表之如何应用，多所发挥，较诸新会发端之论更具体化。”胡序称其“开研究历史者之新径途”。

该书是中国近代唯一一部以统计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史学方法论专著。该书不但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历史统计学的基本原理，而且还整合吸收了当时的历史统计学研究的精华。所以，该书既是历史统计学的奠基之

作，也是 30 年代历史统计方法论的荟萃之著。

全汉升著、陶希圣校《中国行会制度史》由新生命书局出版。

该书共十章，第一、二章讨论行会的起源及萌芽时代的手工业与商业行会，第三、四、五章论述隋唐、两宋、元明的行会，第六章专就会馆予以探讨，第七、八两章考察近代的手工业及商业行会，第九章论近代苦力帮之史，结论部分剖析考量行会制度的利弊和现状。

本书是研究中国工商业同业组织的开创之作。有研究者指出，“回顾中国行会史的研究，可以说，过去国外研究的成果反而要比国内多一些。长时期内只有三十年代出版的一本《中国行会制度史》和寥寥可数的一般通论式的文章。”

刘国钧在《金陵学报》第 4 卷第 2 期发表《老子神化考略》。

此文旨在探讨“老子自哲学家逐渐演变为教主之经过”，内容包括“先秦人之老子观”、“《老子传》转变之始”、“老子神话之开展”、“老子神话之确定”等。作者认为“老子之神化，盖肇于西京，衍于洛下，盛于魏晋，极于六朝，而成于唐宋”。

同期还刊载了陈登原《韩平原评》、滕固《霍去病墓上石迹及汉代雕刻之试察》、孙文青《南阳汉画象访拓记》、何遂《最近南京附近出土之柴窑》、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第 5 卷第 2 期连载）、陈登原《书明夷待访录后》、岑仲勉《读西辽史书所见》、谢国桢《编纂丛书子目类编义例》等文。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此书为配合 20 世纪 30 年代的非娼运动而写，详细叙述了自殷代以来迄民国的娼妓发展情况，强烈呼吁社会各界正视废娼问题。1988 年，该书由上海三联书店收入“近代名籍重刊”中再版。

陶希圣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4 年冬季号发表《宋代的各种暴动》。

作者认为“群众的暴动之研究，可以指示那一时期社会的经济组织的性质”，通过宋代的研究发现，群众暴动“总包含有经济运动的内容”。

同期还刊载了马俊超《中国社会思想之嬗递》、陈高傭《民族斗争史中中国文化之考察》、李则刚《中国氏姓的起源及其流变》等文。

马元材《桑弘羊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对桑弘羊的出生时间、生存环境、学术思想等皆有论述。书中对盐铁政策的探讨。开启了此后学术界探讨汉代盐铁政策的先声。1975 年台湾

商务印书馆再版该书，1982年12月中州书画社又出版马元材的《桑弘羊年谱订补》。

曹绍廉编《西洋古代史》上下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盛朗西编《中国书院制度》由中华书局出版。

12月

1日 《食货》半月刊创刊，社会经济史研究蔚成一时潮流。

本刊由陶希圣主编，以刊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论文为主。陶希圣在《编者的话》中说："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而进一步的理论争斗，必先经过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陶希圣申明："这个半月刊出版的意思，在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搜集这种史料的人。"《食货》半月刊倡导做解决具体问题的文字，而不再偏爱纵横议论的大文章。

不过，《食货》半月刊也没有轻视理论方法。为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辟专栏："方法与理论"（第3卷第6期）、"理论与方法"（第3卷第8、12期）、"方法"（第2卷第4期）、"研究方法"（第2卷第5期），出专号："经济史理论与方法专号"（第5卷第11期）。《食货》半月刊还对商业资本主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争论。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称："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对于中国历史的改造，也抱着一个热烈的宏愿。"

以《食货》半月刊为基地形成了以陶希圣为首脑的食货学会。它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团体，"凡是志愿或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师友们，皆得任意为本会会员"。学会骨干包括陶希圣、连士升、何兹全、鞠清远、武仙卿、曾謇、傅安华、杨一中等，至于松散型会员，则最多时可能达百余人。陶希圣一度考虑，采取确定会员会籍、征收会费、召集会员大会、选举理事等措施，使学会的组织体制趋于规范化，但始终未能如愿。学会依托《食货》半月刊杂志和北京大学法学院设立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社会经济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断代经济史和古代寺院经济、赋税、财政、手工业、行会等专题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开拓工作。主要成果除见于《食货》半月刊外，还包括北大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国经济史料丛编·唐代篇》，陶希圣主编的《中国社会史丛书》和《南北朝经济史》、《唐代经济史》、《唐代财政史》。抗战爆发，《食货》半月刊出至第6卷第1期停刊，会中骨干随之星散。直到1946年7月，陶希圣与曾謇在南京《中央日报》开辟《食货周刊》，试图重拾旧业。但仅两

年，就因国民政府的溃败而中止。

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现尚在草创时期，最近的趋势，似乎已经渐渐脱离宣传革命的巢臼，而走上了研究学术的大路：在这点上，陶希圣先生的功绩，实在不可埋没”。王毓铨致信顾颉刚感慨说：“自从《食货》出版后，在学生群中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掀起一个新的浪潮，每个人都能找点材料做点文章。”

《食货》半月刊创刊号刊载鞠清远《汉代的官府工业》、何兹全《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李旭《魏晋南北朝时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黄穀仙《天宝乱后农村崩溃之实况》、陶希圣《王安石以前田赋不均与田赋改革》、全汉升《宋代都市的夜生活》等文。

黎东方在《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 3 卷第 2 期发表《被否认的中国古代》。

黎东方在文前小序中明确指出自己此文是要批判“正在否认自己民族的过去”的学者与学术研究。黎东方认为“中国在商代以前，确有历史，传说之中皆有史实可寻”，但是为了“明白史实的真相”，我们“对于传说不得不下严格的检查与纠正”。黎东方在文中借鉴了“神祖或图腾制度”的理论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不仅存在图腾（神祖）制度，而且从五帝三皇到尧舜，都具图腾（神祖）制度色彩，而舜是商的祖先，与契是一人，并认为商族的东进和夏族的东进是同时的，但是夏遇到了种种不利因素未能成功。

同期还刊载了朱谦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陈廷璠《巴比伦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之比较研究》、温廷敬《汤盘孔鼎之重榷》、吴康《法国革命史序言》等文。

冯家昇在《禹贡》第 2 卷第 7 期发表《东北史中诸名称之解释》。

文章对“东夷”、“东胡”、“鞑靼”、“满洲”这四个“表示东北民族之符号”概念的含义变迁进行梳理，并指出“南满”、“北满”、“奥满”、“口满”等晚出的名称“受政治之影响”，“日俄任意定名，意有所受”。

同期还刊载了伊志《明代“弃套”始末》、马培棠《徐市故事之演化》、张公量《缙云小志》、顾廷龙《绥远方志鳞爪》等文。

16 日　陶希圣在《食货》第 1 卷第 2 期发表《搜读地方志的提议》。

陶希圣号召“发起详读地方志”的活动。陶氏提议在阅读过二十四史等基本史著“在把社会的历史过程稍有头绪（也只能够稍有头绪）以后，便下功夫从地方志里搜求经济的社会的材料”。他建议先读经济发达的大

都会的县志，因为这些地方志是解读古代社会的关键所在。

同期还刊载了武仙卿《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转变》，（日）加藤繁著、傅安华译《唐代绢帛之货币的用途》，全汉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陶希圣《十六七世纪间中国的采金潮》等文。

钟凤年在《禹贡》第2卷第8期发表《战国疆域沿革考》。

第11期、第3卷第7期连载。作者认为关于战国疆域既无“整个之记载”，又无“一较为界划精严之专著”，乃“将战国诸地之未见于《国策》者，毕据《史记》补入。更依各国历世侯王之疆域盈缩，列以为表。并择其变迁较著之时期分绘舆图，以见其变易之状况”。

作者在《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10期又发表《〈战国疆域变迁考〉序例》，认为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疆域变迁最剧烈，对于“全时期中诸国疆域生若干次变化，与变化至何等程度”，是习战国史者应有之常识，但战国疆域变化“至今尚无专著以说明之”，故企图依据材料撰写此文，计划将此一时期“大小诸国，凡世次可考，立国较久，而曾累对外作战者，各为一篇”。

同期还刊载了叶国庆《三国时山越分布之区域》、夏壁《郑和七使西洋往返年月及其所经诸国》、马培棠《禹贡与禹都》、童书业《“蛮夏”考》等文。

27日 《师大月刊》出版“三十二周年纪念专号”。

此纪念号刊载了高步瀛《段懋堂顾千里论学制书评议》、李飞生《欧洲中古大学之起源》、王辑五《倭国考》、李旭《西晋时代华族与外族之关系》、王兰荫《张之洞之富强政策》等文。

是月 向达在《燕京学报》第16期发表《唐代俗讲考》。

此文内容主要有“长安寺院与戏场”、“僧人之唱小曲”、“寺院中的俗讲”、“俗讲的话本问题”、“俗讲的演变”。后作者又不断修改，于1944年在《文史》第3卷第9、10期合刊发表了此文的增订稿（1950年又刊于《国文季刊》第3卷第4号）。增定稿的内容主要有“唐代寺院中之俗讲”、“俗讲之仪式”、“俗讲之话本问题”、“俗讲文学起源试探”、“俗讲文学之演变”。

林家平等著《中国敦煌学史》称，向达此文在学术上有两个成就，一是“考证出俗讲与唱导异名而同实的结论，勾稽出俗讲的真实仪式，论证了变文即为俗讲之话本，摸索俗讲文学的来源与演变的规律，这些都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课题”；二是“将佛经、古代一般文学与敦煌文学几个方面融会贯通，进行综合的交叉研究，即见出向氏本人渊博的学识修养，

更可窥出他新颖独到的研究方法，代表敦煌学研究走向科学化的新潮流”。

同期还刊载了颜希深《晋荀勖十二笛律斠证》、张东荪《从西洋哲学观点看老庄》、卜德《左传与国语》、孙海波《国语真伪考》等文。

容庚在《燕京学报》第 16 期发表《鸟书考》。

此文是依据金文对许慎《说文序》中提到的“鸟书”（也叫“鸟虫书”、“虫书”，是篆书的变体）进行的研究。容庚在《燕京学报》第 17 期又刊载《鸟书考补正》，第 23 期又发表《鸟书三考》，对此一问题继续研究。1983 年陈直又发表《读容庚氏〈鸟书考〉书后》，对鸟书产生及灭绝、地域之分布、使用、仪态结构等问题进行补充研究。

《考古社刊》创刊。

该杂志由北平燕京大学考古学社主办，创刊号刊载了邵子风《考古学社简章》、容庚《考古学社缘起》、郑师许《通俗考古学丛书编辑计划》、唐兰《理想中之商周古器物著录表》、于省吾《四国多方考》等文。

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由光明书局出版。

该书 1942 年 11 月重印，1981 年上海书店又据民国原书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又出版该书。

何卧云、朱鸿禧编《世界史话》上下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南京正中书局出版日本评论社编纂《日本近世文化与中国》。

是年

胡适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 本第 3 分发表《说儒》。

作者指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人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把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造成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

此文以新的眼光和视角对儒学的产生、发展、流变作了独到的论述。胡适在自传中指出，《说儒》“提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的一个新鲜的看法，我自信这个看法，将来大概可以渐渐得着史学家的承认”。此文被认为是“从任何角度来读，都是我国国学现代化过程中，一篇继往开来的划

时代著作”，它“杂揉中西，做得恰到好处”。至于其缺陷，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指出，“《说儒》之以耶稣传说解孔子故事，以法利赛人和文士比春秋前后的儒者，真是极大胆假设能事的‘古为今用’，又岂止牵强附会而已。至于误诠文句、曲解古籍，尤是余事”。

郭沫若迅即在上海《中华公论》月刊第1卷第1期发表《责问胡适——由当前的文化动态说到儒家》，认为儒本是殷民族的奴性的宗教，到了孔子才“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他指出：“懦之本意诚然是柔，但不是由于他们本是奴隶而习于服从的精神的柔，而是由于本是贵族而不事生产的筋骨的柔。”并证明胡之所谓孔子的“那刚毅弘大的新儒行”，“其实也是周代的贵族思想的传统”。

原文第一节《替鲁迅说几句话》、第二节《论胡适的态度》后抽出单独成文，收入9月前导书局版《新文选》。全文原收1942年4月重庆文学书店《蒲剑集》，后收《沫若文集》第16卷《青铜时代》，改题为《驳〈说儒〉》。

同期还刊载了董作宾《殷历中几个重要问题》等文。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3分发表《周东封与殷遗民》。

在文前引言中，作者指出此文系傅著《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之一章。文章认为周推翻商，将殷遗民放在鲁、卫、齐、宋等东方诸国，并对这些遗民采取怀柔政策，故这些殷遗民丢掉了统治权但却沿袭了旧礼俗。此后“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鲁独发展，而为儒学，其自然崇拜在齐独发展，而为五行方士，各得一体，派衍有自”；并认为“商朝本在东方，西周时东方或以被征服而暂衰，入春秋后文物富庶又在东方，而鲁宋之儒墨，燕齐之神仙，惟孝之论，五行之说，又起而主宰中国思想者二千余年”，故认为“殷商为中国文化之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

许倬云认为，傅斯年《夷夏东西考》、《周东封与殷遗民》等文，“虽是使用大量的传统材料，却因其有民族史的观点，遂能发现前人未见的历史”。傅斯年此文，在批判胡适运动中，被范文澜解读为对日本的“亡国奴顺民的态度”。

丁山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4分发表《宗法考源》。

文章利用甲骨文等资料，考证中国“宗法”的起源，提出“周人宗法，盖唯继高祖之大宗，继祖继父之小宗，三宗而已”；“宗法者，初以辨先祖宗庙之昭穆亲疏，非以别继祖继祢后世子孙之嫡庶长幼也”；“考宗法

起源者，不当求之后世咨询之嫡庶长幼，当反求诸宗庙之昭穆亲疏：故曰，宗法者，宗庙之法也”；“宗法之起，不始周公制礼，盖兴于宗庙制度”等观点。1948 年 5 月，作者又对此文进行了修订，提出儒家的“宗法”，实际就是现今的“继承法”，并指出自己撰写《宗法考源》时，“未能阐明由父母爱少子心理，产生殷代‘兄终弟及季子之子继承’制度”。

该文是宗族制度研究的著名论著之一，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认为该文是甲骨文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

同期还刊载了徐中舒《土王皇三字之探原》、赵元任《刘半农先生》等文。

李济主编《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遗址》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本书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 1930 和 1931 年进行的两次科学发掘的报告，署名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梁思永是主要执笔人，该报告体例亦多由梁氏创制。

傅斯年在该报告的“序”中指出，“这是《中国考古报告集》第一种，又是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国家的学术机关中发布其有预计的发掘未经前人手之遗址之第一次。我以为这是值得纪念的事情。……努力使此报告最简而又最细，求其合于近代考古学报告之要求，只有我们不惜一切气力的编辑者能做得到。这样在草创中求尽美尽善的精神，必为读此书及作此学者所欣悦。此书之贡献在此书之全身上，我不须提出来说”。李济在《城子崖发掘报告序》中指出：“这遗址的发掘我们不但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个可循的轨道。与殷墟的成绩相比，城子崖的虽比较简单，却是同等的重要。……我们相信这不但是田野考古工作一个极可遵循的轨道，而且对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将成一个极重要的转点。所以我们决定以这篇报告为报告集的首卷，希望能由此渐渐地上溯中国文化的原始，下释商周历史的形成。”

谢兴尧在《国学季刊》第 4 卷第 1 号发表《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事考》。

文章考证了向太平军上“和洋人以抗清，再坐困洋人以取上海”计策的“黄畹”、“王畹”即晚清名士王韬，并将王韬原文刊出。

同期还刊载了唐兰《寿县所出铜器考略》、《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铭考释》，马叙伦《令矢彝》，张鸿翔《明北族列女传》等文。

王维诚在《国学季刊》第 4 卷第 2 号发表《老子化胡说考证》。

该文标题下有“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成绩”字样。文章主体共七节，分别是“东汉时老子化胡说之由来”、“三国时所传老子化胡说”、“两晋时《老子化胡经》及老子化胡说之辩论”、“南北朝时《老子化胡经》及老子化胡说之辩论”、“隋唐时老子化胡说之争议及《老子化胡经》之禁毁”、“宋元时老子化胡说之争议及《老子化胡经》”、“明清时《老子化胡经》”，后附五篇相关论文。汤用彤在该文《审查书》中指出，“经作者之努力，对于此佛教史上甚重要之公案，吾人已渐了然其经过，及其相关之问题”。

同期还刊载了罗尔纲《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孟森《宋许州长史孙君墓志铭跋尾》两文。

胡适在《国学季刊》第4卷第3号发表《校勘学方法论》。

该文是胡适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所做的序。作者认为“校勘学的工作有三个主要的成分：一是发现错误，二是改正错误，三是证明所改不误”，并认为“校勘无处不靠善本”。

同期还刊载了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等文。

陈乐素在《国学季刊》第4卷第3号发表《徐梦莘考》。

文章对《三朝北盟会编》作者徐梦莘的生平进行了详细的考索，并将徐氏置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予以观察，对理解《三朝北盟会编》之书，及当时之时代，具有重要价值。姚从吾等人对此文大加赞扬，认为是治宋史者应详读之书。

孟森自刊《清初三大疑案考实》。

其中收《太后下嫁考实》、《世祖出家事考实》、《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三篇论文。

王重民开始游历法、英、德国，发现大量太平天国文献史料。

王氏是从海外访求太平天国文献成绩最著的学者。其撰有三文：(1)《记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此文所录篇目，虽对程演生、俞大维、萧一山三氏已移录者无所补充，但指出了版刻不同，用于校勘，正文字异同，则有助益。(2)《记普鲁士国立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此文指出罗邕所编《太平天国诗文钞》中所收太平天国印书，张元济校订时任意增删，未忠实于俞氏“柏林本”原件。(3)《记剑桥大学所藏太平天国文献》。此文收有剑桥大学所藏而为程、俞、萧三氏未见之《天理要论》、《资政新篇》、《天父、天兄、天王己未九年会试题》等太平天国官书10种。

唐兰《殷墟文字记》由北京大学石印出版。

此书主要从字形出发，系统梳理每个字的字形演变的谱系，是作者将古文字构形理论、古文字学思想贯穿于具体考释中的实践之作。

吴其昌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 3 卷第 2 号发表《殷墟书契解诂》。

第 3、4 号，第 4 卷第 2、4 号，第 5 卷第 1、4 期，第 6 卷第 3 号连载。此文为吴其昌重要著作之一，其中主要解决甲骨文文字考释和文例等问题，对甲骨文中人祭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陈直《汉晋木简考略》石印本出版。

1935 年

※ 傅斯年发表《夷夏东西说》。
※《古史辨》第 5 册出版。
※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出版。
※ 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出版。
※ 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出版。
※ 北平研究院历史组成立，顾颉刚任主任。
※ 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出版。
※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出版。
※《食货》半月刊推出“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专号。

1 月

1 日　刘道元在《食货》第 1 卷第 3 期发表《商鞅变法与两汉田赋制度》。

作者认为，田赋研究一方面可以说明社会的进化，一方面可以说明政治的现象。文章指出商鞅变法对“田制”和“税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商鞅之后，几经演变，到了汉代，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是皇帝、封君、官吏、地主、自耕农，耕种土地的是自耕农、佃农和奴隶，缴纳农产品的是奴隶和佃农，纳税的是自耕农和地主。此外，皇帝与封君都设吏收赋。这种源自商鞅变法的田赋制度贯穿两汉，对于中央集权政府的形成影响重大。

同期还刊载了陈啸江《三国时代的人口移动》、杨中一《部曲沿革考略》、陶希圣《元代佛寺田园及商店》等文。

张树棻在《禹贡》第 2 卷第 9 期发表《章实斋之方志学说》。

文章发挥梁启超“方志学之成立自实斋始”的观点，认为章学诚是“真能了解方志之为用，而从事于实际材料之搜集及系统之记载”的学人，并分析了章氏对方志的界定、体例的架构及其实践等。

同期还刊载了杨大钤《〈汉书·地理志〉丹阳郡考略》、李苑文《威远营刻石考》、梅辛白《〈寰宇通志〉与〈明一统志〉之比较》等文。

姚宝猷在《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 3 卷第 3 期发表《日本史的研究法及参考书》。

此文是其从日本研习历史回国后不久的作品，探讨了在日本不断侵略中国的情况下研究日本史的重要意义、应当注意的十二个问题、研究应采取的步骤和方式、研究所需的参考书籍等。后该文以《日本史研究法》为书名出版。

同期还刊载了陈啸江《三国时代财富的分配》、王名元《殷周货币考》等文。

10 日　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位教授联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该宣言发表在《文化建设》杂志第 1 卷第 4 期，十位教授反对全盘西化。胡适则发表《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的批评文章。十教授于 5 月 10 日在《文化建设》第 1 卷第 8 期又发表《我们的总答复》。

13 日　朱谦之提出中山大学历史学部与从前的语言历史研究所的三点不同主张。

朱谦之代理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主任后，该日在《中山大学日报》发表文章阐述三点主张：第一，语史所以为史料学即史学，现在只认为是史料整理；第二，语史所将语言与历史连成一气，为文献言语学派，现在将二者分开，历史独立，以研究整理历史文化为目的，为文化学派；第三，文献言语学派其弊流于玩物丧志，现在则具有浓厚的科学精神。

16 日　赵泉澄在《禹贡》第 2 卷第 10 期发表《清代地理沿革表》。

第 3 卷第 3、9、11 期，第 4 卷第 1、4、9、11 期，第 5 卷第 1 期、第 8、9 期合刊、第 10 期，第 6 卷第 7 期，第 7 卷第 1—3 期合刊连载。作者指出，清代“地理沿革变化至繁”，但是地理沿革又对学术研究等关系甚大，为了有助于“吾人对于我国近代史上各省地方经济财政系统之探讨”，作者乃对清代的地理沿革进行系统的探讨。根据作者撰写的《凡例》可知，本书范围只限于行政区域，土司、藩属等不予探究；虽名为表，实际文表结合等。

该书不仅运用大量相关书籍记载，而且利用了大量清代档案，改正了官私著作中的错误和缺漏，被顾颉刚赞为“空前的精密著作”。1941 年经作者修订由开明书店出版，1955 年出版增订版，顾颉刚为之序。

同期还刊载了冯家昇《东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绩》、马培棠《禹贡与纪年》、杨效曾《汉末至唐户口变迁的考察》、劳榦《再论尧典著作时代》等文。

全汉升《食货》第 1 卷第 4 期发表《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

作者认为两晋至隋唐时期的佛寺有济贫赈灾、治病救人、戒残杀、劝行善等慈善行为。此文是中国慈善史研究早期阶段的重要成果。

同期还刊载了杨中一《唐代的贱民》，傅安华《唐玄宗以前的户口逃亡》，陶希圣《元代弥勒白莲教会的暴动》，（日）重松俊章著、陶希圣译《初期的白莲教会》等文。

丁文江在《东方杂志》第 2 号发表《中央研究院的使命》。

文中阐发历史学、语言学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意义：“中国的不容易统一，最大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公共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基础，是要建筑在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上，历史与考古是研究我们民族的过去，语言人种及其他的社会科学是研究我们民族的现在，把我们民族的过去与现在都研究明白了，我们方能够认识自己。”结论是：“用科学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才可造成新信仰的基础。历史如此，其他也复如此！了解远东各民族根本是无大区别，有测量可证；了解各种方言完全是一种语言的变相，并且可以找出他们变迁的规则；了解中华民国是一个整个的经济单位，分裂之后，无法生存；然后统一的基础才建设在国民的自觉上。”

张东荪在《正风》第 1 卷第 2 期发表《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批评整理国故运动。

作者认为“一班整理国故的人们”不知肩负重新培养“国民性”的重大使命，“把国故当做欧洲学者研究埃及文字与巴比伦宗教一样看待，简直把中国文化当作已亡了数千年的骨董来看”；外国人研究中国学术取“国学直是考古学”的态度并不错误，可是“中国人因为外国人如此，所以亦必来仿效一下，而美其名曰科学方法”则是错误导向。“我愿说一句过激的话：就是先打倒目下流行的整理国故的态度，然后方可有真正的整理。有了真正的整理方可言有所谓国故。不然全是骨董，我们今天救死不遑，那里有闲暇去玩弄骨董呢！”

26 日　王宜昌在《益世报·农村》周刊第 48 期发表《农村经济

统计应有的方向转变》，引发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

论文发表后，引出薛暮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和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两文。王宜昌又写了《论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和《关于中国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篇，于是辩论开始。论战主要在“中国农村派”和“中国经济派”两大阵营之间展开。“中国农村派”以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月刊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陈翰笙、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等。王宜昌、张志澄、王毓铨、王景波等以由南京中国经济研究会于1933年主办的《中国经济》杂志为阵地，从帝国主义在农村中的作用、农村中的土地关系租佃关系及雇佣劳动问题、农村中的阶级关系等方面来论证中国农村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被称为“中国经济派”。

1935年，此次论战的部分文章结集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

28日　朱谦之在《现代史学》第2卷第3期发表《历史科学论》。

作者在梳理有关“历史”的定义（“以神学说历史的定义”、“以政治或国家说历史的定义”、“以人类或社会说历史的定义”、“以文化或艺术说历史的定义”）和历史分类（年代的分类、区域的分类、事实的分类）的基础上来探讨“历史是不是科学”这一问题。

作者认为，第一时期的历史“属于修辞学之内，为一种文学”；第二时期的历史属于“记忆”的范围，“为一种主观的知识”；第三时期的历史“属于生物学、心理学或社会学之内，为一种科学，或一种复杂科学”；第四时期的历史“为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朱氏指出，“我一方面站在第三时期，认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一方面又把目标移向第四时期，以为历史即是文化史，所谓历史学即为叙述人类文化的进化现象，使我们明白自己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的一种文化科学”。

关于文学、哲学和历史学的关系，作者认为：“我们的时代，历史学已经不是文学，不是哲学，而为历史科学。所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历史文学，也为史学的历史文学，所需要的历史哲学，也为科学的历史哲学，三者互相帮助，因而建设了真正的历史科学的新时代。”

对于傅斯年“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的说法，朱谦之反驳道：“历史决不是什么破罐子，历史学的最大任务即在于根据历史的一切事实，来发现一切统辖人类发展之定律的，所以历史正和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用自然的目光去解释它，而历史的一切事实，亦可以用历史的目光去解释它。”

同期还刊载了黎东方《普通逻辑与历史逻辑》、陈啸江《封建社会崩溃与中国历史往何处去》、王兴瑞《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史》、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政策的检讨》、傅衣凌《晋代的土地问题与奴隶制度》、陈中凡《中国古代艺术上的图谱》等文。

是月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印行《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

原定此册1933年10月出版，但因史语所南迁等原因，导致出版延误。此册收录胡适《陶弘景的真诰考》、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徐中舒《古代狩猎图象考》、郭宝钧《古器释名》、顾颉刚《两汉州志考》等文。

傅斯年在《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发表《夷夏东西说》。

作者认为，东汉末以后中国常常是南北分治，而在三代及三代以前，则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三代及三代以前之东西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本文发表后，对中国上古史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徐中舒前此发表的《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1927)、《再论小屯与仰韶》(1931)即已持此观点。1934年10月，傅斯年又将此文抽印单行本。

李泰棻《方志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全书共分为通论、旧志之择评、章学诚之方志义例、章学诚之义例驳议、修志之辅助学识、余对方志内容之三增、余对方志内容之拟目及序列、修志之先决问题、方志之资料、资料之选集法、记录资料之鉴定法、记录以外资料之鉴定法等14章。

李泰棻在此书中指出“方志与史相同，仅属范围稍异”，即“在中央者，谓之史，在地方者，谓之志”；他认为方志应增加三大内容，一是“应增记录以前之史实”，二是“应增社会经济之资料”，三是“应增贪劣官绅之事实”；他还提出社会的发展给修志提出了更高要求，修志者应具有一定辅助学科的知识，如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年代学、考古学、谱系学、心理学、经济学、法政学等学科知识，方能修出科学的方志。

仓修良在《方志学通论》中指出李泰棻此书是“旧中国所出版的这类著作中篇幅最大、论述系统的一部方志学专著”。

开明书店开始出版“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辑的“二十五史”。

柯劭忞《新元史》出版后，王伯祥提议将此书与原有的“二十四史”合并印行，题名“二十五史”。后开明书店组织“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决定将“二十四史”乾隆殿本和《新元史》重订本缩印合刊，至1935年9月全部刊行。王伯祥将每一部史著的主要版本及重要研究著作附印于后，以方便研究者使用。此外还让卢芷芬、周振甫编纂《二十五史人名索引》以便查找历史人物。1936年3月，开明书店又出版了“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辑的《二十五史补编》，系将历代史家对正史所缺书志表谱共245种增补汇编而成，次年3月出齐。

《古史辨》第5册由朴社出版。

顾颉刚主编，收录讨论经今古文及其相关问题的文字23篇。上编讨论汉代经学上的今古文问题，下编讨论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及其同古代政治与古帝王系统的关系问题。此册为民国以来讨论今古文问题文章之汇集，引导学术界再度关注此问题，重启新一轮的今古文之争。

顾氏在自序中指明了今日研究经今古文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已不把经书当作万世的常道；我们解起经来已知道用考古学和社会学上的材料作比较；我们已无须依靠旧日的家派作读书治学的指导。家派已范围不住我们，那么今文古文的门户之见和我们再有什么关系！”我们不为主观争霸而求一种“客观研究”。现在提出今古文问题，因为“它是一件不能不决的悬案，如果不决则古代政治史、历法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字史全不能做好，所以要做这种基础的工作而已”。研究古史，实不得不以汉代的今古文问题作为先决问题；先打破了这一重关，然后再往上去打战国和春秋的关。对于今古文问题的唯一办法，是细心分析这些材料，再尽量拿别种材料做比较研究。

北京大学史学社主办的《史学》创刊。

创刊号刊载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蒙文通《古刑法略述》、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王崇武《秦汉之户口与政治》、白宝瑾《历史和其他科学的关系》等文。

张荫麟在《清华学报》第10卷第1期发表《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

该文共三节，内容主要包含“丰岛之战”、“黄海之战”、“威海卫之守御”。张氏虽不认同考据为史学第一要务，但是却极重视考信对于历史研究之重要，在此文中，张氏就指出中日记载各有出入，必须将严格的考证方法引入近代史研究，并以此文为实践。戚其章指出，此文一出，影响

巨大，“直到今天，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还不能不读此书。该书的重要性主要不在于其中的一些结论，而在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同期还刊载了浦薛凤《西洋政治思想之性质范围与演化》、张德昌《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陶希圣《古代的土壤及其所宜的植物的记载》、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等文。

杨及玄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春季号发表《由历史观的演变说到民生史观》。

文章内容包括“历史观的演变及其评判”、“民生史观的哲学基础”、“生命的原理”、“民生史观的公式”等。作者认为“民生史观可以把唯物史观融化在内，才是历史上最高的、最后的和彻终的指导原则”。

同期还刊载了杨玉清《儒家的政治哲学》、王孝鱼《王船山的历史进化论》、吕振羽《两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吴明《中国社会史论战底检讨》、刘如真《历史哲学与社会哲学》等文。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纂出版《太平御览引得》。

该书广告称“《太平御览》引书二千余种，现时亡佚过半，故颇为承学之士所珍贵。惟全书一千卷，检寻材料，深为不易，学者苦之”，编纂处将其按篇目和引书编为引得，以便学者利用。

傅斯年主持成立明清史料复刊会。

顾廷龙《吴愙斋先生年谱》由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王宜昌《封建论》由北平文化批判社出版。

朱升苹《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由现代书局出版。

2月

1日 《食货》第1卷第5期开设“方法与技术”栏目。

该期半月刊首设“方法与技术”栏目，刊载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吴景超《近代都市的研究法》、陈啸江《二十五史文化史料搜集法》、王瑛《研究中国经济史之方法的商榷》等文。

汤象龙在《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中指出，撰写完整的中国经济史的时代尚未到来，目前的责任最要的仍是搜集资料。研究经济史不能图急功近效，因为这种研究的第一步仍然是一种开荒的工作。离开它，中国经济史将永远没有写成之日。他认为，民间史料值得注意，如农民或家庭的流水账、店铺的生意经，以及其他关于量的性质的

记载。

针对陶希圣反对"把方法当结论"的主张，王瑛在《研究中国经济史之方法的商榷》认为原则上应当"把方法当结论"。对此，陶希圣作了答辩。他首先承认研究之始必须有方法，否则无从搜集材料。他接着指明："把方法适用到中国的历史现象时，预先描写那个图案，只可说是假设。根据这个假设，我们可以下手得到应得的材料，所得的材料对于假设，或是证实，或是充实，或是发展，或是修正。由此所结成的结论，比假设是高一等的。而此高一等的结论，对于以后的研究，又是新的假设。""我很愿意有人时时提醒大家'严守方法'。不过我不愿意大家只以方法自足。方法也须从观念里面走到历史现象里去，把历史的合法则性指出来，才算得是真确的方法。"

同期还刊载了何兹全《三国时期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杨莲生（杨联陞）辑《唐代高利贷及债务人的家族连带责任》、嵇文甫《朱梁的农村复兴热》、陶希圣《元代江南的大地主》等文。

10 日 《文化建设》月刊出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问题特辑"。

16 日 陶希圣在《食货》第 1 卷第 6 期发表《食货学会本年六项工作草约》。

陶氏在此草约中提出食货学会本年工作有结算以往成绩、介绍外国论著、搜罗参考资料、分时分地研究、发表工作心得、彼此互告消息等几项任务。陶氏指出："要想对中国经济社会史精深研究，必须就外国的经济社会史得到精确的知识。在比较参佐之下，中国经济社会的现象的意义、特征及各种现象的相互关系，历史发达的必然法则，才能看得出来。"为此，陶希圣拟定了以下几个方面为《食货》半月刊的研究重点："（a）欧洲资本主义初发生发达时的各种现象，例如手工作坊、定货制度、账簿组织等。（b）欧洲及日本等处的封建制度。（c）封建制度初生时的现象。（d）中古欧洲的东部，与商业经济同时存在的封建制度。（e）教会及寺庙财产制。（f）资本主义以前的帝国与资本主义发达时的殖民地侵略。（g）殖民地经济组织的特征。（h）半原始种族的经济社会组织。"

同期还刊载了武仙卿《西晋末的流民暴动》、杨联陞《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傅安华《唐代官僚地主的商人化》、张家驹《南宋两浙之盐政》、鞠清远《元代的寺产》、马奉琛《满族未入关前的经济生活》等文。

为便于研究者之间相互沟通学术信息，《食货》半月刊从此期开始刊载"中国经济社会史论文索引"，此期刊载陈啸江编的《南方各大学杂志

中中国经济社会史论文索引》。

《禹贡》第2卷第12期刊发《历史地图制法的讨论》组稿。

王育伊在《历史地图制法的几点建议》中，对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的不足进行分析，认为新图不要采用杨氏朱墨套印法，而用历史及当代两图分立的法子；新当代地图，要和普通地图一般绘制；历史地图各页的单位以历史上的区域为准，免有割裂之憾；秦汉以前的疆界，由于所知还不精确，可参考杨守敬不划人为界限将各地归属情况记于卷首的方法；附带引得，以便检索；希望能绘制专门史的地图，以便研究等。郑秉三提出《改革历史地图的计划》，认为要革除此前历史地图的不足，最好用"复页地图"。王育伊认为此法与其提出的办法类似，并又提出了一些补充。

同期还刊载了《王同春开发河套记》、华绘《明陵肇建考》等文。

是月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1年陈恭禄考入金陵大学，在美籍教授贝德士辅导下开始搜集中外资料，准备撰写中国近代史。后来他受聘于金陵大学。《中国近代史》始撰于1928年，至1934年初全书杀青，不久即再版，被列为大学丛书之一。

陈恭禄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题来建构中国近代史体系。他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要使读者"明了现时中国国际上之地位，政治上之嬗变，外交上之趋势，社会上之不安，经济之状况，人口之问题；认识其交相影响之结果，分析其造成经过之事迹，讨论其成功或失败之原因，辨别事后之得失利弊"。故其取材，偏重于"制度之剧变，生活情状之改易"。"是否有利于近代化"是陈恭禄评判近代史事与人物的价值标准。因而他对西方势力的入侵及其后果多有肯定，而对国内民众运动和革命活动多有批评。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陈恭禄认为，鸦片战争后，"于迭次败辱之下，国际关系根本改变，思想学术、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教育莫不受外影响，其事迹迥异于前古"，故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

陈恭禄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论述，一方面是受了国内社会性质论战的影响，另一方面源自西方思想界的启发，其中马士和陶内的影响较大。其近代史话语，主要来自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此外，在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的解释上，陈恭禄也受到马士的影响。陈恭禄在1956年曾说，马士之书，是其《中国近代史》一书的"思想渊源"。

而此书的不少材料来自陶内。比如在“结论”一章中，陈恭禄引用了陶内调查报告中有关工业、土地、人口、资源、教育等方面的统计材料，来证明中国社会的“停滞”状况。

胡哲敷《史学概论》由中华书局出版。

全书包括“史学的意义及范围”、“中国的旧史学”、“史学革命的必要”、“新史学的特质”、“新史学与各科学”、“历史与人生”、“史家的天职”、“史学的进化”等章。此书不同于当时史学概论性作品的常规写法，而是以新史学取代旧史学为主线，将史学史、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等史学的重要问题穿插其中。

书中涉及“历史上因果意义”问题。作者认为：“历史上的因果意义，自然是很重要；不过它的性质，是与自然科学中所应用的因果律同名异实。”“史学的生命，就是在因果，因果的线索，则恃乎时间与空间二大条件构造而成；研究历史因果者，于此两大条件，缺一不可。”

朱芳圃编著《甲骨学商史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书分从民族、世系、人物、都邑、方国、文化、制度、产业、卜法等方面辑录各家之说而成。

谢兴尧《太平天国的社会政治思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将太平天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分解为“原于周官的思想”、“原于耶教的思想”、“原于中国秘密社会的思想”几个部分，对太平天国的社会政治思想进行了探源性研究。此书是太平天国思想研究的开创性论著之一。

罗根泽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 9 卷第 1 号发表《商君书探源》。

郑鹤声在《教育杂志》第 2 期发表《张之洞氏之教育思想及其事业》。

第 3 期连载。

3 月

1 日　高耘晖在《食货》第 1 卷第 7 期发表《周代土地制度与井田》。

第 11 期连载。作者认为，“井田制的问题，实在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争论最久而最引人注意的问题”。文章分上下两篇，上篇消极地推翻井田论的学说，下篇积极地对周代土地制度进行概略

的考察。

同期还刊载了曾謇《西周时代的生产状况》、武伯纶《西汉奴隶考》、戴振辉《两汉奴隶制度》、倪今生《五胡乱华前夜的中国经济》、鞠清远《读元代奴隶考》等文，多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讨论相关。

15日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进行第11次发掘。

此次发掘由梁思永主持，参加者有石璋如、刘燿、胡厚宣、王湘、李光宇、夏鼐等。此次发掘6月15日结束，对上次发掘的大墓均挖掘到底，还发掘小墓411座，对墓制及殉葬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5月9日，在胡厚宣负责的1004号大墓发现鹿鼎、牛鼎，后来又发现盾、皮甲、矛等文物。

16日　吕振羽在《食货》第1卷第8期发表《对本刊的批评与贡献》。

此文系致《食货》半月刊主编陶希圣的信函。吕氏指出他写《中国社会史纲》是“由于我认为这一问题有急切解决的必要，万不能把这一工作‘留到我们的后辈去做’。因为我们从事这一课门的研究，并不像老先生们玩弄词章一样在作为消遣，也不像从来的文人一样的期于‘藏诸名山’；而是为解决民族出路之一现实的任务上的问题”。吕振羽认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工作，为使其提早完成，在目前，至少方法论的探讨、史料的搜集、系统的书写，有同时进行的必要，故我以为系统的中国社会史的著作，无论其正确与否，至少对问题有相当的补益，出版的愈多愈好”。吕振羽指出《食货》半月刊“以方法论的探讨与史料的搜集”并重是“完全正确而必要的”。吕振羽还向陶希圣建议加辟世界史料栏目。

同期还刊载了倪今生《五胡乱华明日的中国经济》、鞠清远《唐代的户税》、陶希圣《金代猛安谋克的土地问题》等文。

王宜昌在《食货》第1卷第8期发表《关于“反对读历史”的话》。

王宜昌认为，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理论、方法与材料是不能分开的。其中，“理论是最重要的东西”。理论确定研究的观点与方法，观点与方法从而又决定研究的材料之搜集。正确的方法排斥完全归纳法的迷惑于众多材料之中，也排斥以一概全法的武断。他主张“吸取适当的必须的材料”。

他还借用培根的比喻来评论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人物。他说，过去社会史论战及其以前，颇多蜘蛛，以一二事例来推断全史。现在颇多蚂蚁，

只搜集材料。我希望有蜜蜂，能将历史科学武装他的头脑，以自己之力消化所挑选的材料。

《食货》第 1 卷第 8 期刊载桑巴德著、连士升译《经济理论与经济史》。

桑巴德《经济理论与经济史》译自英国《经济史评论》，主要内容是阐明经济史应与经济理论打成一片，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有联络的系统，历史研究应该根据确实的理论知识，经济史学家迫切需要理论训练。文章还论述了“经济制度”观念、通史与专史的对照等问题。

史念海在《禹贡》第 3 卷第 2 期发表《两唐书地理志互勘》。

第 3—6、9 期连载。作者指出唐代地理沿革、疆域变化各有不同，但是记载各异，故以新旧《唐书》的《地理志》为基础，对勘考辨，希望能“廓清唐代地理之诸问题”。此文除考辨地理沿革外，对历史文化地理方面也有涉及。

同期还刊载了钱穆《子夏居西河考》，张树棻、李维唐《十六国都邑考》，于鹤年等《清代地理沿革讨论》等文。

是月　柳诒徵在中央广播电台作演讲《讲国学宜先讲史学》。

《广播周刊》第 25 期刊载此演讲稿。柳诒徵强调民族文化对培养国民爱国精神的重要意义，“讲国学必先讲史学”。

柳氏对疑古辨伪的“风气”持批评态度，认为疑古之风不是“求真”，而是“一种毛病”，“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并不在乎成为考据家或历史家”。“而挟考据怀疑之术以治史，将史实因之而愈淆，而其为害于国族也亟矣。”这可能是用现代传播手段传播学术思想的最早尝试之一。

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附索引》作为“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论文丛刊”之一出版。

该书是邵循正在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是中国学者早期研究近代中外关系的代表作之一，不仅梳理了中、法与越南的历史关系与中法战争的史实，还从国际公法的角度揭露法国侵略中国和越南的事实。

邵循正取得这样重要的研究成果与蒋廷黻的教导和提携是紧密相连的。蒋廷黻出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后，主张中外历史兼重，中外史学方法兼采，把清华历史系建成综合研究历史的中心，以纠正当时追踪汉学、偏重考据的史学风气。为此蒋廷黻在清华历史系选拔培养一批青年学生分

别研究各方面的专史，中法关系方面为邵循正，中日关系方面为王信忠，中俄关系方面为朱庆永，经济史方面为张德昌、梁方仲，清史方面为张荫麟，明史方面为吴晗。由于蒙古史方面缺乏合适人选，在中法关系研究中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且具备语言文字基础的邵循正1934年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后被派往欧洲留学，师从伯希和等人攻读蒙古史。这些被选拔的青年才俊都迅速取得引人瞩目的成果，成为史学研究的新生力量。

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作为“基本知识丛书”之一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

该书论述了中国民族的起源、形成，各民族的交流、融合，近代中国民族所受的侵略、面临的问题和复兴之路等。该书设定的阅读对象是中学生，引用了当时国内外的民族学理论，彰显了民族主义精神，文字浅显易读，为人推崇。

收入该丛书的史学类著作还有王纪文《不平等条约史》（1935年3月），王志瑞《中国经济政治演进史》（1935年5月），王伯祥、周振甫《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1935年6月），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1935年8月）等书。

禹贡学会从研究地理沿革向研究民族演进史、边疆历史转变。

鉴于边疆问题日益严重，《学会简章》规定“以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演进史为目的”；随后学会的具体工作也做出调整，撰写中国民族史被列为首位，因为“三千年来之演进则文籍中历历可按，以吾族无种族之隘见而唯求文化之扩展，故四表得层层消融以成此庞大之国族；作为此编，可于艰难图存之中增进吾民族之自信力，亦使吾民族精神得以昭著于世界”；另外增加中国地理书目之编辑，广搜中外图书中与华夏地理有关者，以之作为研究的基础；最后增加中华民国一统志之编撰，“此为本会工作之最大目的”，因为“人民于其所居之国，莫不要求有确实之知识，以进行其征服自然之设计；专门之学虽为少数人之事，然必对于大多数人发生影响，其学始有价值；故本会以前之工作纯为学者事业，而此最后一事则为供给社会应用。将于前所探讨之中，择其为现代人所当有之常识，出以通俗化之文笔，而期广远之灌输”。

9月4日顾颉刚在致胡适的信中说：“禹贡学会，要集合许多同志研究中国民族演进史和地理沿革史，为民族主义打好一个基础，为中国通史立起一个骨干。……禹贡学会的工作依然是‘为学问而学问’，但致用之期并不很远。我们只尊重事实，但其结果自会发生民族的自信心。而且郡国利病，边疆要害，能因刊物的鼓吹而成为一般人的常识，也当然影响到

政治设施。”10 月 23 日他又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弟所以创办禹贡学会，发行《禹贡》半月刊，即是你们编‘东北史纲’的扩大，希望兴起读者们收复故土的观念，为民族主义的鼓吹打一坚实的基础。”

王宜昌在《新社会科学季刊》第 1 卷第 4 期发表《中国原始社会史方法论》。

作者认为疑古派“主要是以清代考据学以书证书方法来决定古书著作的年代，再用民俗学考证故事流传增益的方法来决定古史实的原来记载”。吕振羽以人类学的研究门径整理古史，其方法可归结为三点：第一，减少了对于古书的怀疑；第二，减少了对于考古学全能的信赖；第三，充分地将摩尔根所记世界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成文记载比勘，而解说了夏禹前后的古史，故而是“研究中国远古历史的好方法”。

曾松友《中国原始社会之探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内容包括“北京猿人是否为汉族直接祖先考”、“汉族在原始时代迁移之阶段”、“原始社会发展之阶段”、“中国始旧石器时代之讨论”、“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国铜器时代”、“中国原始艺术”等。曹诗成在《史学年报》第 3 卷第 1 期发表书评，称“我国迩来因中外学者在考古学上之努力，地下实物，迭有发现，治古史者对史前社会之状况，亦渐知注意”，此书“即综合各家论说而成专题之研究者也。惟史料缺乏，创作非易，曾氏此著，每多牵强附会，以逞己意，又喜掇拾西方学者之偏论，与夫社会学家之通套，以充篇幅”。

4 月

1 日　李秉衡在《食货》第 1 卷第 9 期发表《方法与材料》。

作者认为“理论与方法即是结论”，先有“结论在心里是必要的”，“须以伟大的方法，照耀着、贯通着、运用着，一切材料”。史料并非万能，“使‘史料’验证吾人之理论与方法则可，凭‘史料’以求理论与方法则弊”。“若于‘史料’中提供理论与方法，如解释为一种方法中的技术，似尚可以；否则，方法将陷于部分的、呆板的、不连贯的之误”。“《食货》除收集材料外，似应将过去中国社会史论战所遗下之第一要点，即方法的再事修养与确定——不是再度论争，应是切实的奠基”。

对此，陶希圣答复说：“如果把方法当结论，虽不是机械主义，却易陷于公式主义。历史的研究必须顾到历史的事实。实验主义不尊重确定的理论或思想，公式主义不尊重事实或材料。”对于“‘假设’——以一般的理论应用到中国史上，构成‘假设’，由此出发，搜集材料，作成与一

般的理论一致的结论”，他完全同意。

同期还刊载了全汉升《宋代女子职业与生计》、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陶希圣《明代弥勒白莲教及其他“妖贼”》等文。

7 日　王重民编成《巴黎藏敦煌残卷叙录》第 1 辑第 1 部分。

至 12 月全部完成，其间部分文稿在《大公报》、《图书季刊》连载，1936 年北京图书馆刊印全书。此书系作者对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所作之提要，为当时敦煌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材料。

16 日　李秉衡在《食货》第 1 卷第 10 期发表《近三十年国人研究中国社会史论文提要拟议》。

作者由主编陶希圣关于编制中国经济史论文索引的倡议进一步提出编制论文提要的主张。作者认为，制作提要时需注意：（1）论文的假设及方法论，（2）其所依据的资料，（3）其结论。

同期还刊载了武仙卿《南朝大族的鼎盛与衰落》、刘兴唐《唐代之高利贷事业》、黄谷仙《天宝乱后唐人如何救济农村》（第 11 期连载）、陶希圣《五代的都市与商业》、张家驹《宋室南渡后的南方都市》等文。

钱穆在《禹贡》第 3 卷第 4 期发表《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

作者对传统“北强南弱”的观念及由此引发的种种解释提出质疑，认为“两个民族和国家间的盛衰强弱，往往有时只取决于几次军事的胜败。而双方军事胜败的关键，和其军队附带之武装常有颇重要之关系”。该文主要就是以马匹为例论证其观点，认为南北对峙时，马匹是胜负之关键。此文观点后在《国史大纲》中有所发挥。蒙文通后撰写《读〈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禹贡》半月刊第 4 卷第 1 期），对钱穆的观点提出商榷。

同期还刊载了顾颉刚《崔迈之禹贡遗说》、马培棠《华史征倭略》、谷霁光《唐折冲府考拾补》等文。

30 日　天津《益世报 · 史学》双周刊创刊。

此刊由以吴晗、汤象龙为首的“史学研究会”承办。《发刊词》中公开申明其立场：“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我们的目标只是求真”；“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当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我们既不轻视过去旧史家的努力，假如不经过他们的一番披沙拣金的工作，我们的研究便无所凭借”；同时“我们也尊重现代一般新史家的理论和方法，他们的著作，在我们看，同样有参考价值”；“我们不愿依恋过去枯朽的骸骨，也不肯盲目地穿上流行的各种争奇夸异的新装，我们的目标只是求真”。

在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中，社会经济史是主题之一。创刊一年间共出版 25 期，发表文章 33 篇，其中 26 篇是史学研究会同人撰写的。其研究触角伸到盐业制度、北魏土地制度、招商局的建立、隋朝的国家财政管理、税务问题、明代农民等诸方面。头一年的索引将论文题目分为政治、经济、社会、考证四类，其中以经济一项所占分量最大，计有 11 篇。

胡适在《师大月刊》第 18 期发表《中国禅学的发展》。

1934 年 12 月，北平师大邀请胡适进行学术演讲，胡适以《中国禅学之发展》为题进行四次演讲，此演讲稿由吴奔星、何贻焜笔记，刊于此期月刊。该文主要内容包括“印度禅”、“中国禅宗的起来”、“中国禅学的发展与演变”、“中国禅学的方法”。有研究者认为，胡适此次演讲“绝大部分观点”都是出自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的著作。

同期还刊载了张西堂《三国六朝经学上的几个问题》、李旭《五胡东晋时代华夷势力之检讨》、王辑五《耶马台国方位考》、萧远健《张献忠屠川考略》、程金造《史记三家注所引书目》、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序》等文。

是月　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该书被列为“中国社会史论战丛书第七种”，共十二章，内容包括农民战争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古代农民运动与近代农民运动在质与量上有何差别、农民运动中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及前途如何等。

该书的目的是解答以下问题：“中国的农民战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它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怎样？当中又经过了一些什么阶段？为什么古代的农民战争与近代的农民运动有质量的差异？在农民运动中又有什么急于要解决的问题？农民运动的前途怎样？”作者采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我们拿着一个唯物的武器，才能走出这纷乱而复杂的中国历史的‘迷宫’。过去那些建筑‘迷宫’的匠徒，他们把中国历史装制成帝王的家谱和英雄的记录。……一部中国古代的历史，每一个字都是农民鲜血写成的，也可以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农民暴动的历史。”作者认为：“每一次的农民暴动，都是历史变动的动力。”“根据农民战争之史的发展的路线观察，我们有权利可以说土地问题是农民斗争的关键，历史上每次的农民暴动，其主要原因厥惟农民失掉了土地。”

本书与蔡雪村《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在农民战争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拓荒作用，不仅用新观点系统研究农民战争史，而且还初步建立了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体系，书中的许多观点也都为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所

继承。

冯友兰在《清华学报》第10卷第2期发表《原儒墨》。

本文是作者针对胡适关于“儒”的起源和傅斯年关于“墨”的起源问题之商榷，主要内容包括“儒不必与殷民族有关”、“殷周文化异同问题”、“儒侠之共同道德”、“墨家与普通侠士不同之处”、“儒家墨家之教养之社会的背景”等。冯氏在《清华学报》第10卷第4期又发表《原儒墨补》，对此文进行补充。

同期还刊载了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李嘉言《六祖坛经的异刊本之发现》等文。

杨及玄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夏季号发表《民生史观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发端》。

作者认为经济史应当称为“社会经济史”，因为“我们必须从时间大流中，探索整个社会在经济方面继继续续所表现的消长现象，更必须至全体社会中，阐明经济之史的演变对于社会的全体和部分相生相成相消相杀乃至相反射的交互关系。干脆说来，经济史的研究应当一变而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处处不要离开社会的立场，不然，只是我们所谓‘经济志’的研究而已。”他还批评局限于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经济史，是“把经济现象从其他的社会关系截然分开，只就经济现象本身的孤立状态加以考察，结果，他们大都把社会经济在演变中的本质完全掩蔽了”。

同期还刊载了吕振羽《杨朱派哲学思想的发展——由杨朱到邹衍》、卫聚贤《中国史的年代》、汤吉禾《清代科道之成绩》、刘真如《研究社会史方法的几个重要概念》等文。

金海如致信《文化批判》编者，批评当时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信中说：“年来专治中国社会史的一些学者，目前好多拼命的在那儿做‘翻史书’和‘抄史料’的工作，而考古之风，于焉大炽。”金海如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应当注重社会现实问题，多从研究社会现实出发：“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我主张是多多着重现实，这不是说忽视过去，而是说除了用叙述的方法作历史的研究外，还应当要用研究的方法作追溯的研究。”

编辑王海鸥对这一见解深表赞同，认为“是精确之论”。

《岭南学报》第4卷第1期出版“广东专号”下。

此专号刊载了何格恩《张九龄年谱》、《张九龄之政治生活》，黄仲琴《明两广总督戴燿传》、《清广州府知府李威传》，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冼玉清《梁廷枏著述录要》，郑师许《龙溪书院考略》，谢扶雅《光

孝寺与六祖慧能》等文。

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一文系根据陈澧的遗著、师友弟子来往信件、相关人之论著等资料编纂而成。后附《陈东塾先生著述考略》、《陈东塾遗像》等。

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史》由上海龙虎书店出版。

此书探讨了中国家族制度的根源、变迁、宗族姓氏、家族法规习惯等问题。

《福建文化》总 18 号“李卓吾专号”出版。

该专号刊载朱维之《李卓吾底性格》，前人《李卓吾与新文学》、《李卓吾底思想》，铃木虎雄《李卓吾年谱》等文。

黄文山《唯生论的历史观——民生史观论究》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

马欢著、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曾謇著、陶希圣校《中国古代社会》由新生命书局出版。

5 月

1 日　何兹全在《食货》第 1 卷第 11 期发表《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

作者将三国时期国家的领民依其性质和对国家的剥削关系的不同分为州郡领民、屯田客、军户三类加以考察。

同期还刊载了陶希圣《五代的庄田》、傅衣凌《辽代奴隶考》、龚化龙《明代采矿事业的发达和流毒》（第 12 期连载）等文。

10 日　何炳松在《文化建设》第 1 卷第 8 期发表《怎样研究史地》。

作者认为史地研究“以求得真相为目的”，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只有采用现代所谓科学的方法”。所谓科学方法有两个特点：“第一我们的态度要能够绝对的客观，我们研究史地时，要绝对排除自己的成见，无论是非黑白，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第二我们要适用观察方法”，一方面用飞机、气球等来观察地表等，一方面用各国统计数字来研究人文地理。

同期还刊载了李麦麦《论“五四”整理国故运动之意义》、叶青的《五四文化运动的检讨》，批评五四运动中的复古倾向。

16日　陶希圣在《食货》第1卷第12期发表《十一至十四世纪的各种婚姻制度》(上)。

作者认为，“婚姻制度是社会组织的一断面。不独这个制度本身是一种社会组织，又可以指示一般社会组织的性质”。文章依次罗列了赵宋宗族的买卖婚、契丹的掠夺婚传说、契丹的两姓世婚、蒙古的两姓世婚、女真的十族世婚、女真与蒙古的Levirate等婚姻形态。

同期还刊载了高耘晖《周代土地制度与井田》、韩克信《两汉货币制度》、褚道菴《两汉官俸蠡测》、程维新《宋代广州市对外贸易的情形》等文。

18日　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

马衡、袁同礼、沈兼士、翁文灏、叶恭绰、胡先骕、李书华、朱启钤、李济等人出于“欲使先民之遗迹永久保存，固有之文化日新又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国家边陲筹长治久安之策”，乃动议成立博物馆协会。该组织的宗旨是“研究博物馆学术，发展博物馆事业，并谋求博物馆之互助”，任务是“本互助之精神，积极经营，谋未来之发展”、“唤起一般人之注意，对民族固有文化，真切认识，而促研究之兴趣”、“与世界博物馆协会互通消息，俾资借镜”。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历史博物馆、地质矿产陈列馆、北平研究院博物馆等机构参加协会，马衡、袁同礼、沈兼士、翁文灏、叶恭绰、胡先骕、李书华、朱启钤、李济、徐炳昶等人被选为执委。

31日　卫聚贤等人发掘了杭州古荡遗址，获得石器6件。

是月　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由中国经济研究会出版。

此书是社会史论战的产物。该书广告称：“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之研究，为一般人认为所迫切需要的一门学科，数年来，曾有不少的学者，企图以新的史学方法整理中国历史，但空论多而实际的探讨少，零文多而系统的叙著少。”《中国经济史》颇能代表论战高潮过后进入研究阶段的学术倾向。如嵇文甫序所说：“一方面带着论战时期的战斗气氛，而另一方面在搜集材料上也很下些功夫。”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评价此书“材料相当丰富、见解相当正确，为不可多得之佳著。”理论与材料并重是此书的一大特点。

《中国经济史》的论战色彩集中表现在“诸家批判”一编中。批判包括五个方面：“与李麦麦论春秋时代之阶级斗争”、“与陶希圣论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与叶青李麦麦论墨子所代表的阶级问题”、“顾颉刚古史辨批判”、“与王宜昌论治史方法及中国之用铁时代”。这些内容都是论战的

延伸。马乘风不但就论战中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还对论战进行方法上的总结和反思。

马著以唯物史观为立场，对顾颉刚及“古史辨派”提出批评，认为他们“不从社会的整个轮廓着眼，不从社会底凭借去观察个人底行为，所以他尽举些头发梢的问题，从头发梢上下功夫，这样，哪还有打不坏斩不断的历史呢?”“顾颉刚的路线，会迷乱我们走到越走离中国古代社会越远的歧途上，为了这，我们非站在新的唯物论的见地上，对于顾颉刚路线加以无情的排除不可”，“从顾君的路线出发，必然的结果是把中国古史送到‘断头台’上”。马乘风说：“我们所要知道的，是古代社会生活的全部，是古代社会的大轮廓，是古代社会的整个问题。”

1937 年 11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 1、2 册。其中第 1 册是此书的增订本，增加“殷商时代”一编，第 2 册专论汉代经济，卷首有嵇文甫、冯友兰序。

章太炎在《星期讲演会记录》第 4 期发表《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

文曰：“今人以为史迹渺茫，求之于史，不如求之于器”是“拾欧洲考古学者之唾余也”。“凡荒僻小国，素无史乘，欧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灵于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寻此迂道哉?”中国“明明有史，且记述详备”，可以器物补史乘之未备，而不宜以器物疑史乘，或作为订史的主要凭据。

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新中学文库”。

该文库面向中学生，由王云五主编，分为总类、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文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艺术、文学、史地十大类，共 411 种图书。该文库除了收录诸子著作、二十四史、《明儒学案》等古人论著，还收录近人一些史学类著作，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钱穆《国学概论》，周予同《群经概论》，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向达《中外交通小史》，张星烺《欧化东渐史》，何炳松《历史研究法》，杨德恩《文天祥年谱》，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略》，吴清友《苏联史地》，陈安仁《中华民族抗战史》等。

陈德芸编成《古今人物别名索引》。

作者为了解决后人读古书而知其人，以解决古籍中只标别名、斋名，不署真名等问题，用三年多时间，参阅几十种有关书籍及著作方编成此书。该书共六十余万字，搜集古今人物别名、字号、溢号、爵里、斋名、

帝王庙号等有关名号七万零二百个，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工具书之一，与陈乃乾所编之《室名别号索引》互为补益。该书1937年由岭南大学图书馆收入“岭南大学图书馆丛书”出版，后又多次再版。

朱士嘉编《中国地方志综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朱士嘉在1934年5月1日出版的《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5期刊登了《〈中国地方志综录〉例目》，详叙该书的编纂方法，及编纂规模（收书5832种，93237卷，其中宋代方志28种，元代方志11种，明代方志770种，清代方志4655种，民国368种）。商务印书馆该书的广告称，该综录“除胪举书名外，并详其卷数，编纂人，编纂时期，版本与藏书所在；其有关本书之记述或考证，入备考类，末附统计图，尤足以考见历代修志之迹与文化之关系。此为前所未有之作，凡研究史地社会科学与夫修志者，允宜人手一编也”。

综录的出版，引起美国国会图书馆注意，因该馆所藏大量地方志需整理编目。故1939年9月该馆东方部恒慕义主任托洪煨莲介绍朱士嘉到馆工作。在美图三年期间，朱士嘉编就《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1942年由美国政府印刷局出版，著录2939部，后又有《补编》，著录约400部。

该书1958年增订再版，著录7413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是在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1962年修订本的基础上完成的。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因为秦桧翻案引起诉讼。

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南宋和金朝的和战”一章中，为秦桧说了几句翻案话，认为迫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岳飞等的努力根本无法改变宋金力量对比，秦桧主持和议是必然之举，而他由此背负千古骂名有些冤枉。“九一八”后抗日宣传的领导者之一、南京《救国日报》主持者龚德柏以吕氏犯“卖国罪”和“违反出版法”，将其起诉至江苏高等法院，吕思勉于“廿四年五月十二与李伯嘉、徐百齐入都，十三日午后到庭”。5月20日，法院宣布判决，称该书议论“虽未适当，要皆在我国东北之地未失以前，与现在情形不同，自非别有作用，既系个人研究历史之评论与见解，以法律言，即非破坏我国三民主义，损害国家利益妨害善良风俗，不构成出版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之罪”，不予起诉。

梁方仲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1期发表《明代“两税”税目》、《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

《明代“两税”税目》一文主要是对《明史·食货志》中“夏税”

和“秋税”的考辨。作者认为据《明史》的记载，“夏税”和“秋粮”包括的有几十种内容，这其中的大部分“就其历史的来源而论，并不属于田赋的范围，并且这些项目并没有普遍性”，作者希望考辨这些附加税项的历史来源，又是如何被归并到田赋中去的，“输纳地域上的分布是怎样的”等问题。此文被认为是梁氏经济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一文主要由38个统计表组成，系作者将《明实录》、《明会典》等收集的资料经整理、统计后制作而成，内容涉及明代的各时期的户口、土地面积、钱粮绢布、户口税，以及相关主要数据的变化比较等。作者自称编制这些表格的目的有二，一是为研究明代田赋的人们提供一些整理过的统计资料，一是为自己的专题研究作参考。有研究者指出，此文“首次把统计学的方法运用于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汤象龙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1期发表《光绪三十年粤海关的改革》、《民国以前关税担保之外债》。

粤海关是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与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同时设置的四大海关，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其他三海关关闭，独留粤海关。作者认为，1904年（光绪三十年）粤海关进行的改革“清除了该关二百余年来许多的积弊，这不但在该关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即在整个的关税史上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故撰写此文对引发此次改革的原因、改革的措施等进行分析。此文是中国关税史研究的开拓性论著之一。2006年，任智勇认为汤文主要在论述粤海关的腐败，没有注意到当时的政治和财政背景，对改革的过程、内容、影响也较少甚至没有涉及，故又发表《光绪三十年粤海关再研究》予以补充。

《民国以前关税担保之外债》一文研究的是1861年（咸丰十一年）至1911年（宣统三年）间中国以关税为担保所借外债的情况。作者认为晚清中国每次发生“军事发动时，国家财政即遭受一次浩大的支出”，故以军事借款为中心，将这51年划分为四个时期，并逐一论述。此文与《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2期）一起，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外债与赔付研究领域的开创性成果。

李达在北平法商学院《法学专刊》第3、4期合刊发表《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

李达此时有志于撰写一部《中国现代经济史》，此文即是该书的一章，在该年9月李达还在《法学专刊》第9期发表了《中国现代经

济史概观》。李达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在我们的研究上，实是帝国主义侵入以后的经济史”。李达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序幕”一文中重点分析了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具体的中国经济过程”、“中国商业资本在封建经济中所演的作用”、“从清初到鸦片战役期间的中国经济概况”三个问题；在“概观”一文中，李达将中国“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842—1880年是“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奠定了侵略的根据的过程”，1881—1914年是“封建势力反抗侵入的资本主义的过程”，1915至1935年是“民族资本主义发生的过程”。

蔡元培在《教育杂志》第5期发表《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

蔡元培认为，大学国文系的学生读一点《诗经》、历史系的学生讲一点《书经》与《春秋》，哲学系的学生讲一点《论语》、《孟子》、《易传》与《礼记》，是可以的。

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该书分别从“从西方文艺复兴说到东方文艺复兴”、“东方文化停滞之史的动力”、“西力东渐与东方的沉沦”、“赶上歧途的民族运动”、“划时代转变的来临”、“转型期中社会现象的逆转”几个主题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对此后的五四运动研究影响颇大。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印出版《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

此引得将张廷玉《明史》、万斯同《明史》、王鸿绪《明史稿》、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等89种明代传记编为《姓名引得》及《字号引得》，共14万条，120余万字。

同年7月，引得处又编纂出版《道藏子目引得》。

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开始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至1936年2月出齐十集。是年10月，蔡元培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撰写总序，序中叙述中国文化自古代至近代之发展过程，希望中国能在短期内实现文化复兴。

陈启天《商鞅评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卫聚贤《十三经概论》由开明书店出版。

丁致聘编纂《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由国立编译馆出版。

王志瑞《中国经济政治演进史》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

朱星元《战国纵横家学研究》由上海东方学术社出版。

6 月

1 日　陶希圣在《食货》第 2 卷第 1 期发表《经济史名著选译计划》。

陶氏在中指出“我们选译外国经济社会史名著时，并不是因为那是名著，便拿来译。我们选译的标准，是那名著的全部或一部，里面所叙述或讨论的具体现象（制度或思想或政治等），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必需的比较或指示。中国经济社会史上有许多的筋节，如果不能明白了解，全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便无从了解。……这样的问题，只有把外国史上类似的现象来比较一下，才能在黑暗里得到一线的光明的指示。还有外国经济史上的现象本身，需要具体的分析研究，……我们选译，要有这样的标准：为了解析中国经济社会史最重要的关键，选译外国名著里社会经济过程可以拿来比较的类似的段落的研究。”据统计，《食货》半月刊发表的这类译文共计 52 篇，其中介绍经济史学理论方法的 8 篇，介绍社会形态理论和外国经济状况的 26 篇，讨论中国经济史具体问题的 18 篇。

同期还刊载了王沉《关于地方志》，陈啸江《关于“一亩三甽”问题的商榷并答杨君》，戴振辉《五代的货币制度》，（日）日野开三郎著、高叔康译《北宋时代铜铁钱的铸造额》等文。

2 日　胡适在《独立评论》第 153 号发表《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

文中对陶希圣《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一文引用“资本主义”、“自由”、“封建主义”之类的名词进行批驳，认为在使用抽象名词时，必须有严格的约束：第一，不可乱用一个意义未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词。第二，与其用抽象的名词，宁可多列举事实。第三，名词连串排列不能代替推理，必须有证据。第四，凡使用一名词，不可随时变换它的涵义。第五，对名词的使用，应“但愿空诸所有，不可实诸所无”。

早在 1920 年与胡汉民、廖仲恺等人进行井田制有无讨论时，胡适便反对使用“封建制度”这样的名词，认为“封建制度一个名词是最容易惹起误解的，是最能阻碍新历史的见解的”。

同月 9 日，陶希圣在《独立评论》第 154 号发表《思想界的一个大弱点》，对胡适的批评进行反驳。陶希圣认为，自己的思想方法没有错，因为“用抽象名词代表具体事实是免不了的”。而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的思

想方法，不容许“把许多连贯在一起的社会现象，加一个抽象名词，或是取这些连贯在一起的事实里的主要的或是决定的一个，来指称这些连贯的事实”，“把一切事物都看做孤立的，散乱的，琐碎的，偶然的”。在陶希圣看来，这便是当时思想界的大弱点。而使用抽象名词的思想方法却“可以叫人看出社会上一切现象是相关的，一扫‘说到那儿算那儿’的浅薄的学说”。

3日 《光华大学半月刊》出版“庆祝本校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

此期刊载了吕思勉《十年来之中国》、钱基博《十年来之国学商兑》、周澂《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蒋维乔《十年来之中国佛教》、谢树英《十年来中国大学教育之趋向》等文。

16日 高耘晖在《食货》第2卷第2期发表《分工研究的方法》。

文中提出了食货学会进行分工研究的计划：“聚许多研究目标、对象相同的人而组成学会，为了节省精力起见，确应有一个规划，使每一个会员把他自己的研究方面报告与大家，则凡与其研究目标相同的，可以互相讨论、帮助。研究方面不同的，也可以互相比照、发明。”他还列举了16项内容，提出了4点理由。高耘晖称许陶希圣苦心经营的《食货》半月刊道：“我以为现在国内外对中国社会史从事研究的人，虽然不少，可是真正有具体组织的，还只是食货学会”，并断言它“在现在或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心”。

同期还刊载了梁园东《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之诸问题》，（英）克拉判著、连士升译《经济史的纪律》，曾謇《殷周之际的农业的发达与宗法社会的产生》，莫非斯《论孟子并没有所谓井田制》，姚渔湘《梁代经济之概略》，戴振辉《五代农村的残破和恢复》，陶希圣《北宋初期的经济财政诸问题》，王兴瑞《王安石的政治改革与水利政策》，全汉升《南宋杭州的外来食料与食法》等文。

王重民在《禹贡》第3卷第8期发表《清代学者地理论文目录》。

第9、12期连载。该目录内容分通论、总志、方志、河渠水利、山川、游记、古迹名胜、外记边防八类，方志类所占篇幅最多。该目录作为最早的现代目录之一和最早的方志学目录，分门别类，排列有序，便于进一步研究利用，被认为较有学术价值。容肇祖在《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10期发表评论文章，对王重民将梁启超等不能全算清代学者的文章收入目录提出质疑。

同期还刊载了冯家昇《述东胡系之民族》、刘德岑《黎氏族之迁徙》、张公量《苏代说燕辨证》、李素英《明成祖北征记行初编》、胡传楷《金华志略》等文。

20 日　由中央研究院院长和各国立大学校长选举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一届评议员产生。

此次选出李书华、姜立夫、叶企孙、侯德榜、吴宓、赵承嘏、凌鸿勋、李协、唐炳源、秉志、林可胜、胡经甫、谢家声、胡先骕、陈焕镛、叶良辅、翁文灏、朱家骅、张云、张其昀、郭任远、王世杰、何廉、周鲠生、胡适、陈垣、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定良共 30 人，由南京国民政府正式聘任。

9 月 7 日至 9 日，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在南京召开。蔡元培认为评议会的产生是中研院可以“特笔大书”的一件事，若运用得好，就“找到了中国学术合作的枢纽”。

27 日　童书业到达北平，担任顾颉刚私人助手。

1934 年 8 月，顾颉刚赴杭州奔母丧之际会见童书业（此前已接到童书业所寄《虞书疏证》）。此时童书业因生活压力在浙江图书馆附设校印所任校对员，月薪仅 15 元。顾氏遂邀请其到北平协助自己工作。童书业到北京后，担任禹贡学会的编辑和顾颉刚在燕大、北大春秋史课程的助教，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是月　孙海波在《燕京学报》第 17 期发表《卜辞历法小记》。

该文认为卜辞无春夏秋冬四季纪时之发见；十三月非闰月；殷人通常纪日法，由甲至癸十日为一旬，月三旬，无大小之别，年分别为十二月，凡三百又六十日；在特种情形下，某月附加十日至二十日。

同期还刊载了钢和泰《佛说圣观自在菩萨梵赞》、钱宝琮《汉人月行研究》、吴晗《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等文。

容庚在《燕京学报》第 17 期发表《秦始皇刻石考》。

该文对秦始皇刻石的原起、形状及存佚、“刻辞之校释”、“拓本之流传”等进行研究，并得出了始皇刻石文“其押韵已四声分用”等五项结论。

全汉升在《岭南学报》第 4 卷第 2 期发表《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

本文对明清以来，尤其是清末盛行一时的“西学源出中国”说之出

现、发展、出现之背景、“西学之来源”、“源出中国的西学”、“西学源出中国说的集大成者王仁俊”、“西学源出中国说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王尔敏指出，此文“就19世纪此项观念之解析言，可谓圆满周至，十分透彻”，并认为此文“以严肃性学理上之彻底探讨”，对“西学源出中国”说做了最后总结。

同期还刊载了郑师许《论所谓秦式铜器》、薛澄清《明张燮及其著述考》、何格恩《慧能传质疑》等文。

郎擎霄在《岭南学报》第4卷第2期发表《清代粤东械斗史实》。

本文对清代粤东械斗的意义、原因、道光至光绪年间的械斗事件等进行了分析和梳理，是学术研究层面对这一社会现象较早的梳理。

孙海波在《考古社刊》第2期发表《读王静安先生〈古史新证〉书后》。

作者认为“《古史新证》出，而殷代之世系制度以明，此为王氏研索卜辞之大发明，促成卜辞为系统研求者，当自王氏始也”。此文对王氏有关先公先王的考证，进行了二处订正和二处辑补。

同期还刊载了郑师许《日本考古学界最近之概况》、徐中舒《殷代铜器足征说并论�中片羽》、容庚《尚书新台字新解》、金致淇《明太祖像真伪考》等文。

中学生社编辑《史话与史眼》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书收录陶希圣《孔子与耶稣》、《什么是儒教》，周予同《汉学与宋学》，王伯祥《我国三千年来地方制度的演变》，宋云彬《科举制度及其作用》等论文十三篇。

胡焕庸在《地理学报》第2卷第2期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

作者根据相关资料，估算了中国的总人口，并从瑷珲至腾冲的斜线将中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大部分，认为东南土地只占全国土地的36%，但人口却占了96%。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一文认为本文及其所附《中国人口分布地图》是人口地理研究公认的开创之作。

魏应麒编《林文忠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容庚编《金文续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蒋元卿《校雠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美）罗维著、吕叔湘译《初民社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英）霍布豪斯著、廖凯声译《社会进化与政治学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日）本田成之著、孙俍工译《中国经学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张军光《中国社会发展史纲》由中华书局出版。

王伯祥、周振甫《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

高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 9 卷第 3 号发表《老子世系考》。

7 月

1 日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成立，顾颉刚任组长。

吴丰培、张江裁、吴世昌、刘厚滋等任编辑，常惠、许道龄、刘师仪、石兆原等任助理，孙海波、徐文珊、冯家昇、白寿彝、王守真、邝平章、杨向奎、顾廷龙、王振铎、童书业、杨效曾、王育伊等任名誉编辑，洪业、许地山、张星烺、陶希圣、闻宥、孟森、吴燕绍、钱穆、吕思勉、聂崇岐任会员。

其主要工作有：派吴世昌、张江裁带队普查北平古迹，以大小庙宇为重点，编辑《北平庙宇通检》等书；派刘厚滋任金石编纂工作；派吴丰培负责边疆史地研究，并选购边疆图书。

《食货》半月刊发起“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特辑征文”活动。

刊载在第 2 卷第 3 期的《启事》指出：“中国社会的发达过程，究竟怎样的看取，有许多问题是必须解决的。这些问题的最后的解决，须等经济社会史料，大规模有系统搜集到比较齐全以后。但是史料搜集以前，或搜集的时期，需要理论的指导，假定的建立。这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初步估定，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工作。”《食货》半月刊编委会拟定的问题是“社会发达过程是不是有一定的阶段”，“如有，世界各地社会发达阶段是不是同样的？亚洲或是中国的社会形式以及发达过程是不是特殊的”，“中国社会的发达，是不是各地又各有不同的过程：如长江黄河流域的差别，如沿海及山岭地带的差别”，“西北部落的侵入，对社会发达过程有怎样的影响？欧洲资本主义的影响怎样”等。

《食货》半月刊第 2 卷第 3 期还刊载了格拉斯著、鞠清远译《经济史的兴起》，王宜昌《古代中国的历法》，曾謇《周金文中的宗法记录》，全汉升《十一世纪至十四世纪的各种婚姻制度》（下），王瑛《太平天国革

命前夕土地问题的一瞥》等文。

周一良在《禹贡》第 3 卷第 9 期发表《北魏镇戍制度考》。

文章考辨了北魏置镇于边地的时间、镇的种类、镇戍的设官情况、"元魏设镇数目及其废置沿革"等。后周氏又撰写《北魏镇戍制度续考》(《禹贡》半月刊第 4 卷第 5 期),对此文予以补充。该文被顾颉刚等人称道,被认为是周一良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的代表作之一。

同期还刊载了王育伊《石晋割赂契丹地与宋志燕云两路范围不同辨》、郭豫才《明代河南诸王府之建置及其袭封统系表》等文。

16 日　王瑛在《食货》第 2 卷第 4 期发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纲与方法》。

第 5 期连载。作者认为"我们认为昧于一般的方法理论去研究中国经济史是胡闹,绝对说不上什么研究!因之,我们一再提起注意方法论的重要,不要大家跟着别人胡抓乱挠!研究中国经济史,第一应先把握一般的正确的方法及理论;第二,才能去进行所谓'广搜材料'"。

同期还刊载了王镇九《中国上古各地物产》、杨中一《再论"一亩三甽岁代处"》、陶希圣《宋代的职田》等文。

谭其骧在《禹贡》第 3 卷第 10 期发表《释明代都司卫所制度》。

文章考辨了"卫"、"所"的建立时间、隶属关系、数量、职责等情况,对从整体上了解明代卫所制度有积极作用。

同期还刊载了邓嗣禹《行省的意义与演变》、王辑五《中倭交通路线考》等文。

是月　吴景超在《清华学报》第 10 卷第 3 期发表《西汉的阶级制度》。

作者认为西汉社会中"最下层的阶级是奴隶","比奴隶高一阶级的"是"平民","平民之上"还有"一些少数的利益阶级",这三个阶级虽然有一些剥削关系,但"并不能成为推动历史的势力"。吴氏根据西汉的情况,提出"各时代各地方的阶级,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可以说是'安分的阶级',一类可以说是'革命的阶级'",二者的区别就是"安分的阶级"视剥削为当然,并缺少一种"革命的哲学",而"革命的阶级"则反之,造成二者的差异"不在压迫,不在剥削,而在革命的思想"。

同期还刊载了陈寅恪《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陶希圣《周代诸大族的信仰和组织》、吴晗《明成祖生母考》等文。

马叙伦《石鼓文疏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马叙伦在此书中对石鼓文进行了考证，认为是秦文公时期的石刻。马叙伦发表的石鼓文研究论著还有《石鼓文疏记引辞》（1933）、《石鼓释文序》（1934）、《跋石鼓文研究》（1937）等。

萧一山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 年秋季号发表《天地会起源考》。

作者根据相关新发现的资料，提出了天地会创始时间应该在雍正十二年的观点，并认为天地会的萌芽性组织在康熙年间已出现。

同期还刊载了吕振羽《孔丘派哲学思想的发展》、陶希圣《东周时代的农工商业与社会层》、千家驹《一个历史事实的新看法》、陈之佛《中国历代陶瓷器图案概观》等文。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由国立北平研究院印行。

主要收录作者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搜集的天地会文献，并辑入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包括作者撰写的《天地会起源考》一文。

黄毅民《国学论丛》上册由北京燕友学社出版。

下册 1936 年 4 月出版。

吴其昌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 5 卷第 3 号发表《秦以前中国田制史》。

第 4 号连载。

钱穆《老子辨》由上海大华书局出版。

郑昶《中国画学全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8 月

1 日　朱希祖等编著《六朝陵墓调查报告》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辑出版。

该书共收七篇文章，朱希祖撰写的有五篇，分别是《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六朝建康冢墓碑志考证》、《天禄辟邪考》、《神道碑碣考》、《驳晋温峤墓在幕府山西说》，另外两篇是滕固《六朝陵墓石迹述略》和朱偰《六朝陵墓总说》，此外，书中及书后还附有大量的文物及外景照片和南京等地的地形图。该书作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调查报告第一辑”出版，是我国最早的文物普查报告。

连士升在《食货》第 2 卷第 5 期发表《重商制度略说》。

此文是作者为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西摩勒耳《重商制度》一书中译

本所作的序言，介绍了重商制度产生的原因、特点等。

同期还刊载了陈宪璇《春秋的奴隶制度》、河汉《战国时代商人的动向》、刘广惠《两晋南北朝的宫闱》等文。

5日　郭宝钧主持河南古物保存会对汲县彪镇战国古墓进行发掘。

9月12日结束，发现了水陆攻占图鉴、列鼎器等物品，对了解战国的军事、工艺、社会等有重要帮助。同年冬，郭宝钧等人又发掘辉县琉璃阁战国墓。

10日　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

1933年作者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主讲秦汉史，将前所作《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之大义编撰成“汉代史讲义”，此讲义以叙述性而非考证性的文字写成，顾颉刚自述“以演义体行之，为将来编通俗中国通史之准备”，共二十二章，1935年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题为《汉代学说史略》，后多次再版，至1955年由上海群联出版社再版时，改题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仍为二十二章，文字小有修改。

作者认为“阴阳五行”学说为“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汉人的信条，是他们的思想行事的核心”，故全书二十二章以“五德终始说”支配下的汉代学术与政治为主线。此书为作者“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进一步发展，意在进一步说明汉代形成上古史系统的过程。

雷海宗的评论认为，“书虽然短，事实却很丰富，条理清楚；对初学的人可说是很好的一部参考书。评者个人只觉得书的名称不甚妥当”。

是月　金兆丰《清史大纲》由开明书店出版。

金兆丰原为清史馆的纂修，在修史期间著《清史略》，去世后由其弟金兆梓出版，易名为《清史大纲》。全书共十六章，第一至五章为入关前，第六至十六章为入关至清亡。基本以朝代为纲，一朝一章，在入关前部分，作者认为明朝之亡与明朝失去东藩朝鲜与北方蒙古之屏障有很大关系，故叙述较详；对反清之革命斗争如太平天国、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可能因作者身份则叙述简略。其材料大多取自实录。当时有论者指出，此书为“清史简明之撮要，较之坊间流行之本，贪多务博，猥然杂陈，似远胜之”，但也存在“重视诗话野史”、“轻视外交文化”、“根据资料不明”、“年代次序不明”等问题。

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上册由世界书局出版。

下册1937年3月出版。此书以因果律、进化律探求地理、历史、思想、学艺等对文化的影响，是规模较大的文化通史。

周积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一文认为陈氏此书“不仅篇

幅超过柳著，是当时同类文化史著作中卷帙最大的一部，而且在剖论的深入和文化的把握上要高出柳著一筹”。

李则刚《始祖的诞生与图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根据法国涂尔干和美国摩尔根的相关理论，对中国古代的图腾现象和神话传说进行了初步探讨。该书主要内容有“始祖诞生的传说”、“传说的演进”、“从名号上观察始祖与图腾的关系”、“从图像上观察始祖与图腾的关系”等。

翦伯赞在《劳动季报》第 6 期发表《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翦氏自此开始转向历史研究。

王重民《敦煌本尚书六跋》由北平图书馆刊印。

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由光明书店出版。

9 月

1 日　一良在《食货》第 2 卷第 7 期发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酒》。

文章对自文字记载以来到秦汉时期酒的起源和创制者的传说，酒的材料、制造和种类，酒器等问题进行了考察。

同期还刊载了非斯《用铁时代问题之研究》、黄谷仙《唐代人口的流转》、水子《明汴梁庙会》、陶希圣《明代王府庄田之一例》等文。

钱穆在《禹贡》第 4 卷第 1 期发表《水利与水害》。

此文对一般人所谓黄河为中国之害，长江为中国之利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中国历史上“乾隆以前的中国史，上半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而后半部以长江流域为主脑，大体上却黄河流域代表的文化还超在长江流域所代表的文化之上”，“中国民族唐以前的文化，实在是多多利用了黄河”，“古黄河之有助于中国文化之进展者实远在长江之上”，并指出水之为利为害，主要与政治清明是否有关。

同期还刊载了谷霁光《唐六典中地理记述志疑》、张家驹《宋代分路考》、牟润孙《记魏书地形志校异》、李泰棻《原阳县之沿革》、朱士嘉《杨守敬地理著述考》等文。

自此期开始，《禹贡》半月刊开设专栏辑录中国地理界消息。

《文化批判》“中国民族史研究特辑”出版。

特辑刊载刘兴唐《中国人种的起源》、吴泽《殷周民族不同源释》、广惠《秦汉民族的向外发展》等。

5日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进行第12次发掘。

此次发掘由梁思永主持，参加者有石璋如、刘燿、高去寻、尹焕章等。此次发掘至12月16日结束，雇工500余人，是殷墟开掘以来工程最大的一次。

王日蔚在《禹贡》第4卷第2期发表《伊斯兰教入新疆考》。

作者认为伊斯兰教约在10世纪之末至11世纪之间，由喀什噶尔、叶尔羌处传入，经过多次宗教战争，至13世纪时扩及到库车等地，元代时因借助政府支持，发展迅速，遍于天山南路，元末至明中叶扩及新疆东部，清代时又扩及到新疆北路、南路。此为伊斯兰教传入新疆诸种观点之一种。

同期还刊载了张公量《张仪入秦说秦辨伪》、史念海《西汉侯国考》（第5期连载）、吴玉年《西藏图籍录》、傅成镛《西藏图籍录补》、薛澄清《金门志及湄洲屿志略概述》等文。

30日　黄现璠在《师大月刊》第21期发表《宋代太学生之政治活动》。

是月　王绳祖《欧洲近代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原是作者任教金陵大学历史系的讲义，在贝德士的指导下，作者参阅了数百种西文著作，几经修改后形成比较完善的教材。该书50余万字，6卷26篇，叙述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史。贝德士在序中说该书“宜为此类书中之佳者”，出版后打破了外国教科书对中国西方史课堂的垄断。

顾颉刚在《史学年报》第2卷第2期发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

顾颉刚原计划借撰写《崔东壁遗书序》的机会，“把三千年中造伪和辨伪的两种对抗的势力作一度鸟瞰，使读者们明白东壁先生在辨伪史中的地位，从此明白我们今日所应负的责任”，但应事情繁多最终只写了战国秦汉间一段，为应付《史学年报》索稿，乃略加修饰，“易本题发表”。作者在文章首句即提出“研究历史，第一步工作是审查史料。有了正确的史料做基础，方可希望有正确的历史著作出现”。由于“中国的史料不可信的甚多”，又不曾经过认真系统的整理，所以应当坚持这一工作。此文对伪古史系统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作了探索，是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的深化和运用。

顾氏在此文的《附言》中对外界对其的质疑做了“总答复”：“我开

始辨古史在民国十年，那时中国的考古工作只有地质调查所做了一点，社会上还不曾理会到这种事，当然不知道史料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那时唯物史观也尚未流传到中国来，谁想到研究历史是应当分析社会的！我在那时，根据六经诸子，要推翻伪古史而建设真古史，我自己既觉得这个责任担当得起，就是社会上一般人也都这般的承认我，期望我。从现在看来，固然可笑，但论世知人，知道了那时的环境是怎样的，也就不必对于我作过分的责备。其后考古学的成绩一日千里，唯物史观又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我虽因职务的束缚，未得多读这方面的著作，但我深知道兹事体大，必非一手一足之烈所克负荷，所以马上缩短阵线，把精力集中在几部古书上。我常想，也常说：我只望做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我只望尽我一生的力量把某几篇古书考出一个结果。我决不敢说，也决不敢想：中国的上古史可由我一手包办。事实具在，只要一看《古史辨》第二册以下的自序便知。我以为各人有各人的道路可走，而我所走的路是审查书本上的史料，别方面的成绩我也应略略知道，以备研究时的参考，我决不愿阻挡别人的走路。我自视只是全部古史工作中的某一部分的一员，并不曾想夺取别人的领导权而指挥全部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全部工作的应有的一部分，决没有废弃的道理；如果这一部分废弃了，无论是研究考古学或唯物史观的，也必然感到不便。”

同期还刊载了邓之诚《护国军纪实》、邝平樟《唐代公主和亲考》、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洪业《史通点烦篇臆补》、许同莘《释百姓》、周一良《大日本史之史学》、邓嗣禹《城隍考》等文。

齐思和在《史学年报》第 2 卷第 2 期发表《评马斯波罗中国上古史》。

齐思和所谓“马斯波罗”即法国汉学家马伯乐。1927 年，马伯乐的代表作之一《中国上古史》在巴黎出版后，迅速引起汉学界的注意。该书共四卷，二十七章，“起于中国文化之由来，而迄于秦政之统一六国”，分别探讨了中国文化之渊源、上古至西周的社会与宗教生活、春秋五霸、战国的纵横和六国的灭亡。马伯乐此书多取材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侧重于政治和军事，末卷论及中国的文学和哲学。齐思和认为马伯乐对于考古学、人类学、文字学、神话学、地质学、天文学等辅助学科“既有相当之研究，于西方之文物制度又知之甚详。故其于古代传说信仰之解释，典章制度之考证，每有精义。如其论古代社会之构造，纯用西方封建制度之名辞解释之，语多恰当。较不知封建制度为何物，即侈谈中国古代社会者，不可同日而语”，故该书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没有征引崔东壁的《考信录》、顾颉刚的《古史辨》，但仍可视为“五十年来

西方上古史研究之大成”，是“精心之作”。

张长弓《中国文学史新编》由开明书店出版。

作者认同以时代为纲的结构，但是不赞成将文学史写成各时代作家及其作品提要的堆砌，认为写文学史必须具备历史的精神和批判的眼光，使文学史能见“史的流变”，能认识文学产生的时代和社会。由于该书在体例上采用了“以时代为纲，以文体、作风、派别为子目”等方面的尝试，出版后颇受欢迎，被西南联大国文系等列为必读书目。至1949年3月，该书已出至第6版，1957年在台湾又再版。

李则纲《史学通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是作者在中国公学、安徽大学等校的《史学通论》课程讲义。后经补正，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史地小丛书”。全书共十章，论述了历史学及其相关的若干问题。

饶锷辑、饶宗颐补订《潮州艺文志》在《岭南学报》第4卷第4期刊行。

第6卷第2、3期合刊续载。《岭南学报》所刊《潮州艺文志》共13卷，第14—17卷及外篇一卷因抗战爆发未能刊载。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

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由景山书社出版。

简又文编《太平天国杂记》第1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侧重其法术的和宗教的方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是作者系统运用民俗学、宗教学理论研究古史的典范作品，其中系统研究了中国古代人对出行的理解、出行的禁忌，以及为出行而施展的种种祓除鬼神的巫术。因为出行的这些观念折射出了当时的人们对其所生活的周边世界的种种理解。江氏通过对于古代人出行的研究来探讨当时人的宇宙观、生命观，以小见大的将对古代人日常生活的研究扩大到整个宗教学领域来观照。

陶希圣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5卷第3号发表《王安石的社会思想与经济政策》。

10月

1日 《食货》半月刊推出“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专号之一”。

此专号刊载了陶希圣译《古代社会的经济》、刘兴唐《中国社会发展形式之探险》、马乘风《从西周到隋初一千七百余年的经济转移》等文。

刘兴唐在《中国社会发展形式之探险》中指出："关于中国社会发展之形式问题，因为个人方法论之限制曾生出各色各样的结论，或求之于自然环境，或求之于野蛮民族，以及把唯物史观当作唯一的历史科学方法的人们，又把社会之客观发展法则当作历史之具体的结论，由于他们方法论上之错误，自然难得出良好的结果。唯物史观，只是历史之客观的发展法则，并不能单独成为历史科学上的方法论，他只是使用科学方法论所制造出的结果，所以也只能作为历史之具体分析的一个借镜。把唯物史观当方法论使用的先生们，和木匠把商品当斧子使用一样的可笑。"

《现代史学》第 2 卷第 4 期推出"史学方法论特辑"。

该特辑收录了朱谦之《历史论理学》、陈啸江《建立史学为独立的（非综合的之意）法则的（非叙述的之意）科学新议》、岑家梧《戏剧史方法短论》、朱杰勤《龚定盦的史地学》等文。

编者在《编后话》中指出，该期原本计划出版"史学方法论专号"，因为受到稿件的限制，被迫改为"史学方法论特辑"。

陈啸江在《现代史学》第 2 卷第 4 期"史学方法论特辑"发表《建立史学为独立的（非综合的之意）法则的（非叙述的之意）科学新议》。

作者认为"凡一种学问可以独特成一门的科学者，最少要具两个条件：第一是有特殊的对象可供研究，第二是有普遍的法则可供证实"。依据这一标准，作者探讨了史料学是不是历史科学、对事件的考证是不是历史科学、历史哲学与史观是不是历史科学、历史叙述是不是历史科学等问题。

作者认为，历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主要是因为："历史的发展是有法则可寻的"；"历史科学所研究的，是有其特殊的对象"；"历史科学成立的步骤，与其他纯粹的科学无不同"，因此"历史学者，乃探讨人群演化历程（并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之法则的独立的科学也"。

《教与学》杂志出版"历史教学专号"。

该杂志组织当时著名的专家讨论学校历史教育应如何改革以更好地发挥历史教育在挽救民族危机中的作用。

5 日　吴晗在《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发表《明代之农民》。

作者对明代农民的生存境况作了较详尽的考察。他写道："农民人数最多，和土地的关系最密切，对国家的负担也最重。他们的生活最值得我们注意。"农民承担着沉重的赋役，"除了对国家的以外，农民还要对地方官吏，豪绅，地主……尽种种义务，他们还要受四重甚至五重的剥削"。农民田产被侵夺，地主、皇室及外戚，尺寸皆夺之民间，导致逃民、流民的产生。而招抚逃民政策的虚设，又使农民逃亡的情形日甚一日，终于引发了几次空前的农民叛乱。

10日　吕思勉在《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1期发表《魏晋法术之学》。

16日　李旭在《食货》第2卷第10期发表《五胡时代华夷同化的三个阶段》。

30日　齐思和在《师大月刊》第22期发表《五行说之起源》。

齐氏原本计划对"五行说"进行系统的梳理，但最终没能完成，乃将集中精力对"五行说"的起源进行了细致梳理，认为古人计数多以"五"为单位，故"五行说"之"五"，系虚数；五行"初不过人生必需之五种实物，并无若何玄妙之理论"，后被星象家利用，渐由抽象意义，"生出无数花样"，故"以阴阳五行之说出于天文家，可谓卓识"。有研究者认为此结论"至今仍为定谳"。

同期还刊载了罗根泽《晚周诸子反古考》、纪国宣《宋儒疑古考略》、何贻焜《顾亭林社会观》、李文治《黄巢暴动的社会背景》、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万福增《史学年表初稿叙例》等文。

是月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创刊。

此刊由吴景超任主任的编辑部负责编辑出版事务，所载历史学论文，多有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取向。

雷海宗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创刊号发表《中国的兵》。

作者认为研究"当兵的是什么人，兵的纪律怎样，兵的风气怎样，兵的心理怎样"等是"明了民族盛衰的一个方法"，故较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古代兵制的演化。在雷氏看来，"秦代与楚汉之际"是"爱国观念消灭，爱天下的观念流产，人民渐多不愿入伍，结果就产生了一个麻木昏睡的社会"；此后两千年中国社会流向文弱，"两千年来中国总是一部或全部受外族统治，或苟且自主而须忍受深厚的外侮；完全自立又能抵抗外族甚至能克服外族乃是极少见的例外。这种长期积弱局面的原因或者很复杂，但最少由外表看来，东汉以下永未解决的兵的问题是主要的原因"；"中国兵制

的破裂与整个文化的不健全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在这种病态的社会，王安石一流的人必定失败”。

后来在《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中，雷氏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两千年来的专制制度使人们丧失了国家意识和尚武精神，因此是一种“无兵的文化”，而“无兵的文化”无论其在宗教哲学方面如何发达，都难免亡国之祸。因此，中国文化的新生，关键在于建造“兵文化”。

潘光旦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创刊号发表《近代苏州的人才》。

文章主要从优生学和人才学的角度分析了清代苏州人才的种类和孕育人才的原因，并重点探讨了家族迁徙和血缘遗传的影响。此文是跨学科治史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张荫麟在《清华学报》第 10 卷第 4 期发表《周代的封建社会》。

作者认为周代“是我国社会史中第一个可有比较详细知识的时期”，“周代的社会组织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史的基础。从这散漫的，封建的帝国变成汉以后统一的，郡县的帝国；从这阶级判分，特权广布的社会变成政治上和法律上大致平等的社会，这是我们民族一次捷足的大进步。这变迁的历程是我国社会史的中心问题”。在张荫麟看来，“严格地说，封建社会的要素是这样：名义上在一个王室统属下的土地，事实上分为无数小块，每一块有它世袭的政长而兼地主。照这界说，周代的社会无疑是封建社会”；“周王和大小的封君构成这个社会的最上层，其次的一层是他们所禄养的官吏和武士，又其次的一层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庶人，最下一层是贵家所蓄养的奴隶”。该文后被张氏整合到《中国史纲》一书。

同期还刊载了朱自清《李贺年谱》、吴晗《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等文。

闻一多在《清华学报》第 10 卷第 4 期发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

文章借助考证学、人类学的方法，通过对从《诗经》中的“神女”到宋玉《高唐赋》中“奔女”的变化分析，认为夏、殷、楚等“几个民族最初出于一个共同的远祖（当然是女性），涂山、简狄、高唐都是那位远祖的化身”，朝霓、朝云、美人虹等概念的产生与上古农业时代人们祈雨的需求有关。闻一多还认为“高禖祀典”“是十足的代表着那一生殖机能为宗教的原始时代的一种礼俗。文明的进步把羞耻心培植出来了，虔诚一变而为淫欲，敬畏一变而为玩狎，于是那以先妣而兼高禖的高唐，在宋玉的赋中，便不能不堕落成一个奔女了”。

闻一多后又撰《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补》。该文的一些观点后来引起了争议。

陈寅恪在《清华学报》第10卷第4期发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

作者撰写此文的“主旨不再考定微之作诗之年月，而在拈出唐代地方官吏俸料钱之一公案”。作者认为唐代中央官吏之俸料“史籍所在额数与乐天诗文之所言者，皆无不合”，但地方官吏“则史籍所载与乐天诗文所言者无一相合”，其原因在于“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且同一时间，同一官职，而俸料亦各地互异”。

此文是陈寅恪运用“以诗证史”比较法研究历史的代表作之一，此时陈氏对于这一方法已有自觉性认识，故他在文中特别指出，“考史者不可但依纸上之记载，遽尔断定地方官吏俸料之实数也”。

劳榦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1分发表《汉代奴隶制度辑略》。

作者认为“今人谈汉代奴隶制度者不一，然事实与推论相混，记载与假象不分，似未合‘无征不信’之义”，乃“集两汉书及其他文籍，言涉奴隶者，撮其大要成此一篇”。文章内容含三章：“汉代之私奴婢”、“汉代之官奴婢”、“刑徒俘虏雇佣兵卒与奴婢之关系”，分别探讨了奴婢的来源、任务、待遇奴婢的相关制度等。

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指出，民国时期秦汉史研究领域，“以劳榦先生的成就为最大”，此文既是其代表性成果之一。也有研究者指出，劳榦此文引仲长统《昌言》不当，导致后来一些学者误以为汉代农业用奴隶。

此集刊还刊载了劳榦《盐钱论校记》、《汉晋闽中建置考》两文。

丁山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1分发表《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

作者认为“由部落社会演进为封建，为郡县，国家政权由割据而渐集于中央，帝王都邑，遂由流动的而渐趋于固定”。作者乃运用甲骨文、金文等上古材料，并吸收其他研究成果，考论夏、殷、周三代都邑之地，并认为“夏与殷周，实亦非同族类。故其制度文物，生活习惯，颇多不同”等。

邓云特（邓拓）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冬季号发表《中国

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

作者认为，“中国从秦汉至清鸦片战争以前，这一长期的历史，都还是封建的历史，它虽然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曾经经历过各发展期和衰落期，但在本质上却不曾有过什么根本的变更”，换言之，这是一个“长期停滞”时期。造成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是，“中国历史上的旧生产方法——即以农奴劳动为主体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结合，构成了内部坚固的‘小规模经济体’。在这样的经济体内，那些非自由的农民，始终是在超经济的强制之下，替封建地主劳动，同时在土地自由买卖制下，地主与高利贷者商业资本家的三位一体对于农民的剥削，更使这小规模的经济体变成了枯滞的”。

同期还刊载了吕振羽《隋唐五代经济概论》、谭丕模《“北宋”时代哲学思想的各流派》、王孝鱼《黄梨洲学派》等文。

张其昀在《科学》第19卷第10期发表《近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进步》。

第11、12期，第20卷第1—9期连载。该文梳理了中国地理学在20世纪初期的发展情况，其中对人文地理、历史地理学、方志学都有专节探讨。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文献特刊》。

编印此刊的目的是作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十周年纪念”，收录陈垣《记吕晚村子孙》、孟森《史与史料》、余嘉锡《书册制度考补》等13篇文章。

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系作者在《音乐的文学小史》（泰东书局1925年出版）基础上增补而来，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考察文学与音乐关系的著作。

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作为《国风》第7卷第3号专号由南京钟山书局出版。

苏渊雷《易学会通》由世界书局出版。

卢绍稷《中国近百年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11月

1日 《食货》半月刊推出“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专号之二”。

此专号刊载了莫非斯《中国社会史分期之商榷》、李立中《试谈谈中

国社会史上的一个“谜”》、陶希圣《战国之清代社会史略说》、张家驹《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等文。

10日　张寿镛在《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3期发表《慈湖著述考》。

第4期连载。

16日　《食货》第2卷第12期刊载（美）约克曼著、连士升译《经济史的重要性》。

此文认为，要先充分研究过去的经济史，才有判断现代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经济史研究须归纳法和演绎法并行不悖。

同期还刊载了高耘晖《鲁国的“一生一及”承继制度》、鞠清远《两晋南北朝的客、门生、故吏、义附、部曲》、曾了若《杜佑的经济学说》、陶希圣《满族未入关前的俘虏与降人》等文。

黄文弼在《禹贡》第4卷第6期发表《由考古上所见到的新疆在文化上之地位》。

作者认为新疆的文化主要可能是受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形成，比较大的事件有亚历山大东征和张骞通西域等。从古迹及考古学家发现的物品来看，新疆文化主要有佛教美术、语言文字等。1936年，作者又发表《新疆考古之发现与古代西域文化之关系》（《蒙藏旬刊》第120期）。

同期还刊载了张了且《历代黄河在豫泛滥纪要》、顾廷龙《华夷图跋》、孙海波《世本居篇合辑》等文。

是月　南京正中书局开始出版“史地丛刊”。

该丛刊收录的论著主要有：洪涤尘《亚洲各国史地大纲》（1935年11月）、宋希庠《中国历代劝农考》（1936年5月）、董允辉《中国正史编纂法》（1936年10月）、田鹏《中俄邦交之研究》（1937年6月）、吴宣易《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1941年6月）、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1943年7月）等。

吴铎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2期发表《川盐官运之始末》。

文章对清代四川食盐在光绪初年改行官运的背景、原因、实施的经过、获得的效果等“逐一加以研讨”，“以求对于川省官运商销制度的利害得失，得一比较真切的认识”。

王绳祖在《金陵学报》第5卷第2期发表《欧洲国际关系1871—1914》。

国立北平图书馆索引组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出版。

宋文炳《中国民族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章太炎《经学略说》上下册由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出版。

（美）乌格鹏著、费孝通、王同惠译《社会变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苏）波克洛夫斯基编、卢哲夫译《世界原始社会史》由辛垦书店出版。

12 月

1 日　陶希圣在《食货》第3卷第1期发表《疑古与释古》。

作者对疑古与释古两派都提出批评。他说："近来有些人对于疑古的工作发生反感。他们一反疑古者怀疑古史的态度，把古史的记载随意的使用。例如说尧舜时代是封建社会，殷商时代对父行三年之丧之类，都是随意使用《尚书》的结果。这种对于疑古运动的反动，是由于释古的风气盛行起来了。疑古家不信一切古史记载，释古家会用种种方法，把古史上的神话传说，都解释成史实，并把汉儒伪作的古史，解释成史实。依我的意见，单纯的疑古固然也有不能做到的事情，也有疑得过分的处所；单纯的释古更是不妥当的。……单纯释古者往往把古代社会估得太高。""在疑古家的眼里，古史很短。单纯的释古家，跟随了旧日的古史家的踪迹，又把古史向前拉，拉的很长。"

同期还刊载了西摩勒尔著、连士升译《由城市经济到领域经济的发达》，内田直作著、王怀中译《明代的朝贡贸易制度》等文。

10 日　吕思勉在《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5期发表《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

第6—10期、第5卷第1—4期连载。此文是吕思勉在光华大学的讲义，后单独成书。

同期还刊载了章太炎《论经史儒之分合》，张寿镛《定川言行汇考》（第6期连载），钱基博《周秦诸子聚讼记疏证》，万伯先《玉策时代考》，吕思勉《论中国户口册籍之法》、《丛书与类书》，姚步康《太平天国史料偶记——李秀成供状校录》等文。

16日　王日蔚在《禹贡》第4卷第8期发表《契丹与回鹘关系考》。

作者认为“回鹘盛时，契丹为其臣属；西徙后，回鹘之一部臣于契丹；至黑契丹（西辽）兴于葱岭西，于是回鹘乃尽臣于契丹”。

同期还刊载了于省吾《泗滨浮磬考》、刘德岑《秦晋开拓与陆浑东迁》、赵九成《河南林县沿革考》、黎光明《〈中国地方志综录〉质疑》等文。

是月　国学整理社编辑的“诸子集成”8册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第1册为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清焦循《孟子正义》；第2册为清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册为清魏源《老子本义》，晋王弼注、唐陆德明音义《老子道德经》，清王先谦《庄子集解》，清郭庆藩《庄子集释》，晋张湛注《列子》；第4册为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第5册为梁启超《管子评传》，清戴望《管子校正》，麦孟华《商君评传》，清严万里校《商君书》，清钱照祚校注辑佚《慎子》，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6册为宋吉天保辑、清孙星衍、吴人骥校《孙子十家注》，清孙星衍校《吴子》，清钱熙祚校《尹文子》，清毕沅辑校《吕氏春秋》；第7册为汉刘安著、汉高诱注《淮南子》，汉陆贾《新语》，汉杨雄著、晋李轨注《扬子法言》，汉王充《论衡》，汉荀悦著、明黄省曾注《申鉴》；第8册为汉桓宽《盐铁论》，汉王符《潜夫论》，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宋刘义庆著、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以年为经，以人为纬，分年考订，上自孔子，下迄李斯，“凡先秦诸子，不论显晦，无不网罗”。是书主要成就在于对《史记·六国年表》的错误进行了集中清理，对战国史事、人物进行了精密考证。其不仅全盘考论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源流与生卒年代，同时也澄清了战国史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燕京学报》书评所云：“此书不仅为治诸子学者所必备，凡探讨战国史实者，允宜人手一编也。”

顾颉刚曾向“清华丛书”推荐此稿，然而审查未获通过，钱穆回忆说：“列席审查者三人，一芝生，主张此书当改变体裁便人阅读。一陈寅恪，私告人，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闻者乃以告余。又一人，则已忘之。”后来顾颉刚读此书时，谓“宾四之诸子系年作得非常精练，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又说：“钱

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虽名为先秦诸子的年代作考辨，而其中对古本《竹书纪年》的研究，于战国史的贡献特大。”余英时也称：“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则为诸子学与战国史开一新纪元，贡献之大与涉及方面之广尤为考证史上所仅见。根据古本《竹书纪年》改订《史记》之失更是久为学界所激赏。”

1956 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再版，增订了 20 条，约 3 万余言，占原书篇幅的十分之一。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分为方志的意义及范围、方志在学术上之位置、方志之收藏与整理、方志之撰述等八章。傅振伦认为方志“为记述一域地理及史事之书”，具有记事周细完备、亲切可信、材料平民化等优点，但也具备因袭模拟、拼凑琐碎等通病。傅振伦主张编纂“方志汇目及统计表”、篇目索引、提要等，以方便利用。

郑鹤声《历史教学旨趣之改造》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

作者提出历史教学中应注重培养民族意识，恢复民族自信力。国史编撰及教学的旨趣，“当弃以汉族为中心之小民族主义，而提倡整个中华民族之大民族主义，俾全国人民逐渐养成大一统之观感，共同其利害之关系。如是则金瓯虽缺，意识犹定，纵形式或灭亡分裂，而精神则永久团结一致，长其抵抗，失土未始不可以恢复”。反之，则亲者痛仇者快，祸且不可言矣。

劳榦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5 本第 2 分发表《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和《两汉郡国面积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

葛剑雄、华林甫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一文中指出，劳榦这两篇论文，“首次对两汉人口的地理分布做了简要的论述，并推算出了两汉期间两个年代各郡国的面积，编绘出了人口密度图表。在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方面，劳氏也起了开创的作用，尽管他的论文还不是一项完整的历史人口地理研究成果，同时或此后的一些论著没有超出劳氏的方法和研究范围”。

此分册还刊载陈寅恪《武曌与佛教》、《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考辨》，徐中舒《古代灌溉工程原起考》等文。

吕思勉在《光华大学半月刊》第 4 卷第 5 期发表《丛书与类书》。

作者认为：“考据之学，有其利亦有其蔽；实事求是，其利也。眼光局促，思想拘滞，其蔽也。学问固贵证实，亦须重理想。”他同时还具体分析说：“凡研究学术，不循他人之途辙，变更方向自有发明，为上乘。

此时势所造，非可强求。循时会之所趋，联接多数事实，发明精确定理者，为中乘。若仅以普通眼光，搜集普通材料，求得普通结论者，则下乘矣。此恒人所能也。”由此出发，他进一步反思：“近日之学风，颇视此等下乘工作为上乘，误会研究学问不过如此，则误矣！章太炎氏二十年前演讲，曾谓中国学术坏于考据，拘泥事实，心思太不空灵，学术进步受其阻碍。此说，予当时不甚谓然。今日思之，确有至理。一切学问，有证据者未必尽是，无证据者未必尽非。非无证据，乃其证据猝不可得耳。此等处，心思要灵，眼光要远，方能辨别是非，开拓境界。”

周一良在《燕京学报》第18期发表《魏收之史学》。

此文是作者的学年论文，从“魏收之为人”、“今本《魏书》”、《魏书》的“取材”、“体例与书法”、“事实与论断”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为魏收辩污。作者后来回忆说，此文是其“关于魏晋南北朝史著作的开始”。

同期还刊载了许地山《大中磬刻文时代考》，容庚《唐大中铜磬流传考》，顾立雅《释天》，容肇祖《记正德本〈朱子实记〉并说〈朱子年谱〉的本子》、《月令的来源考》，石兆原《元杂剧里的八仙故事与元杂剧体例》等文。

商务印书馆开始辑印“丛书集成”初编。

由张元济主持，预计选丛书百部约6000种古籍，分装4000册。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实际只出版了3467种，其余部分至九十年代由中华书局出齐。

陈中凡在《考古社刊》第3期发表《研究中国艺术史计划》。

作者认为艺术史是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艺术史应该包括装饰艺术、描写艺术、雕刻、绘画、建筑、音乐及戏曲等。

同期还刊载了陈竟明《卅五年来的甲骨学》、孙海波《卜辞文字小记》、许敬参《铁云藏龟释文补正》、杨寿祺《石鼓时代研究》、罗君惕《秦刻十碣时代考》、邵子风《哭噩同源考》、罗福颐《春秋简书刊误校补》等文。

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由北平成达师范出版部刊印。

此书是全面研究回教及回教徒在中国的历史的较早著作之一，也是回教史研究领域影响较大的一部著作，书中探讨的一些问题为后来者提供了不少启示。

王重民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6号发表《金山国坠

事零拾》。

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章太炎《诸子略说》、《史学略说》由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出版。

赵景深《中国文学史新编》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是年

吴廷燮《历代方镇年表》56 卷由辽海书社刊行。

该书包括汉季方镇年表、三国方镇年表各 1 卷，晋方镇年表 3 卷，宋、齐、梁、陈方镇年表各 1 卷，元魏方镇年表 2 卷，东魏、西魏、北齐、周、隋方镇年表各 1 卷，唐方镇年表 8 卷，五季方镇年表 2 卷，北宋方镇年表 4 卷，南宋制抚年表 2 卷，辽方镇年表 1 卷，金方镇年表 1 卷，元行省丞相平章年表 2 卷，明督抚年表 10 卷，清疆帅年表 10 卷。

作者在《叙录》中说："一县之大，乡镇所积；一国之大，州省所积。州省皆理，一国斯理；州省皆亡，国将焉丽？求厥根本，端在用人，治乱兴替，罔不由之。爰于弱冠从事于斯，迨乎白首，编次粗竟。"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出版。

作者在此书中提出建立"科学的文字学"的主张，主要是探讨考释文字的科学方法，批判了叶玉森等人那种"看图识字"的方法，他认为仅仅从字形出发来随意地解释古文字，对于古文字的考释会产生不良影响。

胡适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5 本第 3 分发表《楞伽宗考》。

作者认为道宣在七世纪撰写的《续僧传》里关于楞伽宗的史料"是最可靠的记载"，不仅可以让我们考订楞伽宗的"早期信史"，还可以"使我们用他的记载来和八世纪以后伪造的史迹相参证比较，考证出后来种种作伪的痕迹来，同时从头建造起一段可信的中国禅学史来"。该文将道宣的《续高僧传》和"近年敦煌出现的古写本，和日本保存的古写本"等文献结合，考证梳理了楞伽宗的历史。

日本学者柳田圣山认为，该文是"胡适初期禅宗史研究论文的骨干，他不仅贯彻主张，而且满怀信心。这已经达到了胡适禅学论证的最高峰，为近代禅宗史的研究历史，带进了划期的新时代"。

胡适此后又撰写了多篇禅宗史研究论著，并引发了与铃木大拙的论争，尽管此后一些研究者认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上不免失之武断，但大都承认《楞伽宗考》等文的开创之功。

郭宝钧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5 本第 3 分发表《戈戟余论》。

该文利用新出土的文物，对程瑶田等前人关于戈和戟的研究提出订正，列出戈戟的演化轨迹，是古器物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但是也有研究者指出，由于资料有限，郭氏对戈戟的分期还不够明细。

陈述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5 本第 3 分发表《金史氏族表初稿》。

第 4 分连载。此文仿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之例，广集辽金元史和当时碑志、诗文等史料中有关金代氏族的史实，按族系谱，是研究金史的重要工具书。

岑仲勉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5 本第 4 分发表《蒙古史札记》。

该文内容有“太祖定都和林说”、“太宗蕃封”、“太子”、“阿里马城”、“定宗征把秃”、“乃颜与朵颜卫”、“孛罗丞相”、“枢密副使孛罗”、“拉施特修史时期”、“仁宗朝使西域者”、“事俄非久安计” 十一项。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将此文视为岑仲勉在蒙古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之一。

同期还刊载了罗常培《通志七音略研究》、王静如《就元秘史译文所见之中国人称代名词》等文。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社会研究所主任魏特夫来华在北平进行研究，与中国学者展开合作。

其主要课题有二：一是国际社会研究所资助的中国家族调查。魏氏首先在北京协和医院社会事业部几位中国助手的协助下展开调查，接着又在燕京和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董家遵等的帮助下，对福州、广州附近的家族进行实地调查。在进一步的大规模问卷调查中，至少有燕京、清华等 16 所中国大学提供支持。二是太平洋问题调查会资助的中国历史计划。魏氏先由临时助手王毓铨召集和指导一批历史系学生，从历代官员传记中搜集与科举制有关的资料。此后，魏特夫又聘请 17 位历史、经济、社会经济史专家（包括赵丰田、姚家积、梁愈、鞠清远、武仙卿、连士升、曾謇、吴景超、冯家昇），分期将中国正史中有关社会经济的纪事文字摘录并英译注释出版，同时进行研究。

此外，陶希圣和邓之诚给予魏特夫的帮助最大。陶氏时常与之过从，助其搜罗资料，并有所讨论。邓之诚则为其解释字义，并推荐合作者。顾颉刚曾与之商讨古史。冀朝鼎也与魏特夫有所交往，并翻译了其《中国经

济史的基础和阶段》一文（载《食货》第 5 卷第 3 期）。

1937 年调查研究结束，魏特夫回国出版《中国社会新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调查》。

汤用彤在《国学季刊》第 5 卷第 1 号发表《读太平经书所见》。

作者借助文献考证的方法，对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与《太平经钞》的关系、《太平经》的版本、真伪与道教及佛教的早期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同期还刊载了马叙伦《读金器刻识》、周祖谟《〈说文解字〉之传本》等文。

孟森在《国学季刊》第 5 卷第 1 号发表《清代堂子所祀邓将军考》。

作者在文中提出清代皇室祭拜神灵的重要地点——堂子，所祭的主神是明代成化年间定辽前卫指挥使邓佐的观点，引起学界关注和争论。后来有学者认为，孟森由于萨满教知识缺乏，故该观点虽有一定道理，却不免附会。

姚从吾在《国学季刊》第 5 卷第 1 号发表《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

作者认为阿保机建国时代热河辽宁一代的"汉城"是由汉人聚居的城寨而得名，完全保持关内"汉城"的特点：就建筑说，"中国风的建筑，应有尽有"；就市容及市的组织来说，有中心区，有南北街，且汉城的位置"普通都在城的南面"；就居民来说，东京"汉城"的居民大多是河朔亡命，西楼"汉城"的居民则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作者还指出，从"汉城"的一些情况来看，当时热河各城，住民种杂，"聚族别居"情况比较通行，并认为这种"聚族别居"在世界各地皆有存在。文章还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原因探索，认为契丹境内之所以有大量"汉城"，主要原因之一是"阿保机和他的部族想利用汉人"。

郭斌佳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 4 卷第 3 号发表《民国二次革命史》。

第 4 号连载。该文是较早研究国民党二次革命的论著之一，对二次革命的爆发、过程等均有所梳理。

同期还刊载了范寿康《孔子思想的分析与批评》等文。

柯劭忞《新元史考证》由北京大学文史部出版。

1936 年

※ 中华书局开始出版《饮冰室合集》。
※ 顾颉刚、杨向奎《三皇考》出版。
※ 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出版。
※ 鞠清远、陶希圣《唐代经济史》出版。
※ 禹贡学会成立。
※ 梁方仲发表《一条鞭法》。
※ 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中国文化史丛书”。
※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出版。
※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出版。
※ 顾颉刚、陶希圣等代表中国方面与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哈罗·田波烈在北京饭店进行会谈。

1 月

1 日 顾颉刚为学会募款事作《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

此文既是一篇有价值的学术论作，也是一篇庄严的爱国宣言。全文分创办缘起、百年来中国之边疆学、百年来外人对于我国之调查研究工作、近年日本学者之中国研究、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本会研究边疆之计划、本会会员之可任边疆研究工作者等方面论述。

作者云：“本会之研究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计划，已具载于《募集基金启》中，兹不赘。此致用方面，事关国家大计，而强敌虎眈于前，奸人鼠伺于后，不便公开，故密为陈说。”顾颉刚改变了此前他所坚持的“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的治史旨趣，提出了所学必求所用的口号，并把是否有用作为评定学术“价值之高下”的尺度。他指出：当承平之世，学术不急于求用，“及至国势凌夷，跼天蹐地之日，所学必求致用，非但以供当前之因应而已”。

5 日　郭沫若在北平燕京大学国文学会《文学年报》第 2 期发表《答马伯乐先生》。

郭氏感谢法国东方学家马伯乐在《郭沫若近著两种》一文中对《甲骨文字研究》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两书的称许与批评，并说某些意见“目前尚碍难表示同意”，为此进一步申述自己的看法。后收入《郭沫若全集》时，改题为《答马伯乐教授》。

12 日　浙江中华史地会在杭州正式成立。

12 月 27 日改名浙江史地学会。发起人为陈训慈，主要成员有王孟恕、李絜非、顾谷宜、董世桢、胡健中、苏毓棻、陈贻荪、刘文翩、蒋君章、陈豪楚、何敬煌、范晓江等。会员多系浙江各地史地教员，初仅四十余人，后发展至七八十人。

学会标举“研究史地，阐扬民族精神”的宗旨，提倡“一、努力于民族本位的史的研究，二、增进中小学史地教学之改进，三、普及史地智识以贯注于一般民众，四、希望以此推进本省学术研究之风气，以与建设事业同其迈进”。其活动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

16 日　鞠清远在《食货》第 3 卷第 4 期发表《三国时代的“客”》。

此文对三国时代“客”的名称、构成、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作者归纳出“客”的四种构成形式：一是出现较早的宾客，因与主人有一定的依附与役属关系，地位渐趋衰落；二是人民为避役投靠贵族为客或佃客，贵族亦主动招募佃客，国家也招募贫民为屯田客，或强迫人民为屯田客；三是国家赐正式的编户为贵族的客；四是奴隶上升为客。

同期还刊载了何兹全《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陶希圣《齐民要术里田园的商品生产》等文。

顾颉刚在《禹贡》第 4 卷第 10 期发表给王毓铨的回信，强调《禹贡》的工作是“收集材料”。

针对王毓铨关于应该加强地理学与史学关系、地理学研究方法问题的意见，顾颉刚回复到，“我们这个刊物，专事收集材料，没有什么理论，实在是一个缺点。别人我不知，就我自己而论，对于这种缺点是知道的，是承认的，是希望改进的”；并指出“伟大的理论决不是不负责任的谈话，必须有事实的基础，这基础就是够干燥的。使用统计表来说话的人固然舒服，而编制统计表的人则何等沉闷？倘使大家不肯沉潜于这种机械的工作，专喜欢发大议论，则既没有事实的基础，只有相率作策论八股；学问到了这步田地，还有什么意味”？“我们不是不要理论”，“我们现在的机

械工作为的是适合事实”，“我们将来的成就是要创造理论”，如果“我们这班人也许因为机械的工作做得太久了，此生此世更无建设理论的希望，可是只要我们留下来的是货真价实的东西，也就足以供给将来理论家的采取”。

同期还刊载了姚大荣《禹贡雍州规制要指》、王日蔚《与陈援庵先生论回纥回回等名称》、于鹤年《纂修〈河北通志〉闻见录》（第5卷第10期连载）等文。

25日　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

该会发表了马叙伦、张申府、吴承仕等249位学者签名的《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宣言》，号召全民起来抵抗侵略、救护国家、收复失地、争取自由。

是月　中华书局开始出版《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友人林志均在梁氏去世后受任公“知友在北平者”嘱托编定此书。林志均将收入“合集”的著作分为“文集”和“专集”两大类，“文集”收录了政论、散文、诗词、题跋、寿序、祭文、墓志铭等短篇文论，“专集”收录学术著作及门人笔记等大部头论著。所收论著以编年为顺序排列，全书“据初印旧本覆校，其有手稿者则悉依原稿校定”。该文集可以说是文集编纂的典范，不仅收录相当完备，将已印行的文字全部收入，还辑入了未印行的文稿，刊载“残稿存目”，为“梁启超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1936年1月先出版了“文集”16册，该年4月又出版“专集”24册，1941年中华书局再版该“合集”，1989年中华书局又据1936年版影印。由于“合集”未能将梁启超的论著收罗无遗，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夏晓虹辑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三大册。

顾颉刚、杨向奎合著《三皇考》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1929年顾颉刚在燕京大学讲授“中国上古史研究”课程，编写《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其中的“三皇”部分到1932年夏“增改一过，分出章节”。1933年由杨向奎续写，主要增加由《道藏》材料补充的“太一”等内容。1934年春完稿。

“引言”云：“三皇是战国末的时势造成功的，至秦而见于政府的文告，至汉而成为国家的宗教。他们是介于神与人之间的人物，自初有此说时直至纬书，此义未尝改变。自王莽们厕三皇于经（《周礼》）和传（《左传》），他们的名称始确立了……我们是要把他们从古史里清出去，清到宗教里去。”

全文共29节，搜罗宏富，旁征博引，先考证皇字之原义、名词皇字之出现、皇之由神化人、皇为人王位号之实现等。次述太一勃兴及西汉时三皇与太一之消长、伏羲等与三皇之家之纠纷、盘古之出现与三皇时代之移后等。末述近代对三皇之祭祀与信仰等，还将道家中之三皇与太一之材料作系统说明。

文章梳理辨析“三皇”名号的来源和演变，且一并解决了“太一”的问题。作者坚持经今文学的观点，认为战国时代出于托古改制的政治需要，将宗教的传说变成真实的历史，三皇五帝的历史系统由此确立起来。由于三皇五帝向被视为中华民族历史的源头，此文关于“三皇”传说的考辨，对以往的中国上古史系统产生了极强的颠覆作用。

（亚美尼亚）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部以法文撰写的巨作，参用大量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史料，不仅对蒙古民族在中亚西亚及欧洲的活动史实做出了详细叙述，也为《元史》等传统载籍的研究和运用，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源，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陈寅恪在《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发表《桃花源记旁证》。

作者认为《桃花源记》是“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实际的桃花源“本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但以牵连混合刘驎之入衡山采药事之故，不得不移之于南方之武陵”，桃花源人所避的是苻秦而非嬴秦。陈氏据《桃花源记》一文，引出魏晋时期的坞堡的问题，引起学界关注。劳榦称此“为一个历史上不朽的发现”。

浦江清在《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发表《八仙考》。

作者对“八仙”的来源、内容等进行考证，认为“八仙”一词本是道家的空泛观念，可追溯到东汉，后来所谓的“八仙的组成与真正的道教的关系很浅”，真正起源可能是佛教绘画，而八人的会合“约略于宋元之际”等。

此文是相关领域的权威之作，后有白化文、李鼎霞作《读〈八仙考〉后记》（载王元化《学术集林》卷10，1997年），周晓薇作《八仙考补》（载《中国典籍与中国文化论丛》第4辑，1997年）等。

吴晗在《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发表《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

作者认为到了民初，中国同南洋的海上贸易已有千年经验，“航舶往

来，直同内地，政府极力鼓励国际贸易，商人极力向外发展，中国在政治上为诸国宗主，在文化上为诸国先驱，到明初更极意经营，郑和七下西洋，兵威远届，中国在南洋的势力遂达顶点”。

该文中提出的郑和七下南洋最大的使命在于“经营国际贸易”的观点引起了学界对郑和下西洋性质的讨论。在吴晗观点发表后，许道龄迅即发表文字对郑和下西洋的性质予以商榷（《禹贡》第5卷第1期），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帝位”，此后，吴晗、李晋华、童书业等人以《禹贡》为阵地，展开了相关探讨。在1949年之后，仍不断有学者探讨这一问题。

贺昌群在《中学生》第61期发表《历史学的新途径》。

作者简要分析了中国历史学发展过程而且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比如他指出“宋明人的历史学，虽能具批评的眼光，较前代进步一层，但那立场是建筑在沙上的”；清人“治史是为穷经”，存在“在各方面都不能显示出一部整个的文化史的线索来”的大缺陷；新时代的学人不仅掌握了清代学人见不到的史料，还具备了他们所没有知识和观念，因此对历史的新看法、新解释都是清人“不可同日而语的”；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上，在“材料的安排和组织”方面，现代史学“必把那个题目所包涵的内容，系统地、一层层地全盘显示出来，在文化史上有一贯的描述，有多方面的解释，不菲弃议论，因为我们可以考证充实之，故言之而信；不单凭考证，因为我们可以使考证不至于支离破碎，在文化史上有一个完形的‘统体’”。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从1928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起，作者便着手编写此书，先后在上海和南京各校讲授此课程达三四十次，历经近八年的修改，终于在1936年付梓。

此书十编，论述了中国经济思想的性质，中国经济思想史在世界经济思想史所占之地位，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一、胚胎时期（自原始至秦末）——上古经济思想史；二、实施时期（自汉初至明末）——中世经济思想史；三、发展时期（自清初至当时）——近代经济思想史。全书以著者对经济思想史的潮流理解为主线，梳理了儒、道、墨、法、农诸家经济思想的大致脉络。

本书是中国第一部用西方近代研究方法撰写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专著，目的主旨在于“研究我国经济思想与制度之史的发展”以助“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萧公权称此书具有资料丰富、与西洋学说“比附”明

晰、条理分明等优点。此书后多次再版。

王瑛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 年春季号发表《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

文章探讨了太平天国前各省土地集中的程度、“土地生产的商品化”、“农民的贫困与离村”等问题。作者认为“土地私有原为商品生产及土地生产商品化的基本条件”，但在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由于种种原因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力的发展一与生产关系相冲突，随着新旧社会的交替，阶级斗争爆发了！这是太平革命爆发的原因”。

同期还刊载了储玉坤《中国宪政史及最近宪法草案的精神》、赵连福《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制度之沿革及其当前问题之商榷》、杜畏之《战国时期军事之研究》、千家驹《鸦片战争后的国民生计问题》、姚宝贤《佛教入中国后之变迁及其特质》等文。

陈啸江《三国经济史》由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出版。

此书 8 万余字，重点研究三国时代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关系，考察当时变乱的时代背景、农业生产状况和屯田制度、人口移徙与回归、商业贸易、社会财富的分配、人民生活与徭役、政府财政与经济政策等。卷末附录《魏晋时代之“族”》一文。

陈安仁《中国近世文化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由于作者采取较为宽泛的“文化”定义，故该书虽然是文化史，但内容包括“政治社会”、“社会风俗”、“家族制度”、“农业”、“税制”、“商业”、“交通”、“币制”、“管制”、“军制”、“法制”、“宗教”、“美术”、“教育”、“学术”、“理学”、“文学”等。

孟森在《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 7 卷第 1 期发表《汉书古今人物通检》。

上海大光书局编辑出版《中国历代艺文志》（又名《中国历代图书大辞典》）。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邓元鼎、王墨君《宋元学案人名索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日）田畸仁义著、王学文译《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及制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姚舜钦《秦汉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顾康伯编《西洋文化史大纲》由中华书局出版。

2月

1日　刘兴唐在《食货》第3卷第5期发表《疑古与释古的申说》。

刘兴唐读陶希圣的《疑古与释古》一文后，撰文做进一步的批评。他认为陶希圣只指出两派的错误，却未说明致误之因。刘兴唐指出两派的共同错误在于缺乏正确的方法论指导。他说："疑古家的错误，是由于没有正确的方法论之把握，对古代神话的传说不能应用。"原始的历史记载"看起来好像后来人的层累造伪，疑古家对此便只有束手无策。单纯释古家的错误，显然的也不外乎是方法论的错误把握。他们只听说科学的方法是在于释古，可是究竟古应该怎样去释，他们丝毫也没有懂得。""在我看来，疑古家之所以把中国历史缩短的，是指示出实证主义者方法论之不通。释古家之错误，因为他只是道听而途说的科学方法论者之狂徒。"刘兴唐还认为，陶氏只提出疑古与释古并用，却未指明具体应用之法。历史家的任务，"是要脱去古史上一切的神秘外衣，他并不是见到伪史料，便一脚踢开"。他们"是把历史上早早晚晚的神话传说，都当作可贵的史料看待"。

同期还刊载了李立中《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辩》，易曼晖《唐代农耕的灌溉作用》，黄现璠、陶希圣《北宋亡后北方的义军》，王毓铨《清末田赋与农民》等文。

佘贻泽在《禹贡》第4卷第11期发表《明代之土司制度》。

文章考察了明代土司制度的起原、土司的等级与俸给、土司的承袭、土司的征调、明代对于土司的"征剿策略"等。本文是明代土司制度研究及明政府与西南边疆各族关系研究领域较早的成果之一。作者在《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5期又发表《清代之土司制度》一文。

同期还刊载了刘掞黎《晋惠帝时代汉族之流徙》、陶元珍《两汉之际北部汉族南迁考》等文。

16日　王辑五在《禹贡》第4卷第12期发表《日本民族考》。

作者根据日本文献的相关记载和神话传说等，对日本民族的起源进行了推测，认为日本民族可能是由从西部亚洲到日本东北部的阿夷奴人、从西伯利亚到日本北部的通古斯系人、从南亚漂流至九州的南洋系人及东渡日本的汉人混合而成。

同期还刊载了陈隽如《长芦都转考》、郭敬辉《大清河流域之地理考

察》等文。

是月　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起自1516年，终于1941年，每年分“阳历”、“阴历”、“星期”、“干支”四项，按日对应，便于互查。书前专门分中国年号、日本年号、朝鲜年号、干支纪年、西历纪元诸项制作《近世中外年号纪元对照表》；书末附有《太平新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表》，也便于查对日本、朝鲜、太平天国时期的历日。郑鹤声之所以将1516年作为此书起点，是由于该年葡萄牙人拉费尔·佩雷斯特罗（Rafael Perestrello）附帆来华，自此以后，“海航大通，欧美文明，骤然东来，国际问题，因之丛生，所有活动，几无不与世界各国发生关系者。中西史日之对照，较之上古中古，其用更繁”。

《燕京学报》认为“近年中国学术界趋势，颇致力于参考书或工具书之编纂，其成就最大而最多者，莫过于年代方面之工具书”，而此书即最新成果之一。1980年中华书局在《重印说明》中说：“本书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其内容较为详备，为研究清史及近代史必备的工具书，现已很难买到。兹商得编者郑鹤声教授和商务印书馆的同意，转由我局出版，以供读者之需。”该书至今仍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必备的工具书。

周予同在《暨南学报》第1卷第1号发表《纬谶中的“皇”与“帝”》，提出近世史学四派说。

作者认为，年来国内治中国古史的，大概可归为“泥古”、“疑古”、“考古”、“释古”四派。泥古一派，囿于旧说，除非别有用心，不足与谈学术。其余三派，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疑古失于臆断，释古流于比附。考古本治史大道，但也苦于狭窄，并不是每一学人所能从事。他主张，疑古和释古都应该有先驱的工作，考古也应该有辅助的工作。这工作便是将中国旧有的神话、传说和旧史作一度分期的研究，看中国的历史是怎样积层地造成的。这样，疑古派的辨伪的争论，和释古派的社会决定的争论，都可以省下一部分无谓的浪费的气力，而考古派也正可以依据地下的遗物和纸上的分析工作相呼应。

（日）青木正儿著、王古鲁译《中国近世戏曲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3年3月北新书局曾出版由郑震据此书译撰的《中国近代戏曲史》，与原书出入较大。

清张廷玉等著、印鸾章修订《明鉴纲目》由上海国学整理社

出版。

程金造在《国立图书馆馆刊》第10卷第1号发表《史记索引书考略》。

第2、3号连载。

3月

1日　李漱芳在《禹贡》第5卷第1期发表《明代边墙沿革考略》。

文章内容有“明成化以前修边事略”、“余子俊创筑边墙事略”、“正德、嘉靖间修筑边墙事略”、“万历间修筑边墙事略”等。

同期还刊载了吴梧轩《南人与北人》、于省吾《〈周颂〉“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解》、丁稼民《维县疆域沿革》等文。

5日　南京《中央日报·史学》周刊创办。

该周刊由以吴晗、汤象龙为首的史学研究会承办。

其《发刊词》声明：“一年来国事愈加迫切，使我们感到史学研究更应积极与种种实际问题紧接。因为目前一切现象的形成和问题的发生，都是由于过去多少年的错误堆积而来的。人们欲求这些现象和问题的解决，无论是全部的或部分的，大家总不能忽视或离开目前现象和问题所由成的过去事实。简单说，我们此后的研究要尽量的与种种民族社会问题打成一片。”

本刊的首篇文章是汤象龙的《清初的经济政策》，前面编者所加的按语指出：“本刊发刊目的是为着要研究过去的事实与目前的问题打成一片，企图从过去认识现在，并且解决现在。由于题材的关系，我们不能要求每篇文章都能够这样做，但选稿的标准，总是朝着这方向做去。”此后发表的若干文章，如谷霁光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之户籍与赋税》、吴晗的《明初卫所制度之崩溃》、罗尔纲的《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失败的原因》、朱庆永的《晚明财政的败坏》等虽然都不失其学术性，但渗透出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

《逸经》文史半月刊在上海创办。

该刊由简又文出资创办，并任杂志社社长，谢兴尧主编（从第22期以后改由陆丹林主编），其宗旨是“供给一般读者们以高尚雅洁而兴趣浓厚，同时既可消闲复能益智的读品，并贡献于研究史学及社会科学者以翔实可靠的参考资料”。栏目有史实、游记、书评、人物志、诗歌、秘闻、

考古、纪事、特写、小说等。本刊内容多为文史资料及文史掌故之类的文章，偏重近代，有关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者尤多。

从撰稿人的构成看，这本杂志汇聚了一批“或性耽文史，或雅好艺术，或嗜求古物，或喜网罗旧闻，或则研究风俗民情，或则专访中外时事”的专家。除杂志社编辑外，还有周作人、俞平伯、叶恭绰、柳亚子、冯自由、谢国桢、许钦文、林语堂、徐一士、瞿兑之、陈子展、谢冰莹、刘成禺、郁达夫、徐中玉、金梁、老舍、王个簃、萧一山、董作宾、冯玉祥等。有已成名的学者，有前清故旧，有新进作家。他们或熟悉史籍掌故，或通晓西文逸事，使杂志在“文”和“史”两方面互相辉映。

《逸经》影响颇大，远及英伦，到 1937 年 8 月 5 日出至第 35 期后停刊。

18 日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进行第 13 次发掘。

此次发掘由郭宝钧主持，参加者有石璋如、王湘、高去寻等。此次发掘 6 月 24 日结束，开始实施全面的“平翻”计划，使地下的迹象一目了然。这次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储藏甲骨的圆形坑，获龟甲 17088 片、牛骨 8 片以及很多用朱墨书写的文字。

21 日　谷霁光在《禹贡》第 5 卷第 2 期发表《三国鼎峙与南北朝分立》。

作者认为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长达 403 年的分裂原因，有很多种解释，“有着眼于社会经济的，也有着眼于政治或文化的。权衡轻重，当以社会经济说比较具体，比较有力量。不过从社会经济立论，也不能忽视社会的地理基础。特别是此时期之政治现象，包涵社会问题，种族问题，文化问题，如果从地理方面作解答，反而容易明了”，并指出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分裂之更替，南北竞争与兼并等现象，“似乎都可以从地理方面得到一种可能的解答”，“这是研究历史地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此文就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为例，进行了分析。

同期还刊载了黄文弼《罗布淖尔水道之变迁》、童书业《盟津补证》等文。

是月　中山文化教育馆主编的“中山文库”开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文库主要是翻译外国学术论著，史学类书籍主要有黄忏华《印度哲学史纲》（1936 年 4 月），（美）鲍茄德斯著、徐卓英等译《社会思想史》（1936 年 5 月），（美）海士著、黄嘉德译《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1936 年 4 月），（英）博克尔著、胡肇椿译《英国文化史》（1936 年 12 月），

（波兰）比亚著、汤澄波译《英国社会主义史》（1936年5月），（苏）朴利汉诺夫著、孙静工译《俄国社会思想史》（1937年5月），（苏）米汀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1936年12月，下册1938年7月），（法）马迪厄著、杨人楩译《法国革命史》（1947年1月）等。

徐中舒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1分发表《金文嘏辞释例》。

作者认为金文中“祝辞嘏辞均可通称之曰祝嘏，此省曰嘏辞”，“金文嘏辞因制器以祈福”，虽只是一方面的资料，但“在文献缺乏之春秋时代及其前期”，亦非常重要，故撰文对此类金文进行研究。文章系统地探讨了金文中的嘏辞，结合古代典籍，阐明了各种嘏辞的含义，对嘏辞的时代进行了考辨，并得出“天与祖先之观念，在殷周之世颇有隆替”；“《洪范》五福，其一曰寿，嘏辞亦以祈眉寿为最多”；古时“以善终为福”，“无不死观念”；“嘏辞为具有大众性之语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格，一地方有一地方之范式”等7条结论。

有研究者认为，该文在方法上运用文中用语来判断作品的写作年代，得出了较为正确的结论，“饮誉学界，成为研习金文者必读的著作”。

同期还刊载了李晋华《明懿文太子生母考》、俞大纲《两唐书玄宗元献皇后杨氏传考异兼论张燕公事迹》、李光涛《内阁大库残余档案内洪承畴报销册序》等。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以皮锡瑞《经学历史》“持论既偏，取材复隘，其以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谓六经皆孔子作，尤一家之私言，通人盖不能无讥焉”，而自己“生当经学放废之后，闵其斯道将丧，惧来者之无闻”，故作是书，凡“古之六经”、“孔子之六经”、“孔门之经学”、“秦火以前之经学”、“秦火以后之经学”、“两汉之经学”、“魏晋之经学”、“南北朝之经学”、“隋唐之经学”、“宋之经学”、“元明之经学”、“清之经学”凡十二篇。

该书是一部简明的中国经学通史，对历代经学盛衰、思想异同等皆有梳理，但对清代经学叙述较为简略。由于该书取材广泛而持论平易，被《中国学术史著作提要》一书认为“是经学消亡之后中国人自己创作的第一部有影响的经学通史著作”。

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研究》由新生命书局出版。

作者认为自己此书基本做到了此前“新兴史学运动”中提倡的“建立历史的社会基础”、“建立历史的科学基础”、“建立历史的实用基础”

三个原则。作者在文尾还阐述了自己对社会史论战的看法，认为第一期是“事实嵌合理论”，以理论为主；第二期是“事实修正理论”，以事实为主，“理论不过作为引导而已”；最后才是比较令人满意的“理论事实融合合一的时期”。他认为当时的“社会史论战”尚在第一期，“多空泛无际，难得圆满的结论”，所以需要更进一步。

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佚名氏编《明季稗史初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印鸾章编《清鉴纲目》由国学整理社出版。

翦伯赞在《劳动季报》第8期发表《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

王古鲁（王钟麟）自刊《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

王庸在《图书季刊》第3卷第1、2期合刊发表《明代舆图汇考》。

4月

1日 《食货》第3卷第9期刊载（美）格拉斯著、连士升译《工业发达史》。

第11期，第4卷第1、3、6、9期，第5卷第11期连载。此为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格拉斯研究经济史的代表作。

同期还刊载了张玉林《隋文帝的社会政策及其统治手段》等文。

6日 蔡元培为程演生等编辑《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撰序。

蔡元培认为此丛书“当国难严重之期，切民族自决之望，得是书以增其刺激，其于吾中国之将来，必大有影响”。

此丛书署“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实系程演生、李季等人编辑，共17辑，98种，以明清时期史料为多（如《倭变事略》、《甲申传信录》、《东南纪事》、《扬州十日记》、《崇祯长编》、《客滇述》、《虎口余生纪》、《明武宗外纪》、《三湘从事录》等），神州国光社在1936年印行，后多次再版，1982年更名为《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

《禹贡》半月刊推出“利玛窦世界地图专号”。

此专号由洪业编辑，集合同人经过近一年的准备而成，刊载了洪业《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陈观胜《利玛窦对中国地理学之贡献及其影

响》，顾颉刚、童书业《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贺昌群《汉代以后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知识之演进》，朱士嘉辑《明代四裔书目》，李晋华《方舆胜略提要》等文。

洪业《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一文引用中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等材料，梳理了利玛窦为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事略、利氏所绘地图的刊刻情况等，作者还指出，利玛窦在中国绘制的世界地图及其传播的世界地理知识，并非中国人的世界观产生多大影响。贺昌群《汉代以后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知识之演进》一文梳理了中国人从魏晋到清代的世界地理知识的演变轨迹，并指出中国古代对于世界地理知识的来源有二，一是“以想象构成”，一是“取材于曾经身历其地者之目见耳闻”。

30 日　万福增在《师大月刊》第 26 期发表《史学年表初稿》（上）。

作者希望借鉴朱彝尊《经义考》，编纂一部“隐窥历代史学消长演变之机，稍省初学披索收罗之苦”的史学年表。故此表纪年方面“首名甲子，次明帝系”；另附西历，在“断限”方面，上迄司马迁，下至清亡；在取材方面，“一以史部著述为准”，史家惟与著述有关，方选入表。此表又分三部分：上卷从公元前 145 年（汉景帝中元五年）时司马迁出生开始，至公元 845 年（唐宣宗大中八年）《唐文宗实录》修毕结束；中卷从公元 911 年薛居正出生到 1276 年元人接收图籍记注结束（第 30 期刊载）；下卷因《师大月刊》停刊而未见刊载。

同期还刊载了刘汝霖《中国禅学之方法》、孔繁信《龚自珍的经世思想》、张敬《乐府之生成考》、李彩璋《唐代商业之研究》（第 27 期连载）、洪业《历史在近代学术中之位置》、杨秀林《历史动力学说之检讨》等文。

是月　《史学集刊》创刊。

该刊由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编辑委员会负责编辑出版。编辑委员会由顾颉刚任委员长，李书华、徐炳昶、孟森、张星烺、陈垣、沈兼士、洪业等任委员。《〈史学集刊〉刊例》规定，该刊“专载关于历史考古之著作”；文体不拘文言白话，但格式一律横行，并须加新式标点；年出二期，“论文加多时得随时增刊，过长者并得刊印专号”。

该刊《发刊词》指出，由于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工作准备“趋重于整理和研究”，大量专题研究论文、专门报告及史料产生，故创设自己的学术刊物非常重要，不仅可以互相探讨，而且可以引起著作的兴趣。并指出，该刊不取宽泛的“国学”，而取“史学”，是希望“范围较一般学报为窄”，以期能将稿件集中在历史和考古的范围之内。

创刊号刊载了徐炳昶《校金完颜希尹神道碑书后》、王日蔚《唐后回鹘考》、尹尚卿《明清两代河防考略》、吴丰培《〈卫藏通志〉著者考》、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徐文珊《史记刊误举例》、白寿彝《周易本义考》等文。

朱谦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一书的评述。分序论、本论两部分，评述黑格尔历史哲学在其哲学体系中之地位，以及历史哲学的基本概念，精神史观，英雄史观，国家史观等。1934 年 12 月《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 3 卷第 2 期所刊载的朱谦之同名论文，系此书的一部分。

鞠清远、陶希圣《唐代经济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分前代的遗产与隋末之丧乱、田制与农业、水陆商路与都市之发展、财政制度等八章，大量征引史籍，阐明唐代各种经济制度的演变和经济的发展。此书虽篇幅不大，但对于经济史的许多细节问题有精湛论述，提供了后来学者讨论唐代经济问题的基本范围，包括庄田、草市、行会、色役、资课、漕运、客户、邸店、柜坊、飞钱等等。

该书被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认为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和财政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张荫麟在《清华学报》第 11 卷第 2 期发表《沈括编年事辑》。

作者认为沈括之伟大“远过其名”，故要详考其生平。该文“注重沈氏事迹编年”，至于学术“不具详”。徐规认为此文是近人全面研究沈氏生平及其贡献的启蒙之作，奠定了沈括研究的基础。

同期还刊载了杨树达《吕氏春秋拾遗》、吴晗《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等文。

吴晗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 1 卷第 3 期发表《元代之社会》。

此文与《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一起，从社会、人口等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元、明易代的原因，认为元朝的崩溃主要是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计集团内部的矛盾长期不能解决导致的结果，元朝的崩溃主要是“自然崩溃”。有研究者认为，吴晗的研究在“取材之广博，与认识之深刻”两点上，优于陶希圣、黄现璠等人，但是也存在将元代社会作静态的观察等问题。

同期还刊载了罗尔纲《洪大泉考》、赵守愚《论近代通货之特质》、浦薛凤《黑格尔之政治思想》等文。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由国民政府考选委员会出版。

该书系作者的学士论文，由邓之诚、顾颉刚指导。第一编的内容由“考试起源”、“考试动机之别面观”、“科举以前之取士法”等；第二编的内容有“唐及五代之考试制度”、“宋之考试制度”、“辽金元之考试制度”、“明清之考试制度”、“考试制度与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的关系”等内容。

该书后又台湾学生书局再版，又被收入“民国丛书”第5编。

王绳祖赴牛津大学留学，攻读世界外交史。

王绳祖在1938年完成硕士论文《马嘉里案和烟台条约》，1940年该论文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中国第一个在牛津出版学术论著的学者。此书出版后受到国际史学界的重视，被美国历史学会列为研究中国国际关系史的必读书目。

邓云特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夏季号发表《中国历史上手工业发展的特质》。

文章对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过程及生产关系进行梳理分析，认为“劳役制的工奴生产关系的支配地存在，窒塞了一切历史的进步的因素，使生产方法的任何根本变革都成为不可能，反而只有加强了旧有的生产方法的顽固性”。

同期还刊载了吕振羽《老聃派哲学思想的发展》、唐擘黄《明季清初西来天算对于清代学术的影响》、郑师许《我国民族学发达史》等文。

钱基博《经学通志》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书系作者代表作之一，旨在探求经学的生成衍变，阐释经学之含义。作者对“经”持狭义的态度，认为“六经”由来已久，不能随意增减。因作者对《易》、《书》、《诗》、《礼》、《春秋》素有钻研，故此书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堪称翔实精审，被认为是“研究中国经学的要籍”之一。

蒋维乔、杨大膺《宋明理学纲要》由中华书局出版。

钟凤年《国策勘研》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李豫曾《清鉴易知录》上下册由广益书局出版。

（美）海士著、黄嘉德译《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5月

1日　傅安华在《食货》第3卷第11期发表《商业资本主义社

会商榷》。

作者认为，“商业资本只是各种生产方法中所产生的一个社会现象”，它“不能破坏或创造任何生产方法，也不能据有特殊的生产方法作自己的基础，所以，它决不能单独构成一个社会形态”。

同期还刊载了丁道谦《商业资本主义与专制主义的透视》、王毓铨《北宋社会经济与政治》（一）、陶希圣《顺治朝的逃人及投充问题》等文。

16日　李秉衡在《食货》第3卷第12期发表《经济史学上的恩格斯》。

作者指出：“上年（1935年）8月5日是伟大的恩格斯死后40年纪念日，日俄等国出版界都有论文纪念。但我国却还没有一点纪念的表示。今特就这位伟大的理论家在经济史方面的业绩，简要记述，以供大家一点参考。”文章着重介绍了恩格斯关于历史进化的观点和对氏族社会、奴隶社会的论述。

同期还刊载了刘兴堂《里庐考》、王毓铨《北宋社会经济与政治》（二）、全汉升《清末西洋医学传入时国人所持的态度》等文。

《禹贡》第5卷第6期刊发国立北平图书馆舆图部编《历史地理论文索引》。

该索引将历史地理类研究论文分为“地理沿革”、“古地理考证”、“地方史”、“古迹、古物”、“山水考”、“地文”、“交通”、“民族与文化”、“宗教与语言”、“政治与疆界（附古都及地名考）”十类，收论文约500篇。

同期还刊载了王辑五《徐福入海求仙考》、江左文《明武宗三幸宣府大同记》等文。

21日　罗尔纲在《中央日报·史学》周刊发表《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

在这篇史论式短文中，罗尔纲做出了“清代士大夫好利”的局部性概括论断，没有像胡适要求的那样“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其中有一段论述清代士大夫好利是由于清初朝廷的有意提倡，引用了清人管同、郭嵩焘的话作为论据。

胡适阅后大为恼火，写信严厉训诫罗尔纲说：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们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的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判断。……你常作文字，固

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24日　禹贡学会在燕京大学举行成立大会。

1934年2月由顾颉刚、谭其骧发起成立于北平，目的在于推进中国沿革地理的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其成员以北大、燕大、辅仁三校学生及平津地区史地学者为主，起初工作主要是编印《禹贡》半月刊。至1936年5月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时，会员已发展到400余人，参与其事者除顾、谭两人外，还有冯家昇、钱穆、唐兰、王庸、徐炳昶、刘节、黄文弼、张星烺、于省吾、容庚、洪业、张国淦、李书华、顾廷龙、朱士嘉、白寿彝、张维华、史念海、韩儒林、吴晗、杨向奎、周一良、吴丰培、侯仁之、童书业、王静如、蒙思明等一大批史地学界精英。其活动也扩展到组织边疆地理考察，编刊《边疆丛书》、《游记丛书》，绘制历史地图等方面。

8月22日召开第一次理事会，顾颉刚为理事长，于省吾为监事长，顾颉刚、谭其骧、钱穆、冯家昇、唐兰、王庸、徐炳昶为理事，刘节、黄文弼、张星烺为候补理事，于省吾、容庚、洪业、张国淦、李书华为监事，顾廷龙、朱士嘉为候补监事。抗战中，学会活动陷于停顿。1946年恢复重建后，声势已大不如前。1955年2月6日，禹贡学会解散。

禹贡学会的工作计划有整理中国地理沿革史，绘制地理沿革图，编纂中国地名辞典，整理历代地理志，辑录地理书籍中各种文化史料作专题的研究。

禹贡学会是我国现代第一个历史地理学的专业学术团体，日后历史地理学的中坚多是禹贡成员。

25日　朱谦之在《现代史学》第3卷第1期发表《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

作者认为“我们都是历史主义的信徒，历史方法则为我们研究一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工具。不但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这些科学需要新的历史方法，即在历史学本身，亦为社会科学之一，非需要社会科学所共同采用的历史方法不可。有了这种历史进化的方法，而后历史才不但成功为叙述的科学，且为说明的科学；有了这种历史进化的方法，而后才能给人类社会的历史，以一个确实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的基础”。

同期还刊载了岑家梧《东夷南蛮的图腾习俗》、曾了若《隋唐之选举》、朱杰勤《英国第一次使臣来华记》、董家遵《明清学者对于贞女问

题的论战》等文。

《现代史学》第 3 卷第 1 期刊载《中国科学史社章程草案》。

朱谦之认为科学史研究“尚鲜有人注意到”，乃集合同人，“为发扬中国固有之科学文化，提倡新型历史，并谋历史学者与自然科学者通力合作起见”，发起组织“中国科学史社”。章程草案规定该社以“中国各专门科学史，如天文学史、算学史、物理化学史、生物学史、医学史、心理学史、地理学史、农业史、工艺史之类”为研究目标，主要以科技发明、科学理论、科学传播等为研究内容。

该社具体运作情况不明。

是月 《中苏文化》在南京创刊。

此刊是中苏文化协会的机关刊物，以介绍苏联各方面情况为主。王昆仑、侯外庐负责，中苏文化杂志社编辑出版，中正书局发行，是左翼史学家的主要阵地。

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梳理清末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立法历程，多引用官方文书，保存了不少史料，对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有开拓之功。

陈受颐在《国学季刊》第 5 卷第 2 号发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儒教观及其反应》。

作者认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不特传播西洋思想和文化于中国，通史也传播中国思想和文化于西洋”，这些耶稣会士对于中国儒教的看法在东西洋思想界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应，不少欧洲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关注儒学，中国的知识阶层有人同情，也有人反对。该文是中国中西关系史的重要成果之一，影响颇大。

同期还刊载了罗庸《陈子昂年谱》、陶希圣《〈齐民要术〉的天气及主要用法》、皮名举《皮鹿门先生传略》等文。

梁方仲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 4 卷第 1 期发表《一条鞭法》。

作者认为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开始施行的“一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史上“一绝大枢纽”，不仅可视为“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还反映了社会经济的重大变迁，所以作者希望“探求一条鞭法最主要的内容，并阐明其制度所以成立的直接原因”。后梁氏又撰写《释一条鞭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 7 卷第 1 期，1944 年），对此文予以补充。

此文发表后在国内外历史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1937 年，日本学者

堀井一雄在《东洋史研究》撰文介绍此文；同年该文被译为日文，在《历史学研究》上分两期刊载；1945年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特约王毓铨对该文进行英译；1956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将《一条鞭法》和《释一条鞭法》（1944年）两文合编为英文本（经杨联陞校正）出版，作为《哈佛东亚丛刊》第一辑刊行。费正清在为英译本写的“序言”中评价曰：“这篇专著是论及明朝后期赋税和劳役系统地改换为银折纳制度迄今最深的研究，他对于近代中国货币经济发展的任何研究有着奠基的作用。”

同期还刊载了吴铎的《津通铁路的争议》一文。

（日）长野朗著、胡雪译《中国资本主义发达史》作为“社会科学丛书”之一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丛书收录的史学类书籍还有黄通编《经济史概论》（1931年1月），（日）劳文著、黄卓译《国际劳动运动史》（1934年1月），（日）吉田虎雄著、周伯棣《中国货币史纲》（1934年9月），何汉文编著《中俄外交史》（1935年4月），（日）小林丑三郎著、周宪文等译《经济思想史》（1938年10月）等。

嵇文甫《船山哲学》由开明书店出版。

嵇文甫自述为学“寝馈六经三史，瓣香一峰二山”，其史学哲学理论多源自王船山。此书分上下篇，上篇探讨王船山的性理学，论述分析其关于天、人、性、命、理、势、常、变等观念；下篇探讨王船山的历史哲学，论述分析了王船山关于古今制度因革、治乱兴衰的认识和夷狄观、“天理史观”等。嵇文甫在民国期间撰著了不少有关王船山的论作，如《王船山的人道主义》、《王船山的易学方法论》、《王船山的民族思想》、《王船山〈黄书〉中的政治纲领》等。

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主要有“天的观念之起源”、“天的观念之利用”、“天的观念之转换”、“天的观念之归宿”等内容。郭氏在此书中结合出土的甲骨、金文材料，并吸收了宗教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知识，对先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中较多地探讨了甲骨文、金文和传世材料中的“天”“帝”等宗教观念，开后世探讨先秦宗教观念研究的滥觞；在重点探讨先秦宗教观念同时，又对商周之际、两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等时期思想观念的变化进行探讨，重点揭示出了先秦思想从宗教向人文的演进。此书后收入其著作《青铜时代》中。

梁思永、刘燿等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

（日）梅原末治著、胡厚宣译《中国青铜器时代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宋寿昌《中西音乐发达研究》由正中书局印行。

6 月

1 日　张家驹在《食货》第 4 卷第 1 期发表《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出版。

文章分别从农工商业的发达、赋税的负担在国家财赋上的地位、人口的繁盛和都市文明几个方面论证在北宋时期中国文化中枢的南移已经表露端倪。

同期还刊载了（日）石滨知行著、李秉衡译《农奴制度研究》，贾钟尧《唐会昌政教冲突史料》，（日）百濑弘著、郭有义译《明代中国之外国贸易》等文。

14 日　章太炎病逝于苏州，享年 68 岁。

是月　陈梦家在《燕京学报》第 19 期发表《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

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如认为周金文中之祭名，“十九因于商”；周金文中之宫庙“半数因于商”；“商周并有天神观念，并同以天神能降丧乱施福佑”，但是“商人之帝为有权势之大自然”，而“周人以天威可畏，恒祈年寿福佑于祖考，而以上帝与天子为统治邦国之两重元首，视天子受命于天，故周人之‘天’若‘上帝’，为政治上之‘主宰’”等。此文是陈梦家上古史研究的早期作品之一。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一文指出，陈氏此文“系统考证了卜辞诸祭名内涵”。这是陈梦家从民俗学、宗教学研究向古代文字、文献研究转变之前的代表作品，至今仍有学术价值。

同期还刊载了郑德坤《水经注赵戴公案之判决》、罗根泽《庄子外杂篇探源》、容肇祖《潘平格的思想》、朱倓《〈东林党人榜〉考证》、谷霁光《安史乱前之河北道》等文。

冯家昇在《燕京学报》第 19 期发表《日人在东北的考古》。

文章梳理了日本人在“朝鲜”、“辽宁与热河”、“吉黑与东部西伯利亚”等地的考古活动进行梳理，认为“日人在东北的考古足与英人在新疆、法人在安南互相媲美。其收获之成绩随其政治势力之前进而推动，如朝鲜之考古适于明治之末，而收获于大正；辽宁、热河之考古始于明治之

末，而收获于昭和；吉黑之考古亦始于明治之末，而开展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作者还指出日本人的“满鲜学”或“满蒙学”已“由文献方面而深入考古方面”，认为“自己分内之事今人代为包办，天下之耻孰甚于此”。同年，冯氏还发表了《日人对于我东北的研究》（刊《禹贡》半月刊第 5 卷第 6 期），提醒中国学人注意日本对东北学术研究是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的情况。

顾颉刚整理《崔东壁遗书》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前有蔡元培序（手书影印），胡适长序，钱穆长序，顾颉刚自序。收崔氏考信录前录二种，正录五种，后录五种，翼录四种，前有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细目》，后附洪业编《崔东壁遗书引得》。并收胡适、赵贞信《科学的古史家崔述》，顾颉刚、洪煨莲、赵贞信《崔东壁先生故里访问记》，胡适辑《崔东壁先生佚文》，顾颉刚、赵贞信《崔东壁先生亲友事文汇辑》，顾颉刚《评论》、《评论续辑》，赵贞信《初刻本校勘记》等。

胡适序云：“顾颉刚先生开始标点《崔东壁遗书》是在民国十年，到现在民国二十五年，快满十五年了。这部大书出版期所以延搁到今日，顾先生自己在序文里曾有详细的说明。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顾先生不肯苟且的治学精神。他要搜罗最完备，不料材料越搜越多，十几年的耽搁竟使这部书的内容比任何《东壁遗书》加添了四分之一。……这样一位‘好求完备’的学者的遗著，在一百多年后居然得着一位同样‘好求完备’的学者顾颉刚先生费了十多年的精力来搜求整理，这真是近世学术史上最可喜的一段佳话！”

此书的疑古考信思想对古史辨派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钱穆说，胡适“于古今人多评骘，少所许，多所否，顾于东壁加推敬，……最为疑古著者曰顾君颉刚……深契东壁之治史而益有进”，“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

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各国社会经济史丛书”。

该丛书收录的书籍有（日）内田繁隆著、陈敦常译《日本社会经济史》（1936 年 6 月），（日）堀经夫著、许啸天译《英国社会经济史》（1936 年 6 月），（日）猪谷善一著、张定夫译《美国社会经济史》（1936 年 7 月），（日）山口正太郎著、陈敦常译《意大利社会经济史》（1936 年 8 月），（日）加田哲二著、徐汉臣译《德国社会经济史》（1936 年 10 月），（日）小林良正著、顾志坚译《俄国社会经济史》（1936 年 11 月），伍纯武《法国社会经济史》（1936 年 12 月）等。

陈启天《中国法家概论》由中华书局出版。

唐兰在《考古社刊》第 4 期发表《释四方之名》。

吴其昌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 6 卷第 3 号发表《北魏均田以前中国田制史》。

第 4 号连载。

7 月

1 日 《禹贡》半月刊推出"西北研究专号"。

专号由冯家昇主编，刊载了冯家昇《大月氏之民族与研究之结论》，(挪威) 斯敦柯诺甫著、张星烺述意兼评《大月氏民族最近之研究》，(日) 安马弥一郎著、王崇武译《月氏西迁考》，赵惠人《史汉西域传记互勘》，朱士嘉、陈鸿舜《新疆图籍录》等文。

冯家昇《大月氏之民族与研究之结论》一文是在对徐中舒、郑德坤关于"月氏"与"月氐"问题辩论总结的基础上，对关于有关"大月氏"研究的音读、种属、原住地、西徙路线、政权、版图等问题的研究综述，并附《汉以前漠北形势图》、《大月氏西迁图》、《大月氏极盛时代之版图》。该文资料收集丰富，包括中、英、日、法、俄等国学者的研究，并能在综合各家研究基础之上提出自己见解，被认为"是一篇极具研究意义且富参考价值之论著"。

张维华被聘为禹贡学会研究员，兼管会务。

2 日 禹贡学会委托赵泉澄负责收购清季档案。

因北京日受日本侵略之威胁，国民政府财政部北平档案保管处奉命裁撤，相关工作人员遂将所管部分档案于 1935 年 12 月和 1936 年 4 月盗卖。纸商又将所得档案转卖给书肆。大量出现的档案引起顾颉刚等人注意，因资金等问题，只得选购，乃委托赵泉澄具体负责此事。

禹贡学会购买的清季档案约四千多斤，三四万卷，大约有边疆档、海防档、遣犯档、粮价档、机器档、铁路工程档、洋药厘金档、陵寝寺庙档等。赵泉澄在《禹贡》半月刊第 6 卷第 2 期发表《本会最近得到之清季档案》一文，公开报告了这批档案的一些情况。赵氏指出，这批档案"多属清季各部司及各省督抚司道之呈报案宗，故与国计民生，最有关系"。顾颉刚 1936 年又发表《禹贡学会的清季档案》，对此批档案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15 日 李悌君在《励学》第 6 期发表《中国古史问题及其研究

法》。

16日　岑家梧在《食货》第4卷第4期发表《图腾研究之现阶段》。

文章梳理了西方学界对于"图腾主义"的起源、"图腾主义发生发展没落诸形态"、"图腾制与氏族制"等问题研究的历程和现状。

同期还刊载了陈啸江《中国社会史略谈》、李立中《关于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许宏杰《周易中所见氏族制崩溃期社会经济之发展》、陆侃如《工正及其他》、李文治《大业民变之经济的动力》等文。

《禹贡》第5卷第10期刊载（日）森鹿三著、周一良译《禹贡派的人们》。

文章将顾颉刚领导下的，以《禹贡》半月刊为中心的研究历史地理的学人称为"禹贡派"，并认为"这派的人们分工地研究各时代各部门，建立地理沿革"的工作，"都是在以辨伪为基础，努力于国学的廓清和整理的顾编辑的设计和监督之下"的，"早晚这些研究结果能集合起来"，将"变成中国地理沿革史，历代地理沿革图，历代地名大辞典，历代地理志考证等等"，并提议编一部《民国学术论文索引》。

同期还刊载了邝平樟《唐代都护府之设置及其变迁》，顾颉刚《有仍国考》，（日）青山定男著、魏建猷译《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变迁》等文。

是月　吴玉章《中国历史教程》油印。

该书是吴玉章1930年至1936年在苏联从事历史教学时写成的讲稿。1963年经他亲自编定的《历史文集》书前附有该讲义的影印件，注明是1934年的手稿。

作者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太古、上古、中古、近古和近代五个阶段。太古时期的下限是夏朝末，为神话传说时期，为原始公社制度；商朝末年到秦统一，为奴隶制形成和发生变化的时期；中古史由秦统一到五代末年；近古史由北宋统一至鸦片战争，为中国特殊的封建制度时期；近代史从鸦片战争直到1935年，又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帝国主义侵略阶段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阶段。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改为史学研究所。

该所下分考古和历史两组，分别由徐炳昶和顾颉刚担任主任。顾氏所任用的学者主要来自燕京大学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毕业生以及禹贡学会的同事和学生，基本没有在北大和史语所工作的学者，遂使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成为顾颉刚的学术阵地。

顾颉刚被聘为燕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

顾颉刚就职后即致信校长，建议增设地理课、古物古迹调查实习课。9 月，顾颉刚在燕大历史系新开“古物古迹调查实习课”，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自动搜集材料的兴趣，使其所学不受书本的限制。不久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也加入。两校历史系师生利用周六下午参观北平各处古迹，并乘周日之便，到涿州、张家口、宣化参观。顾颉刚沿途解释名胜古迹，致使同学们“神往趣生”。1937 年 1 月更远至洛阳、开封等地进行调查实习。禹贡学会还组织了黄河“后套水利调查团”。

同年 8 月，顾颉刚决定扩大燕京大学历史系，经司徒雷登许可后，增聘韩儒林、冯家昇、齐思和、谭其骧、张国淦为兼任讲师，侯仁之为助理。

范文澜《大丈夫》由开明书店出版。

范文澜因不满当局“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而撰著此书。他在该书《凡例》中说：“本书志在叙述古人，发扬汉族声威，抗夷狄侵凌的事迹。”

该书的取材，“正史以外，参考许多种野史笔记，审慎稽核，组织成篇。无一语无来历，无一事无根据，可以当一部信史读，绝对避免演义家凭臆虚造，混乱事实的弊病”。

本书付梓后受到欢迎，成为教育青年和民众的教材，到 1940 年印行 4 版。

朱杰勤《秦汉美术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前两章将历史文献和实物相结合，分从建筑、金石（雕刻）、书学、绘术四个方面对秦汉美术的发展进行梳理，第三章为“文具杂考”，考察了笔、墨、纸、砚的历史。该书是第一部较系统地研究秦汉美术史的著作。1957 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增订版。

王渔邨《中国社会经济史纲》由生活书店出版。

本书分七编，除论述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方法论问题外，着重探讨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各历史阶段的经济特征、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形态的演变等。自第二编以下，大体是根据日本森谷克己所著《支那社会经济史》内容编译。

姜卿云编《浙江新志》由杭州正中书局出版。

作者认为“我国民欲救亡图存，洗辱雪耻，对于国家社会已往之情形及近时之状况，固应有概括之认识，明了时间与空间之重要，急起直追，不容或缓”，而编纂此书也是“救国之步骤”。全书分三编，上编史地编，

中编为人文编，综述浙江史地人文的沿革等情况，下编是地方志简编，以县市为单位。

陈乐素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6 本第 2 分发表《三朝北盟会编考》。

第 3 分连载。本文约 15 万言，分“撰者”、“全书之内容”、“传本”、“原书书目”、“书目有名而未见引用者”、“全书引用材料索引”、“未标明出处之引用材料”、“《〈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校补》”、“引用书杂考”、“宋金史帝纪会编举异”十个部分。

宋德金《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一文认为，该文是一部网罗宏富、考订详实的力作，迄今国内外研治《三朝北盟会编》者“莫不资藉于此”。

同期还刊载了陈受颐《三百年前的建立孔教论》、徐中舒《明初建州女真居地迁徙考》等文。

胡适在《国学季刊》第 5 卷第 3 号发表《颜李学派的程廷祚》。

文章对程廷祚的生平、思想等进行了研究，并认为“颜李之学，到了程廷祚而经过一度解放，到了戴震而得着第二度更彻底的解放。解放的太厉害了，洗刷的太干净了，我们初看戴震的思想，几乎不认得他是从颜李学派出来的了”！胡适自认为该文是三十年代自己最重要的四篇文章之一。

同期还刊载了胡适、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陈垣《记徐松遣戍事》，容肇祖《补明儒东莞学案》，储皖峰《杨万里的生卒年月》等文。

钱穆在《国学季刊》第 5 卷第 3 号发表《龚定庵思想之分析》。

该文是较早全面研究龚自珍思想的论著之一，认为龚自珍的思想学术体现了常州学派“轻古经而重时政”的精神，并认为“定庵之学，虽相传以常州今文目之，而其最先门径，则端自章（实斋）氏入”。

钱穆在《清华学报》第 11 卷第 3 期发表《康有为学术述评》。

本文是钱穆对康有为的系统研究之成果，内容包括“康有为传略”、“康氏之长兴讲学（附朱次琦）”、“康氏之新考据（附廖平）”、“康氏之大同书（附谭嗣同及其仁学）”、“康氏思想之两极端”、“康氏关于尊孔读经之见解”。该文后经修改，成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14 章。

同期还刊载了唐兰《卜辞时代的文学和卜辞文学》、俞平伯《古诗明月皎夜光辨》、王力《南北朝诗人用韵考》、雷海宗《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等文。

翦伯赞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秋季号发表《关于历史发展中之“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

作者认为：“奴隶所有者社会构成的基本运动法则，显现于无数具体的形态中——从最原始的奴隶制到最发展的奴隶制。在形式上，他可以成为家长制的’，‘家内的’，‘古代希腊、罗马的’以及其他奴隶制。”

雷海宗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发表《无兵的文化》。

作者认为“秦以上为动的历史，历代有政治社会的演化更革。秦以下为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在固定的环境之下，轮回式的政治史一幕一幕的更迭排演，演来演去总是同一出戏，大致可以说是汉史的循环发展”。在雷氏看来，“这样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为简单起见，我们可以称它为‘无兵的文化’”。

同期还刊载了浦薛凤《柏克之政治思想》等文。

陈序经在《岭南学报》第5卷第1期发表《东西文化观》上。

第2期刊载《东西文化观》中，第3、4期合刊刊载《东西文化观》下。该文上部主要探讨中国绵延长久的“复古主张”，中部论列主张西洋文化和中国固有文化融合的“折衷办法”各派别，下部阐述“全盘西化的理由”。

中山文化教育馆开始出版“中山文化教育馆丛刊”。

此丛刊收录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1936年7月）、姚宝猷《中国丝绢西传史》（1944年6月）、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1947年12月）等书。

陈端志编著《博物馆学通论》由上海市博物馆出版。

陈东原《中国教育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袁业裕编述《中国古代氏姓制度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日）藤田丰八著、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史丛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

1日 《禹贡》半月刊出版“回教与回族专号”。

此专号由白寿彝编辑，刊载了赵振武《三十年来至中国回教文化概

况》、金吉堂《回教民族说》、王日蔚《回族回教辩》、白寿彝《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单华晋《说陕甘“回乱”初起时之地理关系》等文。

白寿彝《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一文试图从中国史料中，“窥测怛罗斯战役底始末，它在唐底西域发展史上，和在唐大食国际史上的意义，以及它和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之关系”。有研究者认为此文是白寿彝回族史研究的代表作，其主要价值是论证了怛罗斯之战后，中国在西域仍然保有势力，战争使中国的造纸术西传和伊斯兰教义开始有华文的记录。

有研究者指出，《禹贡》半月刊“回教与回族专号”的出版，标志着民国时期回族研究高潮之出现。

《食货》半月刊出版“唐户籍簿丛辑”专号。

此期将陶希圣领导的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搜集唐代经济史料的时候，把中日文书籍杂志里辑录的敦煌户籍收罗在一起”的资料发表。当时见于中日文书籍、杂志的20件敦煌户籍、差科簿（时称丁籍）汇为一编。

在该丛辑的《小序》中，陶希圣在提出“户籍丁籍是多方面重要的经济史料”的同时，又指出：“要研究唐代均田制度，单看均田令是不行的”，因为“第一，政府对于每一丁应授的面积是怎样计算的？第二，应授的田是不是全授了？第三，所授的田是零碎还是整块的土地？第四，受田的人自己买来的田，怎么登记？第五，园宅地授予的情形怎样？第六，丁口登记及田地呈报的情形怎样？第七，口分与永业的比例在实际是怎样？这些只有查看户籍，才可以明白”。

16日　王崇武在《禹贡》第5卷第12期发表《明代的商屯制度》。

作者认为明朝的屯田，分为军屯、民屯和为“救济军屯不足”的商屯。本文自称此文是《明代的屯田制度》一文之一章，但并未见到《明代的屯田制度》出版。王崇武分别刊发有《〈明代的屯田制度〉导言》（《华北日报·史学周刊》第100、101期，1936年）、《明初之屯垦政策与井田说》（《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5期）、《明代的民屯组织》（《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3期合刊）等文。有研究者认为，全面系统地论述明代屯田制度，自王氏始。

同期还刊载了金宝祥《汉末至南北朝南方蛮夷的迁徙》、赵九成《黄梨洲的地学著述》、蒙思明《成都城池沿革》、张兆瑾《浙江省地理述略》

等文。

《禹贡》第 5 卷第 12 期发表国立北平图书馆索引组编《清代文史笔记子目地理类索引》。

第 6 卷第 1、2 期连载。此索引将清代学者有关地理问题的探讨分主题编为索引，以方便研究者查询。

21 日　童书业在北平《晨报》发表《唯物史观者古史观的批判》。

作者并不否认唯物史观史学本身的价值。他申言："近来有一派人专用社会分析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历史，这种方法本不算错，因为他们运用最新颖的知识，把一切死气沉沉的材料都化作活活泼泼的，叫人们勘破事实的表面而进一步探求一切历史的核心，这确是很有史学革命的精神的。"但此派史学的缺陷也十分严重："不幸他们大多数没有考据学的常识，而又不肯虚心的承受他人的成绩"，"他们却非常性急，一心要把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在自己著作的一部书或一篇文章里完全决定，这除了运用主观的成见，还有什么办法？所以他们只要拣一段便于自己引用的文字，便可说古代事实是如此的，或者用了他们的公式附会一段旧文字，加以曲解，也就可以说古代的事实是如此的。"童氏还具体列举王宜昌、李麦麦、卫聚贤、李季的观点来证明他们的唯心态度。

童氏总的态度是："我们对于唯物史观是相当承认的，对于唯物史观者研究历史的成绩也是相当钦佩的。我们所反对的，只是一部分唯物史观者的唯心历史观，和他们对于考据一派的谩骂式的批评。"

这是古史辨派学者对唯物史观史学的公开批评。

30 日　吴越史地研究会成立。

初名吴越史地会，1936 年 3 月由吴稚晖和卫聚贤发起于上海。该日召开成立大会，江浙各地会员 60 余人到会，公推蔡元培为会长，吴稚晖、钮永建为副会长，卫聚贤任总干事，评议和理事百余人，皆政、学两界名流。学会设总部于上海，并在江苏、浙江两省设立分会，各县设立分会。会章规定"以研究吴越（暂以江苏、浙江两省为限）史地为宗旨"，主张借考古发掘手段与成果，研究江浙两省古代民俗及文化。该会编印专刊《古代文化》和《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

是月　李济任总编辑的《田野考古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由傅斯年、董作宾、徐中舒、梁思永任编辑，后改称《中国考古学报》第一册。

在“编辑大旨”中，李济论述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指出“田野考古工作，本只是史学之一科，在中国，可以说已经超过了尝试的阶段了。这是一种真正的学术，有它必须的哲学的基础，历史的根据，科学的训练，实际的设备。田野考古者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给史学家的采用，这本是一件分不开的事情，但是有些有所谓具现代组织的国家，却把这两门学问强分为两科，考古与历史互不相关，史学仍是政客的工具，考古只能局部的发展，如此与史学绝缘的考古学是不能有多大进步的。这种不自然的分离，我们希望在中国可以免除。这几年中国史学之注意考古的发现是一个很好的象征”。李济等人还指出，“健全的民族意识，必须建筑在真实可靠的历史上，要建设一部信史，发展考古学是一种必要的初步工作”。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对厘金制度的起源、实施情况作了详尽论述，是20世纪上半叶清代财政史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之一。梁义群《清代档案与三十年代的经济史研究》一文认为此书是“迄今我国研究厘金史最大最完整的一部专著”。

朱偰《金陵古迹图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侨居南京，“适值新都建始之秋，街道改筑，房屋改建，地名改命，其间变化之繁，新旧递嬗之剧，实其他都城所罕有”，“古迹之沦亡”，“文物之澌灭”不可胜计，作者深惧南都遗迹湮没无闻，“后世之考古者，无从研求，故就今之所见，遗迹之犹幸保存者，实地调查，摄为图版，辑为图考，以保留历史遗迹于万一”。商务印书馆7月还出版了此书的相关书籍《金陵古迹名胜影集》，此二书一文一图，互相印证，详尽地将南京残存的古迹名胜展现出来，并纠正了前人沿用旧说的许多错误。

顾颉刚代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与商务印书馆订立出版合同。

该合同规定，凡有稿件，经顾颉刚审核决定，即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名义出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吴丰培和吴世昌分工承担组稿、审稿工作。当时发出的书稿，有清梁廷枏《夷氛纪闻》、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张任政《金陵大报恩寺塔志》、郭伯恭《永乐大典考》及《四库全书纂修考》、吴丰培《清代西藏史料丛刊》第一集及《清季筹藏奏牍》等，均由商务在1937、1938年先后出版。顾氏与燕大学生徐文珊共同校点的《史记》（白文本）亦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1936年出版。

据吴丰培《顾颉刚先生的“人生一乐”》云：“仅仅一年时间，投入不多的人力，就出版了十余种，总数有数百万字。此一措施，使北平研究

院史学研究所出版物大大增加了，超过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而商务印书馆亦多出了有学术价值的书籍。更重要的是，当时中、青年的作品有了发表机会，鼓舞了他们，督促了他们，一举而三方面都有收益。”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

本书原名《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全书分八篇，叙述近五十年中国思想的演变、思想方法、旧思想之整理与批评、思想论战、新思想之介绍等内容。作者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从社会经济组织的变动决定思想变更出发，将迄止至当时的五十年来的中国思想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自1894 年“甲午之役”至 1911 年民国成立为第一阶段，自 1911 年武昌起义至 1928 年“北伐成功”为第二阶段，自 1928 年“‘北伐成功’至今日止”为第三阶段。该书从亲历者的角度，对清末以来思想过渡的各个环节进行论述，对治清末至民国的学术史思想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商务印书馆着手将所搜集 1300 余种年谱编为《年谱集成》出版，后因抗战军兴而未果。

容肇祖《韩非子考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 月

1 日　丁道谦在《食货》第 4 卷第 7 期发表《诗经中的妇女社会观》。

此文旨在研究诗经时代妇女与社会的关系，以明了当时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

同期还刊载了非斯《金文中所窥见的西周货币制度》、陶希圣《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等文。

4 日　河南省博物馆开始在辉县琉璃阁发掘两座战国墓。

16 日　童振汉在《禹贡》第 6 卷第 2 期发表《野人山考》。

作者指出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中国不断丢失国土，东北外兴安岭被俄国侵占，“西南野人山又泰半为英所强占”，“追溯其原因，并非战败丧失，实缘于边地不重，或画出瞀然，或置之度外，未能早为之所而自坏之。以致任人巧取豪夺，碍及整个国防”。此文就是作者根据自己在云南多年掌握的资料撰写而成。

同期还刊载了叶国庆《冶不在今福州考》、李书华《雁荡山游记》、张维华《介绍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文。

陶希圣在《食货》第4卷第8期发表《唐代管理“市”的法令》。

20日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进行第14次发掘。

此次发掘由梁思永主持，参加者有石璋如、王湘、高去寻等。此次发掘至12月31日结束，得有字甲骨2片，铜器、玉器等古物。

21日　由顾颉刚、冯家昇等人发起的边疆问题研究会在燕京大学正式成立。

30日　周予同在《申报·每周增刊》第1卷36号发表《治经与治史》。

作者提出，现在研究中国古代的经典，应负起两种使命：“一是积极的，将经典当作一种文化遗产，分部的甚至于分篇的探求它的真面目，估计它的新价值，使它合理的分属于学术的各部门”；另一种“可称为消极的，就是探求中国经典学所以产生发展和演变之社会的原因，揭发它所含的宗教毒菌，暴露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将它从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所奴使的学者名流的手里夺过来，洗刷去它外加的血污或内含的毒素，重新成为一种文化遗产，呈献给大众”！

是月　（日）森谷克己著、陈昌蔚译《中国社会经济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森谷克己认为亚细亚生产方法是“敌对的社会形态以前”的“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时代”。“大概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构筑之历史发达的创始期，且为自原始共有制推移到私有的过渡期社会的经济构筑”。在他看来，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原始的经济构筑称为“亚细亚的”，“这大概是有农业共同体构造的意味，所以他毕竟是在这里认取了累进的经济社会构成的始记”。

森谷克己说：欧洲“以奴隶劳动在社会的生产过程上具有支配的作用的一种制度”，“赋有这样意味的奴隶制时代在中国史上可说从未见过”。中国奴隶存在于大牧地、狩猎地，以消费生活为中心，社会生产过程中容纳奴隶的只有制造业和商业，但这两个部门在中国社会经济上不占重要地位。中国的奴隶大多数是宫廷、诸侯王、官僚、富者的家内奴隶或奢侈奴隶。中国是缺了奴隶制度，即是缺了以劳动者（生产的主体）和生产手段（生产的客体）的结合为特色的奴隶制度。

同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该书孙怀仁的译本。

（英）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由中华书局

出版。

原著者序中称：斯坦因第四次中亚探险（1930—1931）夭折后，曾赴美国波士顿罗威尔研究院演讲，概述前三次探险（1900—1901、1906—1908、1913—1916）的经历与发现。1932 年据演讲稿增补为此书，是一部普及性作品。

全书共二十一章，包括亚洲腹部的鸟瞰、中国之经营中亚以及各种文明的接触、在沙漠废址中的第一次发掘、古楼兰的探险、古代边境线的发见、沿着古代长城发见的东西、千佛洞石窟寺、秘室中的发见、千佛洞所得之佛教画、吐鲁番遗址的考查等。附录“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等四篇文章。书中有大量文物、木简、壁画、古文书和遗址照片。

向达的“译者赘言”中评价此书：文章写得相当的枯燥，缺少文学上的意味和人文的风趣，但事实叙述简洁得要，正是一般读者对新疆所需要的一点知识。

食货学会开始正规运作。

食货学会的活动包括确立会员会籍，征收会费，召开会员大会，选举理事，依法立案等。不久，陶希圣又筹划扩大组织。他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任方显廷商议联合国内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几个文化机关和团体及个人，发起一个大的学会。

孟森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6 本第 3 分发表《八旗制度考实》。

作者指出“自清入中国二百六十七年有余，中国之人无有能言八旗真相者。即易代后，又可以无所顾忌，一研八旗之所由来，即论史学亦是重大知识”，但“至今尚无有也”。文章对八旗制度的起源、成立之经过、组织的演变及其原因、领旗贝勒等问题皆有精详的考证与分析，并提出了“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八旗之始，奇遇牛录额真；牛录额真，起于十人之总领”等论断。

孟氏此文是清史研究领域的著名论著，有研究者誉为是八旗制度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文也对后学产生了影响，何炳棣在回忆中说，抗战前夕，读到了孟氏此文，“对北大的明清史产生了很大的敬意”。

董作宾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6 本第 3 分发表《五等爵在殷商》。

此文由傅斯年函问董氏公侯伯子男五字在甲骨文出现次数引起，系统梳理了这五个字在甲骨文中的出现，并得出在甲骨文中公字“尚无作‘五等爵’中公侯之‘公’解者”，而“侯”、“伯”、“子”、“男”皆有爵称

的结论。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以出土文物论证商王国实行封建制的开端”。

郑天挺在《国学季刊》第5卷第4号发表《杭世骏〈三国志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

作者运用对勘等方法，探讨了杭、赵两书的异同、先后、得失等，认为：“杭赵两书，由世骏轫为义例，发起端绪，一清踵而广之；故体裁相同，征据相近。然两书均未完成，故两家集中未及其事。两氏既卒，后人得起遗稿，辗转传录，遂并行于世。”

同期还刊载了汤用彤《释法瑶》、唐兰《“商鞅量”与“商鞅量尺”》、朱光潜《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孟森《书清世祖赐建言词臣朱黄丸令引疾事》等文。

傅乐焕在《国学季刊》第5卷第4号发表《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

标题下标“这是《宋人使辽路线考》的一部分”。该文上半部分主要探讨关于“语录”（即使臣回国后所上奏疏）的各种问题，下半部分考证“辽主接见宋使并非拘于数地的史实，附带着举出现在所发现的几条新路”。该文是作者在宋辽关系史研究上的代表作之一。

陈恭禄《中国近百年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黄汉《管子经济思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杜任之编《各国社会改革史大纲》由太原觉民书报社出版。

谭丕模《宋元明思想史纲》由开明书店出版。

鞠清远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6卷第3号发表《唐代的两税法》。

10月

1日　胡先骕在《国风》第8卷第1期发表《朴学之精神》。

作者对“五四”前后南北学派对立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北方学派方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

6日　顾颉刚接受《世界日报》采访时明确表示“要将经书变成历史”。

顾氏表示，要想把经书变成历史，就要“把向来对于经书的神秘观念除掉，把经书也看成一堆史料，而研究它的来源和变迁”，并表示自己的希望是“用毕生的时间整理《尚书》、《春秋》、《史记》三部书”。

9 日　连士升在《大公报·史地周刊》第 106 期发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方法和资料》。

作者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归结为三种：第一种是把经济史的史料搜集在一起，然后按时代的先后排列起来作系统的叙述，这种叙述式的经济史只注重具体的经济事件的变迁，忽略经济事件在社会上的作用。第二种是应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证明和解释历史，注重事件的因果关系，忽略经济以外的条件。第三种是研究人类历史经济原素和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但不拥护经济决定主义之绝对正确。

连士升说：“经济史是探讨过去的经济生活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有经济理论的素养，使我们能够洞悉问题之所在，同时又能够帮助我们解释经济史料。”著述中国经济史的人必须懂得经济学的理论。因为，史学家的任务是要把个别的事实只当作连锁中的小环境看，所以他自己应熟悉理论的系统，彻底了解各种问题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换一句话说，假如著述经济史的人不想做个古董，那么他对于有关的研究范围，应该有彻底的理论的训练，否则他一定不能提出他的问题，解释他的材料。

16 日　《禹贡》半月刊出版“东北研究专号”。

此专号由冯家昇主编，刊登了张印堂《中国东北四省得地理基础》，冯家昇《原始时代之东北》，王怀中《唐代安东都护府考略》，侯仁之《燕云十六州考》，尹克明《契丹汉化考略》，潘承彬《明代之辽东边墙》，刘选民《东三省京期屯垦始末》，赵泉澄《清代地理沿革表》，龚维杭《清代汉人拓殖东北述略》，（日）百濑弘著、刘选民译《日人研究满洲近世史之动向》，李敬敏《东北海关税设立之经过及各国贸易之情形》，王华隆《沈阳史迹》，金毓黻《〈辽海丛书〉总目提要》，陈鸿舜《〈东北书目〉之书目》，青木富太郎等辑、刘选民校补《东北史地参考文献摘目》等文。

冯家昇《原始时代之东北》一文系根据有限的资料和考古成果对东北原始期历史的“一种假定之假定”。文章推测了旧石器时代、新时期时代、东北之原始民族等问题。有研究者指出，自此文起，中国学者开始“以坚强有力的历史资料，论证了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王怀中《唐代安东都护府考略》一文考辨了唐代安东都护府的创设、都护府迁移情况、名称、废止情况、职责、下辖机构等内容。侯仁之《燕云十六

州考》一文考辨了“燕云十六州”的名称、石晋的十六州、十六州的收复等问题。本文被研究者认为是这一问题研究“最后见地”的成果。

《食货》第4卷第10期刊载波里耶克夫著、傅衣凌译《中国封建构成的发展之合则性问题》。

17日　伍纯武在《光华大学半月刊》第5卷第1期发表《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展开及其前途》。

第2—5期连载。伍氏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的特质是“半殖民地性质”，具有“‘贫血症’的性质”。中国经济之所以不健康，主要有“各种天灾”、“野蛮民族之侵略”、“土地兼并与高利贷剥削”等原因，文章还梳理了中国现代经济各部分发展的历程以及中国现代经济的前途。

同期还刊载了吕思勉《中国文化东南早于西北说》、蒋维乔《清末民初教育史料》（第2期连载）、耿淡如《英埃关系之演变》等文。

22日　在北京周口店又发现较完整的下颌骨和牙齿。

发掘队于11月15日又发现两个头骨盖，11月26日再次发掘得一个保存的比过去发现北京人头骨化石都完整的北京人头骨化石。

25日　燕京大学历史系主办《史学消息》创刊。

本刊由刘选民任总编，蒙思明、张玮瑛等任编辑。刘选民在《本刊的内容》中指出，该刊的目的“在与国内外史学界沟通消息，提倡历史研究兴趣，介绍史学研究成绩，联络会员（燕大历史学会）感情，供本系同学联系编辑之用”，该刊设置“国内外史学界消息”、“讲演录”、“调查报告”、论文举要等栏目，并且明确指出在介绍论文等方面“大体侧重国外方面”。

该刊先后刊载冯家昇《现代日本东洋史家的介绍》，刘选民译《现代苏联邦的东方学文献》、《西洋汉学论文提要》、《日本“支那学”论文提要》、《欧美汉学研究文献目录》，李承荫译《欧美汉学研究之现状》等文。1937年7月1日，该刊出版至第1卷第8期后停刊。

30日　江世禄在《师大月刊》第30期发表《现代史学述略》。

作者系北平师大三年级学生，文章探讨了“旧史学的传统观念”、“传统史学的贡献与弊害”、“现代新史学的产生及其概念”、“现代新史学的性质”等问题，反映了当时一些青年学生的史学观念。

同期还刊载了罗根泽《两宋诗话存佚残辑年代表》、魏佩兰《毛诗序传违异考》、孔繁信《盐铁论中所见之汉代危机》、黄现璠《元代佃户之生活》、乔介林《明代之学校》等文。

是月　雷海宗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2卷第1期发表《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

作者认为简单地模仿欧洲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几个阶段“极难说得圆满”，没有太大意义，认为应该按照时代特征将中国四千年的历史分为两大周：第一周至公元383年淝水之战，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是从淝水之战至今日，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中国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第一周除了史前期，又可分为五个时期：封建时代（前1300至前771年）、春秋时代（前770至前473年）、战国时代（前473至前221年）、帝国时代（前221至88年）、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89至383年）；第二周也分五期：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元明、晚明盛清、清末中华民国。雷海宗认为这样划分与其他民族的历史相比更突显了中国特点，并希望中国可开创“第三周的伟局”。

同期还刊载了陶希圣《唐代官私贷借与利息限制法》、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王忠信《甲午战前之中日外交政策概说》等文。

雷海宗在《独立评论》第224号发表《对于大学历史课程的一点意见》。

作者声称历史系毕业生反映，经过大学阶段的学习，对史学并没有得到一个清楚的认识，原因之一在于课程分配与组织。通过比较美国与中国几个重要大学的西洋史课程，他认为中国的设置不合理，“极需彻底的改革”。其建议是加强通史，压缩国别史，取消专题史。他强调：“历史系本科的目的是要给学生基本的知识，叫他们明白历史是怎么一回事，叫他们将来到中学教书时能教得出来，叫他们将来要入研究院或独自作高深的研究时，能预先对史学园地的路线大略清楚，不致只认识一两条偏僻的小径。”

杨向奎在《史学集刊》第2期发表《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

此文上编论《左传》之性质，下编论“《左传》与《国语》之关系”，认为“书法，凡例，解经语及君子曰等为《左传》所原有，非出后人之窜加，故《左传》本位传经之书。《国语》之文法，体裁，记事，名称等皆与《左传》不同，故二者绝非一书之割裂也”。据作者自述可知，

作者自幼研读《左传》，此文系其大学毕业之作，意在推翻今文经学认为《左传》是假书之观点。此文发表后受到学术界关注，结论被当时一些学者评为“精当绝伦”。

同期还刊载了赵贞信《论语一名之来历与其解释》、王日蔚《丁零民族史》、罗香林《大唐创业起居注考证》、王辑五《日本国号考》、孟森《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一篇》、刘厚滋《同治五年黄崖教匪案质疑》、潘承弼《柳三变事迹考略》等文。

顾颉刚、童书业在《史学集刊》第 2 期发表《墨子姓氏辨》。

此文上编“专辨驳墨子非姓墨说”，下编“专证明墨子之墨为氏姓说”，作者提出“墨姓出于目夷氏，乃宋公子目夷之后”和“墨姓出于墨山之地名”两种假说，并指出“第一说较为有征而近理，故吾人暂时主张第一说焉”。文后附钱穆的商榷信函及童书业的回函。同时刊出的还有吴世昌《书后》，认为顾氏关于墨子姓氏的观点“其说精确，快绝千古”，此文“足成为定论”。

杨联陞在《清华学报》第 11 卷第 4 期发表《东汉的豪族》。

作者认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是“阀阅统治时期”，“阀阅”的前身是汉代的豪族，尤其是东汉的豪族，所以作者撰写此文对汉代豪族予以探讨。文章内容包括“西汉豪族的发展”、“东汉豪族政权的树立”、“东汉豪族概述”、“豪族与经济——小民之困顿”、“豪族与经济——豪人之富奢”、“豪族与政治——门生故吏”、“豪族与政治——选举请托”、“外戚豪族宦官豪族的专政”、“清流豪族的挺起”、“豪族内争——第一次党锢”、“豪族内争——第二次党锢”等。

林聪标认为该文是“当代史学对中国中古门阀社会之渊源做出初步探索工作的名作”，“尤为人们所记诵”。

同期还刊载了杨树达《说字解经十二首》、闻一多《楚辞校补》、邵循正《元史拉施特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孙作云《九歌山鬼考》、浦薛凤《反动与守旧：美法革命以后之政治思想》等文。

陈寅恪在《清华学报》第 11 卷第 4 期发表《读〈秦妇吟〉》。

该文后改名为《〈秦妇吟〉笺证》。《寒柳堂集》所收《卫庄秦妇吟校笺》系此文的晚年定稿。周勋初认为此文是陈寅恪以诗证史的范例。

金兆梓在《新中华》第 4 卷第 19 期发表《通史新诠》。

作者指出：清季及民初史学界，无论是沿清代考据之学疑古之风，从事古史整理与辨伪者；还是沿清代赏鉴古玩好嘘金石之风，进而为殷墟甲骨流沙坠简之研究者；抑或应用西洋考古、地质、人类等科学以从事发

掘，而作史前文化之研究者等等，都是所谓比次之书，考索之功，即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证。

侯兆麟（侯外庐）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 年冬季号发表《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山西票号——山西票号的历史的正确认识》。

文章内容有“票号的认识”、“票号发生的经济基础”、“票号的发展及其基本性质”、“票号的没落”等。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山西票号的性质进行了重点分析，并将山西票号的兴衰与中国社会结构联系起来。

同期还刊载了吕振羽《殷代经济前论》、季子《两汉外患史的发展》、欧伯《佛教的起原及其在宗教哲学思想》等文。

禹贡学会开始出版《边疆丛书》。

由吴丰培、顾廷龙主编。其《刊印缘起》云：“求民族之自立，而不先固其边防，非上策也。”“用是亟求先儒遗著汇而刊之，俾讲边政者资借镜焉。”

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文献论丛》。

编印此论丛是为了纪念故宫博物院成立十一周年，收录了蔡元培《清内阁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序》等 28 篇文论。

王德华《中国文化史略》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

全书分四编：第一编经济史，第二编政治史，第三编学术史，第四编社会史。

江亢虎《中国文化叙论》由上海东方文化出版社出版。

钱亦石《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11 月

1 日　《禹贡》半月刊出版“后套水利调查专号”。

该专号由张维华主编，刊载了张维华《古代河套与中国之关系》、《王同春生平事迹访问记》、蒙思明《河套农垦水利开发的沿革》、张玮瑛《后套兵屯概况》、李荣芳《绥远宗教调查记》等文。有研究者指出，透过该专号的内容，观察禹贡学会研究与现实之结合，“可能较易了解禹贡学会的宗旨，即在朴学考据之外，对时事多所关心，并由此走出新的方向”。

李文治在《食货》第 4 卷第 11 期发表《北宋民变之经济的动

力》。

文章从土地集中与商贾兼并、统治阶级的淫奢享乐、事佛道之浪费和僧道之侵渔、税役繁重和各种苛敛、天灾等方面探求北宋年间发生大规模农民暴动的原因。

同期还刊载了黄君默《唐代的货币》，（日）志田不动麿著、傅衣凌译《汉代苍头考》，（日）饭岛茂三郎著、李汝源译《中国历朝之户口统计》等文。

7日　张寿镛在《光华大学半月刊》第5卷第2期发表《两浙学术考》。

第3—5期连载。

8日　钱穆在南京《中央日报·文史副刊》发表《未学斋读史随笔之一——略论治史方法》。

作者并不认同“今日急务，论当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罗，与旧材料之考订；至于理论系统，暂可置为缓图”的观点，而认为“今日治史要端，厥当先从‘通史’入门”，也就是“以研读通史之方法治史”，在对史乘具有通识之后，史料的搜罗与考订始能更具意义，而不致陷入漫无目标、只知层层堆栈史料的地步。

16日　朱俊英在《禹贡》第6卷第6期发表《〈中国古代地名考证索引〉略例》。

作者指出，为准备编纂《中国古代地名大辞典》，拟先编制《中国古代地名索引》和《中国古代地名考证索引》两种索引。《中国古代地名考证索引》一书主要收录“考证古地理学之专书”和“历代文集札记现代杂志报章中关于古地理考证之论文”，时间从先秦始，书名按笔画排列，地名之下备列考证之书及论文名等。作者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同期还刊载了李子魁《汉百三郡国守相治所考》、班书阁《东晋襄阳郡侨州郡县考》、曹经元《研究贵州苗民问题之动机及其经过》等文。

是月　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王云五、傅纬平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

王云五认为“文化范围广泛，即在史料完整之国家，以少数人综合广泛之史料，终不若以多数人分理各专科之史料为便”，故学术界应当“一方面利用清代学者分部整理之遗产，他方面取法欧美新颖之体例，各就所长，分途程功”。商务印书馆“博考外人编纂之我国文化史料与前述法英两国近年刊行文化史丛书之体例，并顾虑我国目前可能获得之史料，就文

化之全范，区为八十科目，广延通人从事编纂”，以达到“分之为各科之专史，合之则为文化之全史”的效果。

王云五计划编纂的专史科目有 80 种之多，但“中国文化史丛书”只收录了 41 种。第一辑 20 种：《中国经学史》（马宗霍，1936 年 11 月）、《中国法律思想史》（杨鸿烈，1936 年 11 月）、《中国婚姻史》（陈顾远，1936 年 11 月）、《中国民族史》（林惠祥，1936 年 11 月）、《中国田赋史》（陈登源，1936 年 12 月）、《中国商业史》（王孝通，1936 年 12 月）、《中国理学史》（贾丰臻，1936 年 12 月）、《中国盐政史》（曾仰丰，1936 年 12 月）、《中国陶瓷史》（吴仁敬、辛安潮，1936 年 12 月）、《中国政党史》（杨幼炯，1936 年 12 月）、《中国骈文史》（刘麟生，1936 年 12 月）、《中国殖民史》（李长傅，1937 年 1 月）、《中国算学史》（李俨，1937 年 1 月）、《中国南洋交通史》（冯承钧，1937 年 1 月）、《中国交通史》（白寿彝，1937 年 1 月）、《中国绘画史》（俞剑华，1937 年 1 月）、《中国医学史》（陈邦贤，1937 年 2 月）、《中国文字学史》（胡朴安，1937 年 2 月）、《中国度量衡史》（吴承洛，1937 年 2 月）、《中国考古学史》（卫聚贤，1937 年 12 月）。第二辑 21 种：《中国道教史》（傅勤家，1937 年 4 月）、《中国教育思想史》（任时先，1937 年 4 月）、《中国税制史》（吴兆莘，1937 年 4 月）、《中国渔业史》（李士豪、屈若搴，1937 年 4 月）、《中国韵文史》（泽田总清著、王鹤仪编译，1937 年 4 月）、《中国散文史》（陈柱，1937 年 5 月）、《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1937 年 5 月）、《中国日本交通史》（王辑五，1937 年 5 月）、《中国妇女生活史》（陈东原，1937 年 5 月）、《中国音乐史》（田边尚雄著、陈清泉译，1937 年 5 月）、《中国音韵学史》（张世禄，1937 年 5 月）、《中国政治思想史》（杨幼炯，1937 年 5 月）、《中国训诂学史》（胡朴安，1939 年 8 月）、《中国建筑史》（伊东忠太著、陈清泉译，1937 年 8 月）、《中国救荒史》（邓云特，1937 年 11 月）、《中国疆域沿革史》（顾颉刚、史念海，1938 年 3 月）、《中国地理学史》（王庸，1938 年 4 月）、《中国俗文学史》（郑振铎，1938 年 8 月）、《中国目录学史》（姚名达，1938 年 12 月）、《中国水利史》（郑肇经，1939 年 2 月）、《中国小说史》（郭箴一编，1939 年 5 月）。

这套丛书中大部分著作都是各专门方向的开创性成果，该丛书囊括中国文化史的大部分，是 20 世纪前 30 年中国文化史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该丛书 1984 年 3 月由上海书店依原书影印。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谢诒徵译《历史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多次演讲记录。1932 年 12 月，

王灵泉将此书翻译为《历史哲学纲要》，由神州国光社出版，但影响不大。王造时、谢诒徵依据英译本翻译而成。王、谢二人平实雅正、忠实本义的翻译，使该书成为经典名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人。出版后除了商务印书馆多次再版外，1949 年后有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多个版本。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由上海不二书店出版。

该书系统地阐述了殷代和周代的社会性质。上半部主要探讨殷商社会的性质，根据甲骨文、《易》卦爻辞、《尚书》等文献和出土古器物分析，指出当时社会已明显形成若干阶级和阶层，并论证殷代已建立了国家机器。

吕振羽的这部著作首创殷商奴隶社会说。他认为："奴隶社会这一阶段，是人类生产力之史的发展中所必然要表现出来的一个古典的形态。"他得出结论：在殷代"奴隶已成为社会组织之基本部分，……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已经演着主要的角色，大批的奴隶已被驱使到牧场、作坊及广大的田野中去劳动。……社会上形成了主人与奴隶之两大对垒的阶级社会"。他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奴隶制社会的早期形态。

该书下半部主要论证两周社会为初期封建社会：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方面看，周人层层的土地分封奠定了西周封建等级制度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从劳动者的身份、地位看，农奴是西周社会的直接生产者。从土地制度看，井田制是初期封建时代的庄园制。吕振羽是西周封建说的较早提出者。

顾颉刚、童书业在《史学年报》第 2 卷第 3 期发表《夏史三论》。

此文标题下标"夏史考五、六、七章"。此文是在顾颉刚《启和太康》、童书业《少康中兴辨》的基础上扩充而成。顾氏计划《夏史考》共十章，分别是"绪言"、"夏民族的实际的推测"、"桀的故事"、"禹鲧的传说"、"启和五观与三康"、"羿的故事"、"少康中兴辨"、"《伪古文尚书》里的夏史"、"《路史》里的夏史"、"《今本竹书纪年》里的夏史"。此文的目的在于"叙明启和三康——太康、仲康、少康——的故事的演变"，得出了"太康少康的传说与启的传说有关系"、"启在先秦人口中是毁多于誉的"、"太康仲康的传说在先秦时不明显"等观点。

此文被认为是顾颉刚和童书业学术合作的正式开始。对于此文的观点，学界有争议。

童书业在《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一文中指出，此文是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方法"最典型的作品"。

同期还刊载了陈统《慧远大师年谱》、侯仁之《靳辅治河始末》、蒙

思明《元魏的阶级制度》、贝琪《三国郡守考》、赵宗复《汪梅村先生年谱》、姚家积《补邹漪明季遗闻》、王伊同《五季兵祸辑录》、陈晋《〈新唐书·刘宴传〉笺注》、齐思和《英国史书目举要》等文。

洪业在《史学年报》第 2 卷第 3 期发表《礼记引得序》。

此文长达数万言，不仅解析了两千年来有关礼在古典文献中长期争论不休的疑难问题，还详述了自己对《礼记》的疑义，可以说是一篇集礼学之大成的专著。该文对两汉礼学源流颇具功力的考证，得到法兰西文学院的赞赏和推许，被授予 1937 年度巴黎“儒莲”奖。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将中国古代民族分为华夏系、东夷系、荆吴系、百越系、东胡系、肃慎系、匈奴系、突厥系、蒙古系、氐羌系、藏系、苗猺系、罗罗缅甸系、僰掸系、白种、黑种，并分章探讨。林惠祥还在此书中探讨了中国民族史之分期等理论性问题，他认为民族史的性质或者效用有四项：一为通史之补助，二为人类学之一部分，三可供制定实际政策之参考，四有助于民族主义及大同主义之宣传。陈国强、叶文程在《林惠祥传略》中指出，该书虽然是中国民族史中出版较后的一部，但是“在同类书中最为详尽，其创造性更多”。该书 1937 年 5 月就出至第 5 版，并于 1940 年被日人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由上海当代青年出版社出版。

何干之明确指出该书的任务是“要来解答中国社会的来龙去脉”，分别探讨了农村公社与封建经济的停滞、专制主义与手工业、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在歧路上的中国经济、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动力与革命联合、民族危机与抗敌统一战线等问题。何干之在此书中明确提出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该书第二年又增订并改名为《转变期的中国》出版，并多次再版。

于登在《金陵学报》第 6 卷第 2 期发表《明代监察制度概述》。

文章重点梳理了明代都察院的沿革、御史的任免、职掌、“保障及风节”，六科给事中的组织、任免、职掌等。作者还分析了“专制政体下监察制度之效用”及“明代监察制度之特点”。有研究者指出，于登此文“标志着对明代言官的研究进入制度层面”。

同期还刊载了于登《明代国子监制度考略》，黄云眉《康熙字典引书证误》、《续蔡氏人表考校补》，王古鲁《白鸟库吉及其著作》，张钧才《史记引尚书文考例》，陈登原《王荆公新法考》、《三国志义例辨录》

等文。

柳诒徵主修《首都志》出版。

该书是继1881年《江宁府志》后关于南京的最为完备的方志。

郑师许《漆器考》由中华书局出版。

12月

1日　顾颉刚、陶希圣等代表中国方面与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哈罗·田波烈在北京饭店进行会谈。

主要议题为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问题、入会后中国政府之援助与中国的财政负担、中国历史学者即时开展工作之条项等。当时议定，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史学会，“进行方式有三种：一、由中国政府请求；二、由一代表中国的研究院请求；三、由一代表全国的历史学者委员会请求。入会问题在一九三八年八月苏黎支举行四十二国大会决定。田波烈教授返欧后，该学会行政部将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巴黎开会。在开会期前，极愿得知中国之意向。田教授负责写成正式函件致顾教授，促请中国历史学者对此事之注意。彼亦表示将往南京谒见外交部长、教育部长及中英庚款委员会主席”。

次日，田波烈又正式致函顾颉刚，指出“中国本国历史和教育的发展，若不发生更多国际的关系，不会完善。并且在中国以外的学术界中，也总不会被人认识——除非立即采取目前的步骤。贵国的加入，对贵国本身和敝会都具有最崇高的历史意义”。他建议“先要组成一个中国历史学协会”，并希望顾颉刚能积极承担起联络组织工作。

为响应国际史学会的建议，顾颉刚及北大历史系主任姚从吾、清华历史系主任刘崇鋐在北平，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南京，沪江大学教授会常务委员康选宜在上海，分头联络发起组织中国史学会，“务期从速成立，并希望出席一九三八年在瑞士举行之国际历史学会大会”。1937年4月10日，《图书展望》报道称：“我国史学专家顾颉刚、郑振铎暨罗家伦等，循世界著名史学专家田波烈氏之请，筹组中华史学会，作为中国研究历史之最高研究团体，迭经各方之交换意见，认为此事确属重要，即积极着手进行，闻将于最近期内成立，总会设北平，上海及南京、广州等处设分会。”抗战爆发后计划搁浅。

西湖博物馆发掘棋盘坟遗址。

施昕主持。第一次发掘在2月10日结束，获得了红烧土及石器。第二次发掘从12月16日至30日，地点仍在棋盘坟，获得了黑陶的壶、豆

等文化遗物。

6 日　天津《益世报·食货》创刊。

由陶希圣主编，鞠清远、武仙卿、方济霈、曾资生、贾钟尧任编辑。与半月刊是各地食货学会会员的论文汇聚地不同，它主要刊载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同人的译著。周刊的体例与半月刊也不相同。半月刊发布以集合材料为主的长文，而周刊登载内容以叙述原委为主的短文。

其发刊词显示出一种扎实平和的姿态。编者表示不以批判他人为先导、不争正统、不以为“文章是自己的好”、不排斥他派、不说谦恭的话。“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是在萌芽期，谁也没有取得正统的资格和学力，即令为了争正统，把一切专名词喊得震天价响，不合于客观的事象，也是枉然的。况且自立门户，刚心愎气，拒绝人家的优越的见解，护自己的短，这是学问进步的障碍”，“我们要求各家各派的合作并进，我们不主张互相抨击，我们主张互通消息，互换意见，互供材料”。

姚从吾在《中央日报·文史副刊》第 5 期发表《欧洲近百年来的历史学》。

作者指出，19 世纪欧洲史学的发展分为两派：一是偏重事变的考证，二是偏重事变的解释。前者的长处，是能使传说与史事分离，真事与伪事相区分。短处是拘泥于考证，对于历史的演进，缺少综合的说明和贯通的解释；后者的长处，是能运用一种观察，去说明史事的演变，明了历史的演进。短处是先入为主，往往滥引史事以迁就个人成见。德国兰克学派和受过这个学派影响的历史学者，多属于前一派。实证主义派、唯物史观派、文化史观派多属于后一派。

对偏重事变考证一派，姚氏主要论列了尼布尔和兰克的史学成就。他认为兰克是现代科学的历史学的开山大师，并转述史太因费尔德对兰克《近代史家的批评》的评语：第一，“用锐利的眼光批评史料的来源”；第二，“对史事立明确的解说，并由此认识史事对于时代与环境的关系”。姚从吾不仅注意到兰克“史料考证”的一面，而且还强调“栾克是近代特出的历史家，注重记述事实以外兼重历史理论，他的历史观是承袭德国正统派哲学观念主义的见解的，无形中在德国史学界建立一种观念论的历史观”。

12 日　西安事变爆发。

是月　《燕京学报》出版“十周年纪念专号”。

此专号刊载余嘉锡《牟子理惑论检讨》、郭绍虞《陶集考辨》、冯沅君《古剧四考》、冯友兰《庄子内外篇分别之标准》、张荫麟《南宋亡国

史补》、钱南扬《宋金元戏剧搬演考》、于省吾《老子新证》、莫非斯《春秋周殷历法考》、王崇武《明代户口的消长》、朱士嘉《临安三志考》、邓嗣禹《明大诰与明初之政治社会》、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王振铎《汉张衡候风地动仪造法之推测》等文史哲论文十九篇。

冯沅君《古剧四考》一文对南宋金元三百年间戏剧中“勾阑”、“路岐”、“才人”、“做场”四个概念进行了考证。王崇武《明代户口的消长》一文采用统计的方法，对明代人口消长变迁进行统计、概括，并涉及了流民、农民逃亡等，是明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一文分从“神话的发生”、“神话传说中的历史系统”、“动物的服用”、“人兽之争”、“水的神话”、“凤”等方面来论述商代的神话；从“巫”、“舞”、“祓禳”、“玉”等方面来论商代巫术。张光直后撰写《商代的巫与巫术》一文，希望超过陈氏此文的“若干结论”，并纪念陈氏。

陈梦家在《考古社刊》第5期发表《史字新释》、《史字新释补正》。

陈梦家此两文对殷商时代的“史”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有研究者认为陈氏纯从古文字字形的角度提出的“史为田猎之网，而网上出干者，博取兽物之具也”的观点是牵强的，但其对早期“史”字字形的描述却较客观。

同期还刊载了郑师许《考古学与乡村政治》、杨树达《新嘉量铭跋》、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补正》、任熹《石鼓文概述》、莫非斯《西周历朔新谱及其他》、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补篇》、岑家梧《史前考古学发见史略》等文。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4分发表《谁是〈齐物论〉之作者》。

作者认为《齐物论》一篇在《庄子》中“可疑滋甚”，自宋代以后就有人怀疑，遂成“经籍批评学中一问题”。文章最后得出今本《庄子》为向秀郭象所定，“与古本大不同”；“《齐物论》的作者为慎到”等结论。

王玉哲后作《评傅斯年先生〈谁是齐物论之作者〉》一文，认为傅氏“其说颇新，且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至巨”，但“其所持之论据，多有可商”，认为《齐物论》作者并非慎到。

同期还刊载了徐中舒《豳风说》、余逊《汉魏晋北朝东北诸郡沿革表》、丁声树《诗经“式”字说》等文。

董作宾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1分发表《骨文例》、

《殷商疑年》。

《骨文例》一文内容包括“整理骨文例之方法及材料”、“卜法”、“文例”三部分，揭示了卜甲、卜骨上刻辞行款走向的一般性规律。文章后附董氏手绘骨版图三十幅。作者在“附记”中指出，“盖甲骨文例，兹篇与《商代龟卜之推测》中所列，皆已粗具规模”。

据作者《我在最近》一文中介绍的情况可知，《殷商疑年》一文的写作源于作者要“不惜工本把殷商一代的整个年历考证了一番”，原计划文章分“殷商整个的年代”、“帝王在位的年数”、“迁殷以后”、“克殷异说”、“帝乙帝辛的年历”五个部分，因在第五部分发生兴趣转移，该文乃改为“殷商整个年代”、“各王在位之年数”、“迁殷以后”、“克殷异说”、“殷末之年历”五个部分。第五部分因作者“约高君平先生，共同商讨，将别为文考订之”，故此次刊布的《殷商疑年》，只是前四部分。有研究者指出，《殷商疑年》是董氏进行中国古代年代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为完成《殷历谱》奠定了基础。

同期还刊载了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陈述《阿保机与李克用盟结兄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测》、全汉升《南宋杭州的消费与外地商品之输入》等文。

徐中舒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 本第 2 分发表《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

作者认为“虞夏文物之征者，虽不足即为断论，但殷代则自殷墟遗物发现以后，其可征者：自帝王世系，游田，稼穑，工艺，好尚，社会组织等等，则不一而足。故今日之治古史，当断自殷代始”，研究此一时期的历史，必须将“旧有之纸上史料”与新出土之“地下史料”“善为抉择，贯串，证明之”。作者指出依据“综合旧史料中有关地理之记载，而推论其发展之次第”；“以新史料中涉及地理者，证明旧史料之可信”；“以后俩开国期之史事比拟之”这三个原则“论殷周间之史迹，虽不足即为定论，但依历史之构成言，此实不失为一有理解之假说”。文章根据这三原则，先后考辨了“高宗伐柜房与震用伐鬼方”、“周公奔楚”等八事，最后得出“周人自大王居岐以后，即以经营南土为其一贯之国策”。

该文不仅方法新颖，论证充分，而且还直斥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显示了作者的爱国之心。发表以后，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同期还刊载了陈槃《春秋“公矢鱼于棠”说》、全汉升《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黎光明《明太祖遣僧使日本考》等文。

王孝通《中国商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较完备地论述了中国自上古至民国的商业发展历程，在商业史领域有一定影响。有研究者认为，此书尽管征引了许多材料，但是一不能用新方法整理，二不能善于别择，反被材料蒙蔽，不能领会参考。

陶希圣、沈巨尘《秦汉政治制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分从中央政府、司隶与刺史、地方政府、文官制度四个方面将秦汉的政治制度设置、官员建置及其升迁奖惩等问题进行考述。

陈登原《中国田赋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梳理了中国上古至民国的田赋征收的沿革、重要制度政策、缺陷积弊等并阐述了田赋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此书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多次再版。

顾颉刚主编《尚书通检》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是书以江南书局翻刻相台本《尚书孔传》为底本进行逐字索引，即将原书所有的字列为条目，按笔画次序，后注包括该字的句子。

全汉升在《岭南学报》第5卷第3、4期合刊发表《清末反对西化的言论》。

此文对清末以前、清末反对西化的言论进行了梳理，并着重对“反对西洋物质文明”、“反对西洋精神文明”及“用夏变夷”主张进行了重点分析。

容肇祖在《辅仁学志》第5卷第1、2期合刊发表《吕留良及其思想》。

该文由“吕留良传”、“吕留良的思想”、“吕留良与黄宗羲”、“吕留良与张履祥”、“吕留良与陆陇其”、“吕留良与熊赐履、朱轼等”六部分组成，是研究吕留良及明清之际思想的重要论著之一。

同期还刊载了陈垣《吴渔山晋铎二百五十年纪念》、岑仲勉《再说钦察》、张鸿翔《〈明史〉卷一五六〈诸臣世系表〉》、戴明扬《广陵散考》等文。

《辅仁学志》第5卷第1、2期合刊发表赵士炜遗著《实录考》。

作者认为“实录”实际是“编年之流亚也”，自周兴嗣《梁皇帝实录》起，至清《德宗实录》，已踰数百，但“并日即湮没，十九放佚，爰存其名数”，故“略叙源流，录诸左方，用备参稽”。全文共录实录116部。

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郑鹤声编著《中学历史教学法》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

徐懋庸《文艺思潮小史》由生活书店出版。

荆三林《史前中国》由西北大学历史系出版，作为“国立西北大学历史学系丛书”之一。

朴社及所属景山书社解散。

是年

萧一山编《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10 册由国立编译馆出版。

1932 年，萧一山赴欧洲考察，历时七月，在不列颠博物院获见大量太平天国文献，遂摄录编为此书。共收 21 种印书，内有 3 种不在“诏书总目”之列的印书，包括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在扬州书肆发现的《钦定英杰归真》，并各附考订跋文一篇。不过，该书所收各种印书虽均名为影印，但内有数种实系仿刻或抄排，导致失真并造成若干错误。

此外，萧氏在伦敦还发现《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等印书，但误认为是汉译《圣经》的翻刻本，仅拍摄了其封面和样叶。萧一山将在伦敦发现的其余文献，分编为《太平天国诏谕》、《太平天国书翰》，由北平研究院于 1935 年、1937 年相继影印出版，共收 30 件文书（另有 6 件系天地会文件等），篇末各附考释文字或后记。

萧氏另编有《太平天国丛书第二集》，内收太平天国诏旨、兵册等重要史料，可惜恰逢淞沪抗战爆发，商务印书馆已制成的版片悉数毁灭。

杨昌栋《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由上海广学书局出版。

该书计划共四编，第一编探讨了基督教在中古欧洲之普通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贡献，第二编探讨了基督教在中古欧洲之政治生活的贡献，第三编探讨基督教在中古欧洲之知识生活的贡献，第四编探讨基督教在中古欧洲之美学生活的贡献，作者只完成了前两编。2000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再版此书。

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

此书共九章，论述了从 1911 年辛亥革命至 1921 年华盛顿会议的中国外交历程。此书可能是我国第一部民国外交史专著，且作者具有实际的外交经验，故对民国外交史研究影响较大。1942 年 12 月重庆正中书局再版此书。

陈汉章编著《辽史索隐》8卷缀学堂丛书初集本刊行。

作者“采摭故典，探求异闻”，“探颐索隐”，将有关纪事系于《辽史》纪、志、传文之下。此书是较早专门研究《辽史》的论著，重在考证地理。

向达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抄录太平天国文献。

发现天王、幼天王诏旨多通，及一般文书三十余件，包括洪仁玕《立法制谊论》等珍贵文献史料。另有护王陈坤书部所退领、发物单、名册、纪事簿等“杂件”六种，也有一定史料价值。

吴玉章在苏联期间，应国际教育处要求撰写《中国历史大纲》。

作者说：“历史是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我们应该知道人类真正的历史，知道劳动者被奴役和解放的历史；应该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和往哪里去。因为，这能百倍地坚强我们奋斗的信心和给我们以获得胜利必需条件的知识。”

清姚振宗编撰《师石山房丛书》由开明书店出版。

该丛书收《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汉书艺文志条理》、《汉书艺文志拾补》、《隋书经籍志考证》、《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等7种74卷。另有王式通的《师石山房丛书题辞》、陶存煦的《姚海槎先生年谱》及陈训慈的序等四篇。

范文澜离开北平，赴河南大学文史系任教授。

抗战爆发后，在当地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张元济辑印《四部丛刊二编》，收书73种，1910卷。

王重民编录《太平天国官书补编》4册出版。

顾廷龙《古匋文舂录》由北平研究院出版。

谭春霖《欧人东渐前明代海外关系》由燕京大学出版。

范寿康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5卷第2号发表《魏晋的清谈》。

谷霁光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5卷第4号发表《六朝门阀》。

1937 年

※ 抗战爆发，众多学术机构及史学家纷纷避迁内地。
※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出版。
※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出版。
※ 董作宾、胡厚宣编《甲骨年表》出版。
※ 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出版。
※ 李达《社会学大纲》出版。
※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
※ 邓云特（邓拓）《中国救荒史》出版。
※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
※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出版。
※ 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出版。
※ 学术界开展对秋泽修二中国社会“停滞论”的批判。
※ 罗振玉编印《三代吉金文存》20 卷。

1 月

1 日 《禹贡》半月刊出版“南洋研究专号”。

该专号由张维华主编，刊载了罗香林《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统制》，许道龄《南洋地名考异》、《南洋书目选录》，张维华《明季西班牙在吕宋与中国之关系》，张天护《法国与安南》，傅振伦《所建南洋侨胞之情况》等文。

有研究者指出，“禹贡学派讨论南洋时系视之为中国的边疆，也就是将东北、西北、西南和南洋定位于中国的边疆史地来加以研究”，故有此号之编辑。

刘樊在《食货》第 5 卷第 1 期发表《五代的幕府》。

15日　萧一山、范文澜创办《经世》半月刊。

本刊创始于南京，范文澜任主编。范文澜负责开封分社编务。1940年6月改季刊，1945年改月刊。

是月　黄炎培主纂的《川沙县志》由上海国光书局出版。

该志共24卷，分大事年表、舆地志、户口志、物产志、实业志、工程志、交通志、卫生志、慈善志等24目。该志被视为民国志书中的佳作，突出的优点有以下几个：一、篇目设置和内容记述上反映了近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如《实业志》、《工程志》、《卫生志》、《慈善志》等；二、突出表在方志中的作用，该志不仅有《大事年表》，而且在《舆地志》、《户口志》等目内也都有表；三、文中采用互见法，便于阅读和使用。

金兆丰《中国通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全书约50万言。书分总论（述历代大事）、地形论、食货论、职官论、刑法论、兵政论、选举论、外交论、文字论及学说论共十卷。

聂崇岐在《评金著〈中国通史〉》一文中指出该书具有事实不符、叙述遗谬、注释讹误、叙述不清、体例不纯、昧于实况、轻下论议、谬信灾异、前后重复等严重缺陷。

白寿彝《中国交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全书共五篇，分述先秦时代、秦汉时代、隋唐宋时代、元明清时代及现代中国之交通，对交通路线、交通设施、交通工具、交通管理制度均有考述。这是第一部较全面地综合研究中国历代交通史的专著。此书曾多次印行，并有日译本刊行。1984年、1987年、1993年先后在上海、郑州、北京有翻印本。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作为“青年自学丛书”之一由生活书店出版。

该书出版后颇受欢迎，自1937年1月至1940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发行至第10版。1937年7月，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一书也由生活书店收入该丛书出版。

生活书店“青年自学丛书”还收录钱亦石《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1936年10月）、张健甫《近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1937年8月）、华岗《社会发展史纲》（1942年8月）、杜守素《先秦诸子思想》（1946年9月）、狄超白《中国土地问题讲话》（1948年5月）等。

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总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实际是为各史作注的准备工作之成果，后因时移势易，注史工作

无法开展，便将此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1949 年姜亮夫将其增订修改，并改名为《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该书取材丰富，考订细致，收录从上古至 1919 年共 12000 余人，每人注出姓名、籍贯、岁数、生卒年等信息，给人物研究提供了线索。尽管其中难免存在个别错误，但仍然是一部颇实用的工具书。

与此书类似的工具书还有陈乃乾编《清代碑传文通检》，吴海林、李廷沛编《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等。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不但对太平天国运动的产生背景和发展历程加以描述，而且深入探析了它的性质、失败原因和对此后社会的影响，并将这一运动定性为贫民革命。

在自序中，作者认为写太平天国史有两件难事：第一，关于史料的考订方面，前人是不曾替我们做过这一件工作的。没有鉴别史料眼光的人，便看不出史料的真伪，史料的真伪不辨，据以成书，则去“信史”必远。第二，关于写作态度方面，须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不容有丝毫成见掺杂其间，“一个历史家的任务，是在传信”。

此书渗透出强烈的现实感。胡适对此深表不满，他训斥罗尔纲道：“做书不可学时髦。此书的毛病在于不免时髦。”罗亦坦率承认其书有煽动革命之嫌，“成为‘教人革命’的宣传品”。

《太平天国史纲》的读者对象设定为中学生，深入浅出，叙事简明扼要，而又不乏精到见解，取得了巨大成功。汤象龙说：“我们社会研究所历年所研究的成果，诸如关税、外债、厘金、货币等等，都给以惊人的敏锐、扼要地采撷到他这部《史纲》来!”（《〈太平天国史〉序》）当时的《大公报》誉之为具备时、地、人的条件的好著作。《剑桥中国史》也认为此书“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

岑家梧《图腾艺术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对图腾制的分布，图腾的文字、装饰、雕刻、图画及舞蹈音乐等皆有梳理。作者还探讨了中国古代艺术的来源、图腾的意识形态及其如何演变为特殊信仰、习俗的过程等。陈中凡为该书写序，称该书“是专门研究图腾艺术的一部著作”，可以“启发国人对于我国史前艺术的研究”。学林出版社 1987 年再版该书。

商务印书馆编印《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此论文集收录胡适《述陆贾的思想》、陶希圣《唐代经济景况的变迁》、黄炎培《二十五史篇目表》、王云五《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叶

恭绰《历代藏经考》、吴其昌《甲骨金文中所见的殷代农稼情况》等文。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印《礼记引得》。

同年引得处编印的引得主要有《藏书纪事诗引得》，洪业等编《春秋经传注疏引书引得》、《礼记注疏引书引得》、《毛诗注疏引书引得》。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包括文字考释、音韵、文法、经史考证等内容。该书是杨树达经年累月积累其读书所得以及研治金石的成果，尤以金石、小学文字的考证为精华。该书出版后受到学界重视，同年3月即再版，1955年科学出版社出增订版，1983年中华书局再版此书。

冯友兰在《清华学报》第12卷第1期发表《中国政治哲学与中国历史中之实际政治》。

作者指出虽然随着历史研究的进步，人们已经改变了三代以上为“完全黄金时代”，三代以下“完全为一堕落时期”的观念，但是有些人却又被“另一种见解所囿”，即“先秦哲学所托诸古代之理想，与历史多完全无关。中国历史上中人之行事，与中国哲学中所提倡之理想，大部分全不相干”。作者认为，若依这种见解，“历史与实际，完全成为两橛”，故他认为“各种政治社会哲学，对于实际政治或社会，并非外来硬加之物。某种政治社会哲学即所以说明某种实际的政治或社会之纯形式。某种实际的政治或社会之存在，亦必依某种政治或社会哲学，为其理论的根据，二者‘相依为命’，有不可分之关系”。

同期还刊载了闻一多《诗经新义》、王信忠《甲申事变始末》、杨联陞《汉武帝始建年号时期之我见》等文。

陈之迈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2卷第2期发表《独裁政治的兴起》。

文章内容包含“罗马的独裁制度”、“历史上的各种独裁政治”、“几种解释独裁兴起的学说”、“一个政治史上的解释”等。作者试图通过对“独裁”这一政治体制进行史的分析，帮助人们增强对其了解。

同期还刊载了沈乃正《清末之督抚集权、中央集权与“同署办公”》、沈鉴《辛亥革命前夕我国之陆军及其军费》等文。

陈啸江在《社会科学论丛季刊》第3卷第1期发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总成绩及其待解决问题》。

作者将1927—1937年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划分为萌芽期（或个别研究时期）、论战期（或共同研究期）、专题研究期（或科学研究期）三个段

落，对其成果分为全史、断代史、部门专史、泛论的体裁、杂志论文五类进行罗列介绍。

翦伯赞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7 年春季号发表《关于“封建主义破灭论”之批判》。

有研究者指出，翦伯赞从 1935 年 8 月至 1937 年 3 月所发表的《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介绍柯瓦列夫：古代社会论》、《关于历史发展中之“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之清算》、《关于前阶级社会的构成之基本诸问题》、《关于“封建主义”之批判》、《历史科学中的观念论及其批判》等文，皆是呼应吕振羽提出的“殷代奴隶社会论”而写，排除中国历史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破除了秦汉以来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或“封建主义破灭论”。

同期还刊载了邓云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及其特性》、陶希圣《春秋末战国初的变法运动》等文。

汤朝华在上海《书人月刊》第 1 卷第 1 号发表《张荫麟〈中国史纲〉——一个外行人的话》。

此时张荫麟《中国史纲》一书尚未完成，只是在《大公报·史地周刊》先行刊登了几个片断，作者即据此展开评论，说：“《中国史纲》是有生气的，亲切的。这是最大的成功之处。”“《中国史纲》的作者，不但深有史学的研究，而且对于文学，也富有修养，如果将来《中国史纲》能够大受欢迎，决不是偶然的。”

作者还表达对当时中国史学界现状的感受，认为新史学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却还没有“产生一部新的中国历史”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很多“专家”认为“因为各个断代史的研究尚未成熟，通史是没法写的，而且写不好的”；这种错误的观念导致的错误的结果是“小学和中学和大学以及国民的历史教育都没有什么成绩，教科书也好，讲义也好，在我们看来，都是生料硬货，零杂不堪，只是名字史料无穷无尽的排列而已”。作者最后指出：“一个止于蒐集和研究史料的人，虽是一个历史工人，却不是一个历史家。历史家是一个建筑师，历史工人不过是一个泥水匠，建筑师懂得材料（史料）的运用而不知其他，是不够的，他必需还要有设计的能力。设计是多方面的，衡量，分配，组织，调和……可是几乎全部这些作者都错认了：历史者，材料之学也。结果出来的便是生料硬货。”

王宜昌在《思想月刊》第 1 卷第 2 期发表《评吕振羽的中国奴隶社会论》。

王宜昌反对吕振羽将殷代定为奴隶社会、将两周划作初期封建社会的意见。他还公开标举“公式主义”。他说：“虽然有许多人反对过这种意见，但我却认为研究中国社会史，永远是要从‘搬家主义’和‘公式主义’出发的。”

吕振羽随即在《文化动向》第1卷第3期发表《是活的历史还是死的公式？——答王宜昌君》，对王宜昌予以回应。吕振羽批评王宜昌说：在王君脑子里的历史发展的公式，是单一的西欧希腊罗马日耳曼的历史的形式，并且王君所知道的也只是西欧的古代和中古史的现象形式，并不曾懂得其活的内容。他进而提出，“我们研究中国史，拿它和世界史作比较的研究是重要的；但在从这方面去了解历史的活的规律，并不是从这方面去‘搬家’和套死‘公式’。从正确的历史方法论出发，才能够正确的去运用一切史料；只注重‘公式’而不去注重史料，那么写出的仍不外是自己的脑筋，而不是活的具体的历史本身”。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郭廷以《太平天国历法考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吴经熊、黄公觉编著《中国制宪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吴其昌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7卷第2号发表《宋以前中国田制史》。

第3号连载。

2月

1日 《食货》半月刊推出“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专号之三”。

此期刊载了魏特夫格著、冀筱泉译《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和阶段》，（日）加藤繁著、萧正谊译《中国社会史概述》（二），丁道谦《由历史变动率说到中国田制的“循环”》等文。

7日 李晋华因病去世。

李晋华于1933年9月任史语所第一组助理员，负责校勘明列朝实录。1936年8月，李晋华赴浙江南浔嘉业堂对抱经堂本《明实录》进行校勘。由于工作辛劳、条件艰苦、“起居饮食，诸不习惯”，而且“疾间作，犹勤劳不息”，最终导致“心脑颓败症”并“病根已深，卒告不治”，年仅39岁。

16 日　《禹贡》半月刊出版“康藏专号”。

此专号由吴玉华主编，刊载了（瑞典）斯文赫定著、绛央尼马译《西藏》，吴丰培《记清光绪三十一年巴塘之乱》，余贻泽《藏军犯康述略》，孟森《国史所无之吴三桂叛时汉蒙文饬谕跋》，傅振伦《西藏银币考》，郑允明《〈西藏图籍录〉再补》，吴玉年《〈西藏图籍录〉拾遗》，北平图书馆《康藏论文索引》，范道芹《泰晤士报十年来关于西藏的文字索引》等文。

1937 年冯玉书在《边疆》杂志发表《评〈禹贡〉的“康藏专号”》，称该专号所载《西藏》、《记清光绪三十一年巴塘之乱》等文“皆为极有价值之作”，并认为“际兹边疆之研究，需材正殷，国人之注意，方兴未艾，此专号之出，固有待也”。

是月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由南京国立编译馆出版。

本书对广东十三行的起源、沿革、盛衰和功过进行详细考察，是研究十三行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本书付印后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吴晗在《评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中指出，由于梁嘉彬“用了几年的时间……搜尽了一切能找到的中西史料。他在横的方面，遍访各行商后人，利用家谱行状和传说来补正过去学者的缺陷；在纵的方面，对过去历史作了一个详瞻而扼要的鸟瞰。从而克服了过去研究广东十三行的外国学者所不能克服的三个困难：第一是史料的搜集，所有各种文字中关于这问题的记载，尤其是中文材料，都应一一加以研究和批评。第二是实地的采访，除文字的记载以外，还应从行商的后人和父老的传说中采访遗事，与文字的记载互相印证比较。第三是历史的研究，除横的方面就十三行本身作研究外，因这制度和中国历代市舶制度有关，更须向上追溯，作一纵的探讨。”1940 年 3 月，德国鲍克莱尔教授在美国《太平洋事务》发表书评，指出“著者利用该城、该省之早期档案文献，以及家谱史料，详细阐释了若干已经为人所知之史实，并在许多实例上获得几乎全新之成果”。1944 年 1 月，日本山内喜代美将该书翻译为日文，由日光书院出版发行。其译序评价说：通观本书全篇，盖纯为忠实研究之结晶。

梁嘉彬在 1959 年获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基金的资助后，又对《广东十三行考》进行详细的校补和修订，于 1960 年 3 月由台中东海大学出版。后来梁嘉彬又转托中山大学章文钦代为校订原增订本，于 1999 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重版。

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不仅对上古至民国的中国度量衡变迁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还探讨了研究中国度量衡史的途径和方法、中国度量衡制度的标准等。该书是同类著作中较完备的一部，其中的数据常为后来研究者征引。

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共五章，附录一篇。全书叙述历代各个时期考古学的发展，是第一部从上古至当时的中国考古通史，在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共分五部分，前三部分探究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中国医学演变、医疗制度、疾病名称、医书考证等问题；第四部分论现代之医学发展，注重介绍西医的传入及教育等；第五部分略述中国各种疾病史。

据《史学年报》第3卷第1期发表罗秀贞所撰书评可知，在陈氏此书之前，1932年尚有王吉民、伍连德著《中国医学史》，全书用英文写成，“四分之三专述近代医事”。罗秀贞认为这两种《中国医学史》虽然都有不足，但在这一领域“究属创举”。

陶希圣、武仙卿《南北朝经济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全书分六章，论述南北朝时代的农业与土地制度、租税制度，商业交通与工业、货币，以及皇朝、寺院、大族之间的经济冲突。此书认为，“东汉以后，中唐以前，无论在经济、社会、政治、思想上都自成一段落，与以前的秦汉及以后的宋明，各有不同之点。最重要的特征是大族与教会的经济特权及政治特权”。

蒋维乔、杨宽、沈延国、赵善诒合编《吕氏春秋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3月

1日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改版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仍由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卷期号接续《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为季刊，每年3、6、9、12月的1日出版，内容方面“注重关于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方面之专门研究”。编委会成员有梁方仲、汤象龙、朱庆永、吴晗、谷霁光、吴铎、张荫麟、夏鼐、罗尔纲、孙毓堂等。

《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出版“兵制史研究专号(上)”。

此期刊载了孙毓棠《西汉的兵制》、贺昌群《汉初之南北军》、谷霁

光《西魏北周和隋唐间的府兵》等文。

孙毓棠《西汉的兵制》一文梳理了西汉的徭役、中央军、郡国兵、领兵官、武帝对兵制的改革、西汉末年兵制的变化、边防兵、边防制度和措施、军队人数及其组织装备等问题。贺昌群认为汉初“南北军之制，为汉代兵制之一大关键，由此可知前汉之由征兵制而入于募兵制，由兵民合一而至于兵民分离，又可知汉初内外兵制之表里相制，至唐之南北衙军，尤承其旧制”，乃撰写《汉初之南北军》一文对此问题予以梳理。谷霁光《西魏北周和隋唐间的府兵》一文“总述府兵的源流变化及其背景，尤注意于府兵成立意义，及制度设施等问题，借以明了中国中古兵制变化与政治社会关系及相互影响”。

陈独秀在《东方杂志》第 5 号发表《实庵字说》。

第 6、7、10、13 号连载。此文是陈独秀晚年研究文字学的主要成果之一，试图利用古文字材料否定中国古代曾经历过奴隶社会。

此文发表后，立即引起郭沫若的反驳，撰写《读〈实庵字说〉》（后改为《驳〈实庵字说〉》），引用大量甲骨全文，“揭露”陈氏于古文字学之“外行”及其立论的“大误”，并坚定地指出：“关于奴隶制这个问题，我敢于十二分坚决地主张：中国也和希腊、罗马一样，至于马克思的那个铁则并不是例外。”原收 1942 年 4 月重庆文学书店版《蒲剑集》，后收《沫若文集》第 11 卷《羽书集》。

嵇文甫在《食货》第 5 卷第 5 期发表《对于长期封建论的几种诘难和解答》。

文中批驳了中国社会封建论的停滞说、循环说、二元说和修正说。

同期还刊载了倪今生《井田新证别论》、曾謇《秦汉的水利灌溉与屯田垦田》等文。

8 日　西湖博物馆试掘良渚遗址。

施昕更主持。此次发掘至 20 日结束，获得了众多黑陶壶、石器、玉器等。1938 年 6 月，施更昕撰写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由浙江省教育厅出版。

16 日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第 15 次发掘开始。

此次发掘由石璋如主持，参加者有王湘、高去寻、尹焕章等。此次发掘发掘至 6 月 19 日结束，得有字甲骨 549 片，有字骨 50 片。

傅安华在《食货》第 5 卷第 6 期发表《关于奴隶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

作者认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法则，奴隶社会时期的商业资本基础薄弱，自然经济仍占主导。

同期还刊载了岑家梧《转型期的图腾文化》，傅安华《关于奴隶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苏）哈雷特著、李秉衡译《奴隶制度研究》（第7期连载），（日）冈崎文夫著、方哲然译《中国古代稻米稻作考》，陶希圣《王莽末年的豪家及其宾客子弟》等文。

是月　张闻天组建延安“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

此为延安最早的史学团体，成员有刘亚楼、张爱萍、莫文骅、杨兰史、郭全，目的是编写教材培训学员。1937年“抗大”开办后，在教员和教材短缺的情况下，张闻天带头讲课，并组建了这个教研团体。参加研讨会的刘亚楼、张爱萍、杨兰史、莫文骅等一面听张闻天讲课，一面在张闻天的指导下加工讲稿，然后转授其他学员。这些讲稿最后汇集，经张闻天修改审定为《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37年冬由延安解放社出版。

（德）伯伦汉著、陈韬译《史学方法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写于1889年，比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1897）更早，是西方实证史学方法论的权威著作。伯伦汉说：“著者惟有承认本书中有关此之诸篇，其中大部分之知识及规例，均系得之于兰克氏之实例即启发者。”此书对兰克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了系统整理，为集大成之作。

杜维运认为陈韬所译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和李思纯所译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译文都颇似天书”。而陈韬所译伯氏之书，杜维运据姚从吾生前所告，“陈氏可能根据日译本翻译”（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译者依据的应是1901年以后的版本，其中不乏对当时史学发展新趋向的回应，如兰普勒希特的新文化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对各种社会科学亦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历史哲学的作用也有较为公允的认识，并推崇渊源研究法为科学方法。

郑天挺在《国学季刊》第6卷第1号发表《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

文章运用明清大库档案等资料，指出清初之“叔王”为“亲王”以上之爵秩，“皇父摄政王”是当时最高爵秩，为酬报功勋亲王的，多尔衮即因此由“亲王”、“叔父摄政王”，进而尊为“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既与“左右之希旨阿谀”，又“源于满洲旧俗”，“决无其他不可告人之隐晦原因”。该文发表后颇有影响，时人评价该文“以最习见的材料，得出最公允的结论”。

同期还刊载了孟森《清太祖由明封龙虎将军考》、罗尔纲《艺风堂金

石文字目伪误举例》等文。

傅抱石编《中国美术年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王太岳等编辑《四库全书考证》14 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周寿昌《汉书注校补》4 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张少孙编《国学研究法》由上海大华书局出版。

赖义辉在《岭南学报》第 6 卷第 1 期发表《陶渊明生平事迹》。

4 月

1 日 《禹贡》半月刊出版"三周年纪念号"。

此纪念号刊载了袁复礼《新疆之哈萨克民族》、谭其骧《粤东初民考》、于省吾《武王伐纣行程考》、蒙文通《赤狄白狄东侵考》、张维华《齐长城考》、史念海《两汉淮南三国考》、刘秉仁《两汉的人口与食粮政策》、金毓黻《慕容氏与高句丽》、谢国桢《〈东北史稿〉跋》、冯家昇《豆莫娄国考》、张昆河《隋运河考》、王崇武《明代民屯组织》、童书业《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萨士武《明成化嘉靖间福建市舶司移置福州考》、顾颉刚《读尚书禹贡篇之伪孔传与孔氏正义》、郑鹤生《黄河释名补》、赵贞信《郦道元之生卒年考》、孟森《〈水经注〉原公水篇诸家之订正》、傅振伦《吾国地理部类之沿革》、朱士嘉《怎样编纂新式的县志》等文。

顾颉刚在《纪念辞》中提出,《禹贡》已经从"专研旧籍"扩及实际调查,这种"无间新旧,兼容并包,使得偏旧的人也熏陶于新方法的训练,而偏新的人也有旧材料可整理"。在这种新旧配合指导思想下出版的各种专号,"使得材料和问题得着极好的排列和阐发",并认为这种工作"不但为本刊开辟了许多新园地,并给予我国学术史上一种新的生命"。顾氏还认为"救国不是一个空谈的问题,乃是许多有效的实际规划与行动的总和",所以《禹贡》同人"希望在真实的学识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来",鼓励大家一要关注边疆,开展边疆史地调查研究,"使得荒塞的边疆日益受到本国人的认识和开发,杜绝了野心国的觊觎",二要"把我们的祖先努力开发的土地算一个总账,合法地承受这份我们国民所应当享有的遗产,永不忘记在邻邦暴力压迫或欺骗分化下所被夺的是自己的家业",三要"把我们的祖先冒着千辛万苦而结合成的中华民族的经过探索出来,使得国内各个种族领会得大家可和而不可离得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彼此休戚相关,交互尊重,共同提携,团结为一个最坚强的民族"。

在《本会三年来工作略述》一文中，指出禹贡学会的目标有八事：编辑《中国民族志》、编辑《中国地理沿革史》、编辑《中国地理沿革图》、研讨中国边疆问题、编辑《中国地名辞典》、考订校补《历代正史地理志》、辑录地方性之文化史料作专题之研究、与其他科学者合作征求地理问题之解答。

在《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一文中，列出该会未来之计划有“旅行调查”和“编辑与研究”两大类，“旅行调查”包括“西北民族感情之考查”、“西北教育之考查”、“西北经济状况之考查”、“边疆宗教之研究”、“边疆统治阶级世系之研究”等；“编辑与研究”包括“编译边疆探检记丛书”、“编纂地名索引”（含《古书地名索引》、《正史地名索引》、《历代地理专著之索引》）、“绘制沿革地理图”以及“历代正史地理志之校订与注释”、“中国内部小民族之研究”、“历代北部边防之研究”、“边陲民族史之研究”等专题研究。

齐思和在《禹贡》“三周年纪念号”发表《民族与种族》。

作者指出自从孙中山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以来的“二十余年中之中，大家的思想已经由狭隘的种族主义进到了民族主义，大家的目标已经由种族之间的倾轧移到了全民族的奋斗”，但是“一个名词用的泛了，她的涵义便不免含混，往往大家只顾得呼喊而忽略了她的意义”，所以他要重新考察“民族”与“种族”这两个概念的本意及其区别。

作者认为血统、语言、宗教、生活、风俗都不是构成民族的必须，维系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彼此间袍泽的情绪”，所以，民族是“非物质的：是主观的，非客观的”，简而言之，“民族是具有共同民族意识的情绪的人”；种族是“人类有史以来即有的老观念”，“是物质的”，是“具体的”，但是对于种族的区分都是武断不合理的。

此文是中国学界对“民族”、“种族”等基本概念的首次辨正，作者对“民族”、“种族”概念的论断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丁道谦在《食货》第5卷第7期发表《中国果真没有存在过奴隶制度吗》。

作者认为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中国同样经历了奴隶制阶段。

同期还刊载了曾謇《古代宗法社会与儒家思想的发展》，非斯《诗“食我农人”之一新解》、《诗经中表现的土地情形》，（日）森庆来著、高福怡译《唐代均田法中僧尼的给田》等文。

5日　陈啸江在《现代史学》第3卷第2期发表《中国经济史研

究室计划书》。

该计划书指出，“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的目标是在若干时期内，逐渐编纂《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丛书”（包括“断代经济史”、“各种经济部门专史”、“专题研究”）；研究方针是“切实收集材料”、“注重科学方法历史科学方法”、“缩小研究对象”。

同期还刊载了吴宗慈《太平天国纪元年号之述疑》、岑家安《中国石器时代社会研究》、关燕详《金代的奴隶制度》、董家遵《历代节妇烈女的统计》、梁瓯第《元代书院制度》等文。

10 日　吴泽在《文化批判》第 4 卷第 2 期发表《史前期中国社会之意识诸形态》。

16 日　《禹贡》半月刊出版“回教专号”。

此专号由白寿彝主编，刊载了王日蔚《维吾尔（缠回）民族名称变迁考》、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苏华盛《回汉纠纷经历录》、卢振明《开封回教谭》等文。

白寿彝《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一文论述了宋代之前南海上的香料贸易、宋代伊斯兰教徒香料贸易在南海贸易中的地位、宋代伊斯兰教徒香料贸易与宋代财政收入的关系、宋代的香料消费、作为药物的宋代伊斯兰教徒香料贸易品、宋代来中国的几个伊斯兰教徒香料商人等问题。

武仙卿在《食货》第 5 卷第 8 期《南北朝色役考》（上）。

第 10 期连载。文章列举了南北朝时期色役的种种名目。陶希圣在“编辑的话”中评论说：“假如对于‘色役’本身，再加以分析，将它与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复杂关系，将与‘色役’类似的一些东西，加以考察，或许对于南北朝社会的性质的理解，又要改变一些。”

同期还刊载了哈雷特著、李秉衡译《西欧及东洋的封建化过程》，曾謇《晋的占田与课田的考察》，杨廷贤《明末农民暴动之社会背景》等文。

是月　董作宾、胡厚宣编《甲骨年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表按年记述商代甲骨文的有关事项，以供古文字研究者查考。表分为 3 栏：纪年栏始自 1899 年（光绪二十五年），迄于 1936 年，每年标明中国年代、干支和公元纪年；纪事栏记甲骨文字的发现始末、流传情况和研究经过；撰著栏备列有关甲骨文字的专著与论文。书后附列《甲骨文论著分类索引》和《甲骨文论著撰人索引》备检。1967 年董作宾又和黄伟然合作编写《续甲骨年表》。

此表对从甲骨发现到对殷墟进行科学发掘数十年间大事的精审编排，为进一步开展甲骨文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出发点。

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瞿同祖1934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在吴文藻和杨开道指导下攻读社会史研究生，二年后硕士毕业。《中国封建社会》是瞿氏的硕士学位论文，亦是其研究社会史的第一部著作，探讨了“封建社会的形成”、“封建社会的完成”、“封建社会土地制度”、“封建社会宗法制度”、“封建阶级”、“封建政治”、“封建的崩溃”等问题。杨开道序曰：“瞿同祖对于美国现在社会研究已具根基，对于欧洲中古社会情形亦极娴熟，然后以之研究中国过去封建社会，显已立于不败之地。本书为瞿君对于中国过去社会第一次的分析，费时虽仅二载，然其了解，其组织，已有若干独到之处。比一班专讲空洞理论，或一班专收零星材料的朋友，自然又高出一筹。瞿君誓以十年二十年之精力，从事于中国过去社会之研究，从此异军突起。”

该书曾被当时国内一些大学作为参考书。1942年，它又由田岛泰平与小竹武夫译为日文，由日本东京生活社出版。不过，据《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序”可知，瞿氏本人对此书并不满意，认为它是其“著作中最不成熟的一本”。美国华盛顿大学曾经有人着手翻译此书，虽已译出一章，最终还是被瞿氏谢绝。

此书由于颇具学术价值，至今仍有再版。

方授楚《墨学源流》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墨子的生平、墨学产生的背景源流、墨家的组织及其兴衰过程等，分析了墨学的学术思想，考论了墨子的姓氏国籍等问题，并对近代学者关于墨学见解提出了不同意见。

此书实际是近代第一部贯穿古今的墨学学术史，且由于该书叙述简要，多有新说，出版后迅速引起关注。1940年中华书局再版，1957年台湾中华书局影印再版，1989年中华书局将其收入《中华文史精刊》影印重版。

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由清华大学出版。

此文系作者在清华大学史学研究所的毕业论文，由蒋廷黻等人指导。该书将朝鲜问题出现至中日宣战时期的外交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将相关条约原文附上。作者认为甲午战争并不是偶然爆发，而是日本明治政府长期推行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

该书是第一部研究甲午战争历史背景和起因的专著，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戚其章在《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一文称该书“资料准备

充分”、“结构严密”、视野开阔、洞察深邃，较日本人田保桥洁《〈天津条约〉以后中日开战以前近代日华鲜关系之研究》、信夫清三郎《日清战争——从政治外交方面的观察》二书“更有分量，也更有深度”。

陈寅恪在《清华学报》第 12 卷第 2 期发表《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

文章旨在考证向秀、郭象与支遁两种“逍遥义”的“之何所从出”，认为向秀、郭象等人关于《逍遥游》的解释“不能不受当时人物才性论之影响”，而支遁之“新义”则受惠远、道安等人“旧之格义”。

此文虽然短小，不仅是关于魏晋玄学研究的重要文章，为汤用彤、唐长孺等人推崇，也是庄子研究领域的一篇重要文章。

同期还刊载了杨树达《读左传小笺》、张荫麟《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乱（一失败之均产运动）》等文。

童书业在《史学集刊》第 3 期发表《李自成死事考异》。

作者指出关于李自成之死的时月、地点与事迹记载各异，学者争论不已，乃借编撰《中国秘密会党史》的机会，留心明清史籍关于此事之记载，并撰文对此问题进行考辨。文章认为顺治二年五月或六月，“李自成败窜湖北通山县之九宫山，为村民所困，死焉”。

同期还刊载了王振铎《〈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王静如《宴台女真文进士题名碑初释》、徐炳昶《金俗兄弟死其妇嫁于其弟兄考》、顾颉刚《〈潜夫论〉中的五德系统》、吴世昌《敦煌卷季布骂阵词文考释》、白寿彝《〈新唐书·大食传〉校注》、张西堂《荀子真伪考》、王崇武《跋顺治元年边大绶自陈伐李自成祖墓启》、郭伯恭《永乐大典纂修考》、邓诗熙《清代本章制度改题为奏考》、王辑五《中国文化东渐考》等文。

中共中央的理论机关杂志《解放》周刊创刊。

设有“时事短评”、“论著”、“通讯”、“来件转载”、“文艺”等若干栏目，主要特点是代表中共中央的主张，讨论一般原则的理论问题。周刊发表的历史类文章，通常都是一些有关史学理论的作品，内容涉及史学著作、历史人物思想和史学方法论等层面。

1941 年 7 月停刊。

傅斯年洽购嘉业堂所藏《明实录》抄本。

吴兆莘《中国税制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5 月

1 日　瞿兑之在《禹贡》第 7 卷第 5 期发表《国史与地方史》。

作者认为中国是由几个独特的文化区域结构而成，要想有一部好的国史，先要有几部以独特文化区域为范围的好的地方史。

同期还刊载了田凤章《原始时代东北居民与中国之关系略识》、冯家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王伊同《燕秦西汉与东北》、吴相湘《曾纪泽对朝鲜问题的主张记闻》等文。

16 日　曾謇在《食货》第 5 卷第 10 期发表《三国时代的社会》。

作者认为，三国时代是社会经济政治的剧乱时代，是由秦汉的社会向两晋南北朝中古的封建社会转化的枢纽。

同期还刊载了戴希震《五代峻法官僚的财富及其享乐生活》等文。

29 日　郭沫若编著《殷契粹编》由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据著者手迹影出版。

后附考释、索引。作者序云，蒙刘体智允诺，从其编撰的尚未影布的《书契丛编》中，“择取其一五九五片而成兹编。视诸原著虽仅略当十之一，然其菁华大率已萃于是矣。识见所及，具详释文”。该书为作者考释甲骨卜辞的专著之一，为《卜辞通纂》的姊妹篇。

是月　李达《社会学大纲》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

此书是 1935 年李达在《社会之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撰就。本书阐述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和二者之间的关系，将辩证法引入了历史认识。《社会学大纲》首次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历史唯物论如果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唯物论如果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李达说：“只有彻底的把辩证唯物论扩张于人类社会或历史的领域，才能使辩证唯物论更趋于深化和发展，人们才能在世界变动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他指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包括史学在内一切学科唯一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这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此书虽非纯粹的史学专著，但书中阐述的唯物史观和辩证的历史认识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翦伯赞认为此书“虽然不是一部历史哲学的著作，然而却是值得一读的”。侯外庐称赞道：“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毛泽东则谓：“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他还向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推荐此书，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高级干部学习此书。该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共十四章，第一章《引论》论述清代学术源起和宋明学术关系，为全书总纲，其余十三章皆以各个时期学术发展史的代表人物为题。各章所选代表人物主要为明末清初、乾嘉及晚清三个时期，涵盖了这一阶段学术发展史上的经世思潮、经学考据和今文经学等各个方面。他提出了著名的“不识宋学，则无以识汉学”的论断，并沿用传统的“学案”体例，对清代学术进行了系统论述。

钱穆对认为清代考据学是对宋明理学的全面反动的流行观点提出了质疑，提出了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的见解。在他看来，宋明理学在清代不仅没有中断，而且对清代汉学影响颇深。清代学术自晚明诸老开启，而诸老莫不浸淫于宋学。此后方苞、全祖望等也都于宋学造诣甚深。即使是汉学鼎盛的乾嘉时代，汉学诸家的高下深浅，也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深浅以为判。

钱著与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同名，都是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力作。但是在具体的论述上却大相径庭。梁任公主要从清代学术对理学的反动入手进行论述，而钱穆则主要围绕清学对前朝学术的继承上加以展开。就引证广博、论述详赡、考订精审而言，钱著胜于梁著。就编撰体例、考察内容而言，钱著大体不出传统学案体的格局，以政治、哲学思想为主，较少涉及其他学科。就此而言，梁著又胜于钱著。两书一为学术思想史，一为学术史，各有千秋，并行于世，代表了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两种不同风格。

四十年代，钱穆又著成《清儒学案》一书，可惜后来书稿不幸落入长江，只剩一篇《序目》。

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历程分为古代、中古、近代、现代四个时期，并逐一进行梳理。作者认为“政治思想之成因，以社会的基础为其要素。我五千年来孕育深厚之民族，以固有之民族性与环境作基础而铸成思想，复以思想之力量又铸成民族之特性，彼此循回影响，遂造成今日之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思想”。故该书的一大特点是能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究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

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旨在“阐明中日历代交通之梗概，并注重说明两国文化在交通路上之渡涉事迹”。全书按照中国朝代更迭的历史顺序组织章节，内容方面“对于古代交通史料之须待考证处及近代交通梗概之纵的说明，尤力求发

挥尽致”。

潘光旦《人文史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封面标“人文生物学论丛第二辑”，实系潘光旦的论文集，收录《文化的生物学观》、《人文史观与“人制”“法制”的调和论》、《优生与文化》、《妇女解放新论》、《名族元气篇》等十一篇论文。

《史地杂志》创刊号出版。

该杂志由浙江大学史地学系创办编辑，专门刊发历史地理著作。该杂志本为双月刊，出版两期后因抗战军兴，印刷困难，被迫停顿，1940年9月复刊。创刊号刊载了张其昀的《发刊词》及其《中国历史上之国防区域》等。

夏君虞《宋学概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对宋代思想、派别进行了全面论述。

熊公哲《王安石政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阿英《晚清小说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徐式圭《中国监察史略》由中华书局出版。

陈锡祺、徐瑞祥《本国史纲要》刊行。

6月

1日 《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出版“兵制史研究专号(下)”。

此期刊载了张荫麟《〈宋史·兵制〉补阙》、吴晗《明代的军兵》、梁方仲《明代的民兵》、罗尔纲《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等文。

吴晗《明代的军兵》一文包括“军与兵”、“卫所制度”、“京军”、“卫军的废弛”、“勾军与清军”、“募兵”、“军饷与国家财政”几个部分。有研究者指出，此文对明代军兵制度系统的梳理，对了解相关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南炳文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一文中认为吴晗此文“联系明代的政治、经济背景，分析其军事制度的变化，揭示社会矛盾，表现了较深的功力和较高的史识”。梁方仲《明代的民兵》一文将明代民兵的历史分为三期，明朝建立至宣德时期为初期，以防盗和屯戍本地要塞为主；从正统到嘉靖中叶为中期，成为国家军队之一部分，除守卫乡里外，还需参与平定国家的内乱外患；嘉靖中叶以后为后期，调动频繁，丢失本业，战斗力下降；民兵来源初由招募，后改佥编，后又改为雇募、银差，一条鞭法实行后并入秋粮中。

罗尔纲《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一文认为咸丰时期“绿营旧志既成虚设，勇营既代绿营而兴，而湘军制度复支配了咸通后的兵制”，晚清“兵为将有”的局面遂一成而不变，“且渐演渐进以成为清季的局面，终归使袁世凯得借其兵力以移清祚”。此文还对晚清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瓦解及地方财政自主权扩大的情况及其影响也有所涉及。

《禹贡》半月刊出版“古代地理专号”。

此专号由童书业主编，刊载了马培棠《三代民族东迁考略》，蒙文通《中国古代民族移徙考》，杨宽《说虞》、《说夏》，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顾颉刚《九州之戎与戎禹》、《春秋时代的县》，饶宗颐《魏策吴起论三苗之居辨误》，陈梦家《商代地理小记》，孙海波《周金地名小记》，童书业《春秋王都辨疑》，张维华《魏长城考》，钱穆《秦三十六郡考补》，史念海《秦县考》，侯仁之《海外四经海内四经与大荒四经海内经之比较》等文。

童书业在该期《序言》中指出，在中国遭受外侮凌逼趋于极点，“所有有血气的人们大家都放弃了纯学术的研究工作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至于留在学术界的人物也渐渐转换了研究的方向”的情况下，出版“这册近于考据性的古代地理专号”，并非“开倒车”，而是为了更好地“现在中国的成因”。童书业将此专号的论文分为“古代民族迁徙”、“古代国族”、“古代国族疆域”、“古代地方制度”、“考证古代地名”、“研究古代地理书”六类，并概要介绍。

刘兴唐在《食货》第 5 卷第 11 期发表《奴隶社会的症结》。

25 日　胡厚宣在天津《益世报·人文》周刊第 25 期发表《论殷代的记事文字》。

第 26—31 期连载。该文与《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考》（1944 年）和《卜辞记事文字史官签名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2 本，1947 年）提出了记事刻辞的概念，不仅纠正了此前人们普遍存在的“凡是甲骨文便都属卜辞的片面认识”，还连带“解决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甲骨学史上的大事件”。

是月　邓云特（邓拓）《中国救荒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是邓拓在河南大学学习期间，对中国经济史进行三年的研究后取得的成果。目睹国难民怨，邓拓以国计民生为念，撰成此书。

本书为中国救荒史研究的开创之作。中国历史上灾荒频发，前人对灾荒的形成及救荒工作曾有简单梳理，但缺少系统考察。邓拓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原则，依据翔实的史料，阐明了中国历史上形成灾荒的自然和社

会原因，并且论列了历代救荒赈灾的措施、效果及存在的弊端。他指出，救荒史应为一社会病态史，其任务在于揭发历史上各阶段灾荒之一般性及特殊性，分析其具体原因，借以探求社会学之治疗原则与途径。作者不仅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探讨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结构及其变化。

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初版时，为文言文，后由作者用语体文改写，于1958年由三联书店再版并增加附录。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由上海黎明书店出版。

在李达授意下，吕振羽在中国大学开设了中国哲学史课程，为与陶希圣唱对台戏，也取名“中国政治思想史”，并编成讲义。

在该书的“自序”中，吕振羽介绍了一个世纪以来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状况，批评了陶希圣、杨东篿、李季、叶青等人由于阶级的偏见带来的失误。吕振羽力图用新的观点、方法和体例，仿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写一部从古代至近百年的社会思想发展史。

本书将中国政治思想史分为奴隶制时期和封建社会时期两大段：在封建社会时期，又划出领主制的封建制的思想史发展期和地主制的封建制的思想史发展期。吕振羽把整个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概括为三条主要线索，即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没落阶级或阶层的政治思想，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他又将中国古代思想家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划分为两大阵营。此书的阶级划分方法流露出一定的政治宣传意味，影响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

此书虽然重在揭示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实际上却为整个中国思想史清理出了一个系统，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的开创性作品。书评介绍说：“关于此方面书籍固已极少，而以正确唯物史观方法写成者，更为绝无仅有。本书著作者攻史学，已往著作贡献已多，早已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本书四十余万言，尤为著者精心杰构，乃是政治思想研究方面的时代之巨著。”

据吕振羽后来回忆，他在中国大学的这门课程，大受学生欢迎，并吸引了北大、清华等校的学生来听课。陶希圣托人要求吕振羽把中大的政治思想史课让给他讲。李达对吕振羽说：“你叫黄松龄回答陶希圣，把他在北大、清华等校的中国社会史这门课让给你教，叫你统一起来。”陶希圣碰了壁。

（日）佐野袈裟美著，刘惠之、刘希宁译《中国历史教程》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此书共四篇十一章，从人种起源到北伐战争。作者主张“亚细亚的生产样式，因为在中国特殊的具体条件下，不外是奴隶占有者的生产样式(古代的生产样式的变态罢了)”。“中国的奴隶制，是从种族奴隶制发展到父家长的奴隶制。”“中国在亚细亚生产样式的基础上面，使种族奴隶有发生的可能性。”周代参与直接生产的奴隶占了相当比重。周不仅在农业上，奴隶劳动占优势，在手工业领域，奴隶劳动也很普及。

余嘉锡在《辅仁学志》第 6 卷第 1、2 期合刊发表《小说家出于稗官说》。

作者认为稗官是“小官”的统称，属于“士”阶层，其职责是“采传言于市而问谤誉”，故“小说自成流别，不可与他家相杂厕”，“稗官为小说家之所自出，而非小说之别名”。此文目的在于批驳“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此文被认为是小说起源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论文之一。

同期还刊载了陈垣《吴渔山先生年谱》，容肇祖《何心隐及其思想》，岑仲勉《〈汉书·西掖传〉校释》、《〈新唐书·突厥传〉拟注》、《跋突厥文阙特勤碑》等文。

容肇祖在《燕京学报》第 21 期发表《〈商君书〉考证》。

作者认为《商君书》除首尾两篇为后加入外主体大约“成于秦昭王晚年之时”，其内容是说“变法和法治的”，该书出现“十余年后，遂产生变法及法治主义的大家韩非。又十余二十年后，又有依着韩非的理想去实行的李斯”，到了汉武帝建元元年丞相卫绾认为“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奏请罢黜获准后，“从此商韩的法治主义便少人注意了”。

同期还刊载了杨明照《〈庄子〉校正》、郭绍虞《北宋诗话考》、陈梦家《禺邗王壶考释》、吴世昌《释〈诗经〉之于》等文。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由开明书店出版。

全书分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经学）、清（经学）六编。

傅振伦在《考古社刊》第 6 期发表《简策说》、《汉武年号延和说》。

7 月

1 日 《禹贡》半月刊出版“察绥专号”。

此专号刊载了陈增敏《察绥之历史地理概观》、李秀洁《释阴山》、张维华《赵长城考》、史念海《西汉燕代二国考》、高珮《两汉征伐匈奴

之影响》、冯家昇《蠕蠕国号考》、韩儒林《绥北的几个地名》、纪国宣《宣化县城文献述略》等文。

高叔康在《食货》第6卷第1期《山西票号的起源及其成立的年代》。

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8日 胡适因赴庐山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庐山谈话会”离京南下。

11日 姚从吾、梁实秋等北京学人开始离开北平南下。

16日 《禹贡》第7卷第10期出版，随后停刊。

此期刊载了郭豫才《洪洞遗民传说之考实》，童疑（童书业）《蛮夷戎狄与东南西北》，（日）西山荣久著、祁蕴璞译《中国大运河沿革考》，饶宗颐《海录笔受者之考证》，萨士武《记道光〈福建通志〉稿被毁事》，丁谦遗著、夏廷域校录《随銮记恩校注》，纳忠《回教与阿拉伯文明序目》等文。

因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欲逮捕顾颉刚等原因，《禹贡》半月刊在此期出版后被迫停刊。

吴先培在《东方杂志》第14号发表《明代与日本足利幕府关系之研究》。

20日 顾颉刚因被日本侵略者列入逮捕名单决定离京。

在数天之内，顾颉刚将北京事务快速结束：燕京大学事务，历史系事务交由洪业等管理；禹贡学会交由钱穆、张维华等；通俗读物社移往绥远；北平研究院职务仍由顾颉刚遥领。顾氏于22日只身前往归绥。

29日 日军轰炸南开大学，抢劫清华大学。

7月29日、30日，日军连续两天蓄意对南开大学及所属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进行轮番轰炸，南开大学成为“抗战以来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29日，日军进入清华园，数次以参观为名窃取大批珍贵图书、仪器设备，后清华大学校舍被日军野战医院152病院侵占。

是月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由生活书店出版。

本书共分三编九章。上编：亚细亚生产方法论争的意义；中编：中国奴隶社会的方法论；下编：中国封建社会的特质。作者将论战作为一场国际性的论争，对苏联、日本学术界的讨论情况作了较为详尽的评介，对论

战中的不同主张展开评述，并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

此书是社会史论战结束后第一部进行回顾和反思的专著，对论战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至今仍是此方面重要的参考书。同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问题、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存在与否及特点和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都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社会史论战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因而此书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一部重要作品。

此书 1981 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内部重印，1989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刘炼整理的《何干之文集》收录该书，1994 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刘炼整理的三卷本《何干之文集》在第一卷中再次收录此书。

傅勤家《中国道教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是中国学者自著的第一部完整的道教史，主要内容有道教史的分期、道教的起源与发展、道教的神与方术、佛道二教的竞争等。

陈寅恪在《清华学报》第 12 卷第 3 期发表《论李怀光之叛》。

文章考证由李晟率领的中央军“神策军”和李怀光领导的地方军“朔方军”“赐粮之不均”，作者并指出“怀光之所以能激变军心，与之同叛者，必别有一涉及全军共同利害之事实，足以供其发动，不止其个人与卢杞之关系而已，故神策军与朔方军禀赐之不均要为此大事变之一主因”。余英时认为，此文虽是论李怀光之叛，实际是在说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此文的另一特点是陈氏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解释李怀光为何从功臣转变为叛将的原因。

同期还刊载了陈梦家《高禖郊社祖庙通考》、朱自清《赋比兴说》、杨联陞《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雷海宗《章学诚与蓝鼎元饿乡记》等文。

雷海宗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 2 卷第 4 期发表《中国的家族制度》。

作者认为“东汉以后两千年间，大家族是社会国家的基础”，是“社会的一个牢固的安定势力”，中国社会屡经变乱而不瓦解，“就是因为有这个家族制度”；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凝聚力强大的家族制度存在，“两千年来的中国只能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而“与战国七雄或近代西洋列强的性质绝不相同”，近代中国“从一个整个的文化区，组成一个强固的国家，是古今未曾见过的事”。

同期还刊载了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乡间的信仰》等文。

北平师范大学迁往西安，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组成

西安临时大学。

1938年春，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北平师大改为西北联大教育学院。同年8月，西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并于次年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0年，奉命迁往甘肃兰州。

周嘉猷《南北史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陈元德《中国古代哲学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吴越史地研究会编《吴越文化论丛》由江苏研究社出版。

8月

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在南京成立。

日军侵占北京后，北方各大学被迫纷纷南迁。为了便于加强对战时大学的领导，国民政府命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合组新校，并在南京成立筹备委员会负责此事。

许国霖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是继陈垣《敦煌劫余录》之后敦煌学领域的又一代表性成果，其所收录的400多则题记，是具有很高价值的历史研究资料。

傅斯年主持迁历史语言研究所至长沙。

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秦松石《中国历代兵制概要》由军用图书社出版。

9月

1日　顾颉刚应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聘，任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

同月顾颉刚赴西北考察甘肃省及西宁市教育。年底任所办“老百姓”社社长，出版《老百姓》旬刊，以西北民歌方式作抗敌宣传。

8日　胡适前往武汉。

在前往武汉的途中，胡适化名致信留在北平的郑天挺，希望北大留京同仁能维持北大的“故纸堆”，“维持一点研究工作”。

胡适到汉口后迅即转往香港，于该月15日飞往美国，帮助国民政府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

10日　教育部命令组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

抗战爆发后，教育部命北平大学、北平研究院、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西迁西安，合组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西安临时大学设文理学院六个学院、历史系隶属文理学院。1938 年教育部命西安临大改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 年 8 月，改称国立西北大学，即西北大学前身。许寿裳、萧一山、陆懋德、丁山、罗根泽、黄文弼、陶文珍、王子云、陈述等都曾任教于该校历史系，所开课程涵括“史学通论”、中西历史等各方面，该校历史系尤以搜集、整理西北历史文物为重点，对此后系统研究西北历史文物打下基础。

是月　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战时读物百种”。

为了配合抗战，商务印书馆将有关战事的书籍汇集为“战时读物百种”，其中史学类有《近代欧洲外交史》、《美国外交政策史》、《日俄战争》、《世界大战全史》、《中国最近三十年史》、《中日外交史》、《中华民族的人格》等。

王重民编著《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第 1 辑由北平图书馆刊行。

《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第 1 辑 41 篇，作于 1935 年 4 月至 12 月；第 2 辑 45 篇，作于 1936 年 5 月至 1938 年 9 月，1941 年 2 月北平图书馆印行。

此书虽以介绍新发现的古籍为主，但也包含了作者的考证或与传世本对勘的结果。该书介绍的历史佚籍有：《春秋后语》之《秦语》上、中、下和《赵语》上、下，同时探索了《春秋后语》全书各卷的内容；《阃外春秋》卷一和卷二（部分），考证其作者，指出了罗振玉的疏失；《帝王略论》，考出其作者为虞世南；《籯金》，指出《略出籯金》系张球所作，并对张球的事迹进行考究。此外还有《唐高宗天训》、唐张仁亶《九谏书》和被怀疑并非今本的《晋书·何曾传》。传世史籍介绍了《古文尚书》16 件，《今文尚书》3 件，《春秋经传集解》和《春秋谷梁传集解》各 1 件，《史记集解》1 件，《汉书》3 件；分别判定了各件的抄写年代，勘对了写本与传世本的异同。3 件《今文尚书》均被定在卫包改字之前，并据以判定在卫包前已有《今文尚书》。此书出版后敦煌学界提供了许多新的信息和资料，全书后收入《敦煌丛刊初集》第九册，又汇编入《敦煌古籍叙录》。

10 月

钱穆、汤用彤、贺麟离开北平赴长沙。

三人经天津、香港、广州，于该年 11 月底抵达长沙。因北京大学文学院迁至南岳，随即随校迁往南岳，第二年春，钱穆等人又随校迁往

昆明。

11月

1日　陕北公学正式开学。

该校是为培训抗战爆发后大批涌入延安的青年所办，由艾思奇、何干之、徐冰、杨松、陈唯实等人担任教学工作。

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此日被定为西南联大校庆日。

3日　陈寅恪、毛子水、袁复礼等离北平南下。

陈寅恪等人经天津、青岛、济南、徐州、郑州多地辗转，于该月20日晚抵达长沙临时大学，并随即开始授课。

7日　顾颉刚在回教促进会作《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讲演。

顾颉刚对“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应该从事有利于民族团结的融化工作，即“表彰并推广各族优良文化”、“搜集并创作各族共有的中国通史”、“建立为各族求自由平等的舆论机关”。

是月　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3分发表《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

作者决定选择有关府兵制“前期最要之史料”，进行考试，以纠正当时学界的一种错误倾向，即“于时代至先后往往忽略，遂依据此制度后期即唐代之材料，以推说其前期即隋以前之事实，是执一贯不变之观念，以说此前后大异之制度也”。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府兵制之前期为鲜卑兵制，为大体兵农分离制，为部酋分属制，为特殊贵族制；其后期为华夏兵制，为大体兵农合一制，为君主直辖制，为比较平民制。其前后两期分划之界限，则在隋代。周文帝苏绰则府兵制创建之人，周武帝隋文帝其变革之人，唐玄宗张说其废止之人，而唐之高祖太宗在此制度创建变革废止之三阶段中，恐俱无特殊地位者也”。

何兹全1962年发表《读〈府兵制度考释〉书后》，认为陈寅恪此文过度强调了府兵制鲜卑部落兵制这一渊源，而忽略了魏晋以来汉族皇朝乃至十六国北方各族统治时期兵制的另一个渊源。

此文被认为在魏晋南北朝研究领域有“发凡起例之功”，后略微修改增加成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之“兵制”章。

同期还刊载了孙楷第《敦煌写本张维深变文跋》、李家瑞《由说书变

成戏剧的痕迹》。

陈叔陶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3分发表《新元史本证》。

作者试图“以新史之文，证新史之病”，指出柯劭忞的《新元史》存在着重复、译音、人名、地名、纪年、月日、纪事、世系、封爵、官职、氏族、宗室、谥号、姓氏、体例、书法等23个方面的错误，并举出百余处具体例子。

作者系浙江大学的土木工程系的学生，该文题目由陈垣改定，发表后引起了傅斯年等人的注意。

金云铭在《福建文化》总26号发表《郑和七次下西洋年月考》。

该期还刊载鼓山樵《清末民初福建的海防》、萨士武《郑和对于福建文化的影响》等论文。

国立中央大学西迁四川重庆沙坪坝。

傅纬平《民族抗争史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2 月

6 日　刘燿（尹达）表示要从考古研究转向抗日救国。

12月15日，为抗日救国，尹达毅然奔赴陕北。12月底，到达延安。1938年1月，改用母姓，始称尹达，4月进入马列学院学习。

是月　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由延安解放社出版。

此书署名“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实际是张闻天主持编写。

该书依据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进行总结，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教育干部、党员、军人和群众的教科书。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各大解放区、各类干部学校开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等课程，大都以它为教材或蓝本。

此书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体系，探讨了中国革命史发展线索、研究对象、分期等基本理论问题。此书是当时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共产党史研究的代表作，以后出版的许多中国革命史论著，其观点、结构、资料有不少就是源于此书。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由生活书店出版。

该书是何干之“近代史”写作计划的成果，从“启蒙运动的意义及其社会基础”、“新政派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新社会科学运动”、“国难与新启蒙运动”、“目前思想文化问题”

七个方面论述了从洋务运动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何干之认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本质上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只限于少数开明官僚的自我觉醒"；辛亥革命"与大多数国民不相干"；五四运动"只解放了一部分市民和中间层知识分子"；国民革命及以后的社会科学运动"只唤醒了南方各省和长江一带民众，城市产业分子，一部分文化人"；只有抗日救亡运动，才"抓住了全国上下利益不同的社会层"，它不仅"要求民族的解放，同时也要求社会的解放"。何干之深刻全面地论述了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新启蒙运动，指出它是过去各启蒙运动的"最高的综合"，是文化思想上的爱国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运动。

该书是第一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系统梳理论述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思想运动的著作，不仅推动了当时"新启蒙运动"的开展，而且其中的观点和一些提法对此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影响深远。

武伯纶《近世中华民族抗敌史》由西北印书馆出版。

该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为"南宋初年北方民众的抗金斗争"、第二章为"蒙古征服下民族斗争"、第三章为"清末南方人民的抗清运动"、第四章为"满清抵定中国后至太平天国的民族斗争"、第五章为"义和团之反帝国主义运动"。作者在"序言"中高呼"现在是中华民族的兄弟们，利用过去自家斗争的精神，来抵抗危害整个中华民族，妨碍我们完全达到目的的帝国主义的时候了"。

齐思和在《燕京学报》第22期发表《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

该文对胡适、冯友兰等人对"儒"的产生的阐述和儒家思想的解释提出了商榷，认为"欲了解先秦儒家思想，非先于当时制度加以研究不可也"，乃从"社会经济"的视角来解读儒家的产生，儒家与墨家、法家的争论。齐思和认为"封建制度是儒家之最高政治理想"，其"政治思想几完全建筑于封建制度之上，其论治道之精义，亦皆由封建制度抽绎而出"。至于儒、墨、法的争论，"亦皆有社会经济的背景"，墨法二派作为代表封建制坏灭以后兴起之政治社会代言的"新学派"，其主张与儒家不同，故"起而与之辩难"。

同期还刊载了汤用彤《中国佛史零篇》、顾随《元明残剧八种》、钟凤年《答吴诸两君评国策勘研》等文。

洪业在《史学年报》第2卷第4期《〈春秋经传引得〉序》。

此文近十万言，收集参考了两千余年中外学者有关《春秋》经和《公羊》、《谷梁》、《左传》的论述，结合现代知识，考辨《春秋》、《公

羊》、《谷梁》、《左传》的真伪情况、出现的时间、作者、各版本的关系等。《史学年报》所刊《春秋经传引得》一书广告称，“书前洪煨莲教授序言，关于春秋经文可信之程度，及三家经文授受源流与夫各传之成书年代，均有极精湛之论据，足破两千年来诸家聚讼之症结，留心学术史者，尤不可不一读”。余英时将此文与《〈礼记〉引得序》视为“现代文献学研究的杰作”。《洪业传》认为，洪业虽以《〈礼记〉引得序》获得法国“茹里安奖”，但很多学者却认为此文更优异。

同期还刊载了张尔田《与邓文如先生书（论清列朝后妃传稿校记）》、《先师章式之先生传》，王伊同《前蜀疆域考》，刘官谔《明宪宗赐朱永铁券考》，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齐思和的《美国史书目举要》等文。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纂出版《春秋经传引得》。

此引得以锦章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将春秋经传全文，表明章节句读，重为排印，并逐字逐词为之引得，用为检查之助。经传全文以经为纲，继列三家传文。经文以公羊为主，谷左二家文字偶不同者，亦予注明，传文排列，首公羊，次谷梁，次左氏；其左氏之与经无关者，则以‘左附’二字别之”。

《群众》周刊在汉口创刊。

1937 年 10 月筹办于南京，1938 年 10 月 25 日从武汉撤退，继续出版于重庆。这是在抗战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公开出版的唯一的理论刊物。

瞿宣颖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 3 册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将古代史籍中包括服饰、饮食、建筑、居处、器物、民族、信仰、婚姻制度、社会习俗、娱乐、社交、交通等方面的社会史史料逐一摘录、整理汇编成书。该书是中国社会史、民俗研究必备资料书籍。

张诚逊《中英滇缅疆界问题》由燕京大学出版。

沈志远《近代经济学说史》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是年

学术界开展对秋泽修二中国社会“停滞论”的批判。

1937 年 6 月，秋泽修二出版《东洋哲学史》一书；翌年，他又抛出《支那社会构成》，由东京白杨社出版。秋泽修二在这两部书中，歪曲马克思关于亚洲社会的论述，反复宣讲所谓“中国社会之（亚细亚）停滞

性”，鼓吹“此次中日事变皇军的武力”将“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使“农业的中国……与工业的日本结合”，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后书主要研究中国社会的“停滞性”。按照他的解释，古代“农村公社的遗制及农村公社关系，是中国社会内部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的根基，给予中国社会史以多少的影响”，造成了“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其特点，就是在社会“结局上”形成“社会矛盾的循环，社会过程（社会运动）之反复的形式”。这是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这种“根本性格”又是靠自身无法克服的，唯有通过外力才能打破。

中国史家出于爱国义愤，纷纷撰文反击，认为“这是一种最拙劣、最无耻的法西斯侵略主义的歪论”。吕振羽、华岗、吴泽等在重庆的一些史学工作者，都对秋泽修二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吕振羽连续写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李达发表了《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吴泽发表了《中国社会历史是“停滞”、“倒退”的吗?》，华岗发表了《评侵略主义的中国历史观》。蒙达坦、罗克汀、王亚南等一批史家也起而著文驳斥，形成了一次颇有声势的以清算秋泽修二侵略理论为内容的批判运动。

这场批判运动，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驳斥了反动文人借历史传播其侵略主义的谰言，挫败了侵略者的文化征服企图。

1937 年夏，赵纪彬译成秋泽修二的《东洋哲学史》一书，译名为《东方哲学史》，由乔绍周、周永先转艾思奇，拟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印行，但译稿在离乱中遗失。1939 年生活书店出版汪耀三、刘执之译本。

“七七事变”后，安阳殷墟的发掘活动匆忙结束。

安阳殷墟发掘获得了一批具有连锁性的考古资料，将中国的信史向上推进了数百年。殷墟发掘的考古学意义，按照李济的说法，“有三点特别值得申述：第一，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因为在殷墟发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实性是假定的。……有了史语所的发掘，这批材料的真实性才能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程度也大加提高。此后，就是最善疑的史学家也不敢抹杀这批材料。……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由此可以把那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推进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

张光直强调了安阳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殷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头一个用现代科学方法作长期发掘的遗址，所以在殷墟发掘过程中考古学者所经验出来的心得，对以后本世纪考古工作者思想和研究的习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殷墟是目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有文字记录的考古遗址，它对于中国史前和历史时期间的关系的了解上，便发生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但张光直也指出了其局限性，殷墟发掘是由对甲骨文的寻求促成的，而甲骨文研究更是文献史学的延伸，因此，殷墟发掘的主要收获还是体现在“累集史料”上，它的方法体系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史学的窠臼。

陈淳评价说：“安阳小屯殷墟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肇始。它不仅是建国前中国学者所主持的最为重要的大规模田野工作之一，而且，由殷墟发掘建立的考古学传统对其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影响至深。它塑造了现代中国考古学，并培养了中国考古学的第一代领导者。一方面，由此建立的将自西方引入的田野方法和器物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成为后来中国学者严格遵循的范例；另一方面，殷墟发掘使此前饱受怀疑的上古史再度成为信史，从而稳固了传统史学的地位，确立了考古学依附于历史学的学科属性。”不过，殷墟发掘尚属于以文献学为导向的传统途径，与现代考古学倡导的多学科综合探索仍存在很大差异。

殷墟发掘也为世界所瞩目，引起各国学者如伯希和、高本汉、梅原末治等的关注，伯希和就曾于 1935 年亲临安阳发掘现场参观。

罗振玉编印《三代吉金文存》20 卷。

1936 年，罗氏将四十年收集的金文拓片编排成此书，自费印行。该书按器具性质编排，著录铜器 4835 件，皆以原拓影印，鉴别精严，收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对铜器铭文的收集、传播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无书可替代。容庚称赞此书“收罗之富，鉴别之严，印刷之佳，洵集金文之大成”。

罗氏编印此书时，已是七旬高龄，且忙于伪满事务，已无力对所集材料整理、考释。后罗福颐撰《三代吉金文存释文》。1982 年中华书局据罗氏 1937 年原版影印此书。

复旦大学迁往重庆。

浙江大学内迁。

何天行《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由吴越史地研究会出版。

1938 年

※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出版。
※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出版。
※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
※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出版。
※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出版。
※ 徐世昌编《清儒学案》刊行。

1 月

14 日 孟森在北京去世，享年 69 岁。

是月 陈安仁《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3 月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由顾颉刚“发凡起例”并指导写作、增删审定，史念海负责具体撰写。全书二十六章，在对已有疆域沿革研究著作考察的基础上论述了夏民族的传说及其活动范围、殷民族的来源及活动范围、西周的疆域和东周的王畿区域、春秋战国时期疆域的变化和民族的同化、秦帝国的疆域及长城的沿革、从汉至清代的疆域变化、鸦片战争后疆域的变化、民国的疆域区划及制度改革等问题。

此书是现代中国疆域研究史的奠基之作，又因其饱含爱国主义，其影响超出了学术界。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印《食货志十五种综合引得》。

该书将《史记》、《汉书》至《明史》等“正史”中的十三部“食货志”和《新元史》、《清史稿》内的“食货志”，以制度名、事件、人名、地名、官名为标目，按中国字庋撷法排列，提供检索史料的方便。

同年 12 月，引得编纂处又出版了《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

4 月

2 日　教育部电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联大虽然系战时临时性质的学校，但在学术研究、教学、学生培养等方面成绩斐然，八年中，联大曾先后聘任教师 778 人，全校教师常年保持在 350 人左右，其中教授、副教授约占教师人数的一半，文理法各系的教授多在十几人以上；各系课程除按“部订”需求加以编排外，还参照各校传统，并发挥三校教授的专长，分工互补。在联大存在的八年时间中，培养了 2000 名学生，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何炳棣等。

历史系由于聚集了三校力量，如陈寅恪、钱穆、雷海宗、刘崇鋐、姚从吾、郑天挺等，故开设的课程较战前任何一校都更齐全，同一门课也常有多位教师同时或轮流讲授，在学术体系、观念方法等方面产生竞争和交融。何兆武称在西南联大历史系求学的七年是他“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

有效灵活的机制、高水平的师生传授学习、自由纯厚的学术风气使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传奇。

是月　郭沫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延揽众多左翼文化人士加入。

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由燕京大学出版。

此书是作者在燕京大学的硕士论文，共五章，分别“探讨元前社会固有经济阶级”、“讨论元代特创之种族阶级”、“说明种族阶级与经济间之冲突与调合”、“描述调合之后元代阶级之实际状况”、“叙述元代阶级制度崩溃之经过”。该书广告称该书“取材丰富，组织完整。其讨论之中心问题虽限于阶级制度，而实际其范围所及，乃包含元代社会之一般情形，对于元代社会能从动得方面看出其转变之经过”。此书在考证史实的基础上，注重从经济关系入手分析元代的阶级制度。出版后不仅受到中国史坛称誉，日本学者铃木正也认为该书是研究中国社会“必备必读之书”。

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共 44 卷，实际就是 44 个专题：“有巢燧人时社会状况”、“伏羲神农黄帝时社会状况”、“五帝时社会状况”、“三代以来首服”、“身服”、“足服”、“饮食”、“周时车马”、“汉以来车马”、“屋室”、“灯烛”、“城郭”、“都城街衢”、“市肆”、“闾里”、“祠祭”、“学校”、“农田”、“嫁娶”、“丧事”、“葬”、“坟墓”、“坐席”、“拜跪”、“讼狱”、“笔墨纸砚之沿革”、“迷信”、“禁忌”、“厕溷”、“取水、取火、取材木”、“官吏休

沐、佩印、受杖、多虱”、“古贵贱之观察”、“历代物价”、“历代称呼”、“奴婢佣赁”、“治病、傩疫”、“赋税、力役、户籍”、“行旅”、“兵事”、“岁时伏腊”、“各种游戏”、“家庭状况”、“社会杂事杂物”、“平民仕进”、“妓”。

上海一般书店开始编印“一般文库”。

该丛书包括了吴清友《苏联红军二十年》（1938 年 10 月）、周木斋《中国民族革命小史》（1938 年 10 月）、恽逸群《外蒙问题的考察》（1938 年 7 月）、贝叶《中日战争与远东新形势》（1938 年 4 月）等书。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共四章，首章叙原始地图志及其流变，次章为地图史，三章为地志史，四章述近代地理学之进步。此书材料大部分来自时人著述，一小部分为作者旧作，故评论者称“此书之作，实系编辑性质，而书中称为著作，于事实不符也”。

5 月

5 日　延安成立马克思列宁学院，张闻天任院长。

该校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校，学员多是在抗大、陕北公学或中央党校接受过训练学习，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理论基础。该学院开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近代世界革命史等课程，由艾思奇、吴亮平、杨松、陈昌浩等讲授，中共中央负责人毛泽东等也常来此校做报告。

1941 年 7 月，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指示，该院改为马列研究院。毛泽东在研究院成立会上做了《实事求是》的报告，要求马列研究院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以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敌我友三方的历史和现状。

1941 年 8 月 1 日，马列研究院改称中央研究院，张闻天任院长，范文澜任副院长。该院下设中国政治研究室、经济研究室、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等九个研究室。历史研究室下设近代史、农民土地、民族三个组，首要的任务是完成毛泽东亲自下达的任务，即编写一部十多万字的中国通史，范文澜、叶蠖生、李微、佟冬、齐燕铭、金灿然、陈道、孙孝实、刘亚生等参加了这一工作。此外，近代史组还有近代史、苏维埃运动史、中国经学史等计划，土地组有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农民战争史等计划，民族组有民族史等计划。

是月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目录学专史，此书以主题为线索，分为“溯源篇”、“分类篇”、“体质篇”、“校雠篇”、“史志篇”等，尽管有缺点，但仍为此后中国目录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王重民在1956年重印“后记”中认为尽管姚名达此书出版后相关论著“不下二三十种”，但“不论在采集资料方面，或在编写内容方面，都应该以姚先生这部著作为最好”。

1939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年表》，该表以时间为序，将从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至1936年底的中国目录学大事排比考订，编成一书，以补《中国目录学史》之不足。该书于数千年公私图书目录编纂原委、图籍文化盛衰递变、与目录编纂有关的求书、校书、藏书、典书典制沿革诸事都有叙述。姚名达自言此书“无一字无来历，故每事皆注出处”，正是由于该书具备较高的学术价值，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71年重印。

周一良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4分发表《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论宇文周之种族》。

《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包括“南朝境内各种人之分布”、“南朝政府之政策——对特殊分子”、“南朝政府之政策——对一般分子”等内容。《论宇文周之种族》一文认为宇文周的先世当为匈奴。

此两文是作者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的早期论著，也是代表性著作。作者自述称，1935年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即受到陈寅恪的影响，并决定以魏晋南北朝史为终身的研究对象，1936年进入史语所工作，“到史语所后一年中所写关于南北朝各种人、宇文周种族、领民酋长等三篇论文，着眼于南北侨旧的分野、民族问题、婚宦问题等，研究的途径和成果，显然是陈先生影响下的产物”。陈寅恪在1942年发表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第1、2分合刊的《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前“小引”中，特别提及周一良，并明确说对周氏《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深为倾服”。后陈寅恪命蒋秉南编纂文集时，将此段话刊落。

同期还刊载了劳榦《中国丹砂之应用及其推演》、陈述《曳落河考释及其相关诸问题》等。

6月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书末《跋》云：“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尝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

义积年，汇成卷帙。自知于佛法默应体会，有志未逮，语文史地，所知甚少。故陈述肤浅，详略失序，百无一当。惟今值国变，戎马生郊，乃以其一部勉付梓人。非谓考证之学可济时艰，然敝帚自珍，愿以多年研究所得作一结束。”此书乃作者积十余年之力而精心结撰的一部力作。

全书共二十章，第一至五章内容为“汉代之佛教”，第六至二十章内容为“魏晋南北朝佛教”，主要论述了佛教传入中国早期（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历史，注重探讨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汇与冲击。该书规模恢宏，结构谨严，材料丰富，考证精密，是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著作。有研究者认为迄今为止，在史料方面，尚未有同类著作能够超越和取代此书。

此书赢得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在海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胡适在校阅该书稿本第一册时称：“锡予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贺麟评论云：“汤用彤得到西洋人治哲学史的方法，再参以乾嘉诸老的考证方法。所以他采取蔡勒尔治希腊哲学史一书的方法，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丰富，方法严谨，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此书后获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研究评奖哲学类一等奖。

刘选民在《燕京学报》第23期发表《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

此文对清人的发祥地、诸部落的并附经过及其疆域进行钩稽考索，“以明清人肇兴之迹”。

同期还刊载了容肇祖《焦竑及其思想》、刘选民《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侯仁之《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市马考》、杨明照《〈吕氏春秋〉校正》等文。

侯仁之在《燕京学报》第23期发表《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

此文由顾颉刚带领侯仁之等燕京学生前往宣化、张家口实地考察引发兴趣，文章探讨了“明代马市之起源”、“嘉靖朝之马市”、“隆庆朝之马市”等问题。作者后来回忆指出，“这篇论文是我第一次把一处古代遗址的研究扩大到一个地区的开始，也就是‘从点到面’的开始，从而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历史遗迹应该得到充分重视的意义”。

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考证中国尺度的起源、变迁及变迁原因，是中国度量衡史研究的新成果。

陈安仁《中国近代经济史纲》由汉口前进书店出版。

7 月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由艺文研究会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

1938 年，蒋氏从莫斯科驻苏大使任上回国，在汉口等待授职时，写成 5 万多字的《中国近代史》。

本书始自鸦片战争，迄于“七七”抗战，共分“剿夷与抚夷”、“洪秀全与曾国藩”、“列强及其失败”、“瓜分及民族复兴”四章。此书特点是：（一）将中国近代史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去认识，（二）以近代中外关系史为重点，（三）提出了中国近代的迫切问题即如何实现近代化的问题。该书将 1840 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作者认为，一部近代史“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围绕这个根本问题，近代中国形成了学习和不学习西方两派势力的斗争。

蒋廷黻深受马士的影响。虽然他屡屡批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并且渴望能超过马士的“蓝皮书历史”，“建构一个中国立场上的历史体系”，但实际上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体系架构、叙事方式和解释思路上，蒋廷黻完全承袭了马士的观点。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对当时和以后的研究影响很大。1939 年，郭廷以说：“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罗家伦）同开其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964 年，他又评价说：“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蒋先生是个开山的人。近四十年来，蒋先生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特别是给我们新的方法与新的观念。”1965 年，李济也称赞说：“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始资料点活了。”

书中一些偏颇论断也为时人所非议，如为鸦片战争中琦善辩护、指责林则徐等，受到萧一山、陶元珍等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范文澜、翦伯赞等，认为蒋廷黻站在买办阶级的立场上，公开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辩护，《中国近代史》是买办洋奴史学的代表性著作，因此对其进行了批判和驳斥。

此书出版后广为流传。1939 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印行第 2 版；同年，重庆青年书店重印。1949 年 7 月，台湾启明书局以《中国近代史大纲》为书名重排出版。

长沙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日本问题研究丛书”。

该丛书收录的史学类书籍有：周伊武《最近之英日外交》（1938年7月），李毓田《古代中日关系之回溯》（1939年1月），孔志澄、叶祝九编《日本现代人物传》（1939年3月上册出版，7月中册出版）等。

上海华美出版公司编印《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上册。

下册于该年10月出版。同一时期类似的书籍还有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社出版的白水编《中国的抗战——日本侵华大事记》上下册。

（日）白鸟库吉著、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1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2辑1940年出版。

邱汉平编辑《历代刑法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张西堂《王船山学谱》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

28日　中国被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历史学大会正式接纳为会员。

当时正以北大文学院长名义在美国开展外交活动的胡适，以普鲁士科学院通讯研究员的身份受邀参加。8月27日，胡适出席国际史学会的远东委员会。次日大会开幕，史学会理事会上，增补中国、梵蒂冈、爱尔兰为新会员。30日上午，胡适最后一位宣读了题为 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for Chinese History（《新发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材料》）的论文。开会期间，胡适几乎每天出席，听取各国代表宣读论文。至9月3日，史学会闭幕。

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出席国际历史学大会，颇受欧美汉学界关注。

是月　郭大力、王亚南译全本《资本论》开始由读书生活书店出版。

1928年，郭大力和王亚南在杭州相遇，决定共同翻译《资本论》，王亚南译第1卷，郭大力译第2、3卷并负责校稿，至1938年方才告竣。读书生活书店1938年8月开始印刷，9月印毕。本计划由香港转广州而运送到后方销售，但是书运到广州后恰遇广州沦陷，书被毁。1947年读书生活书店在上海重印2000部，1948年纸型运到东北解放区后又印3000部。新中国成立后，郭大力又开始修订译本，1963年修订第1卷出版，1964年修订第2卷出版，1968年修订第3卷出版。

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是所有《资本论》中译本中最完整、

最精确、影响最大的译本。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由长沙新知书店出版。

关于此书写作缘起，作者说，在抗日战争“这样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决没有闲情逸致埋头在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观上，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是为了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批判“隐藏在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与行动阵营中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等等有害倾向”而写的。

该书共六章。第一章“绪论”探讨了“历史科学的任务”和“历史科学的阶级性”等问题。第二章“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论述了“一般性与特殊性之辩证的统一问题”、“关于历史发展诸阶段的几个问题”、“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在第三章“历史的关联性”中，作者阐述了历史的发展诸阶段之间的关联问题，历史发展的横向关联问题，“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辩证的统一”问题，“从历史的关联性认识历史之全面的发展”问题。在第四章“历史的实践性”中，作者评述了各种历史理论学派对历史的客观性、实践性的看法。在第五章“历史的适应性”中，作者分析了“下层基础与上层诸建筑之辩证的统一”问题。在“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的第六章中，作者说明了“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之提出及其展开”，包括“胡适、顾颉刚等的见解及其批判”、“陶希圣的见解及其批判”、“李季的见解及其批判”、“郭沫若的见解及其批判”、“吕振羽的见解及其批判”、“佐野袈裟美的见解及其批判”、“留下来的几个问题与我的见解”。

《历史哲学教程》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上的又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此书以社会史论战以来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为背景，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一些历史理论，尤其是那些“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曾经或一直到现在还可以多少发生一些支配作用的几种理论体系之彻底地澄清”。此书的另一任务是阐发历史唯物主义，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

此书出版后，翦伯赞又从事《历史科学方法论批判》一书的写作，计划写 40 万字，已成 20 余万字，可能因为中途离湘赴渝，此书惜未完成。

1939 年，桂林新知书店修正再版，并增加《群众、领袖与历史》一篇为“再版代序”。此版发行不久，即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抗战胜利后，1947 年，上海新知书店重印。1949 年 5 月，长春新中国书局再次重印。在此前后，不少学校将该书作为讲解唯物史观和史学方法论的教材使用。

世界书局开始出版胡山源编著“明季忠义丛刊”。

该丛刊收录胡山源编著《江阴义民别传》(1938年8月)、《嘉定义民别传》(1938年12月)、《各地义民遗事》(1940年3月)、《各地忠臣遗事》(1940年3月)、《扬州义民别传》(1941年10月)。

9月

22日　教育部颁布《文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

《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两科目被列为文学院共同科目，讲解重点为“注重文化之发展”，均为6个学分，其中《中国通史》第1学年学习，《西洋通史》第2学年学习。另外，《中国通史》、《西洋通史》被列入《法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中国通史》被列入《理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

是月　《古史辨》第6册由开明书店出版。

本册由罗根泽主编。第6册上承第4册，是诸子丛考续编，上编通考先秦诸子，下编专考老子。

冯友兰序云：“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即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的。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

华善学《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由汉口新知书店出版。

据《北京图书馆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简目》可知，该书还有1939年6月新知书店版，1946年10月胶东新华书店版，1947年3月大连大众书店版，1949年6月苏北新华书店版。此书是胡绳所编“救中国通俗小丛书”之一，该丛书还有曹伯韩《法国民族解放斗争史》等。

吴玉章在《解放》第52期发表《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

文中指出：“现在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主要地是研究阶级社会底产生、发展和衰落底科学；是研究阶级斗争底科学。”他希望人们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了解人类真正的历史，研究我们的历史，把历史科学作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斗争工具。

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由生活书店出版。

此书系作者在上海暨南大学和法政学院的讲义，主要内容有“国际资本主义前期中的中国外交”、“资本主义侵入时的中国外交”、“帝国主义

初期的中国外交”、“世界大战中的中国外交”、“全国民觉醒中的中国外交”、“国民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外交”、“世界经济危机中的中国外交”等。

作者在“八一三”事变后组织战地服务队，投身抗战工作，后因染病撤回租界，1937 年 1 月因病去世。其身前友朋为纪念作者，集资出版了该书。

侯外庐由汉口到达重庆。

侯外庐到重庆后，担任了中苏文化协会的机关刊物——《中苏文化》的主编。侯氏在重庆期间，与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杜国庠多有来往。

国民政府派胡适为驻美大使。

10 月

19 日　中山大学开始撤离广州，迁往云南。

是月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政治报告。

毛泽东将有一定的历史知识看作革命成功的关键。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

牛津大学决定聘请陈寅恪为中文教授。

陈寅恪接受牛津大学的聘任后，先后两次赴香港，准备前往英国。第一次是 1939 年夏由昆明到达香港，正准备转乘轮船赴英就任时，适逢欧战爆发未能成行，无奈于 9 月返回昆明。次年夏，陈氏再次赴港，“待赴英时机。既难成行，就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结果陈氏终未能赴牛津就任。

蒋介石《力行哲学》由黄埔出版社印行。

本书发挥孙中山“知难行易”说，提出“不能承认唯物论，亦不能承认唯心论，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的观点。

杨树达随湖南大学迁往湘西辰溪。

11 月

15 日　吴金鼎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之命前往大理调查古迹。

是月　（德）马克思著、郭沫若译《德意志意识形态》由言行出版社出版。

1931 年译讫，并作《译者弁言》，肯定本书“在马克思主义上所有的重要意义”，并说明“译笔主在力求达意，然也极力在希图保存原文之风格”。译稿原交上海神州国光社的王礼锡，因时局动乱而耽搁数年。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由上海圣教杂志社出版。

该书主要探讨梳理了唐宋元明清及民国初年天主教（含犹太教等）传入中国的情况。有研究者认为此书“取材颇精，堪称佳构，惟文笔稍欠流畅”。

12 月

19 日　顾颉刚主持创办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

顾颉刚在《边疆》发刊词中写道：“要使一般人对自己的边疆得到些知识，要使学者们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要使企业家肯向边疆的生产事业投资，要使有志的青年敢到边疆去作冒险的考查，要把边疆的情势尽量贡献给政府而请政府确立边疆政策，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直到边疆……也成了中原而后歇手。”

傅斯年写信给顾颉刚，劝其对“边疆”、“民族”两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顾氏接信后，即作《中华民族是一个》刊于周刊。他在日记道：“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以告同人；此为久蓄了我心之问题，故写起来并不难也。”在这篇文章里，他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汉族’，这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组成的，根本没有这一族。”

对此，费孝通基于社会学者的立场持不同意见，致信《边疆》周刊讨论，顾氏撰文作答。后来费氏明白此文是针对帝国主义假借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阴谋，他“完全拥护”顾氏的政治立场，而保留在学术上的分歧，因为“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所以没有继续辩

论下去。

是月　顾颉刚在昆明任云南大学教职，开始撰写《浪口村随笔》。

顾颉刚在西北时已决定就聘云南大学教授，从12月开始正式担任“经学史”、“中国上古史”课。不久住昆明北郊浪口村，尽力读书，记笔记《浪口村随笔》三册（后陆续刊发在《责善》半月刊），并编写《上古史讲义》十多万字，“甚欲以现阶段之古史研究施以系统化，俾初学得承受较正确之古文常识，民族、疆域、政治、社会、宗教、学术各方面无不当注意者”，希望通过此讲义的编写总结自己多年来研究所得，并吸收现阶段的最新成果，对古史进行全面建设。

这份讲义不仅在内容上大大扩展了范围，而且采用了一种独特的体例：正文是通俗体裁，注释是考证体裁。以叙述性文字撰述，“使读之者弗为考证之语所困”，又因为上古史材料少而问题多，如不加考证则无法看出真相，故又摘取自己及他人之研究结果以注语形式附于文后，“备有志治史者之寻省”。这是将叙述与考证两种体裁兼容、通俗与精深相结合的一种尝试。这是继《汉代学术史略》之后顾颉刚在专门文字通俗化方面的又一次努力。

陈梦家在《燕京学报》第24期发表《五行之起源》。

作者认为五行之成立“约当孟子、邹衍之时，其学兴于齐，齐学之历物、地理、天文、阴阳，皆为构成五行论之预备。五行者分析万物为五个原素，此历物也；此五原素之金木水火互胜互克，而为其中和者土，此阴阳生中和之说也；五行依四时而运转，此天文也，五行各有其方，此地理也。五行之行，源于四季行火，古有拜火之俗，而水火为妃，此为五行相胜最古之源；五行之官，源于商之帝五工臣，帝五工臣为天上五神，此五神分司五种势力，与五行之但重地与物之分析，有先后之别焉”。

同期还刊载了夏承焘《白石道人行实考》、郑骞《善本传奇十种提要》、周一良《读书杂识》等文。

齐思和在《清华学报》第24期发表《战国制度考》。

作者认为“封建之废、郡县之兴，皆发生于战国，此实中国制度史上最重要之关键”，但学者“于战国制度不肯措意”，故其决定在这些方面收集材料，撰写论文。该文从“土地私有制之成立”、“工商业之勃兴”、“阶级制度之废除”、“平民之仕进”、“集权政体之出现”、“中央政府之组织”、“地方政府之组织”等方面对战国制度展开论述，被认为是战国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论著之一。

《史学年报》出版“第十周年纪念特刊”。

该特刊刊发了洪业《阎贞宪先生遗稿五种》，聂崇岐《宋代制举考略》，曹诗成《匕器考释》，葛启扬《卜辞所见之殷代家族制度》，刘选民《清代东三省移民与开垦》，熊得元《顾亭林之经济思想》，齐思和《战国宰相表》，王钟翰《清三通之研究》，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邓之诚《官制沿革备论——论秦以后无真宰相》（上），陆钦墀《英法联军占据广州始末》，萧正谊《西力东渐与日本开国经过》，何炳棣《英国与门户开放政策之起源》，张尔田《孱守斋日记》，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补编》、《燕京大学图书馆善本方志题记》，顾廷龙《读汉金文小记》，容媛《经籍要目问答》，王伊同《德氏〈前汉书译注〉订正》，张尔田讲、王锺翰序录《〈清史稿〉纂修之经过》，齐思和《〈史学年报〉十年来之回顾》、《历史学会十年来职员名录》等文。

聂崇岐《宋代制举考略》一文探讨了宋代的“制举”制度。作者认为“制举兴于汉，盛于唐，而余绪延及于宋”，宋代制举“初法于唐，后乃稍变”，且“较唐代多所损益，若方以汉之贤良，其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文章对宋代制举的“沿革及科目”、“应制举者之资格及看详事例”、“阁试”、“御试”、“科分及待遇”、“宋人对制举之称谓及意见”等问题进行了梳理考辨，最后得出结论“宋举制科，流宕所及，徒为读书人多闻一进身之径而已”。此文被认为是宋代科举制研究的重要论著之一。

刘选民《清代东三省移民与开垦》认为虽然中外学者对东三省移民问题已有所研究，但“大都侧重民国以来之移民概况，其于移民之沿革、开放之源起、放垦之经过，少有系统之研究”，乃“将散见档籍之诸资料，勾稽蒐集，拾掇成篇”，“以地域为经，以年代为纬”，分述东三省“放垦设治之沿革”。

余嘉锡在《辅仁学志》第7卷第1、2期合刊发表《寒食散考》。

作者认为鸦片之祸，人已能详细，但寒食散之为害，学者罕言，实际上寒食散“杀人之烈，较鸦片尤为过之”，故作者“乃考其药之名品，从而推论其所以然，以为读史之助，且愿世之饮鸩自甘者所儆焉”。该文不仅因对魏晋人服食寒食散等史事的梳理在魏晋史领域有重要影响，也因其寒食散的名称、成分等之考辨，在中国医药史领域有影响。

同期还刊载了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方甦生《清太祖实录纂修考》、牟润孙《宋代摩尼教》、启功《山水画南北宗说考》、单士元《恭王府沿革考略》、周祖谟《景松本刊谬正俗校记》等文。

徐慕云《中国戏剧史》由世界书局出版。

该书共五卷，分别为“古今优伶戏曲史”、“各地各类戏剧史”、“戏剧之组合”、“脸谱服装在剧中之特殊功用”、“戏剧之评价与其艺术之研究”，并配有一些脸谱和剧照。该书是第一部完备的中国戏剧史，较准确地梳理了中国从周代迄民国的戏剧发展历程。

北平研究院在昆明重组史学研究所。

顾颉刚仍遥任历史组主任。旧职员留何士骥、吴世昌、许道龄、苏秉琦四人，新聘韩儒林一人。在滇参加工作者，为张维华、白寿彝、宓贤璋等。

是年

徐世昌编《清儒学案》刊行。

《清儒学案》的纂修，始于1928年，迄于1938年。这部书虽因系徐世昌主持而以徐氏署名，实是集体协力的成果。当时知名学人孙夏桐、王式通、金兆蕃、朱彭寿、闵尔昌、沈兆奎、傅增湘、曹章、陶洙等均先后参与其事。

全书凡208卷，收入学者计1169人。上起明清之际孙奇逢、顾炎武、黄宗羲，下迄清末民初宋书升、王先谦、柯劭忞，一代学林中人，举凡经学、理学、史学、先秦诸子、天文历算、文字音韵、方舆地志、诗文金石，学有专主，无不囊括其中。《清儒学案》承黄宗羲、全祖望二家开启的路径，采用学者传记和学术资料汇编的形式，述一代学术盛衰。它既是有清一代260余年间学术的总结，也代表了传统学案体史书的高峰。

谢兴尧在北京编印《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

此书分为四辑，第一辑为谢兴尧的论著题跋等，第二辑为太平天国史料中的稿本、珍本，第三辑为谢兴尧所编有关太平天国的诗史，第四辑为史料选录及当时有关人物的信函。前三辑共印100部，第四辑因须照相等，无力付印。1968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再版。

罗继祖《辽史校勘记》8卷石印问世。

作者祖父罗振玉认为随辽人墓志的大量发现，可用以校史，遂命作者通校《辽史》，并为校记。作者以清武英殿本为底本，以元刊本及明南北监本参校。其校勘方法有二：一是以出土辽代墓志碑刻校史，一为用《辽史》本证。所校出《辽史》之误漏异文，作者自序归纳为四类：一曰姓名之异，二曰名字互移致生歧误，三曰记事矛盾，四曰疏漏。其中《百官志》之校勘成绩最优，学者认为“几乎可以补出一卷《百官志》来了”。

此书至今仍是研究《辽史》必备的参考书。

1958年重加校订和标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

春，傅斯年主持迁历史语言研究所至昆明。

冬，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共同组织“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

1939 年

※ **毛泽东开始主持撰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系统阐述中共的中国历史观。**
※ **（苏）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译本出版。**
※ **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史馆。**
※ **华岗《社会发展史纲》出版。**
※ **杨鸿烈《史学通论》出版。**
※ **周谷城《中国通史》出版。**

1 月

12 日　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该会由边疆教育问题讨论会改组而来，根据 1940 年 5 月 8 日公布的《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章程》，该会是负责蒙藏等边疆地区教育的学术机关。委员会委员除有一些政府机关的官员担任外，还聘任一些学者，如顾颉刚、吴文藻、黄文弼、荣祥等。1941 年 6 月 12 日，边疆教育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召开，通过涉及边疆教育和研究的提案 30 余件，对边疆教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会于 1949 年停办。

14 日　伪北京大学成立。

该大学由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合并而成，伪教育部长汤尔和兼任监督。同年 8 月，该校成立文学院，周作人为院长，设中国文学、西洋文学、日本文学、史学、哲学五系。

17 日　钱玄同去世，享年 53 岁。

毛泽东致信陕北公学教授何干之。

信中说道，“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

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他还谈到自己“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的设想。

是月　朱希祖代张继起草的《请建立总档案库设国史馆议案》获得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

后国民党政府决定设立筹备委员会，委托朱希祖筹划其事。朱希祖在《建立总档案库筹议设国史馆议》中说：“惟中国绵延不绝者，端赖历史悠久，取精多而用物宏，其势然也。然则自吾祖宗缔造历史，历代赓续，未有中绝，垂四五千年，而光照天壤，世界各国无与伦比，国土之大，人口之众，皆受历史精神融铸，断然不可分割，为子孙者，岂可妄自菲薄，不为之继续撰述，传之无穷，而自侪于无史国家乎？夫欲续历史，不可不设国史馆，欲保存史料，不可不设档案总库。盖国家档案，为史料之渊海，国史之根柢，实为至高无上之国宝，当局缔造经营之苦心寄焉，国民劳苦建设之精神系焉，故保存之方，尤宜尽力讲求。”

朱希祖撰就多篇有关史馆修史的文章，阐述国家修史的重要性、历代修史机构的组织运作，总结反思古今中外国家修史的经验教训，制定国史馆的组织条例和选拔史学人才的条例。朱希祖认为设立史馆修史，从根本上是为了保全国史，增强民族自信心。他说，“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盖吾族自有其历史，决不甘屈服于他族之下。是故亡史之罪，甚于亡国。国亡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何则，其魂魄永存，决不能消灭也”。

杨鸿烈《历史研究法》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共十章，分别讨论了历史研究法的意义与重要性、研究题目的选择、史料的范围与分类、史料的搜集与审定、史料的整理和批判等问题。

2 月

8 日　朱希祖谈治史门径。

朱希祖日记中写道：“古人言作史须具三长：曰才、曰学、曰识，而姚姬传言作文亦须具三长，曰词章、曰考据、曰义理。词章属于才，考据属于学，义理属于识，二者本可相通，故决定今后治史，第一宜致力于文章，以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韩愈、章太炎为则，而以蔡邕、司马光辅之。第二宜专治一代历史，而考据其全体，庶不流为烦琐之考证。第三宜治社会科学及哲学论理学，则义理不致于偏颇寡陋。”

20 日　毛泽东读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后致信张闻天。

其中提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伯达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还觉得不大严肃。"

是月 （苏）斯大林著、博古总校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由中国出版社在重庆出版。

1938年11、12月，该书第七章和结束语被译成中文在《解放》周刊第28、56期发表。此书迅即出现了四种不同的中译本：第一种由博古任总校阅，中国出版社1939年2月在重庆出版，这一译本见于大后方各省；第二种由吴清友翻译，上海启明社1939年5月出版；第三种由苏联外文出版局在苏联主持翻译出版，实际由任弼时等译成，题为《苏联共产党（波尔什维克）历史简要读本》，通行于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大后方和华中各地亦常见；第四种是延安的译本，由解放社于1939年5月出版，分上、下两册，主要流行于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

《解放》周刊第70期发文高度评价该书，认为它"是苏联共产党（布）党史委员会最近编成的一部最忠实、最完善、最成功的，充满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对全人类有伟大贡献的一部光辉灿烂的党史。这同时是一部俄国革命胜利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历史。它的历史非常广袤、丰富，它的经验非常值得珍惜宝贵。"毛泽东指出："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

在中共中央的提倡下，陕甘宁边区刊印了莫斯科译本，并组织高级干部从1939年5月起至1940年5月学习该书；中级干部从1940年6月初起至1941年3月学习该书。在学习中，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成立的"联共党史读书小组"拟以党史为中心；国际问题研究室在开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原因、经过与结束"的历史研究中，也把《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第六章第一节至第三节列为参考书。后来学习还推广到一般干部和党员层次。

书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肯定了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即原始公社制、奴隶占有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是历史分期问题产生了巨大影响。

张心澂编著《伪书通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对1059种古书进行考辨，集古今考辨伪书之大成并带有工具书

性质，分“总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道藏部”、“佛藏部”七部分。其总论部分实际是对前人辨伪学的总结，阐述“辨伪之缘由”、“伪之程度”、“伪书之来历”、“作伪之原因”、“伪书之发现”、“辨伪律”、“辨伪方法”、“辨伪手续”、“辨伪事之发生”九方面的问题。

陈昌浩《近代世界革命史》第1卷由解放社出版。

第2卷9月出版。第1卷包括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19世纪上半期的劳动运动三章，第2卷包括1848年法国革命、1848年德国革命、18世纪到19世纪欧美民族运动。书中所附广告称该书“对于每一次革命运动，都详细说明它的政治经济根源，当时各阶级的立场及作用，它的结局和它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并认为“近世世界革命史是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不可分离的一门功课，而本书是一本再适当没有的教科书”。

郑肇经《中国水利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河川为经，以时间为纬，精炼地梳理了从尧舜到近代的中国水利发展过程，并对水利规律进行了总结。侯仁之称“手此一编，可以略知国家历代水利兴废之大端。又叙述至于当代，于近年河渠工事，亦可参考”。

吴黎平（吴亮平）、刘云合译《法兰西内战》由延安解放社出版。

陈和山编著《世界文化史讲话》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印《47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

3月

29日　吴金鼎、曾昭燏等在云南大理苍洱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掘。

这一调查和发掘工作是在吴金鼎的前期的调查基础上展开的，一直持续到1940年，先后发掘了佛顶甲乙二址、龙泉遗址、云甲址等遗址，是抗战开始至1949年之间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工作之一，1942年中央博物院出版了《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一书。

中华书局开始编印“历史丛书”。

该丛书收录的书籍主要有洪钧培编著《春秋国际公法》（1939年3月）、何健民编著《匈奴民族考》（1939年4月）、《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1939年8月）、陈栋编《历代建元考》（1941年8月）、陈里特编著

《中国海外遗民考》（1946 年 11 月）、夏光南编著《中印缅道交通史》（1948 年 8 月）、严中平编著《清代云南铜政考》（1948 年 8 月）等。

李平心《各国革命史讲话》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

此书介绍总结了近百年来世界历史变革的政治风云，将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经验与教训直接服务于抗日民族运动。作者在自序中明确指出："革命史是过去革命斗争的总结，它的最大作用在于激励被压迫大众为变革人类历史及改造自己命运而奋斗。贯通丰富的战斗经验与战斗教训，使革命指导者和革命大众有所借鉴。"

安阳武官村发现司母戊（或称后母戊）大方鼎。

4 月

1 日　《读书月报》第 1 卷第 3 期开辟"学术中国化问题"专栏。

此期专栏刊载了潘菽《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柳湜《论中国化》等讨论"学术中国化"问题的论文。

15 日　《理论与现实》在重庆创刊。

沈志远任主编，艾思奇、李达、侯外庐、翦伯赞等任编委。《创刊献辞》云："理论现实化"与"学术中国化"是两大原则，革命的三民主义是"现实化"和"中国化"原则之下深化理论的总绳准。

创刊号刊载潘梓年《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和侯外庐《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两篇重要文章。

1941 年停刊。

是月　华岗《社会发展史纲》由生活书店出版。

华岗在该书"序"中指出，在"帝国主义强盗正在进行人类大屠杀与我们中华民族正在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非常时代"，更"需要知道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使"许多先进人类的奋斗经验和教训，来帮助我们挣脱苦难以争取解放和自由"。华岗认为蔡和森、李达等人的《社会进化史》普遍存在三方面的缺陷：一是多用进化论来解释社会演变，注重量的变化，而忽略了社会发展中质的突变；二是未能完整地叙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多是讲到资本主义为止；三是很少谈中国，更"不能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世界史的全体范围上来观察，而给以正确的评价"。

华岗认为社会发展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实践生活及其发展过程，特别是研究生产规律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科学"，故用"社会发展史"的概念代替"社会进化史"。这源于华岗对历史学的认识，即历史科

学的任务不仅是把握社会形态与构成及其进化的全过程，而且要“从人类历史运动的总行程中，加以全面分析，探求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并根据这种规律，来说明并指导人类实践生活之历史的具体性及其发展方向”。

该书由于尽力克服了此前同类作品的缺陷，并较完整系统地叙述了人类历史上的各种生产关系的基本形态和历史进程的必然规律，更论及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形态，出版后颇受欢迎。李达曾向青年推荐该书，认为其与艾思奇《大众哲学》两书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很好的入门书。

1950 年 1 月，三联书店出版了该书的增订版。

杨鸿烈《史学通论》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是作者在各大学的任课讲义。杨鸿烈试图“供给读者历史的基本知识，使明了历史究是怎么一回事”。

全书共七章。第一章“导言”，罗列大量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和“史学”的论述，指出许多人概念上的错谬，并阐明作者本人的定义。第二章“史学的‘科学性质’的鉴定”，介绍中外学者在史学是否是“科学”的问题上所产生的争论。第三章“史学的‘今’与‘昔’”，通过对古今历史学在选材和方法等方面的分析，对旧史学提出两点批评。第四章“论历史的正当‘目的’”，认为“历史家的责任不过是在搜集、鉴别和整理史料罢了”，“不过是‘记真事’、‘说真话’罢了”。第五章“论历史的功用”。第六章“论历史的分类”，列举评析中外史家关于史籍分类的不同标准。第七章“论与历史有关系的种种科学”，着重论述了语言文字学、年代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文学、哲学等与史学的关系。

作者信奉多元综合进化史观，他断言：“凡是一元的历史的解释都不可靠。”他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他说，把历史与经济结合得最密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经济史观”，而经济史观只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派别；此外，如波丹、孟德斯鸠、博克尔的人种地理史观，斯宾塞、摩尔根、赫胥黎、尼采的生物学史观，甚至弗洛伊德的“色欲史观”，都是唯物史观的不同派别。

与其他“史学概论”作品相比，本书有一显著特点，即材料丰富、分析详尽。新旧中西，无所不用。引证虽繁，但能以类相从，条分缕析，水到渠成地引申出自家结论。本书是杨鸿烈史学思想的代表作，优于其《史地新论》和《历史研究法》。

钱端升等著《民国政制史》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介绍民国以来25年间中央及地方政治制度，着重述及各级政府机关的法定组织及其法定权力。

钱亦石遗著《中国政治史讲话》由重庆生活书店出版。

张觉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

5月

20日　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

其中提到，“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毛泽东特别强调：“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

是月　叶景葵、张元济、陈陶遗在上海发起成立合众图书馆以保存文献。

叶景葵、张元济等人在中华民族存亡之际，目睹中国文献典籍或损毁散佚，或为外人所得，心痛不已，认为“应负起保护固有文化之责任”，乃决定致力于中国文献典籍的存亡绝续。叶景葵出资10万募集10万以为建馆资本，几位发起人将自己所藏图书捐出部分以为基础，合众图书馆得以在战乱时期迅速成立并发展。该馆一直“以文史为范围，供专门之研究”为宗旨，在1939年8月正式工作后，不仅吸纳藏书家藏书保存文献，还将馆藏秘籍刊行。后因种种原因难以维系，1953年张元济等将此馆捐于上海政府，易名“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

熊十力《中国历史讲话》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石印。

抗战爆发后，熊十力任教于马一浮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讲授宋明理学。熊十力痛感外侮日迫，为此，他撰写《中国历史讲话》一书，旨在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探讨，为各民族团结抗战提供依据。熊十力认为，“发扬民族精神莫切于史”。全书主要论述“种源”和“通史”两大内容。作者试图证明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历史上早已融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具有极顽强的生命力，是不可战胜的。本书还批评了专制主义制度。尽管此书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依据不足，但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昆明恢复。

傅斯年任所长，郑天挺任副所长。陈寅恪、董作宾、李方桂、丁声树等兼任导师，与史语所人员多有重合。

6月

张荫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1期发表《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

此文试图从北宋时期主客户分配的统计数字上说明当时几次社会骚动与土地集中无关。但是汤象龙却发觉了张荫麟运用统计法上的缺失。汤象龙在文末附注中指出“在历史研究法之中，尤其在社会经济史方面，量的分析是有用且有价值的一种方法。但运用它的时候必须慎重，要理会它的危险，要认识它的应用限度”。他进而指出应用统计法应注意四点：第一，“统计可以证明一切”，同样的量的资料可以同时证明完全相反的事情，这是对统计最常有的批评；第二，量的资料必须精确完整，方可为用，官方统计数字与实际情况的差距不可不察；第三，每个历史事实都是单独的、个别的，历史上量的资料原为某项事件或某项目而设，我们很难同时用以类推或佐证其他的历史事项；第四，历史资料繁多，量的资料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若不得其他相关的资料认识清楚而仅用量的资料来证明某一事项是危险的。

同期还刊载了孙毓棠《东汉兵制的演变》、梁方仲《明代银矿考》、吴晗《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新币制》、吴铎《台湾铁路》等论文。

侯仁之在《燕京学报》第25期发表《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

此文对明史的成书、王鸿绪的明史稿、万斯同的明史稿、明史列传残稿和王、万二人明史稿之关系等进行梳理，认为“鸿绪之稿不尽采万传，《明史》亦不全据王稿；但残稿中之必有本诸万稿者”。

同期还刊载了陈鍪《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聂崇岐《宋词科考》、刘选民《中俄早期贸易考》等文。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1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第2—5集分别于1943年、1945年、1946年、1947年出版。由于冯自由的家世及其对革命运动亲身参与，该书所载多是亲历、亲见、亲闻之事，“兼采传闻异说，参以典故和嘉言懿行，不少为他书所未载”，对研究晚清革命运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姚从吾在《治史杂志》第1卷第2期发表《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

1946年，此书在四川青城山单独印行。姚从吾认为全真教是我国唯

一"有理想、有宗旨、有教主、有宫观、有仪式、态度积极而又能觉世救人"的宗教，它们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目的是保全民族的思想文化，以宗教来反对金初对汉族生存和文化的压迫。

陈垣在《辅仁学志》第8卷第1期发表《语录与顺治宫廷》。

本文对发现的三部语录"参互考校"，证明清顺治帝确曾削发为僧，后又被劝说蓄发等。此文被认为是陈氏运用校勘方法治学的一个例证。

同期还刊登了冯承钧《辽金北边部族考》、英千里《弥撒祭考》、牟润孙《崇祯帝之撤像及信仰》、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方甦生《清列朝后妃传稿订补》等文。

7 月

6 日　叶青在《时代精神》创刊号组织一批文章，批评学术中国化运动。

包括叶青《论学术中国化》、毛起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胡秋原《所谓学术中国化》、周宪文《由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讲到学术中国化问题》等文。

叶青认为，"中国化是说欧洲乃至世界各国底学术思想到中国来，要变其形态而成为中国的学术思想"，"化是带有改作和创造之性质，理解、精通、继承、宣传、应用、发挥……都不是化，当然也都不是中国化了"，"依照中国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生动地、通俗地、用中国写作方法去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中国化"。其次，中国化必须以中国为本位，"承认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承认以此时此地的需要为基础的中国本位"。

后来叶青进一步指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于中国，是一种"移植"，中国"不需要共产主义，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因此也就不需要共产党"，当然也就不需要学术中国化了。

针对叶青的言论，艾思奇反驳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由于中国自己本身早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它的基础，是在自己内部有着根源，决不是如一般的表面观察，说这是纯粹外来的。"杨松强调，马列主义并不是一种移植，而是"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在中国生长发育和日益壮大起来的"。

毛泽东指出，叶青是"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

13日　教育部颁布《学术审议委员会章程》。

章程规定该委员会有“审议全国各大学之学术研究事项”，“建议学术研究之促进与奖励事项”，审核硕士、博士候选人资格等责任。该委员会由25人组成，部聘12人，国立专科以上学校选举13人。1940年4月产生第一届委员会，冯友兰、陈大齐、傅斯年被选为文科方面的委员（实际委员29人）；同年5月11日，委员会在重庆召开第一次会议。至1949年该委员会经历三届，迁台后停顿，1955年恢复。

1940年5月11日，委员会通过“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案，具体选取的标准是：（1）作者观点或所代表的思想是否正确；（2）参考材料是否翔实；（3）结构是否完善；（4）有无特殊创见；（5）是否有独立体系、自成一家学说；（6）是否有系统的叙述或说明；（7）整理前人学说有无改进之点或特殊贡献；（8）是否适合国情，或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及农工业各方面是否有所影响；（9）是否有学理依据；（10）是否确实系发明或创造；（11）发明程序是否明显，是否可以实验证明；（12）是否能够普遍应用；（13）技术是否精巧。奖励规则规定：（1）具有独创性或发明性，对于学术确系特殊贡献者，列为一等奖；（2）具有相当独创性或发明性，亦有学术价值，但不及一等者列为二等奖；（3）在学术上具有参考价值，或有益于实用，但不及一等和二等者，列为三等奖。

根据此案，委员会从1941年至1947年共举办了6届学术评奖会。

31日　郑鹤声在《教与学》第4卷第5期发表《选择历史教材的目标》。

第6、7期合刊连载。作者指出“历史教学之兴废，足以影响其民族及国家之存亡”，世界各国无不特别注重本国历史，以种种方式宣扬其光荣史迹，以激励国民爱国情思。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内篡改学校历史教科书，欲使青年学生为其顺民而不觉，用意之毒，实较其政治经济军事之侵略，“为害更烈”。作者认为“历史教学之价值，在乎教材之运用”，“吾人对于教材之选择，必须适应时代，始能发挥其宏大之效力”，“吾人欲培养一般国民有爱民爱国家的思想而适用现代，对于本国历史上关于民族、疆域、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之教材，须选择补充，凡合于上列标准者则尽量加以发挥，其不甚切合上列标准者，尽量加以缩减，庶几有裨于抗战建国之需要”。

是月　顾颉刚决定应聘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

该年5月，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邀顾颉刚至成都主持国学研究所。7月，顾颉刚决定应聘，并邀钱穆同往。9月正式就职，计划“集中精力整

理廿四史，使散乱材料串上系统而成各种专史之材料集，为将来正式作通史之基础”。此时顾颉刚开始着手编辑中国民族史材料集，并任“中国古代史课”。

顾颉刚对当时的研究生立下规诫：“五四运动以来，学者群作论文，以全力解决某一问题，笔记之调不弹久矣。然论文篇幅长，易生芜累，盖立一系统，有不得不加铺张者，既未处处作深研，自必不能无可击之瑕。学者当先从笔记下手。笔记者，或长或短，悉如其分，不多衍一字，有简洁之美。其为文可以自抒心得，亦可以记录人言，其态度可以严肃，亦可以诙谐，随意挥洒，有如行云流水，一任天机。此学术界之小品文也。故为笔记既多，以之汇入论文，则论文充实矣，作论文既多，以之灌于著作，则著作不朽矣”；“是以学者之事，其最后标的固在大通，而个人修学，循序渐进，必先肆力乎一曲，此正所以为大通之试验、之练习、之准备也”。

历史语言研究所开放图书供迁徙于昆明的学术机关使用。

8 月

1 日　侯外庐在《中苏文化》第 4 卷第 1 期发表《抗战二周年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新历史》。

12 日　教育部颁布《大学各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

该表规定历史系必修《中国近世史》（道光至抗战为止，要旨在研究外力压迫所引起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改革）、《西洋近世史》（自维也纳会议至现在）、《中国断代史》（商周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或元史或元明史、道光前明清史，学生至少从中选择二门）、《西洋断代史》（西洋上古史或希腊史或罗马史、西洋中古史、文艺复兴至法国革命史或文艺复兴史或西洋十七十八世纪史或法国革命史，学生至少从中选择二门）、国别史（日、俄、英、美、德、意、法、印度、西班牙或巴尔干半岛等国史或诸国某一时代史，学生至少须习一种）、《专门史》（分设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教育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中国财政史、中国外交史或某国外交史、中国殖民史、中国交通史、西洋经济史或某国经济史、西洋美术史、西洋政治思想史、欧洲殖民史等，学生至少从中选习一种）、《中国史学史或史学方法》、《中国地理》、《西洋史学史或史学方法》；选修《中国史部目录学》、《传记学》、《史籍名著》、《历史教学法》、《史前史》、《考古学》、《世界地理》、《制图学》、《人类

学》、《文字学概要》、《社会心理学》。

此令还规定了其他系科必须必修、选修的历史类课程，如国学系必修《中国文学史》，选修《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中国近世史》、《诗史》、《小说史》、《戏剧史》；英语系必修《英国文学史》；哲学系必修《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印度哲学史》，选修《历史哲学》、《中国美术史》。

20日　社会科学研究会《社会科学》月刊创刊。

《发刊词》指出，“社会科学，为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一般现象的科学，我们今日，应该明白自己社会上与文化上的种种缺陷，如政治组织的散漫、经济结构的矛盾、伦理观念的薄弱等等，都足以招致亡国的祸患。所以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应有医生诊断病人的目光与手腕，指示病原所在与处方的准确，以挽救目前的危机，而保存中华民族之生存与独立”；该刊“讨论社会科学所包含的各方面的问题，无论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历史、伦理等”。

是月　周谷城《中国通史》由开明书店出版。

开明书店在重印《中国通史》的广告中说：“本书为暨南大学周谷城教授所著史学五书之第一种，周君本其十余年的教授经验，汇合最新的史学理论，形成自己的一套系统，用来说明中国数千年往事，轻快自然，头头是道，书中有任何其他中国通史著作所未曾运用过的史学理论，未曾录用过的新鲜材料，未曾使用过的编制方法，文字诚朴，动人情感。”这里所说的“未曾运用过的史学理论”是指周谷城发明的“历史完形论”，“意在指出历史事情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即构造一个客观存在的统一整体的历史。周谷城编撰《中国通史》时，无论是体裁的选择，还是史料的取舍、文字的表达、篇章节的标目，都是以维护中国历史的完整为目标。

《中国通史》采用依历史的发展次序因事命篇的形式，吸收了传统纪事本末体的优长，便于从整体上显现历史发展趋势，而叙事时注意篇、章、节之间的呼应，则有效克服了纪事本末之短，展示出历史活动之间的联系。本书的叙述，在纵的方面贯通古今，首尾相顾；在横的方面，中外对比，场景广阔。

《中国通史》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在史学界颇有反响。从1939年出版到1982年，已印行17次。但当局以此书“有马克思主义嫌疑”而视为禁书，责令周谷城停止教授中国历史课，改任世界史课。

周谷城是共产党人之外较早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著中国通史者。

蔡尚思《中国思想研究法》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6 年，蔡尚思从南京国学图书馆历代文集中搜获了中国思想史料数百万字，乃采精撷华撰写成此书。书成后学界前辈蔡元培、柳诒徵、蒋维乔、顾颉刚、陈中凡等人为之序。

顾颉刚在序中说蔡尚思“其学也博，其思也慎，其辩也明，其行也笃，凡昔人叹为大难者，君并有焉。惟其善疑能博，所以善断；惟其善断，故得阐人所弗敢阐，决人所弗敢决，非特为思想界放一异彩，所习于整个学术者亦至宏且切”。

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此书开晚清经济思想研究的先河，其中的“增岁入说”、“厚俸禄说”、“行预算说”等对考察这一时期财政思想有启发意义。

张立志《正史概论》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何健民《隋唐时期西域人华化考》由中华书局出版。

罗尔纲《捻军的运动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 月

4 日　教育部颁布《大学及独立学院各学系名称》令。

其中规定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哲学、历史学及其他各系；法学院设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学等系。

20 日　杨鸿烈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第 1 卷第 2 期发表《史迹的模糊与复现》。

作者认为，史迹不论怎样的模糊，只要我们能勤于搜辑——尤其是在书籍文字记载以外的史料方面，那么我们终必有一天能够达到“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志愿。

21 日　吴承仕去世，享年 59 岁。

吴承仕曾任北平大学文学系主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与黄侃、钱玄同并称章门三大弟子，与在南京大学任教的黄侃有“北吴南黄”两大经学大师之称。吴承仕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到天津坚持地下革命活动。吴承仕去世后，延安各界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等赠送挽联。

23日　教育部颁布师范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

该表规定史地系必修的历史类课程有《史学概论》、《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中国近世史》、《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世史》、《人文地理》、《中国历史地理》，选修《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文学史》、《史学方法》、《国别史》、《专门史》、《史前史》、《考古学》、《传记学》、《中国文学专书选题》、《中国史学专书选题》、《历代文选》等。

此外，其他系科亦有不少必修或选修科目是历史类课程，如教育学系必修《中国教育史》、《西洋教育史》，选修《中国社会史》、《中国经济史》；公民训育系必修《中国政治及伦理思想史》，选修《中国社会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教育史》、《西洋教育史》、《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国文系必修《中国文学史》，选修《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中国近世史》、《西洋文学史》、《国语运动史》；英语系必修《英国文学史》，选修《中国文学史》、《英国史》、《西洋哲学史》等。

是月　全汉升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2分发表《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

文章内容包括“唐五代汴梁商业的发展”、“汴梁的消费与生产”、“汴梁的交通”、“汴梁的市场”、“汴梁输出入贸易的经营者”、“饮食品的输入”、“服用品的输入”、“燃料的输入”、“药品的输入”、“文化品的输入”、“奢侈品的输入”、“军需品的输入”、“各种工业品的输入”、“各种原料的输入”、“汴梁的输入贸易与市易法”、“茶的输出”、“服用品的输出”、“药品的输出”、“文化品的输出”、“奢侈品的输出”、“各种工业品的输出”、“人口的输出”、“汴梁对外贸易的入超及其抵补”等。该文是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专门论述城市和商业经济的论著之一。

同期还刊载了李晋华《明史德王府世系表订误》、陈寅恪《读〈洛阳伽蓝记〉书后》、胡厚宣《释劳》、劳榦《从汉简所见之边郡制度》、陈述《契丹世选考》等文。

侯外庐在《中苏文化》第4卷第2期发表《社会史导论》。

1933年，作者根据研读《资本论》的体会写就《社会史论导言》一文，“力图从经济学和历史学统一应用的角度，讨论生产方式问题”。1939年，他又在原稿的基础上加以修订，改名《社会史导论》发表。

作者指出，历史研究的先决课题是对社会发展一般构成的探讨，社会性质的决定者是生产方法，只有了解社会构成的性质，才能更好地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文章批判了社会史论战中各家各派的观点，指明他们划分

社会形态标准——生产方式理论上的失误。他批评了社会性质的“技术决定论”和“流通商业决定论”。他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划分社会形态是依据生产方式进行的，而不是别的，而生产方式并非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特殊结合方式”。作者试图为人们提出一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方法。

该文可以看作侯外庐社会史研究的开端。该文后收入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 1945 年版《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并加按语。

向林冰（赵纪彬）《中国哲学史纲要》由重庆生活书店出版。

该书共五编十八章，第一编“中国的社会与科学及哲学的发展阶段”、第二编“诸子时代的哲学”、第三编“经学时代的哲学”、第四编“经学发展的新阶段——宋明时代的新儒教哲学”、第五编“作为经学最高发展阶段的清代哲学”。

作者在《序》中说，“中国唯物论史的写作，以本书为第一次”。

10 月

20 日　杨鸿烈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第 1 卷第 3 期发表《档案与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关系》。

第 5 期连载。

是月　岑仲勉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8 本第 1 分发表《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

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系唐代尚书省六部郎中、员外郎刻于石柱上的题名录，对唐史研究甚有价值，但是多有破坏湮灭，仅留吏、户、礼三部石柱之大部。清代劳格、赵钺将残留的名录著录，并据史料对名录上人物之事迹等进行考订，撰成《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岑氏此文即是对劳格、赵钺二人工作的继承与发展。有研究者认为该文是唐代文史微观综合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

同期还刊载了陈寅恪《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郑天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葛毅卿《喻三入匣再证》、劳榦《论鲁西画像三石》、陈述《〈东都事略〉撰人王偁偁父子》等。

全汉升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8 本第 3 分发表《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

文章内容包括“宋以前广州贸易的发展”、“宋代广州在对外贸易上

的地位与广州政府对于海外贸易的奖励”、“外商对于广州贸易的经营”、“华商对于广州贸易的经营”、“广州的进口贸易”、“广州的出口贸易”、“宋代广州的贸易均衡及铜钱流出的影响”、“宋代广州的国内贸易”等。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都很发达”，外国商品、米、盐等是宋代广州贸易的主要商品。

同期还刊载了岑仲勉《外蒙于都斤山考》、王崇武《明初之用兵与寨堡》、陈述《头下考》（上）、胡厚宣《卜辞杂例》等。

11 月

朱杰勤《中西文化交通史译粹》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朱杰勤翻译的《欧洲使节来华考》、《中国与阿剌伯人关系之研究》、《回回教入中国考》、《古代罗马与中国印度陆路通商考》、《论罗马柯柯作风》、《西洋美术所受中国之影响》、《元代马哥孛罗所见亚洲旧有之现代流行品》七篇论文和朱杰勤自著的《英国第一次使臣来华记》、《华丝传入欧洲考》两篇论文。

此书后成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基本的参考书之一，1972 年台湾重印。

12 月

25 日　国民政府临时会议决议成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

1931 年内政部和教育部联合设立了国史馆筹备处，并颁布了组织章程，但毫无成果。1934 年邵元冲等人重提设国史馆提议，同年 5 月 24 日，行政院颁布了《国史馆组织法草案》，并于 11 月 2 日为此成立了档案整理处。抗战爆发以后，档案史料散失，亟待整理。1939 年 1 月，张继、邹鲁等 13 人再提设国史馆建议，该年 11 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 6 次全体会议决议原党史编纂委员会改为国史编纂委员会，并设国史馆筹备处。12 月 25 日，国民政府正式设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以张继为主任委员、邹鲁等六人为委员。

1940 年 5 月，该会于重庆开始实际工作。1946 年 11 月 23 日，国民政府公布《国史馆组织条例》等，并任命张继为馆长，但焘为副馆长。1947 年 1 月 20 日国史馆在南京正式成立，开始选聘纂修人员和讨论体例，刘成禺、柳诒徵、吴廷燮、汪东、顾颉刚、金毓黻、郑鹤声、许师慎等人被聘为纂修。同年 12 月，还创立了《国史馆馆刊》，由柳诒徵、汪东、汪辟疆、刘成禺等人主编。1949 年随迁台湾，并于 1958 年 1 月复馆。

是月　毛泽东开始主持撰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系统阐述中共的中国历史观。

第一章“中国社会”由杨松、吴亮平、陈伯达三人负责；第二章“中国革命”由毛泽东撰写；第三章“党的建设”由李维汉主笔。

此书系统分析中国历史各主要发展阶段的根本特征，揭示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历史动力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为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研究奠定了理论体系和指导原则。

该书第一次全面展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特征的认识，在史学界和思想界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首先，对诸如封建社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等中国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了理论概括；其次，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从而引发了学术上的辩论，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深入；第三，把中国历史作为一个有规律的社会发展过程来把握，推动了新型中国通史和近代史、社会史、革命史、政治史、文化史等专史的研究。

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他说：“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只有这种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才是中国历史进化的真正动力。因为每次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变动了社会的生产关系与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在此书中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阐述，对 1949 年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若干观点被奉为历史定论，围绕对它的不同解读还催生了一系列的学术争论。

到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这部书共刊印、翻印、出版约 110 版次，是延安时期政治、历史书籍发行量最大、出版范围最广的几部著作之一。

陈高佣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10 册由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出版。

本书上起秦始皇元年，下迄清宣统三年（1911）。以年为经，以事为纬，记载了二千多年间中国历代的天灾人祸。本书篇幅浩繁，材料充实，参考古今著述一百多种。

何炳松为此书作序说：戊戌政变以后，新史学已脱离旧经典羁绊，勇往发展，颇有“附庸蔚为大国”之风。新史学的最终目的在于产生一部尽善尽美的全国国民都应该而且能够阅读的通史。陈氏此书有助于这种通史早日问世。

刘大杰《魏晋思想论》由昆明中华书局出版。

此书主要有“魏晋思想之环境”、“魏晋学术思想界的倾向”、“魏晋时代的宇宙学说”、“魏晋时代的政治思想”、“魏晋时代的人生观”、“魏晋时代的文艺思潮”、“魏晋时代的清谈”内容。

聂崇岐在《史学年报》第3卷第1期发表《麟州杨氏遗闻六记》。

作者认为“宋杨家将故事，以小说戏曲之宣传，大河南北，几于妇孺皆知。稗官野史，里巷之谈，固不足信；而《宋史·杨业传》所述，又嫌简略，难尽窥事实之曲折”，乃在读书时遇到杨业祖孙父子之事的史料“辄迻录之”，并撰成此文。文章由“记入宋前之杨业”、“记杨业战死以后”、“记契丹之重杨业”、“记杨延昭”、“记杨文广”、“记杨重勋”六部分组成，对有关杨家将的史料进行了钩稽考辨。此文被认为与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一样，是研究杨家将史实的代表性著作。

同期还刊载了杜洽《唐代府兵考》、谭其骧《清代东三省疆志》、王伊同《补〈魏志·何晏传〉》、张述祖《〈文史通义〉版本考》、侯仁之《明史列传稿校录》、张尔田《清故学部左丞柯君墓志铭》、《清故朝议大夫湖南优贡知县汪君墓志铭》等文。

梁方仲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2期发表《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

文章将明代国际贸易分为“郑和下西洋前后的贡市时期”、“欧人东来以后的海舶贸易时期”两个时期，并从关税、贸易规模和货物、世界银产量、中国国际贸易格局等方面资料入手，考辨明代白银输出入数量，及其与中国社会变化之关系。

同期还刊载了刘隽《宋元官专卖引法的创立与完成》、严中平《各国在华棉货市场之开辟及其争夺：1833——1913》等文。

杨明照在《燕京学报》第26期发表《太史公书称史记考》。

作者先列举十种关于“太史公书称史记”的不同说法，然后列举五条证据，证明《史记》之名始于东汉“灵献之世”。后陈直在此文基础上，撰《太史公书名考》，又提出九条证据，证明《史记》之名，最早在东汉桓帝初年时出现。

同期还刊载了张东荪《不同的逻辑与文化并论中国理学》、齐思和《孙子著作时代考》、李世繁《评冯著中国哲学史》等文。

岑仲勉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4分发表《贞石证史》。

作者对清代学者利用金石资料研究历史存在的弊端进行反思，并探讨了如何利用石刻资料研究历史的问题。岑氏在文中引用石刻文字，考辨了隋唐间数十条历史事件与人物。此后岑氏又撰写《续贞石证史》。

同期还刊载了董作宾《论雍己在五期背甲上的位置》、劳榦《论魏孝文之迁都与华化》等文。

余嘉锡在《辅仁学志》第8卷第2期发表《宋江三十六人考实》。

作者认为《水浒传》是小说，可置之不论，但其“既已脍炙人口，学者又从而考证之，顾不能得其实，是亦读者之所深憾也”，乃“详引史传以著其事，附加辨证以考其实，非为《水浒传》作也，亦非表扬宋江也，欲示吾党之徒，以史学读一切书之方耳”。余氏又在文前撰《凡例》一篇，其中指出“此篇之意，在援引史传以明稗官小说街谈巷议之所由来”。作者实际上就是要借对宋江三十六人事实之考辨，展示史学考证之方法。余氏后又据此方法撰写《杨家将故事考信录》（《辅仁学志》第13卷第1、2期合刊）。

同期还刊载了于省吾《释屯》、张鸿翔《明西北归化人世系表》、冯承钧《嘉庆丙寅上谕之贺清泰》、方甦生《清实录修改问题》、张德泽《故宫文献观所藏之情太外交史料》等文。

是年

梁思永在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议上发表《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

作者指出，“这篇短文的目的是要将十年来曾经引起中国考古学者极大兴趣的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介绍给研究远东考古学与艺术的学者。”文章主要内容有“遗址发现的年代及其在地理上的分布”、“龙山文化的一般特征”、“三个区域的划分”、“地层和年代”、“与殷代文化的关系”等内容。该文提出的龙山文化三区说、龙山文化与小屯商文化的关系等观点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影响。

1954年9月，该文译载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考古学报》第7期。

张立志《山东文化史研究》甲编由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

该书乙编在1940年出版，1970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再版此书。

春，范文澜在河南确山县参加新四军，担任宣传工作。

冬，陈垣《释氏疑年录》12卷，《通检》1卷，由励耘书屋出版。

萨孟武在《政治季刊》第1期发表《三国的政治》，第3期发表《两晋的政治》，1940年第4卷第1期发表《隋代的政治》等政治史系列论文。

1940 年

※ 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 吕思勉《中国通史》上册出版。
※《战国策》半月刊创刊，“战国策派”形成。
※ 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出版。
※ 范文澜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对郭沫若“西周奴隶社会说”提出质疑。
※ 钱穆《国史大纲》出版。
※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印行。

1 月

8 日　教育部训令专科以上学校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研究。

训令指出“近年以来国人对于我国固有文化之价值，已有相当之研究与认识，顾如何发扬光大尚有待于进一步之努力。我国国际地位，现因持久抗战而日益增高，关于固有文化尤应特予阐发，以增强民族之意识，而促进建国大业”。训令要求各专科以上学校“应本发扬吾国固有文化之旨”，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研究，比如“各科系教材应尽量引用本国材料”、“各院校应与海外友邦设有研究东方文化组织之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或学术团体联络，俾收合作之效”等。

14 日　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抵上海，旋即成立“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

1940 年 1 月 5 日，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郑振铎、张凤举等人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英庚款董事会，希望两部门抢救流散在上海的善本古籍和文献。教育部长陈立夫和中英庚款董事长朱家骅迅速响应并派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赴上海筹办。蒋复璁抵上海后就开始秘密组织成立“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拟定办事细则。

此次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英庚款董事会支持的抢救沦陷区古籍行动

在上海（郑振铎出面）和香港（叶恭绰出面）同时展开，数年之间收购了包括刘氏“嘉业堂”和张氏“适园”中的精品。抗战胜利后，将各处抢救的书籍汇总，仅甲乙两类善本古籍就多达四千八百六十四部四万八千多册，普通线装书多达一万一千多部。

是月　陈恭禄《中国史》第1册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1册自史前起，迄于战国，共分十一编：一、地理及其影响；二、上古史料之评论及史前社会；三、神话传说之古史；四、商；五、西周；六、西周（续前）；七、东周；八、东周（续前）；九、战国；十、战国（续前）；十一、思想与学术。本书第2册于1947年在上海出版。

徐宗元批评云：史前部分材料多陈腐；东周部分，类抄旧说，殊少发明；商代错误甚多，引用古书文字之讹夺，句读之错误，史实不明，出处不详者，触目皆是，举不胜举。

朱杰勤《龚定庵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由六章组成，分别为“龚定庵别传”、“龚定庵之革命思想”、“龚定庵之掌故学”、“诗人龚定庵”、“龚定庵之史地学”、“龚定庵之金石学”。此书是研究龚定庵的第一部专著，对龚定庵的事迹、思想和学术等考证分析颇细致可信，故商务印书馆于1947年重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1972年再版）。朱杰勤认为自己“著述虽多，可观者少”，唯此书“还是差强人意的”。

北京大学出版《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卷。

收录全汉升《宋代寺院所经营之工商业》、金毓黻《大元〈大一统志〉续考》、陈寅恪《〈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两篇》、贺昌群《烽燧考》、劳榦《礼经制度与汉代宫室》、董作宾《研究殷代年历的基本问题》、钱穆《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等文。

范文澜到延安，接替陈伯达出任历史研究室主任。

随着范文澜的到来，历史研究室成员由3名增至8名，新增的5位成员除范文澜外分别为谢华、叶蠖生、金灿然和唐国庆。历史研究室受毛泽东之命撰写体现新观点的《中国通史简编》作为干部学习用的通俗历史读本。编写工作由范文澜牵头主持。

岑家梧《史前史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月

15日　杨宽作《上吕师诚之书》。

杨宽对考古出土史料的价值表示怀疑，并质疑王国维的研究。他说："当前古史之研究，最大之难题，为殷墟卜辞之学犹未能建立成一体系；其章句训诂固在在成问题，其所识之字，亦多以意为之，未能坚人之信也。"王国维曾将一甲骨文字"初释为'夋'，谓即帝俊；即而因证帝俊之即帝喾，乃又改释为'夒'，谓与'喾'音同，又与'夋'相近。究何所见而云然耶？王氏为学尚称审慎，其末流乃举古史上之问题，一一以卜辞穿凿附会之。地下之新史料诚较纸上之旧史料为可贵，实物之史料诚较传说之史料为可信，但考释必须观其会通，然后能增高新史料之价值。若任情附会穿凿，其与伪造新史料，相去仅一间耳"。

《中国文化》月刊在延安创刊。

此为抗战时期延安出版的唯一一份学术刊物。每卷6期，1941年8月出至第3卷第3期停刊。《中国文化》作为综合性学术杂志，其文章的范围广泛，文艺类和哲学类作品居多，12篇史学论文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0%。数量虽少，但涵盖了唯物史观的运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最新成果等当时最热门的几大课题。

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此文最初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稿，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颂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毛泽东分析了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性质，指出："自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一百年来，中国已逐渐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胡绳指出，这篇文章"虽不是专门的历史著作，但他在处理当前的现实问题时，总结了过去的历史经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可以说提供了重大的贡献"。

26日　翦伯赞至重庆。

翦氏任《中苏文化》杂志副主编，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聘为政治部名誉委员，被郭沫若聘为政治部第三厅专门委员，被冯玉祥聘为中国历史教师。

是月　赵万里、王国华合编《王静安先生遗书》刊行。

王国华在《王静安遗书序》中说：王国维“治学之方法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其疑古也，不仅抉其理之所难符，而必寻其伪之所自出；其创新也，不仅罗其证之所应有，而必通其类例之所在。此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也。而先兄以史证经，不轻疑古亦不欲墨守自封，必求其真。故六经皆史之论虽发于前人，而以之与地下史料相印证，立今后史学骨干者，谓之始于先兄可也”。

该遗书收录了当时可见的王国维所有著作，如《静庵文集》、《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观堂集林》等，共104卷、16册，是王国维的著作汇编中较完备的本子。该套“遗书”出版后对学术界影响较大，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此石印本影印，更名为《王国维遗书》。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是作者的论文集，包括《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中国的元首》、《中国的家庭》、《中国文化的两周》、《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等一系列文章。

作者认为，历史研究“第一步关键工夫就是要断定文化的体系”，世界历史可以分为七个文化体系，中国是其中之一；研究的第二步是对不同形态的文化进行比较。“一个文化区由成立到统一，大致不能少于1000年，不能多于1500年”，根据这一理论，则中国四千年的文化早应灭亡，但作者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说。目前中国“正在结束第二周的传统文化，建设第三周的崭新文化”，但是，“二千年来，中华民族所种的病根太深，非忍受一次彻底澄清的刀兵水火的洗礼，万难洗净过去的一切肮脏污浊，万难创造民族的新生”。抗战以来，中华民族表现出惊人的潜力，“最后决战的胜利确有很大的把握”。

雷海宗是中国第一位文化形态历史学家。雷海宗等的文化形态史观，目的是要通过比较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异同，诊治中国旧文化的弊病，以迎接西方新文化的挑战。文化形态史观在抗战时期的兴起，反映出学者的爱国情怀。文化形态史观多元论的观点也突破了历史发展单线论的模式，主张历史的多元性。雷海宗强调各个文化的特殊性，反对用单一的线索划分人类社会的历史。这是历史理论上的一大进步。

与本书相关的尚有1946年5月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论文集《文化形态史观》。

中国文化服务社开始编印“中国国民党丛书”。

该丛书收录了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1941年8月），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1944年2月出版上卷，4月出版中卷，1946

年 1 月在上海上中下三卷出齐)、《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1946 年 8 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1944 年 9 月),(美) Paul Linebarger 著、徐植仁译《孙中山传记》(1946 年 1 月),何仲箫《陈英士先生年谱》(1946 年 4 月),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1946 年 11 月),以及《陈天华集》(1946 年 1 月)、《朱执信文存》(1946 年 1 月) 等。

吴晗《西汉经济状况》由大东书局出版。

吴晗在上海中国公学社会历史系选修胡适主讲的"中国文化史"课。1930 年春,他撰成论文——《西汉经济状况》。胡适对此文十分赏识,将其推荐给大东书局,出版时还亲自题写书名。

此书全面考察了西汉时期的经济生活,涵括财政、平民生活、经济政策、均产政策、土地制度、赋税制度、货币制度、人口问题、都市问题和农业灾害十个主题,并以西汉黄金问题、移民统计为附录。《西汉经济状况》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借取社会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解析历史问题。

李乔苹《中国化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周蜀灵《现代民族复兴史》由重庆黄埔出版社出版。

3 月

5 日　蔡元培在香港去世,享年 73 岁。

12 日　吕振羽在《中苏文化》"中山先生十五周年纪念特刊"发表《日本法西斯蒂的中国历史观与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

16 日　齐鲁大学《责善》半月刊创刊。

本刊是时在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教书的顾颉刚为引导和鼓励学生而创办。顾颉刚在《发刊词》中指出,"治学之道,不贵因而贵创",且"何以能创?必发于精思。何以构思?必基于物证。何以得证?必赖乎善索","清代朴学,严设科条,力搜实据",在"遗物大出、方术益工"的时代,正大有可用之地,但是"从学者初至,恒谓志学未逮,只缘不知所以入门","鉴于借题示范之急,故为此刊以诱导之"。故该刊所刊论文,多为齐鲁大学的师生,如顾颉刚、钱穆、杨向奎、胡厚宣、王树民等人的作品。

创刊号刊载王树民《中华名号起源考》、曾繁康《韩非子初见秦篇作者之推测》、易铁夫《史记三种秦世系年代之比较》、顾颉刚《浪口村随

笔》等。

22 日　中央研究院在重庆举行第 5 次年会。

会议至 23 日结束。选举翁文灏、朱家骅、胡适三人为院长候选人，同时选出第二届评议会评议员三十人，历史组为胡适、陈寅恪、陈垣。

是月　吕思勉《中国通史》上册由开明书店出版。

下册 1944 年 9 月出版。此书是作者在抗战时期上海编写的。作者认为当时上海流行的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因此有必要采用一种更合适的体例来编写通史。

该书上册分门别类地、系统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

作者希望读者读后，"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书中通过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思想发展的考察，指出社会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该书内容丰富，对历史上各方面状况都做了深入浅出的叙述，婚姻、族制、阶级、财产、衣食、住行等，这都是旧史书上缺乏记载的。

顾颉刚指出，《中国通史》"叙述中兼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

潘梓年在《读书月报》第 2 卷第 1 期发表《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变成科学》。

文中先陈述了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认识，强调科学就是对自然界本来面貌的了解，科学是研究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据此，潘梓年认为，马克思主义使社会历史的研究变成了科学。他指出："如果社会历史的研究能够找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如果这个研究不是从社会的精神生活中去找寻社会的物质生活的来源，而是反过来，从社会的物质生活中去找寻社会的精神生活的来源，如果社会的发展规律不是从社会的精神生活中去找寻的，而是从社会的物质生活中去找寻的，如果这种发展规律能够使我们预见，如果这种预见能够由行动、实验来证明，如果这种发展规律能使我们得出实际上的行动结论，而和实践和实际活动获得联系，获得一致，那么，这样的社会历史的研究就是变成了科学。"

《史学季刊》创刊。

该刊发起人有丁山、王绳祖、王庸、王文元、王文萱、孔德、方壮猷、左舜生、吕思勉、朱谦之、李思纯、李小缘、李元澄、李季谷、吴其

昌、吴晗、吴天墀、吴征铸、佘文豪、束世澂、何鲁之、何炳松、何士骥、金静庵、金兆梓、周谦冲、周予同、祝同曾、洪殷朴、姜亮夫、范午、徐中舒、翁独健、孙次舟、凌乃锐、唐祖培、张维华、张其昀、张亦僧、陆懋德、商承祚、陈恭禄、陈训慈、陈锡壮、黄文弼、常乃悳、贺昌群、冯汉骥、韦润珊、陶元珍、陶元甘、彭举、雷海宗、闻宥、蒙文通、蒙思明、赵曾俦、黎东方、刘继宣、刘节、蒋百幻、蒋天枢、郑寿麟、钱穆、谢承平、缪凤林、穆继波、魏守谟、韩儒林、韩荣森、谭其骧、萧一山、顾颉刚、郦承铨。

该刊《发刊词》指出，史学是"以人类过去之一切活动为对象而研究之者也"；研究史学的方法有二，一是"定传说之是非，寻残存之实物，重建已逝之史实，使过去人类活动一一显现于吾人之前，若目睹然"，二是"将古今生活演进之事实融会贯通，取其原理原则搆成一体系，俾后学者有以见史学之核心。前一事之任务为审订史料，谓之考据，是为历史科学。后一事之观点或唯心，或唯物，或侧重其他因素，谓之'史观'，是为历史哲学"；"凡不由历史科学入手之历史哲学，皆无基础者也"，"凡不受历史哲学指导之历史科学，皆无归宿者也"；"世之好为史学者，果欲纳之于正轨且开浚其源头乎，审订史料固最基本之功力，亦最急切之任务也"。《发刊词》还明确指出，"爰创斯刊以为中国史学会之先声"。

创刊号编辑为蒙文通和周谦冲，刊载了蒙文通《秦之社会》，吴天墀《张咏治蜀事辑》，黄文弼《古代于阗国都的研究》，陶元珍《三国志篇目考》等文。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由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

此书内容包括中国的宗教背景、基督教始入中国的传疑、基督教在唐朝的传布、元代基督教、明代基督教的输入、更正教输入中国的预备时期等。有研究者认为，尽管此书存在一些问题，但此书是中国人著中国基督教史"第一部作品，其创始之功不可讳矣"。

刘雪谷《五四运动史》由重庆青年出版社出版。

4 月

1 日 《战国策》半月刊在昆明创刊，"战国策派"形成。

本刊由聚集在昆明的大学教授陈铨、林同济、雷海宗等创办，到 1941 年 4 月 4 日停刊时共出版了 17 期。后来诸人又编辑重庆《大公报 · 战国副刊》，每周 1 期，从 1941 年 12 月 3 日起到 1942 年 7 月 1 日止，共出了 31 期。因此而得名"战国策"派。1943 年 7 月，他们又创办《民族文

学》杂志，仅出版5期便停刊。上述三个刊物是战国策派的主要阵地。

1940年4月15日《战国策》第2期“本刊启事”申明：“本社同人，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政治无以自存自强……本刊有如一‘交响曲’，以大政治为‘力母题’，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上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

“战国策”派采用德国施本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对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说明历史发展的特点，因而又自诩为“比较历史家”。因此，他们受到猛烈的批评，被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同谋。批评者认为，他们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比附为战国时代，而且推断战争必然招致一个类似于秦朝那样的“世界大帝国”的出现，是极其荒诞的，“完全是希特勒法西斯侵略主义的应声虫”。希特勒、墨索里尼与日本军阀狂热地歌颂“战”是不足为奇的，而这样的鼓吹出自我们那些教授之口，只是一种“呓语”。“我们的抗战，恰恰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消灭侵略的战争，这才是正义的战争，值得歌颂的战争”。“战国策”派反对理性主义，鼓吹英雄史观，把“力量”与“天才”说成是一切的中心，“这恰好是符合于法西斯‘力’的哲学理论的”，“是尼采的‘超人’和‘权力意志’在中国的翻版”。

杨向奎在《责善》第1卷第2期发表《绎史斋杂钞》。

此为《绎史斋杂钞》系列在《责善》半月刊刊发之首次，此后在第1卷第3—5期续载。

是月　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史地教育委员会。

教育部鉴于史地教育的重要性，决定“成立史地教育委员会，由吴俊升、张西堂、黎东方为专任委员，陈东原任秘书，吴俊升、颜树森、陈礼江、张廷休等七人为当然委员，吴稚晖、张其昀、蒋廷黻、顾颉刚、钱穆、陈寅恪、黎东方、傅斯年、胡焕庸、徐炳昶、雷海宗等十九人为聘任委员”。5月14日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改进大中小学史地教育事项、推动社会史地教育事项、编纂中国史地书籍事项、编制抗战史料事项”等议案。

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总字数约11万字，分上中下三卷，上卷释字，中卷释学，下卷释绪。本书据甲骨金文讨论“性”、“命”的来源与本义，又据历代古籍中相关史料讨论“性”、“命”字义的演变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思想变迁，特别通过春秋战国诸子对“性”、“命”的见解与态度，考察了先秦诸子之思想及其社会根源。

该书系统利用宗教学理论分析上古“帝”、“天”等宗教观念，并揭示出上古思想从宗教向人文的演进，而且以语言学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颇受学术界称道，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共发布《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

干部学习的初级课程开设：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中级课程开设：联共党史、马列主义。高级课程开设：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

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大力推动下，干部历史教育逐步展开。

李埏在《中央日报·史学》发表《宋代四川交子兑界考》。

5 月

1 日　翦伯赞在《读书月报》第 2 卷第 3 期发表《中国历史科学与实验主义》。

针对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思想，作者指出它是将西方的一种粗俗思想买办性地硬搬到中国。实验主义对中国旧文化进行了批判，但却是完全否定，这是非常可怜的愚笨。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实验主义则是采取极力诬蔑的态度。在历史观方面，实验主义将历史看成可以任意摆布的大钱、任意装扮的女孩，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在历史发展方面，实验主义采取陈旧的进化论，只承认点滴进化，否认革命性变革。作者对实验主义历史观予以批判之后，还进一步分析批判其历史学方法，指出实验主义历史学方法论是“因果律论”，“明因求果”。但这种“明因求果”却是将历史现象一个个地孤立考察，不理解历史的整体性。此外，实验主义强调个人作用、强调历史偶然性等历史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

3 日　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在延安成立，陈云任校长。

该校建设初期史学类课程设置了中国历史等，1941 年 1 月实行新学制后，史学类课程又增加了西洋史等。1941 年 9 月 22 日，与后期陕北公学等合组为延安大学。

15 日　陈铨在《战国策》第 4 期发表《英雄崇拜》，强调英雄史观。

陈铨鼓吹“英雄崇拜论”，认为推动历史的是“英雄人物”。他把英雄史观发挥到极端的地步。“中国的历史演进，毫无疑义地是以英雄为中心。近来许多历史家在那里勉强凑合，想写一部以民群作中心的历史，结果都是可怜的失败。”陈铨所说的英雄，既有政治领袖，也包括思想、宗

教、哲学、科学、文学领域里的伟人，主要是精神方面的领袖，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

陈铨的英雄崇拜论受到不少批判。陈铨的答辩文章《再论英雄崇拜》指出批评“都忽略了我原文最重要的意义”。“我论‘英雄崇拜’，本来还有一个深远的根据。这一根据，乃是一种历史观。判决这一历史观是否正确，英雄是否应当崇拜的问题便迎刃而解”，“这一种历史观的对头，当然是唯物史观。因为前一种侧重‘人’，后一种侧重‘物’，他们的竞争，简单说来，就是‘人’与‘物’的竞争”。

25日　范文澜在《中国文化》第1卷第3期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对郭沫若“西周奴隶社会说”提出质疑。

9月重庆《群众》周刊第5卷第4、5期转载。文章赞成吴玉章关于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的主张，认为从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工具、生产部门等方面来考察奴隶社会的基本条件，考之殷代盘庚以后，无不具备，因此我们可以判定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虽然仍有奴隶，“但主要的却是农奴”，从有关材料看，“西周文王时代，农奴已是主要的生产者”。

此文触发了《中国文化》上关于殷代社会性质的辩论。谢华、叶蠖生与范持同样的观点。尹达认为殷代是“在崩溃过程中的氏族社会”。可见，延安史家承接社会史论战的余绪，使古史分期问题的争论延续下来。

是月　曾繁康在《责善》第1卷第5期发表《中国现代史学的检讨》。

作者将中国近世史学归纳为三派：一是考据学派，以顾颉刚的《古史辨》为代表，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北京、清华等大学为大本营，其主要精神为注重实证，不但以书籍上的记载为考据的根据，而且极注重发掘；二是唯物史观的中国历史研究学派，此派以《新生命》杂志为代表，从经济社会的立场，以西洋的历史材料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种种现实，其所用的方法是辩证法；三是理学派的历史观，此派以复性书院的马一浮为代表，此外乡曲之老师宿儒，亦多抱相同观点，所有观点全系宋明以来理学家的观点，其对于历史的态度，亦系中国旧日史家对于历史的态度。此三派各有短长，亟宜自加检讨，将来必能于史学上均有贡献。

6月

19日　罗振玉在旅顺去世，终年84岁。

30 日　张政烺在《责善》第 1 卷第 8 期发表《玉皇姓张考》。

该文由顾颉刚在《责善》半月刊创刊号发表的《浪口村笔记》中"玉皇"一则引起。作者认为玉皇张姓可能由"张角传说而来"。文后附杨向奎之"附跋"，对此观点提出反驳，认为"张玉皇之说实晚起，绝不见宋朝以前之记载，若果汉末已如此，不应毫无痕迹可寻也"。张政烺在《责善》半月刊第 1 卷第 12 期又发表《关于〈玉皇姓张考〉的通信》，对杨向奎的反驳提出反证。

是月　钱穆《国史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为作者 1938—1939 年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的讲稿。据作者"书成自记"，此书始撰于 1938 年 5 月，完稿于 1939 年 6 月。全书 8 编 46 章，53 万字，内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 20 世纪中叶中国历史的演变。

此书《引论》集中表达了作者的文化观、历史观与方法论。作者将中国近世史学分为"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宣传派"）、"科学派"（"考订派"）三派。"传统派"主于记诵，熟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此派偏于历史材料方面，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彼惟尚实证，夸创收，号客观，无意于成体之全史。"革新派"则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世所提倡。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

钱穆指出，今日所需之国史新本，将是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此书首重政治制度，次推学术思想，又次为社会经济。他认为政治制度为最上层的结构，社会经济为最下层的基础，学术思想则为中层的骨干。但在具体论述时根据各时代历史发展的具体状况而有所调整。如春秋战国时期，重在学术思想的变化；秦汉时期，着眼于政治制度变化；三国魏晋，重在社会经济的变化。钱穆指出："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论之所系。"

此书出版后风行全国，对激发民众的爱国心发挥了积极作用。牟润孙评论说："全书自尧舜以迄民国，为完整之中国通史。识见、议论、编排、

文章，均超越前人之作。享誉史学界，诚非幸致。钱氏怀爱国之热忱，于我国文化之构成发扬递嬗诸端，阐述最为详明。举凡历史上重大事件如统一、分裂、强盛、衰亡等，钱氏悉能掌握其原因、结果、发展线索，予以清楚叙述。盖其所重者在政治经济、制度、学术、文化、社会、民族诸方面，而非徒如前人之拘牵于朝代帝宰之兴衰。钱氏此书中爱国家、爱民族思想洋溢满纸，于世之持自卑自贱之论者，痛加针砭，立论极足使人感动。……《国史大纲》所可贵者在此，苟徒以字句考据求之，如买椟之还珠，非所以知钱氏也。”

钱穆在此书中及此后数年的文章中对中国的传统的政治制度、考试制度的赞美与“中国式民主”的观点，引起了左派史学家在抗战末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对于“中国式民主”的批判。

是书1940年初版于上海，在重庆另印国难版，后被国内多所大学采用为教材。

聂崇岐在《燕京学报》第27期发表《宋辽交聘考》。

此文从使节、国书、礼物、使节的接送、待遇、仪注等方面论述宋辽之间的外交交往。文后附有《正旦国信使副表》、《生辰国信使副表》，系对宋辽两国因贺寿通使之统计。该文被认为是宋辽外交关系研究的重要论著之一，有研究者认为此文“不啻为简明的宋辽交通小史”。

同期还刊载了容肇祖《王守仁的门人黄绾》、程明洲《所谓“景善日记”者》、凌景埏《南戏与北剧之变化》、鸟居龙藏《下花园之北魏石窟》等文。

陈梦家在《燕京学报》第27期发表《商王名号考》。

陈梦家在此文中提出“次序说”，即认为庙号是致祭次序，依照世次、长幼、及位先后、死亡先后、顺天干顺序排列下去。1954年，陈梦家又发表《商王庙号考——甲骨断代学乙篇》，系对此文的补充。1963年，张光直又发表《商王名号新考》，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新说。

叶德禄在《辅仁学志》第9卷第1期发表《唐帝诞辰祝贺考》。

作者认为生日祝寿之礼，始于齐梁，盛于唐宋，故围绕唐代君王的诞辰祝贺等史事，对相关问题进行考辨。文后附《唐宋帝王生日置节表》。

同期还刊载了余嘉锡《汉武伐大宛为改良马考》、魏建功《读天壤阁甲骨文存及考释》、刘厚滋《张石琴与太谷学派》等文。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出版《辽金元传记30种综合引得》。

同年8月引得处又出版《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12月出版《周礼引得》。

吕振羽在《读书月报》第 2 卷第 4、5 期发表《本国史研究提纲》。

这是他在正式编写《简明中国通史》之前所作中国通史的提纲。曾收入《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

《本国史研究提纲》对于历来非科学的历史著作提出尖锐批评。吕振羽认为在封建史家中，司马迁《史记》不愧为伟大著作，已知道研究“游侠列传”、“货殖列传”等涉及社会底层民众和日常生活物质的课题，但毕竟没有去探究历史发展规律。至于资产阶级史家，吕振羽指出，虽然反对儒家的“道统”观和“流水豆腐账”式的记史方法，但也只有“上古”、“中古”、“近代”的时间推移的抽象结论，或“神权”、“王室”、“民权”的政治形式划分的粗浅结论。总之，应用科学历史观研究本国史，“近十余年来才开始”，“然至今还没有产生一部正确的社会通史”。

7 月

7 日 《中苏文化》“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出版。

此期刊载了翦伯赞《中国抗战的历史原理及其发展逻辑》和吕振羽《伟大的历史时代与史学创作》等文。

16 日 张维华在《责善》第 1 卷第 9 期发表《汉代中国和欧洲的关系》。

31 日 刘樊在《责善》第 1 卷第 10 期发表《清人五代史学著作述要》。

第 11 期连载。

是月 黎锦熙《方志今议》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是在《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作者自言该书内容“是泛陈现代新修方志之要旨及其方法”，所以不求系统深入。该书提出了“明三术，立两标，广四用，破四障”的观点。所谓“三术”就是“续”、“补”、“创”，所谓“两标”就是“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所谓“四用”就是“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旅游指导”，所谓“四障”就是“类不关文”、“文不拘体”、“叙事不立断限”、“出版不必全书”。黎锦熙认为章学诚《修志十议》（“乘二便、尽三长、去五难、除八忌、而立四体、以归四要”）之说因时势不同、学术大进，故“虽可节取，宜先知所因革”，他认为新时代修史“宜先知所因革”，所以提出此四端以“树为原则”。黎锦熙的方志理论不仅指导

了他编纂的《城固县志》、《同官县志》、《宜川县志》、《洛川县志》、《黄陵县志》等志书，而且也为后来的志书编纂提供了基本知识和方法。

该书 1946 年再版，1978 年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1982 年中国展望出版社影印，1991 年又收入民国丛书，此外还有城固县刊印的版本。

朱谦之《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朱谦之认为此书是他“最细心结撰的一部著作”，主要是探讨中国思想对欧洲文化所产生之影响。他认为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为寻求欧洲思想界、宗教界对解决天主教教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礼仪之争”的支持，都努力将中国儒家典籍翻译介绍到欧洲，引起欧洲知识界的广泛兴趣。尤其是宋儒理学中的理性精神，给予欧洲思想界极大的刺激，为启蒙运动的反神学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促成了欧洲“哲学时代”的发生。

周积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一文认为该书“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史料的分析和运用上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至今仍受其惠”。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推出“青年基本知识丛书”。

这部丛书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青年基本知识丛书编审委员会主编，收录金公亮编著《中国哲学史》（1940 年 12 月）、金毓黻编著《中国史》（1942 年 10 月）、郑鹤声编著《中华民国建国史》（1946 年 4 月）、方豪编著《外国史大纲》（1947 年 1 月）等书。

尹达在《中国文化》第 1 卷第 5 期发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

作者论述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过程以及金文甲骨文中证明的古代传说的真实性，进而批判中华民族及文化“东来”和“西来”等说法。结论是：“中国社会发展同样也经过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从氏族制以前的社会（约当旧石器时代）到氏族社会（约当新石器时代）以至氏族社会的崩溃，发展线索，历历在目，已经不容许我们有丝毫的怀疑了”，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来源有其独立和自别的特点”，“并不是自他处移植过来的”。

陈安仁《明代学术思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傅统先《中国回教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黄秉心编著《中国刑法史》由改进出版社出版。

8 月

31 日　史念海在《责善》第 1 卷第 12 期发表《晋永嘉流人及其所建的壁坞》。

是月　华岗《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由上海鸡鸣书店出版。

该书是 1939 年秋作者离开《新华日报》在重庆郊区养病期间撰写的。原计划写三卷，第三卷因工作需要未写成。

作者联系抗战实际，从鸦片战争开始，总结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历次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以“提供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实与经验教训，借以鼓舞抗日战争的情绪，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民族抗战方针，反对妥协，避免重蹈过去民族抗战失败的覆辙”。

该书出版后，几年间多次重印出版，解放区一些中等学校把它作为中国近代史教材。后改名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为“辅仁大学丛书”第 6 种印行。

本书在史料运用上颇具特色：一是于常见书中发掘出被忽视的材料，如《徐霞客游记》所记载的佛教史料；二是于罕见书中得到大量从未利用过的材料，如《嘉兴藏》中的大量僧人语录。他说：“以语录入史，尚是作者初次尝试，为前此所未有。”陈寅恪为此书作序，以为其中“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至识断之精，体制之善，亦同先生前此考释宗教诸文”。

本书从士人逃禅反映当时政治的变迁，虽言佛教，但“本文之着眼处不在佛教本身，而在佛教与士大夫遗民之关系，及佛教与地方开辟、文化发展之关系。若专就佛教言佛教，则不好佛者无读此文之必要。惟不专言佛教，故凡读史者皆不可不一读此文也”。因此陈寅恪说此书“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以政治史读也”。

方豪盛赞陈垣善于发现研究题目：“余尝谓援庵先生最善读书，读天主教书、读回教书、读佛教书、读道教书、读一赐乐业教书、读摩尼书、读火祆教书、读中国任何古今典籍，皆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谓为别具只眼，当非过誉之词；但善读之外，尤善发现应研究之题材。易言之，善择书名，以当时情况，身处北平，而以‘滇黔佛教’为研讨对象，常人岂能见及？”

1957 年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重印后记”中，对其撰著目的，作了进一步说明，说：“所言虽系明季滇黔佛教之盛，遗民逃禅之众，及僧徒拓殖本领，其实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

平心（李平心）《中国现代史初编》由香港国泰出版公司出版。

此书共八章，从太平天国讲起，至抗战结束，梳理了太平天国、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北洋政府时期的民主浪潮、蒋介石时期的民主运动、抗战期间的民主运动等。该书1946年由进化书局再版，更名为《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1册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7年3月出版第2册。本书所述主要为中外关系史。其近代史分期与欧美学者相同。

《史董》在四川三台创刊。

本刊由教育部第五服务团研究部编辑并出版发行；所载文章，或修订旧文，或辩证史实，或疏通文字，不拘一家之说，上起先秦，下迄清末。

丁山在第1期发表《新殷本纪》，此文以《史记·殷本纪》为基础，将卜辞等司马迁未见的材料引入，并尽量以地下材料订正文献记载的错误，使得关于商代的历史论述丰富起来。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虽然字数不及6万，但是确实一部全面研究李白的专著，涉及李白的政治、思想、文学创作等方面，尤其是对李白求仙学道及其思想中的道教因素之分析较为深刻。

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由中华书局出版。

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9月

1日　雷海宗在《战国策》第11期发表《历史警觉性的时限》。

雷海宗观察到："多年来中国学术界有意无意间受了实验主义的影响，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机械、太简单。以史学为例：一般认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为历史的人，根本可以不论；即或是知道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的学者，也往往以为事实搜集得相当多之后，这道理自然就能看得出来，实际恐怕绝不如此。"

在他看来，"历史的了解是了解整个人格与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并非专由乱纸堆中所能找出的一种知识"。况且，"中国的乱纸堆，二千年来堆得太高，若必要把许多毫无价值的问题都考证清楚，然后再从事综合了解的工作，恐怕是到人类消灭时也不能完成的一种企图"。因此，他疾声呼吁道："有心的人，为何不抖去由堆满败简残篇的斗室中所沾的灰尘，

来到海阔天空的世界大吸一口新鲜的空气!”

6 日　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在重庆召开第一次会议。

1939 年 11 月，教育部训令国立编译馆筹办“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1940 年 3 月，教育部颁布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章程。该委员会由 52 位专家组成，文史方面的专家有张道藩、郑鹤声、魏建功、朱光潜等。该会初隶于教育部，1942 年改隶于国立编译馆。大学用书来源有公开征稿（1940 年 10 月开始）、采选成书、特约编著三种，历史类的《西洋通史》采用成书，《中国通史》委托史地教育委员会代为编辑。

被选入的历史类著作有钱穆《国史大纲》（特约），黎东方《中国历史通论》（春秋战国篇，特约），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特约），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成书）、《辽宋全史》（成书），王凤喈《中国教育史》（征稿），柳无忌、曹鸿昭《英国文学史》（征稿），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稿》，孟云桥《西洋政治思想史》（成书），蓝文征《隋唐五代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等。

是月　范文澜应延安新哲学会邀请，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讲演。

讲演稿发表于《中国文化》第 2 卷第 2、3 期。范文澜早年受业于经学名师黄侃和刘师培，抗战前出版过《群经概论》。后来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摆脱古文经学的家法。在此文中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西周至“五四”运动前夕经学的产生与发展作了概述。

毛泽东亲临听讲，并致信范文澜云：“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周谷城《中国政治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周氏自言该书“不是政治思想史，不是政治制度史，更与一般专讲理乱兴衰之政治史绝不相同”，而是着重研究“每一时代支配政治之主要社会势力”。全书约 22 万字，共分五章，即“部族联合的完成”、“政治社会的确立”、“门阀藩镇的交替”、“绝对专制的完成”、“民主政治的创造”。此书对支配政治的主要社会势力的分析，不仅使读者了解了中国政治治乱兴衰的原因，而且也联系到了当时政治的走向。作者认为“民主”是现代政治的主要支配势力。

1982 年中华书局再版此书。

教育部出台《修正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修正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

这两个标准带有浓重的战时色彩。一是在内容上虽仍授中外通史，但总比重有所降低，且增加了中国史的分量与授课时数，相应减少了外国史的比重，中国史增加的内容多与“抗战建国”相关；二是课程目标有浓厚的现实应用色彩，如在高中阶段，强调通过对历史的讲授，“使学生对于中华民族有整个之认识与爱护”，“启示学生复兴民族之途径，及其应有之努力”，“策励学生研讨世事，探求科学，而努力于抗战建国之大业”。

（瑞典）高本汉著，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翻译《中国音韵学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为高本汉的博士论文，共四卷：第一卷“古代汉语（关于古音知识的书本上材料、古代汉语的音系、古音字类表）”，第二卷“现代方言的描写语音学”，第三卷“历史上的研究”，第四卷“方言字汇”。傅斯年在中文版序言中说：“高本汉先生之成此大业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讨接受吾国音韵学家之结论，实其成功主因之一。”

此书是系统利用西方语音学理论分析、研究中国传统音韵的开创之作，作者试图以西方的音素来分析和构拟中古音，标志着中国传统音韵学从研究方法到研究内容的全面变革。该书被认为是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

鞠清远《唐代财政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讨论税收与财务行政问题，重点在于分类叙述财政收入（如赋税、专卖、官业收入、商税、特种收支等）、财务行政两方面。书中对收入项目的归类比较恰当，对财务行政的论述内容较丰富，但缺乏财政支出方面的探究。该书虽只 11 万字，却是断代财政史的开山之作。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认为此书“奠定了后来学者研究唐代财政史的基础”。

尹达在《中国文化》第 2 卷第 1 期发表《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问题》。

此文针对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的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作者指出传世文献有关殷代历史的记载，大多出自后世文人之手，其中有不少“修饰和重编”的成分，因而不足为据。由于参加过安阳殷墟的

发掘，尹达认为，研究殷商社会最可靠的史料是当时的甲骨文字和遗迹遗物，离开它们就不可能写出殷商社会的信史。在他看来，文献上的材料大部分是后人的记述，应当弄清作者的时代及其社会性质，然后才能使用。假若一味相信，很可能发生错乱，把殷商社会看作比它还要进步一些的社会形态。

他批评范文澜“以后代史料移置于前代”，以致对殷商社会性质判断有误，高估了此时社会的发展程度。从考古材料看，殷代“社会组织结构基本上还是以血缘关系为其纽带之氏族社会的组织”，即处于氏族社会的崩溃阶段。结论是：“殷代后期的社会处在崩溃过程中的氏族社会，是没落的氏族社会走向坟墓里去的前夜。”

顾颉刚在四川省教育厅主办的《中等教育季刊》创刊号发表《中学生读的中国史》。

面对没有理想的适合中学生阅读的中国通史的状况，顾颉刚提出了弥补之法。顾颉刚说，“困难是事实，在困难中想方法便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现在写出这篇文字，替一般中学校想，替一般中学生想，觉得中学校方面本国史有下列几种补充读物：《左传》、《史记》、《资治通鉴》、《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圣武纪》等。”

柳诒徵在中央大学《中等教育季刊》第1卷第3期发表《中学历史教育与精神修养》。

10月

15日　吴泽在《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2期发表《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

作者指出：“只有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此文即处处以马克思的论述为依据，阐述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

是月　蔡尚思《中国历史新研究法》由昆明中华书局出版。

全书分12章，内容比较广泛，涉及到历史观、历史学的作用，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史籍分类、历史分期，治史方法、撰史条件、读史方法等问题。全书取材也很丰富，引述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材料，包含了哲学、史学、史学史、目录学以及思想方法论等各门类的知识。

本书力图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解答中国历史问题，指导治史方法，其中较多地引证马克思、恩格斯的论点和事例。因此，本书具有强烈的批判

意识，对于章学诚、梁启超的史学观点均有辩驳，对西方的一些研究方法也有批评。

中华书局开始出版陶菊隐的“菊隐丛谭”。

该丛谭收录陶菊隐编撰的《近代轶闻》（1940年10月）、《吴佩孚将军传》（1941年5月）、《六君子传》（1946年2月）、《蒋百里先生传》（1948年4月）、《督军团传》（1948年6月）等著作。

11月

1日　《齐大国学季刊》在成都齐鲁大学创刊。

该刊由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办，顾颉刚任主编。

创刊号刊载孙次舟《论魏三体石经之来源并及两汉经古文写本的问题》、陆懋德《瑚琏考》、黄文弼《中国古代答谢位置考》、张维华《汉张掖郡骊靬县得名之来源》、侯宝璋《中国解剖史之检讨》、姚名达《史字的本来意义》、丁山《聚珍本牧庵集跋》等文。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郭沫若任主任。

27日　陈垣在辅仁大学作《顺治皇帝出家》的演讲。

对《汤若望与木陈忞》、《语录与顺治朝廷》两文中关于顺治皇帝出家、董妃的来历、帝后的火葬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关于我研究此事，曾得了三点教训，愿借此一一提供诸位参考：（一）凡事之传说，不论真伪，必各有原因；（二）凡研究讨论一事，如证据未充分时，决不可妄下断语；（三）读书时遇微细异同之处，虽一字之差，亦不可忽略。”

是月　《学林》月刊创刊。

鉴于“上海学术空气之渐为战氛所掩也”，郑振铎、何炳松、金兆梓、章锡琛、王伯祥、徐调孚、杜佐周、周予同、周昌寿、王勤堉、徐莲僧等组成“学林月刊编辑委员会”，出版《学林》月刊“以振导学风”。

《学林》自创刊至次年停刊，共出版10辑。

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印《论语引得》。

阿英编《近代国难史丛钞》上册由上海潮锋出版社出版

中册1941年3月，下册1941年6月出版。

翦伯赞在《中苏文化》“苏联十月革命23周年纪念特刊”发表《苏联历史学家对东方史学的贡献》。

12 月

16 日　杨向奎在《责善》第 1 卷第 19 期发表《〈李冰与二郎神〉自序》。

该文是杨氏《李冰与二郎神》一书的序。当时在成都任教的顾颉刚注意到当地流传着李冰与二郎神的故事，乃收集材料，准备进行研究，并草拟了一个纲要。杨向奎从兰州到成都投奔顾颉刚后，顾颉刚乃令杨向奎研究此一课题。后来杨向奎回忆说，自己六十年前在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时期，有两篇文章记忆犹新，《李冰与二郎神》即是其一。

30 日　丁山在《责善》第 1 卷第 20 期发表《周武王克殷日历》。

是月　鸟居龙藏在《燕京学报》第 28 期发表《契丹黑山黑岭考》。

作者不仅考辨黑山、黑岭之地理位置，还运用人类学、神话学等知识，考察“黑山”在契丹人精神世界的意义，认为黑山与契丹人信仰有关，契丹人认为黑山“即最古祖先魂魄居住之所。此信仰古来流传于契丹人之间”，“含有极浓厚萨满教之色彩”，“契丹黑山之信仰，可认为东胡民族固有之物，其与黄泉国志信仰巧合”。

同期还刊载了杨明照《郭象〈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检讨》、寿普暄《由经典释文试探庄子古本》、凌景埏《宋魏汉律与大晟府》、郑骞《冯惟敏及其著述》、齐思和《燕吴非周封国说》、王西徵《五音七音述考》等文。

裴文中在《史学年报》第 3 卷第 2 期发表《中国史前学上之重要发见》。

作者指出，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史前学是比较晚近发达的一种科学”，在中国“史前学之开始，也不过是近二十年之事。至于史前学列入大学课程之中，更是以本年在燕京大学始”。作者认为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前学最重要发现有四个，一是安特生在 1921 年发现“仰韶期彩陶文化”，二是桑志华和德日进 1923 年在河套发现“旧石器时代之遗址”，三是 1926—1930 年发现“周口店中国猿人之遗骸及遗物”，四是 1933 年发现“周口店山顶洞”。

同期还刊载了张述祖《范蔚宗年谱》、杜洽《唐初镇兵考》、聂崇岐《尹洙之年寿》、林树惠《明之北边备御》、徐绪典《钱谦益著述被禁考》、陈鳌《黄恩彤与鸦片战后外交》、夏循垍《夏先生穗卿传略》、翁独健《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等文。

《史学年报》出至此期后停刊。

谢华在《中国文化》第2卷第4期发表《略论殷代奴隶制度》。

与尹达不同，谢华认为《尚书》、《诗经·商颂》、《史记》等记载“是殷代最宝贵的直接史料”，片面地用甲骨文来反对古书是“一种很幼稚的办法”。谢华指出，在研究商代社会时，不应只依靠甲骨文而轻视历史文献。根据“最可靠的纸上材料和地下材料”，谢华对殷代奴隶国家提出三个论据，进而强调“在某种程度的生产力之下，必然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工具之存在的”。

陈垣在《辅仁学报》第9卷第2期发表《清初僧诤记》。

本文是《明季滇黔佛教考》的姐妹篇，参考六十余种文献，详细梳理了明季清初佛教的十次论争，并对明清之际与僧侣有关的居士、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行动等有所涉及。据作者在1962年该书再版后记可知，此文的目的在于向抗战的人们表达敬意，对汉奸进行谴责。该文后被日本学者野口善敬翻译为日文出版。

同期还刊载了赵卫邦、叶德禄《释氏疑年录通检》等文。

赵光贤在《辅仁学志》第9卷第2期发表《明失辽东考原》。

第10卷第1、2期合刊连载。此文为作者在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的毕业论文，主旨在揭示明之失去辽东，最主要原因在于失去全辽之人心。作者并指出，国家之安危，系于民心之向背。

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印《周礼引得》。

张伊林《世界民族复兴史》由桂林青年书店出版。

金公亮编著《中国哲学史》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

是年

夏，钱穆就聘齐鲁大学教职。

钱穆应顾颉刚邀请担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主讲“中国文化史”，并主编《齐鲁学报》。顾颉刚离开齐鲁大学后，由钱穆接任研究所主任。

吕思勉避居沪上租界。

吕氏抱着书生报国之志撰写了大量史学著作和论文，还留意时局，关心国家命运，以“野猫”、“乃秋”、“六庸”、“程芸”等化名，撰写许多洋溢民族正气、揭露日寇暴行的文章刊于租界内的抗日报刊上。作家兼报

人范泉称其为“孤岛上的斗士”。

陈石孚在《新政治》第3卷第1期发表《中国史分期问题》。

文中把中国史分为四个阶段：唐虞夏商为部落时期；周代为封建时期；秦以后至辛亥革命为帝国时期；辛亥革命以后为另一时期。

冬，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四川南溪县李庄镇。

1941 年

※《文史杂志》在重庆创刊。
※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出版。
※ 周予同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出版。
※ 张荫麟《中国史纲》第 1 册石印。
※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上册出版。
※《古史辨》第 7 册出版。
※ 李玄伯（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出版。
※ 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出版。
※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印行。

1 月

1 日　吴天墀在《责善》第 1 卷第 21 期发表《明代三吴水利考》。

第 22 期连载。

25 日　中国历史研究室（延安）在《中国文化》第 2 卷第 5 期发表《〈中国通史简编〉之三——封建制度开始时代——西周》。

焦敏之、侯外庐在《中苏文化》第 8 卷第 1 期发表对苏联“关于新社会发展法则之论争”的讨论文章。

是月　《文史杂志》在重庆创刊。

先后由独立出版社、重庆商务印书馆（1941 年第 1 卷第 3 期起）、重庆中华书局（1944 年 1 月第 3 卷第 1 期起）出版。该刊原由朱家骅发起创办，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受秘书长吴铁城领导，社长为叶楚伧，创刊时主编为卢逮曾。1941 年 6 月顾颉刚任副社长兼主编，自第 1

卷第 9 期起直至停刊。史念海、魏建猷等都曾担任过编辑。1945 年 2 月，刊物与国民党的关系中断，顾颉刚自任社长，艰苦支撑至抗战胜利，出满 5 卷。抗战后两度在上海复刊。第一次在 1946 年，由中国出版公司出版两期；第二次在 1948 年，由文通书局出版三期。

顾颉刚坚持自主办刊的方针，认为“文与史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唤起民族意识的利器”。因此，《文史杂志》虽系纯学术刊物，但内容力求通俗，讨论的问题与时代相联系，受到读者的欢迎。

《文史杂志》创刊号发表叶楚伧《文史与兴亡》，云：“文史中间要具备一种时代的感化力量。这时代的感化力量，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是要以很公正的心理，来指挥正确的眼光，有了这种正确的眼光，方可成为时代所需要的作品。……一代的文化，可以看到一代的兴亡。中国历史上整个的文化，也可以看得出中国一兴一亡的症结。这个民族有这个民族一兴一亡的成绩。”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办的《齐鲁学报》创刊。

创刊号由钱穆主编，在沪出版。发刊词简要分析近三百年来虽经满清入关、洪杨之乱，但“学术不为中歇”之原因，认为在日本侵略的战乱时代，学者应当团结努力，保护学术命脉延续。

创刊号刊载了丁山《九州通考》、吕思勉《汉人訾产杂考》、张维华《汉置边塞考略》、钟凤年《水经著作时代之研究》、冯汉骥《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杨宽《伯益考》、孙次舟《读“古蜀国卫蚕国说”的献疑》、赵泉澄《咸丰东华录人口考证》、童书业《没骨花图考》等文。

马元材《秦始皇帝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第一编内容为“始皇帝之家世及其生平”，第二编内容为“时代背影”，第三编内容为“武力统一之成功”，第四、五、六编内容为“统一后之政治设施”，第七编内容为“始皇之客死与帝业之崩溃”。该书实际是以秦始皇为中心的秦代史。

1985 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再版。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由中华书局出版。

上册从殷商巫术文学讲起，至唐诗结束，共十五章；下册从晚唐五代词讲起，至清代小说结束，共十五章。作者受法国文学史家朗宋的影响，认为“文学发展史是人类情感与思想发展的历史”，文学史家的任务就是叙述文学进化的“过程与实质，形式的演变以及作品中表现出的思想与情感。并且特别要注意到每一个时代文学思想的特色，和造成这种思想的政

治经济、社会生活、学术思想以及其他种种环境与当代文学所发生的联系和影响”。故此书在探讨文学发展历史时特别重视社会状况、政治环境、学术思想变化等方面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该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在20世纪50年代受到批判，但1978年以后，一些研究者又给予此书较高的评价，有的研究者认为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科学论述中国文学集大成之作”，有的研究者认为该书“为民国时期的文学史撰写，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为发轫于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史学的走向成熟，建立了重要的里程碑”。

1949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下册，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增订版，1962、1963年中华书局又出版新的增订版，此后该书又多次再版。

郑鹤声在《学生之友》第2卷第1期发表《总理对于学术之研究》。

该文考察了孙中山在古典书籍、政治学、历史学等方面的学术研究。

同期还刊载了李季谷《历史的趣味与功用》等文。

哈佛燕京学社引得处编印《孟子引得》。

2月

周予同在《学林》第4辑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作者在冯友兰、钱穆的基础上，完善了对现代史学的阶段划分，认为“转变期的中国史学，应该分为‘史观’与‘史料’两派”。史观派包括儒教史观派、超儒教史观派。儒教史观派又分为受古文学派影响的（属于旧史学）和受今文学派影响的（第一期新史学）两派。超儒教史观派则分为疑古、考古、释古三派，他们都脱离了经学而独立存在。而史料派则是指随着史料的大量发现，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的一部分学者。

周予同从经史关系、清代史学的演变追溯新史学的渊源。他说：上溯现代新史学的渊源，“第一须追念黄宗羲”，“第二须追念钱大昕”，“第三须追念章炳麟”。而给予史学转变以直接动力的是今文经学。受今文经学的启示而使中国史学开始转变的有三个人非常重要，他们是崔适、夏曾佑、梁启超。梁启超之后，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的是胡适。胡氏及其同派者都继承了宋学的怀疑精神，承受了清末高度发展的汉学今文派的思想体系，采用了汉学古文派的考证方法。他们被称作“疑古派”，代表人物除胡适外，还有顾颉刚、钱玄同等。对于疑古派的研究提出修正意见的是考古派。这派的代表者，在初期有王国维，在后期有李

济。继疑古派与考古派而崛起的是释古派，初期代表人物是胡汉民，使之发展而与疑古、考古鼎立而三的是郭沫若。“与郭氏同属于释古派而见解却歧异的是陶希圣”。以郭沫若等为代表的释古派遂起而倡导“用一种理论以解释这各期社会形态与本质之所以形成及其转变”，二三十年代持续开展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便是这种史学风气最明显的反映。最近几年，即“七七”事变以后，史学界已渐有综合各派或批评各派而另形成最后新史学派的趋势。

该文特别着重从经学与史学的关系这一独特视角考察了1900—1941年中国史学的发展行程，把新史学的发生和发展看作是史学逐渐胎离经学的过程。而认为近代史学存在着“史观派”与“史料派”两个系统，则为此后的史学史界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

陈垣对此文颇不以为然，在1941年5月7日致陈乐素的信中说：“《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已见，新字当改作古字。此杂志已出数期。无一篇有力文字，所谓海派者非耶?”

《共产党人》第15期刊载《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讨论提纲》。

提纲提出日寇在发动军事、政治、经济进攻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文化进攻。“一方面是摧毁中国的民族文化，焚书坑儒，另一方面是进行亡国灭种的文化教育”；“修改中国的教科书，修改中国历史”就是日寇文化进攻的直接表现。“必须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广泛地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发扬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提高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继承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的优秀传统”。

黄坚叔《中国军制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3月

1日　中国边疆学会在成都成立，顾颉刚被推为理事长。

中国边疆学会由齐鲁、华西、金陵、金陵女子四所大学共同发起。适值马鹤天、赵守钰各自在陕西、重庆分别成立了中国边疆学会，社会部通知三方面合并，并谓总部应设在重庆。于是以重庆的学会为总会，以其余两会为陕西、四川分会。会员共600多人，凡边疆的知名人士和内地对于边疆有研究者都网罗在内。其后云南、西康、甘肃诸省也均设有分会。分会有《边疆》周刊，总会有《中国边疆》月刊，并出版《边疆丛书》。

但后来“币值日跌，捐来的款无济于事，各会员又为生活压得喘不出气，无心研究，加以轰炸严重，图书疏散，搜集参考材料极端困难，要组

织旅行团更谈不到，所以一天天的消沉下来”。

23日　钱穆开始为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和“秦汉史”。

31日　傅衣凌在《福建文化》总28号发表《明清时代福建佃农风潮考略》。

该期还刊载林希谦《美国公文书中关于占领台湾的计划》、沈祖年《谢钞考》、金云铭《清代福建人民移徙时所遭遇的困难》、徐天胎《福建租佃制研究》等论文。

是月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1943年5月29日所写《中国史学史·略例》中称：“本编初经前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先生校订，送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列入《大学丛书》，并于三十年八月出版，嗣以上海、香港相继沦陷，未能输送于后方。兹经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列入大学用书重行付印，并经中央大学教授缪凤林重加校订。”

全书共十章，“谨依刘（知几）、章（学诚）之义例，纬以梁氏（即梁启超）之条目，稍加铨次，以为诵说之资”。它以史官与史家、官修史书与私人著史为主要脉络，论列先秦至明清的史学，并重点叙述司马迁、班固、刘知几、章学诚的成就。全书结构完整，资料翔实，阐述清晰。

此书问世后大受欢迎，王玉璋、傅振伦等所编中国史学史讲义皆受其影响。齐思和评曰：“抑吾人犹觉美中不足者，书名史学，自宜论其体裁之得失，编次之良否，态度之偏正，考订之精粗，俾读者了然于二千年来史学演变之大势，及今后改良之途径，作者过重故实，而忽略史学，仅言纂修经过，鲜言体例得失，史学之义，似犹未尽也。”

顾颉刚开始将在云南大学所编《上古史讲义》陆续在《文史杂志》发表。

顾氏说：“许多年来，我常想系统地编出一部《中国古代史》，给一般人看。无如北平书籍太多，研究小问题太方便，总不容许作大体的叙述。抗战以来，许多书籍看不到了，而我们在大学里的职业还没有丢掉，我很想借此机会达到这一项志愿，所以前年到了云南大学，就用通俗体裁编写上古史讲义。人家笑我写的是小说，我说，我正要写成一部小说，本不希罕登大雅之堂。”“读者诸君如果觉得这个体裁可用，希望大家起来这样写，让一般没福享受高等教育的国民能看我们的正史，激起他们爱护民族文化的热忱；那些大学生呢，也可看了我们的注释，自己去寻求史料，

作深入的研究。”

吴曼君《民生史观研究》由时代思潮社出版。

吴曼君认为，“民生史观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综合”。不过，民生史观不是半斤八两地折衷调和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作为一般形态的民生史观，“是把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作了一个辩证的统一，吸收了它们二者的优点和长处综合而成的”，是在吸收唯物史观强调“物质境遇”的基础上，吸收唯心史观强调“人类行为”，不过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物质境遇。所以他说：“孙先生整个的思想是这样的：物质境遇决定人类行为，人类行为也决定物质境遇，但决定物质境遇的人类行为仍为物质境遇所决定。”吴曼君的心物合一论，强调物质的第一性，似乎更倾向唯物论。

容庚编《商周彝器通考》由燕京大学出版。

是书阐述了商周彝器的起源、发现、类别、时代、铭文、花样、铸法、价值等内容，对器物的形制、花纹和铭文的流变作综合的研究，突破了宋清以来的金石学模式，被学界誉为20世纪青铜器学的“奠基之作”。

金德建《古籍丛考》由昆明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受“古史辨”派影响而从事古籍、诸子之考辨，此书集作者历年所作关于古籍源流方面考证之论文，包括《〈论语〉名称起源于孔安国考》、《两汉〈论语〉今古文源流考》等21篇。

吴天墀在《史学季刊》第1卷第2期发表《烛影斧声传疑》。

文章对宋太宗继位的历史疑案进行了梳理辨证，认为“烛影斧声”已无可考，但宋太宗继位确实不能称得上“名正言顺”。有研究者认为史料详实，论证谨严，所下结论有说服力。

该期季刊编辑为顾颉刚与张维华，还刊登了蒙文通《国史上黄河初次改道与种族之祸》、李源澄《两晋南朝之军户及补兵》、陶元珍《建康实录札记》、《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前之曾李关系》等文。

此期出版后，刊物停刊。

北平国学书院《国学丛刊》创刊。

该刊是由北平国学书院第一院编纂组负责编辑出版，主要刊登文史考证和语言学的不定期刊物，至1945年5月出版了15册。该刊总体学术水平不高。其中刊登的较为重要的论文有程树德《论语集释》等。

蒋恭晟《钟山本国史》第1册由重庆钟山书局出版。

该书第2册于1942年7月出版，第3、4册于1941年12月出版。

马以禹《中国回教史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束世澂《郑和南征记》由青年出版社出版。

4月

1日 《责善》半月刊出版“周年纪念号”。

该纪念号刊登了丁山《文武周公疑年》，金毓黻《南宋中兴之机运》，罗桑趣吉玛著、李荫亭、金鹏译《西藏佛教源流总说》，苏学林《历朝伪太子与伪皇族案》（苏氏在第2卷第3期又发表《再论伪太子与伪皇族》），钱穆《罗念菴先生年谱》（第2卷第3、4期续载）等文。

25日 辅仁大学历史学会成立。

该学会的主要作用是在课堂教育以外进行学术交流，培养学生多方面兴趣。

在学会成立会上，陈垣作《官书与私书》的演讲，认为在现代仅靠个人力量很难纂成历史伟著，必须依靠有作为之个人凝聚成的众力来完成。同年6月，沈兼士又在历史学会作了《近三十年中国史学之趋势》的演讲，认为“史学是可以促进人类文化进步的一种科学”，并认为近代史学的发展，多借助考古学、民俗学的发展和档案材料的整理，而西洋治史新法的传入也给中国史学发展带来了新变化，沈兼士在最后指出，“我国号称有五千年的文化，而旧史记载多令人不敢相信，若一味疑古，凿空立说，亦为缺陷。吾人倘能利用上述之新材料、新方法，重新证实我们民族光辉灿烂之信史，岂不是空前的一大收获吗？”

是月 金兆梓《中国史纲》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以横向记史的办法，叙述了史前纪、中国民族形成的经过、帝国主义的侵入、政治的演化、教育和考试制度的变迁、宗教与学术文化及自然科学的发展等问题。

吴晗在《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发表《明教与大明帝国》。

文章包含“吴元年与明国号”、“明教”、“明教与回鹘”、“明教之传播”、“弥勒佛白莲社与明教”、“明太祖与红军”、“大明帝国与明教”等节，对佛教弥勒信仰与摩尼教的融合，明教与当时的农民运动、与朱元璋建立的大明帝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考证。

该文被顾颉刚等人认为是民国时期研究民国史的重要成果之一，在宗教研究领域也颇有影响，但也有学者对此文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

同期还刊载了冯友兰《孟子浩然之气章解》、陈寅恪《读哀江南赋》、

杨树达《易牙非齐人考》、谷霁光《宋代继承问题商榷》、陈梦家《社与郊》、张荫麟《〈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何炳棣《张荫桓事迹》、陆侃如《建安文学系年》等文。

蒙思明在《华文月刊》第1卷第2期发表《北魏实施均田制与三长制的年代问题》。

5月

1日　毛子水在《文史杂志》第1卷第3号发表《论大学中设立科学史系事》。

毛子水强调综合科学史的意义，极力主张在国内大学设立科学史系。毛子水提出：我们目前的急务，在使国内的科学家知道科学史的不可忽略，知道科学史的有利于科学的进步；在使国内主持史学的人，知道科学史应和人类争取自由的政治史并列而为“正史”的两高峰；在使国内寻求知识的人，知道科学史是一种正路的学问，是人类知识的最重要的帐目。

此文可谓中国学者对萨顿提倡科学史学科建制化的具体回应。

16日　《解放日报》创刊。

本报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报，选登的历史类文章内容多元，形式灵活，历史知识的普及和著作的评论都迅速及时。在副刊发表文章的多为专家、名家，大多是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

20日　翦伯赞在《时事类编》第63期发表《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与中国人在南洋的黄金时代》。

是月　张荫麟《中国史纲》第1册由浙江大学石印。

张荫麟撰成于1940年，仅完成至东汉初，共十一章。1941年6月，以《中国史纲》上册为名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1944年7月青年书店再版，更名为《东汉前中国史纲》。1948年4月正中书局出版时名为《中国史纲》(上古篇)。

在自序中，作者指出，此书之作“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以开拓心胸的壮观”。因而，总括过去几十年来的史学成绩，在种种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的应有之事吗？”张氏自称其通史的着眼点在“社会组织的变迁，思想和文物的创辟，以及伟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由于是受教育部之托为中学生编写通史教材，因而在写作中“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

索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

该书虽然因为张荫麟英年早逝而未能按计划完成全部撰述，但仍被认为是中国通史代表性著作之一。翟宗沛认为“这册书从上古到新莽虽仅寥寥十数万字，就内容讲，较任何一般通行的‘中国通史’为少，但不论就取材、结构、叙述乃至论断等任何方面均与已有的通史著作迥乎不同”。童书业认为“是书之内容，虽疏误极多，然综论大势，往往有出人之见解。且所述之古史轮廓，颇见正确，立论既不偏于疑古，亦不固执而信古；既有丰富之史学知识，又具通贯之史学眼光；深入浅出，人人能解；在当代通史作品中，允称佳著”，“为当代史学一名著”。苏联学者B・鲁宾称赞此书不仅“处理史料时感情丰富，能激发读者们对于创造伟大的中国的文化的普通人民的热烈关怀”，而且能“把科学的解释和通俗性成功地结合起来”。

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上册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

此书是1940年秋吕振羽执教于重庆复旦大学时始作，至1941年2月完成上册。下册在1948年戎马倥偬之中完稿，由大连光华书店印刷发行。

周恩来谓吕氏云：“现在蒋介石搞尊孔读经，你可以写一本中国历史，从正面教育青年。”因此，该书即“以宣传爱国主义，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为主要任务”。吕振羽完成《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后也感到，要彻底批驳帝国主义的谬论，“一部较系统而正确的中国社会通史的建设，愈成了最迫切最现实的要求”。为此，吕振羽着手写作《简明中国通史》。

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1版序言中自谓：“我的写法，与从来的中国通史著作，颇多不同。”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把中国史看成同全人类的历史一样，作为一个有规律的社会发展的过程来把握”；“第二，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第三，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观点渗入”。

吕著《简明中国通史》是中国最早出版的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之一，与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一起，开辟了中国通史研究的新方向。但六十年代以后，由于吕振羽蒙冤，其影响已远逊于范著。

1948年5月大连光华书店出版上下两册本，1949年4月新华书店校正再版，1949年5月三联书店印上下册合订本。后经过数次修订和增补，多次再版，前后印刷约60万册。

魏应麒《中国史学史》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曾任职南京国立编译馆的魏氏于抗战中撰成此书。“全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将中国史学之特质与价值、中国史籍之位置与类别、中国史官之建置与职守作一有系统之综括叙述。下编则分期叙述自远古至民国每时代史学发展之情形，注意各种体裁之因创，尤注意史学家之史学理论与方法。”下编十章，为古代之史学、两汉之史学、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史学、隋唐之史学、刘知几、五代宋之史学、郑樵、元朝清之史学、章学诚、民国以来之史学。书末两节，则专门介绍新史学与梁启超。

它以评价史书为主，兼及史家及史籍体例，基本上摆脱了史籍解题的模式，将史学的发展进行前后对比，并注意到历史观问题，对古代史学理论也较为重视。对各期史学发展的特征及史体类别源流等，均有独到见解。

姜蕴刚《历史艺术论》作为“华西大学文学院学术丛刊第 3 种”出版。

作者指出，历史是没有什么规律可寻、没有理由可讲的“超机演进”，是一种“含有意志心灵的转动”，“不必按一定的方向，可以有种种不同的临时变迁”，并且“可以因社会遗产之积累与社会遗传之增厚，产生一种非生物的突变现象”。过去的历史，可靠性太少，所以考据和史观都是一偏之见。因此，历史不是科学，也不是哲学，只是一种艺术。他主张，历史学家先要有艺术的修养，然后可以产生有价值的历史。

作者认为“所有的历史，虽不一定都是神话，但可以说都是传说”。“古史固然是由于传说得来，便是现代史乃至新闻材料，也都是传说的”，“传说毕竟还是历史的动力，历史的存在还是依存于传说”。而且，历史等同于小说，“历史与小说的本质，不也就是二五与一十么?”他主张以小说的手法，从历史中去找出有时代及丰富意境的史事来描写。

姜蕴刚断言：“我很自信，此后的著述世界，应该是‘历史艺术论’的时代，至少这个时代，可以命名曰‘历史艺术论’的世纪。”

此书增改后 1943 年 7 月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叶蠖生在《中国文化》第 2 卷第 6 期发表《从安阳发掘成果中所见殷墟时代社会形态之研究》。

针对尹达提出利用出土文物研究古史的主张，叶蠖生指出：“研究这些史料必须注意到材料的缺陷性，即是发掘成果还很小，所发掘的遗址半在盗掘破坏之后。”从殷墟发掘的考古史料中，完全可以找到“奴隶与奴隶主、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对外贸易、贫富之差、强迫劳动、金属制的生产工具”，考察一般的事物，不能单从量上着眼，必须要看到它的质。殷墟的铜器量虽不甚多，但质已发展到晚期的程度。“因此，我们说它不

是原始公社，而是奴隶占有制。”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本文是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其中，对近代史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做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研究和分析，然后才能做综合研究。”

（苏）古柏尔著、吴清友译《殖民地附属国新历史》1—3 册由大连读书出版社出版。

第 4 册 1948 年 4 月出版。

6 月

1 日　杜光简在《责善》第 2 卷第 5 期发表《唐宋两代产丝地域考》。

作者指出“蚕丝业在我国经济史上之重要，吾人业已知之，其产地之分布情形如何，是不可不明。今日我国产丝之地，多在南方，然考之古代，则不尽然”，故“据唐书及宋史地理志，检出丝绢之产地”。通过逐一列举，作者认为，“唐宋时代产丝之地，大部均在北方”，北方所产丝织品，“又以绢为主”，并“在经济基础上极为重要”。

同期还刊载了钱穆《记三国至五代北方丝业盛衰》一文，钱氏在此文前言中指出，“拙著《国史大纲》，曾论南北经济转变，举例及丝织业之初盛于北渐移而南。比来成都，偶为诸生道之，颇有北省人诧为异闻者。以史纲急切不可得，特嘱杜君光简列记唐宋两代地理志所载贡丝诸地以证我说”。

3 日　国民政府颁布《部聘教授办法》。

该办法规定聘在国立大学和独立学院任教十年以上，教学确有成绩且“有专门著作且具有特殊贡献”的教授，由教育部直接聘任为任期 5 年的部聘教授，由教育部在专科以上学校特设讲座，从事讲学和研究。历史类的部聘教授有柳诒徵、陈寅恪、萧一山，国学类的部聘教授为胡小石，国文类部聘教授为黎锦熙、杨树达，哲学类为汤用彤。

14 日　吴金鼎主持由史语所考古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国营造学社合组的考古队对四川彭山汉墓进行发掘。

1942 年 3 月 7 日结束，参加者有夏鼐、曾昭燏、高去寻等。

16 日　韩儒林在《责善》第 2 卷第 7 期发表《元史研究之回顾

与前瞻》。

该文是韩儒林 1940 年 12 月 15 日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师生所作的学术演讲，由张蓉初笔记。作者在此文中将从明朝修纂《元史》至抗战时期的元史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并提出希望“吾人今后研究元史，于域外史料，决不能仍以贩卖西人译文为满足。必须直接阅读史料所在之原文，与中文材料之作比较之研究”，以期建设“可以立足二十世纪之史学界”的第五期元史研究。有研究者认为，此文“充分表达了韩儒林代表的元史学界对发源于中国本土的蒙元史学的学术自信力”。

是月 《古史辨》第 7 册由开明书店出版。

吕思勉、童书业主编，上中下三编。本册考辨夏以前的古史传说。上编古史传说的通论，收录顾颉刚的《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中编收录吕思勉的《古史记年考》、顾颉刚和杨向奎的《三皇考》等 8 篇文章；下编收录童书业、顾颉刚、吕思勉等人的 15 篇文章。中、下两编从三皇一直讨论到夏桀，汇聚了当时研究古史传说的重要文章。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对中国古代的传说进行了系统讨论。童书业序云：“杨先生的古史学，一言以蔽之，是一种民族神话史观。他以为夏以前的古史传说全出各民族的神话，是自然演变成的，不是有什么人在那里有意作伪。这种见解，实是混合傅孟真先生一派的民族史说和顾颉刚先生一派的古史神话学而构成的。他的见解，虽然有些地方我们还嫌简单，或不能完全同意，但他确代表了‘疑古’的古史观的最高峰。”

杨宽在导论中指出，近人分我国古史学之派别为四：曰信古，曰疑古，曰考古，曰释古。主信古者动谓战国秦汉之书近古，所记传说必有所本，一切皆为实录，未可轻疑；主疑古者以古书既有真伪，所传古史又不免失实，苟无精密之考证批判，未可轻信；主考古者，辄病于传说之纷繁，莫由遵循，又鉴于近人争辨古史，立论绝异而均不出故纸堆之范围，乃谓但有纸上之材料无用，非有待于锄头考古学之发掘不为功；主释古者，则以古人十口之相传，“事出有因”，必有史实之残影存乎其间，未容一概抹煞，苟据新史观加以归纳推理，即为可信之古史。此四说者，除信古一派外，无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吾人必先“疑古”“考古”而后终之以“释古”，然后史家之能事尽矣。

顾颉刚说：“这一册的文章讨论得最细，内容也最充实，是十余年来对古史传说批判的一个大结集。”杨宽认为此册“是这几年来从事古史学研究者研究夏以前古史传说的总成绩”。

李玄伯（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由北平来熏阁书店出版。

该书系孔德研究所丛刊之一，李氏曾翻译法国古朗士（又译库朗热）的《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并撰四万余言的《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序》，因篇幅太多，内容也超出序言以外，故与《中国古代图腾制度及政权的逐渐集中》合为《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另行出版。

前篇《古代社会研究序》的主旨，是依据希腊罗马城邦制度阐发周代社会的隐奥，以代表祖先牌位的"主"字入手，钩沉出中国的祀火制度；另一篇《中国古代图腾制度》，则从西方人类学的图腾说解释中国远古时代，如以姓即图腾，以昭穆为氏族的婚级，以尧舜禹禅让出于部落选举或翁婿继承。

此书为中国古史研究开辟一新门径。李氏取社会学之法，以古朗士所述的古希腊罗马社会为参照，对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进行了比较研究，论殷周社会的发展程度，自近于希腊罗马而非印第安。蔡元培评论说，史前学及之考古学之所得，"往往零星断烂，不能为独立的说明"，"乃有资于旁证的民族学"。社会学方法与比较古史学的方法同时并用，"对古史的贡献更能增加"。沈兼士在《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之趋势》中也以此书为例说明西方史学方法给中国史学研究带来的影响，称赞李玄伯"取法古朗士，是一个好例"。1941 年 8 月 15 日，陈垣致乐素云："最近孔德研究所出版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一册。幸有此书，足以不朽，固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也。"

后增加《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几种现象》作为附录，1948 年 9 月，更名为《中国古代社会新研》由开明书店再版。

重庆独立出版社开始编印"二十年来各国兴衰史丛书"。

该丛书收录李长之《波兰兴亡鉴》（1941 年 6 月）、郎醒石《捷克兴亡鉴》（1941 年 11 月）、李执中《二十年来的日本》（1942 年 1 月）、贺岳僧《二十年来的中国》（1942 年 4 月）、王觉源《二十年来的苏联》（1942 年 4 月）等。

尹达在《中国文化》第 3 卷第 1 期发表《关于殷商史料问题——兼论殷商社会性质》。

此文就谢华和叶蠖生的批评进行了答辩。尹达认为，意见之所以分歧的中心环节，在于对殷代史料的看法或多或少有些出入。"如果想正确地把握社会的本质，必须依据正确的史料，必须正确地分析史料本身的可靠程度，才可能得到相当安定性的结论。"他指明虽然考古学上所提供的殷

商史料“是最可靠最宝贵的”，“目前所出的报告太少了，它们只是殷代遗址的部分的事实，不能代表全部的殷代遗址发掘的史料”，“不能以初期发掘的材料和报告为满足，应当注意到所得到的全部材料，辩证地分析它们的相互关系”。他指出从农业的发展上看，原始的农业是可以在新石器工具之上发生发展起来的。他还重申：殷代虽然存在奴隶，但还不曾成为决定社会性质的因素。

延安史学界关于殷商社会性质的讨论一度活跃，但仅限于殷商，而未涉及西周和西周以后的时代。在讨论中，各家观点虽相持不下，但在学术方法论上却日趋一致。

聂崇岐在《燕京学报》第29期发表《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

宋代地理行政区分，府、州、军、监为一级，变化较多，情况复杂。该文系统梳理了宋代府、州、军、监的设置、废复、升降、更名等，是宋代官制研究为数不多的综合性研究之一，被视为聂崇岐的代表作之一。

同期还刊载了秦佩珩《吴伟业殿上行本事质疑》、许世瑛《段氏说文注所标韵部辨误》、王静如《论开合口》、鸟居龙藏《契丹之角觝》、翁独健《斡脱杂考》等文。

顾颉刚抵重庆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自第1卷第9期起主编《文史杂志》，至1949年结束。

7 月

1 日　李济生在《责善》第2卷第8期发表《论鲁学》，顾颉刚为之跋。

作者指出“回顾过去三百年中，吾鲁风气未尽如今日之凋落也”，乃撰写此文“爰述往贤，下及时彦，以告有志为学之士，观其影响”。该文实际是从清初至抗战前山东地区的学术简史。

顾颉刚在文后跋语中认为该文“诚以于齐鲁大学中论近三百年来齐鲁学风固最足为一堂师生之针砭尔”，并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世变日亟，人丧所守，衣食不遑，何心悦学。后世之人读史而至今日，必将怜其遭际之艰危，不忍为严格之绳纠。虽然，此在他人言之则可，而在我辈则固不容自恕。必其艰危，乃得磨炼意志。必其振奋，乃得战胜环境。我辈生于今日，处存亡绝续之交，数千年之学统其将由我而开创一格局耶？此今日有志之士所必当有之自身，亦必当负之责任。为之而善，则我辈固百世之功臣；为之而不善，则我辈实禹稷之罪人。故生于今日，受空前之痛苦者，其分也；生于今日，婴空前之大任者，其幸也”！

4日　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会议至6日结束，决定发起组织中国史学会，同时“广征各学校及各研究机关之史学界人士共同发起”，计划一年后召开成立大会。顾颉刚、缪凤林、金毓黻、黎东方共同提出《由本会补助设立中国史学会案》。

16日　史念海在《责善》第2卷第9期发表《永嘉乱后江左对于流人之安置》。

31日　傅衣凌在《福建文化》总29号发表《明清时代福建的抢米风潮》。

是月　叶蠖生在《解放》第133期发表《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

叶蠖生对历史研究中的史料运用和研究程序等提出意见，主张对旧有的史料严加判别而取舍，因为“第一，它们真伪相杂，错误难免；第二，无论官修私造的历史著作，皆常有一定的阶级意识；第三，旧史著作包括很广大的范围，许多部分在今天用处很小；第四，封建时代的历史著作，社会情形只能附见而已；第五，史料的深厚非常不平衡；第六，愈是接近平民生活的记载，愈容易为当年的历史家吐弃”。

他又说：“我们研究历史，最主要的，不在于记诵故事，批评人物，而是在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求得其一定的法则。”

童书业在《齐鲁学报》第2号发表《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新考》。

作者不认同董其昌等人提出的南北分宗说，在归纳启功等人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地理、画法等方面资料的梳理，另行说明了中国画史上的南方画派与北方画派。此文是美术史研究考证取向的代表性论著之一，有研究者认为此文“繁征博引，极尽考据家的能事”。

同期还刊载了杨宽《月令考》、钟凤年《战国地理杂考》、朱希祖《史记汉王劫五诸侯兵考》、吕克由《秦汉移民论》、吕思勉《道教起原杂考》、程芸《拓跋氏先世考》、赵泉澄《同治东华录人口考证》、沈延国《淮南补正》等文。

8月

1日　《思想与时代》月刊创刊。

此刊由当时任教于迁至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的张其昀、张荫麟、郭斌龢、谢幼伟等在贵州遵义共同发起。该杂志以“发扬传统文化之精神，吸

收西方科技之新知”为宗旨。正如张其昀后来所说，《思想与时代》“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与二十年前的《学衡》杂志宗旨相同”，刊载内容包括哲学、科学、政治、文学、教育、史地等项，而特重时代思潮与民族复兴之关系，“本刊文字大都为通论，不载考据纂辑之作，但穷理力求精密，立论务期征信，以要言不繁深入浅出者为尚”。

该刊是抗战时期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期刊，其撰稿者多为钱穆、张荫麟等名流。创刊之初，以月刊的形式出版，至 1945 年 2 月出至第 40 期后停止出版。直至 1947 年元月才重新复刊。

10 日　《现代史学》推出“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该论文集即《现代史学》第 4 卷第 3 期，收录了陈安仁《历史教学法的理论》、朱谦之《什么是现代》、罗香林《尚书名义考》、郑师许《广学会与戊戌前后之西洋文化运动》、陈啸江《地理因素在历史中所占地位之评价》、彭泽益《太平天国战后土地之丧乱及其整理》、李肇新《精神分析学的历史观》、关履权《论个人对历史的作用》等文。

编者在《编后话》中指出，“史学研究会成立已经十年了，在过去的悠长日子里间，在寂寥的中古学术界中我们总算曾略效微力，故在今天出版这本纯学术性质的论文集来作十年生长的纪念”。

16 日　杨树达在《责善》第 2 卷第 11 期发表《京师解》。

是月　叶蠖生在《中国文化》第 3 卷第 2 期发表《抗战以来的历史学》。

叶蠖生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立场出发，着重对各派历史观及其党性展开分析。他认为，各派政治力量在抗战中无不注意运用历史学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其学术无不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不但抗战营垒和日寇及投降派营垒之间存在着激烈斗争，即使是抗战阵营内部，也存在着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斗争。文章抨击了日本御用学者秋泽修二和国内对日妥协派种种历史理论，肯定了翦伯赞、吕振羽、吴泽、华岗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建设历史学科理论和反对各种日寇汉奸及投降方面所做的贡献，强调了未来史学的发展必然是“唯物史观学派渐走向主导的地位”。

作者还从唯物论的立场上，批评民生史观是“某些人们为着政治作用，企图向科学的历史方法反攻”。作者认为“在抗战营垒中，无论是唯心的唯物的历史学派，为着适应抗战的需要，都注视到浅显通俗的宣传教育的重要，都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站在抗战营垒以内的唯心论历史家，为着他们还主张抗战，为着他们太重视心理作用，他们便强调历史教育的

功用，企图以祖国光荣史迹来增强民族自信心，来鼓励抗战精神”。

世界书局开始编印“学术讲话丛刊”。

该丛刊收录李建文《中国文化史讲话》（1941 年 8 月）、施慎之《中国文学史讲话》（1941 年 8 月）、施瑛《中国民族史讲话》（1945 年 11 月）、秦尚志《中国政治思想史讲话》（1945 年 11 月）等著作。

谢幼伟在《时代精神》第 5 卷第 1 期发表《唯物史观与道德》。

作者提出道德史观，他认为道德是超阶级的。道德应人类的生存需要而产生，道德又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是经济的基础，是生活的基础。没有道德，社会就无法维持。道德是每一个人都有的，道德没有阶级性。

道德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离开道德，一部历史无从写起；离开道德，历史无演进之可能。因为在历史演进中，道德是潜伏于人类一切生活下的原动力。没有道德，人类失去生活能力，历史失其前进的目标。所以说，道德是历史的基础，是历史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历史是人类道德的产物，是人类成功和失败的记录，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可以用道德解释。

抗战时期道德史观的提出，其目的是针对唯物史观。

蒙思明在《文史杂志》第 1 卷第 9 期发表《六朝世族形成的经过》。

（美）海斯等著、邱祖谋译《世界史》上下册由上海正行出版社出版。

9 月

1 日　张维华在《责善》第 2 卷第 12 期发表《明清间基督教及西洋学术东渐史自序》。

作者指出，“自江宁条约而后，欧西列强方且以东方民族为鱼肉，保持其瓜分之野心，而吾中华民族亦甘任宰割，略无抵御之术。窃尝慨之。吾国晚近文化，几全袭欧西之津余，不能自拔，而于政治外交之情势，尤备受创痛，不可缕述。即今思往，则以明清之际中欧两地之交通，实为其转移之关键。用是著此篇，先述明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与中国之关系，说明近世中欧交通发展之情形，次述基督教之东来及其所传入之西学，说明西洋文化在中国所发生之影响，以见当时吸收外来文化之重要史实”。

张氏《明清间基督教及西洋学术东渐史》，原计划收入萧一山主编的“经世社丛书”，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但最终无果。一说 1948 年文通书局出版，似不确。

16 日　金鹏在《责善》第 13 期发表《研究西藏文化刍言》。

30 日　徐天胎在《福建文化》总 30 号发表《福建历代之饥馑》。

是月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创刊。

抗战时期迁往四川的金陵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各有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各有刊物，哈佛燕京社建议合并为一个“汇刊”，以集中人力和经费，出版高质量的学术刊物。

《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简章》规定该刊物只发表三研究所专任人员的稿件，不收外稿；刊物内容主要是“考证论文”、“调查报告”、“重要史料”、“书报评论”四类；每年计划出版一卷，编辑事宜由齐鲁、华西、金陵三校依次轮流担任。1943 年以后燕京大学又加入进来。到 1945 年 9 月，共出 5 卷 6 册。发表各类研究论文 72 篇，200 余万字。1946 年后由金陵、华西继续出版至第 9 卷，1951 年出版的第 10 卷由华西大学独立完成，此后停刊。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是抗战时期驻成都教会大学最有成绩的学术合作，在战时的国学研究中占有突出地位，德国学者傅吾康在《抗战期间中国后方的学术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 6 卷）一文中认为该刊在汉学研究的出版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创刊号刊载了史岩《秦代钟鐻金人之艺术》、孙次舟《嵩县唐墓所出铁剪铜尺及墓志之考释》、刘铭恕《契丹民族丧葬制度之变迁及其特点》、刘国钧《建安时代之政治思想》、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韩儒林《读〈蒙古世系谱〉》、张蓉初《〈新元史·氏族表〉蒙古部族分类质疑》等文。

马列研究院更名为中央研究院，下设历史研究室，由副院长范文澜主持。

改组后的中国历史研究室人员变动很大，马列学院改组后，谢华、唐国庆和尹达就离开历史研究室。同其他研究室一样，中国历史研究室由研究员和研究生两部分人组成，他们职责相同，但待遇有别。此间，历史研究室补充了大量新成员，其中两位特别研究员是齐燕铭和吕振羽，一位研究员是刘亚生，新增研究生分别是陈道、宗箴、李徽、孙孝实、夏奇峰、胡朝芝和湛湘汉。

延安大学成立。

它是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和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合并成立的一所高等学校。

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

由于毛泽东一再号召全党注意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范文澜受中央委托，主持编写一部供广大干部和青年阅读的中国历史读本，于是有此书之作。

全书撰写始于1940年8月，计划分三编：第一编，原始社会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成立——远古至秦，由谢华、范文澜编写；第二编，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立后对外侵略到外族入侵——秦汉至南北朝，由佟冬、尹达、范文澜编写；第三编，封建经济的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入侵——隋的统一至鸦片战争，由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范文澜编写。后来由于各人文风不同、观点各异、详略不一，难以统稿，范文澜遂决定一人独立编写。1941年5月完稿。原题“中国历史研究会编”。

其《序言》说：“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本书目标是“从广泛史料中选择真实材料，组成一部简明扼要的，通俗生动的，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的中国通史”。

范文澜总结此书与旧史书的五点不同之处：一、书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类型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二、按照一般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划分中国历史段落，这是和旧历史不同的；三、中国是长期延续的封建社会，但二千年来决不是没有发展，本书把封建社会分成三个时期说明它的发展过程，关于时期的划分，着重于经济基础的变动，并注意到文化思想的发展；四、写阶级斗争，着重叙述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同时也要指出农民阶级本身缺乏组织性和觉悟性，因之它只能起着有限的推动作用；五、书中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

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出，“它是以新的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历史的一个宝贵成果，它在处理历史材料与分析问题上打破了中国旧史学者的治史偏见，立基在先进的无产阶级立场上，正确地洞照了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所以，它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方向打下了一个基石。同

时，在运用新的方法上，它克服了社会史论战时代的公式主义的作风，以具体的材料系统地叙述中国历史的运动状况，它里面没有空洞的议论，而是把作者所持的观点和方法论溶化在丰富史实叙述里，对中国历史上的争论问题，它不是告诉几点泛泛的道理，而是按着历史和实在状况代替了条文式的回答。”也有论者指出，“这是一部有强烈战斗意识的书”。而批评者认为，此书“仅只是替中共平添了一部宣传品”。

《中国通史简编》中册北宋至鸦片战争以前部分于 1941 年底完稿，1942 年 12 月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

此书是 1949 年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的代表作，为中国通史的编撰提供了一种典范。刘大年称之为“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自延安出版以来，它成为解放区干部的必读书，曾多次重印，发行量巨大。

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为“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丛书”之一。潘光旦收集整理了从嘉庆十七年至民国二十三年（1812—1934）一百多年间共一百七八十个家系的伶人资料，系统地分析了他们的地理分布、社会阶层分布、移植与血缘关系。潘光旦认为在地理分布上，河北、江苏、安徽、湖北、山东几省的伶人依次较多；在伶人形成问题上，伶人的婚姻亲属、家世对伶人的形成起着重要影响，存在着“类聚配偶律”；在阶层分布上，先是务农和务工的比较多，后出现转折，经商与仕宦出身的比较多，此种转变既有经济的因素又有心理的原因。另外，潘光旦还探讨了研究伶人的意义、近代以前中国伶人的情况、西洋伶人研究的状况等。

金毓黻《东北通史》由五十年代出版社印行。

作者编印此书的缘起，是因他流寓四川时对故土的怀念及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而将旧稿整理出版。此书有四节叙述金史，即“女真之兴”、“女真之经略东北”、“宋使入辽金之行程录”、“蒲鲜万奴之东夏国”。书中对史事和地理沿革考证较详。它与略早于此书的傅斯年《东北史纲》同为我国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宋德金《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一文认为该书“对史事和地理沿革考证较详”，与傅斯年《东北史纲》“同为我国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开明书店开始编印“开明文史丛刊”。

该丛书收录的史学论著有张政烺《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陆侃如冯沅君

《中国文学史简编》、张长弓《中国文学史新编》、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方德修《东北地方沿革及其民族》、朱东润《史记考索》、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张须《通鉴学》、谭丕模《清代思想史纲》、谢国桢《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谢再善译《蒙古秘史》等。

李达在《文化杂志》第1卷第2期发表《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

作者把问题归纳为八点，即战乱频繁，封建力役，封建剥削，宗法封建制下聚族而居的村落公社，封建的政治机构，农民阶级不能担负新生产方法，科学的不发达与儒家学说的影响，地理环境。

稍后蒙达坦在《文化杂志》第2卷第1期发表《与李达先生论中国发展迟滞的原因》，认为除了封建力役和封建剥削外，特殊的土地关系、农民战争、共有财产也是封建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华岗撰文批评了李、蒙二人的意见。吕振羽、吴泽、罗克汀等也参加了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就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长期缓慢的原因展开了讨论。这场讨论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

齐思和《西洋史教学之基本问题》由北平函雅堂书店出版。

董霖《中国政府》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10月

25日　教育部训令专科以上学校应设史地学会。

该训令称为发扬民族意识，各校应设立史地学会，无史地系学校宜促成学生组织中国历史或地理研究会。

是月　中法汉学研究所在北京成立。

此所是法国在中国开设的学术研究机构，由法国驻华使馆聘请汉学家铎尔孟任所长。其前身为《法文研究月刊》出版委员会，经费主要来自中法庚子赔款余额。珍珠港事变后，燕京大学停办，研究所于是扩大编制，增聘燕京大学语言学家高名凯、历史学家聂崇岐及原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职员多人。1945年前，中法汉学研究所设有通检（引得）组、民族研究组、历史考古组、翻译组、《法文研究》组等。另外还出版不定期刊《汉学》（1944年起）和半年刊《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

1948年该所由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接管，改称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亦称北平汉学研究中心），由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院长戴密微任所长，

法国汉学家韩百诗任主任。1949 年后，中法汉学研究所实际上停止工作，1953 年该所正式关闭，大部分图书运回巴黎。

研究所以“通检组”成果最大，先后出版了《论衡通检》（1943 年 1 月）、《吕氏春秋通检》（1943 年 5 月）、《淮南子通检》（1944 年 12 月）、《潜夫论通检》（1945 年 12 月）等 10 余种中国古代文献通检。

陈安仁《中华民族抗战史》由曲江民族文化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十五章，从中国民族起源问题讲起，梳理了从黄帝时期至清代中国民族对外战争的概况。作者在“序言”中指出，“本书站在民族主义之立场，从历史教育之方面，提起中华民族对外抗战之历史精神与文化精神，此种民族意识之培养，固历史家之任务也。”作者认为汉族是中华民族能成为一“坚固组织之单位”的“同化之本位”，而汉族之所以能够担任如此责任，又在于汉族“数千年能对外有一种自强不屈之独立精神，以为民族之维系也”。作者明言，“本书对于过去数千年之中国民族，以血汗造成伟大之战史，条举而概述之，为今日民族抗战之写照，盖纯从民族意识方面，而提揭时代精神，骥树起民族之自尊心与自信力，而完成民族复兴之伟业。”

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由开明书店出版。

该书是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丛刊之一，全书共十章，论述了明代理学的思想来源、派别、陆学的复兴、王学的兴起、王学的派分、明代考证学、东林学术及明末黄道周、刘宗周的思想。

1992 年，齐鲁书社再版此书，在“前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称该书“是一部拓荒性的学术专著，对明代学术思想作了系统而深刻的研究”，“一直被视为研治明代思想史所必备之参考书”。

闻一多在《清华学报》第 13 卷第 2 期发表《周易义证类纂》。

作者指出，此文“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易，不主象数，不涉义理，计可补苴旧注者百数十事。删汰芜杂，仅得九十。即依社会史料性质，分类录出”。闻一多将这些材料分类为“有关经济事类”（分别有“器用”、“服饰”、“车架”、“田猎”、“畜牧”、“行旅”）、“有关社会事类”（分别有“婚姻”、“家庭”、“宗族”、“封建”、“聘问”、“争讼”、“刑法”、“迁邑”）、“有关心灵事类”（分别有“妖祥”、“占候”、“祭祀”、“乐舞”、“道德观念”）、“余录”（指“无类可入者”，分别有“坤”等）。

郭沫若曾说闻一多对《周易》等古籍“实实在在下了惊人的很大功

夫，就他所已有成就而言，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他那眼光犀利，考索的渊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有后无来者”，并认为闻一多的这些古籍研究“继承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学的致密”。该文是闻一多周易研究的代表作，有研究者认为此文“提出许多自《周易》出现以来没有人讲过的问题，破译了《易经》中许多千古不解之谜”。也有研究者认为，闻一多这种不主象数，不涉义理，专以文字考据解说《周易》，并从社会史料的角度进行分类研究的路径，代表了近代易学研究的新动向。也有研究者认为，对古籍的考据只是闻一多通向更高一级认识的手段，闻一多已经认识到时代背景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对古籍研究的重要性。这一点在该文中已有所体现。

同期还刊载了汤用彤《王弼大衍义略释》、雷海宗《司马迁的史学》、丁则良《王安石〈日录〉考》、李嘉言《贾岛年谱》、陈梦家《关于上古音系的讨论》等文。

袁钺《革命哲学史观》由成都铁风出版社出版。

作者从分析东方哲学入手，探讨了革命哲学的产生根据、内容及与救亡图存的关系等，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孙中山、蒋介石的哲学就是革命哲学的代表。

阎宗临在《建设研究》第6卷第2期发表《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略述》。

该文对一切文化源于中国说和中国文化西来说都提出批评，认为应根据史实对中西文化之间相互产生的影响进行科学的研究。在《建设研究》月刊第6卷第3期，阎宗临又发表《近代中西交通之研究》一文。

刘异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7卷第1号发表《六艺通论》。

11月

1日　胡厚宣在《责善》第2卷第16期发表《甲骨文所见殷代之天神》。

作者认为，“帝乃殷人之天神”，“其名虽以称‘帝’最为普通”，但亦有“上”、“上子”、“上帝”的叫法，“此在天上之帝者，能令雨足年，能不令雨而降为旱灾，能降祥降祸，能授佑作它，是其虽在天上，而实为人间祸福之主宰也”，并认为“殷人尚鬼，崇祖先，隆祭祀。实因殷人心目中以为祖先死后，可以升天”。有研究者认为，胡氏是中国殷商宗教研

究成果最多、成就最大的一家，此文即是最早之代表性论著之一。

16 日　胡厚宣在《责善》第 2 卷第 17 期发表《甲骨文中之天象记载》。

20 日　金灿然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

21、22 日连载。作者把中国史学史的发展划分为封建时代的历史学、资产阶级方面支配下的历史学和唯物史观初步运用下的历史学三个阶段。封建史学为封建统治者辩护，注重个人尤其是帝王的功业言行，忽视广大群众的活动；注重文物制度（上层建筑），忽视食货经济（下层基础）。晚清以来，中国史学虽然出现了历史观的改变、中国通史的编著、专题的研究与实证等发展趋势，但其致命伤是“以精神、心、道等唯心的观点来说明中国的历史，过分估计了英雄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民本的意义”。

作者认为，唯物史观的输入和运用，使中国史学呈现出新面貌。社会史论战以来，“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社会史上，唯物史观的方法已占了统治的地位。在这个光辉的方法论面前，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历史方法已显得暗淡无光，失却了活力”。今后中国史学的方向，“便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也就是说，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固有的历史资料，把中国历史学带到真正的科学道路上”，“今后的历史研究者，要越过那种以社会发展史的公式随便配合上一点历史材料便算解决了中国历史问题的低级阶段，他们要从具体材料出发，在具体材料中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是月　中山大学主办《中山学报》创刊。

该刊系由朱谦之等人创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办刊特点是坚持学以致用。由于战乱条件困难，该刊并不是定期连续出版物。

创刊号刊载朱谦之《中国思想方法论纲》、郑师许《中国史前文化》（第 8 期，第 2 卷第 1、2 期连载）、陈安仁《中国上古农业之史的探讨》、罗香林《南诏种族考》、陈啸江《中国地理对于中国经济史特殊发展之影响》等文。

吴希庸在《东北集刊》第 2 期发表《近代东北移民史略》。

该文梳理了清初以后关内汉族人大量移入东北的历史，作者认为大致经历了“招垦”、“移屯”、“弛禁”、“移民”等发展时期。文章还分析了关内向东北移民的原因，并考证计算了相关数字。

同期还刊载了金毓黻《清代统治东北之二重体系》、陈述《契丹女真汉姓考》等文。

12月

1日　蒙思明在《责善》第2卷第18期发表《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

应钱穆邀请，蒙思明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演讲《史学方法在史学上的地位》，并邀其将讲稿写出，改题"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交由《责善》半月刊发表。

蒙文对数十年来"谈史学的人，除考据外，皆斥而不谈"的风气痛加针砭。他批评近数十年来学术界以考据为"史学的正宗"和"惟一的内容"，指出这种不事综合不谈思想的考据风气之所以形成，一方面是承继清代朴学的遗风，一方面又接受西洋考据学的余绪，本来这样的学风已为西方的新兴思潮所厌弃，不料在中国双流汇合的结果，"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金字招牌之下，有如打了一剂强心针，使垂灭的爝火，又将绝而复燃，竟变成了学术界唯一的支配势力。学者们高谈整理国故，专崇技术工作；使人除考据外不敢谈史学。评文章的以考据文章为优，倡学风的以考据风气为贵；斥理解为空谈，尊考校为实学。"蒙思明认为，考据不能独当史学重任，而且考据必须有历史哲学的领导、有博大鸿阔的学识以及有实用价值。总之，"需要有目的的考据，更精密的考据学，具特识的考据家。否则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鸿愿，永远是一个鸿愿而已。"

胡厚宣在《责善》第2卷第18期发表《卜辞零简》。

该文系由《论殷代纪四方之序》、《论殷代已有五方之观念》、《殷代之乐舞》、《甲骨文中之牙病记录》、《'中国'称谓之起源》五篇短文组成。《'中国'称谓之起源》一文系在钱穆的启发下而写。钱穆在阅读完胡厚宣前四文后告诉胡氏，"中商者，或与后世中国之称谓有关"，胡氏受此启发乃撰写此文。

3日　林同济、雷海宗等在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

此为《战国策》半月刊停刊后"战国策"派的又一阵地。此副刊共出31期，1942年7月停刊。

8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查封。

日军逮捕了燕京大学包括司徒雷登、洪业、邓之诚、侯仁之在内的20多名进步师生，校舍被占用。全面抗战后退居上海租界和香港的不少文化、学术人士不得不辗转回到重庆等内地。

14 日　郭沫若在《新华日报》发表《我怎样写〈棠棣之花〉》，谈历史剧的创作。

文章介绍创作历史剧《棠棣之花》的经过，以答观众问。其中谈到历史剧创作的主张，认为考据和创作“是两条不必一定平行的路”，“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

至 1943 年 4 月，郭沫若相继创作了六部历史剧。分别是《棠棣之花》（1941 年 12 月），《屈原》（1942 年 1 月），《虎符》（1942 年 2 月），《高渐离》（又称《筑》，1942 年 6 月），《孔雀胆》（1942 年 9 月），《南冠草》（1943 年 4 月）。前 4 个剧本为战国题材，《孔雀胆》写元代事迹，《南冠草》写明代事迹，其中以《屈原》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郭沫若此期历史剧中的冲突，是爱国与卖国、自由与专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并鞭笞独裁、卖国的败类，讴歌忠于祖国、为自由和平而牺牲的仁人志士。它们“贯穿着反侵略、反分裂、反投降或反独裁的主题，充满着为争取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而斗争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具有崇高雄伟的美，异常振奋人心”。

16 日　胡厚宣在《责善》第 2 卷第 19 期发表《甲骨文四方风名考》。

该文不仅揭示了卜辞中所见商代四方风名，还将其与《尚书·尧典》、《山海经》、《夏小正》、《国语》诸典籍中的四方风名相印证。有研究者认为，自此文发表之后，四方风名，始为人所知，而四方风名之卜辞，也被甲骨学界承认。《责善》第 2 卷第 22 期又刊载丁声树、胡厚宣撰写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补正》。

同期还刊载了严耕望的《楚秦黔中郡帝王考》等文。

30 日　管长墉在《福建文化》总 31 号发表《福建之畲民——社会学的研究与史料的整理》。

作者试图将社会学的一些知识和史料梳理结合起来，探讨福建畲民的起源、分布、姓氏、生产情况等问题。

同期还刊载了傅衣凌《清乾隆福建吃老官斋匪滋事考》、萨士武《福建早稻源流述概》、徐天胎《明代福建邓茂七之乱》3 篇论文。

是月　《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材料》由中共中央在延安编印出版。

该书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编辑成书，收录了 1928 年 7 月中共六大至

1941年11月间各种文献556篇。1942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又编印出版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此书收录1921年3月至1928年6月间中共党史及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献198篇，为研究和学习中共六大以前的历史提供了资料。此两书主要是为中共的高级干部在整风运动中学习和研究提供材料，此两书实际上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为此后的中共党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吕思勉《先秦史》由重庆开明书店出版。

本书共十六章，首章总论，讨论了治先秦史的现实意义、先秦史的分期方法及原因；第二章讨论了古史材料，作者认为“古书之伪者并不多”。

本书在编撰体例上颇有特色，在民族疆域、社会组织、农工畜业、衣食住行、政治制度、宗教学术等方面，皆作专题论述。“此书论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国民族起源及西迁，古代疆域，宦学制度，自谓甚佳。”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经毛泽东修改后公开发表。

《决定》云：延安干部学校并各抗日根据地干部学校“除正确地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毛泽东在修改决定时指出：“本决定适用于延安，但一切基本原则不但适用于延安，同样亦适用于其他地方。”

历史类课程被列为干部学习的重要课程。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干部在职教育增加了中国历史和世界革命史的学习内容。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由辅仁大学印行。

关于此书写作目的，陈垣在1957年7月《重印后记》中说：卢沟桥事变起，河北各地相继沦陷，作者“乃有感于宋金及宋元事，觉此所谓道家者类皆抗节不仕之遗民，岂可以其为道教而忽之也。……诸人之所以值得表扬者，不仅消极方面有不甘事敌之操，其积极方面复有济人利物之行，固与明季遗民之逃禅者异曲同工也”。

全书共3篇4卷23章，依据散见于碑刻和诸家文集资料，对全真教等三教的起源、发展及活动情况详加考论。书前有全真教传授源流表，全真教历任掌教表，大道教祖师传授表，太一教祖师传授表和作者识语；书后有朱师辙跋。

本书是研究金元道教的重要著作。孙楷第评论说“三道教有史，自先生始”。是书有不可及者三，“一曰真积力久，二曰心解神契，三曰诠叙有方”。“然余尤服先生议论之正也。真积力久是学，心解神契是识，诠叙有方是才，议论之正则是德也。”

杨志玖在《文史杂志》第 1 卷第 12 期发表《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

作者依据《永乐大典》卷 19418 所录元代《经世大典·战赤》的一段史料，解决了一桩历史公案，考证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所述他伴随蒙古公主从泉州返波斯等事是真实的，他确实到过中国，还订正马可·波罗离华时间是在 1291 年初，而不是以前西方人所认定的 1292 年初。这是迄今所知汉文记载中唯一能见到的马可·波罗活动的考证和研究，得到向达、顾颉刚、汤用彤、傅斯年等人高度评价，并因此而获中央研究院名誉学术奖。

该文还译为英文，1944 年刊登在英国《亚洲皇家学会学报》孟加拉版第 4 卷；又在 1945 年 9 月美国《哈佛亚洲学报》第 9 卷第 1 期上发表了论文摘要。而几乎同时，法国伯希和利用波斯文史籍对马可·波罗离华的时间得出了与杨志玖相同的判断。

余嘉锡在《辅仁学志》第 10 卷第 1、2 期合刊发表《〈疑年录〉稽疑》。

作者自认服膺钱大昕之学问，觉《疑年录》之有用，但“惜其未尽善”，乃根据材料“为之弥缝其缺失”。此文所“稽疑仅前两卷，起自后汉，终于有元”，上卷涉及 25 人，下卷涉及 79 人，于钱氏《疑年录》错误处纠正之，无注出处处补充之。

同期还刊载了陈垣《明末殉国者陈于阶传》、牟润孙《崔浩与其政敌》等文。

柴德赓在《辅仁学志》第 10 卷第 1、2 期合刊发表《宋宦官参预军事考》。

作者指出，“余观宋代宦官之与政治，举凡国计民生治河决狱之事，巨细莫不与闻，顾以参预军政，与一代用兵关系最大，军政之坏，殆由于此”，乃撰写此文，揭示宋代宦官参预军事，导致军政败坏之史事。

金陵大学教授刘继宣鉴于当时青年学生历史知识的贫乏，发起“读一部史书运动”。

作者说：“掠人之国土者，类先从历史上找根据，或虚构其词，并继之以武力侵略。如日本政府授意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矢野仁撰写《满蒙非支那领土论》，田中义一据以发挥，不懂历史，便无法反驳。”

钱穆任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导师。

是年

第一届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奖评出。

获奖的人文社会科学类著作有：文学类一二等奖空缺，三等奖四名（邵祖平《培风楼诗续存》、卢前《中兴鼓吹》、陈铨《野玫瑰》、曹禺《北京人》）；哲学类一等奖一名（冯友兰《新理学》）、二等奖一名（金岳霖《论道》）；古代经籍研究类一等奖空缺，二等奖二名（杨树达《春秋大义述》、陈启天《韩非子较述》）、三等奖四名（黎锦熙《方志今议》、罗倬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贺懋庆《周易卦序研究》、金景芳《易通》）；社会科学类一等奖空缺，二等奖一名（胡焕庸《缩小省区方案研究》）、三等奖一名（陆懋德《中国上古史》）。

郭沫若陆续发表《由诗剧说到奴隶制度》、《屈原研究》（1942年2月）、《殷代是奴隶社会考》（1942年4月）等文，对殷代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新的论证。

郭沫若抛弃旧说，重新认识了殷代社会性质。他明确表示：“关于殷代是奴隶社会这一层近来已得到一般公认。”

1942 年

※ 西北史地考察团由重庆前往西北进行考察。
※ 陈垣撰成《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 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室制定三年研究计划。
※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出版。

1 月

1 日　严耕望在《责善》第 2 卷第 20 期发表《论秦客卿执政之背景》。

15 日　顾颉刚在《文史杂志》第 2 卷第 1 期发表《商王国的始末》。

16 日　缪钺在《责善》第 2 卷第 21 期发表《王粲行年考》。

25 日　郭沫若邀请翦伯赞等人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举行演讲。

翦伯赞在三天中分别作了《中国人种之起源》、《前氏族社会》、《氏族社会》等演讲。此次演讲同时还邀请了侯外庐、周谷城、吕振羽、杜国庠等历史学家来讲中国通史和古代思想史。

据钱远铎《永恒的怀念》一文记载，当人们问郭沫若为什么不自己一个人讲下去，而要请这么多观点不尽相同的人来讲时，郭回答道："我是有意识地请这些观点不完全一致的学者来讲的，这一方面是百家争鸣，另一方面能启发大家独立思考问题。我本人的历史观也是一家之言，你们大家可以互相比较，择善而从，学问就能深入了。"

是月　由中国边疆学会主办的《中国边疆》创刊。

2 月

1 日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

其中说，“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

缪钺在《责善》第2卷第22期发表《何晏王弼事辑》

作者认为世人以成败论英雄，对何晏王弼“史多诬辞，世鲜公论”，且“魏志不为何王立传，史文零落，逸事罕征”，乃编撰此文，“略存梗概”。本文还是魏晋清谈研究领域的重要论著。作者还提出了“后世言清谈者，溯源正始，实则太和中其风已畅”，“正始清谈之士，宗派不同，约而论之，可析为三，而以何晏钟会王弼为代表。何晏以文辞胜，钟会以明理胜，王弼以玄远胜”等观点。

同期还刊载了陆懋德《论国学的正统》等文。

是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其中规定：高、中级干部之具有学习理论资格者，于业务学习与政治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依次逐步学习之。其学习方法，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原则”，“政治科学以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以我党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

姚薇元《〈道光洋艘征抚记〉考订》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

作者运用档案等材料，对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一书涉及的史事进行细致考订，赢得了蒋廷黻、郭廷以等人的高度称赞。蒋廷黻称此书提供了关于鸦片战争许多正确的知识，并使人认识到魏源在当时对世界的了解情况；郭廷以不仅称该书“是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公允的正确的论述之书”，而且此书运用档案和外国一流著作来考证近代史史实的方法“真是嘉惠后学不浅”；费正清称此书“是一本有详细的注释而且有判断力的书”。

1955年，作者对此书增订后改名《鸦片战争史事考》，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1984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修订版。

于右任在《文史杂志》第2卷第2期发表《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

3 月

30 日　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

报告对中共党史的学科性质、学科特点、研究方法、党史分期等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这为中央高级学习组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方法指导，奠定了中共党史学科的理论基础。

是月　朱谦之在《现代史学》第 4 卷第 4 期发表《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说》。

第 5 卷第 2 期连载。作者认为《梁书·东夷传》中有关女人国的传说，"照慧深所说，研究结果，可以断定为即今美洲亚马逊河附近之某岛"，"扶桑国即为墨西哥"。

同期还刊载了郑师许《史前之东北与中原之关系》、董家遵《隋唐五代的收继婚》、王兴瑞《地方经济史研究方法导言》、丘陶常《孙夏峰生平及其学术思想》等文。

4 月

1 日　国立南洋研究所在重庆开办。

南洋研究所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如史地组计划研究南洋史（含通史、断代史、地域史、国别史四个方面）、华侨发展史（含中国与南洋交通史、华侨移殖民史、华侨革命史、华侨名人史迹四个方面）、列强侵略南洋史（含欧人拓殖南洋史、美人拓殖南洋史、日人南进研究三个方面），但是由于派系人事斗争激烈，该所实际上未能展开多少研究，于 1944 年 8 月被下令裁撤。

21 日　西北史地考察团由重庆前往西北进行考察。

该团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于 1941 年底提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共同组建，由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任团长，李承三任总干事，向达任历史组组长，劳榦任文书，石璋如为会计。6 月 19 日，劳榦和石璋如在敦煌开始西北考古调查工作。

是月　缪凤林在《思想与时代》第 9、10 期发表《国史上的战斗观——从国史上证明战斗至上的历史真理》。

为反驳日本人渡边秀方的中国民族文弱论，作者提出了"战斗至上论"。他指出，"战斗至上"才是"历史的真理"，"中华民族的真精神"，

并以史实说明中国古代国家的建立是由于战斗，从唐虞三代的兴盛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发展，乃至秦汉强大，隋唐隆盛，明代复兴，清代繁荣，无不由于战斗。中国的历史显示，“欲抑不义之战，必以义之战”，“欲世无侵略，必以具备优势之战斗力为第一义”，“徒言防止，断不足以制止侵略。欲侵略之绝迹，唯有如孝武之大张挞伐，深入惩创，使侵略者完全丧失战斗力耳”。

尹达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陕西华北书店出版。

5月

16日　周荫棠在《斯文》第2卷第13期发表《历史与政治》。

作者提出政治史观。他强调政治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他指出，一部完备的历史，不能只记载政治事实，但政治毕竟是最重要的因素。政治的行动，几乎占了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体相的全部。一部完备的历史，应以政治事实为主体。他批评经济是基础的观点，认为经济固然重要，但经济是需要调和节制的，在阶级分化日益显著的时代，调和节制更显必须。这种调和节制的事，就是政治。他试图以大量事实证明，历史与政治联系不可分，历史本身就是政治。

是月　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自序云：“先生讲授此学，多秉梁（启超）先生之义……余此篇远宗梁先生之大义，而略为去取，以求研述之方便；藉金先生搜罗之宏富，而取精用宏，裁以自我之史观大义，而成一新系列。”

该书分五章依次论述史官、史家、史学名著，并从史学名著中归纳史体、历史哲学及史学发展新趋势。全书将中国史学史分为几大专题进行论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特设一章，专论历史上的“五德终始说”、“三正三统说”、“皇极经世论”、“三世论”等历史哲学，以及神权史观、垂训史观和科学史观演变递兴的过程与意义，此为该书一大特点。

6月

《现代史学》推出“中国现代史专号”。

该专号收录了朱谦之《太平天国史料及其研究方法——中山主义的太平天国革命观》、陈安仁《中国现代革命史论》、王兴瑞《清末革命党与保皇党的关系》、区琮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起源》、丘陶常《明室士大夫复国运动对于近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的影响》、黄庆华《辛亥革命思潮溯源》等文。

朱谦之在《现代史学》第5卷第1期“中国现代史专号”发表卷首语《考今》。

作者首先指出“现代史学的第一职务，乃在怎样理解目前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大转变，换言之，即是‘考今’。现代史学新旧倾向所行不绝的论争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历史家的职务，是单纯的考古呢？还是考今呢？1938年第8届国际史学会会议，从所提出各种论文报告之中，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现代史学研究的趋势，在努力使研究工作与现代问题及兴趣发生密切之联系，即在较远古之时代研究上亦然’”。

朱氏认为，考古学和上古史研究应当从史料收集向注重史实的解释转变，应当和现实发生联系。在世界史学界，以朗普勒希特为代表的“考今派”已经对以兰克为代表的“考古派”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中国，抗战以后，“这种纯粹考古考证的史风似乎已经急剧地转变，民族意识的增强，使我们对于本国文化的价值，从极端怀疑古史中解放出来，考证考古的工作一转而从事抗战史料的搜集，社会经济史料的搜集，民族文化史料的搜集，这种努力，使研究工作与现在问题发现密切的联系，不能不说是有很重大底历史意义的”。

邓初民《中国社会史教程》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

本书“绪论”主要讨论什么是历史、什么是中国社会史、关于研究一般历史所必须注意的几个要点三个问题。第一编为“先史时代的中国社会”，第二编为“正史时代的中国社会”。

此书是一部比较重要的马克思主义通史作品。

陈寅恪开始在广西大学任教。

至1943年秋结束。

7月

7日　姚名达在抗日前线牺牲，终年37岁。

1940年9月，姚名达被国立江西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聘为文史系教授兼导师。为支持抗日，1942年6月10日姚名达在江西中正大学组织师生战地服务团，并任团长。该团于6月22日前往前线劳军，因日军突破防线，服务团冲散后被敌军发现，姚名达与日寇奋起肉搏，壮烈牺牲。姚名达因此被誉为“抗日战争壮烈殉国的教授第一人”。

14日　田汉主持在桂林七星岩下召开“历史剧问题座谈会”。

是月　韩启农编著《中国近代史讲话》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分店

出版。

蓝文征《中国通史》第1册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

8月

13日　群益出版社在重庆成立。

该社专门出版郭沫若的著译作品，同时出版学术性刊物《中原》。

是月　许立群《中国史话》由华北书店出版。

《中国史话》的前身是1940年许立群发表在《中国青年》上的一篇文章《古中国的故事》，这篇文章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许氏遂扩充为本书。

作者说："历史科学是生活斗争的重要武器之一。本书的写作目的是帮助广大人民群众初步地学习中国历史，以便进而学习掌握这一斗争武器。因此本书内容和文字都力避艰深枯燥，尽量求其通俗化和趣味化。""本书着重反对旧历史教科书的成见，注意广大的下层人民的生活与斗争，及其反抗外族侵略者的斗争的英勇，同时也注意暴露统治阶层的荒淫与无耻。"其内容上自远古下至鸦片战争，共分三编。历史分期采用范文澜等《中国通史简编》的分法。

这本书出版后发行很广，在延安获得过五四青年节活动奖励，更受到当时吴晗的赞赏，称其为近似他心目中理想的补充历史读物。在薄薄一册小书里，整个中国历史都用文学性的笔调描写了出来，堪称一部小型中国通史。吴玉章为此书作序。

郭沫若作《论古代社会》。

作者指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首先必须搜集"一切真实的史料"，充分利用甲骨文、金文以及一切旧有的文献；其次应当弄清古代的经济组织，这里着重论述了"中国古代确曾用过大规模的奴隶来作生产事业，确曾经过奴隶制度的阶段"，即"从殷周到春秋中叶"。后收入《沫若文集》第12卷《今昔集》。

董作宾在《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发表《殷代的羌与蜀》。

9月

15日　四川博物馆开始发掘前蜀王建墓。

此次发掘由冯汉骥主持，参加者有刘复章、林名均等，发掘工作持续到该年11月底，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作。

是月　陈垣撰成《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是陈垣1943年为辅仁大学研究生新开的一门课程。本书即是为此课所写的讲稿。本书主体在1946至1947年间曾在报纸上发表为单篇二十余篇，未出单行本。直至1955年12月，才由郭沫若报荐给科学出版社出版，并题写书名。全书六卷，著录六朝以来佛教史籍35种，包括佛籍目录、僧传、灯录、护教、纂集、音义等五类，按成书先后排序。

其撰写《缘起》云：“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关，不参稽而旁考之，则每有窒碍难通之史迹。此论即将六朝以来史学必需参考之佛教史籍，分类述其大意，以为史学研究之助，非敢言佛教史也。”以史籍为史学研究之辅助，从此目的出发，将每部史籍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内容等一一著录，谬者纠之，误者正之，疑者辨之。每部佛教史籍都有解题，还分列“本书之体制及内容”、“本书之特色及在史学上的利用”、“本书之得失”、“本书版本异同”、“本书之流行”及撰者“略历”，有关史实“辨误”、“正误”等小标题，一一评介、考辨。每一解题即一独立成篇学术论文，揭示出各部佛教史籍的主旨、特点与史料价值。

有研究者认为此书“是近代以来第一部介绍佛教史籍的目录书，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以近代史学的方法系统研究佛教典籍的专著”。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在日本也有很大影响。

吴泽编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由重庆峨嵋出版社出版。

本书由十二篇论文汇编而成（目次上只列十篇），多数为编著者撰写，也收录他人的论文，其中《实验主义中国历史观批判》、《法西斯侵略主义中国历史观的批判》、《中国历史研究上的诸问题》、《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基本原理》等，皆取翦伯赞、华岗和吕振羽的文章缩成，并稍作文句上的修改。本书由编者作了整体性的处理，将所收之文按性质分为五章，每篇文章各为一节，每章拟有标题。

第一章“引论”论述中国史学的动向。作者叙述了中国史学产生发展的简况，严厉批判封建旧史学，指出顾颉刚等疑古辨伪的历史考据对经学和旧史学的清算之功。而随着科学历史观传入中国，中国历史的研究也进入高级阶段，由于郭沫若、吕振羽等人的开拓工作，逐步阐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法则。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反动的史学思潮及复古主义史学，特别批判了“战国策”派。作者指出当时的史学状况是旧的还未彻底破坏、新的还未完全建立的转变时期，史学发展很有希望，也很困难。为此，作者呼吁堵击暗流，肃清末流，早日建立中国新史学体系。

全书论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研究中国上古史的具体方法占最大比

重，大致反映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研究法方面所达到的水平。本书收集的文章，经过统一的筹划编排，显示了编者建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方法论学说的努力。

1944 年 9 月修订再版。

张维华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 2 卷发表《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

作者指出，《汉书》等记载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的设置年代时间“前后未尽一致，而后之读史者，亦依违莫知所从”，故撰写此文以考辨四郡的设置年代。作者认为四郡设置都与汉通西域有关，酒泉最先建置，大约在“元鼎二、三年间”；元鼎六年，又建敦煌张掖二郡；武威建置最晚，“当求之于昭帝末年及宣帝初年”。

张维华在自传中指出，劳榦在整理汉简时，在考订河西四郡年代上，“有的地方同我的说法很是相合”。有研究者认为该文“表现出精深的史学功底，至今为研究者称道”。

同期还刊载了胡厚宣《殷代年岁称谓考》、严耕望《两汉郡县属吏考》、王伊同《隋黎阳河阳常平通兴洛回洛六仓考》、钱穆论《宋代相权》、沈鉴《四十余年前之联俄外交》等文。

孔玉芳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 2 卷发表《西汉诏举考》。

作者认为虽然学界已经对汉代选举制度多有研究，但对诏举制度却无信息准确的研究，故试图“应用归纳之方法，寻出西汉岁举与诏举之真面目”。文章探讨了诏举的科目、应诏举者之籍贯与出身、分科之待遇等问题。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 3 卷，作者又发表《东汉诏举制度考》。

费正清二次来华。

费氏在重庆任美国战略情报局高级职员，兼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和出版处主任，至 1943 年 12 月。期间，他主持美国学术资料供应处，与中国文化教育界人士颇多往还。

陈安仁《中国文化演进史观》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

张旭光《中华民族发展史纲》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

10 月

9 日　西北史地考察团历史组组长向达到达敦煌莫高窟。

向达在对敦煌进行了短期考察后就给傅斯年、李济撰写万字长文，后由傅斯年在文前加按语，以《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

个问题》为题于 1942 年 12 月 27 日开始在《大公报》连载三天。该文呼吁敦煌千佛洞应收归国有，并交给纯粹的学术机关管理（可为此设立一个千佛洞管理所），在技术问题未解决以前研究者不能剥离壁画，学术机关应在河西设立工作站从事历史考古等调查和研究工作。1943 年 1 月 7 日，贺昌群在《大公报》发表《敦煌千佛洞应归国有赞议》，支持向达的意见。

这些文章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国民政府遂决定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于 1943 年开始筹建。

24 日　张荫麟在贵州遵义病逝，终年 37 岁。

30 日　《戏剧春秋》第 2 卷第 4 期出版“历史剧问题特辑”。

一些理论家对历史剧问题展开讨论。胡风认为“翻案”要根据历史人物自身的特性和当下抗战的历史环境而定，“像曹操固是在当翻之列，而在现在这个接骨眼忙于替秦桧做翻案的却大可不必”。胡风认为历史剧的创作一要“看出历史的真实”，二要“看出其与今日历史发展的联系”，“把握历史的结果就是把握今日的生活”。

邵荃麟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我希望，写历史剧就老老实实只写历史，不要去‘创造’历史，不要随自己的意欲去支使古人”；“第二，我希望，不要以古拟今，即是不要借古人事情影射现在”，因为“只要作品是现实的，对过去现实的剖解，一样可以增加我们对当前现实的理解”。

周钢鸣认为，当时存在四种历史观的斗争：“第一种是把握着正确的历史观，对历史真实的追求是抱着很严肃的态度，很忠实地分析历史，处理历史的事件，显示历史的真面目，以达到历史正确的再认识的地步”；“第二种是以历史的故事当作自己趣味的满足，……只抓到历史的一鳞半爪，来添油加酱”；“第三种是革命的主观主义公式主义的历史观”；“第四种是虚伪的历史观”。第一种“正确的历史观”是指现实主义的史剧观；第二种可以看作是浪漫主义史剧观的变种；第三种是现实主义史剧观僵化处理结出的怪胎；而第四种则是敌人宣传“东亚共荣圈”的怀柔政策，对这种史剧观必须极度警惕和坚决抵制，提倡真正的现实主义史剧观。

这场关于历史剧的大讨论，集中在国统区的重庆和桂林，参加者有知名学者、导演、剧作家，讨论内容相当广泛，讨论文章主要刊载于重庆的《戏剧月报》、桂林的《戏剧春秋》等戏剧杂志及《新华日报》。

是月　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0 本第 2 分发表

《读〈东城老父传〉》、《读〈莺莺传〉》。

《读〈东城老父传〉》一文揭示了唐代长安“西北胡人留滞不得归者”为数甚多，且“殖产业而长子孙”，对长安“风俗服装之渐染胡化，实大有关系”；《读〈莺莺传〉》一文先对“会真”一词进行考释，后分析当时社会风俗及社会门第对于婚姻之影响等，后论《莺莺传》等小说创作与古文运动之关系等。

此两文被认为是陈寅恪“以小见大”治史方法和从文学作品中发现历史治史路径的代表性论著。

同期还刊载了劳榦《汉武后元不立年号考》、全汉升《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之影响》、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等文。

伪华北编译馆馆刊编辑部开始出版《华北编译馆馆刊》。

创刊号刊载沈启无《龟卜通考》、梁盛志《理学东渡与李用》等文。该刊至1943年10月停止，共出版13期。

金毓黻《中国史》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

曾资生《两汉文官制度》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11月

1日　严耕望在《责善》第2卷第23期发表《秦宰相表》。

15日　《责善》出版第2卷第24期，并宣布停刊。

是月　曹伯韩《中国近百年史十讲》由桂林华华书店出版。

12月

1日　韩亦琦在《斯文》第2卷第23、24期合刊发表《中国上古史之重建》。

韩亦琦认为，经过清儒的考据，上古史料可靠的已很少。像《汲冢书》、《竹书纪年》、《山海经》等“可靠的成分更是少了”。他特别指出：“我们切不可以为王国维利用《山海经》证实了甲骨记载中殷先王亥，便认为《山海经》完全可靠。”他对金文也持保留态度：“虽然金文也能当做史料，但未经科学的发掘和严格考订整理，用时危险极多；即使考订正确，为数也有限。”古史的重建只能寄望于“科学的考古发掘。这门学问若能发达，新材料不仅可以大量寻找出来，使古史之重建极为可能，而且这些材料将愈积愈多，使后人知道古代史更详细、更悠远、更确切”，“可

以利用颠扑不破的古代实物重建古史”。

韩亦琦正式提出“中国古史重建”的口号。

18 日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在北平成立学术文化审议会。

该委员会之设立系在教育、学术上为日本侵华提供帮助，共有周作人、傅增湘、曹汝霖、钱稻荪、黎世衡等 28 人组成。

25 日　陈寅恪作《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

其中指出：治上古史，“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断，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断不误者”。

是月　全汉升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0 本第 3 分发表《南宋稻米的生产与运销》。

该文研究了南宋各地稻米的生产运输情况，认为“当日长江上游的四川，中部的湖南与江西，以及下游的三角洲，都是稻米的重要产区，其产品除供当地人口食用外，还有剩余作输出之用。至于湖北与两淮，因为地接金国，常受战争的蹂躏，米产甚少，不足以养活当地的人口，须输入上述各地的米”，而在沿海一带，“米产丰富的长江三角洲及珠江流域，也大量地把米贩往米产不足的浙东与福建”。作者还指出，南宋稻米在各地的频繁流通是“当日交换经济势力增大，自足经济销声匿迹的表示”。

同期还刊载了陈槃《古谶纬书录解题四种》、《敦煌唐咸通钞本三备残卷解题》、傅乐焕《宋辽聘使表考》等文。

余逊在《辅仁学志》第 11 卷第 1、2 期合刊发表《早期道教之政治信念》。

作者认为“道教初兴，即与政治相牵连，视乎仅以训民化俗立教者，区以别矣”，“东汉道教，实杂糅儒道阴阳方士巫觋而成”。此文目的在于“细绎东汉道教混杂儒道之情形，刺取晋宋以后言道诸人论治之语，以明儒术与道教之不相违”。文章内容主要包括“道教思想之渊源”、“《太平经》之论治术”、“葛洪之出处识见”、“东晋道教徒多从重事功”、“南北朝道教徒关心政治”几部分。

该文是道教思想研究领域的早期重要论著之一，对《太平经》的研究等有启发性价值。

同期还刊载了冯承钧《高车之西徙与车师鄯善国人之分散》、余嘉锡《王雱不慧有心疾辩》、孙楷第《近代戏曲原出宋傀儡戏影戏考》、叶德禄

《七曜历入中国考》、冯先恕《〈疑年录〉释疑》、德禄《〈魏书〉缺页补》等文。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王德昭《明季之政治与社会》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

是年

第二届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奖评出。

获奖的人文社会科学类著作有：文学类一二等空缺，三等奖三名（王力《中国语法理论》、唐玉虬《国声集及入蜀稿》、孙为霆《巴山樵唱》）；哲学类一二等奖空缺，三等奖一名（刘奇《论理古例》）；古代经籍研究类二等奖一名（罗倬汉《诗乐论》）、三等奖一名（丁超五《易理新诠》）；社会科学类一等奖空缺，二等奖四名（郭宝钧《中国古铜器学大纲》、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胡元议《破产法》）、三等奖六名（全汉升《中古自然经济》、张印堂《缅滇铁路沿线经济地理》、吴文晖《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费孝通《禄村农田》、张金鉴《人事行政学》、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

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室制定三年研究计划。

中国历史研究室工作，暂分为三组：（1）近代史组，具体工作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下册（近代史之部）”、叶蠖生的“苏维埃运动史”、叶蠖生的“中国近代政治史”、李徽的“收集东洋史运动材料”、叶蠖生的“抗战史”、叶蠖生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史”、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中国文学史”；（2）农民土地组，具体工作为佟冬的“中国土地制度史”，孙孝实的“中国法制史”，刘亚生、宗箴的“中国农民战争史”；（3）民族组，具体工作为金灿然的“民族史”、陈道的“西南少数民族史”。

目的在培养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历史学者，以一半时间从事日常工作，另一半时间加深理论修养。理论之研究学习，按期进行，暂以一年为一期，每期建立其中心方向：第一年为科学方法之修养；第二年为各种非科学的历史方法论之研究与批判；第三年则从事中国历史轮廓之研究，在运用中锻炼已学习之方法。

研究室还制定了七项“半年内所拟即予完成之工作”和三年学习计划。由于整风运动的开展，很多研究计划实际上并未执行。据叶蠖生回忆，当时真正进入操作程序的书稿只有五种：中国通史简编、中国文学

史、苏维埃运动史、中级中国史课本、中国国文选。在整风运动期间，中国历史研究室有组织的研究基本中断。

全汉升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0 本第 1 分发表《中古自然经济》。

本文系统论述中古时期社会经济的总体面貌。作者指出，从汉末魏晋南北朝直到唐中叶，实物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成为人们交易支付的主要手段，与从自然经济到货币经济的一般发展道路相悖，经过贞观与开元盛世的商业发展，金属货币再度取得支配地位，两税法得以推行。

李根蟠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一文中指出，全汉升是第一个较系统地研究中国中古时期和近古时期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学者，此文仍是这方面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同期还刊载了劳榦《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王崇武《论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转变》等文。

张政烺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0 本第 1 分发表《六书古义》。

此文"通过系统考查《说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揭示许慎《说文解字》一书中托古改制的奥秘，并对六书提出了不同于许慎的新说。这对于破除后世学者研究古代文字以许书为宗，即使面对大量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文字等材料，仍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迷信，犹如晴天霹雳，从而对促进建立新的古文字学，无疑起了除旧布新的推动作用"。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由耕耘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作者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论文集，包括"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与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等。书后有附录：《日本法西斯蒂的中国历史观批判》、《本国史研究提纲》。

1946 年 6 月，日本《改造评论》第 1 号刊载书中《日本法西斯蒂的中国历史观批判》一文。

杜国庠、侯外庐等在重庆发起成立"新史学会"，顾颉刚、张志让、周谷城等参加。

该会是中国共产党影响和领导下的学术组织。在史学方面，高举"新史学"的旗帜，批判复古思潮及其他史学流派的观点，强调要通过研究讨论来解决学术上的争议。该会撰写和出版了一批有关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论著，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产生了推动作用。

王抱冲在《大学》第1卷第9期发表《理想中的中国通史》。

此文着重“讨论如何创造一部理想的中国历史”。王抱冲通过对夏曾佑、王桐龄、章嵚、缪风林、邓之诚、吕思勉、张荫麟、钱穆等所纂中国通史的分析指出：只有众史家相互配合，发挥群体力量，才能撰写出一部较为理想的中国通史著作。

年底，吕振羽到达延安。

吕改任刘少奇学习秘书，在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运动，并作为特别研究员在中央研究院从事学术研究。

1943 年

※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出版，招致延安方面批判。
※ 中国史学会在重庆成立。
※ 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出版。
※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出版。
※ 翦伯赞发表《略论中国史研究》。
※ 劳榦《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石印出版。
※ 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出版。
※ 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出版。
※ 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出版。

1 月

1 日　《思想与时代》第 18 期“张荫麟先生纪念号”出版。

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云：“历史乃人事之记载，故史学亦为一种人事之研究。”钱穆认为能够完成新史学的新史学家，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一、于世事现实有极恳切之关怀；二、明于察往，勇于迎来，不拘拘于世事现实；三、于天界物界人界诸凡世间诸事相各科学智识有相当晓了；四、具哲学头脑，能融会贯通时空诸事态相互间之经纬条理。张荫麟“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

陈梦家评价《中国史纲》说：“这是我最近所看到历史教科书中最好的一本‘创作’。我们称此篇创作以别于从前许多抄录为主的教科书，它们重复前人所犯的错误，忽略近人新立的学说。这本书的作者既详细利用所有的材料，并且遵守若干预立的原则，有条不紊地把融化了的史实用清楚明白而动人的文字写出来，使读者在优美的行文中浏览古代社会的大略，所以我名之为‘创作’。”

熊十力《哲学与史学——悼张荫麟先生》云："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荫麟方在盛年，神解卓特，胸怀冲旷，与人无城府，而一相见以心。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属乎。惜哉！其数遽止于此也。今之言哲学者，或忽视史学；业史者，或诋哲学以玄虚，二者皆病。昔明季诸子，无不兼精哲史两方面者。吾因荫麟先生之歿，而深有慨乎其规模或遂莫有继之者也。"

同时刊发张荫麟遗作《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张氏此文对其通史方法论作了全面交代。《中国史纲》的《自序》似乎是此文的删定稿。关于史实的选择标准，去掉了"决定性的标准"。关于史实的综合，除"循环的秩序"被删除外，总体上也有所调整。此文被许冠三认为是他"精研史学原理一生的心血结晶"，"自司马迁倡'笔削'说以来，困扰中国新旧史家二千多年的书事义理问题，至此乃有一深切而允当的现代解答"，"荫麟对新史学最具体而又最重大的贡献，无疑应推通史取材原理的发明"。

10日　郭沫若在桂林《文化杂志》第3卷第3期发表《关于古代社会研究答客难》，批评"西周封建说"。

作者表示不同意"把井田解释为庄园制"，认为"西周封建说无一可通"。他指出："后期制度内有前期的孑遗，前期制度内有后期的萌蘖。此不可蒙混。非从坚实资料作客观分析，即堕入主观公式之窠臼，毫无是处。"

27日　陈寅恪作《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提出"新宋学"概念。

陈氏写道："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阴百十人矣。"他还评价邓广铭说："邓恭三先生广铭，夙治宋史，欲著《宋史校正》一书，先以《宋史职官志考正》一篇，刊布于世。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

是月　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作者在序言中自述其研究方法云："1. 必须接受清代考证的传统；2. 必须接受卜辞金文家的传统；3. 必须基本上遵守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论；4. 必须对于亚细亚历史性作'理论的延长'。"

作者致力于对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界定，以超过四分之一的篇幅专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他断定：古代社会发展有着不同的路径，所谓"古典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在马、恩的著作中，都是指奴隶社会。两者有时并列使用，没有一定的序列，因而是作为不同种类看待的。侯外庐用家族、私有制、国家三个标志来说明古代文明形成的不同路径，全书充满思辨色彩。

该书重点研究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史。作者认为，西周初年中国历史迈入文明社会门槛时，进入奴隶社会，并且走上一条独特的亚细亚道路。其论述思路是：第一，从中国古代第一次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过程以及随之而起的"国人"阶级和商人阶级的发生发展过程来论证西周进入奴隶制社会；第二，从殷周时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过程论证中国奴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第三，从先秦思想史的演变探讨中国奴隶社会特殊发展道路的折射式的反映。

侯外庐此书以扎实周密的理论探讨，对奴隶社会的存在和特征进行了论证，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氏族、财产、国家等问题在中国的"理论延长"。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阶段。

上海正中书局开始出版"国学汇纂丛书"。

该丛书收录蒋伯潜、蒋祖怡父子的国学著作，共有蒋伯潜编著的《文体论纂要》、《文字学纂要》、《校雠目录学纂要》、《诸子学纂要》、《经学纂要》、《理学纂要》，蒋祖怡编著的《史学纂要》、《诗歌文学纂要》、《小说纂要》等十部著作。

陈家康在《群众》第 8 卷第 1、2 期发表《明末农民运动研究》。

文章回顾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全过程，并提出："中国社会自从进入以封建制度为主要生产方法的历史阶段以后，农民运动就成为重要的社会动力。对内而言是如此，对外而言也是如此。"

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重视农民战争史研究。

中央大学主办《文史哲季刊》创刊。

该刊"以发表关于文学、史学、哲学之论著为宗旨"。创刊号刊载罗根泽《墨子探源》、范存忠《十七八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思想》（第 2 期连载）、韩儒林《蒙古的名称》、金毓黻《宋代兵制考实》等文。

黄淬伯在《文史哲季刊》创刊号发表《诗传笺商兑》。

作者认为“学术之事，本因时推进……盖今人所资取者厚，其足为思想之痼弊者亦渐见摧毁，而钻研之途术亦蒙受近世朴学家之所赐，及现代科学之影响，而日进于缜密。振旧刷新，当亦今之学人所有事耶”。

1943年6月出版的《图书评论》新第4卷第1、2期合刊介绍《文史哲季刊》时，特别针对此语进行评论：“由此可见，倘能益厚资取，益摧毁思想之痼弊，钻研之途术益肯受朴学家之赐，及现代科学之影响，而益日进于缜密，学术之事自亦当益进。或者说，倘使今之为新汉学者，真能日近于朴学，而远于浮学，学术事业，本可因时推进。而‘振旧刷新’，趋真去浮，具科学之修养，叨逻辑之熏陶，受算数之锻炼，并察十九世纪后半西洋古学者所为为如何事，力行谨严精审准确，务求细致周到缜密，亦诚宜乎为‘今之学人所有事’。”

李剑农《中国经济史讲稿》由新中国书局出版。

此书是作者在蓝田师范学院讲授中国古代经济史的讲义。该书共三编，叙述自殷周至两汉的经济史。全书材料丰赡，见解独到，是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作品。

1947年又由武汉大学出版部以《中国经济史稿》为名出版，1956年略加修订后更名为《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于次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罗志渊《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

2月

28日　中国史学会筹备会在重庆召开，讨论中国史学会成立事宜。

此次会议地点为重庆上清寺卡尔登饭店，傅斯年、郑鹤声、卫聚贤、金毓黻等与会，金毓黻称“参加史学会之集议”，“颇极一时之盛”。

同年3月，教育部决定借史地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之机，聚集散处大后方的高校史学界人士到重庆发起成立中国史学会。史地委员会通电各大学史学系，告知开会计划安排，请各校派代表出席。

是月　胡厚宣在《学思》第3卷第3期发表《殷人疾病考》。

第4期连载。

3月

“琴台整理工作团”对前蜀王建墓进行第二阶段发掘。

“琴台整理工作团”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中央博物馆筹备

处共同组成。此次发掘由吴金鼎主持，除第一阶段发掘的冯汉骥等人外，参加者还有王振铎、王文林等人。此次发掘至9月21日结束，出土了玉器、金银器、陶器等、

10日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

全书共八章：（1）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2）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3）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之深刻化；（4）由北伐到抗战；（5）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点；（6）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7）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8）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全书的主旨是宣传只有国民党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救中国。《中国之命运》民族主义色彩浓重，把中国的问题一概归咎于外国列强的掠夺和不平等条约的危害，体现了蒋介石的基本政治思想。

国民党当局发动宣传舆论工具，大肆吹捧该书为“古今中外唯一的伟大著作”。国民党中宣部将其列为“必读之课本”，通令国统区各机关、团体、军队、学校都要阅读。

《中国之命运》后由外交部长王宠惠组织学者进行英译。英译本1947年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林语堂作序。国际舆论称其为希特勒《自我奋斗》的中国版。此书面世后旋即受到延安方面的批判。

本书1944年1月出版增订本，第1章、第3章、第5章略有增删。虽然当时严重缺纸，但这本书第一次就印刷20万本，到1943年底重印200多次。

24日　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重庆召开。

各大学代表及会员与会者120余人，陈立夫和社会部代表马仁松到会。顾颉刚致开幕词称：“我国史料之多，单论明清档案，北京大学所保管者，据估计，如编制目录提要，即需六十年。其他若甲骨文抄本之类，更多至不可数计。盖今日研究历史范围，已放宽于二十四史之外，若地方志书、家谱、碑帖之类，均在研究之列。只以困于经费，致若干能做的事不能做。今者史学会既告成立，希望永远不停地做。”

继由黎东方报告该会筹备经过，“谓本会自前年‘七七’发起，邀得各方赞助，经过两年筹备，得于今日成立。现名列发起人者，已达二百余人”。接着逐条讨论通过中国史学会会章。

大会先由黎东方为临时主席，推顾颉刚、徐炳昶、金毓黻、蒋复璁、陈衡哲、傅斯年、黎东方、黎锦熙、雷海宗等9人为主席团成员，由顾颉刚任总主席。大会选出的中国史学会职员，有理事21人：顾颉刚、傅斯年、黎东方、雷海宗、徐炳昶、陈寅恪、金毓黻、钱穆、朱希祖、吴其

昌、胡适、缪凤林、柳诒徵、姚从吾、沈刚伯、黎锦熙、卫聚贤、萧一山、张其昀、陈安仁、陈训慈。候补理事9人：罗香林、陈衡哲、王芸生、方豪、贺昌群、陆懋德、丁山、张西堂、向达。监事7人：吴敬恒、方觉慧、张继、蒋廷黻、吴俊升、蒋复璁、邹鲁。候补监事3人：陈东原、王迅中、蒙文通。并决定于28日起举办学术讲演周。

据《中国史学会章程草案》，该会"以联络全国历史学者共同促进史学之研究及史学知识之传布为宗旨"，"会所设国民政府所在地"，可在各省市和各大学设立分会，会员分甲乙两种，研究院所助理员以上的研究人员、专科学校讲师以上的教员、其他学术机关相当于上述资格的人员以及有历史专著的人士可为甲种会员，研究生、助教、史学及史地系毕业生以及大学毕业后连续担任中学历史教员五年以上者，可为乙种会员。章程规定会员大会每年举行一次，理监事会每三个月开会一次，常务理监事会每月开会一次，将进行沟通国内外史学研究、整理史料、出版史学书刊、协助会员从事专门研究等事项。

顾颉刚1943年3月的日记载："此次中国史学会之召集出于教育部，电滇、黔、粤各校教授前来，花费殆十余万。说教部提倡学术，殆无此事。有谓延安正鼓吹史学，故办此以作抵制，不知可信否。予与今教长恶感已深，本不想参加，又恐其作强烈之打击而勉强出席。然开会结果，予得票最多，频作主席，揭诸报纸，外人不计其实，遂以为我所倡办矣"。

26日　中国史学会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召开。

选举常务理监事，共选出常务理事9人：顾颉刚、傅斯年、黎东方、朱希祖、缪凤林、陈训慈、卫聚贤、金毓黻、沈刚伯；常务监事3人：吴敬恒、方觉慧、蒋复璁，并推黎东方兼任中国史学会秘书。会上还讨论了各地代表的提案，除已办者外，通过移交下次理事会商讨办理。在理监事会上，通过了由史学会审查标点二十四史的提案。

28日　中国史学会讲演周开始。

每日一讲，依次为卫聚贤的"敦煌石室"；陈安仁的"印度文化输入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变革"；雷海宗的"先秦国际政治"；郑天挺的"清初礼俗"；王迅中的"甲午以前之中日外交"；吴其昌的"历史上大学生之卫国与建国"；罗香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傅斯年的"明太祖之建国与立制"。后又增加几场演讲，如雷荣珂的"百年来中国之外交"，郑师许的"明清两代之军器与政治"，陈国治、王兴瑞的"清末之革命党与保皇党"。

是月　邓广铭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第4分发表

《〈宋史·职官志〉考证》。

作者认为由于“总裁失检”、“纂修纰缪”等原因，导致《〈宋史·职官志〉》挂漏很多，殊误特甚，非重修不可，故收集材料，校勘考辨，撰写此文。该文对于纠正《宋史》关于职官制度等方面的许多错误，对于推动宋代史学研究有重要价值。陈寅恪特为此文撰《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称“邓恭三先生广铭，夙治宋史，欲著《宋史校正》一书，先以《〈宋史·职官志〉考证》一篇，刊布于世。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并指出“是其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

该文是邓氏的成名作，《北京大学大事年表》1943 年条称，“邓广铭撰《〈宋史·职官志〉考证》，其学术思想始对我国宋金辽史研究产生影响”。

同期还刊载了劳榦《居延汉简考释序目》、岑仲勉《天山南路元代设驿之今地》、王崇武《查继佐与敬修堂钓业》等文。

张政烺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0 本第 4 分发表《讲史与咏史诗》。

作者将传统文献与新发现史料结合，探讨了“宋人关于讲史之记载”、“早期讲史话本之特征”、“唐经进周昙咏史诗”、“胡曾咏史诗”、“宋人讲史之作”等内容，认为“咏史诗始于胡曾，前无所承，与汉魏人之咏史绝无关系”，“周昙进讲咏史诗为讲史之祖”，“平话即由咏史诗演变而来”等。

吴泽《中国原始社会史》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

这是继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之后，又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的作品。全书共 4 章，论述中国人种起源、中国原始社会的经济构造、社会组织与家族形态、原始社会的意识形态等问题。此书吸收了当时中外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首次把原始文化作为原始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中国原始时代的文化成果进行了初步整理。

曾资生《中国政治制度史》由重庆南方印书馆出版。

袁月楼《力行哲学史纲》由中国力行学会出版。

蒋中正《中国经济学说》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出版。

4月

17日　吕振羽在《解放日报》“历史常识”专栏开始发表九个专题的历史常识系列讲话。

连载至12月28日。这些文章叙述了从原始社会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历史。

是月　《中山文化季刊》创刊。

此刊由中山文化教育馆负责编辑出版。《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在抗战爆发后因印刷困难和人事变动等原因停刊，此刊“是《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的续刊”。

此期刊载了翦伯赞的《夏族的起源与史前之鄂尔多斯》、侯外庐的《孔子批判主义社会思想底研究》、萨孟武的《从汉至唐官吏薪俸制度的研究》、杨人楩的《麻迪厄及其法国革命史》等文。

张绍良在《力行》第7卷第4期发表《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为纪念中国史学会成立而作》。

文章把30年来的中国史学分作两期：（1）五四时代中国史的翻案工作，主要指顾颉刚、钱玄同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古史辨”是考证真伪、疑古翻案，大胆否定封建卫道史的大本营；（2）北伐革命后中国史的整理，主要指社会史论战时期的史学。前者是对封建旧史学“烂帐”式记录的否定，后者则是国史的整理和重建。

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1919年夏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本国史学概论的讲义。原为三篇：一、中国史学之起源；二、中国史学之派别；三、历史哲学。后在其他大学讲授时，删除了第三篇。1942年，朱氏应女婿罗香林之请，决定出版该讲义，附录《太史公解》和《汉十二世著纪考》论文两篇。

该书共有两部分：第一部分“中国史学之起源”，探讨了“史”的本义和历史记载的产生等问题；第二部分“中国史学之派别”，将史学分为记述主义和推理主义两大派，记述为《左氏春秋传》，推理为《公羊春秋传》和《谷梁春秋传》。其后记述主义大为发展，累世扩张，而推理主义自汉以后，渐次衰微。推理主义的发展，除凭借记述主义外，还必须有哲学、社会学为基础，“于物心两界及宇宙全体，透澈了悟”。而我国既无系统之哲学，又无求实证之社会学，所以推理主义不能发达。该书把记述史学进一步划分为编年史、国别史、传记、政治史、文化史、正史、纪事本末等类型，这种分类梳理中国史学发展的方法颇具特色。

该书贯注了作者大量研究心得。自序中云：“近世治史学有不免钞胥

陋习者，或从中国名著颠倒抄袭，或从外国人著作中片段抄译，干没其名，据为己有”，而对自己的讲义则颇为自信，认为讲义之作，虽“不足以言著述”，但也“皆自出心裁，不染抄胥陋习”。

《戏剧月报》出版“历史剧问题特辑”。

收入郭沫若、葛一虹、刘念渠、张骏祥、陈白尘等人关于历史剧创作的文章。

郭沫若在《历史·史剧·现实》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主张浪漫主义史剧观。这对当时的历史剧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剧坛卷起一股翻案风，剧作家们纷纷从现实要求出发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翻案。

郑鹤声《中华民国建国史》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

该书所记自兴中会成立至1941年。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为主要线索，按革命的发展将中华民国史划分为三个阶段：“辛亥革命推倒满清为第一阶段；北伐完成，打倒军阀为第二阶段；抗战建国为第三阶段。”

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在北碚成立，顾颉刚任社长。

5 月

30 日　胡适致信王重民谈“勤、谨、和、缓”四字治学真经。

信中说：“我十几年前常借用此四字来讲治学方法。勤即是来书说的‘眼勤手勤’，此是治学成败的第一关头，凡能勤的，无论识大识小，都可有所成就。谨即是不苟且，一点一笔不放过，一丝一毫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即是谨，即是慎。‘和’字，我讲作心平气和，即是‘武断’的反面，亦即是‘盛气凌人’的反面。进一步看，即是虚心体察，平心考察一切不中吾意的主张，一切反对我或不利于我的事实和证据。抛弃成见，服从证据，舍己从人，和之至也。”“‘缓’字在治学方法上十分重要。其意义只是从容研究，莫匆遽下结论。凡证据不充分时，姑且‘悬而不断’。英文的Suspension of judgment，即是暂时悬而不断。”

是月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从民族升降、党派集团、外族盛衰及外患与内政关系三处深度剖析唐代政治。重点在种族与文化的关系，作者谓“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

要”，而“此点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若不明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关于唐代政治之变化，作者认为：“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初唐社会以“关陇集团”为轴心，与之抗衡的另一种社会力量是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高门贵族；武则天开始通过科举擢进新人，引起社会阶层的流动，“关陇集团”被打破；唐玄宗以后，转化为外廷士大夫两党，世族旧人和科举新人分别勾结内廷宦官之间的斗争，牛李党争即其表现。

本书是一部隋唐史力作，其中许多观点看法至今被不少学者称道、征引。

尹达《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由作者出版社出版。

此书简称《中国原始社会》。后来该书一部分修订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于1955年出版；1979年再版时，书名改为《新石器时代》。

全书分三部分，即第一编“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第二编“从古代传说中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和第三编“补编”。第一编占全书的四分之三，是主体部分。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叙述了从中国猿人以迄殷末社会漫长历史，考察了原始社会各阶段的社会结构及其发生、发展和逐渐崩溃的过程。

本书充分运用考古资料，并结合近世出土的甲骨文、古代文献以及神话传说，荟萃了从旧石器时代考古至殷墟发掘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材料。侯外庐称尹达是“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翦伯赞在《学习生活》第4卷第5期发表《略论中国史研究》。

作者认为当时许多史家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当作一种教条，在史学研究中，把科学方法论与中国具体的历史实际割裂开来，因此他提出，“新的历史家，在现在的任务，不是高谈方法论，而是应该带着他们已经知道了的方法，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去用历史资料来考验方法论”。

此文可视为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论指南。文章依次论列了“大汉族中心主义”、“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联”、“中国史的特殊性”、“社会经济与主观斗争”、“集团分析”、“统治者集团内部矛盾”、“内外矛盾之转化”、“意识诸形态之发展”等中国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将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真正进入中国历史的内部开展切实的探讨，摆脱了以往唯物史观派普遍存在的教条化倾向，是此文的价值所在。

这标志着重庆方面的唯物史观史学正日益走向成熟。

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1 本第 1、2 分合刊发表《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

该文前半部分考辨分析了“貉子”、“巴”、“蜀”等有关南北朝时期江东各地不同人的称谓、分布等，后半部分根据相关材料推论了南朝的政治情形。作者认为，“南朝之政治史概括言之，乃北人中善战之武装寒族为君主领袖，而北人中不善战之文化高门为公卿辅佐，互相利用，以成此江左百年北人统治之世局也”。作者还在文末强调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的提出的“北朝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观点。

劳榦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1 本第 1、2 分合刊发表《两汉刺史制度考》、《汉代社祀的源流》、《汉简中的河西经济生活》。

《两汉刺史制度考》一文考辨梳理了御史制度与刺史制度的关系、刺史官职的设置及其因革、刺史职权的发展和职位的除授等内容；《汉代社祀的源流》一文利用居延汉简对汉代“社祀”的渊源、重要性及其与后代信仰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汉简中的河西经济生活》一文对居延汉简中可见的西汉中晚期之经济史料进行了分类，探讨了衣服、食物、车马等 8 类商品的价格等。

劳榦这些论文是利用汉简研究汉代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仅被顾颉刚等人视为秦汉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也被视为是抗战时期中国历史学界的重要收获。

全汉升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1 本第 1、2 分合刊发表《唐代物价的变动》、《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

《唐代物价的变动》一文考察了唐初、太宗高宗、武周前后、开元天宝间、安史之乱后、两税法实行后、唐末等时期的物价变动，认为“唐代物价并不是常在静止的状态中，而是常常作一涨一落的变动”，影响物价涨落的原因主要有生产发展状况、货币供应等。《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一文先概述唐代扬州经济繁荣的状况，然后重点分析导致唐代扬州经济发达的五个原因，最后概述分析唐末以后扬州衰落的情况及其原因。

全氏此两文被研究者认为是物价史、商业史等研究领域的奠基性论著之一，代表了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学界对唐代货币经济研究的水平，至今仍不失学术价值。

范文澜继续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下册。

延安中央研究院改组为中共中央党校三部，中国历史研究室成员随即被纳入了各类行政组织之内，只有范文澜、叶蠖生留中宣部历史组，范文澜调中宣部后，继续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下册，即近代史部分。

程树德《论语集释》由国立华北编译馆出版。

该书内容分考异、音读、考证、集解等十部分内容，不仅分类采辑前人研究成果，为研究者提供了自汉到清的相关资料，而且在综采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中法汉学研究所编《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之法国汉学》在北平刊行。

董作宾在《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发表《敦煌纪年》。

6月

劳榦《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在四川南溪石印出版。

由于抗战爆发，居延汉简照片原版被毁。劳榦根据照片副本继续研究，写成《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以石印版问世。1944年出版《居延汉简考释释文》4册、《考证》2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44年9月），并发表了《〈居延汉简考证〉补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4本，1948年）一文。1949年11月商务印书馆又铅印出版“释文之部”两册。这是有关居延汉简较早的释文和考证。

劳榦在自序中阐述简牍资料的价值：“正史对于边塞屯戍的事，只能记载一点广泛的一般原则，其具体事实的供给，则要倚赖发现的新史料。必须利用正史和新史料来钩距参伍，才可以得着事实的真像。”劳榦居延汉简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汉简资料与汉代历史的研究相结合，在以简证史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继承罗、王二人简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推进，把此前研究范围局限于考释和零星的史地考证扩大到对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领域做全方位的研究。

劳榦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集大成者。徐苹芳评价道：“他在《流沙坠简》的基础上使简的分类更加详密，大体上概括了居延简的类别。他研究的范围广泛，研究的方法基本上是在王国维所创立的方法上更加完善，通过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来恢复汉代历史。在居延汉简的研究上，劳榦先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部书长期以来一直是治汉史者必读的著作。

《居延汉简考释》图版之部，发表于195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1分。

贺昌群在《文史哲季刊》第1卷第2期发表《烽燧考》。

作者将考古发现的汉简等新资料与传统典籍中的相关记载相结合，详细考辨了“汉唐间烽燧之遗制”。

同期还刊载了韩儒林《吐蕃古史与传说研究》、缪凤林《古代巴蜀文化》、朱希祖《汉王劫五诸侯兵考》等文。

罗倬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梁方仲在《人文科学学报》第1卷第1期发表《明代的户帖》。

黄庆华在《现代史学》第5卷第2期发表《中国史学史引端》。

7月

21日　陈伯达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评〈中国之命运〉》。

《中国之命运》的观点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针锋相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写作《评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原拟作为《解放日报》社论发表。毛泽东审阅全文，改标题为《评〈中国之命运〉》，改署陈伯达个人名字。当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便发出《关于广泛印发〈评《中国之命运》〉的通知》，全文如下：“陈伯达同志《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本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广播两次。各地收到后，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校对勿错），使党政军民干部一切能读者每人得一本（陕甘宁边区印一万七千本），并公开发卖。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南方局应设法在重庆、桂林等地密印密发。华中局应在上海密印密发。其他各根据地应散发到沦陷区人民中去。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切勿放过此种机会。”

同日，毛泽东在致重庆董必武的电报中，指出：“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

刘少奇在延安召集艾思奇、范文澜、吕振羽等开会，要求这些学者撰写一批文章反击国民党的进攻，文章交稿后，在刘少奇主持下讨论修改，最后由中共中央审查定稿。从1943年5月至10月陆续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以下文章：范文澜《谁革命？革谁的命？》（8月1日），吕振羽《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8月7日），齐燕铭《驳蒋介石的文化观》（8月9日），何思敬《驳蒋介石的法律观》（8月10日），艾思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8月11日），杨绍萱《中国法西斯之命

运》（9 月 13 日）等。

是月　黎东方《中国历史通论》（远古篇）由重庆国立编译馆出版。

该书首先探讨了年代、地域、人种等问题，接着梳理了从氏族到帝国的过程、远古的经济及文化等问题。1944 年 2 月该书“春秋战国篇”出版，叙述了春秋战国之分期、政治经济之演变、灿烂辉煌之文化等内容。

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开始出版“中学文库”。

此文库是抗战时期后方出版的最大规模丛书，涉及史地类著作 90 余册。

翦伯赞在《中山文化季刊》第 1 卷第 2 期发表《诸夏的分布与鼎鬲文化》。

文章内容主要有“诸夏之居与仰韶文化遗址”、“传说中的诸夏之族”、“吴越为诸夏之族”、“楚为诸夏之祖”、“鬼方为诸夏之族”等。

同期还刊载了戴裔煊《宋代食盐生产及统制方法研究》、侯外庐《中国古代“贤者”之史的研究》、邓初民《中世纪亚洲人所建三大帝国之研究》、夏醴泉《章学诚“学术”思想试探》、彭泽益《梁启超与中国新闻事业》、罗莘田《伯希和对于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启示》等文。

王治心《中国文化史类编》由作者书店出版。

（德）玛尔霍兹著、李长之译《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 月

1 日　浙江通志馆成立，聘余绍宋为馆长，孙延钊为总纂。

1942 年 5 月浙江省政府决定成立浙江省史料征集委员会，但由于战乱实际很难展开工作。为此浙江省政府将委员会改组为通志馆，余绍宋鉴于战乱期间的文献损失给民族和国家造成的危害，决定就任馆长一职来保存文献、记录日本侵略所犯罪行，以告诫后人勿忘国耻。余绍宋先后撰写刊发《略评旧浙江通志兼述重修意见》、《浙江通志稿纂修大纲》等文阐述修志意见，并网罗了宋慈抱、洪焕椿等数十位新老学人修志。余绍宋等人决定该志完全依照《定海县志》和《龙游县志》的新体例，以中华民国为正统，叙事至最近发生之事，将迷信、烈女等不合时宜的类目删除。至 1949 年 3 月该馆停止工作时，共完成《重修浙江通志》初稿 125 册，1982 年由浙江图书馆整理出版。

王静如在《华北编译馆馆刊》第 2 卷第 8 期发表《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

此文是王静如在中法汉学研究所的演讲，由瞿宝恩记录。王静如指出，法国汉学得以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是“起于十九世纪时”，在“近五十年来的二十世纪”才影响“汉学发生的本土”，即中国。王静如认为沙畹以前的法国汉学是“语文考据方法”，自沙畹起在“语文考据方法”的基础上又加上“史学方法”，自葛兰言起又在以上基础上加上“社会学方法”。王静如指出“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受法国汉学影响至为巨大而广发”，并认为最先受法国汉学影响的是王国维，之后胡适、陈寅恪、中研院史语所、徐炳昶、冯承钧、张星烺、裴文中、邵循正、李玄伯等都受到法国不同时期汉学的影响。王静如希望中国学者“尽量采法国汉学的方法及其优点以董理国学、史学”，法国的汉学家利用便利多和中国有见地的学人交往，“深深理解中国学者个别优点”，这“不只是国学或汉学的光明道路，并且是两国学术文化光明的开始”。

是月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丛考》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

内分三辑，收太平天国史论文十八篇。吴晗序中总结出一种“剥笋考据法”：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每一问题或史实，先要追求这问题在历史上的地位，已否解决，如已解决，它们的证据是否可信，如未解决，症结何在，接着用全力考证这问题，恰像剥笋似的一层一层地剥去这问题所堆附的外障。再接着，还不肯以问题本身的解决为满足，还要问为什么这史实成问题，为什么这史实为许多外障所蔽而成问题。这一切完成之后，对史实进行估价，给它在历史中一个恰好的位置。剥笋考据法已经超出了单纯的考证，从认清“是什么”到追问“为什么”，由史实考证进入史事重建。

罗尔纲、陈婉芬编著《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年谱》由正中书局出版。

朱东润《史记考索》由开明书店出版。

江士杰《里甲制度考略》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9 月

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3 册由国立编译馆出版。

先前缪氏《中国通史纲要》一书，资料虽丰富，但缺乏剪裁，属读史要录性质。后由于日军全面侵华而被迫中断。后缪凤林又在《中国通史纲

要》的基础上编撰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要略》一书，以激励中华民族的抗战信心。缪凤林认为此"亦书生报国之一端"。

作者将中国历史分为十个时代，即唐虞以前曰传疑时代、唐虞夏商西周曰封建时代、东周曰列国时代、秦汉曰统一时代、魏晋南北朝曰混乱时代与南北对峙时代、隋唐五代曰统一时代与割据时代、宋元曰汉族式微与西北诸族崛兴时代、明曰汉族复兴时代、清曰满族入主时代、民国曰中华民族更生时代。每时代为一章，综合叙述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礼乐、风俗的变化发展，"自为经纬，分之可略识各代原委，合之即得千古会归焉"。"中华民族更生时代"与"结论"二章未能完成。

《中国通史要略》记述历史，不求面面俱到，重点在显示每一个时代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尤其关注民族关系和文化的发展。"就我国族所以开拓广土，团结庶众及历久长存之本原，与其政治文化社会各中变迁之荦荦大者，略述其根柢与趋向，以饷学子。"

罗香林尝云："近人所著史中，以缪凤林之《中国通史要略》最为简明，文字亦甚优美。"

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是以中国棉业发展为样本，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进行的个案研究，梳理了从1289年至1937年的中国棉业的发展轨迹，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背景、发生过程的特征、棉工业生产的组织形式等问题。该书是最早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著作之一，作者所得出的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顺利发展的结论对后来的相关研究影响深远。该书1942年即获得杨铨纪念奖金，后多次再版，并于1966年被日本学者翻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

张维华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3卷发表《汉武帝伐大宛与方士思想》。

该文对汉武帝不远万里征伐大宛的原因进行了新的推论，认为汉武帝是受到方士乘天马升天的蛊惑，兴兵伐大宛以求天马。作者最后指出"汉武帝之文治武功，多由方士之思想为出发点"，并指出"宗教信仰，最足使人发生伟大力量"。

同期还刊载了严耕望《两汉郡县属吏考补正》、许毓峰《周濂溪年谱》、刘铭恕《郑和航海事迹之再探》、史岩《宋季翰林图画院暨画学史实系年》、韩儒林《八思巴字大元通宝跋》等文。

王伊同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3卷发表《五胡通考》。

文章内容有"论胡风"（音乐、饮食、服御、语言），"释'五胡'"，

“论匈奴”，“论羯”，“论羌”，“论鲜卑”，“论氐” 等。该文被认为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分布、起源和迁徙的重要论著之一。

张宗颎在《中德杂志》第 5 卷第 3 期发表《社会学的历史观》。

文章从社会学立场说明历史记载受社会制度的限定，它无所谓因果，也没有定律，甚至历史的真相也无从认识。历史知识的价值不在寻求因果定律，而在于“在创造新理想或维持旧组织任何一项企图中，常被用作有力的说服工具”，“显明的是意识形态的表映的一种方法”，“它应视作现在社会秩序的一种安定力，或是推动力”。作者认为，历史不能成为科学。

10 月

19 日　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此文为 1942 年 5 月所作。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旨在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的讲话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毛泽东主张文化艺术应当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他认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文艺批评有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个标准。“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

11 月 7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其中规定：“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全部精神，同样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也同样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全党应该认识这个文件不但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问题的材料，并且也是一般的解决人生观与方法论问题的教育材料，中央总学委对此已有明确指示，鉴于根据地知识分子大多都是受过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文艺的深刻影响的，在他们中间尤须深入的宣传这个文件。”

《讲话》成为体现中共文化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对日后的文艺、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是月　杜金铭《中国儒学史纲要》由国立华北编译馆出版。

此书分“儒学的起原”、“儒学的创始”、“儒学的分歧”、“儒学与阴阳家及方士的融合”、“儒学与玄学及释道两教的融合”、“儒学的复古与革新”六章，简要介绍了由先秦而至秦末儒学思想发展大势。

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由重庆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研究了中国隐士的名称、形成、类型、地域分布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问题。

11 月

24 日　陈垣致函方豪谈学术思想的变化。

陈垣在信中说：“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

“七七事变”之后，陈垣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变化，越来越推崇经世致用的思想。而其经世致用思想直接导源于清初学者顾炎武。他仍从事考证，然其目的、意义却在考证之外。

是月　李絜非在《思想与时代》第 28 期发表《论历史方法》。

作者特别强调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认为历史学“有了社会进化之方法，而后历史才不断成功为叙述之科学，且成为说明之科学”，但没有“定律”的学问终究不能说成是一门科学。

陈安仁《中国近代民族复兴史》由重庆青年出版社出版。

12 月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

全书包括“论信古”、“民族三集团考”、“洪水解”、“中康日食”、“徐偃王与徐楚在淮南势力的消长”、“五帝起源说”、“所谓黄帝以前的古史系统考”七章及附录四篇。该书主要从古代文献入手，结合相关的考古发掘与民间传说，考察了中国在有文字记载历史之前即传说时代的社会状况，包括当时的部落分布、部族间的关系、社会经济状况等。作者认为，

我国古代部族可分为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此三大集团经过互相斗争、融合，渐渐最后形成了后来的汉族。华夏集团是三大集团中最重要的，最后成为中国全族的代表。本书还就洪水故事、五帝起源、黄帝以前的古史系统等问题进行剖析，为中国故事传说时代创立了一个新的体系。

作者对疑古派学者的偏失有所反思和纠正。该书首章“论信古”，主旨以为“古”有真有伪，古者可信，非古者始不可信，而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太史公以及此类之学者则决非有意造谣之人，故对近人治古史者如卫聚贤、顾颉刚辈之立论，颇多批评。作者本人则注重对传世文献和传说资料进行细致的辨析和解读，充分发掘其史料价值。

20 世纪 50 年代，作者对本书作了较大的修订，于 1960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增补本。1985 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台湾里仁书局再版。

翦伯赞《中国史论集》第 1 辑由重庆文风书局出版。

此书收录作者 1940 年至 1943 年间所撰的 20 篇历史论文。包括《略论中国史研究》、《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略论殷商的青铜器文化》、《论中国的母系氏族社会》、《两宋时代汉奸及傀儡组织》、《论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论辛亥革命与中国历史之新的转向》、《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中国进步的文化》等。

朱师辙在《辅仁学志》第 12 卷第 1、2 期合刊发表《北魏六镇考辨》。

文章主要内容有“北魏诸镇之溯原”、“六镇异说之考辨”、“六镇地域今释”等。作者认为沈垚六镇说为北魏初期所有之事，此后因政治社会变迁，六镇有所改变，魏末六镇应以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所载为是。

同期还刊载了余逊《南朝之北土地位》、柴德赓《〈鲒埼亭集〉谢三宾考》、赵光贤《清初诸王争国记》、李玄伯《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跋》等文。

陈寅恪开始任教于成都燕京大学。

杨树达《春秋大义述》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范文涛《郑和航海图考》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是年

春，顾颉刚发起编撰《中国名人传》。

1943 年 10 月 12 日，顾颉刚致函胡适云：“刚近日勉强振作精神，欲

集同志合编‘中国名人传’一部，计二百数十种，期于两年半完成。”

顾颉刚念念不忘要作通俗的国史，要“就自己的行业，把确实而有系统的历史知识介绍给全体国民”，由于“历史知识里最容易发生兴趣的是名人传记，最能给人以做人榜样的也是名人传记”，故而从此处着手。他认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终不灭亡，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因为“无数的圣贤豪杰把我们的国魂陶铸熔冶，已炼成了金刚不坏之身了”，期望人们在接受历史知识的同时能以历史上的优秀人物为榜样，认识我们的立国精神，在国难当头之时共图民族复兴的大业。自周迄清选出二百余人，“期就此数百人之身而表现其各个时代与各个社会之背景”，分之为二百余册，合之为一书，“而《中国通史》之雏形于是乎在矣”。

顾颉刚亲自撰写《晋文公》，作为“名人传”的第一册，此书当时即被梁实秋誉为“最生动之通俗历史，不独对民众，即一般知识阶级之非专攻历史者，读之亦觉盎然有味”。

为编纂通史，顾颉刚邀集王毓瑚、史念海、傅筑夫、吕叔达等人共同为之，而欲由自己总其成，“以自审文笔尚能通俗，思想亦不颓废”，“自其适宜于此也”。

第三届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奖评出。

该年获奖的人文社会科学类著作有：文学类一等奖空缺，二等奖一名（朱光潜《诗论》）、三等奖五名（程伯藏《影史楼诗钞》、宗威《度辽吟草及劫余吟》、洪深《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高华年《昆明核桃等村土语研究》、邹质夫《断滕记传奇》）；哲学类一等奖一名（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二等奖空缺，三等奖二名（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胡世华《方陈概念之研究》）；古代经籍研究类一等奖空缺，二等奖一名（闻一多《楚辞校补》），三等奖二名（王如心《孟子赵朱异注纂述》、钱基博《增订新战史例孙子章句训义》）；社会科学类一等奖二名（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刘节《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论》），三等奖十一名（曾资生《中国政治制度史》、郑天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等论文三篇》、王焕镳《曾南丰年谱》、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等）。

方壮猷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7卷第3期发表《辽金元科举年表》。

侯外庐编《王国维古史考释集解》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

1944 年

※ 毛泽东提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观点。
※ 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
※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出版。
※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 1 卷出版。
※ 萧一山《清史大纲》出版。
※ 吴晗《明太祖》出版。
※ 傅衣凌《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出版。
※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出版。
※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出版。

1 月

1 日　国立敦煌研究所正式成立。

1941 年秋，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视察莫高窟后，提议将莫高窟收归国有，并成立专门的管理、研究机构。1943 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成立隶属于教育部的国立敦煌研究所。1950 年 8 月，原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

9 日　毛泽东在观看延安评剧院上演的《逼上梁山》当晚，写信给该剧的编导杨绍萱和齐燕铭。

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后来毛泽东把这个观点概括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31 日　傅衣凌在《福建文化》总 32 号发表《福建畲姓考》。

是月　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由正中书局出版。

本书运用社会学的抽样调查方法，选取周、宋、清末三个时段，探究中国家族社会的演变，还分析家族制度的优缺点。书中指出周代在政治上以伦理维护家族社会，以法律维护家族内长幼之序、男女之别。宋代家族社会的特点是宗族制度民众化，而清末以降，家族观念渐趋淡薄。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由桂林开明书店出版。

2月

1日　《文史杂志》出版"美术专号"。

专号刊登了唐君毅《中国文化中之艺术精神》、郭宝钧《由铜器研究所见到之古代艺术》、傅抱石《中国山水画论》等7篇文章。

23日　吴其昌病逝于四川乐山，终年40岁。

吴其昌1938年随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因条件艰苦患上咯血症。其同事方壮猷在《吴其昌教授事略》一文中指出，面对家属朋友的劝告，吴其昌"辄以'国难严重，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为辞"拒绝休息静养。吴其昌在去世前两月，几乎日夜不息赶撰《梁启超传》，"虽在发烧、吐血之日，亦几未间断，其事至苦"，"朋友劝阻而不果"，终于完成五万多字的《梁启超传》上册。封笔数天后，吴其昌即病逝。

是月　胜利出版社开始编印潘公展、印维廉主编的"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

第一辑为"民族伟人"，收录有吴晗编著《明太祖》（1946年2月）、朱焕尧编著《汉武帝》（1945年2月）、钱穆姚汉源编著《黄帝》（1946年2月）、黎东方编著《孔子》（1946年2月）、顾颉刚编著《秦始皇帝》（1946年2月）；第二辑为"历代贤豪"，收录有罗尔纲编著《洪秀全》（1944年4月）、卫聚贤编著《勾践》（1944年5月）、郑鹤声编著《郑和》（1945年1月）、潘公展编《陈其美》（1947年4月）等；第三辑为"学术先进"，收录有杨杰编著《孙武子》（1944年2月）、张默生编著《老子》（1944年3月）、方豪编著《徐光启》（1944年6月）、吴其昌编著《梁启超》（1944年7月）、李长之编著《韩愈》（1945年3月）、苏渊雷编著《玄奘》（1946年5月）、许寿裳编著《章炳麟》（1946年5月）等。

3 月

19 日　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

连载至22日。1944年为明亡300周年。1944年1月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杂志社，决定组织发表一组纪念文章，提醒人们吸取明末农民战争失败的历史教训。郭沫若正是受《新华日报》之托而撰写《甲申三百年祭》的，3月10日脱稿后经董必武修改后发表。

这篇文章分析和评价明末农民战争，推翻了以往史籍视农民军为盗贼的观念，歌颂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总结其经验教训。

此文引起了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反响。国民党视之为洪水猛兽。3月24日，《中央日报》组织对《甲申三百年祭》的围攻，先是由陶希圣执笔，发表了社论《纠正一种思想》，说这是"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不能姑息和放纵这种反常思想，听其谬种流传"。4月1日，重庆的《商务日报》也发表社论《论赫尔的名言》，攻击郭文是"散播败战思想，把不正确的毒素，渗进社会内层"。4月13日，《中央日报》又发表社论《论责任心》，说郭文是用"文学、戏剧、史论，渲染着亡国的怨望和牢骚"。4月20日，叶青抛出长文《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评议》，对《甲申三百年祭》及《新华日报》副刊发表的附和一一点名攻击。叶青说："际此甲申之年，特利用明亡的历史事实来作材料，而妄想以明朝来隐射国民政府。郭沫若向来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而又薄有文名，自为执行这个宣传政策的适当人物。所以郭沫若的失败主义不过是共产党的失败主义之流露而已。"

中共方面则持欢迎态度。3月20日，《新华日报》副刊发表《甲申事变——明末亡国的历史》一文，对明末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势的变动作了介绍。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讲话，其中高度评价《甲申三百年祭》："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月15日，《群众》第9卷第7期发表柳亚子《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赞《桃花扇底看南朝》与《明末的政治风气》、《明末清初史学的时代意义》等文，作为对郭文的唱和。4月18、19日，延安《解放日报》连载《甲申三百年祭》，并在编者按中指出："郭沫若先生这篇名震一时文章"，"充满了爱国爱民的热忱"。

另有学者也对郭沫若持同情立场。宋顾说："因为受了传统历史书的束缚，还有人把明末的农民起义目为寇贼，反把卖国求荣的洪承畴当圣哲，那么，把这段三百年前的历史弄清楚就更是有意义的事了。"（《三百年前》，《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日）丁易也谈道："李自成这段历史

经过及其失败教训，除了那些深中明史之毒的人不予重视外，一般进步的史家似乎也仅仅将他当作一个普通的无计划的农民起义看待，并未予以更高的评价”，而《甲申》一文“使这沉浮数百年的真相大白于世，不能不说是一件快事”（《庄烈帝与李自成》，《大学》第9、10期，1944年）。

此文虽以明代历史事件为考察对象，但染有强烈的现实色彩，成为史学致用的一个显例。

是月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4册作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在成都出版。

据胡厚宣回忆，该书在1942年已开始印刷，因石印过慢，至1944年方才印完正式出版。1942年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看到该书初集部分文章，呈请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颁予科学发明奖二等奖。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提出“殷非奴隶社会论”和殷代已有封建制度的论点。胡厚宣指出一些人用来论证殷代存在奴隶的甲骨文其实与奴隶并不相干。《殷非奴隶社会论》一文中说：“今之治中国社会史者，多以殷代为‘奴隶社会’，谓殷代凡农业生产以至征伐军事无不以奴隶为之。”其所根据的卜辞诸文，“固无一能作殷为奴隶社会之证据者也。”在《殷代封建制度考》一文中，胡厚宣指出王国维所说的“中国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与历史实际不符。他认为殷与西周实为一个文化单位，其剧变不在殷周之际，乃在东周以来。

冯汉骥支持胡厚宣观点。冯汉骥认为，胡厚宣的殷非奴隶社会论“自为卓识，可一洗强将中国社会比附西洋社会发展的通病”。他对奴隶制时代的否定，比胡厚宣还彻底，认为“以供牺牲之俘虏为奴隶，亦容有未妥”。“中国社会制度的剧烈变动，当以盘庚时代前后为断。因为一固定村落的社会组织，自与一时常迁徙的村落社会组织的需要大不相同了。封建制度之开始，大概亦于此时”。

陈中凡则提出激烈批评：“胡氏对于封建一词之界说，未能确证。”胡厚宣所列举作为殷代封建制度之特征之五等爵和五种义务，都“属于形式主义之解释，已不能证成其说。若再进而论及封建制之本质，考当时生产方式若何，封建地主对于农民之关系若何，更无一字述及。”殷代的“众”和“众人”从事生产劳动，而其收获则归之于王族，这种生产关系正是奴隶所有者与奴隶之关系。“以‘众’为贵戚集团或民众集团之通称，而成牵强附会矣。”

此后，胡厚宣又将《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二册，1945年3月）、《甲骨学商史论丛三集》（一册，1945年7月）、《甲骨学商史论丛四集》（二册，1946年）作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出版。此四集六册“论

丛”共收入论文三十余篇，涉及考古、释字、文例、地理、帝王、礼制、宗教、历法、医学、断代等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宗法制度、重男轻女、帝王世系、四方风名、记事刻辞、卜龟来源、农业生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探索，“实为新的研究在更高水平上进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树起一座继往开来的里程碑”。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由新华书店出版。

该书共有“原始的职工运动”、“职工运动黎明期”、“中国第一次罢工的高潮”、“香港海员大罢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劳动立法运动”、“开滦五矿大罢工”、“京汉路大罢工—二七惨案”、“职工运动消沉期”，“职工运动复兴期”、“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五卅运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省港大罢工”13 章，书后附《邓中夏同志传略》。

马元材《桑弘羊及其战时经济政策》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

陈世材《两汉监察制度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 月

11 日　郑天挺在西南联大文史演讲会作《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演讲。

郑天挺对满洲的族称、满洲先世在元明的地位、爱新觉罗姓氏的由来、氏族与旗籍、清代诸帝之血系、佟氏与汉人、满汉通婚之禁、选秀女之制进行了详细论述。他从清开国前后满族的源流入手，证明清代皇室氏族中，含有满、蒙、汉各族的血统，原来东北地区的满族，同内地各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密切，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员。他说："清代以满洲表部族。”满洲是族称而非地名、国名。他用满族的历史，痛斥日本侵略者非法扶持“满洲国”。“近世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

是月　《文史杂志》出版“明清史专号”。

专号刊载了孟森《明开国以后之制度》、李文治《明末的寨堡与义军》、萧一山《天德王洪大全考》、罗尔纲《翼王石达开略传》等文。

社论《明清史研究的重要及其趋向》中提出：“历史研究的目的原在帮助人类对于现实问题的理解，进而决定其行动趋向与取舍。所以古代史的研究与近代史的研究是有同等的重要性。为了探求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渊源，以决定将来社会文化的进路，我们固然需要源溯到三代秦汉以上，

而近代的明清两朝的历史，尤其需要下一番研讨的工夫。……希望明清史研究者把他们的研究计划和抗战建国的需要切实配合起来，使明清史的研究在现在可以直接有利于抗战，在将来更可以直接帮助建国。”

朱谦之《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由江西中华正气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三章和一个附录组成，第一章为“太平天国史料及其研究方法”，第二章为“太平天国革命文化之背景”，第三章为“太平天国革命文化之面面观”，附录为“天德王之谜”。该书不仅系统地介绍了太平天国史料的分类、价值及研究方法，还分析了太平天国爆发的原因及政治、军事、文化、宗教制度，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状况。此书显示了朱谦之治史的变化，即提倡史料和史观并重，并部分受到唯物史观的历史解释的影响。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翦伯赞自序中说，“这本书，上起开天辟地，下迄殷周之世，其所论述的范围，是秦以前的中国古史”。全书共二十一章，约二十余万言。以时代演变划分为“前氏族社会”、“氏族社会”、“古代社会”、“初期封建社会”四阶段。

此书在结构上，每一个叙事单元基本上都是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板块，而且这三大板块之间并非平列并置，而是由底至上梯度推进：经济史—政治史（政权、制度、阶级关系等）—文化史。这种框架，是唯物史观诸学理层次之间关系的外在化。在对象的取舍上，社会经济史的内容极大增多，政治史、军事史、事件史、精英阶层史等内容被大幅度压缩。春秋战国时期是政治军事斗争最为激烈、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但作者仅以10页的篇幅就把“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间血与火的搏杀交代过去，而在论述“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经济构造”时，却用了21页。许多在传统史家笔下鲜见的经济史内容毕现于书中。此卷《中国史纲》还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利用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学、考古学等所提供的成果，阐释、清理中国的史前社会。

1946年12月容媛在《燕京学报》第31期发表书评云：“著者侧重氏族社会之演变与封建制度之形成，及农业经济之发展与私有财产制度之产生；循自然之演变，渐次形成社会之阶级。”“本书即根据最新出土之史料以为出发，打破循循相因的藩篱”，“推陈出新，为研究上古史者辟一新途径。惟校对欠精，鲁鱼亥豕，比比皆是”。1949年2月，邓嗣禹在美国《远东季刊》第8卷第2期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翦书是项“雄心勃勃的尝试”，似乎目空前人，但的确组织精密，有一些新思想。

张传玺认为“全书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坚持了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方法，为中国通史的编写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将上古史“从神的历史还原为人的历史”；“将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对于中国新石器文化划分的六期说引入中国古代史研究。此举使前此的‘传神书怪，捕风捉影’的旧式研究受到沉重打击，为新史学建设开辟了科学而广阔的道路”；“将西周封建论写入《史纲》，并作了较充分的论述，对于西周封建论一派学术观点的形成和中国古代奴隶制与封建制社会的研究与讨论，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46 年 7 月，被生活书店收入“新中国大学丛书”再版；1950 年，北京三联书店、1990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此书。

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

此书收录《嘉靖间葡萄牙人在宁波被屠问题》、《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明清之际中西血统之混合》、《伽利略与科学输入我国之关系》、《望远镜传入中国考》、《红楼梦新考》、《清初宦游云南之犹太人》、《同治前欧洲留学史略》、《浙江外来宗教史略》等 11 篇论文及与缪钺、方国瑜、向达等人的 7 封通信，主要论及明代以后中国与南洋西洋史事。

钱穆在《文史哲季刊》第 2 卷第 1 期发表《两汉博士家法考》。

文章考辨“博士”渊源流变，并梳理探讨汉代经学发展过程、“家法”问题、“齐学与鲁学”、“今学与古学”等，提出了清代学者所谓“汉学”并非原本意义上汉代经学等看法。该文是钱穆经学研究的重要论著，被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一书列为钱穆代表作之一。

同期还刊载了柳诒徵《〈三国志〉裴注义例》、程憬《泰一考》、金毓黻《宋国史所载岳飞战功辨证》等文。

阎宗临《欧洲文化史论要》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

该书探讨了研究欧洲文化史的出发点、埃及文化与自然、中亚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中世纪的文化与哲学、民约论与法国大革命、近代欧洲文化等内容。1948 年 8 月，文化供应社在上海出版了新版。

侯外庐《船山学案》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

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民生史观研究集》由重庆中华书局出版。

5 月

1 日　竺可桢在《思想与时代》第 34 期发表《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

文章探讨了“中国、印度、阿拉伯之二十八宿是否起于一源”、“二十八宿起源之地点”、“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等问题。该文被认为是竺可桢的代表作之一，在天文史等领域有重要影响。

作者指出“我国有二十八宿，印度亦有二十八宿，即埃及、波斯、阿拉伯亦有二十八宿。近百年来，欧美人士对于二十八宿起源地点，争论颇为热烈，或主印度，或主中国，或主巴比伦。而国人对于此问题，反懵然若无所知，宛若二十世纪初叶，日俄以东三省为战场，而我反袖手旁观也。晚近中印交通频繁，战后两国关系必更密切，则此问题自更饶兴趣”，故撰写此文，希望引起中国学术界的注意。

是月　原西北史地考察团改组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开始在甘肃调查发掘遗址。

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地理研究所在原西北史地考察团的基础上联合组建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向达任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夏鼐任副组长。历史考古组的考察限于甘肃境内，参加者有向达、夏鼐、阎文儒三人。夏鼐持续时间最长，1944—1945年先后调查发掘了敦煌佛爷庙、月牙泉、北朝和唐代墓葬、玉门关汉代烽燧遗址、临洮寺洼山和广河阳洼湾的史前遗址、武威附近的唐代吐谷浑墓葬。1944年11月5日，先后采集到汉简48枚。1948年夏鼐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撰《新获之敦煌汉简》，整理公布了48枚简牍的照片，并作了释文。

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独立组团的考察、发掘活动，意义深远，成果丰硕：不仅发现了不同时期的大量考古遗存，对玉门关、汉代烽燧等有了新认识，而且夏鼐根据宁定县阳洼湾遗址的发掘资料，改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编年中齐家文化早于仰韶文化的错误。

萧一山《清史大纲》由重庆经世学社出版。

萧一山《清代通史》只写到太平天国，并未囊括整个有清一代，且篇幅庞大，检读不易。而《清史大纲》则用通俗的史话体裁，通贯从后金建国直到辛亥革命的清代历史，实为《清代通史》的简写本。全书共十章：明清之际、民族革命之酝酿、大清帝国之盛衰、近代社会之经济、民族革命之新对象、民族革命之壮澜、曾国藩与李鸿章、西方帝国主义之压迫、东方帝国主义之压迫、民族自觉与国民革命。此书不繁征史料，史事纵横旁通，议论一气呵成。

全书以“民族革命”思想贯穿始终。萧一山在“引论”中说：“我是主张民族革命史观的，尤其是讲中国近代史，必须以它为骨干，为中心。

因为它——民族革命——整个支配了中国近代社会，一切都依它为枢纽而变动的。”作者把近代社会的起点置于明末清初，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其“民族革命史观”。在萧一山看来，近代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的革命对象是清廷，如十七世纪的反清运动、天地会及太平军的起义；第二时期是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革命对象为列强帝国主义；第三时期前一段从民国元年到 1928 年是反对列强帝国主义，后一段从三十年代起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抗战建国为口号。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历史体系。但这种分期法，有把清代历史变成国民党党纲的注解和三民主义的政治教本之嫌。

张其昀认为该书“勾玄提要，体大思精，诚为大气磅礴，匠心独运之巨作”。

翦伯赞在《中山文化季刊》第 1 卷第 4 期发表《吐蕃种族来源考》。

作者认为羌族南徙西藏当在史前时代，吐蕃的人种主要成分是南徙诸羌，而非发羌一支，更不是后来的“秃发族”。

同期还刊载了杨幼炯《中国学术思想之演变与三民主义思想的渊源》、吴泽《殷代帝王名谥世次世系家族与继承制研究》、方壮猷《中国中古时期之门阀》、侯外庐《乾嘉时代的汉学潮流与文化史学的抗议》、杨荣国《戴东原的哲学思想》等。

归静先《清代文献纪略》由重庆人文书店出版。

张其昀《中国军事史略》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

6 月

1 日　朱谦之在《现代史学》第 5 卷第 3 期发表《中国文化新时代》。

作者认为，经过抗战的洗礼，改变了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过时的看法，并使人认识到，中国文化“越到现代越发现出蓬勃新兴的气象，从文化的独立现象看，中国文化是永远绵延，永远不会磨灭的”。作者还探讨了在新时期中国文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来继续发扬光大。

同期还刊载了陈安仁《中国近代民族复兴之历史意义与本质》、邱陶常《阳明的学说和明季的士风》、陆丹林《基督教传华的四期》等文。

7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和军队的干部学习《甲申三百年祭》。

此文“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全国各解放区的广大党政干部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必读教材。

是年 11 月 21 日，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复信郭沫若说：“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又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30 日　谷霁光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 7 卷第 1 期发表《战国秦汉间重农轻商之理论与实际》。

作者认为重农轻商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史上重要的问题，大略而言“春秋时代农商并重”，春秋末至战国初年，“渐有农为本商为末之理论发生，列国之间，亦渐以农为重商为轻”，秦是“重农轻商之急进者”，并因此富强吞灭六国，汉代“轻商贱商，曾一度趋于极端”，汉以后之各朝，“虽与时变易，而轻商理论，或旧调相承，或陈言是用，至于清而未完全断绝”。此文主要探讨“春秋时代的重商”、“重农轻商事实之演变与其背景”、“重农轻商之理论与其派别”、“轻商贱商政策之实施与影响”、“重农政策之实施与影响”等问题。关于重农轻商政策的影响，作者认为至少有四个方面，一是资本之剥夺，二是官商之操纵，三是商业资本之偏枯，四是工商之畸形发展。

此文的一大价值是依据西方经济学理论省察中国历史上的重农轻商问题，但作者也意识到西方经济学观点与中国经济思想之间存在歧异，因而反对盲目类比。他指出“近人每好以重农主义，相当于西洋经济思想史上之 Physiocracy，而以管子书中之重商学派，相当于 Merchantilist，此亦须加审慎”。原因有二，一是《管子》成书时代较晚，“其中思想，非纯粹重商，不能以之代表重商学说”，一是“中西历史背景不同，两派思想差别甚大，不能作单纯之对比，而忽视其差异之处”。

同期还刊载了《张荫麟君事略》、孙毓棠《汉代的交通》、袁震《两宋度牒考》（第 2 期连载）、梁方仲《释一条鞭法》、《明代十缎锦法》等。

傅衣凌在《福建文化》总 33 号发表《关于捻乱的新解释——太平天国时代社会变乱史研究之一》。

作者注意到太平天国时期江淮间发达的“寨堡组织”，并认为捻军是地方封建割据势力乘中央统治力下降而发动的叛乱。

同期刊载了陈文松《郭沫若谥法之起源驳议》，檀仁梅《古代中国的农业教育》，王新民《孔子立说前后相违考源》、《越灭吴史迹正误》，张一纯《南宋诸陵遗事纪》，麦克隆著、金云铭译并增补《十八世纪以前游闽西人考》等文。

是月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史料与史学》创刊。

傅斯年在《发刊词》中指出，“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莫母森之著史立点。史学可为绝对客观者乎？此问题今姑不置答，然史料中可得之客观知识多矣”。

本刊共出 2 期，1945 年停刊。1948 年 4 月，历史语言研究所将《史料与史学》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5 本重排出版。

吴晗《明太祖》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分五章，即流浪青年、从士兵到统帅、开国皇帝、恐怖政治、家庭生活。以通俗笔法叙述朱元璋从起兵到建立明朝政权的经过，并介绍了朱元璋的身世、明教概况等，对朱元璋实行的专制政治进行了抨击。

1948 年 11 月，吴晗到石家庄会见毛泽东时，毛泽东阅读了此书手稿，并提出意见：“在方法论问题上，先生似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工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作者曾三次对本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从第二个版本起，更名为《朱元璋传》由新华出版社于 1949 年 4 月出版，此版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故对朱有苛评。第四版于 1965 年 2 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作者于第四版《自序》中检讨说：“第一二个本子内容都有许多错误，有些地方甚至犯了严重的错误”，“第三个本子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对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分析注意不够，对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够全面”。

《文史杂志》出版“中国经济史专号”。

本期包括傅筑夫《由汉代的社会变动说到两汉的兴亡》、谷霁光《宋元时代造船事业之进展》、万国鼎《殷商之土地制度》等 7 篇文章。

社论《略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指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是近二

十年的事。最初是以研究社会史开其端，这不待言是受着民国十五六年北伐时革命思潮的影响。因而这种研究乃是皮毛的抽象的，所以在民国二十年以前真正有价值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论文很少看到。二十年以后，随着国内社会的渐趋安定与发展，经济史的研究乃渐趋于本格的”，“依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经济史研究乃全部历史研究的重心，一切历史上所发生的分歧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而且必须向当时经济实况中求得其所以然的原因；如果不把历史上各时代的经济情形予以说明，那一切历史事实绝不能得到正确而合理的解释”。就经济史研究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应把研究方向由局部问题的考订转向大部资料的整理，二是把近年来的经济史论文做一个索引，以减少学者搜求参考资料的困难，三是把外人经济史著述，特别是关于中国的，多介绍一点过来，以作他山之助。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由文风出版社出版。

侯外庐把古代思想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西周的官学，春秋时代的缙绅之学和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并鸣之学。他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系统探讨先秦思想学说史。此书在分析思想史的变迁和思想家的思想理论过程中，具体而详尽地揭示了思想观念产生和变化的社会根源。不仅从生产方式的变化上，而且从社会制度的变革上，深入分析社会存在的变化给人们思想观念带来的影响。

侯外庐说：“我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是继《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之后，在 1942 年年底写成的。它是我从社会史转向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界碑。从此以后，我治学的重点就基本上转到思想史方面来了。”他指出：“过去研究中国思想史者有许多缺点，有因爱好某一学派两个人是非其间的，有以古人名词术语而附会现代科学为能事者，有以主观主张而托言以为重言者，凡此皆失科学研究的态度。”他认为正确的方法是，第一，必须以文献学为基础，做好史料工作；第二必须用科学方法分析古人用语的特殊含义，不能望文生义。

侯外庐自谓该书有三个特征：第一，始终注意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关联；第二，偏爱于解决一些学术界争论难定的疑难问题，重在历史事实和历史线索的澄清：第三，写作朴实，立论有据，不作虚词装饰。赵纪彬指出，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是‘学术中国化’号召以来，思想史研究上一颗最硕大、最肥美的新果实”。

该书具有拓荒性质，它表明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研究体系的形成。

7 月

5 日　朱希祖在上海病逝，享年 66 岁。

是月　蒋祖怡《史学纂要》由正中书局印行。

全书共分四编，包括绪论、史书、史学、余论。每编设若干章节，分专题论述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

作者认为："历史虽然可以正当地称为一种'科学'，而永远不会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像物理学、化学一样。历史正如其他的社会科学一样涉及于人事；而人事永远是一个易变的因子。化学家或是物理家，能在博大的范围中采定种种条件去适合于他自己，又能为他的种种实验抽到一种理想的环境。而历史家却不如此，他不能再创造过去的，因此他的许多假设必定比自然科学家的假设是更实验的。所以与其使史学倾向于主观，无宁使它成为呆板的一种科学。"他反对在史书撰述中横生议论，而主张尽量裁抑主观倾向，史家的责任仅在"求真"，为此不惜将史学变成"呆板的一种科学"，或者说"史学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

常乃悳《历史哲学论丛》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激烈批判实证史学。他说，实证史学家"以为科学的历史就是考证式的历史，就是努力搜集些干枯材料累积起来的工作，他们的理想标准是把历史表册化，令人打开一看除了干枯无味的人名地名及数字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他们以为能做到这个程度才算尽了科学化历史的能事"。这种"为一件琐细到极点的不相干问题费上数万字的考证工夫，换得一个博学的头衔"，实际上是"玩物丧志"，是浪费"聪明才力"，是"贻误后代"。这样的史学不能称之"学"，只是"史术"，这样的史家不能称之为"家"，只是"抄书匠"。他指出："伟大的史学家其任务决不仅以搜求史料为满足，历史家之任务在能接受时代的潮流，以其个人伟大的天才与社会心灵相互渗入，反映社会之需求，并进而指导社会的新趋向。"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具有"伟大生命力"的"杰作"，才能称得上"伟大的史学家"。

傅振伦《中国史学概要》由重庆史学书局出版。

1929 年至 1937 年，作者在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史学系讲授中国史学通论。抗战后入蜀，1942 年在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史地系讲授史学通论。1944 年，他把讲义整理成书，原拟题名《史学通论》，为与其师朱希祖的书相区别，改名为《中国史学概要》。

此书分十篇，分别为：史之解谊、史官建置、史学起源、史书名目、史学流别、史体得失、史学名著举要（上、下）、史学上两大思想家、史籍之整理，并有附录《编辑史籍书目提要之商榷》。其《自叙》谓："金静庵先生撰《中国史学史讲义》，以吾国史学发展历程分为五级。今本其

说而略论之。”本书虽寥寥八万言，但对中国史学的诸多方面，都有简要论列。

傅氏的史学史研究是在朱希祖的指引下完成的。他承认：“余每有专著，辄就正于先师”，“及阅《史通之研究》，推为研究刘知几学说之津梁，论《刘知几年谱》，曰搜集资料甚备。……《中国史学概要》，则谓能广师说，而备述各方面。”

张家驹《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册由广州协荣印书馆出版。

8月

傅衣凌《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由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出版，开创社会经济史研究新路径。

此书以偶然发现的一大箱、数百张明清以迄民国时代各种土地文书及租佃契约为基本依据，对福建的佃农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一些过去尚未为人论及的看法，并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地区研究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开创了中国经济史学利用民间文书，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地区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的新路。他在该书中所倡导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的选题设计，对此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该书问世后，虽然因为战争原因在国内流传不广，“但很快被介绍到日本，成为战后日本史学界重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而后又由日本史学者的媒介，传播到美国，成为美国五六十年代新汉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钞晓鸿、郑振满在《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一文中认为该书“主要资料是作者搜集的民间契约文书，研究风格、包括资料的搜集利用均与传统的治史方式大相径庭，开一代风气，为此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包括《太平天国全史导言》等7卷，其中写道：“一般地言之，马克斯的唯物史观，经济定命论，或经济史观，实为不健全的学理，尤其不能施用于太平天国史之解释。”

同年11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简又文的《金田之游及其他》。

韩儒林在《史学集刊》第4期发表《突厥蒙古祖先传说》。

此文以研究“突厥蒙古祖先传说之演变，及其传说上承受希伯来天竺及吐蕃之痕迹”为目的，内容包括“乌孙高车突厥先世传说中之狼”、“畏兀儿蒙古祖先传说中之天光感生说”、“‘甘教’与苍狼苍突厥苍蒙古之解释”、“蒙古祖先传说中天竺吐蕃成分之分析”、“蒙古祖先传说中希

伯来突厥成分之分析”等。有研究者指出此文对相关资料文献进行综合分析比较，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地证实了蒙古史中“层累地叠加”这种理论。

同期还刊载了李玄伯《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几种现象》、董作宾《中康日食》、丁山《班殷铭跋》、徐炳昶《晋宁访古记》等文。

《文史杂志》出版“近代史专号”。

该专号刊载了萧一山《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潮》、罗尔纲《李鸿章评传》、彭泽益《郭嵩焘之出使欧西及其贡献》等9篇文章。

程滨遗等人编纂的《田赋史》2册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

该书上册由程滨遗、罗巨峰、夏益赞、吴泽编纂，下册由马大英、江士杰、刘国明、王延超编纂，上册从上古到元代，下册从明代到民初，不仅全面梳理了中国的税法、赋役情况，还有目的地对中国天赋史资料进行系统整理。有研究者认为此书“层面较多，视角亦广，观点平实，在当时堪称详备”。

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瞿兑之《秦汉史纂》由中国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瞿兑之、苏晋仁《两汉县政考》由中国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9 月

徐中舒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4卷发表《井田制探原》。

作者提出了“田之初义为田猎为战陈”、“偏旁从田诸字仍多从田猎得义”、“春秋战国之世仍当为田猎畜牧而兼农业之社会”、“井田之形方，实由田猎社会演化而来”等观点，并认井田制实是殷代田制和兵制的遗存。有研究者认为该结论“说不可易”。

同期还刊载了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探讨》、刘朝阳《殷末周初日月食初考》、陈寅恪《〈连昌宫词〉笺证》、刘恕铭《苏莱曼〈东游记〉证闻》、徐益棠《南宋杭州之都市的发展》、唐文播《巴黎所藏敦煌〈老子〉写本综考》、杨明照《〈抱朴子外篇〉举正》等文。

史念海《中国的运河》由重庆史学书店出版。

该书共8章，从上古对自然水道的利用说起，然后按时间顺序论述了我国从先秦至清代人工运河发展演变及其历史过程。该书对中国运河的研究影响颇大，其中的论点及资料常被后人引用。1988年4月，陕西人民出

版社出版了增订版。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云："晚明这短短数十年，一方面是从宋明道学转向清代朴学的枢纽，另一方面又是中西两方文化接触的开端。其内容则先之以王门诸子的道学运动，继之以东林派的反狂禅运动，而佛学、西学、古学错综交织于其间。这一幕思想史剧，也可算热闹生动了"，"这样一个思想史上的转型期，大体上断自隆万以后，约略相当于西历16世纪的下半期以及17世纪的上半期"。

陈寅恪致函牛津大学中文高级讲师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授权其代表他向牛津大学提交《高级中国研究计划》。

计划中规定：该教授应负责将《旧唐书》及《新唐书》以比较形式译成英文。为了提高唐史翻译的价值，应运用这种新的比较研究方法，利用敦煌手稿，撰写研究论著，阐明唐代文化。

同时，出版社应该委任雷海宗、邵循正、孙毓棠写一套3卷本约1500页并附所需地图及详细索引的中国历史。这套历史应用英文撰写，并以认真的历史学生为对象。

1945年秋，陈寅恪到英国治疗眼疾未能奏效，不得不放弃牛津的聘任。1946年1月21日，牛津大学正式公布陈寅恪因健康不佳辞职。这一计划也就失去了实施的机会。

中法汉学研究所编《汉学》第1辑出版。

此期刊载了张尔田《论中国文化及其宗教道德》、孙楷第《傀儡戏考源》、张芝联《资治通鉴纂修始末》等文。

黎东方《先秦史》作为"复兴丛书"之一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被商务印书馆收入"复兴丛书"的史学论著还有吴清友《苏联史地》、李源澄《秦汉史》、萧一山《清代史》、刘文岛《意大利史地》等书。

岑仲勉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第3、4分合刊发表《补唐代翰林两记》。

该文与《翰林学士壁记补注》（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5本）两文是作者对唐代翰林学士全面研究的代表性论著。作者从正史、诗文、笔记小说、金石文字等方面广泛收集资料，认真分析梳理，对唐代的相关文献进行了颇具学术价值的订误、补佚、考释等。

有研究者指出，岑仲勉对隋唐文献的研究考证，“虽间或有琐碎繁杂的弊端，可商之处亦不少”，但是都从其著作“材料的丰富，以及考证的缜密而感到获益匪浅”。

同期还刊载了陈槃《谶纬释名》、《谶纬溯源》（上），全汉升《北宋物价的变动》、《南宋初年物价的大变动》、《宋金间的走私贸易》等文。

劳榦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第3、4分合刊发表《两关遗址考》。

劳榦利用新出土的汉简材料，分从“太初以前的玉门关”、“汉代的玉门新关”、“阳关遗址”、“唐以后的玉门关”四个部分对玉门关、阳关的位置及其变迁进行了考辨，修订了王国维认为玉门关西迁之观点。

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指出，劳榦这一时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先后发表的《两汉户籍与地理的关系》、《两汉刺史制度考》、《两关遗址考》等文，“俱极精审，发前人之所未发”。

万国鼎在《文史杂志》第4卷第5期发表《殷商之土地制度》。

罗仲言《中国国民经济史》上下册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10月

23日　吕思勉为徐永清作《论疑古考古释古》，论三者不可偏废。

是月　陶希圣《中国社会史》（古代篇）由文风书局出版。

郑鹤声在《文史杂志》第4卷第7、8期合刊发表《明季西洋学术思想之输入》。

11月

15日　顾颉刚抵成都齐鲁大学。

顾颉刚被齐鲁大学汤吉禾邀请担任国学研究所主任，顾氏虽拒绝担任这一职务，但是允诺到齐鲁大学一个时期，以便于开展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在齐鲁大学，顾颉刚还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春秋史”课程。

是月　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

该书是侯外庐继《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之后又一思想史力作，以人而不以学派或思想为单位论述了中国近三百年的思想学说史。之所以跳过

秦汉至明代的时期而直接研究清代，侯外庐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著述思想史要清楚一个“先决难题”，即“社会史的时代认识”。由于古代至秦汉的中国社会众说纷纭，学者间至今犹无共识，以此基础来写必然流于附会臆度；二是研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是社会较迫切地需要，有利于认识和继承“清代思想之光芒”。侯外庐自言此书的研究态度是“实事求是”与“自得独立”并重。

此书出版以后颇受好评。杜国庠在《接受遗产与知人论世》一文中称赞该书“在已有的中国近世思想史中，是最优秀的著作”，“启示了接受中国思想遗产的一个良好法门”。该书下卷在1945年6月出版，1946年6月，三友书店又出版了订正第3版。

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十章，以交通对于经济的作用作为论述的主线，探讨了运河畅通与否与唐宋帝国兴衰的关系，充分肯定了当时漕运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

杨联陞评价此书有两个优点：一是采用了一种“新纲目体”，二是把经济史同政治史军事史打成一片。李根蟠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一文中认为此文“打开了了解近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的一个窗口”。

秦佩珩在《新经济半月刊》第11卷第3期发表《中国经济史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

作者总结说：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潮是“材料的整理及方法的讨论”。在“中国经济史”的总旗帜下，尽管各路诸侯云集，然而，大势所趋，仍倾向于食货一派。结果自然要以陶希圣马首是瞻。他所主办的《食货》半月刊杂志，执笔者几遍全国，而其思想亦掩袭大江南北，这时，中国经济史的倡导工作，已达到了最高潮。

秦佩珩还为日后的经济史研究作了规划，打算成立四个学术团体。第一，成立一个方志索引社；第二，成立一个欧洲经济史译学社，翻译欧洲经济史名著；第三，成立一个国学社，将笔记诗文中的经济史料分类汇抄；第四，成立一个西洋史料供应社，采集各国史籍中关于中国的材料。

郭沫若在《群众》第9卷第20期发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郭沫若对以往的古史研究进行了反省。文章分古代研究上的资料问题、论所谓“封建”制、关于井田制、施行井田的用意、申述人民身分的演变、井田制是怎样破坏了的、工商是怎样分化出来的、奴隶就这样得到解放八部分。对于1930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他认为虽然博得了很多读者，但“实在是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

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

作者论及材料的审查对于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检讨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和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新史学家们对于史料的征引，首先便没有经过严密的批判”。

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蒙文通《儒学五论》由成都路明书店出版。

12 月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始撰于 1939 年冬，1940 年 4 月完稿。本书讨论了隋唐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制度的渊源，谓隋唐制度有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而尤以前二者更为重要，从而纠正了人们认为隋唐制度渊源于西魏、北周的一般认识。作者分别考察了隋唐制度形成的轨迹和原因，并探讨了汉化和胡化的问题，分析魏晋以降东西南北各地域间文化的转输保存关系。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书，“空论少而发明多，建设多而破坏少”，推究渊源，明述系统，不具成见，实事求是，被评为“异于时人所讥之琐碎考据，亦异于剪裁陈言纂辑成书之史钞，更大异于具有成见与含有宣传性之史论”，可一洗当时治史者喜称专家，不识制度损益演变，多穿凿附会一二事之流弊，为抗战期间公认的佳作。有人因而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称赞二书。

陈子展《唐代文学史》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

1945 年 4 月，陈子展《宋代文学史》也被重庆作家书屋出版。1947 年 9 月，作家书屋又将两书合为《唐宋文学史》出版。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是年

第四届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奖评出。

该年获奖的人文社会科学类著作有：文学类一等奖空缺，二等奖二名

（罗根泽《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李嘉言《贾岛年谱》），三等奖八名（冯阮君《古优解》、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缪钺《杜牧之年谱》等）；哲学类一、三等奖空缺，二等奖一名（黄建中《比较伦理学》）；古代经籍研究类一等奖一名（劳榦《居延汉简考释》），二等奖一名（吴毓江《墨子校注》），三等奖三名（徐复《后读书杂志》、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张国铨《新序校注》）；社会科学类一等奖空缺，二等奖五名（萧一山《清史大纲》、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等），三等奖十六名（蓝文征《中国通史》上卷、洪启翔《古代中日关系之研究》、施之勉《古史摭实》、王伊同《五朝门第》、汪士杰《里甲制度考略》等）。

夏，华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室成立。

创办人是在华西大学担任中国社会史课程的姜蕴刚，出版刊物《中国社会》。（消息见《文史杂志》第5卷第5、6期）。

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

林同济编《时代之波——战国策论文集》由重庆在创出版社出版。

李埏在《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4期发表《北宋楮币起源考》。

1945 年

※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
※ 董作宾《殷历谱》出版。
※ 夏鼐在甘肃宁定县发现两座齐家文化墓葬。
※《文史杂志》出版“社会史专号”。
※ 郭沫若《青铜时代》出版。
※ 郭沫若《十批判书》出版。
※ 陈垣发表《通鉴胡注表微》前十篇。

1 月

1 日　林石父（华岗）《苏联外交政策史论》由昆明风云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七章，探讨了“苏联外交政策底特质”、“苏联外交政策底四大原则”、“苏联外交政策底动力和依据”、“革命和内战时期的苏联外交政策”、“和平建设时期的苏联外交政策”、“反侵略战争时期的苏联外交政策”、“战后和平问题和苏联外交的展望”等问题。1950 年 4 月，上海海燕书店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苏联外交史》。

25 日　顾颉刚因齐鲁大学发生风潮离开成都。

顾颉刚离开后，整理廿四史之计划等受阻。顾氏后又去信给主持研究所工作的吴禹铭商量此事，信中说：“《二十四史》之标点，为我辈整理中国历史之初步工作，且为不能不经过之一阶段。经过此一阶段，然后研究工作方有凭借，引用原文方有标准。”这一工作最终似无结果。

顾颉刚到达重庆后，担任了复旦大学教授。

是月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由独立出版社出版。

陆氏早年留学英国，获硕士学位，曾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历史系任教。本书是其在多年授课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全书分五编，每编分为三章。第一编论“历史的意义”、“历史的地

位”和“历史的方法”，第二编谈“史料的收集”、“史料的类别”、“史料的运用”，第三编论“考证的需要”、“考证的工作”、“考证的决定”，第四编论“解释的需要”、“解释的观点”和“解释的方法”，第五编论“著作的体裁”、“著作的文艺”和“著作的编制”。陆书征引伯伦汉和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等人的著作随处可见，其关于考证的章节，几乎是直接移用。

本书条理清晰，文字简要，广泛介绍西方史学家的理论、观点和方法。阐述问题时，往往追根溯源，且以中外情形参照互证，持论也较平允。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将其列入“史学史资料丛刊”再版。

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出版《六同别录》。

该书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三种，1945年1月至1946年1月陆续出版上中下三册。该书收录在李庄的史语所同人论著，手写石印出版，上册载文九篇，中册载文十一篇，下册载文八篇。1948年9月，史语所将《六同别录》所刊论文重新编排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14本出版。

李建芳《各国民族统一运动史论》由重庆大道出版社出版。

2月

中国史学会为校订《清史稿》事召开全体理监事会议。

与会者认为，曾被国民政府列为禁书的《清史稿》得失互见，瑕瑜不掩，各大学、研究机构均以近代史为必修科或研究要目，而《清史稿》为第一位的参考书。因此，特呈文教育部，要求由中国史学会负责校订和出版，请政府解禁，并给予适当帮助。

萧一山《清代史》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是在《清代通史》基础上的简写和补充，以“民族革命”观念贯穿全书，简要梳理了从明末满清兴起至宣统退位革命成功的历史。该书后被收入《民国丛书》第4编，并被辽宁教育出版社等再版。

3月

13日　尹达在《解放日报》发表《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作者应《解放日报》之邀，回应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对郭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历史功绩、学术观点和治学精神进行了

评述。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中国，这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部巨著，从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上看，它确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由于它的诞生，才把陈腐的中国古代史料点活了，才奠定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基础。”《卜辞通纂考释》一书“成为中国空前的、综合性的、关于甲骨文字的杰作，每一个研究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的人，都依靠着它作为最可靠、最珍贵的读物”。而《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从郭先生自身研究的经过里，检讨了中国古代社会中的许多问题，把十几年研究的菁华简要地写出来了；这的确是古代研究中的一件极宝贵的文献”。郭氏“根据十几年研究的成果，对最初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进行了自我批判，这不仅是郭先生对古代社会研究的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正是今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指标”。

4 月，《群众》周刊第 7、8 期转载此文。

是月　瞿同祖赴美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与华盛顿大学合作设立的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

瞿同祖是应主持中国历史研究室的魏特夫邀请抵达哥伦比亚大学的。在此期间，瞿氏主要从事社会史研究，直到 1953 年离开。期间瞿同祖完成了关于汉史的研究，其文稿后来经过整理修订，由杜敬轲（Jack Dull）博士编辑，以英文《汉代社会结构》（Han Social Structure）为名出版（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2 年）。该书主要对汉代的家族、婚姻、妇女地位、社会阶级以及豪族等问题进行论析。《亚洲历史学报》（Journal of Asian History）评论此书“是中国现代学术最佳成就的一个主要范例，它对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课题作出了卓越的综合”。

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创刊。

王亚南撰写了题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代发刊词。侧重刊发中国社会史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制度研究、福建社会政治文化专题研究等方面的论著是该刊的特色之一。

张贵永在《文史哲季刊》第 2 卷第 2 期发表《最近几十年来的德国史学》。

4 月

20 日　中共第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该决议对此前中国共产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对王明代表的“左倾”作了详细结论，充分肯定了“八七”会议、“遵义会议”的功绩

和六大路线的基本正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杰出贡献。该决议不仅为中共七大做了很好的思想准备，而且对此后的党史研究也影响深远。

是月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成书于1940年。全书五编二十五章，上起先秦，下至孙文，论及古今学者六十余人。该书《凡例》指出，“本书采政治学的观点，用历史学的方法，叙述晚周以来2500年间政治思想变迁之大概”；“体例以时代为经，以思想派别为纬，其取材以前人著作之具有理论价值者为主”；“叙述各家思想，力守客观之态度”。该书共有五编：第一编“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创造时代”、第二编“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因袭时期”、第三编“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转变时期（上）”、第四编“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转变时期（下）”、第五编“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成熟时期”。

作者在《绪论》中指出：“吾国政制自商周以来，凡经三变：商周之际，部落社会渐进而成封建天下，此为一变；始皇并吞六国，划天下为郡县，定君主专制之制，此为二变；满清失政，民国开基，二千年之君制遂告终止，此为三变，段落分明。”

该书被认为是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开创了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新局面，至今再版版本众多。美国汉学家牟复礼穷十余年之力移译此书，后由普林斯顿大学印行。

董作宾《殷历谱》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董作宾历时十年，数易其稿，终于在1945年完成，并手写石印出版。书中大量使用把甲骨卜辞按占卜日期排列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排谱方法，从卜辞中整理出商王按严格规定的日程逐个祭祀先王、先妣的所谓“五种祀典”制度。这种根据甲骨卜辞所反映的礼制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研究的方法，揭示出甲骨卜辞中一些重要现象，对甲骨文的断代研究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产生了促进作用。

傅斯年多次督促董作宾写印《殷历谱》，并亲自筹划出版事宜，又为其撰写序言。傅氏高度评价董氏的学术成就，指出董作宾在历法研究中广泛应用新技术，并用现代天文学关于日月食的记录加以检验，澄清了商朝统治时期的顺序。他写道：“必评衡此书之全，则有先决之条件在：一、其人必通习甲骨如彦堂；二、其人必默识历法如彦堂，必下几年工夫。”

马元材《秦史纲要》上册由重庆大道出版社出版。

马元材此书之目的在“补二十四史无秦史之缺”，体裁仿“史记汉书

等正史成例"，实为由秦史课讲义基础上增修而成，分武力建国、中原争霸、统一运动、计划建设、帝国崩溃等内容。该书仅见上册，至六国覆亡而止。该书是秦史研究领域最早的专著之一，对此后的秦史研究有一定影响。

《文史杂志》出版"古代史专号"。

本期刊载郑德坤《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顾颉刚《黄河流域与中国古代文明》等7篇文章。社论《研究古代史的新途径》云：我们今日要想研究上古的史实，不能单靠几本古书，只有尽力从事于考古学，努力向地下发掘遗物。

（美）沙耳非米尼著、周谦冲译《史学家与科学家》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主要阐述历史学及社会科学的性质、功用和方法，并与自然科学对比。作者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如：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目的不同，前者再现过去而后者要找出人类行为的定律，但是历史可以帮助社会科学来发现社会现象的定律；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应当是真理的探求者而不是宣传家；史学和社会科学永不能和物理学一样精准，是不完全的科学；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道德上不能宽恕罪恶，不能屈服于不同的思想而改变自己的意见等。

侯外庐在《中苏文化》第16卷第3期发表《康有为与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

冯自由《华侨革命史话》由海外出版社在重庆出版。

5 月

夏鼐在甘肃宁定县发现两座齐家文化墓葬。

夏鼐从墓葬的填土中发现了马家窑文化的陶片并据此否定了齐家文化早于仰韶文化的结论，又把齐家文化划归另一个文化系统，动摇了安特生的甘肃史前文化六期划分说。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由永祥印书馆出版。

本书共7章，专门探讨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第一章"为什么要研究历史"，第二章"历史的历史"，第三章"史学进化的几个阶段"，第四章"旧时历史的弊病何在"，第五章"现代史学家的宗旨"，第六章"作史的方法"，第七章"研究历史的方法"。

作者认为，"马克斯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是不可不知道的史学

上的重要观念。

“青年知识文库《历史研究法》说明”云：作者是中国史学界的权威，这部著作当然是积聚了作者毕生的学识，用深入浅出的手法撰写出来的大众读物，它应该是时代青年必备的课本。

1981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吕思勉《史学四种》，将此书列入其中。

潘公展编《五十年来的中国》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

该书分上下编，上编为“国家建设之部”，收录邹鲁、王云五等人撰写的国民革命、政治、外交、出版等方面的文章；下编“学术思想之部”，收录贺麟、顾颉刚等人撰写的关于哲学、科学、史学等方面的论文。

王绳祖《近代欧洲外交史》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由作者留学回国以后在金陵大学的讲义修改而成。作者以国际均势问题为贯穿全书的主线，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个人的因素出发，重新解读了维也纳会议、克里米亚战争、柏林会议、英国孤立政策等。

陈觉玄《中国民主思想发展史》由成都大学印书局出版。

杨荣国《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由东南出版社出版。

6月

30日　傅衣凌在《福建文化》总34号发表《太平天国时代回乱领导人物出身考——太平天国时代社会变乱史之三》。

是月　《文史杂志》出版“社会史专号”。

本期专号包括社论《我们要补足旧史的缺陷》和8篇专论文章。

《我们要补足旧史的缺陷》云：“近年欧西的治学方法传入我国，一切旧有的学问都被重新整理和估价，在历史的部门中尤其是如此。……但是我们几千年来的社会，也有我们自己独特的环境，因而产生出许多独特的现象。……盲目地比附，常常会发生相反的结论，而使原来的史实根本改变了性质，这决不是治史者所应持的态度。……我们要想补足旧日史家留给我们的缺陷，要想由史料的整理得见旧日社会的全貌，但这些社会的全貌要的的确确是由史料中显示出来的，而不是我们有意或无意中想象出来的。这是我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的要求。”

傅筑夫《社会经济史的分段及其缺点》批评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来划分历史阶段，作者写道：“由一种社会制度转变到另一种社

会制度，其间绝没有显著的鸿沟，可以为两个时期或两种制度的分界，而实是前后交错，新旧并存，成为一种交互错综的现象。所有人为的分期，实际上都是非常勉强，而且是每每陷于错误"，"即使这个学说完全正确，但是应用到中国历史上来，亦是错误百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要使中国历史符合这四阶段的公式，每每去曲解历史，甚至改造历史"。结论是："利用任何一家的分段标准来强绳中国历史，其结果都是错误。"

常燕生《中国社会之史的发展》同意"社会发展有一定必然的轨道"，但是不主张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来划分历史时期。他提出以"社会权力的转移"作为历史分期标准。从商代到春秋末叶是"封建社会"，亦即"贵族权的社会"；战国秦汉时代封建社会已经崩溃，是所谓"君权社会"；魏晋北朝则形成第二期的"封建社会"；至宋明以后则又形成第二期的"君权社会"。

翦伯赞在《中山文化季刊》第 2 卷第 1 期发表《论司马迁的史学》。

文章内容包括"司马迁的传略"、"司马迁的历史方法——纪传体的开创"、"司马迁的历史方法——纪传体的活用"、"司马迁的历史批判——'太史公曰'"、"史料的编制及其历史观"等。在《中山文化季刊》第 2 卷第 2 期，翦伯赞又发表了《论刘知几的历史学》。后此文被编入《史料与史学》出版（1946 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除此二文外，还收入《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

有研究者指出，翦氏这些文章的写作与发表代表了翦伯赞在史料学研究方面的深度与广度，也显示出唯物史观派史学在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重视史料的新动向。

同期还刊载了侯外庐《古文献最初发现的中国古代文明考》、张蓉初《元代大都粮食的运输》等。

7 月

李光涛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2 本第 1、2 分合刊发表《清太宗求款始末提要》等文。

李氏系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购大库档案后招募的书记员，参与了这批档案的清理、整理、编辑的全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者逐渐积累掌握了大量档案材料，并且开始利用这些材料进行研究工作。此期发表的《清太宗求款始末提要》、《清入关前之真象》、《记努尔哈赤之倡乱及萨尔浒之战》、《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记清太宗皇太极三字称号之由来》、

《记崇祯思念南海岛大捷》、《清太宗与三国演义》，就是作者以大库档案资料为基础，参考其他文献资料，对明清之际相关历史事实的考辨，有研究者这些研究“使明清之际这段本来就错综复杂、又被清政权故意篡改歪曲了的许多史实，得以拾遗补缺，匡谬纠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同期还刊载了王崇武《读明史朝鲜传》，岑仲勉《旧唐书逸文辨》、《“回回”一词之语原》、《吐鲁番一带汉回地名对证》、《吐鲁番木柱刻文略释》，陈槃《古谶纬书录解题》（二）、《古谶纬全佚书存目解题》（一）。

吴泽《中国历史简编》由重庆峨嵋出版社出版。

原名《中国社会简史》，1942年11月由桂林学艺出版社出版，后经增补扩充，改名为《中国历史简编》。

全书共七编十七章，简要地叙述中国史前时代至“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和特点。作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把中国历史的发展依次划分为史前原始公社制社会、殷代奴隶制社会、西周至鸦片战争的封建制社会等几个阶段，打破了“万世一系”的王朝体系和上古、中古、近世等笼统、模糊的旧史体例。

萨孟武《中国社会政治史》第1册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

8月

15日　抗日战争胜利。

22日　中共山东省政府决定在临沂成立山东大学。

1946年1月5日，临沂山东大学举办开学典礼，正式开办。该校初期并不分立院系，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开设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等课程。组为文教系，下设教育、文史、数理、艺术四科。

1948年6月，该校改建为华东大学，10月迁入济南，将系科调整为社会科学、文学、教育三个学院，史学类课程有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联共党史、中国文学史等。1950年5月，华东大学将社会科学部改设为政治、文学、史地、艺术、俄文五系。史地系课程为社会发展史、科学历史观、中国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马列主义史学名著选读、中学史地教材教法及实习等。

是月　侯外庐在《中华论坛》第1卷第7、8期合刊发表《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家商榷》。

作者《附记》云："作者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这一问题，从苏联学者论战以来，就列在我的研究课程表之中。十余年来，这个恼人的问题无时不在材料继续提供之下，思索又思索，考核又考核，一方面是理论原则的材料整理，他方面是原则引用于东方古代史上的决疑说明，阙一不可能解答这一问题。这正是一种博古通今的课题，谈何容易。我初步寻求出答案来是在战前一年，但并不敢冒然把自己的'理论延长工作'贡献出来，和世界学者商榷。就在我写《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时候，虽然大体上根据自己的研究，说明中国古代史的发展律，而并没有从原则上全盘地拿出来的。因此就有几位朋友或面询或函问我为什么保留系统的说明呢？其实我亦不安的。此文是我在两年半以前，用了一个月工夫写出来，更兴奋的是在我写完时，又发现了理论大师的遗著，佐证了我的假定。然而，我慎重着，率不发表到如今。其间我把此稿送交过几位朋友预先征求批评，但都没有否定的商榷，故初稿写竟，在此二年多的时间，我也没有修改过。现因《中华论坛》编者再三敦促，重读一遍，决意把它发表，深望爱好历史理论的专家给我以严正的批评。"

此文后经作者修改，编入其所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一章，题为《亚细亚古代社会规律的研究》。

侯外庐《苏联历史学界诸争论解答》由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出版。

这部社会史论集综合了作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先秦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朱倓《明季社党研究》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孟云桥编著《西洋政治思想史》由重庆国立编译馆出版。

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

9月

4日　胡适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在胡适未到任以前，由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代理校务（1946年9月结束）。

是月　郭沫若《青铜时代》由重庆文艺出版社出版。

共收入作者1934—1945年间的十二篇学术论文：《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周易〉之制作时代》、《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驳〈说儒〉》、《墨子的思想》、《公孙龙子与其音乐理论》、《述吴起》、《老聃、

关尹、环渊》、《宋钘尹文遗书著考》、《〈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秦汉之际的儒者》和《青铜时代》，附录关于钟鼎彝器研究的三篇文章，最后有《后序》。其中，《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理出了先秦哲学、政治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其他各篇考究先秦的社会结构和人物、学派思想。

作者认为中国青铜器时代的下界“是在周、秦之际”，由于周代年限太长，因而必须重视“周器的断代研究”。同时说明殷、周青铜器可以分为鼎盛期、颓败期、中兴期和衰落期，并分析产生“这样的波动”的社会原因，阐述了各期青铜器的特征。作者自云“这本是我十几年研究青铜器所得的结论”。

郭沫若《十批判书》由重庆群益书社出版。

《十批判书》收录《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和《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等十篇论文。

本书对先秦思想的批判，涵盖了先秦诸子及重要学派。作者提出“人民本位”作为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他还主张先清算社会机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性质，然后清算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的研究方法。

朱自清说：“郭先生的学力，给他的批判提供了充实的根据，他的革命生活、亡命生活和抗战生活，使他亲切的把握住人民的立场。他说‘现在还没有达到可以下结论的时候，自然有时也不免要用辩论的笔调’。他的辩论的笔调，给读者启示不少。他‘要写得容易懂’，他写得确是比较容易懂；特别是加上那带着他的私人情感的《后记》，让人们更容易懂。我推荐给关心中国文化的人们，请他们都读一读这一部《十批判书》。”

《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是郭沫若关于先秦社会学术思想的姐妹篇。这两部论著都是论文集。《青铜时代》偏于考证，《十批判书》则重在学术分析。

刘铭恕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5卷发表《宋代出版法及对辽金之书禁》。

作者根据《宋会要》等书记载，认为有宋一代出版法制，大约有四个方面，一是“不经之天文邪教书籍之禁”，二是“科场举子应用时文文字之禁”，三是“政治法律书籍之禁”，四是“讲论政治经济等文字出境于辽金之禁是也”。四方面“不无互相影响沟通之处”，尤其是对辽金之书禁一端，“直接间接波及于宋代图书出版问题者特巨”。作者还指出，宋代图书审查法，自北宋仁宗时代已经成立，设立此种审查法之首要原因，在

于担心国内情况泄露到辽金。

同期还刊载了刘朝阳《夏书日食考》、徐益棠《宋代平时的社会救济行政》、刘铭恕《宋代海上通商史杂考》、甄尚灵《汉字俗解小考》、唐文播《巴黎所藏敦煌〈老子〉写卷斠记》、杨明照《〈汉书〉颜注发覆》、王钟翰《〈三国志〉裴注考证》等文。

束世澂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 5 卷发表《中国古代医药卫生考》。

作者认为现代史家对古史探讨“收获至丰”，“惟论及古代医药卫生者尚尠”，乃根据“古籍中述及医药者”作文。文章探讨了古代医药、“病理及卫生”及古代医学发展等问题。

侯外庐在《中山文化季刊》第 2 卷第 2 期发表《章太炎基于“分析名相”底经史一元论》。

作者认为章氏的学术活动“在中国学术史上是 19 世纪末叶的有价值遗产。他的经史一元论，是继承了清初傅青主‘经子皆王制’，章实斋‘六经皆史’的思想，而发展为一家之言”；章氏“是以历史学与逻辑学而治经学”，循此两条治学路径，“他以历史是人类智识的宝库，治经在‘存古’，存古则非谓旧章可永远遵循，乃谓据此文明制度流变之学问而‘灌溉’吾民；治经不能以历史为刍狗，而归结于某一人的唯心创造，乃谓六籍与历代史书并重。所谓‘斟酌古今，未有不资于史’；治经不是一种君学，而是一种匠学，故他以孔子与刘歆皆因校雠之学，使学术下私人，不为帝王所独专，他们做良史之功都甚伟。然而，治经尤在于逻辑，即所谓‘理内之言’，‘推既见以至微隐’，其方法则为忠恕之学，归纳与演绎并重，而更应重视归纳”。

同期还刊载了杜守素《墨家认识论的研究》、吴泽《殷墟青铜器研究》、翁达藻《中国上古的鬼神观念》、林仲达《大学教育之史的发展》等文。

罗尔纲《绿营兵志》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傅衣凌在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第 1 卷第 2、3 期合刊发表《太平天国时代团练抗官问题引论》。

10 月

马元材在《文史杂志》第 5 卷第 3、4 期发表《秦时佛教已流行中国考》。

余精一《中国社会经济史论》由南京东西文化社出版。

11月

陈梦家《西周年代考》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分两部分，分别由竹书纪年和金石文字考证西周年代，并形成“夏商周积年简表”、“两周简表”、“西周分期表”、“西周诸侯世表”、“两周诸国存亡表”等五个附表。

柳诒徵在《文史哲季刊》第3卷第1期发表《史原》、《史权》。

此二文即系被称为“先生文史学晚年定论”的《国史要义》前两篇。

同期还刊载了张贵永《从英国先期浪漫主义到赫尔德的历史思想》、《西洋外交史研究》，唐圭璋《宋词版本考》，朱焕尧《四种记注史书述》等。

侯外庐在《中苏文化》第16卷第9、10期发表《中国古代民族专政与统治之起源》。

飚生编著《世界大事年表》由独立出版社出版。

秦尚志《中国政治思想史讲话》由世界书局出版。

王恒《汉代土地制度》由正中书局出版。

12月

陈垣在《辅仁学志》第13卷第1、2期合刊发表《通鉴胡注表微》前十篇。

1946年12月，《辅仁学志》第14卷第1、2期合刊发表后十篇。

1945年，陈垣深入研究《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历时三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这是作者对以往史学研究具有总结性意义的论著。该书“前十篇言史法”，即考据与史评，是对于史学研究方法的总论，结合胡注的研究，建立起自己的方法体系。校勘、解释、避讳、考证、辨误诸篇关系历史文献考证的方法，是约取《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等书精华，分析胡三省《通鉴》注文，并进行史法总结；“后十篇言史事”，所言史事有政治、军事、民族、民心、宗教、人生与经济等。其中《臣节》、《夷夏》两篇讲民族气节，《出处》、《生死》两篇集中在“正人心，端士习”，《治术》、《伦纪》、《边事》、《民心》、《货利》诸篇则是针对时局而作，至于《释老》篇则因作者一向留心宗教史，借此表达自己宗

教信仰自由的主张。

同期还刊载了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沈兼士《石鼓文研究三事质疑》、孙楷第《梁鼓角横吹曲用北歌解》、周祖谟《胡三省生卒行历考》等文。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由开明书店出版。

此书通过对大量材料的梳理，叙述了明朝中晚期著名政治家张居正的一生，把张居正的政治活动展现给世人，并且力求公允地看待张居正。朱东润在《我怎样写作“张居正大传”的?》一文中指出，自己是“想从历史陈迹里，看出是不是可以从国家衰亡的边境找到一条重新振作的道路”。该书和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吴晗的《朱元璋传》、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一起被誉为“20 世纪四大传记”，被多次再版。

徐文珊《历史教育论》由重庆史学书局出版。

此书系作者对抗战时期历史教育的总结，共十二章，分别是：历史与民族、历史与现实、历史与将来、历史与文化演进、历史与文化建设、历史与戏剧、历史与小说及其他艺术、论史观、历史的特性、论大时代、史学风气之改革、历史教育之实施。

徐文珊由“拘拘自限”于古史考订向“以现实为归趋”的历史教育转变。他希望通过历史教育“因已然之势，应目前之需，启未来之运”，并借此为国家和民族“效其沧粟之诚”。

王亚南在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第 1 卷第 4 期发表《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法则问题》。

作者指出，“最近二十年中的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虽然使中外经济史学者关于中国社会的理解，有了一些根本的改变，即不再把中国社会看成需要另制一套历史立论或法则，始能加以说明的东西，但中国社会史上的许多特殊表象，毕竟不是硬套现成公式所能解释的”。

同期还刊载了傅衣凌《唐代宰相地域分布与进士制之相关的研究》、郑书祥《明代东南倭患及其对于社会经济之影响》、胡寄馨《明代福建市舶司及漳州舶税征收机关考》等文。

杨向奎《西汉经学与政治》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

此文被认为是针对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而作，共分七章，论述了五行说的起源及“五德终始说”于西汉的发展，于西汉经学今古文之别之外，又提出孟学与荀学之别，反对康有为等关于刘歆遍伪群经，王莽以伪篡汉的观点。

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

该书在吸收欧美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掘利用了“汉文佛经中所包含的印度哲学”资料，对从古至公元七八世纪的印度哲学发展作了系统的阐述，影响颇大。

张舜徽《广校雠略》在长沙自印刊行。

该书内容主要有学术源流、著述体例以及校勘、目录、版本等，1963年4月中华书局出增订版。

陈伯达《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由新华书店晋西北分店出版。

1946年2月重庆群众杂志社更名为《窃国大盗袁世凯》，后多次再版。

王兴瑞《清末革命保皇两党关系史》由重庆史学书局出版。

陈之迈《中国政府》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是年

第五届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奖评出。

该年获奖的人文社会科学类著作有：文学类一等奖空缺，二等奖二名（柴德赓《鲒埼亭集谢三宾考》、姚薇元《鸦片战争史事考》），三等奖七名（孙文青《南洋草店汉墓画像集》、严济宽《中国民族女英雄传记》、王玉哲《鬼方考》、许澄远《魏晋南北朝教育史》等），奖助者五名（朱谦之《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说》等）；哲学类一二等奖空缺，三等奖二名（崔书琴《三民主义新论》、金平欧《心理建设论》）；社会科学类一等奖空缺，二等奖三名（周荫棠《中国近代文官出身之途径》等），三等奖八名（罗仲言《中国国民经济史》上册等）；古代经籍研究类一二等奖空缺，三等奖二名（程廷杰《周易程传参正》、苏维岳《诗经丛著》）。

1946 年

※ 郑天挺《清史探微》出版。
※ 郭廷以编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出版。
※ 劳榦《秦汉史》出版。
※ 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出版。
※ 童书业《春秋史》出版。

1 月

郑天挺《清史探微》由独立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作者三四十年代的清史论文十二篇，涉及满洲礼俗、制度与血缘关系等内容。《满清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等文章，虽然所论为满清的氏族、风俗、典制、名词考释等具体问题，但皆系清史研究中的大关节，或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或补正完善了前人观点。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由生活书店出版。

本书为作者经济理论体系代表作之一，运用《资本论》的体系范畴，从商品经济入手，揭示了旧中国的经济属性。其结论表明：无论是商品、货币、资本，还是城市、乡村、工业、农业、商业，都是各种经济关系交错在一起的一种芜杂的经济形态，即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该书被学术界誉为"一部中国式的《资本论》"，1957 年再版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被译为多国文字。

齐思和在《大中》第 1 卷第 1 期发表《现代中国史学评论》。

齐思和指出当时中国史学界存在着两种最重要的派别——掌故派和社会学派。他说："在这种混乱的现象中，有两三种畸形发展，颇占势力。一种是琐碎考订的发达，我们可称他为掌故派。他们大抵知道用纪传的方法改修旧史或纂修新史是不行了，于是乃选择一个窄深冷僻的题目作一穷源竟流的探讨。考证则细入毫芒，征引则繁富博赡。……此外另有一派又

走向另一极端，他们因厌弃掌故派的繁琐苛碎的考订，遂要研究中国整个社会的进展，我们可称他们为社会史派。”

中共在晋冀鲁豫边区邢台市西关创办北方大学。

边区政府特聘范文澜为校长。北方大学是边区政府的最高学府，内设行政学院、财经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和一个附属班。北方大学曾先后开设七个学院和经济、历史二个研究室。刘大年曾任该校领导小组成员、工学院负责人，尹达任教务处负责人，尚钺、王冶秋等在此任教，范文澜亦曾在此讲历史。

2 月 15 日，即将调赴华北大学的尹达致信在重庆的傅斯年，其中表示：“今后甚愿与诸师友取得联系，以便共同致力于学术事业。”

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2 月

陈彩章《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对中国历代户口比率、人口增减、人口分布、边疆移民、国外移民都做了论述，并首次以省区为单位考证历史上生活在该地区的人口数量。常建华在《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中认为该书是我国“第一部人口通史”，已认识到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

杜守素在《中苏文化》第 17 卷第 1 期发表《中国古代由礼到法的思想变迁》。

钱亦石《近代世界政治史》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陈光祖《近代世界革命史话》由新华书店出版。

3 月

10 日　禹贡学会在太庙图书馆举行复员大会。

到会者有张星烺、沈兼士、马松亭、刘厚滋、吴丰培、侯仁之、张政烺、苏秉琦等百余人。顾颉刚做工做报告，总结抗战前情况，并述抗战中后方会务，如史念海、郑逢原等绘制历史地图，蒙文通论《水经注》之错误，自己考察西北，同仁编撰《北碚志》等，又谈及此后计划。吴丰培亦报告八年来北平会务：抗战初由赵贞信保管学会，赵氏离平后交刘厚滋、吴玉年、冯世五三人管理，图书等项无损失。

理事长仍由顾颉刚担任，王光玮、吴丰培、冯世五为常务委员，主持

会务。会议讨论今后募款及编辑事宜，组织基金管理委员会，由刘厚滋等九人任委员；改《禹贡》半月刊为季刊，由翁独健负责；在北平《国民新报》上发刊《禹贡》周刊，以通俗文字为主，由王光玮、侯仁之、张政烺负责；出版《禹贡会讯》，以便联络会员，促进会务，由冯世五、栾植新负责；《边疆丛书》由吴丰培负责。

顾颉刚任《禹贡》周刊主编。顾颉刚离平后不久，由赵贞信接管。以后季刊未能出版。《禹贡会讯》出了两期，《边疆丛书》由吴丰培自筹资金陆续刊印《北征日记》、《西行日记》、《巴勒部纪略》等六种。

21 日　《国民新报·禹贡周刊》开办。

主编顾颉刚作《发刊词》曰：抗战以来，学会集体工作虽停止，而个人之工作绝未因此而停顿；“况播迁所及，随地有考察机会，故西南西北，貊国羌乡，咸多创获，远迈前修，他日整理成书，必可开拓知识之领域”。

是月　萨师炯《清代内阁制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 月

郭廷以编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征引中外文献数百种，以日记事，以中西历并列，详叙太平天国革命的历程，考订相关事实，以图节省其他史家在研究太平天国史事上的时间和精力。另外，对捻军和天地会亦有记载。书后还附有历法对照表、人物表等颇有助于其他研究者检查的工具性资料。此书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重要成果，对后来者有巨大帮助。罗家伦称赞此书是“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一部大书”。

1926 年作者毕业于东吴大学后即开始编纂此书，1933 年初稿编成，1934 年中央大学曾排印，此后作者又四次修改，并决定于 1937 年正式出版，旋因抗战爆发中辍，1946 年才得以面世。茅家琦出版有《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校补》。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

收录作者 1945 年左右发表的《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史料的搜集与辨伪》等文，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最早系统研究史料学的专著，代表了这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料学方面的成就。

许冠三认为，翦伯赞的史料学成就“并不次于一般的专业史学家，有些见解且在他们之上”。翦伯赞“1944—1946 年的尝试，既显示他未忽略司马迁、刘知几所代表的大传统，亦表明他重视梁任公、胡适之和傅孟真

等所推动的新潮流”，他的述作“显示他深知史料学的重要，且有意与当时的主流史学一较高下”，而他识断之精审，“固在傅斯年‘史学本是史料学’之上”。

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由开明书店出版。

抗战爆发后，禹贡学会人员离散，童书业于1938年赴上海，并被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吕思勉破格聘为中国历史地理课讲师。此书即是童书业的讲义，根据张芝联的笔记整理而成。该书共三篇，第一篇“历代疆域范围”，第二篇“历代地方行政区划”，第三篇“四裔民族”。谭其骧在《评〈中国疆域沿革略〉》一文中认为，该书虽然存在一些史误和缺少“都市”的内容，但仅就第一、二篇而言，“简明扼要，纲举目张，有裨初学”，实较胜于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其中先秦诸章，论述尤为精审”。

5月

4日　西南联合大学举行结业式，宣告结束。

联大学生按志愿分别返回三所学校回迁，师范学院奉政府命令留下独立设置，更名为“国立昆明师范学院”。该年10月10日，复员后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正式开学。

15日　《理论与现实》在上海复刊。

主编沈志远，编委为：郭沫若、马寅初、郑振铎、沈志远、翦伯赞、马叙伦、胡绳、周建人、张东荪。出版4期后停刊。

是月　齐思和在《大中》第1卷第5期发表《中国史学界的展望》。

作者评价“新史家”云：“他们欲知今日社会是什么阶段，将步入何种阶段。其长处在能由大处着眼，而短处是题目太大，材料太少，有的甚至仅翻弄‘矛盾’、‘崩溃’、‘演变’等名辞，有些八股式的议论，而不用心去搜集材料，所以成绩并不太大。”他认为“国史的改造”应当由专题研究开始，“不过，所说的专题并不是琐碎片断而无意义的，乃是大问题的枝节，必须与整个社会问题有关”。

李季在《求真杂志》第1卷第1期发表《古史辨的解毒剂》。

文章对古史辨派的方法、研究范围及科学素养、公式、腰斩中国历史及其对外宣传等问题进行批评。作者指出：古史辨中含的毒素非常之多。胡适、顾颉刚应用形式逻辑和实验主义的方法整理中国古史，而以辨伪为

先务。他们二十年来愈加辩论古史，便愈加陷入绝境，用他们的方法去担负这种工作，是完全没有前途，是完全破产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公式完全建立在“不言 = 不知 = 没有”的公式上，是他们常用的最重要的法宝。杨宽所补充的分化演变说非但不是这个公式的救命星，反而成为它的催命符，愈修改愈昏乱，绝对没有科学的价值。

李季的结论是：治学方法的幼稚，研究范围的狭小和科学素养的欠缺，是古史辨派的致命伤。

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

本书主要汇集了作者在《战国策》杂志、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上发表的文章。

马叙伦在《理论与现实》第3卷第1期发表《中国历史上的民主痕迹和民主思想》。

杨荣国《孔墨的思想》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中国史学会《中国史学》年刊发刊。

6月

4日　周光岐（周予同）在《文汇报·史地周刊》发表《由魏编中国史学史论及史学史的分期问题》。

作者指出：“一部史学史的写作是相当艰苦的，不但要对过去各史学家的史学方法论有深刻的研究，对史籍有深刻的了解，对时代有深刻的体味，更要紧的，还要对史学自身的整个发展有所认识。否则，会变成一本‘垃圾堆’的！在魏应麒氏《中国史学史》（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未问世以前，别人也曾经出版过三四种中国史学史的书籍，可是总不能使人满意首肯，不是史观的错误，就是史料的不确，最大的缺陷，是对史学自身的发展没有把握到。”

作者特别提出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依周氏之见，中国史学史应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从殷周直至春秋以前，以甲骨上及钟鼎上的刻辞、诗经、周易、今文尚书中的一部分材料为代表，此为“中国史学的萌芽期”；第二期，从春秋经战国至汉初，以春秋、竹书纪年、国语、世本等为代表作品。这一期可称为“中国史学的产生期”。第三期，从汉初至清末，以纪传体的二十五史，编年体的正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的九种纪事本末，以及作为政治制度史的十通，和作为学术史的四朝学案等为代表作品，此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期”，也可说是中国史学的定型期。第四期，

从清末到现在，可称为“新史学”时期（以前三期可称为“旧史学”），新旧史学的转捩点出于“鸦片战争”后的经济社会起了极度的变化，而直接由于经今文学派之文化的动力，此为“中国史学的转变期”。中国史学由“萌芽”、“产生”、“发展”而“转变”，自各有其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背景和基础在。

鸦片战争以后的史学，“大别之可分为三派：以胡适为中心的疑古派，以王国维为中心的考古派，以郭沫若等为中心的释古派。至今为止，中国新史学尚未走上正确的路向。不过，我们在这混乱的局面下，或多或少已经看出中国史学已逐渐走向释古派一途。最近，郭沫若《先秦学说述林》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册的出版，更指示了中国新史学的方向。我们在这里，已经逐渐看出了新史学定型的憧憬了！谈到这里，我以为史学史的分期应该在人类实际生活中去找根本的原因，同时还要配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如果单从王朝的盛衰兴替来作史学的准绳，那是会变成记载的叙述的旧史学，而不能称为说明的新史学的”。

20日　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成立。

该会由郭沫若、茅盾、马寅初、马叙伦、陶行知、叶圣陶、郑振铎、翦伯赞、胡绳、杜国庠、许新海、周建人、蔡尚思等人发起。

30日　韩振华在《福建文化》总35号发表《日本初割台湾十五年中理番暴行》。

同期还刊载了王新民《礼运大同篇溯源》、赵图南《梁元帝著作考》、吴如周《福建各县沿革表》等文。

是月　蒲韧（胡绳）《二千年间》由开明书店印行。

据胡绳自述，1944—1945年，他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之余，利用大部分精力学习中国历史，做了大量笔记。在此基础上写成许多文章，发表在叶圣陶主持的在教育界和学生中间享有盛誉的杂志《中学生》上。此书是这些文章的结集。

本书最重要的特点是把二千年间的中国历史当作一个整体，从中择取若干重要问题逐一分析。书中对古代中国为什么会产生皇帝乃至人们为何能忍受昏君、做官与当兵是怎样成为皇帝制度的两大支柱、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以及边塞为何屡屡发生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做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叶圣陶非常欣赏这些文章，而吴晗则盛赞本书是“一本有血有肉有灵魂，活生生的书”，并写了一篇长篇书评。吴晗在文中历数种种历史教科书对孩子、青年的虐待，而反观今日的历史读物，教科书体仍然无处不在，令很多人对历史书望而生畏，而这本《二千年间》“正如蜜蜂酿蜜，

是经过消化的，融会贯通，所以可读，也所以不可不读”。吴晗还谈到他们关于根据读者的年龄和兴趣写出三套内容不同又互相配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设想。第一套以人为主，采用故事式的写法，选择每一时代的代表性人物，附带的烘托出这时代的大事；第二套是纵剖面的，以事为主，原原本本具体说出每一事所涉及的事物的衍变、发展，是人的生活的历史、进步的历史；第三套是横剖面的，以时为主，从横的方面去看这一时代，看这一时代的各方面。吴晗认为《二千年间》符合他所设想的第二套的教本，而且比他的设想更成熟、更精炼、更有积极的意义。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册符合第三套的设想，并且更进一步。许立群的《中国史话》近似于第一套。

齐思和在《燕京学报》第 30 期发表《西周地理考》。

齐氏认为中国“古地理之学，不过确定地望而已，即较进步者，亦不过论其形势险要，以求其用兵成败之理，至于地理与文化之关系，则多阙而未论”，此“乃地名簿记之学，犹不足以言地理”。齐思和指出“自人文地理之学兴，然后地理与文化之关系，始可得而解，世人始知各民族文化之特点，往往有地理上之原因”，因为“地理为历史之舞台”。齐思和主张借鉴西方“治地理沿革者”的经验，“以地证史，以史论地，其相互关系，粲然大明”。齐思和鉴于“周初地名，争论尤多，时贤所论，亦多待商”，乃“考其地望，论其形势、穷其土壤气象与历史发展之关系，以说明周初文化之背景，而为古地学辟一新经”。

同期还刊载了阎简弼《南宋六陵遗事正名暨诸攒宫发毁年代考》、翁独健《元典章译语集释》等文。

侯仁之在《燕京学报》第 30 期发表《北平金水河考》。

此文对元明清三代北京金水河的河源、河道变迁、疏导等问题进行考订梳理。洪业对此文的修改颇有帮助，在给作者的信中，认为此文“创获累累”。

傅衣凌在福建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第 2 卷第 1、2 期合刊发表《清末厘金制起源新论》。

文章探讨了清末厘金制推行的社会背景、厘金制的发展原型及其构成、清末厘金制之存立的历史意义等。作者认为厘金制度“乃是适应清末半殖民地的地主经济重建下的一种针对中小生产者的一种征税制度”，其原型“就是仿自中国行会的抽厘与一文愿的成员互相鸠资方式”。

同期还刊载了胡寄馨《宋代银铜矿考》等文。

（法）巴比赛著、徐懋庸译《斯大林传》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

7月

25日　何炳松病逝于上海，享年57岁。

是月　梁方仲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7卷第2期发表《明代粮长制度》。

作者指出明代粮长制度“本身不仅提供了田赋征收方面的种种特殊问题，并且蕴藏着深长的社会和政治的意义”，对这一制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梳理明代财政，也可增加对“中国地方基层组织的形成，以及地主绅粮势力的扩申种种现象”的了解。文章探讨了明代设立粮长的用意、粮长的职责及其特权、粮长制度的衍变、粮长制度的盛衰及其祸害等问题。

该文资料翔实，考证与阐释兼备，为研究明代经济史、社会史必不可少的成果之一。有研究者指出，此文“把王朝制度研究的视角，引向对王朝国家运作的社会机制的关注，开辟了从深入探究基层社会组织和权力结构变动去说明国家历史重大转变的历史研究新路径”，成为明清乡村基层组织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石之一”。

该文此后经过多次修改扩充，于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同期还刊载了吴晗《元史食货志钞法补》、何维凝《明代之盐户》等文。

生活书店开始出版“新中国大学丛书”

抗战时期，生活书店就准备推出一套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的“新中国学术丛书”，抗战胜利后改为“新中国大学丛书”。该丛书《编辑缘起》指出，“抗战胜利结束，民主和平建国开始，为中国开辟了一个空前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旧中国扬弃和新中国诞生的历史转变的大时代。配合着这样一个时代，自然需要一种新的进步学术——适应民主和平建国要求和指导这一时代顺着历史轨迹向前迈进的新学术。从它的本质上讲，这种新时代的学术，首先应当为实现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服务。同时新中国的学术，不只是为中华民族的自由服务，它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世界性的。中国学术界负有与政治经济的建设任务相配合的学术建设的使命”，发行这套丛书，“就是想为这一使命尽我们一分力量”，这套丛书的基本立场，“只是‘学术自由’四个大字”。

“新中国大学丛书”收录的论著都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论著，主要有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册），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沈志远《近代经济学说史》、《新经济学大纲》（增订本），彭迪先《世界经济史纲》，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王剑秋《近代西洋哲学史纲》等。1949年7月，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继续

出版“新中国大学丛书”。

陈国屏《重订加注清门考源》由上海联谊出版社出版。

该书内容有清门的起源、沿革，各帮的组织、分类，香堂规范、清门法规、家庙传录等。初版于 1933 年季秋，再版于 1939 年仲秋。

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由华西大学出版。

该书主要内容有四川的“史前文化”、“巴蜀始末”、“大石文化遗迹”、“广汉文化”、“秦代之开发”、“版岩葬文化”、“汉代四川之政治与社会”、“汉代之建置”、“西南夷始末”、“交通与实业”、“汉墓调查”、“汉墓文化”。

该书作为对“巴蜀文化”开拓性的研究论著，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该书被收入《民国丛书》第 5 编。2004 年，巴蜀书社将此书整理后再版。

8 月

6 日　天津《益世报·史地周刊》开办。

该周刊由“史地周刊社”主编，定位是普及史地知识，主要刊登“与史地有关的知识，如史学思想问题、史地教育问题、世界各地史地、中外传记，以及边疆问题、旅行游记等”。编者指出“只要与一般兴趣有关的，本刊都可容纳。至于太专门太枯燥的考据文章，我们尽量避免刊载”。

25 日　童书业在上海《中国国民》周刊第 1 卷第 4 期发表《“新史学”批判》。

第 5、6 期连载。作者对当时流行的“科学的史学”和“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的“新史学”进行理论批判。现在一般公式主义者所称的“科学的史学”，其实只是“科学”其名而“公式”其实，“史学”其名而“宣传”其实。他们所谓“以社会科学治史”，其实也只是“社会科学”其名而“主义”其实，“治史”其名而“鼓吹主义”其实。

童书业还注意到，最近唯物史观学者、公式主义者迫于理论上的贫困已出现调和迹象，以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为例，已不得不努力于观念论与唯物论的调和，一般性与特殊性的折中。

此文抨击唯物史观，抬高民生史观，具有超越学术论辩进行政治批判的倾向。他指责公式主义用宣传欺骗方式来统制思想，将中国学术引入绝路。尤其是史学，要以主义的公式统制中国的历史，使中国成为无史的国家。他把这些新史学家视为“毁灭中国历史学的恶魔”。他称社会分期为“新‘五德始终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是“经学上的问题”。

是月　青年出版社出版“青年模范丛书”。

该丛书是“乙种青年丛书”的扩展，共分四辑，第一辑为“我国历史上知识青年从军之先例”，收录杜呈祥编著《卫青霍去病》、李旭编著《郑成功》、孔繁霖编著《岳飞》等十部著作；第二辑为“革命先烈奋斗牺牲之事迹”，收录了孔繁霖编著《陈英士》、何伯言编著《黄克强》、《黄花岗》、杜呈祥编著《邹容》、李旭编著《蔡松坡》等八部论著；第三辑为“抗战期中军民忠勇故事”，收录了孔繁霖编著《民间忠勇故事集》等四部论著；第四辑为“远征军青年军生活纪实”，收录罗时暘编著《远征军在前线》、《活跃的青年军》两书。

金毓黻《宋辽金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全书九章，主要内容有“宋之立国”、“宋前之契丹”、“宋与辽之关系”、“宋之变法与党争”、“金之灭辽侵宋”、“南宋对金之和战”、“西夏与宋辽金之关系”、“金与宋之灭亡”。

作者特别在第一章“总论”中探讨了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方法、材料等，认为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应该抛弃以宋为主，辽金不足观的狭隘观念束缚，三史并重，“三史兼治”，“三史互证”。

许地山《国粹与国学》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收录《原始的儒、儒家、儒教》、《清代文考制度》、《国粹与国学》等十三篇论文。

曾资生《中国宗法制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包遵彭《五四运动史》由南京青年出版社出版。

冯子超《中国抗战史》由上海正气书局出版。

9月

16日　上海《益世报·史苑周刊》创刊。

顾颉刚的“发刊词”指出：自五四运动至抗战前，中国的历史研究的巨大成就引起了世界的注意，而战争却把中国的学术工作拖后了20年，必须“重培幼苗，使它可以接上前期的烂漫”。他又指出：“抗战前的史学界，大家投向专的方面，而忽略了通的方面”，“一般民众万想不到他们会和史学发生什么关系。专家的研究是史学界的基石，万万缺少不得；而普及者即是接受专家研究的成果，融汇贯通之后送给一般人看，唤起民族意识，把握现代潮流，都靠在这上了”。将来的史学应当“两条路都走，两种人才都培养，然后可以学尽其用”。

26 日　童书业在上海《东南日报·文史》发表《论神话传说之演变质李季先生》。

1946 年 9—12 月，童书业就古史研究问题与上海的新史学派展开论战。童书业陆续发表《论神话传说之演变质李季先生》、《时代思潮与史学》、《"疑古"、"考古"与"释古"》、《给李季先生一封信》、《新汉学与新史学》等一系列文章。

是月　胡适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汤用彤为文学院长，郑天挺为总务长。

劳榦《秦汉史》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

该书以十一章的篇幅叙述从秦的先祖到蜀汉兴亡的历史。第十二章专叙两汉的学术信仰及物质生活。书末附世系表和年号表。

作者对秦汉史籍和汉简有精深造诣，驾驭史料从容自如。本书重点突出，条理清楚，是一部通俗简要的秦汉史。全书侧重民族疆域和政治制度方面，但疏于社会经济问题的探讨。

胡绳在《新文化》半月刊第 2 卷第 5 期发表《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

作者指出："1940 年以后，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的最沉闷、最艰难的时期，……实际的形势使人更加看出抗战的胜利和中国问题的解决绝不是短期间可以奏效的事，也就逼得人不能不从深远处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实际，由这里来追寻解决中国问题的线索。所以就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研究风气的旺盛。"

此文是对 1941—1945 年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状况的总结。作者列举了 1940 年提出"学术中国化"口号以来中国史研究取得的"丰美的果实"，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吴泽等人的古代史研究，侯外庐、杨荣国等人的思想史研究，华岗、严中平、李平心等人的近百年史研究等，都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成就"不仅表现着历史研究这一个部门内的进步，而且可以说是学术研究风气转移的一个重要契机。学术研究可以认识中国的历史和实际的基础，那才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才能做到学术中国化，才能使洋八股和洋教条完全'休息'下来"。这几年的努力"给今后的学术研究工作开辟了一个新方向"。

作者还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中出现的专题化倾向："采取典型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作深入的研究，以一隅而照见全面，这个方法对于新史观处理历史的研究者，或许还可说是新近学到的方法。以这方法来克服粗枝大叶和概念式的图案的毛病是有效的。这个方法应该是值得继续提

倡的。”

舒宗侨编《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由上海联合画报社印行。

杨熙时《中国政治制度史》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10月

1日　郭沫若在《文艺复兴》第2卷第3期发表《鲁迅与王国维》。

郭沫若指出鲁迅和王国维都“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对于旧学都在幼年储备了相当的积蓄，而又同受了相当严格的科学训练”，虽然他们要成为医学家或物理学家的愿望没有达到，不过他们“用科学的方法来回治旧学或创作，却同样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宋元戏曲史》和《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王国维的力量后来多多用在史学研究方面去了，他的甲骨文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等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些惊人的成绩”。郭沫若认为“大抵两位在整理国故上，除运用科学方法之外，都同样继承了乾嘉学派的遗烈”，并说“就和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一样，鲁迅是新文艺的开山”。郭沫若对于王国维和鲁迅的论断对后世影响颇大，王国维“新史学的开山”这一称号在史学界确立。

16日　胡适在《大公报·文史副刊》发表《〈文史〉的引子》。

《大公报·文史副刊》是胡适主编的副刊，每周一期。此文实际上就是这一副刊的发刊词。胡适指出：“我们用的‘文史’一个名词，可以说是泛指文化史的各个方面。我们当然不想在这个小刊物里讨论文化史的大问题。我们只想就各人平日的兴趣，提出一些范围比较狭小问题，做一点细密的考究，寻求一些我们认为值得讨论的结论。文化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文化史的研究，依我们的愚见，总免不了无数细小问题的解答。高明的思想家尽可以提出各种大假设来做文化史的概括见解。但文史学者的主要工作还只是寻求无数细小问题的细密解答。文化史的写定终得倚靠这种一点一滴的努力。我们没有什么共同的历史观。但我们颇盼望我们自己能够努力做到一条方法上的共同戒律：‘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五分证据，只可说五分的话。有十分证据，才可说十分的话。”

此文发表后引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不满，翦伯赞在《文萃》第二年第16、17期合刊（1947年1月22日）发表《正在泛滥中之史学的反动倾向》一文，批评胡适倡导的“复古的倾向。”

是月　顾颉刚发起成立民众读物社。

顾氏在 1946 年 10 月 9 日致杨向奎信中说："刚前在北平编辑之通俗读物，出六百种，共印五千万册，此一试验决不当令其落空，此一事业在我一切事业中独为伟大。抗战数年，虽此事不能开展，终未尝一日去怀。此次东归，相遇有钱同志，决定在沪续办。上海为出版事业之中心，此举可望其有超出北平之开展。"他在社会教育学院与院长陈礼江、同事董渭川以及马荫良等筹备组织民众读物社，欲集合全院师生之力作社会教育之试验。

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由作家书屋出版。

抗战时期，华岗重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发表了《论中国历史翻案问题》、《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阻滞的基因》等多篇论著。此书即收录此三篇文章。

作者重视对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辨伪，认为"考证学在整个历史学中，乃是主力部队之一，不应该让他局限于旧的岗位，而应该移置在新的战略据点上"，批评那些对史料不下功夫，而仅依据抽象的理论和公式的做法是"拿它当作邮局的图章，乱刻在史料上，结果只能搬演公式的八股文章，并不能具现真实的历史"。同时作者也指出过去的考据学，"缺少了活的神经"，即"科学历史观"，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必须有科学的历史观作指导，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方法论。

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由新华书店出版。

该书叙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发家史，揭露了他们是如何以"国家"、"政府"的名义，用"官商"的形式，在金融、商业、工业、农业、地产、新闻、出版等各方面，将国家的财富变成他们自己的私产，成为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广大民众则陷入一贫如洗、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从而指出：四大家族的统治是中国的耻辱和灾难。

本书在舆论上造成巨大声势，摧毁了国民党上层集团的形象和声誉，成为颠覆消解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一枚重磅炸弹。但书中所引证的资料和数据，来源可疑，可靠性甚低。

此书前后印刷不下数十万册。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分述了香港、檀香山、日本、越南、暹罗、美国、南洋、英国、荷兰殖民地、缅甸、加拿大等地华侨的革命活动，是研究近代中国革命史和华侨史的基本资料之一。1947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此书。

苏联社会科学院编、杜克展译《近代新历史》由读书出版社

出版。

全书三篇十二章，重点叙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

1947年9月，该书又以《近代史教程》由太岳新华书店出版，第2册于1947年11月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

历史研究社编《中国近代史研究纲要》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

11月

28日　童书业在《东南日报·文史周刊》发表《“疑古”、“考古”与“释古”》。

作者认为“近人把研究古史的人分为四派：‘信古’、‘疑古’、‘考古’与‘释古’，这四派之中，除信古者确自成一派外，其他三派其实不能算做‘派’，只能代表研究古史的三个阶段而已”；“我们敢断言：‘疑古’、‘考古’与‘释古’乃是研究古史的三个阶段，是一件工作的三个方面，并不是三个学派”；“无论站在任何立场，抱何种态度去治史，都应该牢守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求真”；“无论站在任何立场，抱何种态度去治史，都应该牢守一个方法，那便是科学的治史方法。怎样的治史方法才是科学的呢？较详细的说起来，第一是尊重客观的事实……第二是重视证据……第三是多用‘归纳法’而少用‘演绎法’”。

是月　金兆梓在《改造杂志》创刊号发表《历史是否是科学》。

金兆梓赞同《大英百科全书》对历史的解释，他说：“照这一解释，物理、生物、社会、艺术、文学、政治无不各各有其变动不居的历史，而历史的范围实已侵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文学的范围。那么，历史之为学，竟是一切学问的综合，固然不属于哲学、文学，自也不属于科学，所以说‘历史只是历史’。”

童书业《春秋史》由开明书店出版。

此书原稿是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所授春秋史讲义，由童书业代笔，1941年写就。

本书分“正文”、“考证”两部分，正文用叙述体，文字以浅显为主，除必不得已处，不引原文。考证部分拟模仿崔东壁《考信录》的体例，定名《春秋考信录》，与正文可分可合。此次出版的是正文部分。作者说主张：“凡著通史，每一件大事都应该详其来龙去脉；每一个时代的前后关系，不可割断。”所以本书以春秋的历史为中心，而附带述及太古至西周的历史。另有《战国史略》一章附在最后，因避免与杨宽书重复而删去。1966年童氏回顾说，他在序言中未曾涉及的一点是，在写这部断代史时

已开始用经济史观解释历史了。

吕思勉在序言中评价说："其体例极谨严，而文字极通俗。征引古书，率多隐括其辞，出以己意，盖今世史家之例然也。……以余所见，言春秋者，考索之精，去取之慎，盖未有逾于此书者矣。"1989 年李学勤在《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中说："就专著而言，迄今还没有代替建国前出版的童书业《春秋史》这一部书。"

朱伯康、祝慈寿《中国经济史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国立中央大学经济学会丛书"之一。

此书是中国第一部从古代叙述至近代的中国经济史专著，作者在"自序"中指出该书"取材着笔之际，恒求其有新异性、发展性，能作各时代经济轮廓上之区别者为限"，而对于无关经济性质改变的"共同现象"，则略而不述，以免成为"对历史大势进展之了解"的累赘。

本书"导论"，讨论中国历史和经济史各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正文分上古经济、中古经济、近代经济等，按朝代顺序记述经济发展的历史。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四川南溪李庄迁回南京。

12 月

12 日　童书业在《东南日报·文史周刊》发表《给李季先生一封信》。

作者云："我现在依旧承认考据是治史的正当方法之一，依旧承认不经过考据的阶段，历史的真相是无法出现的。""我们所用的考据方法，以史料为依据，以假设求证为步骤，而以求真为目的。"

是月　鸟居龙藏在《燕京学报》第 31 期发表《中国石棚之研究》。

作者认为"中国考古学界对于史前陶器之研究颇盛，而对于巨石文化研究，则尚付阙如，实属遗憾，甚盼今后能开一新纪元"，乃先作此文以先导。文章分"世界中之石棚分布"、"朝鲜之石棚"、"日本之石棚"、"辽东半岛之石棚"、"山东省之石棚"等几部分。

同期还刊载了钟凤年《战国时代秦疆域考辨》、容媛《汉代谷城长荡阴令张迁表颂集释》等文。

周祖谟在《辅仁学志》第 14 卷第 1、2 期合刊出版《宋亡后仕元之儒学教授》。

文章内容有"宋亡后元止搜访遗逸"、"元之儒官及出仕之山长学

正”、“出仕之儒学教授”、“出仕之原因”、“出仕后之自悔”、“诸公出仕之评论”。该文在元代学官研究等领域有重要影响。也有研究指出，此文与社会现实有关，系作者有感而发。

同期还刊载了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下），岑仲勉《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弥天释道安著作辑目》，启功《急就篇章草本考》、魏建功《草书在文字学上之新认识》等文。

张舜徽《积石丛稿》在兰州壮佚轩出版。

该书包括《汉书艺文志释例》、《毛诗故训传释例》、《扬州阮氏学记》、《乾嘉三通偶传》等内容。

彭泽益《太平天国革命思潮》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范任宇《民生史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傅衣凌在福建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第2卷第3、4期合刊发表《论乡族集团对中国封建经济之干涉》。

是年

（德）傅吾康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6卷发表《中日战争期中后方之汉学研究》。

作者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外籍教授，是抗战期间中国后方学术研究的亲历者。作者首先指出，尽管中国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在1937—1945年间遭受了世界上最严重的损失，学者们治学条件极端艰苦，但是完成了一些研究成果。文章将他认为“含有汉学研究新成就的出版物”分为“书目文献研究”、“哲学与宗教”、“语言研究”、“文学研究”、“考古学、上古史、天文学”、“历史和地理研究”、“民族学与民间文学——艺术史”、“西南边疆研究”几类进行概述和罗列。

本文是对抗战时期学术研究的首次梳理，但由于是英文写作，故在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领域影响不大。该文后被王启龙译补为《抗战期间（1937—1945）中国后方的学术研究》（载《国际汉学》第15期，2007年）。

同期还刊载了缪钺《〈吕氏春秋〉撰著考》，刘铭恕《崖墓稽古录》、《辽代帝后之再生仪》、《宋代辽金文化之南渐》，徐益棠《南京之人文区域》、《南京紫竹林与古代分科大学》等文。

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纲要》由文通书局出版。

此书是在《中国回教小史》的基础上加以完善而成的，是一部通俗性

读物。全书计划“专给高小、初中学生阅读或作教材用”，故采取教材的形式，分为二十部分，每部分后附有相关习题和参考书举要。该书后被翻译为法文出版。

1948 年 11 月，白寿彝又编辑出版了《〈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

秋，钱穆赴昆明主持五华书院文史研究所。

钱穆在此讲授“中国思想史”等课，并在云南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

顾颉刚归苏州，任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9 月始，授图书博物馆系“中国目录学”课、社会事业系“中国古代社会史”课。

范文澜、陈伯达《曾国藩与袁世凯》由华中新华出版社出版。

白寿彝在昆明五华书院演讲《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

此讲演破史书体裁风俗，另立新意，是作者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关于史学史方面的意见。讲词见《文讯》月刊 1946 年新 10 号。

1947 年

※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出版。
※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出版。
※ 翦伯赞著《中国史纲》第 2 卷（秦汉史）出版。
※ 吕思勉《秦汉史》出版。
※ 侯外庐、杜守素、纪玄冰（赵纪彬）《中国思想通史》第 1 卷出版。
※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出版。
※ 潘光旦、费孝通发表《科举与社会流动》。
※ 孟森《清史讲义》出版。
※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出版。
※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出版。
※ 徐炳昶、苏秉琦发表《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

1 月

1 日　蔡尚思在《中国建设》第 3 卷第 4 期发表《战后中国思想学术论争》。

8 日　胡厚宣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甲骨学提纲》。

22 日　翦伯赞在《文萃》第 16、17 期合刊发表《正在泛滥中之史学的反动倾向》。

文章批评胡适等人企图将中国史学拉回到考据的路子上，认为这是有政治目的的“愚民政策”表现之一，“企图以腐朽的古典学派作武器，进攻科学历史学派的城堡”。胡适这个美国的文化奴才，之所以提倡考据史学，是“因为这个学派具有回避现实，学以为学的传统，足以愚弄青年，

僵化青年。他告诉青年，治史的目的，不是为了致用，而是为了娱乐；不是为了从历史上吸收经验与教训，而是昏迷于废纸堆中，不省人事。这样习而久之，一个青年便会变成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废物，便会变成不辨黑白、不辨是非的呆子，从而他们就会把独裁当民主，把人民当土匪，把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当‘法律问题’，特别会把《水经注》当作最了不得的学问。这样，一个青年便会白首寒窗而至死不通。结果，和蠹鱼一样葬身于断简残篇之中”。

是月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作为“当代中国学术丛书”之一由南京胜利出版公司出版。

本书由方诗铭、童书业分别起草，顾颉刚总改定。包括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三编。

作者认为，前期史学的发展，自鸦片战争以迄民国成立，一方面仍沿循乾嘉以来的治学路数，注重历代正史的考证、续补或改作，同时也萌生了三种新趋势，即金石学的考索、元史和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以及经今文学的复兴。后期自民国迄于抗战胜利，除继承前期成绩外，又拓展出考古学和史前史、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敦煌学、小说戏曲俗文学和社会史等六个新方向。后期史学取得显著进步的原因在于：一、输入了西洋近代的科学治史方法；二、输入了西洋新史观如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等；三、新史料的大量发现；四、受欧美日本汉学研究进步的促动；五、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影响。并指出：“中国史学进步最迅速的时期，是五四运动以后到抗战以前的二十年中。这短短的一个时期，使中国的史学，由破坏的进步进展到建设的进步；由笼统的研究进展到分门的精密的研究；新面目层出不穷，或由专门而发展到通俗，或由普通而发展到专门；其门类之多，人材之众，都超出于其他各种学术之上。”

作为第一部系统论述1845年以来百年中国史学的专著，该书视野宽广，举证丰富，既突出主流，又包容各派，广义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尽收眼底，描绘了中国史学由旧转新的历程。如顾颉刚自己所言“对于百年中最有成绩的学术——史学来作一个总结算”，对当代史学各重要分支学科的成就及著作分门别类的介绍和评论，有着重要的学术史参考意义。但本书讨论的重心仍在文献史料学方面。

“当代中国学术丛书”由潘公展、叶溯中主编，除此书外还收录贺麟《当代中国哲学》（1945年11月）、杨幼炯《当代中国政治学》（1947年1月）、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1948年5月）等书。

《历史与文化》双月刊创刊。

此刊是南京历史与文化双月刊社创办的文史综合性刊物。它侧重研讨中国历史与文化问题，刊载有关中国古代史及传统文化的学术论文，介绍历史和文化知识，提倡恢复孔孟儒学道统；栏目有通论、专论、杂论、中国古代史等。

南京市通志馆开始编印“南京文献”。

该文献收录盛时泰《牛首山志》（1947 年 1 月）、陈沂《金陵古今图考》（1947 年 4 月）、夏仁虎《秦淮志》（1948 年 12 月）等 20 余种论著文献。

詹竟烈《唯生论与民生史观》由广州中南印刷所出版。

作者认为唯生论和民生史观是“人类智识论的最高发展”。

方豪编著《世界史大纲》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

晨风在《岭南学报》第 7 卷第 1 期发表《一八九五年台湾民主运动失败之原因》。

2 月

国防部史政局开始编印“战史丛刊”。

该丛刊收录（美）马歇尔著、裴元俊等译《马歇尔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报告书简编》（1947 年 2 月），谢爱群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事记》（1947 年 2 月），王镇编译《日军登陆作战》（1947 年 2 月），詹宣国等编绘《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图解》（1947 年 3 月），国防研究院编译组《挪威战役》（1947 年 2 月），曾国杰等编《抗战军人忠烈录》（1948 年 3 月）等著作。

黄维荣编著《外国史》5 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张孟闻撰《中国科学史举隅》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

杨东莼编《开明新编高级本国史》上下册由开明书店出版。

3 月

1 日　大夏大学历史社会研究所编辑《历史社会季刊》创刊。

杜佐周在《发刊辞》中提出“社会科学的新使命”是“启发人类走向光明途径”。

此期刊载了吴泽《龙山小屯仰韶文化与夏殷民族渊源考》、蔡仪《从汉莫拉比法典看巴比伦的奴隶》、郑安仑《儒家的社会思想》、刘育松

《水浒传的社会思想研究》等历史类论文及秦和鸣《吴泽中国历史简编传后》、蒋钟《读翦著中国史纲后》两篇书评。

12 日　向达在上海《大公报·图书周刊》第 10 期发表《西征小记》。

第 11—14 期连载。该文是对河西地区古代遗址和敦煌写本的实地调查笔记和相关问题的初步考证，向达此后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等研究论文。

30 日　廖元善在《福建文化》总 36 号发表《中国古琴考》。

是月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由新华书店出版。

1941 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做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依据号召，1943 年党中央组织人力，分头编写四部著作，具体分工是：经济史陈伯达，政治史范文澜，军事史郭化若，文化史欧阳山。范文澜接受任务后，搁置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下册的计划，全力投入近百年政治史的撰作。原拟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上下两编。1945 年冬范文澜离开延安时，上编写到义和团运动，手稿由叶蠖生整理。他原计划将"中国近代史"部分作为《中国通史简编》的下册，但此书是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一部分，只叙述重大政治事件，与《中国通史简编》上、中册的体例并不一致，因而题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

本书起自 1840 年，终于 1901 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是本书的重点。该书注重揭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宣扬爱国主义。另一重点是突出阶级斗争，高度评价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的功绩，歌颂人民的革命运动。

此书"所奠定的基本框架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论断，影响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例如，关于"洋务派"的概念及定性，后来为学界普遍接受。刘大年认为，此书"用科学观点为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了一个头"。戴逸认为，此书与作者的《中国通史简编》全面地、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的全部历史，教育、影响了后代的历史学家，也教育影响了当时千千万万的革命者。陈其泰认为，两书的撰成出版"是中国史学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工作的大事件"。不过，书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演变过程、关键缺少详细考察，并流露出大汉族主义倾向，有借史说今、简单比附的现象，如将清朝说成是异族统治，以曾国

藩比附蒋介石，称其为“内战能手”、“出卖民族的汉奸”等。

1947年9月，华北新华书店重印《中国通史简编》，将原来的上、中册分编为六册，已出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作为《中国通史简编》第七册和第八册，合为一书刊行。但后来仍题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单独出版。苏联曾出版此书俄译本。

翦伯赞著《中国史纲》第2卷（秦汉史）由重庆大孚出版公司出版。

全书分两篇：一、中期封建社会的序幕，分四章述秦族建国渊源，秦代社会经济结构，政权性质、组织及发展与灭亡，意识形态及其变化。二、中期封建社会的确立与展开，分七章述西汉王朝之建立及其历史形势，两汉之社会经济构造，政权之性质、组织、发展及其崩溃，两汉之意识形态。

这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秦汉史专著，同时也是第一部秦汉通史。作者在序中说：“秦汉的历史直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看到一部完整的科学的专著；有之，只是以一个章目列于诸家通史之中。”而本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广征各种文献以及简牍、汉画像砖石、碑刻、封泥等文物考古资料，在秦汉社会性质、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社会文化、阶级斗争、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历史地位与作用等方面都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作者富有诗意的叙事语言在凸现学术个性的同时，也吸引了许多并非史学专业的读者”。

该书也存在一些不成熟之处，如对秦汉商业资本的作用作了夸大的估计，对刘邦、王充等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因过分依赖阶级分析法而失之偏颇，还有某些史实不准确等。1947年6月安志敏在《燕京学报》第32期批评说：1. 考古资料之不足。2. 忽视人类学、考古学之研究，对民种问题妄加臆断。3. 叙述之误谬。4. 插图缺出处及说明。“此书共达四十五万言，著者用力之劬，固令人钦佩，惜依据资料太少，未能充分利用考古资料，兼以个人主见其深，致歪曲事实颇多。对中外学者研究之结果，既未能充分利用，而个人之见解，又多无所根据，遂致虚耗精力，徒费篇幅，此古人所以深戒‘不知而作’欤?”

1959年后，张传玺在翦伯赞指导下对此书进行全面修订补充，于198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誉为“近四十年来大陆出版的水平最高的一部《秦汉史》”。

吕思勉《秦汉史》由开明书店出版。

全书共20章，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按时间顺序分12章，叙述秦汉

至三国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的发展，既钩稽史实，又有考辨和评论。第二部分用 8 章 47 节，分门别类地对秦汉时社会组织、社会等级、人民生计情况、实业、人民生活、政治制度、学术、宗教进行探讨。

本书取材丰富而精审，叙事明晰周详。吕氏自谓："此书自问叙西汉人主张改革，直至新莽；及汉武帝之尊崇儒术，为不改革社会制度而转入观念论之开端；儒术之兴之真相；秦汉时物价，及其时富人及工赀之数；选举、刑法、宗教各章节，均有特色。"本书缺点一是未利用考古资料，二是引用古文不标明出处。

刘燿（尹达）在《中国考古学报》第 2 册发表《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

该学报标"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三"，即《田野考古报告》第 2 册。《北方杂志》第 2 卷第 1、2 期同时刊载此文。作者 1937 年 7 月所撰。

此文最早指出仰韶村遗址包含着龙山和仰韶两种不同系统的文化遗存，而安特生所说的"仰韶文化"混淆了二者，"实有加以纠正的必要"。作者依据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大量考古学发现，从后冈等遗址的文化堆积关系，厘定了仰韶、龙山、小屯文化的历史发展顺序，从而否定了曾风行一时的安特生的甘肃远古时代六期划分说。

郭沫若、侯外庐、李平心、杜国庠等推动上海《文汇报》副刊全面改革。

创办了《新思潮》、《新社会》、《新经济》、《新文艺》、《新教育》、《新科学》等六个周刊，其中侯外庐主编的《新思潮》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己任，撰稿者有郭沫若、杜国庠、胡绳、周谷城、蔡尚思、赵纪彬等。5 月 24 日由于《文汇报》被禁而停刊。

叶圣陶主编《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由开明书店出版。

该书收录浦江清《花蕊夫人宫词考证》、郭沫若《考古记的年代与国别》、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王了一《新训诂学》、顾颉刚《辛未访古日记》、翦伯赞《台湾番族考》等九篇文章。

聂崇岐在《现代知识》第 1 卷第 11 期发表《对现在史学界几句诤言》。

作者说："我不反对考据，因为好些史事，非考据无以明真象，就是支离琐碎些，也胜于吞枣。但既搞考据，就应当切切实实的做，不可投机取巧。……我也不反对所谓'科学的历史'，以唯物史观去解释历史。但解释需要有充分的根据，客观的态度，不应当就薄弱的证据立下定论。"

李俊《中国宰相制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月

李源澄《秦汉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由作者在浙江大学、四川大学讲授秦汉史的讲义改写而成。全书分23部分，前15部分以帝王朝代系目，如“始皇二世”、“武帝”等。后8部分分类立目，如“政治思想”、“社会风尚”等。全书夹叙夹议，语体近于文言，不用考古材料，概念术语也多采自传统，不合近代学风。

方壮猷《中国史学概要》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

本书实际上是中国史学史。分中国史学之起源、纪传史、编年体、纪事本末、制度文物史、方志与家谱等七章，对中国古代的代表性史体和史学典籍作了评价。

杨幼炯《中国近代政治思潮论》由重庆青年出版社出版。

龚稷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料》由佳木斯东北书店出版。

5月

翦伯赞《中国史论集》第2辑由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

收集作者1943年至1945年间的代表性论文，共18篇。

《方豪文录》由北平上智编译馆出版。

此书系方豪将有关明清之际天主教东传以及中西交通史方面的论文汇编而成。

曹聚仁、舒中侨编《中国抗战画史》由上海联合画报社出版。

6月

齐思和在《燕京学报》第32期发表《周代锡命礼考》。

作者认为，周代封建诸侯大夫被“封建命官”时的“极隆重之典礼”——“锡命”礼，“于封建制度所关极要”，如果此礼不明，则“吾人于古代封建制度绝难了解”，故“征引故籍，稽诸金文，于此问题，重加考订，并旁考西洋封建制度，以资比较”，以为“究心古史者之一助”。此文对“锡命礼”的仪式、内容、“王臣之典礼”、“诸侯之典礼”、“嗣位诸侯之典礼”、“春秋时代王室之锡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该文推动了对中国封建制度的认识，被视为是齐思和的代表作之一。

同期还刊载了钟凤年《水经注校补质疑》、周一良《能仁与仁祠》等文。

聂崇岐在《燕京学报》第 32 期发表《满官汉释》。

聂崇岐在《满官汉释》一文中依据《清文监》、《清文总汇》等书，“取习见之满音官爵，加以诠释”，对研究清代职官、政治制度有不小的助益。

傅衣凌在《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第 2 期发表《明代徽商考》。

该文对明代徽商发生的地理背景、经营领域、活动地点、资本出路、徽商在商业史上的地位及其所代表的商业资本的类型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梳理。该文被认为是徽商研究的开山之作。

此文下标“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傅氏同一系列的论文还有《明代江苏洞庭商人考》(《社会科学》第 4 卷第 2 期)、《清代前期东南洋铜商考》(《社会科学》第 4 卷第 3 期)、《明代陕西商人考略》(《社会科学》第 4 卷第 4 期）等。

王庸《中国地理图籍丛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分甲乙编，甲编收录《明代总舆图绘考》、《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明代海防图籍录》三篇论文，乙编收录《〈中国地理学史〉订补》、《中国历史上地图与军政之关系》、《中国历史上之土地疆域图》等五篇文章，甲乙编外有一附录《明代倭寇史籍志目》。书中所收文字，皆在此前发表过，但作者在结集出版时又多有校订增改。

1956 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修订版。

郑振铎编《中国历史参考图谱》(1—20 册）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内容为上古至明末的出土文物、文史遗迹、人物图像等照片。本书第 21—24 册于 1950 年出版。

董家遵在福建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杂志第 3 卷第 1、2 期合刊发表《古姓与生肖同为图腾考》。

作者认为，“我国主要的古姓，就是十二个图腾兽的别称”，“先秦的古姓，实是图腾的蜕变，现今的生肖也是图腾的遗迹”。

同期还刊载了傅衣凌《伴当小考》、胡寄馨《明代的矿贼和盐盗》等文。

胡华《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略》由冀中新华书店出版。

卷首有成仿吾序言。

傅斯年因高血压病赴美就医。

1948年夏回国，8月抵上海。

许同莘编著《公牍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冯瑶林《中国文化输入日本考》刊行。

彭雨新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第1期发表《清末中央各省财政关系》。

7月

容庚在《岭南学报》第7卷第2期发表《甲骨学概况》。

本文从甲骨文的发现、甲骨文研究者、甲骨文研究著作（分为文字类、考释类、杂著类、字书类、目录类）三个方面对清末民国甲骨学史进行了概括，被认为是“甲骨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该文另一常被人重视处在于对王国维之死的记述。

同期还刊载了冼玉清《苏轼居儋之友生》、罗福颐《敦煌石室稽古录》、曾昭璇《秦郡考》等文。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甲种18”。

作者对湘西苗族的田野调查始于1933年，参与调查的还有勇士衡。

姜蕴刚《中国古代社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朱琳编《洪门志》由中华书局出版。

周予同《本国史》4册由开明书店出版。

8月

侯外庐、杜守素、纪玄冰（赵纪彬）《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

1946年春，新知书店准备出版“新中国大学丛书”，向侯外庐约稿。他与杜国庠、赵纪彬、陈家康商定，合著一部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不久即完成该书第1卷。从该书第2、3卷起，邱汉生开始参与撰著工作。1947年，为躲避国民党迫害，侯外庐、杜国庠移居香港，赵纪彬到青岛，邱汉生留上海。他们在上海完成第2卷后，分别在各地撰就第3卷，稿件

集中到上海，由邱汉生保管，至建国初期得以继续出版。

第 1 卷时限为殷商至战国。此卷以侯著《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为基本框架，融会了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与赵纪彬《古代儒家哲学批判》中的观点和材料，综合了先秦思想史研究各方面的成就，论述了殷周礼乐文明、孔墨显学与诸子百家之学，其中对先秦逻辑思想史的掘发尤为深入。

《中国思想通史》前三卷贯彻哲学思想研究中的党性原则，凸显司马迁、王充、范缜等唯物主义思想家，注重阐述思想史上正统思想与异端思想的对立和斗争及其意义。前三卷均有相应的社会史研究作基础，具有系统、连贯的社会背景分析。

侯外庐将此书的撰写原则总结为五点：一、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二、思想史、哲学史出现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怎样的先后不同。范畴往往掩盖着思想实质，如何分清主观思想与客观范畴之间的区别。三、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形成，其间有什么关系。四、各学派之间的相互批判与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条理。五、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关联，但是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如何明确其间的主导与从属的关系。这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是作者在成名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基础上增写而成，起于鸦片战争，止于北伐战争。李剑农在此书中将这百年中国史分为三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是列强入侵、新思想酝酿的时代；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革命势力不断发展、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时代；从民国成立到北伐战争是革命势力与清残余的军阀势力斗争的时代。

由于资料翔实、叙事生动和分析深刻，该书出版后不仅轰动一时，而且长期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费正清认为该书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最清晰的唯一全面的评述”，西方的研究学者可将其“作为一种可靠的纪事史和重要资料的简编”。

该书 1942 年由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史地学会印行，1946 年蓝田启明书局又印行线装版，经商务印书馆 1947 年出版发行后始大面积传播。由于该书的广大影响，海内外有多种版本，仅 2000 年以后，中国内地就有复旦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等版本。1956 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英译本，1964 年该书又出版新德里版。

侯外庐在《大学》第 6 卷第 3、4 期合刊发表《汉代社会新论》。

作者论述秦汉生产方式的变化，“汉代政权与世族”、“劳动力的血族联系”、“农村支配城市”、“超经济剥削”等社会制度方面的特点。

1950年5月，作者在此文基础上撰成《汉代社会史绪论》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褚柏思《人物中心中国政治史》由白雪出版社出版。

解文超《中国革命史纲》由长春胜力图书公司出版。

杨松、邓力群编《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1集由上海读书出版社出版。

9月

1日　翦伯赞在《历史社会季刊》第1卷第2期发表《魏晋时代之塔里木盆地及其与中国之关系》。

23日　顾颉刚致信白寿彝谈编辑中国通史及“古籍汇刊”事。

其中谈到，“范文澜、翦伯赞们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他想以文史杂志社的名义发起编辑“中国通史”：“集合各方面有专长而又能合作的人，那些是作哲学理论的，那些是作材料的搜集的，那些是能作问题的考订的，那些是能作叙述的文辞的，各各予以适当的安置。”

顾氏又想为文通书局编辑“古籍汇刊”，信中说：“这是我卅年前就立下的志愿，在柏溪时已做了不少，只要有人帮我，一年中可出几十种。商务出《四部丛刊》，只介绍了古本，中华出《四部备要》，只介绍了聚珍版，王云五编的《丛书集成》，点句大错，闹了极多的笑话，这整理古书的事本不是上海商人所能做的。我们在古书里钻了多少年，有资格做了，只要文通有力量出，这一炮一定放得响。”除此之外，他还想在15年内编辑《古史辨》若干，并自编文集及写自传。

是月　岑仲勉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本发表《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白氏长庆集伪文》、《白集醉吟先生墓志铭存疑》等文。

这几篇文章对白居易文集的编定的经过、版本源流、作品真伪等进行了周密详尽的考证，为进一步研究白居易及唐代文学史提供了便利。文章发表后，对学术界产生了不小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花房英树撰写了《关于岑仲勉先生的白氏长庆集研究》长文，称赞岑氏的研究“实在是充实的著作”。

同期还刊载了岑仲勉《唐集质疑》、《读全唐诗札记》、《跋封氏闻见记》、《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胡厚宣《卜辞同文例》，全汉升《宋代南方的虚市》，李光涛《清人入关前求款之始末》等文。

顾颉刚、丁君匋主编“中国历史故事小丛书”由上海大中国图书局出版。

该丛书收录了纪庸编辑的《商鞅变法》、《诸葛亮六出祁山》、《吴起和孙膑》，顾德辉编辑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蔺相如完璧归赵》等书。

斯维至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卷发表《两周金文所见职官考》。

文章以两周金文为主要资料，辅以典籍记载，考证两周之职官，计有“宰”、“大宰”、“善夫”、“䙴”、“小臣”、“楚”、“里君”、“小子”、“大史”、“内史”等67个，后附《两周金文所见职名职掌表》。通过对比研究，作者认为“《周礼》所言职官之名称及其职掌，实与金文往往契合，但其言六官之系统，则非古制”。

有研究认为，此文在郭沫若《周官质疑》的基础上，“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许多精彩的见解，如西周为两寮执政宰本小臣等，为进一步探研金文职官打下了基础”，但是该文也存在将西周的金文材料与春秋战国的金文材料混为一谈等缺陷。

同期还刊载了徐益棠《中国南北之人口升降》，刘铭恕《元代之户口青册》、《宋代陷北之美术考古家毕少董》、《辽代之头鹅宴与头鱼宴》、《金元之南家与宋代之口语文学》，（德）傅吾康《明史要目解题初稿》等文。

《文化先锋》第6卷第16期刊载蒋星煜对顾颉刚的采访《顾颉刚论现代中国史学与史学家》。

顾氏在回答“现代中国史学家是不是有明显的流派存在”时指出：“严格地说，明显的流派是不存在的，以前有人勉强分出疑古派释古派等等，其实疑古是手段释古是目的，这种方法很不合理。又如陶希圣、郭沫若、翦伯赞同是以唯物史观来理解中国历史的，但各人所得的结论距离很远，未便归纳在一个流派里面。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以北平为中心的史学家，重实际而注意细节，往往失之琐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上海为中心的史学家，重概括而追求完整，往往失之空洞，只见森林而不见树木，最好是能有梁任公那样集大成的史学家出现，可以综合各方面的研究心得，再予以系统的整理，则中国史学当有辉煌的发展。”

王文杰《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由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出版。

徐浩《廿五史论纲》由世界书局出版。

10 月

27 日　翦伯赞因避免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从上海到达香港。

翦伯赞到达香港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下应聘为达德学院的历史学教授。在翦伯赞到达香港的前后一段时间，郭沫若、侯外庐、矛盾、千家驹等一批左派文化人士都到达香港。香港一时成为左派文化人士的中心。

是月　孟森《清史讲义》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

30 年代孟森在北京大学授课时，撰有《明清史讲义》，清史部分单独印行，名为《清史讲义》。

《清史讲义》分两编，主要是对入关以来至咸同时期清朝历史的论述。该书强调要公正评价清代的历史地位："近日浅学之士，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既认为仇敌，即无代为修史之任务。若已认为应代修史，即认为现代所继承之前代，尊重现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前代，而后觉承统之有自。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革命时之鼓煽种族以作敌忾之气，乃军旅之事，非学问之事也。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由新知书店出版。

此书是侯外庐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和《苏联历史学界诸争论解答》中有关先秦社会史的内容抽出、修改和增加了许多新的论证而成，如补充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在理论上对中国奴隶社会特殊性的论证。该书从社会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制度（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氏族制的残存等）、阶级关系（"国人"阶级和商人阶级等）和思想意识发展等各方面，证明中国古代历史确实经历过奴隶制社会阶段，并在文明发展路径上表现出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此书是侯外庐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代表著作，1955 年 6 月人民出版社修订再版时更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潘光旦、费孝通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 4 卷第 1 期发表《科举与社会流动》。

作者认为"研究中国社会结构时，我们不能依一己的好恶，任意根据一部分的事实作我们理论的基础"，而是要依据材料进行精确的研究。此

文主要是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量化分析、差异分析等，对从清康熙至宣统年间915本朱墨卷进行分析，企图探讨科举对社会流动的影响，特别是父代功名与子代功名的关系、城乡分割的影响等。此文既是关于“中国士大夫”研究的开拓性成果，也是社会史研究的典范之作，刊发后在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同期还刊载了戴世光《统计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雷海宗《春秋时代政治与社会》等文。

陈寅恪在《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发表《长恨歌笺证》。

该文下标“元白诗笺证稿之一”。陈氏首先指出，欲了解《长恨歌》，“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第二，须知当时文人之关系”。作者认为，“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是和唐代古文同一起源的新文体，“不独流行当时，复更辗转为后来所则效”，从此可知陈鸿的《长恨歌传》与白居易的《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并认为“白陈之长恨歌及传，实受李元之莺莺歌及传之影响，而微之之连昌宫词，又受白陈之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其间因革演化之迹，显然可见”，但《长恨歌》“本身无真正收结，无作诗缘起，实不能脱离传文而独立也”，元稹《连昌宫词》虽深受《长恨歌》影响，但却“成一新体，使之自成一独立完整之机构”。在陈氏看来，“长恨歌为具备众体体裁之唐代小说中之歌诗部分，与长恨歌传为不可分离独立之作品，故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明皇与杨妃之关系，虽为唐世文人公开共同习作诗文之题目，而增入汉武帝李夫人故事，乃白陈之所独创，诗句传文之佳胜，实职是之故。此论长恨歌者不可不知也”。

陈寅恪在1944年致陈槃信中说：“弟近草成一书，名曰‘元白诗笺证’，意在阐述唐代社会史事，非敢说诗也。弟前作两书，一论唐代制度，一论唐代政治，此书则言唐代社会风俗耳。”此文即是1950年出版的《元白诗笺证》一书的第一部分的初稿。

陈文发表后，一些学者对陈氏观点提出质疑（1949年，夏承焘撰《读〈长恨歌〉——兼评陈寅恪教授之笺证》，1963年吴庚舜发表《唐代传奇繁荣的原因》），认为陈氏所谓“歌”、“传”为共同体的看法是错误的，二者实际是各自独立的体裁。后黄永年又撰写《〈长恨歌〉新解》。

陈氏在文中考证杨玉环入宫前是否是处女问题，后被钱钟书等人讥讽为繁琐考据的代表例证之一。

同期还刊载了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许维遹《飨礼考》、陈梦家《尧典为秦官本尚书说》等文。

《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由北平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联合出版。

此目录共收有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藏15000余册汉文黄册。书前有1936年2月1日蔡元培为《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所作序，蔡元培认为此书对阅览者提供便利，“有功史学，夫岂浅鲜”。另附单士魁、王梅庄《叙录》，郑天挺《后序》。

金兆梓《近代中国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11月

5日　童书业在《中央日报·文物》周刊发表《实物史料与文献史料》。

文中列举历代文献中诸如服饰、器用、建筑之样式、变迁，皆可用考古作补充考据，提出“必须把文献史料与实物史料配合起来，把二重证据法应用到一般历史上去，才能适应现代世界的史学潮流。”

从1946年起，童氏已在此刊上发表了因考古发现而作的20余篇考据文章。

15日　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第四次大会提名院士候选人。

胡适、唐兰、杨树达、李剑农、陈垣、陈寅恪、傅斯年、蒋廷黻、顾颉刚、李济、郭沫若、董作宾、徐中舒等获“人文组”提名。

是月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系吴文藻主编《社会学丛刊》甲集第5种，原为作者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中国法制史和社会史”讲稿。

作者认为：“法律是社会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它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路、伦理等价值观念，它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我们不能像分析学派那样将法律看成一种孤立的存在，而忽略其余社会的关系。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

该书依据大量个案和判例，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及其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探讨了家族、婚姻、社会阶级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宗教对法律的影响、儒家法家思想与法律的关系、中国古代法律自汉至清有无重大变化等问题。

该书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华书局1981年、2003年再版该书。2004年，该书又被收入《瞿同祖法学论

著集》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20 世纪 50 年代，瞿同祖在哥伦比亚大学将此书译成英文，并利用哥大图书馆的丰富馆藏，扩充为《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收入法国巴黎大学高等研究实用学院经济与社会科学部《海外世界：过去和现在》丛书，1961 年由巴黎和海牙穆东书店出版。

英文版的问世，受到国际汉学界的广泛关注。有人撰文指出此书“中文原作是中国法制史研究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向中国读者提出了创新的观点”，“是西文中关于中国法律最好的一本书”；还有人认为“此书原著是一部标准的中文参考书，它对一切研究中国法律的学者都有影响，并将继续影响他们……此书有丰富的重要资料，组织完善，论证精辟，研究传统中国的学者都深受其益”；《哈佛亚洲研究学刊》1963 年的文章则指出此书“不仅阐明了法律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并且对社会结构性质的理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月初，侯外庐为躲避迫害，从上海赴香港，与同在此地的郭沫若、翦伯赞多有往来。

12 月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是潘光旦利用家谱、方志等历史资料研究中国宗族、人才问题的尝试，他将研究的时间、地点、对象进行严格限定后，并从家谱、方志、行状墓志、会乡试试卷等处收集资料，在实证分析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望族血系分图、血缘网络图、世泽流衍图，再运用遗传学和社会学的理论阐释了明清两代嘉兴望族的世代连绵、婚姻关系和人才蝉联的关系。该书既是人类学的研究，也是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

徐炳昶、苏秉琦在《史学集刊》第 5 期发表《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

作者指出，“近几年因为研究我国传说时代的古史，深切感觉到史学方法对于此一部分的古史有特别的重要。因为近二三十年用科学方法整理古史材料的口号提出以后，贡献最大的，无疑义的是那一班疑古派的先生们。不过他们把事情看得太简单，把真正历史时代限于殷墟时期以后固然不错，可是他们把从前的自炎黄至商中叶的传说时代，一笔抹杀，送它到神话区域里面封锁起来，却是大错而特错的”；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从神话时代到历史时代的实在过渡”，所以“必需要把这一部分半神话、半历史的传说整理清楚，才可以把我们黎明时期的历史大略画出轮廓，才

可以把我们的史前史同真正的历史中间搭上一坐联络的桥梁”；此前关于史前史的研究“不能得到共同承认的结果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没有预先找出来一个共同承认的办法”，故“就想着把我作研究时所用的方法拿出来同大家商榷，以求得一个共同的出发点”。

文章认为“从传说材料的整理研究来解决我们传说时代的历史问题”是可能的，并对“传说材料的整理”和“传说时代的研究”的“种种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希望为中国史前史研究提供构建一个共同的坚实基础。该文对史前史研究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被视为是徐炳昶的代表性论著之一。

同期还刊载了冯家昇《火药的发现及其传布》、陈述《论契丹之选汗大会与帝位继承》、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上之地位》、钟凤年《〈水经注〉之一部分问题》、许道龄《玄武之起源及其蜕变考》、程溯洛《女真辫发考》等文。

齐思和在《燕京学报》第33期发表《商鞅变法考》。

此文认为前人“三代相传之制至商鞅而始坏”和“《商君书》为商鞅所作”之观点是错误的，导致“商君变法之意义遂晦而不明，湮而不彰，而古代制度演变之程序遂亦混然淆乱，莫可究之诘”。作者在文中提出了“战国变法始于魏”，商鞅在“政治方面最重要之改革为废除社会阶级制度，与废人治而行法治”等观点，从商鞅的历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变法成效、商鞅被杀等方面考证论述，以辨明“商君变法之意义及其在历史上之地位”。

同期还刊载了裴文中《中国细石器文化略说》、鸟居龙藏《奴儿干都司考》、安志敏《殷墟之石刀》、钟凤年《史地辨疑》、王崇武《吴三桂与山海关之战》等文。

聂崇岐在《燕京学报》第33期发表《宋役法述》。

文章认为《宋史》及《宋会要》、《文献通考》等典籍所记宋代役法“首尾各不完备”或显简略，由“皆不是以明一代之典制”，故撰此文“以示有宋役法变迁之梗概”。文章从“宋代色役及其渊源”、“役法之流弊”、“熙宁改革役法”、“元祐及绍圣后之纷更”、“南渡后之役法”等几个方面对宋代役法进行探研，对推进宋史研究有重要价值。

《国史馆馆刊》（季刊）在南京创办。

柳诒徵为总辑纂，与汪旭初、汪辟疆、刘成禹等轮流主编。本刊“以研究史学及国史各项实际事例并搜集当代名家之史料著述为主旨”；栏目有论著、专著、国史拟传、碑传备采、文艺、馆务；曾刊载重要文章有马君武《抗日记事诗》等。1949年1月出至第2卷第1期停刊。

创刊号刊载但焘《国史体例杂议》，金毓黻《国史商例》、《释记注》，刘成禺、汪辟疆《编年史长篇略例》，马騄程《中华民国史义例及其意见书》等文。

余嘉锡在《辅仁学志》第15卷第1、2期合刊发表《〈太史公书〉亡篇考》。

作者认为作为“乙部之祖”的《史记》之完阙，“迄无定论”，是憾事，且相关研究纷然淆乱，“懵然不知所从”，“乃发愤理而董之”，撰写此文，“胪举诸家之说，悉载不遗。有所考证，疏之下方”，“如有所疑，付之盖阙”，对《史记》所缺十篇一一考核，并对褚先生所续部分做了探讨。有研究者认为，尽管此文洋洋十万余言，引证材料几百条，但是由于离开了《史记》本证，囿于班固、张晏之成说，考证的起点就偏离了方向，其考证结果并不能定案。

同期还刊载了陈垣《〈日知录〉停年格条注引辛瑊考》、《宋元僧史三种述评》，叶德禄《唐代胡商与珠宝》，孙楷第《唐章怀太子贤所生母稽疑》，陈述《阿保机营建四楼说正误》，鹿辉世《〈归潜志〉作者刘祁》，柴德赓《全谢山与胡稚威》、《跋〈邵念鲁年谱〉》、《记贵阳本〈书目答问〉兼论〈答问补正〉》，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删要》，黄文相《王西庄先生年谱》，刘乃和《顾亭林画与顾亭林之得名》等文。

此期出版后，《辅仁学志》停刊。

中华书局开始编印舒新城等主编的“中华文库”。

该文库分为“小学”、“初中”两部分，收录的历史类书籍有邢鹏举编《历史学习法》（1947年12月），赵景深编《中国文学史纲要》（1947年12月），徐澄、吴一心编《中国史略》（1948年5月），《外国史略》（1948年5月）、马精武、范御龙编《小学历史教师手册》（1948年9月）等。此外，该丛书还收录了一些中外名人传记类著作。

周谷城《中国史学之进化》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

此书系周谷城的史学评论集，收录《建设的文化工作论》、《评冯友兰之“新理学”》、《评斯坦因氏古代中亚之遗迹》、《中国史学之进化》等论文8篇。

金应熙在《岭南学报》第8卷第1期发表《吐蕃之兴起》。

此文对吐蕃种族之来源、名称、七世纪初西藏高原之形势、禄东赞家族的事迹、吐蕃的兵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同期还刊载了李镜池《周易筮辞续考》，冼玉清《招子庸研究》，容庚《记〈竹谱〉十四种》，庄泽宣、陈学恂《从四方馆到同文馆》等文。

邓广铭《辛稼轩先生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系作者在1937—1939年撰成，用“比类推求”的方法从宋人文集中收罗大量相关资料，间接确定了辛弃疾的行事年月，并纠正了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体例上虽分年隶事，亦兼用纪事本末写法；内容上与作者所著《稼轩词编年笺注》互为呼应，详略各有侧重。

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增订本。

福建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出版“福建问题专号”。

该专号刊载了傅衣凌《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地区的社区经济与佃农风潮》、郑书祥《明清时代的福建农民运动》、胡寄馨《清代台湾稻米之生产机器输入内地》、萨士武《清代以来本省文献整理述评》等文。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印《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

是年

第六届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奖评出。

1946年未评此奖，故此界奖为1946年、1947年两年度奖项。此次获奖的人文社会科学类著作有：文学类一等奖空缺，二等奖一名（杨树达《造字时有通借证及古文字研究》），三等奖一名（徐复《语言文字学论丛》）；哲学类一、三等奖空缺，二等奖一名（张西堂《颜习斋学谱》）；社会科学类一等奖空缺，二等奖三名（施之勉《汉史考》、刘铭恕《中外交通史论丛》等），三等奖四名（曾仲谋《广东经济发展史》、张秀琴《日本史正名篇》、徐松石《泰族僮族粤族考》）；古代经籍研究类一二等奖空缺，三等奖二名（胡朴安《周易古史观》、杨明照《汉书颜注发覆》）。

北方大学成立历史研究室。

范文澜主持，成员有刘大年、荣孟源、王南、叶丁易、王冶秋、尚钺、赵俪生，历史研究室一时人才鼎盛。

裴文中在甘肃省的渭河和汉水上游、洮河流域、河西走廊、青海省湟水流域、青海湖及兰州附近对一些史前时代遗址进行调查和试掘。

至1948年结束，发掘调查的成果总结在《史前期之西北》（西北通讯社编，1948年）。

应周谷城之邀，胡厚宣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系任教授兼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

胡氏先后开设史料学、考古学、先秦史、商周史、春秋战国史等课程。

年底，熊十力《十力语要》四卷四册线装大字本印行。

1948 年

※ 柳诒徵《国史要义》出版。
※ 中央研究院选举产生第一届院士。
※ 董作宾《殷虚文字甲编》出版。
※ 刘节《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论》出版。
※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出版。
※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出版。
※ 胡适离平赴宁，国民政府实施“抢救学人”计划。

1 月

1 日 《文史杂志》复刊。

顾颉刚作《复刊词》云：“现在有些人反对用考据的方法治文史之学，……我们要深入，可是我们没有忘记要浅出。我们要分工，可是我们没有忘记要合作。我们研究的是小问题，可是我们没有忘记了大任务。”

是月 李达《先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由生活书店出版。

该书实际上是由李达《经济学大纲》的“序论”和第一部分组成。《经济学大纲》是李达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 1936 年印行的教材。该书是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著作，但是李达也明确在绪论中指出，“我们不是专门研究经济学才研究经济学，而是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经济学”，李达认为研究经济学“除了研究中国历史上各种顺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外，还必须研究中国经济”，因此他在研究经济学时非常重视“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毛泽东对此书高度赞赏，称“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并向延安各界推荐此书。

胡厚宣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2 本发表《卜辞记事文字史官签名例》。

作者提出，“甲骨文中除贞卜之史官，恒于卜辞之中记其名者外，记

事文字之末，或龟甲之偏僻地方，亦常有记史之签名”，并概括为七种情况。此文不仅有助于加深对甲骨文体例认识，对于史学史研究领域有关史官起源的研究之推进，也有价值。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2 本系在 1945 年出版的第 12 本第 1、2 分合刊基础上，增加抗战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清查到的旧稿及岑仲勉新作《补白集源流事证数则》和《从〈文苑英华〉中书翰林制诏两门所收白氏文论白集》两文而成。清查到的旧稿主要是岑仲勉《四库提要古器物铭非金石录辨》、《〈宣和博古图〉撰人》、《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等文。

何兹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6 本发表《魏晋南北朝的兵制》。

作者认为在汉末时期，征兵制已经破坏，导致了招募强制降民俘民及亡户为兵、征发等集兵形式并存，及至三国末年，逐渐形成了“世兵制”。所谓“世兵制”，一方面是“兵民分离”，一方面是“兵家子子孙孙，世世都要为兵”。两晋时期为这一制度的极盛期，宋齐以后渐衰，直到隋代统一南北才又为普遍的征兵制代替。

作者在晚年自述中指出，自己在抗战时期的研究，“最得意的是对世兵制的提出和论述”。有研究者指出，该文与发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7 本上的《魏晋的中军》一文，“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军事制度的情况。以后学者的成果都是在何文研究基础上展开的”。

同期还刊载了陈槃《秦汉间之所谓“符应”论略》、《汉晋遗简偶述》、凌纯声《畲族图腾文化的研究》、逯钦立《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芮逸夫《释甥之称谓》、傅乐焕《辽史复文举例》、王崇武《李松如征东考》等文。

劳榦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6 本发表《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

作者指出，秦汉时期，由于国防等原因，“邦国之政事与军备皆北重于南，陆重于海”，但“以民族发展之方位言之，则经济发展之趋向在南而不在北，国防发展之趋向在北而不在南”，故撰写此文，就“汉世水陆交通略述其大要，以见汉朝帝国虽赖陆运以维持国家之完整，供给国防之军资，而缘海之地则海运常重于陆运。汉人非不明海事，徒以陆上危机大于缘海。期间不能不有所轻重”。有研究者指出，该文是汉代交通研究的开创之作，“于中国交通史研究也有经典意义”。

董家遵《中国奴隶社会史》由中国社会学社广州分社出版。

书前有萨孟武序。共 8 章，叙述奴隶社会的成立、奴隶的来源、职务、人数、奴隶制度的瓦解等问题。

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由银行周报社出版。

本书为银行周报三十周年纪念刊，封面有“银行学会编印”字样。内分“论著”、“统计”、“经济资料”、“经济大事记”四编，收录宋汉章等 40 余人的经济论文 53 篇，各种金融贸易统计资料 29 种，财政金融法规、文件近百种。末编“经济大事记”逐月记载民国以来国内外经济大事。

郑鹤声编《郑和遗事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内容包括郑和之世系与里邸、郑和之品性与时代、郑和之生卒与年表、郑和经历之地方与港口、郑和出使之年岁与大事、诸国朝贡之事略、郑和之轶闻等。此书材料丰赡，包罗广泛，考证详确，成为此一时期郑和研究的代表作。

陈安仁《中国农业经济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钱健夫《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奴隶制问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张孟伦《宋代兴亡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专刊”之一。

丁山《中国通史简编批判》由上海中国人文研究所出版。

2 月

柳诒徵《国史要义》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书是抗战期间作者为研究生讲授史学原理的讲稿汇编。全书共十篇，依次为“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各篇分别围绕一个专题，梳理中国的史学传统，并欲将古代的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贯彻落实于现代。其旨在表彰中国传统史学。本书以较大字体写出作者的论述，论述之后以小字罗列有关的历史材料。

该书吸收刘知几、章学诚、梁启超、刘咸忻等人思想，有所创造和突破而自成一家。后人评价甚高，或认为是“先生文史学之晚年定论”，或认为是“继刘、章二氏后，论述中国史学义法的杰出之作”，或认为“是一部空前的名著，其价值较刘、章之书有过之而无不及”。

严耕望编著《两汉太守刺史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严耕望从各种史书中将两汉郡国守相刺史姓名里贯、按任地任期排比为表，为研制汉史提供了不小的方便。

张须《通鉴学》由开明书店出版。

范文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由东北书店出版。

竺可桢等编著《地理学家徐霞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3 月

24 日　中央研究院选举产生第一届院士。

代院长兼评议会议长朱家骅在南京总办事处主持，会期三天。25 日，就第四次会议通过的院士候选人名单（共 150 人：数理组 49 人，生物组 46 人，人文组 55 人）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第一届院士 81 人：其中数理组 28 人，生物组 25 人，人文组 28 人。本来计划选 100 人，但有 69 人未超过半数票，只选出 81 人。此后每年续选 15 人。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人文组名单如下：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是月　金毓黻在《国史馆馆刊》第 1 卷第 2 号发表《唐宋时代设馆修史之制度考》。

胡寄馨在福建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第 4 卷第 1 期发表《明代的乡绅》。

4 月

6 日　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颁布《东北解放区文物古迹保管办法》。

是月　董作宾《殷虚文字甲编》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该书收录甲骨，除少数朱书影印外，全部为拓片。拓片计：甲 2513 片，骨 1425 片，还有 3 件兽头刻辞及 1 件鹿角器，共 3942 片，每片都附有发掘次数及原编号。所收录的甲骨，是第 1—9 次发掘所获。

同年10月出版《殷虚文字乙编》上辑，次年3月出版中辑，1953年12月出版下辑。

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3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林宝于唐元和年间奉旨撰成《元和姓纂》，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中唐以前的大姓族望，对研究中国氏族与社会有重要价值，但是此书北宋时开始散佚。清代修四库全书时，只能据《永乐大典》参以诸书校辑成书。清代学者孙星衍、洪莹据孙氏所藏某阁本钞本校刊行世，光绪六年金陵书局复据孙氏本翻印。及至近代，罗振玉、温廷敬、牟润孙对此书均有辑校增补，但终究未克全功。岑仲勉乃参藉历代典籍、碑志和已有研究诸书，旁搜博征，详加考校，系统增补，于芟误、拾遗、正本、伐伪四方面尤致力，著成《元和姓纂四校记》，共170多万言，为唐史研究提供了一部高学术价值的工具书。

费孝通《乡土中国》由上海观察社出版。

此书共收录《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男女有别》等14篇论文，系根据作者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课程整理而成。作者运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探究了农村的社会结构，并涉及家族、村社、社区等社会组织及行政结构，目的是为了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

该书出版不久即被认为是“近年出版社会学研究佳著之一”，更此后的研究者认为是费孝通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论著，不仅“从具体的研究对象上求综合”等方法对此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研究都产生了不小影响，书中所运用的一些概念已经衍变成学术界共用的概念，而且一些对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特质的论断至今仍被认为颇具价值。

尽管作者在解读“乡土中国”时努力摆脱美国教科书的影响，主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但仍被端木蕻良批评为“想用美国眼睛来看中国”，关于中国乡村社会是静止的等结论“经不住真理的考验”。

1985年三联书店再版此书，此后出现多个出版社版本。

全汉升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5本发表《元代的纸币》。

文章梳理了元代纸币币制变迁的情况，分析了币制跌落乃至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认为导纸币贬值的主要原因是“财政收支的不均衡”。并指出“元末政权所以终被推翻，最后固然直接由于军事上的崩溃，初时实因于统治者在财政经济奋斗上的失败”。该文不仅首次对元代纸币进行研究，而且以丰富的资料论析了元代钞法的演变和崩坏，被认为有较高参考

价值。

同期还刊载了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续贞石证史》、《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唐方镇年表正补》，谷霁光《辽金乣军史料试释》等文。

何兹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7 本发表《魏晋的中军》。

文下署“《中古兵制史稿》之一章”。文章包括“两汉南北军的追溯”、“曹魏的宿卫军”、“晋的宿卫兵”、“宿卫外的中军”、“魏晋中军的名称职掌与人数”、“中军的统帅官”等，对魏晋的中军之渊源、名称、职责、人数、统领方式等问题都进行了考辨，揭示了“魏晋中军的组织及其演变”。

同期还刊载了张政烺《问答录与说参请》，陈槃《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古谶纬书录解题》、《古谶纬书录解题附录》，王崇武《论万历征东岛山之战及明清萨尔浒之战》、《明成祖朝鲜选妃考》，岑仲勉《唐唐临〈冥报记〉之复原》，杨志玖《阿保机即位考辨》，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等文。

劳榦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7 本发表《汉代察举制度考》。

文章梳理了汉代察举制度的渊源，汉武帝之后的变迁，并分类探讨了察举制度的项目（分别是“孝廉”、“茂才”、“贤良方正与文学”、“其他特科”）等。

潘光旦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 4 卷第 2 期发表《说五伦的由来》。

此文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将五伦在历史上的各种表述进行列举、统计、分析，梳理重构了“五伦”形成的过程，分析了“五伦”的几个源头。

同期还刊载了易廷镇《资本主义出路的历史背景》等文。

5 月

刘节《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论》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

该书共八章，分别为绪论、宗族的涵义、世与代、图腾层创观、氏姓派衍、宗族分枝、移植概况等。作者认为“历史是以人的文化作主体的，对于人文的演变过程及其相互关系，如说明白了，历史家底责任就完成了”，所以此书是要根据莫尔根的《古代社会》、罗维《初民社会》等一些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的书籍来确定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及其发展过程。作

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如三皇五帝的传说是古代图腾社会的误传和曲解，儒家言必称尧舜，将尧舜禹时代视为黄金时代是反动的历史哲学；再如古代社会是由图腾社会转变为有姓氏的城邦社会，再由有姓氏的奴隶社会发展为封建社会；又如推动历史发展的是种姓制度及历史以事实为基础但也离不开想象等。

作者在 1943 年 11 月 10 日所作“跋”中指出，“这本书并非宗族移植史的全面，而是一部讨论古代宗族史底问题的书，全篇都是考证，但是从这里面，可以发现许多历史法则”。

刘节编著《历史论》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

本书撰作于 1940 年冬至 1944 年春。共收十篇文章：《历史论》、《诗与幽默》、《国家观念之起源及其发展过程》、《理想社会人生》、《历史上的两种法则》、《传统与真理》、《民族更生之理论》、《科学对于人类的贡献》、《新现实主义》、《张衡传》。

其主要观点：一、“历史”的功能是增进道德、扩充智慧、发展文化、推求世变、叙述民性；二、史学方法是研究如何撰述各种史书的方法，包括考据、编次两方面。通识不排除考据，考据也需要通识。通识可以培养考据家的新眼光，为其出新题目，提高考据家所得结论之新意义。这样才能合成整个历史方法；三、历史学是介于科学同艺术之间的一种学问。考证史料是一种科学，排比史料却与艺术有莫大的关系。历史叙述离不开感情与合理想象；四、史家必须气机条畅、积储学问、养成识鉴，“对于一种学问或一件事情能够看得很透彻，把其中的曲折是非判断得很准确，于己于人于民族于人类都能够得到益处”；五、历史上存在着自然法则与人为法则，二者相互冲突。“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促进人为法则使之切合于自然法则的历史”。

李絜非《中国近世史》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印《墨子引得》。

程幸超《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略》由中华书局出版。

6 月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推出“本院成立第 20 周年专号”上。

该专号实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0 本，分上下两册。上册刊载陈寅恪《元微之悼亡诗及艳诗笺证》、胡适《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马衡《宋范祖禹书古文孝经石刻校释》、岑仲勉《旧唐书“旧领县”之表

解》、陈槃《论早期谶纬及其与邹衍书说之关系》、全汉升《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逯钦立《陶渊明年谱稿》、王崇武《董文骥与明史纪事本末》、李光涛《朝鲜壬辰倭祸中之平壤战役与南海战役》、劳榦《北魏洛阳城图的复原》、夏鼐《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芮逸夫《僚为仡佬试证》、严耕望《魏晋南朝地方政府属佐考》、王明《黄庭经考》等文。

周一良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0 周年专号"上发表《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

文章细致考辨了从领民酋长到六州都督演变的轨迹，认为"领民酋长由部落酋长衍为不领部落之虚号，更由领民酋长之虚号蜕变而为领民都督，专领北人。逮'六州'两字成北人之代表，于是六州领民都督更省为六州都督"。

作者对此文较为满意，在晚年回忆中指出，此文对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作了初步解释，"遂成定论"。但严耕望因嫌周氏此文"写得颇为散漫，欠条理，分析也嫌不够"，乃重新撰写了《北魏领民酋长制度》，作为《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之一章。

季羡林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0 周年专号"上发表《浮屠与佛》。

作者由胡适与陈垣关于"浮屠"、"佛"的争论引发对此一问题之关注，并利用掌握吐火罗文字的优势，提出中国最古佛典翻译中之"佛"字，不是直接从梵文而来，而是间接通过吐火罗文字而来，并从此延伸探讨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1949 年，周法高撰《论〈浮屠与佛〉》，对季氏观点提出商榷。后季氏又撰写《再谈"浮屠"与"佛"》一文，对此文予以补充和扩大。

王明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0 周年专号"上发表《黄庭经考》。

作者认为"《道德经》为玄教经典之鼻祖，下分参同论外丹，黄庭说内丹，并为古典，甚可宝也"，并进一步认为"《黄庭内景经》者，盖自觉之宗教思想与医学糅合之道书也"。文章对"黄庭"等概念、《黄庭经》撰者及其成书年代、《黄庭经》之思想、《黄庭经》学说之来源及其衍变、"王羲之黄庭换鹅"等问题进行了考辨，被认为是考证精当，客观谨严，至今仍有学术价值。

陈芳芝在《燕京学报》第 34 期发表《清代边制述略》。

此文认为清代“边徼建置，虽多取法于唐，而其经营缔造，且多凌驾前代，”虽在后期“一再割削，然而大一统之局面，犹能勉强支撑，终其朝代”，民国“边区政治制度”“一承有清之旧，相沿不改”，但抗战以后外蒙独立，欲明“症结所在”，则“前代递嬗之迹，亟应详其因革”。作者分别从“满洲”、“藩部”、“外蒙古”、“额鲁特”、“回部”、“西藏”几个部分论述清廷的统治边陲制度。

同期还刊载了鸟居龙藏《金上京城佛寺考》、梁启雄《论语注疏汇考》、阎简弼《梁颢的中状元的岁期年寿跟其他》等文。

陈梦家在《燕京学报》第34期发表《六国纪年表》。

作者在昆明讲课过程中感到《史记·六国年表》不适用，乃根据金文、《竹书纪年》等资料编纂此表。文章先述编作年表之方法，次述对《竹书纪年》原文的甄别，三述《竹书纪年》的纪年与周正，最后才是纪年表。陈梦家在学报第36、37期又发表《〈六国纪年表〉考证》，分别考证了周、晋、魏、赵、韩、田齐、燕、越、秦的世系。

聂崇岐在《燕京学报》第34期发表《论宋太祖收兵权》。

此文分别对“‘杯酒释兵权’即罢藩镇”、“罢藩镇必具旋乾转坤之力”、“宋太祖已完成罢藩镇之政策”三个观点进行辨正。

齐思和在《燕京学报》第34期发表《〈战国策〉著作时代考》。

此文批驳了罗根泽《战国策》作于蒯通的观点，认为《战国策》古本为刘向校辑之原本，今本系曾巩补辑之本；战国策非一人之书，而其中的“纵横之说多出于后人揣拟”。

陈增辉在《福建文化》总38号发表《犹太人入华年代考》。

同期还刊载了金云铭《中国豢鸬捕鱼起源考》、韩振华《越南半岛古史钩沉》、翁国樑《福建猺民误称“客家”考》、谢道芬《闽北越王遗迹考》等文。《福建文化》季刊自此期后停刊。

顾颉刚任兰州大学历史系主任，讲授“上古史研究”。

7月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

本书上起1840年，下迄1924年，分新关系的建立、“中兴”和媚外、“洋人的朝廷”、“强”的人（上）、“强”的人（下）、革命与反革命六章，阐述“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一切政治改良

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等等。

该书强调，当时中国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存在着两个中国：一个是“满清政权和环绕其四周的地主阶级的中国”，一个是“经常爆发武装抗争的农民的中国”。作者着重指出：“有许多研究中国的近百年史的著作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一种错觉。他们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描写得这样单纯，以致把满清政权写成是不断地受到帝国主义国家所欺凌侮辱的可怜存在。这种描写是不合历史事实的错误观念”；“自一八四〇年以后的多年间，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已经渐渐形成了中国统治者和中国人民双方不同的同外来侵略者之间的新关系的结合”。

严昌洪、马敏《20 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一文认为此书“虽然有着为当时革命斗争服务的鲜明政治色彩，史料的运用也略显粗糙，但由于运用了唯物史观，改变了观察历史的视角，不仅在 1949 年以前关于辛亥革命的众多著作独树一帜，而且为 1949 年后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

此书共十章，分别为“中国文化之地理背景”、“国家凝成与民族融和”、“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古代学术与古代文字”、“文治政府之创建”、“社会主义与经济政策”、“新民族与新宗教之再融和”、“文艺美术与个性伸展”、“宗教再澄清民族再融和与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东西接触与文化更新”。该书不按历史的发展进程介绍中国文化，而是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入手，对中国的宗教、哲学、文学、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进行论述，对此后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影响较大。

林迭肯（林汉达）《东周列国志新编》由生活书店出版。

此书是林汉达编著历史通俗读物出版最早的一部作品，1956 年修订后由三联书店出版，1962 年修订为《东周列国故事新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新中华杂志社编辑《中国传统思想之检讨》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王亚南、林砺儒、纪玄冰、嵇文甫、蔡尚思、陈守实等的 14 篇关于中国传统思想论文。

吴晗《史事与人物》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8 月

1 日　陈序经担任私立岭南大学校长，网罗陈寅恪、容庚、梁方

仲等众多一流学者到校任教。

24日　华北大学在正定成立。

该校华北联合大学（成仿吾为校长）和北方大学（范文澜为校长）合并而成，新校长为吴玉章，该校研究部由范文澜兼任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与延安中国历史研究室一脉相承，不仅由范文澜领衔，且研究课题也主要是修订与续写《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继续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室的工作。

是月　陈寅恪在《清华学报》第14卷第2期发表《白香山新乐府笺证》。

文章先概括元稹、白居易关于“新乐府”体裁的共同理论，后比较二人之作品。作者在文中提出，“凡诠释诗句，要在确能举出作者所依据以构思之古书，并须说明其所以依据此书而不依据他书之故，若仅泛泛标举，则纵能指出最初之出处，或同时之史事，其实无当于第一义谛也”。

同期还刊载了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闻一多《九章解诂》两文。

（美）海斯、穆恩、韦兰著，刘启戈译《世界通史》由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

翦伯赞作序。此书被认为是“欧洲中心论”的代表作。此书将黄种人、棕种人和黑种人看作为“白种人的负担”。

秦佩珩在《清议》第2卷第4期发表《从蓬勃到沉寂的中国经济史坛》。

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他提出五条建议。一是建立一个经济史研究网，进行全部资料的整理；二是从事经济史作品的翻译工作；三是各大学或研究院广招研究生，充实人才；四是作成系统的经济史论文索引；五是提倡有关经济史的旧书标点工作。他为经济史研究所做的种种规划，基本上沿循了《食货》半月刊的工作思路，是《食货》半月刊的继续和深化。

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介绍从晚清到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思想的演变，是较早且较完备地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著作，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有重要影响。

《唯物史观中古史》由永祥印书馆出版。

该书原为《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国史部分，由费明君译并重新题名

出版。

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9 月

陈述《契丹史论证稿》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出版。

这是第一部从多方面研究契丹政治制度的专著。重点论究契丹民族之构成、选汗制度和帝位继承、统治政策以及西辽的建立等辽朝政治史上的重要问题。作者认为“契丹为中华民族之一支，故契丹威名之广溢，亦吾中华民族之光荣”。宋德金《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一文认为“这一提法同那种视契丹等少数民族为‘外族’、‘异族’的传统观点相比是一大进步”。

日本鸟居龙藏认为“此书乃近代契丹史中之深具兴味者，读之对著者之高见不胜钦佩。此书乃庄重之出版品，系最有价值之一编政事史”。

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由光华书店发行。

此书系吕振羽 1947 年 2 月在哈尔滨著成。他说：“现在抗战胜利结束，进到和平民主事业的斗争，国内民族问题立即就要全面地提到行动日程上，我们应同时展开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当时最重要的国内问题主要有两个：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而“中国民族问题，从来还没有系统研究过”。直到 40 年代“我们对国内各民族，尤其对各少数民族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了解，还相当隔膜”。“外国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各民族的研究，大都从侵略主义观点出发；国内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则大都从大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初版序）吕振羽决定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考察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于是有此书之撰。

吕著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民族史的著作。

解放社编《社会发展简史》由新华书店出版。

全书分七章：谁是我们的祖先、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农奴制度）、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后来再版时增加第八章“条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前四章摘自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初学读本》，后三章摘自苏联《新百科全书·社会发展史》。

编者指出，编印此书的目的“是在于给初学社会科学的同志们提供社会发展史的一般知识”。

钱格川主编“中华民国历史小丛书”由上海大成出版公司出版。

该丛书收有吴相湘等编纂的《辛亥革命》、《二十一条》、《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国民革命军北伐》、《九一八东北被占》、《一二八——淞沪抗战》、《七七卢沟烽火》、《八一三全面抗战》、《迁都重庆》、《天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国军远征缅甸》、《开罗会议》、《日本无条件投降》、《还都南京》、《台湾光复》等书。

屈万里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发表《甲骨文从比二字辨》、《谥法滥觞于殷代论》。

《甲骨文从比二字辨》一文对甲骨学界认为"从比二字不分"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二字字形既殊，其义尤不相涉"；《谥法滥觞于殷代论》一文认为殷人有"以日干追号其先人"以避讳之俗，但时间长久，必有重复，故又追加名号以示区别，实为谥法滥觞，"比周人开国，盖习闻武丁，武乙，文武丁诸号，喜其嘉名，乃及身而自称之，于是有文，武，成，康，等号。久之，更由自命之美称，进为殁后被人追命以寓有褒贬之谥号，而谥法之制以定"。屈氏有关谥法滥觞于殷代的观点发表后，引起学界关注，不少学者认同，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经不起认真推敲。

同期还刊载了石璋如《河南安阳后岗的殷墓》、张政烺《说文燕召公史篇名丑解》、李济《研究中国古玉问题的新资料》、董作宾《殷历谱后记》、劳榦《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等文。

严耕望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8本发表《北魏尚书制度考》。

作者认为北魏时期尚书制度事关中国"两千年中枢发展史"之研究，故"搜考史传以弥缝之"。文章内容包括"北魏尚书组织演变"、"都省"、"尚书分部"、"列曹职官"及"北魏初期之大人制度"等。在作者看来，从汉代至北魏，尚书逐渐由宫官向府官转变，权力渐趋变重，北魏前期君主以拓跋鲜卑的"大人制"为基础，参考秦汉制创制了尚书制度，中经反复，至孝文帝"大革旧俗，厘定官制"时，重建和确立了尚书制度。作者还指出，"尚书制度之发展与华化之步趋不异，其在初期，尤为华化之标征也"。

有研究者指出，严氏此文颇有创见，是相关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严氏在晚年回顾自己治史经验时指出，该文是其"聚小为大"研究方法的最好例子，也是其单篇论文中最有贡献的论文。

同期还刊载了王明《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吴晗《记〈明实录〉》、李光涛《论崇祯二年"己巳虏变"》、傅斯年《北宋刊南宋补刊十行本史记集解跋》、《后汉书残书跋》、劳榦《北宋刊南宋补刊十行本史记集解后

跋》等文。

缪钺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8卷发表《清谈与魏晋政治》。

作者将魏晋清谈划为四期（魏正始为第一期，魏晋间为第二期，西晋为第三期，东晋为第四期），并按照这一顺序梳理清谈与政治之关系。作者认为魏晋“清谈思想，虽崇老庄，而亦兼融儒学，故并不轻视政治，且有其政治上之新见解及其理想的政治家之新型，即在能以超世之怀建济世之业。魏晋两代政治，受清谈之影响，自成形态，且多变化。盖此二百年中，清谈名士，因其才性之殊，环境之异，故在政治上有不同质反映”。

同期还刊载了斯维至《殷代风之神话》，缪钺《颜延之年谱》，徐益棠《襄阳与寿春在南北战争中之地位》、《唐代之仓储制度及其他》，刘铭恕《唐代归化之何国僧伽大师》、《元代安南进贡之代身金人》、《元代之只孙校尉》等文。

翦伯赞主编在香港复刊的《文汇报·史地周刊》。

翦氏先后化名钱肃端、陈思遗、农畴在《史地周刊》第1期发表三文，同时又写了《编者的话》。

周刊共出八期，翦氏文章计有《编者的话》、《杜甫世系及其家属考》、《西晋的宫闱》、《三国时内战中的外族军队》、《孙皓的末日》、《舶寮岛史前遗迹访问记》、《关于台湾的石环及其他——复李规先生》、《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兼答吴兰先生》、《评南北朝的幻想》、《末代帝王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关于传国玺答文芳先生》等。

侯外庐在香港继续主编复刊的《文汇报·新思潮周刊》。

此时侯外庐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撰写《中国思想通史》第3卷的工作上，同时也参与了批判“第三条道路”的工作。

吴壮达《琉球与中国》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10月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官僚政治之经济的历史的解析》由时代文化出版社出版。

该书最初以论文形式连载于上海《时与文》杂志。此书共17篇，探讨了“官僚政治”的含义、中国官僚政治的特殊表象、社会经济基础、官僚阶层内部利害关系及一般官制的精神、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官僚贵族

化、两税制与科举制对官僚政治的影响、士宦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农民在官僚政治狭隘的社会经济生活、官僚政治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中国官僚政治在现代的转型、传统官僚政治的覆败、新官僚政治的成长等问题。本书将中国的官僚政治当作一个特定的形态或体制加以考察，通过比较研究，从“技术”和“社会”两个方面，揭示了中国官僚政治产生的基础、特点、演化及官僚主义的作风与流弊。王亚南将“官民对立”视为是秦至清时期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该书由于采用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于中国这种既古旧又现实的社会政治形态”进行了深刻剖析，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理论色彩最浓的著作之一，也是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有研究者认为此书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系统剖析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著作。

此次结集出版后并未引起人们太多关注。1981 年 6 月，经过孙越生校订过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时的知识阶层因为正在反思“文革”，此书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2 册由开明书店出版。

这部 24 章 110 万字的巨著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突出各时期的重要政治斗争，叙述两晋南北朝政治的发展演变，属政治史。后一部分分别论列这一时期的民族分布及构成、社会组织、社会等级、农工商业、衣食住行、社会风俗、政治制度、学术宗教，属专题史。

吕思勉自谓“此书自问，总论可看。此外发见魏史之伪造及讳饰，表章抗魏义民，表章陈武帝，钩考物价、工资、货产，及论选举制度，皆佳。论五胡时，意在激扬民族主义，稍失其平，因作于日寇入犯时，不自觉也，异日有机会当改正”。曹文柱、李传军《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一文认为此书“不但以史料丰富称著，而且不乏精辟见解”。

王明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9 本发表《周易参同契考证》。

文章对《参同契》的名称、《参同契》与汉代易学的关系、《参同契》的中心思想、《参同契》思想的渊源及其流变、《参同契》的真伪等问题进行考辨，作者认为“《参同契》之中心理论只是修炼金丹而已”。由于该文对《参同契》的名称、源流等问题进行清晰又准确的考辨，是道教思想史、科技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论著，被视为“道教研究的上乘之作”。

同期还刊载了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严耕望《北朝地方政府属佐制度考》、李光涛《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劳榦《论中国造纸术之原

始》、《释汉代之亭障与峰燧》等文。

吴晗在《清华学报》第 15 卷第 1 期发表《明初的学校》。

作者认为“专制独裁的君主，用以维持和巩固皇权的两套法宝，一是军队，二是官僚。用武力镇压，用公文办事。皇权假如譬喻作车子，军队和官僚，便是车轮，一武一文，缺一不可”，朱元璋在建国之初，缺少有力的文官，乃创造了学校系统以培养新官僚。明朝的学校分为“国学”和“府州县学”，文章重点对“国子监”进行了研究，对“府州县学”论述较为简略。

同期还刊载了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论》、沈有鼎《周易释词》、王瑶《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等文。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出版“校长梅贻琦先生六十寿辰纪念号”。

此期专号刊载了雷海宗《东周秦汉间重农抑商的理论与政策》、潘光旦《说家谱作法》、刘汝江《中国人寿的探讨》、李有义《西藏之婚姻制度》等文。

潘光旦《说家谱作法》一文前一部分“专叙家谱的普通作法”，以供修订家谱的人参考，后一部分“分论谱法的若干变通的用途”，以“备研究人品与品性遗传的人采用”。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文献论丛》。

此丛刊作为“沈兼士先生纪念刊”，收录王之相《中俄陆路通商关系之历史上的变迁》、单士魁《清代黄册与赋役问题》等论文。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考证集》由独立出版社出版。

此书分史事考、天历考、史料考、访问记 4 部分。

赵纪彬《中国哲学思想》由中华书局出版。

11 月

23 日　郭沫若、侯外庐、翦伯赞等同船离开香港北上。

是月　李文治《晚明民变》由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认为旧史书“囿于明清之正统，于（李）自成等极尽诬蔑”，本书“着眼点，在民变之兴衰转变，以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而予以新的看法”，立论述事力求客观求实，“力避前人之隐讳，据实直陈”。

本书是关于晚明民变问题的早期著作之一。

燕京大学《燕京社会科学》创刊。

该刊由燕京大学法学院主办。编者在《编后语》中指出，“若论目今的世界学潮流，都是趋向于综合的研讨，无论物质、生物、人文、社会诸科学，皆循环连锁，发生密切的关系。近年物质科学成绩惊人，生物科学也已成长，认为社会科学自应迎头赶上。科学分门别类的时代已经过去，人类社会原是一个整体，分割剖释决不能表现整体的真面目。所以，社会科学园各门学问，力求彼此融会贯通，互相携手协助，自是急不容缓之举。本刊发行极望在这方面努力进行”。编者们并指出：“所谓科学综合的研考，并非罗列诸科，即可成事。最主要的莫过于在方法上观点上求配合求一致。但是各科分家由来已久，每科自有一套名词一套说法，一时尚不易凑搭起来，所幸执笔者都具有社会整体的见解，每人学有所长，各能在整体的观念之下，发挥专门的特殊的知识。”至于对该刊所刊稿子的要求，《编后语》指出，凡人文社会科学的题材，都欢迎，但是由于“近代社会科学走上实地研究的路途”，所以刊物特别欢迎有“实际观察的材料”的稿件。

创刊号刊载了高名凯《中国语的语义变化与中国人的心理趋势》、齐思和《西周时代之政治思想》、张锡彤《分权说在清季之传布》、李有义《西藏的活佛》、翁独健《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等文。

华夏书店编辑出版《康有为与梁启超》。

赵迺搏《欧美经济学史》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

12 月

15 日　胡适因国民政府“抢救学人计划”离京南下。

1948 年底，国共双方在平津地区激战之际，国民政府秘密实施了“抢救学人计划”的行动。由傅斯年等人开列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名单，计划派专机接载分批南撤。“11 月 10 日，傅斯年、朱家骅、翁文灏等人商议，把一批图书资料和文物运到台湾，又要设法接出北平的学者。傅斯年直接面见蒋介石，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并指定傅斯年、陈雪屏、蒋经国三人负责此事，要接运的学者分四类：各院校馆所有行政负责人；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学术上有贡献者”。“抢救”对象约 60 人，连同眷属共 300 余人。当日与胡适同机的还有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等。

12 月 21 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

平，抵达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 24 位教授。

1949 年 6 月，“抢救学人”计划停止。据统计，除胡适、梅贻琦等十几人外，中央研究院 80 余位院士有 60 余位留在大陆，各研究所、大学中的图书资料、实验仪器则几乎全部保存下来。

21 日　中共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文化接管委员会。

钱俊瑞为负责人，范长江、尹达、王冶秋等为成员，下设教育部、文艺部、新闻出版部和文物部。

25 日　中国共产党公布国民党首要战犯 43 人名单，陶希圣、王云五、左舜生、曾琦、张君劢等列名其中。

是月　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由上海观察社出版。

此书是对中国社会结构问题的探讨。该书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四种重要成分，即皇权、绅权、帮权和民权。因而重点讨论皇权与绅权结构及其互动关系，探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这两种权力合作与冲突的具体情形。该书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里，皇权是一个基本的权力。皇权的帮手是绅权。绅士是士，官僚是大夫。士大夫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层次，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书中还涉及农民、商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士兵、家庭及宗族等问题。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出版。

该书是作者 1930 年、1934 年赴罗布淖尔的考察报告，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出版，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

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出版。

本书是对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的综合研究，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对瓦鬲的研究。作者以斗鸡台出土瓦鬲为主，结合全国各地所出，对瓦鬲的源流进行分析。作者将瓦鬲依其形制、制法等进行分类，探寻各型的渊源、流变及其相互关系，并从功能的角度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考古类型学的成熟。

齐思和在《燕京学报》第 35 期发表《孟子井田说辨》。

作者认为井田制不过是孟子将封建制度下田制“加以理想化、整齐化，将之由虐民之制变为仁政之基”，而后儒不知其然，“遂以此为三代田赋之通制”，以至于“愈推愈远，愈说愈密，而愈似不可能”。齐文断定井田制为孟子的理想，但非完全凭空杜撰，而是有所根据。助法即是依据所在。孟子所谓的助法，实即西洋史家所谓庄园制度。他旁稽西洋日本封

建时代的田制以资比较，证明其结论。有研究者认为此文材料坚实，见识深邃，自成一家之言。

同期还刊载了鸟居龙藏《金上京城及其文化》、周一良《敦煌写本杂钞考》、王襄《古陶残器絮语》等文。

唐长孺在《燕京学报》第 35 期发表《白衣天子试释》。

此文认为白衣为弥勒教之服色，起源当在元魏之世，而白衣天子亦为弥勒教之谣谶；北朝沙门乱事多与弥勒教有关；信仰弥勒教者特重白莲，所以尚白，恐取其意，而远公白莲社之传说，殆亦受弥勒教之影响；明教或吃菜事魔者所奉之白佛，当是依托弥勒。

《新纂云南通志》由云南通志馆出版。

1901 年王文韶、唐炯等人修纂的《续云南通志稿》印行后，因修纂粗糙、缺漏甚多，云南主政者龙云、卢汉乃在 1931 年设云南通志馆重修云南地方志。该志由龙云、卢汉主持，周钟岳任总纂，袁嘉谷、秦光玉、方国瑜等文化名人参与编纂，前后历时十八年。

该志将历朝旧志，勒为一书，并续撰 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迄 1911 年（宣统三年）之事，1911 年后事另作长编，分大事记、图、表、考、传灯五类。该志共 266 卷，在体例、内容等方面都较明清云南方志完备充实，被后人称为云南地方志中“一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之书”。该志收录的赵星海撰《方言考》、方树梅撰《艺文考》、方国瑜撰《金石考》等，内容详备，资料充实，颇具地方特色；所补近代以来云南的工业、公共设施等创建和发展的情况，保留了不少可靠的史料。

云南通志馆在编纂《新纂云南通志》的同时，又单独修纂了一部民国云南省志——《续云南通志创编》，计划 80 卷 21 大类，1948 年后因种种原因未能统稿印行，1985 年由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修订后出版。

罗福颐在《岭南学报》第 9 卷第 1 期发表《清内阁大库明清旧档之历史及其整理》。

作者指出，清内阁档案发现已经二十年，但是“舍史学专家知之外，近欲求错综之记载，殊不可得”，如不记述此事，“再越三五十年，则史料之史，更不可究诘”。由于罗氏曾随其父亲罗振玉“亲手检理”这些档案，故根据“耳闻目见”，将“旧档流传之历史，及各方整理之概略，分章述之”。作者指出，该档案的整理研究，“岂止关一姓兴亡之所系，实有以示我民族数典而未忘其祖也”。

同期还刊载了容肇祖《方以智和他的思想》、冼玉清《苏轼与海南动物》、李镜池《周易卦名考释》等文。

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在自序中说，自1939年起在燕京大学等学校教授史前考古、史前史一类的课程，并开始编写讲义，到了1947年春季，写了三十多万字，但是由于物价飞涨，不能出版，乃将在这一时期撰写的短文及在各地的讲稿二十篇连缀成书出版。该书分总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附录四部分。

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湾杨梅。

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所藏古物图书开始运往台湾，至次年2月结束。

胡寄馨在福建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第4卷第4期发表《明代的民间宗教团体及其叛乱》。

是年

王重民编《太平天国官书十种》全4册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

1936年，王重民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摄录《资政新篇》等十种太平天国印书。后来，《资政新篇》、《太平天日》、《诛妖檄文》等三种印书分期刊发于1936—1937年上海《逸经》半月刊，其余则因抗战爆发而暂时搁置。1948年，简又文、叶恭绰将其一并编入《广东丛书》第三集，名为《太平天国官书十种》。至此，从海外陆续传回国内刊布的印书已达36种，占太平天国原刊书籍的绝大部分。

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由民主政治社出版。

作者除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评介之外，还就“心理史释”作了专门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上海市文献委员会编辑出版“上海文献丛刊”。

据《上海文献丛刊发刊旨趣》言，该委员会计划“上海文献丛刊”第一集编制一百种上海文献，以供各方面参考。但实际上该年出版《上海人口志略》、《上海外交史话》、《上海地方志综录》、《上海事物溯源》、《上海胜迹略》六书之后，该丛刊停止编印。

1949 年

※ 胡适等人被定为战犯。
※ 陈垣发表《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
※ 范文澜发表《谁是历史的主人》、《再谈谁是历史的主人》。
※ 中国史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
※ 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出版。
※ 毛泽东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新建设》、《学习》杂志创刊。
※ 周谷城《世界通史》出版。
※ 齐思和发表《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 顾颉刚《浪口村随笔》油印。

1 月

10 日　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接管清华大学。

该日上午，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北京市军管会副代表吴晗等前往清华接管，清华校务委员会代主席冯友兰等协助接管。接管后清华大学大部分保持原状态办学，但改革废除了反人民的内容，取消了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及国民党党团的活动。吴晗后被任命为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 日　陈寅恪任岭南大学教授。

陈寅恪虽然在北京围城后随胡适南下上海，但多次拒绝胡适、傅斯年等人前往台湾的劝告，最终被陈序经聘为岭南大学教授，留在广州。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被中山大学合并，改任中山大学教授。

20 日　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25 日　中国共产党公布国民党第二批战犯名单，胡适、叶青等列

名其中。

31 日　北平和平解放。

是月　吴玉章《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油印出版。

此为作者 1948 年至 1949 年在华北大学讲授中国革命历史的讲稿。本书由总论和纲目两部分组成。

此书区分了近五十年中国革命的几个主要阶段，归纳出各阶段的主要特征。作者将近五十年革命区分为九个紧要阶段：甲午战后救国时期、戊戌变法时期、义和团运动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及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著者还阐述了近五十年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主要问题，既包括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与转变、战略与策略及土地问题外，又涉及革命的理论、革命运动的政党、近五十年的社会经济和国家政权、革命的军队四方面问题。

此书是一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最早的系统性的中国革命史专论。

林举岱《西洋近代史纲》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该书是较早按照苏联体系编纂的西方近代史著作，以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为欧洲近代史的开端，以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为欧洲近代史的结束，其中又以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为界将欧洲近代史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1950 年 9 月，上海杂志公司再版此书。1951 年 1 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商得上海杂志公司同意，将此书稍作修订并易名为《外国近代史纲》，以作为高中外国史下册的代用课本，此后多次再版。

《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停刊。

在该月出版的第 8 卷第 1 期上，编委会刊登了《本刊启事》，声称此刊从第 8 卷起每年出两期，每年 1、7 月出版，内容注重刊登经济史、社会史和政治史方面的论文，欢迎投稿。实际上此期出版后，由于中央研究院迁台等原因，该刊停刊。

集刊最后一期刊载了王崇武《明成祖与佛教》、《明成祖与方士》，罗尔纲《太平天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湘乡曾氏藏忠王李秀成原供》，彭泽益《中英五口通商沿革考 1842—1844》等文。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由北平文化出版社出版。

此书按时代顺序论述了西方汉学研究的演进史，展示各国汉学间的相

互关系。全书十万余字，共七章。第一至六章主要介绍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和研究过程，追溯了古希腊和罗马关于中国的知识，以至后来与中国的接触、晚明以来传教士的活动等等，直到清代中叶。第七章改为分国叙述，详尽描述法、荷、德、英、俄、美、瑞典、匈、奥、日等国的汉学研究情况，几乎占到全书篇幅的一半。莫东寅此书不少地方直接引用自日本石田干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

此书是最早的汉学史专书，在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汉学史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

2 月

3 日　解放军在北京举行入城仪式。

21 日　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部长为尹达、副部长为王冶秋。

28 日　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北京大学，决定学校行政事务暂由汤用彤负责。

是月　为帮助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亲自审定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目。

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基础》和《思想方法论》等 12 种。

这套“干部必读”书经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通过后，从 1949 年 6 月到 1950 年 6 月一年时间内全部出齐，印行总数达到 300 万册。它成为建国初期广大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备书籍。

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10 卷由中华书局出版。

3 月

大连新中国书局开始编印“干部学习丛书”。

该丛书收录了联共（布）中央党史委员会编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49 年 3 月）、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49 年 4 月）、列宁《左派幼稚病》（1949 年 4 月）、《帝国主义论》（1949 年 4 月）、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949 年 4 月）、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49 年 4 月）、《社会发展史略》（1949 年 4 月）等。

华北大学历史系研究室编《中国近代史》（上编）由新华书店出版。

4月

华岗《中国近代史》由东北书店印行。

该书封面标“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规定，高中二年暂用课本，专科学校适用”。该书上起鸦片战争，下迄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稍有区别。

徐毓枏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5卷第2期发表《马恩著作中历史唯物论之史的发展》(上)。

此文梳理了马恩著作中历史唯物论的发展历程，重点探讨了马恩著作中“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之确立”、“阶级压迫与阶级斗争”、“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发展”、“历史哲学——经济史观”等问题。

同期还刊载了潘光旦《周官中的人口查计制度》、王永兴《中晚唐的估法和钱币问题》等文。

5月

4日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

军管会任命汤用彤、许德珩、钱端升、曾昭抡、向达、郑天挺、俞平伯等为校务委员，汤用彤为常务委员会主席，许德珩、钱端升、向达等六人为常务委员，曾昭抡为教务长，郑天挺为秘书长，汤用彤为文学院院长，向达为图书馆馆长。

11日　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

该信由刘乃和起草，再经陈垣亲笔改定，然后又请范文澜修改。范文澜字斟句酌后，并无大的更动。4月29日定稿，5月11日由《人民日报》发表。

信中说：“你曾对我说，‘共产党来了，绝无自由’，并且举克兰钦克的《我选择自由》一书为证。我不懂哲学，不懂英文，凡是关于这两方面的东西，我都请教你。我以为你比我看得远，比我看得多，你这样说，必定有事实的根据，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曾在我脑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知道新生的力量已经成长，正在摧毁着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我要留下来和青年们一起看着这新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以往我一直是受着蒙蔽，适之先生，是不是你也在蒙蔽着我呢？……我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认清了

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认清了现在的时代，……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关系，所以我们时常一起讨论。你并且肯定了我们的旧治学方向和方法，但因为不与外面新社会接触，就很容易脱不开那反人民的立场。如今我不能再让这样一个违反时代的思想所限制，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方法，在立场上是有他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研究历史和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相同，应该有'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两重任务。我们的研究，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部分，既有觉悟后，应即扭转方向，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不为反人民的统治阶级帮闲。……我一直不同意你在政治上的活动，但是我先前并不知道你在服务于反动统治政权，……我现在很诚挚地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幡然悔悟，真心真意地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将来我们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该信发表后，国内外报刊争相转载。12日《进步日报》转载，同时发表社论。这反映了中共对胡适及其他在海外知识分子的统战意向；不久又转载于香港报纸，6月间便有英文译本传到各地。

6月18日胡适得到英译本，其6月19日日记说："此绝非伪作的。全函下流的幼稚话，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次日日记曰："今天又细读陈垣公开信英译本，更信此信不是伪造的，可怜!"再后一天，他读到中文本，愈发确定此信出自陈垣之手。不过，后来胡适发了"考据癖"，根据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信中有关书信日期又有错误，故断言此信是别人假造的。1950年1月9日，胡适作《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

29日　范文澜在《进步日报》发表《谁是历史的主人》。

此为范文澜在北京大学所做的演讲。作者明确指出："中国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加上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和统治阶级中在政治上、军事上做过有益于人民事业的人。过去的历史是以帝王为主的历史，我们今天要推翻它。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6月

16日　《光明日报》在北平创刊。

章伯钧任社长，胡愈之任总编辑。毛泽东题词："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初由民盟主办，后为中共中央直属中央宣传部代管。

23 日　范文澜在《人民日报》发表《再谈谁是历史的主人》。

此为范文澜 1949 年 5 月 30 日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的演讲。

作者指出，一切历史现象“追溯到最根本的因素，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是劳动人民在一定的相互关系条件下拿着工具在生产物质资料。现在我们对几千年历史的看法，必须彻底翻他一个身。过去读历史，只看生产关系里面的一面，偏重在各个朝代的盛衰兴亡，典章制度的沿革改订，帝王将相的功过优劣，文武官员的升降黜陟，文人学士的佳话轶事，英雄豪杰的‘丰功伟业’等等，一句话，偏重在生产关系里高高在上的一面（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每个剥削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也曾有过它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对被压迫、被剥削、被统治阶级的一面，及生产关系里受苦受难的一面，是不重视和无视的，把他们反抗压迫的阶级斗争看作‘乱民’、‘叛民’、‘流寇’，至于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历史的决定的最后的因素，那就更谈不到了。这样的看法如果不改变，就永远找不到历史的主人，永远看不见历史的本质”。

是月　马克思著、郭大力译《剩余价值学说史》3 卷本由上海实践出版社出版。

郭大力在译完《资本论》后，便着手翻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并于 1943 年 1 月完成翻译。由于战乱等原因，该书一直未能出版，后经郭大力修订后于上海解放前夕出版。该书是郭大力最用心翻译的著作之一，在 20 世纪 60 年代修订《资本论》工作完成后，郭大力即着手重译该书，即使“文革”期间的挨批斗和半身瘫痪也未中辍工作。1976 年春终于全部完成重译工作，完成重译工作后不久，4 月 9 日，郭大力就突发心脏病去世。

吴玉章《中国历史教程绪论》由文明印刷所印行。

本书曾多次公开发表。其中一节最初发表于《解放》周刊第 52 期，另刊于 1949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8 日《人民日报》。

其中指出：“我们研究历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发现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加强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必然获得胜利的信心，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发展的规律，有其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因此，说到一般的共同性之外，一定要把握它的特殊性。我们反对那种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另外一种历史发展的道路，但我们并不反对说东方社会发展有它的一些特点”，“我们虽然是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但却不可拿抽象的社会学的公式去代替历史叙述”。

黎乃涵（黎澍）《辛亥革命与袁世凯》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由“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与妥协”、“袁世凯的窃国阴谋”、“大独裁者与政党政治”、“怎样上场，怎样下场”五章组成。作者运用唯物史观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政治情况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梳理分析，认为成败皆在于“妥协”：成亦妥协——胁迫黎元洪任都督，败亦妥协——让临时大总统给袁世凯。该书出版后不仅在社会上产生不小影响，而且对学术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旭麓称此书的基本论点“成为一般论述辛亥革命前后政治的蓝本”。严昌洪、马敏《20 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一文认为此书“堪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辛亥革命的少数开创性成果之一”。

1954 年该书改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齐思和在《燕京学报》第 36 期发表《毛诗谷名考》。

作者原本“想以《诗经》为基本史料，加上群经诸子、彝器铭文，作一篇《周代农业考》，以为《中国农业史稿》的发端”，后因感觉问题太大而分解为许多问题来研究，此文就是其中之一，系对《毛诗》中出现的 15 种谷物的来源、最早记载、发展、用途、历代学者之研究、国外相关记录等情况进行了论列。

同期还刊载了周一良《〈牟子理惑论〉时代考》、鸟居龙藏《辽上京城内遗存之石人考》、安志敏《沙锅屯洞穴层位之研究》、孙楷第《元曲家考略》、王钟翰《清世宗夺嫡考实》等文。

陈梦家在《燕京学报》第 36 期发表《六国纪年表考证》。

第 37 期连载。该文分别考证了周、晋、魏、赵、韩、田齐、燕、秦的世系。此文是陈梦家年代学研究的代表性论著之一。

张纯明在《岭南学报》第 9 卷第 2 期发表《清代的幕制》。

该文对“幕”的起源，清代“幕”的性质、种类、流品、特点，“幕与案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同期还刊载了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李镜池《周易校释》，冼玉清《陈白沙碧玉考》，邵君朴《井田制度考》等文。

艾思奇《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由华北大学出版。

沈志远《社会形态发展史》由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出版。

7 月

1 日　中国史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

由王冶秋、王重民、王伯祥、尹达、白寿彝、向达、吕振羽、吴玉章、吴晗、吴泽、宋云彬、杜守素、余嘉锡、余兆祥、李则刚、周谷城、周予同、尚钺、金灿然、邵循正、范文澜、侯外庐、马衡、翁独健、梁思成、容肇祖、唐兰、陈垣、陈家康、陈述、郭沫若、嵇文甫、张云波、华岗、叶丁易、叶蠖生、杨绍萱、杨东莼、楚图南、裴文中、翦伯赞、邓初民、邓以蛰、黎锦熙、郑振铎、郑天挺、齐燕铭、钱杏邨、韩寿萱、罗常培等发起。

下午，发起人会议在北京饭店举行，到会者有郭沫若、范文澜、邓初民等30余人，郭、范、邓等发言，“一致表示全国历史工作者应团结起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会议通过了筹备会的组织规程和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并决定迅速筹备召开全国历史工作者代表会议，选举了筹备会的常务委员会，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邓初民、陈垣、侯外庐、翦伯赞、向达、吴晗、杨绍萱、吕振羽等11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任副主席，侯外庐、杨绍萱任秘书，承办全国历史工作者代表会议的筹备事宜。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规定了该会的宗旨、会员和组织等一系列重要原则，其宗旨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会员须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赞成本会宗旨，并遵守本会会章。该会的最高领导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由大会选举理事若干人组成理事会，为大会闭幕后的执行机关。理事会认为必要时，可设立各种委员会，从事调查、发掘、研究、编辑等工作；可组织各种学习小组，举办讲习会。省或中心城市成立分会，须经理事会批准。

未得邀请的顾颉刚在1949年7月11日日记中写道：“报载北平成立新史学研究会，在南方之伯祥、寿彝皆在，而无予名。予甚为新贵所排摈矣。予为自己想，从此脱离社会活动，埋头读书，庶几有晚成之望。”

6日　周恩来作《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其中指出：“农民是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中国的历史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一部农民战争史，而近二十九年来乃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史，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有熟悉农民、了解战争的任务。”

7日　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等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庆祝“七七”抗战十二周年大会。

14日　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发起人会议在北京召开。

朱德、周恩来、郭沫若等出席。郭沫若在开幕词中提出，建立真正社会科学的使命“落到大公无私的世界的真正创造者——无产阶级的身上”。

是月　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概要》由三联书店出版。

《绪言》云：在中国学术的园地里，先秦诸子的思想，无疑地是第一批开出来的鲜艳美丽的花朵，其社会根源就在那个时代正是中国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变革时代，“学术史上的‘百家争鸣’，正好反映着社会史上的氏族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整个的先秦诸子思想，在客观上表现出了一种好象有机的组织的样子，一一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家和家之间，派与派之际，有着某些斩不断的葛藤。研究诸子的思路必须‘知人论世’地从这些葛藤中间去找出它们的来龙去脉才能正确地把握一家、一派、一人的思想真面目”。作者既努力还原诸子思想的本来面目，又寻找诸子思想演变的规律。

1982 年金应熙评价此书说：“这本著作特色之一是非常重视在探讨先秦各家思想社会根源的基础上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如墨家和儒家，稷下黄老学派和儒家孟、荀，墨辩和名家等无不互相制约，互相依存，一家学说往往在批判另一家学说的过程中也受到了被批判者和影响。这样，‘整个的先秦诸子思想，在客观上表现出了一种好像有机的组织的样子’。这本著作就试图从阐述先秦各家思想的兴起、衍变、继承、递嬗，即在弄清其来龙去脉中，去正确地把握一家、一派、一人思想的真面目，并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由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出版。

周积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一文认为“该书分述史前期、邃古期、南诏期、段氏期大力地区的宗教、居住、葬法、服饰、语言、姓氏、习俗，颇具文化史与人类文化学的价值”。

1978 年，李家瑞对此书进行校读，并有中华书局改名《大理古代文化史稿》再版，后被收入《民国丛书》第 5 编。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由中华书局出版。

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史大纲》由中华书局出版。

方且编《中国共产党史纲》由上海编译社出版。

8 月

14 日　毛泽东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此文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系列

评论之一，意在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成功的原因做出理论上的说明。

文中把是否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看作唯物唯心两种历史观的分水岭。他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用这个观点解释历史就叫做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就是历史唯心主义。”

其中还提到：“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是月　刘大年《美国侵华简史》由华北大学出版。

此书论述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8年9月一百多年的美国侵华史。作者指出该书“是在范文澜同志赞助下写出来的”，实际上提出较切实修改意见的是时任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有研究者指出，该书由于具有一定学术底蕴，又高度契合当时政治形势，出版后迅速风行全国，被不少地方作为时事学习材料，在社会、学术领域产生了不小影响。

1949年11月被北京新华书店收入“新华时事丛刊”重版，此后多次再版。

顾颉刚到北平主持禹贡学会理监事会，组织学会保管委员会，推于省吾为主席。

9 月

8 日　《新建设》创刊。

其前身是1946年6月出版的《中建》半月刊。《中建》是一本综合性刊物，总社在上海，编辑出版在北平。其宗旨是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团结和教育各民主党派及全国广大民众。由于《中建》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创办，一些共产党人也参与其中，1949年9月被查封。《中建》停刊后，《新建设》杂志创刊。编委会负责人是费青；编委为向达、吴晗、李广田、袁翰青、张志让、费于、费孝通、闻家驷、雷洁琼、樊弘、潘静远、钱伟长、钱端升、严景耀。董事长王艮仲、费振东、潘祖丞。《发刊词》声明：“过去《中建》的任务，主要是在破坏”，《新建设》此后的任务，“主要的将是为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建设而提供我们的意见和方案”。

1956年曾合并到《光明日报》社，编委会和主编几度更易。到1958年，编委会负责人为吴晗，主编孙承佩。1958年秋，中宣部决定将《新建设》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领导，成为我国第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杂志，1966年停刊。

15日 《学习》杂志创刊。

此刊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而创办，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设有专论、问题商讨、名著题解、学习经验、读书笔记、读者笔谈、传记、学习测验、名词解释等栏目。

艾思奇的代发刊词《从头学起——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指出："过去我们一般的干部和群众的马列主义知识水平是很低的。一方面，广大地区和主要城市是处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就是死罪。解放后，马列主义思想对于人民群众还是陌生的，许多人甚至对此毫无所知。而旧社会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反动派的宣传都还保留着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解放区是长期处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马列主义的学习受着相当大的客观上的限制，许多干部虽然在斗争中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他因为没有认真学习过马列主义的理论，就不能把自己的经验加以总结、提高。"而新中国的成立，为人们"从头学起"，普遍开展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运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

此刊成为当时学习马列主义的主要理论阵地，"在建国初期，面对广大干部急需社会科学、哲学知识的情况，该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另外，该刊经常发表一些政策方针性和重大理论性文章，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1951年4月，学习杂志社从三联书店独立出来，成为中宣部的下属单位。1958年6月，毛泽东将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更名为《红旗》，并由中共中央主办。1988年7月，更名《求是》。

16日 毛泽东发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文章批驳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认识。艾奇逊试图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思想状况去说明中国革命的发生，认为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

20日 齐鲁大学文学院制定改革国学教研的计划。

改进计划书中说，齐鲁国学研究所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对中国

古代文化、古代哲学和一些专题研究在学术上“实已有相当的贡献”。报告总结说：“但以今日之观点论之，仍不免有其自身的缺点，即在研究工作上，仍不能超出东西汉学家及中国乾嘉学派范围之外，其重心趋重于个别文献之整理，而不能有系统地说明整个社会演进之过程。流弊所及则与现实脱节，与群众无联系，不能有助于社会之进步。今后当重订研究计划，在总的原则下，是以马列主义观点批判中国文化遗产及研究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

这份报告还设计了个人研究与集体分工的研究方案，改变以前学者之间毫无联系的弊端，将齐鲁文学院的研究范围划定在自殷商起至秦汉阶段，依照社会发展史的过程，或研究基层的生产关系，或研究上层各方面的文化，最终形成一个整体的研究。张维华向哈佛燕京社报告说，齐鲁制定了邀请“杰出人才”来讨论研究工作的计划，并要“特别看重新观点”。而实际上这一时期，并没有产出多少具体成果。

27 日　周口店遗址重新发掘。

因抗战爆发停止发掘后 12 年，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重新开始。这次发掘由裴文中指导，贾兰坡负责具体工作。

29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此文件具有新中国临时宪章的性质。其中第四十四条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

是月　周谷城《世界通史》3 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上起初民时代，下迄“重商主义”（即资本主义），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历史现象，囊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社会各方面。本书采用了大量国内外材料，其中许多是原始材料，对前人的学说、观点，也择要加以评介。

作者为了挑战“欧洲中心论”，广泛运用比较法，凸显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明的特征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改变了过去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通史体系，形成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著述格局。作者指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

在《世界通史》第一篇中，周谷城列举了六个远古文化区，即尼罗河文化区、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河流域文化区、中美文化区，在考察西方各文化区各文明特点的同时，对古代东方各个文化区的政治、经济、阶级关系、文化特点等也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这些东方文明均有自己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磨

灭的重要作用。

周谷城此书扭转了当时世界史只是“西洋史”、区域史的格局，在内容、体例上别具一格，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世界通史著作，也是民国时期我国唯一的一部世界通史。它在体系及论断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准。有学者评价它“是中国历史学家贡献于二十世纪世界史学界的一部珍贵的科学著作。它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吴泽《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殷代奴隶制社会史》)由棠棣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复旦大学史地系开设的殷商史讲稿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完稿于1944年初。

全书凡四编十五章，近四十万言。上起成汤建国，下迄武王灭商，网罗商代六百多年间史事。作者认为殷代是奴隶制社会，符合亚细亚的特点。作者对世界当时的三大文化区域（殷商、埃及、巴比仑）进行了比较研究。

本书是吴泽构想中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第二部著作（第一部是《中国原始社会史》)。本书中大量引用了考古资料和甲骨文资料。后胡厚宣曾撰文对本书中引用甲骨文资料的一些错误进行批评。

同年11月再版；至1953年出版修订本；前后共印6版。

顾颉刚筹划复刊《禹贡》落空。

为使禹贡学会与新史学会建立联系，顾颉刚将一份学会简况和学会成员名单交与新史学会。在拜访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时，胡氏谈及《禹贡》杂志可由新华书店续出。顾以为“此事如能成”，学会便“能欣欣向荣，使学术工作逐渐推进矣”。但一个月后胡氏改口，谓由新华书店代售固可，若要由其出版则须待开会商议。复刊事遂作罢。

1955年2月6日，顾氏与学会理、监事开会，商学会结束办法，议决将房屋捐献政府，图书赠民族学院，刊物分送各大学及图书馆，现金慰劳军队。“禹贡学会从此终了矣！”

萧棠《资本主义社会史论》由天津知识书店出版。

贾植芳《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

10月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5日　冯友兰致信毛泽东，表达改造自新的意愿。

信中云："在参加这几日的庆祝的时候，我于欢喜之中，感觉到十分愧悔。因为在过去我不但对于革命没有出过一份力量，并且在对日抗战时期，与国民党发生过关系，我以前所讲的哲学，有唯心及复古的倾向。这些在客观的社会影响上说，都于革命有阻碍。各方面对于我的批评我都完全接受。但是我也要表示，我愿意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努力改造我自己，作一个新的开始，使我能随着你及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建设中，尽一份的力量。"

冯友兰表示，将在五年之内，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重新改写二十年前所作《中国哲学史》，愿以此项工作迎接即将来临的文化高潮。

毛泽东接信后，于 10 月 13 日回复说："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的态度为宜。"

9 日　郭沫若被选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11 日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与北京六大学史学联合会在师大文学院历史学会举行联席会议。

师大历史系主任侯外庐，戏曲改进局杨绍萱，北大、师大、清华、辅仁、燕京、中法六校史学会代表出席，师大历史系同学 40 余人列席。主席侯外庐报告召开联席会议的意义与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成立的经过，指出：新史学的研究为实行《共同纲领》中文教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尤其对新民主主义的学习，是个打头阵的工作。会议商讨了今后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地召开新史学座谈会和讲演会，与中学历史教员取得密切联系等问题。

六校代表一致建议新史学研究会出版专门的历史书刊和通俗刊物，编定优良的中学历史教材，对古代史迹作进一步的考证，把全国各地研究历史的人组织起来，运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批判旧的历史，养成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以便充实新史学的建设工作。

在统一部署下，新史学会举办了一系列讲演会，主要目的是宣传历史唯物论。

12 日　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发布《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

规定要求高等教育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总方针下真正提高一步、前进一步，使青年们获得科学的世界观、社会观和方法观，正确地了解中国与外国的历史，批判地接受中国的与外国哲学、文学以及其他方面的学术遗产，研究和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培养出大批真正能够为人民服

务的革命和建国人才。

明确废除“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课程，规定文法学院的必修课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新民主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文件还分别对中国文学系、哲学系、历史系等系的必修、选修课程作了具体规定。历史系课程有：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马列主义名著选读、中国通史、世界通史。

19日　郭沫若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

是月　华岗《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由海燕出版社出版。

该书出版后销售颇好，至1950年10月，海燕出版社已印刷3版。1955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该书。该书后被译为日文和俄文。

齐思和在《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发表《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作者对近百年来的史学发展进行总结。他说，清季史学界发生了一场革新运动。第一位积极介绍西洋史学并呼吁改造中国史学的是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输入引起了改编国史的运动，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都是新史学思想的产物。到五四前后，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动，历史学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古史辨运动遂应运而生。从五四到北伐，在时间上，虽然只有七八年，但是中国的学术思想，又走到第二个解放时期。北伐以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史，遂更展开。假如“古史辨”运动可以象征五四的史学，那么中国社会史论战便可以象征北伐后的史学。论战第一声炮是陶希圣的《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到了郭沫若，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才真正地走上了学术的路上。此外，李大钊、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也被重点论及和表彰。

此文是研究20世纪史学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它的最大特点是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线索。在齐氏笔下，民国以后的史学版图已由史料学派一统天下，改为唯物史观派在北伐后向中央位置进军了。

同期还刊载了安志敏《中国史前时期之农业》、赵靖《宋代之专卖制度》、鸟居龙藏《日本古代的瓦器》等文。

东北图书馆编印《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辑。

选入明天启三年至崇祯十七年（1623—1644）“内外官署之题稿、奏本、折帖”等525件。此次档册的出版面世，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11 月

1 日　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

据 9 月 27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在政务院之下设“科学院”，行使管理全国科学研究事业的政府行政职能。中国科学院是在接收前北平研究院的原子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植物学研究所、史学研究所等机构的基础上成立的。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藏书亦归本院。郭沫若任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任副院长。

12 月

16 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任命吴玉章任校长。

是月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召开筹备会。

周谷城、李亚农、金兆梓、周予同、李平心、顾颉刚等人参与。次年 3 月，设置了机构和职员。按照总会规定，南京、杭州也归入上海分会活动。

周一良在《燕京学报》第 37 期发表《乞活考》。

作者认为在西晋末年东晋初年，黄河两岸存在一个“团结最坚、活动地域最广、历时最久者，厥为晋史零星记载而语焉不详”的流民组织——“乞活”，乃搜集材料，对此组织的发展和演变轨迹进行考辨，并分析了其对两晋社会产生的影响。

同期还刊载了于省吾《重文例》、陆懋德《中国发现之上古铜犂考》、程金造《史记体例溯源》、周汝昌《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等文。

罗福颐在《燕京学报》第 37 期发表《契丹国书管窥》。

该文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契丹大小字的历史，并将所能见到的契丹字汇录、分类，并注出出处，为此后的契丹研究提供了方便。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本院成立第 20 周年专号”下由中国科学院出版。

该册刊载郭宝钧《古玉新诠》、余嘉锡《释伧楚》、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余逊《读〈魏书·李冲传〉论宗主制》、张政烺《一枝花话》、石璋如《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邓广铭《宋史刑法志考证》、张秉权《甲骨文类比研究例》、黄彰健《洪武二十二年太孙改律及三十年律诰考》、陈述《乣军考释初稿》等文。

中国科学院出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4本。

该本刊头标“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扉页有中国科学院编译局说明：“本集刊原系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因在本院成立以前即已交印，故仅改革其隶属关系，暂仍旧贯。”

何兹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4本发表《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

该文是对全汉升《中古自然经济》一文提出的商榷性文章，作者认为南北朝时期北方由于战乱等原因，退回到自然经济状态，但是南朝由于北方人口、财富、生产技术等大量南移，加速南方开发，交换经济发达。此文就是通过对东晋南朝钱币使用情况的梳理，来证明这一显现，并探讨由于钱币大量使用带来的经济上及财政上的相关问题。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南朝的钱币使用已经非常活泼，在公私经济生活中，钱币均占重要地位。钱的使用虽然尚未能完全把谷帛的使用排除于交换手段之外，但这只是由于南朝广大的地域中，各地经济未能平衡发展所致”，所以“把南朝看成是一个自然经济的时代，大概是不妥的”。

作者在自述中指出，“文章自然可补全汉升先生文章的不足，自然也纠正了全文的不确之处”。该文是较早研究南北朝贸易、货币及社会经济问题的论著，对相关研究有一定影响。

同期还刊载了高去寻《评汉代以前的古镜之研究并论“淮式”之时代问题》，傅乐焕《宋辽聘使表稿》，王崇武《刘綎征东考》，芮逸夫《伯叔姨舅姑考》，劳榦《象郡牂柯和夜郎的关系》、《居延汉简考证补正》，张政烺《王逸集牙签考证》等文。

全汉升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1本第1分发表《清末汉阳铁厂》。

作者指出，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新式制炼钢铁的工厂，研究其历史“意义非常重大”，故梳理了清末汉阳铁厂从创办到1908年汉冶萍煤铁长矿有限公司成立之间的历史。作者将这段历史分为官办和官督商办两个时期，并对这两个时期的燃料问题、机器设备问题、厂址问题等进行了初步考辨，并认为汉阳铁厂之所以失败，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关税不能自主”。作者在文末还指出，“中国近代工业化运动所以得不到多大的成绩”，可从汉阳铁厂的研究中“知道一些消息”。

该文是为数不多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早期基础性研究之一，具有不能忽略的学术价值。

同期还刊载了陈槃《古社会田狩与祭祀之关系》、《谶纬命名及其相

关之诸问题》、《“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之诸问题》，王叔岷《庄子校释后记》等文。

陈寅恪在《岭南学报》第 10 卷第 1 期发表《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

作者认为白居易虽然晚年皈依佛教，实际上他与道教关系更为紧密，是一个“老学者”，“其趋向消极，爱好自然，享受闲适，亦与老薛有关者也”，之所以如此，“不能不于其家世之出身，政党之分野求之”，盖“当日士大夫之政治社会，乃老学之政治社会也，苟不能奉老学以周旋者，必致身败名裂”。

同期还刊载了陈寅恪《论元白诗之分类》、《元和体诗》、《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陈槃《谶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容庚《飞白考》等文。

是年

上半年，顾颉刚重新标点《五经通论》及《新学伪经考》毕。

顾氏说：“现在研究经学人士寥寥可数，只沈凤笙、张西堂数君。予苟不为，则康崔之绪即断，故此后研究工作，必倾向经学，庶清代业绩有一硕果也。”其论今日治经之意义云：“我辈生于今日，其所担之任务，乃经学之结束者而古史学之开创者。此非吾人故意立异，乃自宋至清八百年中积微成著之一洪流，加以西洋科学之助力，遂成一必然趋势也。必将经典弄清，中国文化史方能写作，否则识其外层而不能解其核心，于事仍无益也。”

顾颉刚《浪口村随笔》由合众图书馆油印。

1939 年，顾颉刚居昆明北郊浪口村，得暇整理旧日见闻撰为笔记，并证之故籍。1946 年东归后，又续有增益。1949 年顾颉刚再次加以整理编排，新作或重作三十四篇补入。

该书共分六卷：“卷一论地理，继承昔日禹贡学会工作，为民族史与疆域史之探求者也。卷二述制度，为周秦之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作钩沉，拟以树立古代史之骨干者也。卷三考名物，此十年中学虽不进而舟车之辙迹弥广，即今可以证古，即边疆可以证中原，对于大小名物时有会悟，创为新解者也。卷四评史事，卷五绎文籍，皆衍《古史辨》之绪，欲作一番洗刷工夫，期揭出其真相者也。卷六记边疆，吾游西北、西南，见蒙、藏、回、爨诸民，相其文化，叩其历史，知实为绝好工作园地。”

本书用民族风情和民俗习尚证诸中原古史，开创了民族考古学的新领域。其中四十余篇经多次修订，又增加若干篇章，辑为《史林杂识初编》，1963年初由中华书局出版。

夏，钱穆南走香港，并在是年秋创办“亚洲文商夜学院”。

1950年亚洲文商夜学院更名为新亚书院。

后记

在本书即将付印之际，笔者有几句感谢的话必须要说。

本书的编撰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最早参加此项工作的是陈峰博士和李扬眉博士，后来李扬眉因另有任务退出，郭震旦博士和姜萌博士陆续参加进来，并成为主力。笔者感谢这批年轻的博士，没有他们的十数年的辛劳，笔者的愿望永远无法成为现实。在这十多年中，他们也逐步成长起来：陈峰目前已是山东大学文科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导”之一，在“民国学术史”领域已享有一定声誉；郭震旦副教授在学术界亦已崭露头角，有先前出版的《〈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和此部编年（1950－2000）为基础，相信他在“共和国学术史”研究上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厚积薄发，此之谓也；姜萌作为我们这个学术团队中最年轻的一员，目前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他特别勤奋又能吃苦，并有相当的悟性，我们期待着他在“清末民初学术史”研究领域破土而出。除上述三人外，张富祥先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李平生先生（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长，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一直怀着极大的热忱关注着本书的编撰，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李扬眉博士（《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李梅博士（《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俞艳庭博士（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蒋海升博士（山东政法学院教授）、杨华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黄广友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孙宜山博士（《山东大学报》主编）、王绍樱硕士（《文史哲》英文版行政助理）等，都程度不等地为本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弟子不必不如师”，正在笔者这里变为事实。我为自己与这批英才结下师生缘分而深感荣幸！

在漫长的编撰过程中，本书有幸得到多个基金的资助。在这里，首先

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提供的后期资助，特别是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对书稿所提出的十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对于本书的修改、提升和完善，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杰出学者奖励基金”、山东大学“985工程二期”及“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团队基金”，也先后对本书提供了资助，没有这些资助，本书的编撰将寸步难行。笔者在此代表这个编撰团队，对山东大学社科处历任主政诸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后要特别感谢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常绍民先生以及商务文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波先生对本编撰团队的厚爱，没有他们无私的帮助，本书是不可能如此顺利出版的。也要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刘翔先生，刘兄虽然是一个年轻的编辑，但却具有出类拔萃的专业素养，他从编辑角度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很多非常好的建议，为本书增色不少。

王学典

2014年7月5日

于韩国陶山旅次